

鐵窗丹心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中斗争纪实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鐵窗丹心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中斗争纪实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 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沈阳

铁窗丹心

Tiechuang Danxin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中斗争纪实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7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¾　插图：18
印数：1—2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中平　版式设计：晓　天
封面设计：安今生　责任校对：李守勤　雁　鸣

ISBN 7-205-01804-8/K·193

登记号：（辽）第1号　定价：8.00元

必须坚持革命气节

——为《铁窗丹心》一书出版而作

韩光

《铁窗丹心》是一本专题史料书。它所记述的是1927年至1937年间，在东北地区反动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的13个监狱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们坚贞不屈的斗争史实。本书编者为编成这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花了几年工夫，查阅了敌伪遗留下的有关档案，如审讯记录、判决书，以及敌伪人员佐证资料等；阅读了党的有关历史文献；还四出调查访问，从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和当事人亲属那里搜集了大量史料，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考证。因此，编入本书的史料可说是真实可信的。本书出版之时，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它既是为缅怀革命先辈的一份献礼，又为向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一种教材。作为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一个老战士，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本书展现的历史事实，将读者带回到半个世纪以前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的革命者从事革命工作和抗日救国活动，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经常受到敌特警宪的侦缉，难得有安身之所，一旦不幸身陷囹圄，等待他们的是手铐脚镣、刑讯拷打和死亡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坚守党的机密，保护党组织免遭破坏和其他同志不受株连，是每人

每时所要经受的严峻考验。本书列举的许多同志是经得起这种考验的。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着保全革命利益，坚持革命气节，宁可备受酷刑折磨，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他们把敌人的监牢、法庭直到刑场当做自己的战场，同志间团结相助，宣传革命主张，坚定、机智、顽强地斗争不息，无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我们读到当年这些同志的斗争事迹，仿佛重见他们丹心耿耿、铁骨铮铮的风采，感到一种令人激励的力量。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是讲骨气、重气节的民族。无数革命先驱者在推翻压迫剥削制度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临难不苟，坚持革命气节，集中地表现出我们民族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学习，继续发扬光大。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是人民的天下，后代革命者再也不会受到过去反动统治阶级所加的种种迫害了。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还会遇到不同于旧时代的考验。这就是能否经得起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的冲击和金钱、物质、色情等的诱惑；能否顶得住国际敌对势力为搞“和平演变”施加于我们的“软刀子”。在这样一些考验面前，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一定要怀着一颗爱国主义的赤胆忠心，始终不渝地保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色，在对外交往中珍重和维护我们的国格和人格，这同样是个坚持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990年10月　于北京

目　录

铁窗岁月

我所知道的狱中共产党人

狱中诗抄

狱中书信遗抄

狱中斗争大事记

参考资料

党的文献资料

敌伪文献资料

敌伪报载资料

东北地区敌伪监狱简介

血染的历史 悲壮的里程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被捕同志狱中斗争事迹综述

李国鸿 张大庸

中共满洲省委从1927年10月建立到1936年6月撤销，在八年又八个月的峥嵘岁月里，领导东北各地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在那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里，省委及地方党组织曾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有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志士陷于敌人的黑牢。除了极少数动摇叛变者外，绝大多数同志忍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顶住了敌人的利诱和劝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敌人虽然夺去他们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却夺不去他们顽强的革命斗志，他们把监狱当做特殊的战场，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狱中斗争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页页壮丽篇章。

中国东北地区是一块富饶的地方。由于富饶，为她的儿女提供了繁衍的乳汁；也是由于富饶，在近代史上，她又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和蹂躏的重要对象。

从19世纪末开始，沙俄在吞并我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之后，又从各方面加紧对东北内地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几十年的渗透，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直至军事的手段，终于在1931年侵吞了中国的东北，并由此侵入到中国的腹地。

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期，东北被奉系军阀所统治。张作霖为向关内扩张势力，曾于1922年、1924年进关发动了两次直奉战

争。奉系军阀为打内战，在东北大肆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滥发纸币，造成奉票毛荒，以清丈土地来勒索农民，强行征兵充当炮灰……广大东北人民无法忍受封建军阀的残酷盘剥和黑暗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城市工人不断地进行罢工，农民自发开展抢粮、抢盐、吃大户、抗捐、抗税、反"清丈"土地的斗争。

东北人民反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布城乡，孕育着一颗颗革命的火种。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在我国东北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18年以后，有4万多中国工人陆续从苏联回国，他们大部分经由哈尔滨到全国各地。他们从苏联带回许多振奋人心的"工人国"的真实消息，许多苏联报刊，从而扩大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派马骏、罗章龙、李振瀛、陈为人、吴丽石等人来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进行组建党团的工作。从1924年到1927年，哈尔滨、大连、沈阳、吉林、长春、牡丹江、双城、穆稜、北宁路、柳河、台安等地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央鉴于东北各地党组织日渐扩大，迫切需要统一的领导机关，以加强对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决定成立东三省（满洲）省委。但因派去筹建省委的邓鹤皋于1927年7月在大连被捕，满洲省委的筹建工作从而推迟。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建立东北统一的党组织，派中共直隶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组建省委。10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1928年9月召开第三次全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满洲省委。以下文中统称满洲省委）。陈为人任第一届省委书记。代表大会决定省委机关设在奉天（沈阳）。在大会通过的政纲中明确地提出："反对一切军阀间的战争"，

"驱逐日本军警出境"，"取消日本与张作霖所定的一切侵略的条约"，"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项斗争目标和任务。

满洲省委成立初期，除发展党的组织外，重点是领导工人运动，省委在其全部活动中，先后领导工人搞大小罢工达百余次。在农村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农民的斗争开始发展。在学生中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活动，较成功地领导了哈尔滨"一二九"学生运动，为中华民族生存、争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大批青年革命者。省委很注意搞兵运工作，在20年代末期就向奉系军阀部队及东北讲武堂派去我党骨干力量，为创立革命武装创造了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涌现出一股股的民众自卫军、抗日救国军等民间抗日部队，当时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满洲省委曾派优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夏尚志、邹大鹏等到义勇军里开展政治工作，并建立了党所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联合作战，结成了统一战线。东北地区坚持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27年至1937年，东北地区处在奉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满洲省委及各地区党组织领导东北广大人民向统治者开展了许多斗争，革命烈火遍布东北的城市和乡村，给反动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敌人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实施侵略阴谋，对东北地下党组织进行疯狂的镇压和血腥的屠杀，致使省委及各地党的组织多次遭到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被监禁，有的惨遭杀害。

这10年间，仅省委就遭到5次较大的破坏，先后有8位省委书记、11位省委常委被捕。据不完全调查，党团员爱国志士及革命群众有2800余人被捕；被杀害者，查到姓名的就有624人。

这些被捕的革命者，先后被关在奉天第一监狱，沈阳陆军监

狱，旅大日俄监狱，抚顺监狱，安东（丹东）监狱，吉林第一、二、三、四监狱，哈尔滨监狱，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及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设立的松花塾监狱，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秘密监狱等13座关押场所。

1928年12月28日前，东北为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易帜”之后为国民政府统治；“九一八”之后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伪满洲国统治。在这10年间，东北地下党组织遭大小破坏达90多次，其中有60多次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为。1927年至1931年“九一八”前，我们党在东北的组织先后38次遭破坏，其中12次是由日本附属地和租界地里日本警察署将革命者逮捕之后引渡给中国当局的。

尽管敌人对东北地下党组织进行镇压与破坏，但共产党人从未被反革命气势所吓倒，无论在任何地点和环境都在同敌人进行战斗。一个人被捕了，另一个人马上会接替上去；一个党组织遭到破坏，不久新的党组织很快重新建立起来。前仆后继，斗争不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白区搞地下斗争，被敌人通缉、逮捕是经常发生的事。因此，敌人的监狱也可以说是革命者一个特殊的战场。无数革命者在斗争中表现出至死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的信心，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形式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的斗争事迹是可歌可泣的，我们根据所收集到的真实史料，将他们的主要斗争概述如下。

一 在监狱中建立党的组织带领难友开展斗争

由于监狱环境险恶，敌人监视严密，在狱中建立党的组织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共产党人虽然身陷囹圄之中，但他们时刻都没

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自觉地发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凡是有党团员的地方，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们都尽可能地组织起来，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的集体。

在奉天第一监狱、旅顺日俄监狱、哈尔滨道外监狱、延吉监狱、吉林第一监狱、吉林高等法院看守所、长春监狱，在几个不同时期都相继建立过狱中党支部、狱中干事会、监狱工作委员会、绝食指挥部、党小组等组织。这些党组织带领被捕的党员及思想进步的难友，在狱中适时地进行了反虐待、反克扣、反打骂、争生存的斗争。还在某些监狱中组织过武装暴动。有的在狱中还秘密地发展党员，组织党团员学习党的文件、进步报刊，教青年难友文化、外语等。

监狱党组织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叛变自首、变节动摇分子进行斗争教育，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人。一个党内的叛徒要比敌人对党组织的威胁更大，是特殊而又十分危险的敌人。而在狱中想要除掉叛徒是极难做到的。但狱中党组织采取了三步措施：一是查清谁是叛徒；二是对叛徒进行分化瓦解，对重点人采取孤立政策；三是对变节动摇的人挽救教育，使他们终止变节行动，在法庭上翻供。

杨一辰在奉天警察厅押犯所和“北未决”号里搞了几次查叛徒活动，很快查出了三名叛徒，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让他们自我解脱，不要再自供、供人、“咬人”。这三个叛徒懊悔地低下了头，痛心疾首地作了检查，后来他们在法庭上都翻了供。赵尚志、杨靖宇、林仲丹、张有才等同志被审讯时，敌人将叛徒带来与他们当面对质。他们痛斥叛徒，将叛徒骂得不敢抬头正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被带走。

二 在敌人刑讯室、法庭、刑场上经住严峻考验

敌伪监狱是阴森恐怖的魔窟。一个政治犯一进监狱就给带上脚镣，轻者8斤，重者18斤。有些监狱还有木枷、单镙（12斤），带上这种刑具想迈一步都很困难。对女犯还设有牛皮紧身衣、苦衣（带刺）。真是求死不得，求生更难。刑讯室通常使用的刑罚有"老虎凳"、"上大挂"、"压扛子"、"灌凉水、辣椒水、煤油、马尿"、"滚钉板"、"站笼"、"钉竹签"、"开水烫"、"烙铁条"、"火炉烤"、"香火烧"、"投水牢"、"冻冰棍"、"电刑"等几十种。许多被捕的革命者，承受了敌人的这些种种酷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利益。

杨靖宇1929年8月任抚顺特支书记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经日警特的多次审讯，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在叛徒范青的指认下，敌人断定他是抚顺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他施用重刑逼供连续五六个昼夜，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但他却始终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

1930年11月11日，林仲丹被捕。敌人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确认是满洲省委派来的重要干部，对他多次审讯，严刑逼供。林在审讯中大义凛然，同敌人进行辩论，敌人反复地折磨他，可是他的嘴始终未被撬开，因此，敌人曾怀疑他是"疯子"。

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被捕后，由于叛徒指认他是特委领导人，敌人昼夜疯狂地对他进行审讯，杨被打得死去活来，仍不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又对他采用"疲劳战术"，日夜不让他休息。杨毅然地以绝食抗拒敌人的刑罚。敌人恶狠狠地说他是个"亡命徒"。杨一辰蔑视一笑，挥笔成诗：

法西斯残暴世间无，

文明新刑灌"醍醐"（指灌凉水）。

力竭声嘶犹苦斗，

赢得荣名亡命徒！

在敌人法庭上，许多革命者借机宣传共产主义和揭露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罪行，他们把法庭当做宣传阵地，以法庭做战场。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在敌人的法庭上昂首挺立，慷慨陈词："我们中国共产党现阶段，要限制资本家的暴利分配。平均地权，限制资本主义……将来要在我国建成人类极为美好的共产主义。"共青团大连地委书记魏长魁在敌人法庭上据理抗争，弄得敌法官手忙脚乱，十分难堪。《大连新闻》曾以《在舌尖上燃烧着不屈的言辞》为题报道说："主义者之一魏某对当局审问豪言处之……"

有的同志被捕后，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编假口供蒙骗敌人，尽力掩护自己和同志的真实身分。刘少奇被捕后，咬定自己是工人，审讯者看他的手没有老茧，问他是什么工人？刘少奇不紧不慢地说："我是印刷厂的排字工。"弄得敌人哑口无言。他在奉天高等法院法庭上，沉着地同法官周旋，说他是武汉失业工人，听说奉天好混，来到奉天，刚下车路过纱厂就叫他们抓去了，搞什么工潮我概不知晓。他镇静自若地回答法官的一一提问，最后法庭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只好将他释放。

奉天特委第四届书记张有才因被叛徒于冀贤出卖而被捕。日本宪兵队多次对他刑讯逼供，而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当高等检查官将叛徒于冀贤带到庭上同张对质时，张有才向法庭反诉说："于是卖国求荣，栽赖我是共产党。"于无言以对，检察官只好无精打采地宣布休庭。

刑场是身陷敌手的革命者接受最后考验的地方。许多共产主义战士和爱国志士，当他们面对敌人的屠杀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脸不改色心不跳，昂首阔步，大义凛然，表现出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气概。

延吉区委书记曹锡基等30名同志被处决时，敌人将他们关在

一座草房里，浇上汽油，用火活活将他们烧死。当大火冲天烧起时，曹锡基带领大家在烈火中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直到全部壮烈牺牲。

赵一曼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在刑车上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而又悲壮的遗信。信中最后说：“在你长大成人之后，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革命文艺工作者共产党员金剑啸在刑场上敌人送他一杯“临刑酒”他拿起酒碗狠狠地砸在日本宪兵队长的头上，仰天大笑，慷慨赴死。

爱国志士苗可秀，在凤凰城南山就义时，被绑在一棵树上，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喊革命口号，用笑藐视敌人，场面十分悲壮，目睹者无不潸然泪下。

这10年间东北被杀害的何止这几个，可以说，成百成千的同志牺牲了。我们揭开历史这一页，仿佛看到，东北大地洒满了烈士的鲜血。

三　团结教育难友，为争生存而斗争，扩大党在狱中的影响

黑暗而狭小的牢房，只能限制革命者的行动自由，却关不住革命者为人类解放而战斗的决心，更动摇不了共产党人推翻旧世界的坚强意志。共产党人在狱中不仅锻炼了自己，而且时刻在寻找各种机会传播革命火种，教育难友奔向光明，投身革命。许多人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共产党，不少人出狱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参加了我党组织的抗日部队，有的经过考察具备条件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人在狱中不仅口头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宣传我党的主张，而且还写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宣讲革命故事来鼓舞难友

们。在奉天第一监狱的杨一辰、王德海、温建平，哈尔滨监狱中的吕大千、赵一曼、董雨航等都写了不少诗词。

哈尔滨道外监狱，关押了大批的政治犯。原哈道外团区委书记董雨航曾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狱中革命者的心情：

黑暗的牢房，关不住阳光，

镣铐铁窗，挡不住共产主义的巨浪，

铁棍木棒扭不转新时代发展的方向……

同牢的青年知识分子高凤鸣翻译了俄国《祝福神圣的贝加尔湖》一首歌曲。有的编写了《牢笼之歌》。王鹤寿在狱中教难友们唱《国际歌》，并讲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巴士底尔大狱》。

1933年吉林特支遭破坏，被捕的同志在狱中临时党团支部的领导下办了一个"微型"刊物《夜光》。这是他们自喻坚持真理向往光明的象征，是坚持斗争精神的生动写照。在发刊词上写道："我们生活在黑暗阴森的牢狱里，大家都向往光明，但愿这个《夜光》能给难友们一点光明。"这个小小的秘密刊物是监狱中斗争的一面旗帜，临时党团支部通过它来指导狱中斗争。

旧监狱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监狱党组织带领广大难友为争取改善环境和生活条件而进行了许多斗争。陈潭秋、孟坚、王鹤寿等在哈尔滨狱中关押时，狱方不准与家人通信、会面，不准看书看报。为改变这种非人的待遇，陈潭秋让孟坚代表政治犯同狱方交涉。在政治犯们据理力争下，狱方终于答应与其他刑事犯同等待遇。李子芬等被押到辽宁第一监狱青年监后，狱方令他们每周听一次"教诲课"，狱方常常请来神父给犯人们讲"赎罪经"等。"狱支"让赵尚志公开站起来与神父辩论，将这位神父弄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迫使狱方只好暂停上课。

在东北许多监狱里，反虐待、反克扣、争生存的斗争，也一直没停止过。在奉系军阀和日伪统治时期，先后搞大小绝食斗争上百次，这是以集体生命同敌人进行苦斗的较量。1934年春，在

哈尔滨道外监狱，为迫使敌人改善难友们的生活条件，由原军委书记姜学文、共产党员陈屏章、董雨航三人组成了绝食指挥部，在三个监号以政治犯为主的60余名难友开始了绝食。在整个绝食斗争中，体现出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团结奋战的精神。使狱方从不理睬到重视、焦急、紧张转而向难友们乞求复食。最后，在狱内外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在第七天答应全部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些斗争，不仅改善了狱中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在难友中扩大了党的影响。

四　伺机组织越狱、暴动

身陷牢狱的共产党人，除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狱内斗争外，在东北的几个监狱里，在党的领导下及部分爱国志士参加下，曾搞过几次越狱和武装炸狱。

延吉监狱、吉林第一监狱的越狱斗争先后获得成功，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1年，在延吉监狱中秘密建立起党的监狱委员会，并组成了以原汪清县委书记金勋为首的越狱指挥部，成立了爆破、放火、抢枪、突击等小分队，同时得到狱外党组织的支援。1931年夏、1933年4月搞过两次越狱，都因出现动摇分子及叛徒而告失败。1933年冬，主要领导人金勋等被敌人杀害。秘密隐藏下来的越狱指挥成员金明柱，又经过一年多的认真准备，秘密串联发动。组成17人的敢死队，于1935年6月7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冲出去100多名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犯，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老共产党员于树功1930年从苏联回国，刚越境就被东北当局逮捕，判无期徒刑，关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他忍辱负重，装做顺从老实，服服贴贴地干杂活，但他内心一刻也没停止寻找时机冲出牢笼。1937年青年政治犯赫洵被判刑押到吉林第一监狱，不久他

们就成为亲密战友，日夜不停地策划越狱。他们争取了一名有爱国思想的看守长，在他的帮助下，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巧妙而从容不迫地在家属、亲友们的帮助下，越狱成功。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北京，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当年伪《大同日报》曾披露过这条惊人消息："吉林第一监狱两名政治犯越狱。"

五　争取、教育狱中敌伪人员为我党服务

争取、教育狱中敌伪中下级人员为我党服务，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促使被捕的同志尽快结案、营救出狱，或者改善狱中生活条件。

为争取、教育狱中敌伪人员，先后被捕入狱的陈潭秋、赵毅敏、杨一辰、张干民、赵一曼、杨坚白等同志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党在狱中开展各种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党在奉天第一监狱争取、教育、团结敌伪人员比较突出而有成效。赵毅敏被判刑投入劳役后，在医务所争取教育了医生王常泰、勤务员曹鸿祥；张干民争取了副看守长王惠风；杨一辰争取了教诲师宋大公、技师王宏久。他们从外边捎带报纸、党的宣传小册子、密信，甚至党内文件等，为我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给监狱中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在哈尔滨监狱中，争取敌伪人员更为突出的是赵一曼同志。她用很短的时间，就将看守董宪勋、见习护士韩勇义争取过来，并全力以赴地帮她逃跑，对她所进行争取工作的效果，伪滨江省警务厅在给上级的报告中也不得不"表示佩服"。赵尚志在吉林第一监狱争取了"教诲师"刘作垣，后来介绍他入了党并担任过长春特支的负责人。陈潭秋在哈道外狱中，争取了一位姓李的看守，他为我党提供很多情况。被我们争取过来的敌伪人员都不同程度地为我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六　狱内外党组织协力营救被捕同志

满洲省委十分关心被捕同志在狱中的情况，通过赤色互济会，负责营救和及时掌握被捕同志在狱中的表现。营救狱中同志，是一场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斗争。

1931年3月27日《中共满洲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告同志书》写道："在狱的同志们！你们与敌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扩大会议非常满意，你们要加强锻炼你们的奋斗精神，保重你们有用的身体，他日得释归来，继续为党为革命而奋斗！"使狱中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感到党的亲切关怀，受到巨大的鼓舞。

党组织为着营救狱中的同志，尽可能地争取各界人士及各方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党领导的赤色互济会主要分三个渠道进行工作：通过关系找社会著名人士开展营救工作；通过党员亲属、朋友开展营救工作；利用金钱买通敌伪人员。

1927年任国桢、杨志云被捕后，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了东北著名爱国人士傅立渔先生。他特派中华青年会校长赵晋如找奉天省长莫德惠活动。此后傅先生还亲自在奉天纱厂纪念厂庆开幕式上，对奉天官绅各界呼吁营救任、杨。他说："任杨二君是青年爱国思想的表现。并无其他彩色，请以本民族的立场主持公道……"这些活动和社会舆论对任国桢、杨志云后来能得到释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0年4月，省委遭受大破坏时被捕了30多名党、团员，最后送辽宁第一监狱的有19人。省委通过关系，使张学良作出"这批人暂不解往南京"的批示。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日本人还来不及建立政府，组织一个维持会管理沈阳地区的政务；"狱支"了解到维持会负责人之一有个叫冯子敬的人，是我被捕人员王心斋的老师。于是让王给冯写了一封信，述

说我们十几名青年因搞些爱国活动，被东北当局逮捕，关押狱中一年有余，尚未结案，请老师给予援救。冯接信后很同情，批给辽宁临时高等法院重审。不久，我党被捕同志全部获释。这是我党利用社会关系营救狱中共产党人成功的一例。

“九一八”事变后社会秩序混乱，贪污受贿成风。一些监狱官员及警察、翻译官等都想乘机捞点油水。因此，当时只要有钱就可以从狱中买出“政治犯”来。鉴于这种情况，省委及时向中央打报告，请求一批资金，将当时在东北几个狱中关押的领导人林仲丹、赵尚志、杨靖宇、夏之栩等花钱活动出狱。使他们又走上新的革命征途，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被捕的共产党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敌人的酷刑同样会摧残他们的躯体；但他们又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对凶恶的敌人和险恶的狱中环境，他们斗争不止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们百炼成钢、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本色。

狱中斗争事迹，是革命先辈们的历史足迹，是他们功绩的记述，是他们坚定信念的写照。

狱中斗争是一部血染的历史，也是一部极其悲壮的历史。它使我们看到，我们伟大的党所走过的这条光辉而坎坷的道路上，充满了火与血的斗争，生与死的搏击！这条道路是成功之路、希望之路、光明之路。烈士的血不会白流，先辈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将沿着他们的足迹坚定地走下去！

这段历史后辈人永远不可忘怀！

铁 窗 内 外

赵尚志在狱中

张大膺

1987年冬，“中共满洲省委狱中斗争史”编采小组一行三人，在哈尔滨市访问了赵尚志将军的胞兄赵尚朴同志①。他住在松花江南岸友谊路一座很普通的公寓里。居所只有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代客厅。室内陈设简单朴素，只有一套旧式沙发和几个大木凳，墙上挂着赵尚志将军的烈士证书及王鹤寿、韩光等同志送的怀念尚志战友的条幅。书房堆满了各种书报，更多的还是党史资料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

赵老已80高龄，但精神很好，头脑清晰，说话很幽默，接待我们很热情。他说：“解放后调查尚志住狱的情况还是很少的。他在狱中我去接见过几次，送些钱、物，对他在狱中的活动了解的不够多。更多的还是留在他同狱的难友们的记忆里。你们将这部分史料整理出来，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欣慰。”

赵老深沉而又自豪地说：“尚志弟弟已牺牲45年了，可以说，他的一生是暂短的一生——仅活了34岁；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两次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在痛骂日本帝国主义。”

① 赵尚朴系赵尚志的胞兄。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做过党的互济会工作，1931年7月同陈潭秋、孟坚、王鹤寿同时在哈尔滨道外监狱关押。1932年出狱后到达延安。解放后任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9年9月30日病故于哈尔滨。

两年来，我们曾三次访问过赵老，他提供了许多赵尚志在狱中斗争的珍贵史料和重要线索。我们沿着这些线索去寻找赵尚志将军在狱中斗争的英勇事迹。

少年投身革命

赵尚志，1908年10月26日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们兄妹11人，他是老六。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他父亲赵子服教私塾和长兄种地来维持。

1918年尚志全家逃难到哈尔滨。他父亲经人介绍在“吕家大柜”当了一名帐房先生，这样也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1919年，11岁的尚志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只好到社会去谋生。五年间，赵尚志受尽了店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黑暗的社会产生了无限的仇恨，使他形成了一种倔强的性格和反抗精神。

1925年，由于大哥从苏联寄回些钱，家境稍有好转。那年2月，他考入了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结识了被我党派到哈市建党的吴丽石（哈特支书记），以及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彭守朴。

“五卅”惨案发生后，哈市各大、中学校都行动起来了。赵尚志在吴丽石的领导下，积极地投入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1925年夏，经彭守朴介绍，年仅17岁的赵尚志，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6月间，因赵尚志在哈市组织了第一个学生会，校方以“不守校规”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学籍。这年冬天，在吴丽石支持下，他到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5期）。

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了反苏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开始逮捕共产党员。同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

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不准跨党。赵尚志坚持跟共产党走，毅然离开黄埔军校，返回哈尔滨。

在长春被捕前后

在中国的南方，国共两党已开始分裂，而在东北，国共两党还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因为这两党均未掌握政权，都被军阀张作霖视为非法，都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因此还能合作。

赵尚志从广州回哈尔滨后，于1926年初秋，被中共北满地委派到长春开辟工作。

1926年冬，国民党从广州派来一名青年学生叫董海平，带着一枚刻有“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之印”的方型印章来到长春。当时东北奉系军阀统治得很严，董海平感到活动有困难，只好请曾在广州一起开过会的韩守本①（共产党员）来帮助他筹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中共北满地委认为，这是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良机，为我党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于是，决定派韩守本及前期到长春的赵尚志两人参加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工作。

经过赵尚志、韩守本、董海平两个多月的秘密活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组建工作基本就绪，于1927年2月20日，在长春日本租界地里的一个旅馆中，召开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正式成立大会。会上推选了执行、监察、常务等委员和各部部长。赵尚志为青年部长，韩守本为宣传部长，董海平为组织部长。

1927年5月18日，长春道尹孙连山给吉林督军张作相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今年正月间，在长闻得赤党发生消息，山密令眼线暗中留心，于古历二月初间，侦实党魁组织党部，山即欲奉

① 韩守本，1925年入党，是长春市党组织的创始人，后在苏联做国际情报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被捕入狱，不久死于狱中。

报告。”①赵尚志等组织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活动，早已被奉系军阀在长春的警特机关所注意了。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成立不久，国共两党代表对印章使用问题产生了矛盾。董海平以自己是广州派来的自居，把持省党部大印，不让赵尚志、韩守本等共产党人使用。赵尚志、韩守本非常气愤，便去日租界地一家日本人开的近江书局另刻了一枚省党部印章。由于日本刻字局老板告密，3月2日，长春宪兵当局将赵、韩先后逮捕。

吉林长春警察厅长修长余，当日给吉林督军张作相发了急电："吉林大帅钧鉴，二月二十五日督察长鲁绮报称，据宪兵二营连长刘文涛面称：现有人报告头道沟界内潜匿宣传赤化党员，请派员会同前往查拿等情，当即派督查员齐祖谦及第一署巡官王殿华会同前往侦查去，讫施于本月二日十二点，在头道沟大世界后身民宅拿获赵尚志一名……”②三月十五日长春警察厅审讯课长谯金声在一份审讯综合报告中也谈道："在头道沟31区满铁医院东边楼上北端房内，拿获党犯赵尚志，搜出大小方印两颗，文曰：'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印'，又有印刷品，抄书信多种，多与赤化有关，并同时拿获伙犯韩守本一名……”③

赵尚志、韩守本被捕后，押于长春警察厅看守所。次日，在警察厅审讯室里，由审讯课长谯金声主审，督察长鲁绮旁听。谯金声一开始就追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派到长春的赤化分子？并恐吓他说："如不从实招来，大帅有令，对共产党定斩不赦……”④

---

① 见吉林长春道尹孙连山给《吉林督军张作相的报告》（现存吉林省档案馆11号全宗1～4号目录）。

② 见吉林长春警察厅长修长余给《吉林督军张作相的电报》（现存吉林省档案馆11号全宗1～4号目录）。

③④ 见长春警察审讯课长谯金声的"审讯综合报告"（现存吉林省档案馆11号全宗1～4号目录）。

19岁的赵尚志异常冷静，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只承认是国民党员。鲁绮突然发问："你信仰什么主义？"赵说："我入学以来佩慕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当主审继续追问他有关赤化问题时，他却不正面回答，而是趁机大讲国民党的宗旨和主义，他说："入国民党者基督教徒居多数，遍及东三省。基督教是以舍己救人为宗旨，国民党主义则重在舍身救国。彼此主义相同……"①他利用这种办法来打乱敌人的审讯思路，从而掩护了共产党组织和他的真实身分，并再三声称自己是国民党的右派，并非左派，与共产党无任何关系。

韩守本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昂首挺胸站在公堂上。他在审讯中也否认自己是共产党，承认是国民党的右派，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敌人最后对他们动了肉刑。可是赵尚志、韩守本在敌人残酷的刑讯面前没有屈服。

敌人毫无办法，只好暂时停讯。长春警察厅对赵、韩在长春的活动又做些调查，尽管他们都不承认是共产党，但警方初步认定，他俩并非一般的国民党人。在审讯综合报告上曾写到："查该犯赵尚志、韩守本虽仅据供认伊等加入国民党右派，以和平稳健为宗旨反对左派……惟查阅起获之印刷品抄单，竟敢明目张胆，宣传赤化，其政治决议，又载共同推倒奉派，冲破安国军壁垒等语，其为共产党正犯，实足证明。"②最后，敌人还是按共产党重大嫌疑犯，将赵尚志、韩守本移交吉林督军署军法处审理。3月4日，押送省城吉林。

---

① 见《赵尚朴访问录》。

② 见长春警察审讯课长谯金声的"审讯综合报告"（现存吉林省档案馆11号全宗1～4号目录）。

初入巴虎门大狱

吉林第一监狱是吉林省三大监狱之一。它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917年正式叫吉林省第一监狱。因地处巴虎门里，故俗称“巴虎门大狱”。陆军监狱和军法处看守所也设在这里。狱中关押近千名已决囚犯，也有军法处的未决犯。

1927年3月的吉林，寒气袭人。吉林督军署军法处，下午4点多钟才将赵尚志、韩守本二人过完堂。几个士兵将他们二人押上一辆马车，顶着飘洒的小清雪，驶往巴虎门监狱。进监狱大门时天已擦黑了。他们被押入门右边一间房子，经过登记填写小卡片后，被送到灯光昏暗的十字监。在中央岗台处，看守叫杂役犯人给他们带上了8斤重的脚镣，然后关到军法处管的未决号里。

这个监号不大，只关押七八个人，大部分是军法处的未决犯，其中有反抗官府的“内乱犯”，还有国民党人和军纪犯人。他俩一进号，大家都很热情地围拢上来问长问短。有个老国民党员说：“你这小伙儿不过20岁，犯什么罪给你抓来的？”赵尚志说：“我犯的是‘爱国罪’……”当晚，其他难友向他俩介绍了如何缠镣膜，怎么带镣穿、脱裤子及走路迈步。赵尚志、韩守本很感激这些难友。

天刚蒙蒙亮，监狱的钟声就响了，犯人们马上穿衣起床，慢了就会挨看守的打。钟声过后，接着就是连续不断的开门锁的声音，各监号轮着放风。上百名面容憔悴、衣服褴褛的囚犯，提水罐的，抬便桶的，扶着病犯的……一起从窄小的长号筒拥出来，到露天便所去大便，倒尿罐，涮便桶。大小便后就去席棚子里洗脸。狱中的早晨，充满了铁镣声、喊声、叫声、看守的吆喝声……这些庞杂刺耳的噪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狱中一天最“沸腾”的时刻。赵尚志从这天起，开始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活。

两天后的一个早上，趁放风中的忙乱，先期被捕的工人共产党员张有仁找到了赵尚志，向他介绍了监狱中的情况，狱吏、看守们的特点及我党人员狱中的表现，并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张有仁说：“这回共产党人在狱中多了，团结起来一致同狱方做斗争，力量就大了。”赵尚志很受鼓舞，表示要和同志们一起与敌人展开斗争。

4月初的一天下午，法警从死囚号提出三个土匪，往外押解时，一个人高喊：“兄弟们，爷们儿们，来世再见吧！”这凄惨而绝望的喊声，使整个监号鸦雀无声。不一会儿，赵尚志号门开了，一个老看守在喊：“赵尚志、韩守本出来，二位先生给你们道喜啦！”这意味着什么？他俩是非常明白的，死神突如其来地降临在这两个年轻人头上，人生的路走到尽头了。可他们没有惊恐，毫无惧色地走出监号。监狱有个规矩，凡被处决的人犯，均出西门到刑场。他们被敌人绑上，押出了西门。出西门往右走不远，是一个土崖子。敌人让他俩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老子不跪，站着死。”韩守本说：“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枪声响了，三个土匪倒了，赵尚志只是震颤了一下（毕竟他那时只有19岁）韩守本依然挺立在土坎下。一个军法官说：“好样的！带回去吧！”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想教训一下这两个青年人①。回号后，大家说：“我们想这回你们早到酆都城了……”赵尚志说：“阎王爷暂不想让我去……”韩守本讲：“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

身陷黑牢志不衰

1927年4月17日，哈尔滨当局派警宪在五处党的活动地点，

① 见《赵凡回忆录》。

逮捕了中共北满地委代书记高洪宇、地委委员何安仁（安平），共青团书记吴晓天，还有王寒生、金永绪（金伯阳）、韩心怿、姜文周、海涛、高浩新等党员干部。同时被捕的还有国民党员张冲、杨克剑、齐东野等人。同年秋，从哈市道外监狱押到吉林第一监狱。后来这里陆续关押国共两党干部和其他政治犯达60余人，是吉林监狱关押政治犯最多的时期。

他们入狱不久，赵尚志就同他们接上了关系。他们认为，我们政治犯在狱中，要同敌人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向广大难友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党的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政治犯要做出几件有影响的事来，把难友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

赵尚志曾积极帮助教育一名因强盗罪入监的青年人陈福祥，使这个青年人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陈福祥说："有朝一日我得到自由，将回到江北拉起胡子帮，树起替穷人打天下的大旗。"他当时把"无产阶级"理解为天下一切穷人，把"革命"领会为粉碎挡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事物。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他是一个半文盲，后来跟赵尚志学习文化，到1929年春，他已能到童子监教少年犯识字了。

自古以来，监狱里除狱吏折磨毒打罪犯之外，还有一害就是"炕头"。这些家伙都是强盗和惯窃犯，是亡命之徒，他们与看守、看守长勾结，喝犯人的血。他们毫无人性，你卖儿卖女借印子钱，他们不管，只要你有油水，就会不停地压榨你，一直到榨干为止。如果你不服，他就会百般折腾你，晚上叫你睡在尿桶旁，"炕头"去撒尿时有意溅你一脸，早上让你抬便桶，干重活，硬不给你饱饭吃，叫一批帮凶无缘无故地痛打你；更甚者，他们串通一气，说你要逃跑，要暴动，看守将你抓去，关在黑牢中，打你个半死，有的犯人就这样被折磨得死去了。吉林第一监狱有四个大"炕头"，人称"四大金钢"。许多难友身受其害却敢

怒不敢言，有些难友忍无可忍，在法院过堂时向法官控诉，但一点用也没有，因为监狱要利用这些“炕头”，某些看守也从他们手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总是庇护他们。

1928年春天，赵尚志组织政治犯到处收集“炕头”们的罪恶材料，集体签名向典狱长、法院控告，指控这些坏蛋同看守和看守长相互勾结干下了种种坏事，如不处理将向社会报界提供情况，将狱中黑幕公布于世。监狱当局害怕政治犯闹事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不得不给那四个“炕头”带上重刑具，押往分监。几个被点名，证据确凿的看守、看守长，也被调到分监去执勤。狱中的共产党人为难友们除了一害，难友们深受鼓舞。

监狱里还关押了一小批特殊犯人——白俄。这些人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流落东北各大城市的俄罗斯贵族，他们在东北还拥有重资，仍然过着腐朽享乐的生活，并从事复辟活动，有些人因为非作歹被捕入狱。军阀政府一向是崇洋媚外，对这些白俄在狱中也给予优待。当时吉林第一监狱关押八九名白俄犯人，每月给他们发面粉，由他们自炊。这帮白俄觉得自己受优待，看守不敢管，就在狱中横行霸道，欺负中国犯人。他们常常把青年犯人作为练拳的对象，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放过，有时拿一盆脏水往少年犯头上浇，然后哈哈大笑，拿人取乐。

1928年5月间，赵尚志动员几个犯抢劫罪的青年人，把这群白俄痛打了一顿。看守上前干涉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帮家伙喝醉酒后要放火烧监房，我们才打他们，否则就着火了。”狱方明知是中国犯人找借口教训他们，却又找不到反驳的证据，也就不去深究了。从此白俄犯人老实多了，他们都说：“赵尚志这小子不好惹。”赵尚志办了这两件事后，受到广大难友的敬佩，共产党人在狱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残酷的铁窗生活，没有消磨掉赵尚志的革命锐气，相反却使他的斗志更加坚强。他通过社会关系弄进来很多进步书籍，有列

宁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作品等。这些书在政治犯当中广为传阅。他还积极组织政治犯为难友们写上诉呈子，教他们文化，使一些要求进步的普通刑事犯人，紧密地团结在政治犯的周围。吉林狱中有个姓佟的看守长①，他经常从狱外购入进步书刊，甚至捎带党的文件，为我党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给狱中的政治犯很大方便。他是吉林监狱管理人员中唯一的党员，但他为了密秘工作需要，从未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是以一名同情者出现在政治犯面前。

1928年春，田介人②调来吉林监狱任候补看守长。他是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在长春时与韩守本、赵尚志有过来往，很同情这些革命者。他上任后，为照顾这些政治犯，曾与佟看守长一起向典狱长建议开设两个优待号，其条件是在监外有地位的人物，有影响的政治犯、军纪犯中的军官，让他们交十几元钱伙食费，可以自炊。典狱长考虑开设优待号是有利可图的，既能从中搞人情，又可让狱吏们每月不交钱，白吃优待号的伙食，何乐而不为。他同意开设两个优待号，一个设在十字监，一个设在病监。不久，经田、佟俩看守长的活动，赵尚志调十字监优待号，韩守本等住进病监优待号。优待号的门白天不上锁，犯人可到甬道随便走走，给党的活动带来很大方便。

1928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常委唐宏经同志来狱中，通过佟看守长，接见了北满地委委员何安仁。他带来了一个消

① 佟看守长（名未查清），因他长的很黑，都叫他“黑佟”。1926年左右经张玉彬（党的吉林通讯站站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隐蔽在监狱工作。1930年下落不明。

② 田介人（现名赵范）原是国民党进步人士，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韩守本等人办过《关外》杂志。曾在长春、哈尔滨、吉林等监狱做一段看守长（管会计），帮助我党地工人员，后被敌人所追捕。解放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现离休。

息：张学良不久将要同国民党正式合作，省委分析，这样的话，以国民党员身分被捕的同志会被释放①。狱中的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都很兴奋。大家住狱多年，很盼望回到党的怀抱，回到革命队伍当中，继续战斗。

然而，赵尚志却十分冷静。他很清楚，敌人已获知他同韩守本是共产党，马上释放的希望并不大，他做了长期住狱的思想准备。

斗狱长，争取"教诲师"

旧社会的监狱阴森恐怖，疾病和死亡时刻威胁着犯人。无论冬夏，一律两餐，早饭只一碗高粮米粥，一块臭萝卜咸菜，晚饭一个窝头，一碗无油花的菜汤。火炕从来不烧，虱子臭虫满炕爬，咬得难友们彻夜难眠。浴池从不开放，几个月不给理发，犯人个个是蓬头垢面。有医务所却没有可用的药品，一次瘟疫蔓延，就会有几十人死去。由于根本没有卫生条件，加之犯人处在低营养的条件下，患病的很多，有些年轻轻的就失明了，每月都有病饿而死的。赵尚志、韩守本和张有仁想了许多办法给难友们解除病痛。有个老国民党员会点针灸，赵尚志就动员他为难友治病，又通过关系从伙房搞些生姜、大蒜之类的东西做去瘟药。赵尚志、韩守本、海涛还到处寻找铁片，磨成很锋利的小刀，为难友们理发。经过政治犯的努力，在苦难的环境里，难友们走出了一条求生的路。

吉林第一监狱有个王典狱长，他肆意虐待犯人，吃犯人的"空头"。不仅如此，他还大量克扣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囚粮，使在押"犯人"精神和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广大难友极为愤慨，却

① 见本书《唐宏经回忆录》。

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忍气吞声。赵尚志、韩守本对难友们说：“咱们不能等待他们刮油啊！不能眼看着让他们把咱们折磨死，大家团结起来跟他们干！”在赵尚志、韩守本、张冲（国民党人士）宣传鼓动下，张有仁、海涛、高洪光等分别去各监号进行发动，揭露王典狱长的种种恶行，激起了众难友对王典狱长的愤慨。这时，佟看守长给赵尚志提供了一个消息：几天后省府将派一大员来监狱视察。赵尚志、韩守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分别同张冲、张有仁、海涛、高洪光等研究，决定搞一次反克扣囚粮的绝食斗争。

那天上午10点多钟，王典狱长陪着省府大员到监舍视察。这时，大家将早已写在白被单上的“控告典狱长”的五个大字标语伸到铁栅之外，各号难友们高喊“反对克扣囚粮！”“改善犯人生活条件……”，一时将王典狱长搞的热汗直流，狼狈不堪。当天，各监号开始了绝食斗争。

吉林第一监狱是省城的重地，“犯人”的绝食，对省府震动很大。吉林督军张作相派省高等检察厅长肖如华到狱中处理这个事件。肖厅长查清问题后，当众宣布撤销王典狱长的职务。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狱教务科有一名“教诲师”叫刘作垣，是河北省唐山人，学生出身。他为人正直，同其他狱吏不同，愿意同政治犯谈话和接触。由于长期受政治犯们的熏陶，使他比较同情革命者。监狱当局规定每周一次“教诲课”，妄图用封建思想来劝诱“政治犯”“改邪归正”。赵尚志在两年的铁窗生活中，不断利用上“教诲课”的机会，向刘作垣进行宣传教育，启发他的觉悟，争取他站到人民这边来。赵尚志也常同他进行辩论。每次辩论，刘作垣都被搞得理屈辞穷。有一次，赵尚志向刘作垣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是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是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质问深受难友们的赞同，引起较大

的共鸣。刘作垣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后来他作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他被赵尚志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毅然投向革命。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分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并对赵尚志和韩守本等人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援助。1928年冬，他被调到吉林第二监狱（长春）当"教诲师"。1929年9月，赵尚志从南京出狱后，引导刘作垣参加了革命，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长春特支的领导人。

铁窗除夕夜

1929年1月18日，东满区委书记周东郊、青年工人霍哲文在延吉被捕。1月19日晚，押入吉林第一监狱十字监未决号。赵尚志得到消息后，通过张有仁将周东郊请到他的监房里。对新来的难友，赵尚志非常热情。他向周东郊全面地介绍了狱中的情况，并鼓励他说："一个共产党人被捕了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保持气节，不能动摇，与敌人只有斗争才能胜利。"又说："张有仁他们很快就要解往沈阳获释了，我们大家同监狱二科科长已讲好了，过几天将你同小霍调到优待号中。"①

1929年1月24日，张有仁、高洪光、金永绪、何安仁等十余人解往沈阳，他们与赵尚志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赵尚志并没有因为未能与其他同志一起解往沈阳开释而颓丧焦急，每天还是穿着那件灰色薄棉袍，在零下20多度的监狱甬道里踱步，有时静静地思索，有时昂首阔步，怒视前方，伸拳前击。他真想把当今这个社会推翻，砸烂世间的一切不平。

他肯援助穷苦的无依无靠的难友，把自己穿的单衣，家里送

① 见《铁窗内外》（周东郊同志回忆录）。

来的棉衣让给他们穿。头年春节时，狱里特殊送给他一碗肉，他看到别的难友没有，便气得将肉泼在甬道里。人们都管他叫“赵魔怔”，他甘受这个绰号。

春节前夕，周东郊、霍哲文果然被调到赵尚志这个优待号。这个号没有“炕头”，押在这里的有前吉林省哈长护路军营长李某，外号叫“阔李”，因私运鸦片判刑4年；有一名前督军署卫队团士兵，也是因私贩鸦片被押的；另一名是大地主的少爷；加上周东郊和霍哲文，这个号里总共才六个人。房里很宽敞，行动自由些，在当时的黑牢中，这就算是“天堂”了。

瑞雪刚刚下过，吉林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家家户户准备迎接1929年的新春佳节。而监狱却是另一种景象，犯人休工停产，紧锁号门，大墙增哨加岗，全体难友一律收号不许活动。省城没有亲朋好友送食物的难友，只好享受狱里“恩赏”的一顿高粱米小豆饭，一小碗猪肉炖白菜。狱里的除夕静得出奇，除了叹息声、轻轻的哭声，就是看守巡查的脚步声。许多人围着破被，蹲在冰凉的土炕上，想着自己的心事，怀念着家乡和亲人；有些人苦中寻乐，慢慢地喝着闷酒。

优待号比普通监号要活跃些，他们有亲友送的冻饺子、粘豆包、香肠、罐头、糖酒之类的食品。营长“阔李”烧一手好菜，大家合伙共度除夕之夜，边吃边议论。有些人在猜测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能否颁布赦令，有的说可能，有的说不见得。监狱有一句口头禅：“啃完粮食盼大赦，大赦不来睡大觉”。对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的囚徒来说，大赦是早日解脱牢狱之灾的唯一希望。

这年的除夕之夜，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号里已是哈气成霜。脸红耳热的酒兴渐渐消失了，盼大赦的热烈争论也停下来了。一种清冷悲凉的气氛开始笼罩监号。午夜已过，外边传来隐隐约约的鞭炮声，使身陷牢狱的人们产生了一种思亲的情绪。有人自言自语地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沉默许久的赵尚志这

时开口了："这句古话有它的道理，但是也不尽然，我看人逢得意之时，纵然佳节当前也未必念叨他们的亲旧，至于象我这样的亡命之徒，管它什么三十晚上、大年初一呢？从来就没有想念什么往日的欢乐。如果你心里有个理想，有为理想豁出脑袋的决心，就更不会想什么父母亲故了……大丈夫别有所怀么……"①他这番慷慨陈词，使冷漠消沉的思乡气氛冲淡了，它象一股春风吹进了囚人的心扉。

当"阔李"发表一套他的人生哲学后，赵尚志半真半假地对他说："我这赵魔怔是吃人的社会逼出来的，有朝一日，'魔'一定把当代的神仙连你这样的阔家伙都吞了！"②

除夕深夜是以赵尚志同"阔李"的辩论而散席的。大家和衣而卧，一觉醒来便是大年初一了。

被解往南京前后

春节过后不久，赵尚志接到解往沈阳的同志来信，他得知这批同志到沈阳后，在奉天监狱仅住两宿。张学良亲自接见后，当场释放了他们。共产党员已同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赵尚志为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而感到十分高兴。

3月初，省督军署军法处将霍哲文提出过堂，向他宣布无罪释放。这名被误捕的无辜青年人很诚实，两个多月的狱中生活，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在开释这天，他对赵尚志、周东郊说了一句心里话："在这样的社会里，活着真有些闷人，怪不得你们这些青年人有福不享，找罪受呢？"赵尚志笑着对他说："我们并不是有福不享的人，天底下没有福享的人太多了，

---

① 见《铁窗内外》（周东郊回忆录）。

② 见《铁窗内外》（周东郊回忆录）。

罪也不是我们愿意找的，罪总在找人啊！受罪的人、被罪找上的人，有一天懂得只有推翻使人受罪的东西——这就叫革命吧！才有福——真正有福可享呢！这可不是高官厚禄可享，娇妻美妾可娱，子孙富贵可保，而是为人人能过上不受罚的日子。”赵尚志深情地说：“记住我这魔怔的话，也许不会虚度以后的岁月呢！”说着，他把磨得相当锋利的剃头小刀送给霍哲文作纪念①。

1929年3月初，吉林省督军署军法处，向南京政府报告，请示赵尚志、韩守本一案如何处理。不久南京来电：请速将赵、韩二人解往南京。3月中旬军法处通知赵尚志、韩守本整理行装，近日解往南京。

这时赵尚志的胞兄，赵尚朴正好来接见，给他留下50元钱作去南京路上的花费。临行前的晚上，赵尚志将被褥、狗皮和一些零碎东西送给了周东郊，将他们的书籍都送给了同号的青年人。临告别时赵尚志对周东郊等同志说：“我们都很年轻，会有重逢的日子，但，征途险恶，也许从此永诀啦！但愿我们谁也不辜负人类对我们的期待吧！”

到南京后，赵尚志和韩守本暂羁押于南京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南京审讯时，赵尚志在法庭上陈述：“我们是在军阀统治时期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时被奉系军阀逮捕的。我们都是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执行委员，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信徒……”赵尚志、韩守本坚持只供认自己是因国民党案被捕的，同赤化无关。他们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的身分。国民党司法部没有办法，只好将他们押送江苏省苏州看守所候审。

他们在苏州看守所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给南京政府写了两次申诉，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同年5月22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奉南京政府司法部之令，对赵尚志、韩守本案

---

① 见《铁窗内外》（周东郊同志回忆录）。

进行了审理。认定他们是“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不予起诉”，立即开释，并发给他俩一笔救济费。赵尚志、韩守本他们认为来南方不易，便用十几天的时间在苏、杭两地考察了南方的社会情况。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监禁杀害共产党人。那时，赵尚志、韩守本正在吉林狱中，他们出狱后才知道这个情况。虽然大革命暂时失利，可他们没有丧失革命信心。赵尚志对苏杭考察后急速赶回沈阳。中共满洲省委分配他在团省委工作。

1930年4月12日，省委派赵尚志同杜兰亭、陈尚哲参加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的讲演会。赵尚志同讲演者苏上达辩论的同时，向与会者发表了反帝、反封建的演说，他们三人当场被东北宪兵司令部便衣特务逮捕。

在侦缉处的审讯室里

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设在沈阳小西门外“三贤祠”的大殿里，这里是东北军阀专门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地方。

黑夜沉沉，杀气腾腾。一盏忽明忽暗的马灯挂在大殿当中。打手们正往殿里搬弄各种刑具，什么“夹棍”、“杠子”、“老虎凳”、打屁股的黑红棒子等。侦缉处长雷恒成凶煞恶神似地坐在大八仙桌前，慢慢地吸着烟。突然，他将烟掐灭，大喊：“提赵子和（赵尚志化名）！”不一会儿，特务将赵尚志带到了大殿。雷说：“赵子和，咱们是第三回见面，这几天你想的怎么样？”“还是那句话，青年爱国无罪！”赵尚志很坚决地回答。雷恒成火起来：“什么无罪，你在大会公然宣传赤化，反对友邦，还说无罪？”“怎么？雷处长，你把帝国主义叫做友邦？”赵尚志这一句将雷恒成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你……你这个人严重危害

党国的利益，是对党国不忠的表现……”赵尚志寸步不让地说：“那你对党国忠不忠呢？”“我身为党国军官，当然忠于党国了。”雷恒成在标榜自已时很得意。“雷处长，您没忘记民国16年4月那件事吗？”“什么事？”雷很惊疑。“处长真健忘啊！”赵尚志冷笑道，“那年你不是帮助张大帅将孙中山的战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先生给杀了吗？这能说你也是忠于党国的吗？”这下子可激怒了雷恒成：“你这大胆的小青年……你……来人，给我上大刑！”

几个打手将赵按倒，两个人上前压杠子。赵尚志虽满脸流汗，仍骂声不止。雷又让两个人上去压。杠子断了，赵尚志也昏过去了，他的腿肚子被压开了花，鲜血淋淋。苏醒后，仍痛骂雷恒成是杀人的魔鬼①。审讯后，站堂的看守偷偷竖起大拇指说：“这才叫中国人呢，真有骨气！”后来，就再没提审他。

在辽宁第一监狱青年监的日日夜夜

赵尚志等同志在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关押了20天，除杜兰亭、陈尚哲叛变外，其他19名同志都经受住了刑讯的考验。没有供出党的任何机密。5月20日，敌侦缉处将他们的案子移送军法处，羁押于辽宁第一监狱青年监。这个青年监在“北未决”病监院内，是青砖小瓦房，许多年前曾关押过青少年犯，故称青年监。室内阴暗潮湿，一进屋一股霉味直冲鼻子，墙角长起了一堆堆小蘑菇，简直没法住人。监狱当局深怕政治犯同其他犯人接触，所以特殊给他们安排在这个地方。

难友们每天除吃两顿饭外，就是被军法处的军法官连续提审。6月份之后，审讯结束，大家没有其它事可做，感到很寂

① 参阅《访赵尚朴记录》。

寞。赵尚志出面向狱方交涉，要求给些书报看。不久，监狱“教诲师”给送来一些《圣经》、《佛经》、《道德经》之类的宗教书籍，同志们很反感。赵尚志自告奋勇去找胖看守长，提出：“我们是政治犯，不能看这类经书，要求看看社会上普通的报纸。”胖看守长打官腔说：“监狱有规定，不管什么犯都不准看社会上的其他书报，只能读经书，你们也不例外。”赵尚志同他辩论了一阵，仍没结果。

6月下旬的某一天，饶漱石对赵尚志说：“听说最近调来一名姓常的所官（所长），这人好说话，你再去交谈一次。”赵尚志找到常所官，首先向他宣传一阵爱国主义思想，并提出政治犯们要求看书的问题。常所官对犯爱国罪的政治犯比较同情，他说：“这样办吧，你们出钱，我让看守到外边给你们买些，另外也可以写信给你们的亲友送些书来。”这件事办成功了。后来政治犯手中有许多书报，还从外面拿进些较为进步的书籍。

胖看守长外号叫“肉坛子”，这个人很坏，经常吊打犯人，通过狱头吃票，勒索犯人财物。赵尚志想要治一治这个坏看守长。当他一到青年监巡查时，赵尚志就开骂：“‘肉坛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大家齐声喊：“喝犯人血的‘肉坛子’快滚开。”后来，“肉坛子”再不敢到青年监了。他说：“赵小个子可真是个茬子，别惹他。”①

辽宁第一监狱规定每周都要给犯人上一次“教诲课”，集中在可容300人的教诲堂上课。除由监狱内的教诲师上课外，有时还请外边的天主教的神父和佛教的和尚来为犯人讲经。1930年6月的一天，狱里请来一位天主教神父给犯人讲“赎罪经”。神父闭着双目念叨：“……你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本来是善良的，你们是让魔鬼缠住了，才走入罪恶的深渊……”赵尚志突然站起来

① 见本书《张干民回忆录》。

说："神父，我提个问题。"这突然的提问把神父惊住了。赵尚志没等神父反应过来就问："请问神父，上帝这个人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年岁了？"听课的犯人哄堂大笑，神父十分尴尬，说不出话来。赵尚志又问："上帝他住在什么地方？"神父无可奈何地说："啊！上帝在我心中……"赵尚志明知故问："上帝是多么大的东西？怎么还能装在你心里？"难友们笑得更厉害了，搞得那位神父下不了台。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狱方不敢让政治犯去听教诲课了。

1931年春天，监狱长考虑政治犯长期不听"教诲课"无法向上头交待，只好再次让政治犯去听教诲课。赵尚志按狱支指示，在讲课时组织难友大唱《国际歌》、《满江红》等，使教诲课无法进行。后来，狱方再也不让政治犯去听教诲课了。

赵尚志同志在沈阳度过了19个月的铁窗生活。1931年冬，经党组织和社会知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

尾　声

三年多残酷的铁窗生活，并没有消磨赵尚志的斗争意志。出狱后不久，他便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中。他创建和组织了巴彦抗日游击队、珠河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并成为抗联二路军的领导者之一。他带领抗日队伍，转战松花江畔，远征黑嫩平原，横扫哈东南，与日冠浴血奋战达数年之久，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本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小小的满洲国"里，遇上了"大大的赵尚志"。

赵尚志的革命征途是极其曲折坎坷的。他多次蒙受错误打击，曾两次被开除党籍①，两次被撤销军职，致使他领导的抗日武

① 赵尚志同志曾于1933年、1940年1月两次被开除党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委对开除赵尚志党籍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确认是一起历史冤案。1982年6月8日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

装几起几落。他曾两度赴苏联，其中1938年因发生误会，又被苏军在伯力隔离审查达一年之久。

1942年2月12日凌晨，打入我内部的特务刘德山、张德生（张小背）提供假情报，诱使赵尚志带小分队去袭击梧桐河警察分驻所。拂晓，离袭击目标两华里左右，部队刚刚爬上一个小山坡，特务刘德山乘人不备，从背后向赵尚志开了一枪。赵尚志中弹后忍着剧痛，回手一枪打死了刘德山。特务张德生以去找医生为名，引来了敌人。敌人用爬犁将赵尚志拉到吕家菜园子，后送到梧桐河金矿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后仅活8小时，就壮烈牺牲了，年仅34岁。

赵尚志的一生是苦难奋进的一生，是光荣战斗的一生。

1989年12月10日于沈阳

没有罪证的“囚徒”

——记任国桢、杨志云在奉天第一监狱

白文升

1926年11月，中共奉天支部创始人任国桢从吉林第一监狱获释。

1927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派他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后改奉天市委）。跟他一起做组织工作的杨志云（原系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部长），通过老同学仲肇发（老精华奉天眼镜分店经理）的关系，将支部设在奉天南站春日町（现沈阳太原街）老精华眼镜分店二楼。任国桢和杨志云以医大学生的名义居住在这里。南满医大学生邓述明等四人和满洲银行的高子升、铁路局的孙廷喜、兵工厂的高纪五、东北大学的戚明三等地下党员常到这里来集会。

任国桢、杨志云常以小商贩的职业为掩护，背着香皂、毛巾、牙粉等货物，深入工厂、学校，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和我党的主张，在工人、店员、学生中赠阅《灯塔》、《十字街头》等进步书刊。同时又在小河沿医科学校，省立一师，第一、二工科，女师，兵工厂，银行等处成立了党小组，发展党员40多名。

奉天制麻株式会社（现沈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是当时沈阳最大的日资工厂之一，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工业企业。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经常以加班加点、取消福利待遇和劳保设施为由借故减发或不发给工人工资，规定轻伤自理、重伤解雇等办法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在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下，1927年5月，

奉天制麻株式会社600多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听到这个消息，任国桢立即派杨志云和有关同志与工人代表接头，鼓励工人坚持斗争。提出了坚持斗争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如罢工工人按地区编组，各组推选代表，以加强联系指导；分区组织纠察队，以防奸细；还帮助工人拟定了“工资应以现洋兑现”、“不准随便打骂工人”、“废除歇工三天开除的决定”、“禁止日本人侮辱女工”等复工条件。

党的领导，给工人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日本人觉察到罢工有向毛纺、制糖等其他公司蔓延的趋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请出了揽军屯中国商务会长从中调停斡旋，全部接受了工人所提出的条件，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声势之大，参加人员之多，为东北工人斗争史所罕见，被称为“东北三大工人运动”之一。

任国桢原打算把罢工浪潮扩展到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奉天纺纱厂、大连机械制造厂，但敌人已觉察到这次罢工“其背后是有个强有力的思想团体支持着”。日本特务机关在一份《关机高发11003号》报告中写道：“……在会社中没有一个能被认为是真正的主谋人物，根据多方面推测，策动的根源可能是在社外。”

日本特务机关“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同时加紧活动，派金、王两名特务扮成工人模样，混在罢工群众中进行侦察。他们发现杨志云的行动可疑，并对其跟踪，查明了他的住址。同时，也探知这次罢工与任国桢有关系。

1927年6月29日晚7点多钟，一个陌生人走进老精华眼镜分店，自称姓郭，是大连来的，找杨志云，说有一封信要亲自交给他。因杨当时不在，只好将地址留下，叫杨回来按地址去取信。

当晚，杨回来得知大连来信后，毫不怀疑地按留下的地址去取信。刚下楼，邻居照像馆就叫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让他去

南站邮局同送信人见面。不料，一进邮局就被便衣日警逮捕。

当晚10点钟，任国桢及老精华眼镜分店店员董廷臣、门德中、史立荣、阎宝德、王德令等6人同时被日本警察逮捕。只留下仲肇发由日特监视做诱饵。

6月30日上午10点钟左右，南满医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述明来到眼镜店找任国桢。

仲肇发急中生智地说："你买眼镜吧！随我来，我给你验光……"仲带邓到暗室，将昨晚发生的事通知了他。邓走出验光室后，以没看中货样为名走出眼镜店，立即把情况转告了奉天地下党组织，避免了更多同志落入敌手。

下午4点钟左右，日本警察署将董廷臣等5名店员放回，但又把仲肇发抓走，押到日本警察署西塔看守所。

同天，中共地下党员、奉天团支部书记杨伟坚，带着文件，骑自行车从眼镜店后门进去找任国桢时，也被逮捕。后因没查出证据，关押一个星期就将他释放了。出狱后，在眼镜店存放的自行车和车上放的文件，仍完整无失。

日本警察署对仲肇发多次审问，在"查无罪恶"的情况下，于1927年7月下旬，将其送交大连当局处理，大连关东厅法院判仲为犹豫刑（监外执行）3年。大连老精华眼镜总店登报声明："因仲肇发通共，开除奉天分店经理职务。"

敌人集中力量，死死盯住任国桢和杨志云。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本年5月初旬，奉天制麻会社有中国职工600多名同盟罢工，事后始知出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杨志云及国民党奉天党部执行委员任国桢等数人之阴谋，于是，即由奉天附属地日本警署于6月29日在奉天春日町十二番地将杨志云、任国桢逮捕……7月21日，将杨志云、任国桢二人转送奉天城内交我国当局处刑。"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敌人只知道任国桢是国民党奉

天党部执行委员，此外，别无所知，但并未解除对任是共产党员的怀疑。

敌人为了弄清任国桢的真正身分，曾多次对他审讯，严刑拷打，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有一次，任国桢在牢房中被一个外号叫“活阎王爷”的看守久保田打得鼻口流血，但他坚贞不屈，对党的机密一个字也没吐露。

杨志云被捕后也曾遭到灌凉水、毒打等酷刑。后来在敌人拿出大连李仲刚的证词后，他承认了自己是“准共产党员”，但却始终没有供出任国桢同志的真正身分和奉天地下党组织。

1927年7月21日，日本警察署将任国桢、杨志云转送奉天军法处，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

日总领事署给当时住在北京的张作霖连续去两封电报，要求对任、杨二人从严惩处。张作霖复电军法处说：“任国桢、杨志云二人如果查有实据，处以死刑可也。”

在奉天军法处和省长公署会审时，任国桢、杨志云按照事先研究的对策指责日本人歪曲事实，刑讯逼供，杨志云是屈打成招。任、杨请求中国政府申张正义，为民做主。

在狱中审查期间，他们通过书信、亲友接见等机会积极争取社会的声援。

转到奉天第一监狱后，杨志云就给大连青年会会长、著名爱国人士傅立渔先生写信，要求设法给予解难。傅见信后，及时派大连中华青年会校长赵晋如到奉天找省长莫德会说情。傅立渔先生还亲赴奉天，借在奉天纺纱厂厂庆大会上演说之机，对官绅各界公开申明任、杨二人是爱国青年并没有反对当局的行动，请求政界以民族立场主持公道。

由于社会公正舆论的压力，迫使奉天军法处给张作霖复电：“没有证据。”从此，奉天当局对此案采取了拖延的态度。

日本总领事署对任、杨案件迟迟不作处理深为不满，并对省

长公署提出了抗议。于是造成了当局处理下不得手，又不敢释放的局面，致使任、杨在奉天第一监狱关押了一年多。

在这种情况下，任、杨在狱中用巧妙的方式，主动争取当局缓解矛盾，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杨志云通过在奉天远东银行工作的哥哥，用金钱买通了王忱典狱长；任国桢也用家里送来的60元钱给王忱典狱长买了一块料子。任国桢和杨志云还分别通过教王典狱长儿子学英文和武术的机会取得了王的好感。从此，他们二人的脚镣被卸去了，每天也不挨饿了，过堂审问大为减少，活动稍有自由。同时，通过王忱典狱长的儿子，还能看到报纸和一些进步的书刊。

任国桢和杨志云被捕入狱时，正在北京做“大元帅”的张作霖，曾发来电报：“查有实据，处以死刑可也。”可是，一年后的1928年6月，任国桢、杨志云依然活得好好的，而回归沈阳的张作霖，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了。

张学良为父治丧，决定特赦政治犯。消息传到监狱后，任、杨二人分析了形势，又给军法处写了请求释放的呈子。

1928年6月28日，任国桢、杨志云从奉天第一监狱被释放。

这就是任国桢同志就义前，从事革命活动四次被捕中的第三次情况。

这次被捕出狱后，任、杨各自回到了原籍。不久，任国桢又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

扑不灭的火焰

——记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两次遭破坏和被捕同志的狱内斗争

林凤山　陈光真　李光后　董子言

大连，这座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海滨之城，在不见天日的旧中国，曾记录了广大劳动人民饱经忧患、蒙受凌辱的苦难历史，也记载了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奋起反抗三大敌人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业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对深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大连人民十分关心，曾先后派共产党员罗章龙、李震瀛、陈为人、邓中夏、林育南、王荷波等同志来大连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24年6月，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

1925年，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2月下旬，中央发出121号通告，指示各地将超龄团员转党，以实现团组织的青年化。中共北方区委根据这一指示，于1926年1月，将大连超龄团员董秀峰、张云峰、杨显庭、王少坡、阎启明、杨志云、张文明、秦茂轩等8人直接转为党员，成立了中共大连特别支部。2月，改为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大连地委）。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同年7月，中共北方区派邓鹤皋来大连担任地委书记。

1927年6月初，邓鹤皋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归来后，他根据中央指示，将中共大连地委改为中共大连市

委。当时党员已发展到230 余人，建立了23个支部。

一

在大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抗捐等斗争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1926年3月，大连各界人民在党领导下，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活动，引起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惊慌。他们如临大敌，派出大批军警进行严密警戒和监视。4月爆发的“福纺”工人大罢工，更扰得敌人坐卧不宁。为扑灭刚刚点燃的革命烈火，6月25日，敌人公然以“胁迫嫌疑罪”、“业务妨害罪”等罪名逮捕了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等26名罢工领导者和工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敌人威胁利诱刑讯逼迫我代表下复工令，被傅景阳严辞拒绝。敌人对被捕的同志百般折磨，但同志们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分和任何有关党的活动情况。1927年8月21日日本在大连最早的一份日文报纸《辽东新报》报道中写道：“我当局对大正15年（1926）夏天发生的福纺事件策源地工学会的严密侦察同时，对重点人物作特殊监视，但一无所获。”此后，敌人更加警惕“赤化”，加紧了对社会各方面的监视。

1927年1月31日，中共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化名徐义明）由上海回哈尔滨，在路经大连时，给中共大连地委带来文件和数百册书刊，内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工人与政党》、《共产主义ABC》等。当天，吴住在奥町（今民生街）中华栈，通知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部长杨志云晚7点到客栈会晤。不幸的是，当天下午敌大连警察署“刑事”到客栈检查来往客人时，吴所带文件被发现。吴丽石看到有危险，未及时通知杨志云，便匆匆乘车离去。当晚杨赴约去客栈，便被敌人

逮捕，并从他的住处搜出《中国青年》、《劳动青年》、《向导》等刊物。在审问时，杨志云机智地只承认了与国民党有关系，而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分。杨虽于2月被驱逐出大连，却保存了大连党组织。敌人惊呼这次事件是中共“企图赤化全满洲”。

4月6日，奉系军阀在北京逮捕了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并搜出大连党团组织呈送北方区的报告材料。于是，敌人加紧了对大连党团组织的搜查活动。

1927年6月18日，大连沙河口日本警察署在市内和“满铁”的一部分沿线发现了中共大连地委以“大连人民留京同乡会编辑部”名义油印的刊物《大连人民》。敌人认为该刊物“强烈地反映排外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是“进行赤化宣传的小册子”。敌人根据对油墨的分析，确认这个刊物是在大连印刷的，并认为“其内容还是一个相当的大连和满洲通人物执笔的”①。于是，敌人在大连展开了广泛严密的侦察。

7月13日，共青团大连市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魏长魁②。在码头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时，被敌人探知。当夜2点，大连小岗子日本警察署赶到长安街29号魏长魁家中，将其逮捕。

魏长魁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加审讯，但魏长魁“始终不肯招认”，致使敌人一无所获。

正当敌人苦于没有线索，无从下手的时候，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胡杰三却给他们帮了大忙。胡杰三（化名范青），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场翻砂工人，1927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

---

① 见1927年（昭和2年）8月20日《满洲日日新闻》号外。现存中共大连党史研究室档案25卷89～91页。

② 魏长魁于1933年初遇“大赦”提前释放。出狱后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后在战斗中牺牲。

即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当上了沙河口日本警察署的密探。1927年7月23日，胡杰三得知第二天要在西沙河口"满铁"水库召开党的会议，便立即报告了敌人。

沙河口警察署连夜布置潜伏。第二天晨8点左右，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共"满铁"沙河口工场地下党支部书记韩冈清及支部委员辛培源被当场逮捕。随后，敌人又赶到沙河口工场党支部成员于全福家，将其逮捕。

韩冈清被捕后，在刑讯下供出了中共大连市委工运部长兼交通员丁文礼（又名丁予明、丁菊畦），并于25日凌晨带领敌人到丁家，将丁逮捕。丁文礼经不住严刑审问，又很快地供出了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① 和其他几名主要干部，并于当日上午9点，带领敌人赶到日本桥（现胜利桥）电车站，将正在等待接头的邓鹤皋逮捕。

随后，敌人在大连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从7月13日起至8月下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51人，大连党组织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在《辽东新报》上曾狂呼乱叫："在我政界严密控制下的关东州，尤其在大连市内发生的这起中国共产党事件，简直叫人梦都想不到。其影响之大，意义之深，就在于他不仅轰动了这块小小的满洲，而且使中国和日本内地的各界人士也都感到十分惊讶。这伙共产党的口号是，'取消私有制，废除治外法权'，其方法手段是很狡猾的。他的企图首先是在大连巩固共产党的组织，接着举行大罢工，而且逐步掀起排外运动高潮，狂热地宣传共产主义。我当局为防患于未然，采取果断行动，将魁首邓鹤皋以下50名一网打尽。"

---

① 邓鹤皋，原名邓溎，又名邓和高。1926年6月受党的北方局派遣到大连工作。被捕后判10年禁锢。1979年7月逝世。逝世前曾任国家轻工部副部长等职。

不管敌人怎样狂叫，斗争并没有停止，革命的火焰仍在继续燃烧、蔓延。正如日本人关宽治、岛田俊齐在《满洲事变》一书中所说："同年7月，由关东厅特别警察对上一年刚刚成立的满洲共产党大连地方委员会进行了大逮捕。但是，潜伏在各地的共产党却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东三省各地继续培植着国民革命思想。民众动员起来，掀起了打倒田中内阁的反日运动。"

邓鹤皋被捕后，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纪幼柏（纪锦章）立即接替了他的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以访亲拜友、个别串联的方式，把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组织起来，继续进行反日活动。

同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即派杜继曾①来大连重新组建大连市委。为了加强党在大连的领导力量，12月，又派曲文秀来大连工作。并于1928年1月20日，召开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了关东县委会，推选曲文秀为书记兼宣传，孟庆恩为组织，张振忠为工运，杜继曾为农运，纪幼柏为青运兼县团委书记。还通过了《中共关东县委新决议案》，迅速整顿恢复了各级组织。这个时期，在关东州有满铁、纱厂、印刷、店员、码头、油坊、旅顺、金州等十个支部，党员45名，其中工人党员32名，农民党员1名，小商人党员3名，知识分子党员9名。

中共关东县委成立后，在宣传、工运和发展组织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加上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使关东县委在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时候，又遭到敌人的破坏。

1928年2月，县委联络员高景阳被捕，旅顺党组织与县委的

① 杜继曾，又名杜省物，曾用名何仁、何林生、白长山、杜省五。被捕后判有期徒刑8年。1935年出狱后到河南开封及淮北豫皖边区工作。1972年逝世。生前任河南省科委副主任。

联系中断了。为此，县委书记曲文秀派农运委员杜继曾去旅顺联系工作。

1928年3月15日，杜继曾到达旅顺。他下火车后走出不远，在日本桥附近看街道示意图时遭到日本警察的盘问。日警觉得他可疑，便将他带到日本桥派出所审查。警察从杜继曾的皮包中翻出了密写药水和关东县委的文件。杜继曾趁警察翻阅文件之机，将文件夺下填入火炉，但没等文件烧完，就被警察抢出。杜继曾当即被捕。

警察当局从烧残的文件中发现了地下党员的住址，即开始了大肆搜捕。到4月14日止，共逮捕孙长贵、周祥富、王跃先、秦日新、张义堂等19人。但县委仍在继续工作。

然而，杜继曾等人的被捕，并没有引起县委书记曲文秀的警惕，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而是继续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关东县委印刷了大量反日传单，4月28日发动党团员在沙河口、西岗等繁华街道和娱乐场所散发和张贴。这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即令全市各警察署“以非常之警戒，大肆搜探，以期速得真象”①。

29日晚8时，县委书记曲文秀在沙河口永安街一带张贴标语时，被沙河口警察署“密行班”逮捕，并从他的住处搜出传单、文件及印刷工具等。经沙河口警察署高等系主任西村审问，曲文秀供认了自己的身分，并向敌人写了《我所怀抱的共产主义》自首书，还带领敌人逮捕了关东县委的一些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

敌人根据曲的口供，对大连地下党员、团员，又进行了一次大搜捕。从4月29日至5月上旬，陆续逮捕了纪幼柏（刘香九）、吕毓鸿（吕雁宾）、刘景台（刘中毅）、刘廷德、李廷明（李廷

---

① 见1928年5月29日《泰东日报》。引自《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汇辑》195页。

冥）等47人（其中包括奉天、营口各逮捕1人）。

1928年3月至5月的大搜捕，我党、团员及有关群众共被捕66人，致使中共关东县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二

从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在十个月内，大连党的组织连续两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先后共有117人被逮捕。这些被捕者最先关押在小岗子、沙河口等警察署的拘留所里。

警察署是"鬼门关"。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不但吃不饱，睡不好，甚至连水都不给喝。审问时更是凶狠残暴，皮鞭抽、棍棒打、灌凉水、夹笔杆、用火烧……刑讯逼供，惨无人道。被捕的同志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除少数贪生怕死者动摇变节外，大多数同志都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

魏长魁被关押在小岗子警察署拘留所。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刑讯，妄图从他的口中掏出大连地下党的组织情况，但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敌人问："被告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断宣传共产主义是不是事实？"

魏长魁理直气壮地回答："本团既然为了研究共产主义而设立，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那是自然的事。"

当敌人追问大连党的组织情况时，魏长魁斩钉截铁地说："我虽然第一个被捕，对党的组织情况至死不能供出一个字。"敌人无可奈何地承认："虽然审讯了组织系统，但该犯却缄口不语"，哀叹"审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①。就连日本报纸《大连

① 见《调查时报》7卷9号。引自《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汇辑》159页。

新闻》也感到震惊，以“在舌尖上燃烧着不屈的言辞，主义者之一魏某对当局的审问豪言处之”为题，报道：

> 成为大逮捕的导火线，首先被小岗子署逮捕的魏长魁（23岁）身无定职，专心狂奔于宣传，碰到他那火一样怪僻的人，大致都要为他折服。他是这样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在审问时，他以豪然的态度说：“失败一两回算不得什么，不管抓得怎样厉害，我们培育的苗子会接二连三地象风暴一样地发动起来。”审问的时候，警察可费了苦心。由于魏患着重肺病，虽然尚未判决，也被收容在别室里①。

邓鹤皋被捕后，因有叛徒的出卖和敌人搞指供，不得不承认了某些情节，但他仍然坚持斗争，凡敌人没掌握的一概拒供，从而保存了党在大连的秘密联络站“益记笔店”和一批党团员，为我党在大连继续开展工作，保存了阵地和力量。

杜继曾被捕后，敌人虽然从他身上搜出了党的文件，得到了一些证据和我地下组织的一些线索，但敌人却没有从他的口中获得任何有用的情况，从而避免了更多的同志被捕，保住了关东县委。在他被捕后，关东县委仍然在继续活动。

于全福是中共沙河口铁道工场党支部委员，他被捕后押在沙河口警察署。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压、打、灌凉水、夹笔杆，用火烧……但他守口如瓶，严守党的秘密。敌人问他加入共产党有什么好处，他坚定地回答：“大连的中国工人，工资仅能维持半饱生活，还受着牛马似的残酷剥削。共产党是工人的火车头，能领导群众斗争，反对私有财产，大家工作，大家吃饭。”

陈德祥（陈瑞亭）是大连小野田洋灰厂（现大连水泥厂）的挂长（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1926年6月25日，他因参加大连

① 见1927年8月21日《大连新闻》。引自《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汇辑》166～167页。

“福纺”纱厂罢工，被大连警察署逮捕。在狱中虽然遭受多次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从未屈服。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于1927年2月被释放。由于在狱中表现好，出狱后不久，经侯立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陈德祥再次被捕，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由于敌人没掌握确凿证据，关押一个多月，即被释放。

孙长贵（现名孙长恩，曾用名孙傑三）1926年4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因积极参加“福纺”工人的罢工斗争，曾于1926年6月被敌人逮捕过一次，那次，他只承认自己是“工学会”①会员，并没暴露共产党员身分，于1927年3月末被“无罪”释放。这次，由于敌人从杜继曾身上搜出的名单中有他，他又被敌人逮捕，但他一口咬定和杜继曾不相识，更无任何联系。因无证据，关押两个月后，敌人不得不又放了他。

辛培源是中共沙河口铁道工场支部委员，被沙河口警察署逮捕后，他对任何问题都拒绝回答，气得敌人哇哇直叫：“混蛋，快说！谁是共产党的头目？”

辛培源冷笑着说：“见鬼，我又不是共产党，怎么能知道谁是头目人！”

敌人再无办法，大声吼道：“带到刑具房去！”

刑具房是一间小房子，墙上挂满了皮鞭子、绑绳、灌凉水的用具，墙上的血迹新痕压旧痕，一进屋就有一股血腥味。敌人用绳子绑住了辛培源两个大拇指头，假心假意地诱供说：“中国有句俗语，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快照实说了吧！你年轻轻的，死了死了的可惜呀！”

辛培源仍然闭着眼睛不答话。敌人恼羞成怒地说：“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知道厉害！”辛培源被吊到半空中，一顿鞭子打

① 工学会即大连中华工学会，是大连第一个工人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发展成了全市性的工会组织。1927年8月20日被日本殖民当局查封。

得他皮开肉绽，昏了过去，敌人却连他姓什么都没有问出来。最后，敌人只好把他押进了拘留所的另一间小房子里。这里的墙壁和地面全是水泥灌的，门窗上镶着铁栏杆。辛培源躺在墙边，身下只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他醒来时已经是半夜了。浸透了汗水的衣裳，牵扯着皮肉，疼痛难忍。但这些他并不理会，心里只反复思索：敌人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情况，而且都掌握得那么准确，难道说是党内出现了叛徒？思来想去没想出结果。

天快亮时，一阵摩托车的声响，再一次把辛培源从蒙胧中惊醒。"当啷"一声，狱门开了，一个长长的身影被推了进来。借着微弱的晨光，辛培源看这个人很象老丁，但为了谨慎，辛培源没有出声。只见老丁的样子全变了，可一天多前，他还是那么斗志昂扬，此刻却象被谁抽掉了筋，软塌塌地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坐下了，嘴里还不断地唉声叹气。不一会儿，屋里更亮了，老丁发现辛培源就躺在他近旁，他凑过来，看到了辛培源浑身的伤痕，同情地抓了把稻草往老辛身下垫铺着，并低声说："老辛，这下子咱们算全完啦！"听到这垂头丧气的话，辛培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遇到这利剑般的眼光，老丁把头低下了。

正在这时，来人把他俩提走了，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审讯。这两个房间原是一间大房隔开的，隔壁上面有尺宽的空间，隔壁房间的谈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

负责审讯辛培源案的敌人还没有来，隔壁已传来审问老丁的声音。听到丁文礼的回答，辛培源终于明白，他已成了叛徒！可是，他却没供出辛培源。

这时，审问辛培源的敌人晃晃悠悠地走进来。

"放聪明点吧！小伙子，讲出共产党的事，免得皮肉受苦！"敌人说。

"我不是共产党，能讲出什么共产党的事。"辛培源倚墙站着，满不在乎地回答。

敌人狠命地拍着桌子叫道："拉出去打！"

两天两夜的吊打、灌凉水、压杠子，没有吓倒赤胆忠心的辛培源。

夜里，当辛培源苏醒过来时，见老丁仍坐在他的身旁，便狠狠地骂道："叛徒！"

老丁低声为自己辩白："不是我出卖了同志，是老韩那晚快天亮时，带着敌人抓了我。你还不知道吧？你们支部全是胡杰三出卖的。今天日本警察追问老邓的地址，我不肯说，胡杰三穿着一身崭新绸大衫，出来一口咬定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怎么？你把老邓的地址说了吗？"辛培源突然抬起头来急切地问。

"我，我寻思你们支部出了事已经两天了，老邓怎么能还蹲在老地方……"

"你这个软骨头叛徒！"

"可我，我并没有出卖你……"

"那你也是叛徒！叛徒！"辛培源连气加伤疼，又昏了过去。

丁文礼是不是软骨头，还是让他自己来说清楚吧。他在自述中这样说："被捕30多个小时里，接连不断地受审，吃尽了各种各样残酷刑罚。敌人问我是不是地（市）委委员，邓鹤皋在何处？起先我说不知道，后来我就领他们（敌人）到盘城町（现合作街）、荣町（现荣华街）两地方去了一趟（这地方是组织部长由明堂住过和常开会的地方），我知道他已经搬走了，回来敌人说我狡猾，更加折磨的厉害，因受刑不过，终于说出了我和邓鹤皋约定在日本桥见面的时间。我于次日（25日）上午亲自带领警察署刑事在日本桥逮捕了邓鹤皋。"中共青岛市委经过反复调查核实，1956年3月9日对丁文礼的这段历史作了结论："临危屈服，叛变革命，出卖同志，成为党的叛徒。"

三

1927年8月5日，大连日本殖民当局将邓鹤皋、魏长魁等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由小岗子警察署、沙河口警察署送交大连地方法院，押于关东厅刑务支所（又称“岭前大狱”）。

8月21日，邓鹤皋、魏长魁等17名共产党员被起诉。

同日的《泰东日报》报道：“解送法院之共产党徒51名，经三谷、池内两检察官审理，对邓鹤皋、丁文礼、于全福……魏长魁等起诉问罪，其余情节较轻者，概予不起诉处分云。”

8月29日，又有林春生、宫相承、迟文诚、门若棠、苏崔氏等5人被起诉。

9月19日上午9时半，日本大连地方法院于该院楼上第一号法庭，对邓鹤皋等17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开庭进行首次公审。安住审判官担任庭长。

首先受审的是大连共产党的“首魁”邓鹤皋①。

安住问：“被告所奉行的是共产主义？”

邓鹤皋毫不隐瞒地回答：“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现阶段要限制资本家的暴利，要分配均等，平均地权，限制资本……将来要在我国建成人类极其美好的共产主义。”

安住接着问：“据听到被告宣传的人说，由资本家手中没收铁路、工厂、土地、电气事业、水道等归为国家公有，劳动者按其技能就业，劳动的时间可以缩短，生活有保障，生活可以提高，听说这样受到宣传，怎样进行宣传的？”

---

① 对邓鹤皋的审讯，引自于全福的回忆录《狱中斗争》和1927年9月20日的《满洲日日新闻》，文中似有不通处，原文如此。

邓鹤皋回答："是的。如果是这样，不但职工可以得到恩惠，一般人民也可以得到安定生活。"

当安住问到《国际歌》中的"寄生虫"是说明什么意思的时候，邓鹤皋坦然地告诉敌人："这意味着中国的官僚、军阀、不劳而肥私腹的人。"

安住又问："你们是要学生、工人、农民等巩固的团结……？"

邓鹤皋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必要的，当然要这样做……"

对邓鹤皋将近一天的审问，使法庭变成了共产党人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弄得安住理屈词穷，非常狼狈，他气极败坏地说："就是你们的主义好，可是，但是……"随即挥起拳头凶狠地说："谁的拳头大，谁说的算！反正你们得遭点罪！"此时，法庭上一阵骚动。敌人的初次审判失败了。

次日，日本当局的报纸《满洲日日新闻》专题报道了这次公审的情况，说在法庭上，"邓得意然讲解三民主义"，这次审判以"不得要领而告终"。

1927年9月21日上午8时，仍由安住担任庭长，对"共产党事件第二次公审"，旁听席"仍患人满"①。

首先审问迟文诚、刘林秀、邹继升等人。受审的大部分同志在回答为什么要入党时，大体上都是说：现在大连的中华工人受到社会上的虐待，工资仅仅维持全家半饱的生活，衣着极差，不仅如此，还受着牛马似的残酷虐待，以打破此社会制度为目的而加入共产党②。

9月22日的《大连新闻》在题为《共产党第二次公审》的报

① 见1927年（昭和2年）9月22日《大连新闻》所载《共产党第二次公审》。

② 见于全福的回忆录《狱中斗争》，载于《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217～223页。

道中写道："迟文诚、刘林秀、邹继升、裴德亮被告5名，异口同音的供称'我们工人象牛马似的被酷使，却吃不饱，就因为被资本家剥削去了。所以为了打倒资本家，提高工资，才入的党'。并絮烦地陈述贫困的生活状况。"

"紧接着审问邓和高的助手，致力于组织大连共青团（共产党的别动队）有名的组织者魏长魁。"①

魏长魁凛然地走上法庭，仍然表示："我虽然第一个被捕，但对于党的状况，至死也不能供出一个字。这种决心，永矢弗渝。"敌人对他没有丝毫办法，只好"申斥而带下"②。

1927年9月28日上午，日本殖民当局大连法院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了第三次审判。

据于全福同志回忆：

> 这天法庭上仍然挤满了旁听者，敌人觉得几次"公审"已"圆满"结束，于是，这次便进入了由三谷检察官的求刑阶段。这个家伙连珠炮似的叙述了他们的治安维持法："……任何人说要统治国家他必然要制造国家政策的危机，违反治安维持法，那是不用说的了。"接着又说："本件共产党案就是这样的……然而被告所说的共产主义，即便从这个主义上说是个好事……"敌人觉得说走了嘴，因此，支唔了半天才荒谬地说："但是，如果执行者的人格、学识不佳，随着而来的必然会使人不甚战栗……因此，绝对不能允许！"接着他便胡说八道起来，最后威吓说："只要在我们统治之下，无论如何宣传共产主义，也要彻底被检举的，一定使其不致再起。"

当天，三谷检查官代表"关东州"当局，宣布判邓鹤皋10年徒刑，判魏长魁等人8年徒刑，于全福等人7人徒刑。

---

①② 见1927年（昭和2年）9月22日《大连新闻》所载《共产党第二次公审》。

宣布判刑后，邓鹤皋仍然据理力争。他借用敌人的话为判刑的同志辩护："我们的同志中，既然如同你们所说，有的不清楚有关道理，有的还不识字，那么你们就应立即释放他们，不应判刑！"①

1927年10月10日下午，敌人法院对在"第一次大破坏"中被捕的共产党员进行了宣判。邓鹤皋禁锢② 10年，丁文礼、韩冈清、毕庶通、王天民、魏长魁、于全福等6人判徒刑7年；迟文诚、石华源、王玉增判徒刑5年；刘林秀、邹继升、侯立鉴、朱长德、林春生等5人判徒刑3年；裴德亮、宫相承无罪释放。

10月14日，除邓鹤皋外，其余被判处徒刑的魏长魁等14人，不服第一判决，一齐提出上诉，投旅顺高等法院审理。

同年11月7日午前8时，大连地方法院又开庭宣判，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判处邵福年、辛培源徒刑5年；梁学友徒刑3年；苏崔氏和门若棠罚款后释放。

1928年2月9日，判徒刑的人被转送到关东厅旅顺刑务所（旅顺大狱）关押。

至此，大连地下党组织第一次遭到破坏的所谓"共产党事件"告一段落。

1928年4月2日和5月14日，"第二次大破坏"中被捕的共产党人，先后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由各警察署移交到大连地方法院审理。

1929年1月18日午后，大连地方法院开庭公审，审判官为长岛。

首先被审问的是"本事件主谋者"杜继曾。

---

① 见于全福的回忆录《狱中斗争》载于《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217～223页。

② 禁锢是日本殖民当局刑罚的一种。它比徒刑管制更严酷，施行单独关押，限制一切人身自由。囚服也区别于其他犯人，别的犯人为红色，禁锢犯人为蓝色。

《大连共产党事件公判》①一文，有如下记载：

判官："民国十五年，在北京居住，当时被中华民国国民党左倾派派遣到东三省做宣传员的事没有吗？"

杜否认："加盟到国民党的事是有的，但不记得作为宣传员被派遣之事。"

判官："被告来连后，在提出打倒军阀，建立工农政府，否认私有财产等基础上受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大连市党部的丛子风、曲文秀的劝诱，加盟的事，这是事实吧？"

杜："不记得有加盟的事"，他装作不知地说。

判官："同丛子凤、曲文秀有来往的事，是有的？"

被告："有接受丛访问的事，是礼上（应为"尚"——编者注）往来，没别的来往。"

判官："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大连市党部书记，从事宣传工作，这一事实是什么？"

被告："这种事实，丝毫没有。"

判官："中国共产党大连市党部，宣传如打倒军阀、否认私有财产制度等过激的思想，以此达秘密结社的目的。被告，这个不知道？"

被告："全然不知道有这样结社的事情。"

审问中，杜继曾严守党的秘密，"无论问什么事情，都是不知道地极力否认。"为此，敌人不得不"打断了对杜的审问"。

接着被审的是张义堂。

张义堂，又名张侠清，印刷工人，共青团员。审判官长岛一开始就问他："记不记得经魏长魁介绍加入共产党？"他回答："……表示加入的想法绝对没有。"《大连共产党事件公判》中

---

① 见1929年（昭和4年）1月19日《满洲日报》第七版，有关这次审判的引文也均出此。

也承认："接着无论问什么"，张义堂的回答都是"'上述的事实一点也没有'，从头开始否认"。对"周祥富、杜继曾、魏长魁是共产党的事"，也"全都否认"。

田立华、王耀先（王世达）秦日新（秦鸿涤）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敌人审问时，他们也都采取了"全面否认"的态度。

下面是《大连共产党事件公判》一文中，关于审问秦日新的记载：

> 秦日新否认判官所问的"由王耀先介绍，加入杜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事实。"
>
> 答："不记得一个友人介绍入党。"
>
> 判官："以一个党员想为了主义的宣传而活动，这是为什么？"
>
> 答："没有加入，更谈不上活动。"

最后审问的是中共关东县委候补委员吕毓鸿（吕玉洪）。他不但否认了他参加的一些党的活动，而且否认自己参加了共产党，他说："只加入了工人会，不记得什么他人介绍加入了什么。"而且"完全不知道那个工人会是共产党关东州委员会的一部分。"当问到1928年2月22日、23日，"在曲家帮助起草关东州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时，吕毓鸿冷静地回答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那个会。"由于他一直采取"完全否认"态度，"判官对吕毓鸿束手无策"，只好仓促闭庭。

在法庭上被审问的党员除曲文秀、张明阳（张振忠）等少数不坚定分子叛变"坦白"外，大多数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杜继曾等人被反复审问了很长时间，直到1929年4月17日才最后判决。杜继曾、纪幼柏判徒刑8年；曲文秀判徒刑7年（1930年死于狱中）；其余判3年、2年8个月、2年2个月的各1人，1年8个月的34人，1年2个月的7人。

因关东县委遭破坏而被捕的66人中，有47人被判刑，2人在拘留期间死去（王可义、田永盛，党员，死于岭前监狱），17人被释放。

判决后，被判徒刑的47人也从岭前监狱转到旅顺关东厅刑务所（旅顺大狱）关押。

于是，大连党组织两次遭破坏中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狱内斗争。

四

关东厅刑务所，位于旅顺口区旧市区元宝房，中国人称它为"旅顺大狱"。它是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旅大时期，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法西斯魔窟。这里的严刑酷法名目繁多，"犯人"们不仅肉体上经常受到折磨，精神上也受到严重摧残。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以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8年2月9日被关押到这里的于全福、魏长魁等14人，不服判决，反复上诉。敌人企图用酷刑强迫他们服罪，他们则以绝食的形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敌人不得不让步，将于全福等三人的7年徒刑，改判为5年。

在监狱里，"犯人"们不准互相讲话，如说话被发现便要遭到一顿毒打。但这并不能阻止同志们传递消息和交流思想感情。于全福在回忆录《狱中斗争》中写道：

> 如在工厂做工时，我们经常是手在做工，眼睛注意着看守，脚便在桌子下面打起"电报"来，有时为了更确切地传递一点事或者说说笑话，便拿着工作物到要讲话同志身边去小声私语，当被看守发现后，我们便借故问活计怎么干为由，哄骗敌人。不仅如此，有时还借机揭露敌人对我们的虐待。

强制"犯人"到监狱内设的工厂、窑场、菜地服苦役，是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一个重要手段。"犯人"们忍受着饥饿，不但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苦工，而且还要受到人身污辱。凡服苦役的"犯人"，每天早晨都要通过"检身室"，"犯人"们叫它"鬼门关"。不论春夏秋冬，过"鬼门关"时都必须把身上的衣服脱光，然后走到检身室中间的一个木杠前，举起双手跳过这个"独木桥"。收工回牢房时，还要再来一次。

为了强迫"犯人"劳动，监狱当局规定干活多的多给饭吃，干活少的少给饭吃。对此，我们的许多同志宁肯少吃饭，挨饿，也不为敌人多干活。有些同志常因此遭到日寇打骂。如毕庶通（共产党员，1927年8月被捕）就因消极怠工遭到日寇的几次毒打。

狱中的同志虽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但共产主义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敌人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他们就用各种隐蔽的形式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进行巧妙的斗争。

23岁的共产党员辛培源，虽被判刑5年，但表现却十分乐观。为了鼓舞大家的情绪，他经常寻找各种机会，用各种方式取乐，给铁窗里带来了欢笑。晚间，他常常拿起扫地笤帚，小声唱着小曲，用笤帚当桨跑"旱船"。当听到看守的脚步声时，便马上装成扫地的样子。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打了两桶洗脸水回来，边倒边打趣地说："同志们，我去买香皂和雪花膏没买到，买来'冰糕'啦，请原谅。"以此来揭露敌人在冬天还让难友用冰水洗脸的虐待。辛培源同志为了出狱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坚持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他曾多次向难友们表示："将来出狱后，还要干革命，不怕为革命穿'红衣裳'（当时的囚衣是红色）。"① 辛培源后来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931年8月，因

① 见于全福的回忆录《狱中斗争》，载于《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217～223页。

大赦，辛培源提前出狱。获释后，他在家只呆了三个多月，便不顾敌人的严密监视，北上找党。在吉林与党组织负责人袁树柏接上了关系。他密切配合当地游击队，搞一些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工作。1941年7月11日，由于叛徒告密，他又一次被诱捕入狱，后牺牲在狱中。

“福纺”纱厂工学会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侯立鉴更是一个宁死不屈的典型代表。

侯立鉴又名侯康光、化名吴凤山。1926年4月27日，“福纺”工人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他是罢工的总指挥。罢工的第三天，厂主以谈判为名勾结日本警察署诱捕了他。当时，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竹板夹手指、上大挂、用烟头和香火烧腋下和前胸……最后，敌人把竹签子扎进他的小手指头，疼得他几次昏厥过去，他也没有屈服。他对同伴说：“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死，也什么都不能说。”后来，经党组织和大连工学会多方营救，于6月3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拒绝了厂主的高薪收买，继续领导“福纺”工人罢工。6月19日，敌人再次逮捕了他。临上囚车，他把仅有的5元钱，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傅德才，让他给罢工纠察队队员买鞋穿。在狱中，当他得知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时，兴奋得几夜没睡好觉。他对小野田洋灰厂(今大连水泥厂)工学会分会委员长陈德祥说：“我们虽然胜利了，但困难还很多，工学会被取缔了，我们还有党，有党就有希望。”这次他被押7个月后释放。1927年7月，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又一次被捕入狱。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被捕了三次，肉体受到了严重摧残，但革命意志始终不减。在法庭上，敌人问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他理直气壮地说：“宣传共产主义。”侯立鉴这次被判刑3年，他对难友们说：“只要不死，还要干。”

1930年春，侯立鉴出狱后，不顾敌人的严密监视和迫害，继

续进行革命活动。他经常向"满铁"沙河口工场的青年工人江尚义等进行革命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不久，他介绍江尚义、褚丕禄、黄耀典加入中国共产党。重新组建了中共"满铁"沙河口工场支部。并发展了当年"福纺"纱厂罢工骨干李永久等8名青年入团，组建了福纺"纱厂团支部。侯立鉴的活动，严重威胁着日本殖民当局的统治，他被"福纺"纱厂开除。1933年4月，党派他到新京（长春），在"福昌公司"以修理工为掩护，继续为党工作。长期牢狱折磨和艰苦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于1935年病逝。

杜继曾是一位坚强的年轻战士，在"旅顺大狱"服苦役期间，他领导狱中同志以消极怠工、绝食等形式，坚持与敌人斗争。一次，同案人王玉增（党员，1927年被捕）无辜遭到看守毒打，杜继曾以此事件为由，领导狱中同志绝食。狱官前来说情，遭到拒绝。结果迫使监狱长不得不出面承认错误，承认看守不应该打王玉增，向王道了歉，并将王送医务所包扎伤口，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杜继曾看王玉增爱好数学，就教他学习。王刑满出狱时，他还给王写了一首诗："珍重后努力，前途各自励，四年茹荼苦，无意此中味。"鼓励王玉增不断前进，继续斗争。

杜继曾是大学生，文化水平很高，为了使狱中的同志坚定斗争的信心和出狱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他积极地组织大家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他常把敌人丢弃的报纸收集起来，从中分析形势，设法告诉大家。于全福在回忆录《狱中斗争》中写道：

> 在狱中，杜继曾同志常常以革命的理论来教育我们这些工人出身的理论水平不高的党员，并常把外面传进来的零星消息，南方党领导工农红军革命斗争情况，告诉我们。

敌人经常对"犯人"进行人身污辱和迫害，杜继曾从不屈服，始终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有一次，一个看守领着一个日本和尚到工场发菜牌（上面写一个"褒"字），让大家跪着接，杜继曾坚决不跪，看守强按他的头，他也不跪。看守恼羞成怒，把他毒

打了一顿。他说："我上跪父母，再下我谁也不跪，至于日本帝国主义更不跪……"

杜继曾虽然身陷囹圄，却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对于全福说："在地方法院时，我把青大衫里面的小领子撕下一块布条，塞在牢房的地板缝里，待将来革命胜利后，可到那拿出它来，作为我们蹲监牢的纪念。"①

还有许多同志对非政治犯的难友进行了团结教育工作，从而扩大了我党在监狱内的政治影响。

当时，有一个姓安的刑事犯，在我党同志的教育影响下，对政治犯很有好感，甚至与邵福年（共产党员，1927年被捕，判刑5年，1929年于狱中病故）在狱中拜了"盟兄弟"。他常常冒着很大危险给我们的同志弄吃的。

有一个姓刘的犯人，因枪杀了一名日本警察被判了死刑。在狱内他曾几次高声呼喊："你们共产党是些好人！"

有些在押的日本籍和朝鲜族犯人，对我们的同志也很敬慕。他们趁敌人不注意时，常对政治犯伸出大拇指，表示由衷的钦佩。

残酷的刑罚、非人的待遇，磨灭不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我党被捕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宁死不屈，以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斗争。

中共大连地方党的组织在1927～1928年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先后有65人被判刑，关押在关东厅刑务所。

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

狱中的共产党人受尽了各种磨难，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更成熟了。许多同志出狱后，或北上，或南下，又重新找到了党的组织，接受了新的任务，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们就象不熄的火种，在漫漫的长夜中燃烧。

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

① 见于全福的回忆录《狱中斗争》，载于《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217～223页。

挣脱魔网

——记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次被破坏及狱中斗争

卢云龙

1928年11月25日，上海的《新民晚报》以《共产党入东省》为题报道："国府迭据报告，近有大批共产党乔装经商旅客，潜入东省，从事活动。东省青年学生，对党的研究正在萌芽，深恐感受共党煽惑，误走迷途。因是谭延闿特嘱奉代表邢刚三，即电张汉卿迅速饬令各地方长官严密查拿共产党员，并取缔各界秘密集会，防祸于未然，邢已据情电奉报告。"

这则消息发出不足一个月。1928年12月23日下午。12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突然出现在奉天（沈阳）大东边门外黄土坑，把一间低矮的小房团团围了起来。几个破门而入的警察环视一下挤满十几个人的小屋，厉声问道："我们查户口，谁是户主！"

主人牛思玉应道："我是。"

警察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牛思玉说："我家很困难，他们请会，帮我的。"

其他人也凑向前向警察解释说："我们来请会，每人10块钱，帮老牛一把。"趁着大伙说话的机会，一位身穿西装的青年人，暗中把一团纸扔进屋角小孩的便桶里，并向主人说："老牛啊，你孩子的尿桶还在屋里，怎么不拿出去，放在这里怪脏的。"说着，便把尿桶捧起来，牛思玉说了声"我来拿。"便急忙把尿桶接过来，好象怕熏了别人似的，一直举到屋外，把纸团儿倒进茅坑里。

原来，就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中共满洲省委正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这间小屋是从大连派来的汉医、共产党员牛思玉的家。黄土坑是奉天的贫民区之一。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些拉洋车的，做小买卖的，每天去“打工夫”的临时工和修炉子修炕的泥瓦匠。在这样一个“穷得叮当山响”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些身穿皮袍、呢大衣和西装革履的人，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拥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半天不出来，自然引起了密探的怀疑而报告了警察。

警察突然闯进，参加会议的人按事先统一的口径回答讯问。趁警察没注意，正在传达文件的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丽石当即把文件揉烂，机智地扔进小孩便桶里，让牛思玉倒掉了。

盘问过后，警察开始搜查。由于搜出了没有来得急毁掉的《十大纲领》和以“互济会”名义起草的章程，加之这些人年龄不等、穿着各异，而且说话南腔北调，更引起了警察的怀疑，便把与会的全部成员带走，只留下牛思玉的妻子看家，带孩子。被带走的有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唐韵超），以及王鹤寿、牛思玉、张刃光、李振琪（李梅五）、刘国栋、潘任德（潘敬久）、李正权、张德禄、王赞升、王化民、李荣等14人。

当警察押着这14位同志走到小东门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当时，小东门一带是奉天下层的繁华地区，南通大东门下杂行，北接纸行和小津桥，不仅商店林立，人烟稠密，而且还有一个破烂市场。工运部长唐宏经想到，这次被捕，万一有人暴露身分，东北的组织将遭到严重的破坏。为通知尚未被捕的同志迅速转移和改变联络地址，他趁街上行人拥挤，突然冲出警察的包围，向人多的市场逃去。警察见有人逃跑，大吵大嚷，穷追不舍。唐宏经被警察追上又押了回去。但就在警察追捕唐宏经时，张刃光却趁机躲进路旁的厕所里，逃过了警察的追捕。他在厕所

里一直挨到天黑才出来，急忙赶到团省委机关关碧云的家里，让陶惠明、邹立孟急速通知未被捕的同志马上转移。

被捕的十三名同志被押到小东警察分局。一进审讯室，先对每人进行搜身。

警察在吴丽石的身上搜出一枚“赵云容”①的手戳，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说：“我叫赵云容。”

警察说：“这象个女人的名字。”

他则以开玩笑的口吻解释说：“赵云容，就是说我的容貌长得象三国时的赵云，赵云是男的。”

警察瞪了他一眼，不再吱声。因此，吴丽石这次被捕后，在狱中一直用“赵云容”这个名字从事活动。

搜身之后，警察让每人填一张登记表。填表之前，一个警察厉声说：“你们填表要老实。是干什么的就填什么，不然查出来，倒霉的是你们自己！”

尽管警察通过不同的手段进行恐吓，有的还是填了假名，没有一人填上自己的真实身分。填表之后，大约过了两个小时，警察开始点名，点到名的就被带出去。

原来，当局为了摸清这次被捕人员的真实身分，把十三人进行了分别关押和审讯。唐宏经、王赞升、潘任德被关押到南市宪兵队；刘国栋被押回兵工厂（刘是该厂工人）；其他人分别送沈阳警察厅。

第四天——1928年12月27日《盛京时报》第四版赫然刊出《捕获大股共产党》的消息：“第四警察署于星期一晚在某处侦得共产党多名，当秘密请准，白厅长会同宪兵前往拘捕，至则共捕获青年十三名，并搜出宣言书多份……旋因某种原因被宪兵司令扣留三名，被兵工厂扣留一名，其余九名被拘押警察厅拘留所

---

① 赵云容，北大毕业生，陈为人同志的女友。

内。白厅长已令该厅司法科于昨二十五日晚严刑审讯。有无如何株连尚不可知。”

由此可见，这次大逮捕的目的是要抓捕共产党员，破坏党的组织。

由于唐宏经在途中逃跑，一进宪兵队，便被提出去审讯。双手被板子打得肿胀的象面包。回到号里，王赞升、潘任德看着他的双手，眼泪止不往的流了出来。唐宏经无事似地说：“哭什么？自己干什么的不知道吗？拉出去枪毙也不能掉泪！”接着，又嘱咐王赞升说：“你年纪小，要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就说你在迫击炮厂干活，是他们‘请会’找来做饭的。”

王赞升当时20岁，是一家兵工厂的工人，当局从唐宏经的嘴里没有捞到任何“油水”，便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宪兵队一名姓牛的队长亲自审讯王赞升，他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说：“你还是个小孩子，有什么就说什么，别怕……”一连审了五“堂”，王赞升还是那句话：“我是他们叫去做饭的，什么事也不知道。”牛队长见软的不行，就动硬的。站班的宪兵抡起手扳子就是一百下。王赞升的手被打得肿起多高，但他还是咬定一句话：“我真的不知道。”

审他的另一名军法官火了，大声吼道：“你这个小孩太顽固了，告诉你，知道也死，不知道也枪毙！”

王赞升装出委屈的样子说：“这样死了，我就算倒霉了……”

那个牛队长被气得一挥手，把王赞升又押回号里。

在沈阳警察厅，当局选中了年龄最小的王化民。这一选择，也使与他在一起的同志捏着一把冷汗。因为王化民当时只有18岁，是王鹤寿在兵工厂发展的新团员，而且家庭生活也比较优裕。一旦他经不住严刑拷打，不仅被捕的同志性命难保，而且整个组织也将遭到彻底的破坏。

望着看守押走王化民，同号的同志思考着万一被指明身分后的对策……

大约近两个小时，王化民被两名看守拖了回来。和他同号的王鹤寿、李梅五等当即围上去察看他的伤势。王化民望着大家担心的神情，语气平和地说："你们放心吧，我挺得住！"

王鹤寿摸着他的头，为他擦着嘴角上的血迹，轻声地说："相信你，你很坚强……"

轮到王鹤寿"过堂"了，他被警察用皮鞭子蘸凉水抽得浑身是血道子，血肉和衣衫粘在一起。回到号内，连衬衣都脱不下来……

审讯一次接着一次，拷打一次比一次厉害，敌人的信心却一次比一次丧失。

当局从被捕的同志身上得不到他们怀疑的证据，便于1929年1月，逮捕了牛玉思的妻子张璧生，妄图从这位普通家庭妇女嘴里弄清被捕同志的真实身分。

在警察局，牛思玉的妻子坐在笨重的铁凳上，向警察哭诉着自己受苦的身世……

警察急了，向她吼道："谁让你讲这些！"她反问道："不是你问我是干什么的吗？"

为了撬开她的嘴巴，警察让她穿着单薄的衣裤站在数九寒天的院子里反省……反省无效，还是动用了手板和皮鞭，但她始终就是一句话："我就知道我家困难，为了吃饭，请人打会的。"

警察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放了她。

经过近一个月的审讯，由于被捕的同志口径一致，刑罚也没有起作用，警察局便把此案移交给军法处。在移交前，李正权被保释，刘国栋被兵工厂要回处理。其余11人被军法处押去。

到了军法处，大家在预审室里见了面。通过眼神的交流，知道大家都挺了过来，每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军法处逐人核实完后，将他们送到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关押。“北未决”是专门关押正在审理而没有定案的嫌疑犯、军纪犯的场所，条件恶劣，刑罚残酷，审讯野蛮，是很难熬过的“鬼门关”。

在“北未决”，这11名同志被分别关押在“忠”、“孝”、“悌”、“信”等不同的监号里，只有每天“放风”时才能互相见上一面。由于这次是省委首遭破坏，所以监狱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不多，也没有成立党的组织。这11名同志被关进之后，为了掩护陈为人，形成了以吴丽石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吴丽石在争取监狱看守的协助之后，利用各种机会同难友联系。他利用放风时机和监号上的孔洞，经常给大家传递“革命要坚持到底，坚决保守党的机密”、“党的秘密不能暴露、任何严刑也不屈服”等简短的鼓舞士气的纸条。后来，经过看守的协助，吴丽石又同外边的“互经会”联系上，使内外情况沟通，更增加了大家的斗志。

军法处对这11名同志除了轮番刑讯逼供外，还让监狱的官员分别对他们训话。训话的内容大致是：你们一定要交待问题，不讲是不行的；你们看到了，监狱关押了那么多国民党，他们都讲了实话，就被全部释放了；你们共产党如果也讲实话，我们也释放你们。大家清楚，监狱当局的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由于张学良易帜，与国民党联合了，自然就不能再押国民党了。所以，因参加国民党活动被捕的，也确实放出去了。但对共产党，他们是决不会放过的。“讲真话就释放”，纯系诱骗！11名同志无一人上当。大家每天忍饥挨饿，带着棍伤和鞭痕，默默地坚持着、坚持着……

一天下午，军法处的头目颜文海破例来到狱中，将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王鹤寿、李梅五等提出去。按照惯例，下午提出的人都是要被杀害的。这几名同志自然也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省委书记陈为人叮嘱大家说：“咱们在刑场上不要喊口号，喊口号

会暴露其他同志。”

颜文海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后，没有进行审讯，却以长辈的身分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争取教育”。他先对吴丽石说：“你有书不好好读，闹事玩，以后不要瞎闹了，要好好念你的书……”说完，又训斥了大家一番，就让回到号里。

原来，这位颜文海是吴丽石的同乡，而且还沾点亲戚。吴丽石在狱中给其在江苏的父亲写信，请他设法营救。吴父便专程赶到奉天，找到在军法处当处长的同乡颜文海，求他关照放人。

由于当局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经过吴父的上下“运动”和满洲省委的营救，1929年7月底，这次被捕的同志全部取保释放。

释放时，由看守押着，到外边打铺保，谁打了铺保就放谁。有社会关系的，就找亲戚打保，交给警察后，就算释放了。吴丽石、潘任德在奉天没有社会关系，当天没有获释。翌日，吴丽石设法找到了曾和他一起关押，并已释放的菜园子把头，让他出面保释了自己和潘任德。

他们出狱之后，中共满洲省委已由刘少奇担任书记。为了他们的安全，组织派他们到外地接受新的任务，迎接新的斗争。

魔窟脱险

——记刘少奇、孟坚在奉天纱厂被捕及其在狱内的斗争

傅乃礼

1929年6月8日，党中央为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决定派刘少奇同志任第五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少奇以海军部工作人员的名义偕夫人何宝珍到达沈阳，赵唯刚（沈阳特科人员）在沈阳北站将少奇夫妇接到秘密地点，三日后与省委接上关系，定居在工业区78号。

少奇同志到沈阳后，对东北地区的形势进行了深入调查，指出："满洲民众在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政治压迫之下的生活日益恶化，斗争情绪逐渐增高。"① 为了进一步推动东北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少奇同志准备在沈阳亲自发动一次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将工作重点选定在奉天纺纱厂。

被　捕

奉天纺纱厂是1921年兴建的官商合办企业，有两千余工人，其中有八百多名童工。厂方对工人剥削和压迫很重。工人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微薄的工资还要经常拖欠。不仅如此，厂方还只发不断贬值的奉票②。当时，奉票毛荒，粮价飞涨，纱厂又从7

① 《中共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1929年10月18日）。

② 奉天官银号发行的一种代替小银元流通的纸币，称小银元票或小洋票。通称奉票。

月起以奉票给工人开半资，工人生活非常的困苦，极为愤懑。

1929年7月，纱厂党团支部恢复后，曾经组织过工人小规模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8月间，少奇同志派省委组织部长孟坚和组织干事杨一辰前往纱厂，同厂党支部研究如何将分散的小规模斗争逐步汇合成大的罢工斗争。

孟坚回省委后，向少奇同志汇报了纱厂罢工的准备情况。少奇向他提出几个问题，孟坚答不上来。少奇感到罢工的准备工作不足，一些问题安排不细，便决定亲自前往纱厂会见党支部领导。

但是，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等人，已在工人中进行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厂方马上警觉起来。工人管理员孔令铎拿着标语和传单向厂部协理员王广恩报告，王听后，认为事关重大，即令孔向总经理报告。总经理叫人将技师刘轩华找来，训斥说："你们光吃饭了，为什么让工人把传单带进来，赶快给我清理。"

刘轩华被训斥后，慌忙清查工潮问题。他发现他的亲属崔凤翥（地下党员）参与此事，便怀疑这次工潮可能有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能破获共产党组织，他就可以得到一笔赏钱。于是，他决定从崔凤翥身上打开缺口，对崔进行威胁恫吓，许愿拉拢。崔凤翥在刘轩华的软硬兼施的进攻下，供出了常宝玉和厂外来人会面的事。

因此，当天常宝玉被厂警抓去，党员老范逃离。常不仅缺乏斗争经验，意志也不坚定，他在厂警一再威逼下，供出了孟坚，说是受孟坚指使，将煽动工潮一事全推到孟坚身上，想以此摆脱他的干系。

1929年8月22日下午4点多钟，刘少奇身着工人装束。孟坚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一身教书先生打扮。一先一后来到奉天纱厂北门外的一片小树林里，按约定时间来与常宝玉等人碰头。下

班时间到了，工厂大门依然紧闭，没见工人出入工厂，只有几个厂警呆在厂门外。少奇感到异常，估计情况有变，当即告诉孟坚赶快离开，不能再等。正当他们分开欲走之际，工厂大门突然敞开，一群厂警持枪朝他们直扑过来叫喊："抓住他……"刘少奇、孟坚躲闪不及遂遭逮捕。

对 簿

刘少奇、孟坚被押进工厂警卫班，厂警看管很严，使他们之间没有对话的机会。晚饭后连同常宝玉一起被带到警卫队受审。以工人管理员孔令铎为首，对三人进行审问，他先把常宝玉叫上去，向他吼叫道："你为什么要煽动工潮？"常宝玉回答说："工厂发的奉票买不到粮食，日子过不下去。"并指着孟坚说："是他说厂方至少要发八成现洋，不然就罢工。"①

孔令铎没有继续往下问，转而审讯孟坚，他问过姓名、住址后，便气冲冲地质问道："你为什么煽动纱厂工人闹工潮？"

孟坚说："我是教书的，根本不知道纱厂里的事，什么工潮不工潮，我听都没听说过。"警卫队头子刘春朗听了，在一旁大叫起来："胡说！我早就盯上你了！你煽动工人闹工钱、闹罢工，还想抵赖！"②

孔令铎令常宝玉当场对质。常宝玉一口咬定孟坚煽动他闹工潮，孟坚不承认有煽动工潮的事，并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孔见问不出什么口供，就令人打孟坚的手板，孟坚还是一口咬定："我根本不认识他。"

孔令铎审讯孟坚无成，只好审讯刘少奇，问："你叫什么名字？"

---

①②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见《红旗飘飘》20期57～58页。

少奇早已想好应急措施，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叫成秉真（少奇表兄的名字）。"接着说他是武汉来的，因为在武汉生活不下去，听说奉天日子好过，想到这里投奔一位同乡找个职业，混碗饭吃。

一个帮凶打断了少奇的话，嚷道："什么武汉？你是上海派来的，上海纱厂工人才闹得凶哩！"

又一个接过话茬叫道："你们南蛮子是有来头的，知道你要来捣蛋。"

少奇一听，知道这些家伙什么也不懂，是乱咋呼，便从容地回答说："我确实从武汉来的，刚下火车，人生地不熟地摸到这里，天气太热想找口水喝，在树林乘乘凉，不知为什么把我抓来了。"

孔令铎指问少奇，"你是做什么的？"

少奇回答："我是做工的工人。"

另一个警卫头目走过来瞪着眼上下打量少奇，突然叫道："把手伸出来！"他察看少奇同志的手，立刻发出一阵奸笑"嘿嘿！工人？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老子，看你细皮嫩肉的，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还敢跑到这来冒充工人！"并恶煞般的吼道："老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①

一群帮手也跟着怪叫："说！说！"一时空气十分紧张。孔令铎等人自认为抓住了把柄，洋洋自得。

少奇同志却漠然置之，神情坦然地回答说："我是个排字工人，若是你们这有排版的活儿干，我可以干得蛮好哩！"②

帮手们一听，目瞪口呆，无计可施。孔令铎只好接着问闹工潮的事，少奇说："不知道。"又问："认不认识常宝玉？"少奇答：

---

①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见《红旗飘飘》20期59页。

②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见《红旗飘飘》20期59页。

"没见过，不认识"。孔令铎恼羞成怒，令人打手板，边打边问，少奇仍答不认识。孔令铎只好又将常宝玉带来对质。常从未见过少奇同志，看了半天，只好说不认识。帮手们无处撒气，便将常打了一顿。

常宝玉仍坚持说是孟让他搞罢工的。于是审讯集中在孟坚身上，企图从孟坚身上得到口供，他们不仅抽打孟，而且将他捆绑在长凳上，用一把大水壶给他灌凉水。孟坚忍受着各种折磨，坚不吐实。刑讯一直进行到深夜。最后几个厂警将三人带回警卫班看押起来。

第二天，孔令铎在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只好向总经理报告捕押人的情况。总经理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害怕在他管辖范围内发生政治案件对他不利。因此，总经理听了捕人和审讯的情况后，极不满意，训斥他们说："我叫你们在厂内清理，只要不出事，也不要追究是不是共产党，谁要你们到厂外逮人？那不是我们的事，赶紧把人弄走！"①

孔令铎本来是想报功领赏的，不想碰了壁，挨顿训，便默默退出。但是放人他又不甘心，便拉上警卫队长刘春朗一起把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三人送到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

当年，作为工厂向警察局送押人员是要有公文的。孔令铎没有公文，只好请求警察局先将人收押，事后补交送人公文。警察局问是什么案子，孔怕总经理训斥，不敢报"共党嫌疑案"，只好报个"煽动工潮案。"他回厂后，请示总经理，总经理不但不出公文，而且根本否认厂内发生工潮事件。

从此，孔令铎也再不敢去三分局了，所谓"煽动工潮案"也就失去了原告。

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对刘少奇等三人进行了审讯，边

---

① 转引自《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43页。

审边看纱厂警卫队的审讯记录，口供记录与他们的所审出的口供一样。

常宝玉仍一口咬定孟坚煽动工潮。孟坚坚持否认他认识常宝玉，又遭到警察的一顿毒打。三分局见审讯无结果，纱厂又不出公文，便将三人连同两次审讯笔录一并送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一推了事。

营 救

少奇和孟坚在奉天纺纱厂北门外被捕，被在省委秘书处工作的李文玉望见，当即向秘书长廖如愿作了汇报。廖立即告诉秘书处干事张干民将文件藏好，以备万一；又通知在外地的常委丁君羊、任国祯速回沈阳开紧急会议；另外派人去了解少奇等被捕后的情况，设法营救。

省委组织干事杨一辰火速赶到奉天纺纱厂，找到团支部书记小苏。小苏告诉他，少奇和孟坚被工厂警卫抓去后，厂警对他们进行了刑审。刘、孟都很坚强，未招供。第二天上午将他们送到警察三分局去了。杨一辰问明情况后，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

省委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营救工作。一是通过党员郭任民找其堂兄，当时在南市分局任捐务主任的郭庆善去找警察三分局的司法主任，设法疏通，把“无故徘徊厂外非奸即盗”之类的话写进送检案卷，以转移当局对“煽动工潮”的注意力。省委又通过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李笛晨（共产党员）给三分局司法张主任写信疏通（李同张主任是朋友）。省委秘书处工作人员张干民以李笛晨的听差的身分持信前往三分局送信，司法张主任见信后，表示问题不大，问明情况即可放回。

省委在得知少奇和孟坚被送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之后，派杨一辰去奉天第一监狱打探情况。

当时狱中关押一名叫周世昌的共产党员，他是党中央的交通员。1928年2月间，由上海经大连去长春，下船后被日本水上警察逮捕，后被驱逐出大连，路经瓦房店时被东北当局逮捕，当地军法处以内乱罪判徒刑3年，关押在辽宁第一监狱。狱方派他在监狱开设的一个小杂食店服劳役，卖酱油之类的东西。

这天杨一辰手提瓶子，装做买油的样子来到小杂货铺，悄悄在瓶子底下压个字条，条子上写着有人被捕转押在这里，请他打听监狱中有没有新关押的政治犯。

杨一辰一边递瓶子，一边用暗语问："有没有香油？"

周世昌会意答道："有，只剩下缸底子了，不太好，正磨着，你过两天再来。"

杨一辰急切地问："明天来行吗？"

周答："不行，你过两天再来看看吧！"①

周世昌接到任务后，通过狱中关系了解到少奇狱中化名等情况。第三天杨一辰一到，周世昌便递出一瓶香油，底下压着个小纸条，杨一辰拿到无人的地方，打开一看，条子上写着在看守所新关进几个工人打扮的人，还未判决，并附名单。杨一辰急速交到省委，省委得知少奇和孟坚果然在其中，并知道了少奇使用的假名成秉真。

省委当即决定要杨一辰去监狱会见刘少奇。杨一辰带20元现洋，买了些点心和水果，以少奇表兄的名义，在监狱接见室见到了少奇。他见少奇精神还好，只是有点消瘦，便问："身体怎样！"

少奇说："还好，不要紧，没什么事，过两天就出去了，家里不要挂念，放心吧！"

杨一辰会意，便问："需要钱吗！"少奇点头，杨一辰便把20

① 杨一辰：《营救少奇同志出狱经过》，见《红旗飘飘》20期。

元现洋留下，并告诉少奇用钱吱声，可以安排①。

次日何宝珍同志以少奇表妹身分去看望了他，沟通了有关情况，并告知需要找保时可到保兴店。

翻　供

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三人被押送到辽宁高等法院检查处看守所（即北未决号），分押在两个牢房里，少奇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孟坚、常宝玉二人关在另一间大牢房里。这里关押的犯人很多，每间有十几个人。白天空气污浊难于呼吸，夜晚挤在炕上难于翻身。但是看守并不十分严格，对犯人之间的谈话，来往等事，通常是马马虎虎。

少奇同志被关押到看守所后，总结了几天来的情况。由纱厂到警察三分局，再到高等检察处，辗转解送，换了三个地方，审讯却只进行两次。凭着多年在白区对敌斗争的经验，少奇对案情进行了具体分析。当时的司法部门有个大体上的分工，凡属政治性案件，特别是共产党案，都要送到军法处审理，一般刑事案件或工潮案则由地方法院审理。敌人没有掌握他们共产党活动的真凭实据，故没有送军法处。常宝玉也未供出地下党的其他情况，而是将煽动工潮的责任推给孟坚减轻自己罪行而已。少奇同志作了认真的分析与判断后，确定了对敌斗争策略：趁检查处和法院还没有进行审理时机，立即加紧做常宝玉的工作，让他彻底翻案。

一天，少奇借放风之机，走到孟坚身旁，悄悄对孟说："既然把我们解到地方法院，看来案情并不十分重要，关键问题是那个工人，你要向那个工人做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了做好事。如

① 杨一辰：《营救少奇同志出狱经过》，见《红旗飘飘》20期。

今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但他们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如果他能翻案，否认有人组织工潮，我们的案子就会比较容易解决。”①

常宝玉从在纱厂被捕那天开始，就一口咬定是孟坚煽动工潮，以此来开脱自己，因此，争取常宝玉翻供也需要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当天，孟坚凑到常宝玉身边躺下，用胳膊碰碰常宝玉，轻声问他纱厂其他工人的情况，以便进一步动员他翻供。可是，常宝玉理也不理他，摆出誓不两立的架势，使劲一翻身，给孟坚一个后脊梁。

为了工作，孟坚耐着性子，继续设法与常拉话，一连几天常宝玉都是一言不发。孟坚心里很着急，很怕他工作没做完法院就提审。放风的时候，他向少奇汇报了情况。少奇与孟坚分析了常的思想状况，研究了具体办法，要孟坚不要急躁，不要畏难，继续工作。

这天晚上，孟坚看大家都躺下之后，捅捅常宝玉压低声音，直截了当地问常：“你一口咬住我，还不是一同坐监狱，纱厂并没有饶过你，还认为是你煽动工潮，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能改改口吗？”②

这次常宝玉仍然一言不发，但没有转身，而是听着孟坚的话。

孟坚感到有了转机，继续说：“既然把我们解到地方法院，说明案情并不严重，而且纱厂指控我们煽动工潮又没有物证，只有人证。我根本否认与煽动工潮有关，而且从没有承认认识你，如果你也一样否认，就连人证也没有了，将来判决就会轻得多。”③

孟坚的话终于使常宝玉认识到坚持原供和彻底翻供对他的利

---

①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见《红旗飘飘》20期。

②③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见《红旗飘飘》20期。

害关系。于是，常宝玉表示要在法院过堂时全部否定在纱厂的口供。

1929年9月10日左右，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主审官是个留日回国的学生，很年轻，身穿法官礼服，派头十足，坐在审判桌前，先叫孟坚的名字，问过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便问："你为什么到奉天纺纱厂煽动工潮？"

孟说："我是个教书的，根本不知道纱厂有什么煽动工潮的事。"

问："那为什么把你抓来了？"

孟答："那天我从纱厂门口路过，见围着很多人，不知纱厂出了什么事，就过去看热闹，谁知正赶上纱厂警卫抓人，就连我这个看热闹的也抓进来了。他们乱抓人，我是无辜坐牢啊！"

问："哪会有这样的事。"

孟说："确实如此，我实在是无辜坐牢。"①

法官察看在纱厂和三分局的审讯记录后，叫人把刘少奇带上来审问："你叫成秉真吗？"

"是的，我叫成秉真。"少奇装出十分冤枉的样子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

法官边听边看过去的审讯记录，几次口供分毫不差。于是也叫人把少奇带到一边，又把常宝玉叫上来审讯。常宝玉的口供果然改变了，他根本否认有煽动工潮的事，也不承认有什么人指使他煽动工潮；只是由于奉票太毛，买不到吃的，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根本没有闹工潮。

法官越听越感到不对，就干脆制止常宝玉的讲话，追问："你说的为什么和前面的口供不一致？"

常回答说："先前的口供是他们动刑逼我说的，我不这样

①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见《红旗飘飘》20期。

说，他们就打我，我只好照着他们的要求，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①

法官指着孟坚问：“你不是说是他煽动你闹事的吗？”

常回答说：“他们硬逼着我这样说。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②

法官继续追问一些问题，常宝玉都一一否认。

出　狱

就在法官审讯后的几天，判决书下来了，对少奇是“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孟坚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常宝玉因与纱厂有直接关系，判罚40天拘役。这样，少奇根据事先营救安排，花钱到保兴店取保被释放。孟坚通过皇姑屯铁路工厂党支部的同志找厂大门外的小杂货铺取保释放。

少奇、孟坚出狱后，先后回到省委，少奇向中央写了被捕和出狱的详细报告，经中央决定继续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主持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孟坚因与纱厂的关系，为安全起见，调离沈阳，去哈尔滨任市委书记。

1930年3月下旬，少奇同志调离满洲省委，回中央工作。

---

①②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见《红旗飘飘》20期。

铮铮铁骨　耿耿丹心

——杨靖宇在狱中斗争纪实

张大庸

一

1929年7月。抚顺。

一阵又一阵热风，吹过矿区，吹过人群熙攘的“欢乐园”。

这里有一栋栋大工房，每间里住着百十号独身的煤矿工人；这里还有一片数以千计的臭油毡纸苫顶的小破房，里面住着矿工们的家属。资本家、把头们为榨尽矿工们的最后一点血汗，在这里开设了数十家下等妓院，还有大烟馆、吗啡馆、赌局、当铺、小押店；一些小买卖人在这儿开了粥棚、饭铺、小旅馆；附近还有一座小落子（评剧）园……

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异乡人出现在“欢乐园”的街头。他用冷峻、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四周。

街上，有打把式卖艺的，卖狗皮膏药的，卖故衣、换旧鞋的，卖冰水的……商号门前有些衣衫褴褛的人在打“哈拉巴”讨钱，老君庙前聚着一群要饭的，几个矿工喝醉后，发泄胸中的愤闷，大骂着日本监工和把头……

异乡人若有所思。然后，匆匆地消失在人群中。

不久，他在这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他一副小商人的打扮；夜里，又换上一套矿工的服装，出没在大工房和矿工家属区。

他叫张贯一。其实他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新派来的抚顺特支书

记杨靖宇。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开封纺织印染工业学校，1925年6月在校求学时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于1926年暑假回家乡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在1927年四五月间领导确山农民起义。之后在开封，洛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三次被捕入狱，都因无证据及党组织营救出狱。1928年初冬，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学习。1929年春，党中央从上海派他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此间，他经常代表省委到抚顺、本溪等地巡视工作，当时他化名张贯一，代号大马。

很快，靖宇同志在矿区扎下了根。

据邹立孟[①]回忆说："1929年夏天，团省委让我到抚顺矿去考工，以便打入矿区搞工运。团省委组织委员陶惠明带我到抚顺站附近一个闹市场靠北边的一间小屋里见马同志。陶向他传达了省委指示后就回沈阳了。我同马同志在一铺炕上住了七天。他是河南人，身体非常魁梧，强壮有力。他生活很简朴，我们每天吃的只是火勺，豆腐脑，他还边吃边说：'从前在家乡要能吃上这样饭都不容易呀！'这人讲话幽默风趣，不紧不慢，很有节奏，生动有力，我听得出神。看来他对抚顺矿区的工人斗争很熟，向我讲了许多同资本家斗争的事，我受到很大的教益。他每天晚饭后都出去，很晚才回来，后来因我身体检查不合格，没考上工，又返回沈阳。"

靖宇到抚顺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他能深入到工人中去，与工人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因而深得工友们的欢迎和敬佩。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山东张"。

---

① 邹立孟，1927年在大连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大连、沈阳、营口、辽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在黑龙江鹤岗市农业局工作，现已离休。

日本人又要裁减工人了。消息传来，矿工们非常气愤。晚上，一些工人骨干到"大工房"找到这位"山东张"，请他给出个主意。靖宇说："弟兄们！咱不能再这么忍气吞声了，不能让日本人骑在我们头上胡作非为。我们要拿出点力量和日本人较量一下！"靖宇当即决定，如果日本人裁减工人，我们就罢工，并对罢工事项作了周密的安排。

不久，日本人裁减工人的布告果然贴出来了。工人们按靖宇的安排，针锋相对地开始了罢工，为得到社会上的声援和支持，还散发了大量的传单。罢工使矿上一片混乱，煤出不来，井下的水没人排，矿井眼看有被淹没的危险。日本人非常焦急，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来的复工条件：增加工资，取消裁减工人的决定，反对加班加点不给报酬。

罢工取得了胜利，党在工人中的威信增强了，工人们更信任"山东张"了。

这次罢工也震惊了敌人。狡猾的日本警特敏锐地感觉到抚顺有共产党在活动。据敌伪档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の人事课"在1930年1月写的《1929年满洲工运情况》中记载："以抚顺、奉天为中心，共产党员的活动，是从四月中旬开始的……尤其是五月开滦煤矿劳资纠纷发生后，在抚顺也有了明显的异乎寻常的感觉，因而当局给予了充分的注意，结果，果然就在七月下旬在抚顺炭矿矿区内发生了散发传单的事件……"为此，抚顺日本警察署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地下党的破坏。派特务、密探四处活动，全力进行搜查，并指令叛徒、内奸范青①千方百计，不遗

① 范青，原名胡杰三，别名胡登山。1927年在大连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叛变，成为日本特务。1928年3月由大连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米夫介绍到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当特务并重新钻入党内，成为内奸。解放后隐瞒主要罪行，被判刑7年。1961年发现他有出卖杨靖宇、林仲丹等严重罪行，经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61年判处他无期徒刑。1984年改判获释放。

余力地搞到张贯一的下落。

二

范青是敌人的密探。在大连破坏了党组织之后，又被日本人派到了抚顺。

1929年5月间，杨靖宇去抚顺巡视指导工运工作时，曾与抚顺团特支书记王振祥到永兴铁工厂同范青接头。杨靖宇看范很圆滑，对他的印象不太好。尽管当时范青很"关照"他的食宿安排，问寒问暖的，但杨靖宇从未将自己的行踪讲给他。

1929年8月末，杨靖宇转移到"欢乐园"二十二番地"福合客栈"的4号房间居住。

范青一直没有查到杨靖宇的行踪。

当时，抚顺的党组织并未看清范青的真面目。省委发来的标语传单大部分寄存在范青的铁工厂。王振祥和范青的接触较多，常到范青处取标语传单，并常和他吃吃喝喝。王振祥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纪律，省委几次来人都是王泄露给范青的。范青将所获的情报都向日警署特务机关作了报告。

日本人出于放长线钓大鱼的目的，加之五六月抚顺的工运斗争尚不十分激烈，没有特殊情况在中国管区内不便抓人。所以，省委几次来人，都未遭到逮捕，只是让特务跟踪，掌握了活动情况。

1929年8月29日晚，王振祥又到范青处取标语。

范青问："你想到哪儿去贴呀？"

王振祥答："去张贯一那儿研究一下再定。"

王在谈话中向范青泄露了杨靖宇的新住地。范青喜出望外，他正愁查不到张贯一的下落呢。当晚8点多钟，他急急忙忙跑到

日警署高等系主任峰须贺重雄家报告了此事①。根据范青提供的情报，8月30日上午，抚顺日本警察署在矿区王振祥的住处，将王逮捕，同日在街上又将去找杨靖宇会面的孙德文（党员）逮捕。

日本特务将王振祥押进了抚顺日本警察署审讯室。高等刑事横烟武吉那一双凶恶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他，突然猛捕过来抓住他的脖领子，狠狠地把他摔在砖地上，他还没喘过气来，日本刑事松尾马上又给他使了一个柔道的招数，横烟又扯过他，把他摔了个大长条，把他摔得鼻青脸肿。日特将从王住处搜出来的传单、书籍、油印工具等摆在他的面前。王振祥在物证和敌人的刑讯下，没经得起考验，终于招供了。他供出了韩思贵等几名党员及他所知道的抚顺特支的情况。

当天下午，抚顺日本警察署长大林久美命令署内警特开始对“欢乐园”地区“福合客栈”进行严密监视，对警署已掌握的古城子、大山坑、东乡等矿上的党员、工会会员立即逮捕。具体执行者是须贺，他接受任务后，马上进行了周密布署，调几名日本刑事，在矿警队的配合下，去各矿区捕人，令巡查田高山等人在“福合客栈”守候。他带领横烟、松尾隐蔽在“欢乐园”附近追捕杨靖宇。

杨靖宇这天一大早就到矿区去了解工运情况了。由于谈话的人很多，返回市区已快5点了。他刚一迈进旅馆房间，日警的枪口就顶住了他的胸膛。

日警巡查田高山问：“你的是张贯一？”

杨靖宇随即镇静地回答：“我是张贯一。”

“你的日警署的去说话！”田高山恶狠狠地把枪一挥。

靖宇辩问道：“我是做小买卖的，没犯罪啊！”②

---

① 《峰须贺重雄笔供》（现存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胡杰三卷）。

② 见《杨靖宇堂单》，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这时须贺带着一伙日警特围了上来。面带奸笑的须贺对靖宇说："张桑的，请到警署的谈谈吧！"

杨靖宇被捕后，关押在日本警察署拘留所的一个单人监号里。

由于王振祥的招供和内奸范青的出卖，从8月30日至9月5日，在抚顺先后有10名党员和工会会员被捕，另外在沈阳被捕11人。其中党员8人，工会会员3人。抚顺特支遭到了一次严重破坏。而可耻的叛徒、内奸范青却为此得到他的主子——日本警察署1千日元（金票）的赏金。

为掩人耳目，便于范青继续隐藏在我党内部活动，日本警察署让他伪装逃跑回老家暂避，同时发了一个搜捕范青的假通缉令。后来又以从狱中释放为由，再次潜回抚顺混入党内。数月后，使中共抚顺县委在1930年又遭到了一次大破坏。

三

日本警察署据范青等人提供的情况，断定这个名叫张贯一的人，是抚顺新来的共产党"头目"，所以当天夜间就对他进行了重点审讯。

一栋两层日本式的小灰楼，坐落在抚顺新站七条通。这就是日本满铁附属地，抚顺日本警察署。在这栋小楼的一头，是日本警察署的高等系，它的后屋便是审讯室。晚8点钟靖宇被带到灯光昏暗的审讯室。横烟、松尾、翻译官等都坐在审讯桌前，两侧站了好几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刑事。

横烟看见靖宇进来，便假惺惺地说："张桑，你的这边请坐。"

横烟一边吸烟，一边死死地盯着靖宇，一言不发。室内死一般的沉寂，空气象凝固了一样。

杨靖宇曾三次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沉着、冷静，敌人不吱声，他也不说话。

横烟突然发问："你的原籍什么地方？"①

杨靖宇本来是河南省人，他却说："我是山东省曹州府人。"

问："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靖宇却所答非所问："我来千金寨，想开个杂货铺。"

横烟见他不正面回话，便直接提关键问题："炭矿的罢工，华工街、老虎台的传单你的知道？"

杨："我什么也不知道，从来未听说那件事。"

横烟很恼火，几次离开桌子狠狠抓起靖宇的脖领子逼供："你的共产党有？通通讲出来！"

靖宇很从容地回答：

"什么是共产党？我不知道，在山东老家听说过，在这儿我没见到……"

横烟阴险的笑一笑说："张桑你看看这是什么？"他一按电铃，墙上的大铁门开了。

一股阴森森的寒气逼来，里边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半地下刑讯室。铁索上吊着一个满身是伤，已是奄奄一息的青年人，血从脚尖滴滴流下，地上已是一汪血了。烤人火炉、老虎凳、灌水器械、夹棍，各种刑具应有尽有，几个掌刑的日本胖汉凶神似地站在里边。

横烟狞笑着："张桑你的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场面对一个胆小鬼来说，也许会吓得魂飞魄散，但对杨靖宇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来说，却是毫无作用的。杨靖宇微微摇摇头，脸上还露出一丝冷笑。

几个小时的刑讯，敌人一无所获。审讯最后，横烟阴险地一笑，对杨靖宇说："警察署不光有物证，而且还有人证，你的回

---

① 见《杨靖宇堂单》，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去考虑考虑吧！不要自找苦吃的。”

日警察署后院有一栋日本式的平房，这就是日本警察署的拘留所。杨靖宇被关在一个8平米的单人牢房里。屋里除了一个草垫子和一个尿桶外，什么也没有。夜深人静，杨靖宇躺在草垫子上，反复思索着如何对付明天更加严峻的斗争。

第二天早晨，日警署高等系主任峰须贺重雄，对审讯又作了重新布署。8点多钟，杨靖宇再次被提来到审讯室，由须贺主审，横烟帮办兼做打手。阴森森的审讯室里，气氛紧张而严峻。

一束强光照在杨靖宇的脸上，更显出他的刚毅和冷静。

峰须贺重雄除重复昨夜提的问题外，重点追问抚顺地下党的情况。靖宇仍断然否定自己是共产党。

一个叛徒被带到审讯室。敌人让叛徒与杨靖宇对质。杨靖宇拒不承认和叛徒相识。他挺胸昂首，用蔑视的眼光盯着敌人。

横烟和其他几个日本刑事早已按捺不住了，疯狂地扑上来，狠狠地抽打杨靖宇。一个人打完推给另一个人继续打。面对残暴的敌人，靖宇毫不畏惧，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而且还将口中的血水喷吐在打手们的脸上。

须贺见他不低头，气极败坏地说：“拖下去！给他点利害尝尝！”

几个日本刑事把靖宇拖到地下刑讯室。将他双腿紧紧绑在一个特制长凳上。这就是“老虎凳”。上这种刑就是往脚下不断垫砖加高，每加一块砖，大筋就要抽长1毫米，受刑者会感到如筋断骨折一般的疼痛。

当加到第二块砖时，横烟问：“你的共产党有？”

靖宇回答说：“不是！”

横烟让掌刑的再加第三块砖。这时靖宇昏死过去。

敌人向他泼了一桶凉水，他醒过来。敌人继续追问，靖宇依

然拒供。

敌人又将他吊起来，边问边抽打他的后背，衬衣被打飞了，血肉又模糊了。

由于他拒不招供，残忍的敌人拿起烧红的烙铁，往他后背的伤口上烙。一声惨叫，一股油烟，血同油同时从背上流下……靖宇再次昏死。

就这样反复审问，反复用刑。灌“辣椒水”、“压杠子”，连续折磨他达五六个昼夜。所有的刑罚都用过了。靖宇遍体鳞伤。

最后，日警特竟将靖宇扔进了齐胸深的水牢里。伤处受水浸后，如刀割针刺一般地疼痛。更甚者，水牢里装了一枚大电灯泡，正悬在杨靖宇的头顶，初秋的东北是小蚊小咬肆虐的季节。靖宇不仅要忍受刑伤的巨痛，而且还要承受成群的蚊虫在头上叮咬的痛楚。

尽管敌人对杨靖宇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折磨，可他始终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战犯峰须贺重雄，1954年6月2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亲笔供词中曾写到：“横烟对其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讯问，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的组织……横烟残暴地殴打他，脊背受伤……”这里指的“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残酷的刑讯，水牢中的浸泡，使杨靖宇的伤口大面积感染，加之毒蚊的叮咬，他脸面红肿变形，身体开始发高烧。口干舌燥，想要一口开水喝都没有，靖宇只好喝脏水，于是又患了赤痢，每天上厕所十多次。杨靖宇已奄奄一息了。幸好当时“号里”有几个被捕的矿工，很同情靖宇同志，他们冒险通过关系搞到两块大烟，给他灌进去，这才将他救活。但他仍站不起来，只能躺在“号里”，一切全靠难友们照顾。

四

1929年9月28日，日警署以“治安维持法违反犯”的罪名，将杨靖宇解到抚顺县公安局，羁押于抚顺县公安局看守所。

1929年10月3日，抚顺县公安局局长刘克羽向抚顺县政府监督写了一份《为报羁押人犯张贯一患病由》的报告。

“钧府羁押日警署引渡人犯张贯一一名，当该犯入所之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患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合签报。”

这份简短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靖宇在日警署被行刑至伤的严重程度。

10月3日上午，抚顺县公安局审讯官孙金城，不顾靖宇身负刑伤，行动艰难，继续进行审讯。

抚顺县看守所院内有一栋西厢房的审讯室，屋里除了一个旧八仙桌外，只有几个旧板凳。靖宇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步履蹒跚地走进审讯室。

孙金城装腔作势地按惯例询问了靖宇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原籍等自然情况，靖宇均按在日警署讲的一一作了回答。

孙突然单刀直入地问：“你怎么入的党？”

杨：“我是7月11日（阴历）由家来到千金寨，是打算做生意，不料受人牵连，到‘福会客栈’就被捕了。我与王振祥没见过面，无晓有入共产党的事情……”

问：“你与王振祥是同时被捕的吗？”

杨：“是和他们一天被捕的，不差，但被捕的原因应另当别论。我到‘福会客栈’居住第二天后，经日警署检查，说我是上海人，形迹可疑。又说我带的硼酸是毒药，最后搜出张若云给王振祥的一封信，硬说我是共产党，带到日警署刑讯致伤。”

问：“张若云怎样给你写与王振祥的书信？”

杨：“我由家来青岛，遇乡亲张若云，给我写了一封信，是叫王振祥关照我的意思。我并不知王振祥是共产党。”

问：“从你住处搜出的《红旗》及印刷品等，不是你的证据吗？你怎么还敢狡辩呢？”

杨：“药和信是我的，其他东西是从范青处搜来的。假如我是共产党怎敢不自检，把那些违禁品放在明处呢？请能给予详查。”①

民国18年（1929年10月3日）抚顺县公安局《堂单》有这样的记载：

“查该犯既与范青、王振祥等有牵连，且有与王振祥之书信，该犯已自供认，而日警署并搜出一些证物，谓该犯系共产党之首魁，尚非尽属臆断，着收押，即速函送法院，以便与王振祥、范青之案合并侦讯。此谕。”

1929年10中旬，抚顺县公安局将张贯一案及抚顺日警署“解送书”一道转送抚顺地方法院检查处审判。杨靖宇在抚顺地方法院检察处的法庭上，带着严重的伤病之躯，对着中国法官，慷慨陈词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蹂躏中国人民，肆意践踏中国法律的罪行。

“法官先生，你们看我这满身的伤痕”，杨靖宇将自己上衣当众解开，显露出胸前和后背的一道道血印和烙铁烧的黑紫色伤痕，悲愤地讲：“我作为中国的一个老百姓，却在中国土地上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成重伤，作为官府不仅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替日本人来审判我……”

法官说道：“张贯一，这是法庭，你要冷静些，法庭会做出公正裁决的。”

---

① 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士章、陈瑞英编著的《杨靖宇传》43页。

杨靖宇以法庭当战场，继续质问那些昏庸无道的法官：

“公正裁决？你们能做些什么好事呢？对日本人奴颜婢膝，为虎作伥，做敌人的鹰犬，反而在老百姓身上作威作福，来残害自己的同胞，你们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枉做中国人……”

法官张口结舌，无言可对，只好草草地结束了庭审。

1929年10月下旬，抚顺县法院将他解往辽宁高等法院，羁押在奉天高等法院看守所。

12月25日，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陈士杰以反革命嫌疑罪对杨靖宇予以起诉：“……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送付公判。”①起诉书送达杨靖宇两日后，辽宁高等法院正式开庭，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半。

五

杨靖宇没有上诉。

1930年1月初，他被解送到辽宁第一监狱服劳役。因为杨靖宇有文化，字写得好，看守长将其留在南监杂居监，当杂役。据原奉天第一监狱看守李景（外号李迷糊）讲：“民国18年冬或19年初这个样子，我在南监一舍当看守，从‘北未决’送来两名政治犯，其中有一个姓张的河南人，他头发、胡子很长，很清瘦、高个子……”②

杨靖宇到南监后，首先研究了监狱总的情况，并积极寻找在押的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犯。当时监狱中只有周世昌③、高景阳

① 见《辽宁高等法院检查处起诉书》。现存辽宁省档案馆，辽革第94号卷31～32页。

② 见《中共满洲省委狱内斗争史料之四》杨靖宇专卷42～58页。

③ 周世昌曾用名周振东，1942年在天津再次被捕时叛变。1968年病故于北京。

两名共产党员，他们都是1928年3月份在大连地区被捕的，以“内乱罪”判刑3年。另有非党员的“内乱犯”张鸣岐、曲容堂、李宝贤等三人。靖宇很快同他们联系上了，并向他们做了思想工作。监内以靖宇为核心的组织力量已形成。

另外杨靖宇很注意争取教育狱内的下级管理人员，着重做看守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争取了贫农出身的李景。这个人没有文化，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见到被日本人打伤的犯人就同情。后来杨靖宇又通过李景认识了李景的把兄弟主任看守赵某。

在李、赵二人的努力下，杨靖宇很快就当上了杂役头。他利用这个合法身分，常去狱内工场（厂）、炊场、医务所和部分监舍活动。在难友中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同胞的罪行。

1960年8月23日，杨一辰同志回忆说：“我们在监狱中也有活动，在我入狱前，监狱是杨靖宇负责……”

旧监狱中的犯人大多数没有文化，因此要想写张呈子和书信都得求人，而写一张呈子就得花一两元钱。那些穷苦的犯人，往往是苦于没钱，申诉也没有办法。靖宇看到这种情况后，除自己写以外，还动员其他政治犯为穷苦难友们写呈子、写家信，他还积极帮助不识字的犯人学文化。当时的看守从农村来的多，大多数没文化，杨靖宇有时也帮助看守们写请假条和买房典地的文书之类的东西。因此他受到了难友们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感化争取了看守人员，给他在狱中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狱内清扫队有一个叫赵小六的纵火犯（判有期徒刑10年）①他家住在沈阳附近的一农村。因为本村的一个姓王的老财为霸占他家的三亩坟地被陷害入狱。他入狱两年多来一直喊冤，多次申

① 见《中共满洲省委狱内斗争史料之四》杨靖宇专卷42～58页。

诉都被法院驳回，他本人和难友们都失望了。

靖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主动与赵交谈，听完赵小六子的叙述后，杨靖宇的内心很不平静，他决心要为赵小六平冤。他认为制服王老财只有采取斗争的方法才可奏效。他问小六子："你好好想想，你村那个姓王的老财有什么缺德事没有？最好有犯法的事。咱们抓住他，就不愁这老家伙不堆了。"

小六子想了半天说："有了！3年前我在王老财家扛活，一天，王老财叫我给北大沟看瓜的李罗锅子送了一封信，没过几天，西村王老财的仇人于八爷就被胡子抢了。事后李罗锅还特意找到我，不许对外人讲送信的事。讲了就会掉脑袋。"

靖宇听后说："好！有办法了！"回号后他马上替赵小六给于八爷写了一封信。

于八爷：

小侄被本村王老财所害，正在奉蹲大狱。如你能帮我打官司，我可将您被抢的拉线人提供给您。

小侄：赵小六

民国十九年春

3年前于八爷被土匪抢了两千块大洋，还被打伤，差点没送了老命。他曾怀疑是东村王老财干的，他们在抢河套地时与王老财结的仇，但因没有证据没法治他。突然接到赵小六的来信，于八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到沈城花钱运动了典狱长，破例的见到了小六子。问明情况后，于八对他说："小六子，你放心，你的官司我包打了，听信吧！"

几天以后，于八爷就到沈阳警察局花了几百元现大洋，通过王督察长告发了王老财通匪并诬陷赵小六。王老财、李罗锅被拘审后，在人证面前和于八爷的追诉下，不得不全部招供。

王老财承认他家场院着火是他孙子放鞭炮造成的，而嫁祸于赵小六子，其目的是为了霸占赵小六子的3亩坟地（此地作为赔

偿失火的损失，已归王老财）。王老财还招认，为土匪送信抢劫于八爷是出于报复。最后王老财以通匪、陷害罪被拘押了。赵小六无罪释放，并判决王老财退还3亩地，赔偿赵小六住狱损失费300元。

释放这天，赵小六给靖宇叩了三个响头说："我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啊！"

两个月后，赵小六带着老婆孩子专程来狱中看望杨靖宇。接见时靖宇深情地对他讲："王老财没有了，还许有李老财、赵老财呢，你要处处小心呀！"

这件事在狱内轰动很大，大老张在狱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1930年夏天，从吉林转来一个青年"犯人"，屁股被打开了花，已发臭化脓流水，血肉把内外裤全粘在一起了，脱不下来。到医务所治伤时，只好把裤子剪开，才能上药。从医务所回来后这个青年人光着身子躺在"号里"，发高烧无人管。

靖宇同志见到后非常同情。把自己的一件灰色大褂撕开，托监狱缝纫厂的难友做了两个大裤衩，给这个青年人穿，又从外边搞点退热消炎药。几天后，他的伤就好转了。感动得这个青年人直流眼泪。

后来靖宇常与他谈心，方知道他是吉林一个学生领袖，因闹学潮而被捕入狱。敌人怕关在本地熟人多不好看管，就解到沈阳狱中。靖宇对这个青年人进行了许多革命思想教育，谈了祖国和东北的形势，这位青年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

三个月后这个青年被保释出狱了。回吉林后，他给靖宇来了一封信，并寄大洋30元。信中表示一定按靖宇指的路走下去①。

1931年旧历年到了。狱方规定正月初一这天，早饭是纯白面馒头，一碗粉条炖猪肉。旧监狱"犯人"一年难得吃上这么一顿

① 见《中共满洲省委狱内斗争史料之四》杨靖宇专卷42～58页。

白面和猪肉，难友们都很盼望初一这顿美餐。靖宇头天晚上从李景那儿知道，馒头里掺苞米面了，猪肉下的量也不足。靖宇一听火冒三丈，他以杂役头的身分，晚间借故到炊场，亲自看看，发现面里有三分之一的苞米面，犯人炊事员说："年前七八天，刘看守长就叫我们准备苞米面往白面里掺。"

靖宇回监号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周世昌等政治犯，让他们到各号去串联。众难友一听都非常气愤，大骂监狱长，群情激昂。这时靖宇提出正月初一早上开始绝食，大家一致响应。

大年初一早上，杂役将掺苞米面的馒头送来了，大家坐在号里无人去拿。老看守感到意外，往常这顿好饭都争先恐后地去吃，今天这是怎么了？一小时过去了，饭菜都凉了，还是没人吃，他明白了，这是要绝食了。去年除夕晚"北未决"不就干了一次吗？弄得典狱长年都没过好。看守报告了狱方。二科科长立即来到监舍，询问怎么回事，靖宇代表难友向狱方提出质问和抗议。二科科长无法回答，只好向典狱长报告。上午10点钟，典狱长来了，他怕节日犯人闹事，不好向法院交待，马上表示初二早饭给补上，希望大家先吃饭，并说今后一定按规定办。第二天早饭，果然是纯白面馒头和炖猪肉。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但难友们却受到了很大鼓舞，认识到在狱中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在旧监狱里，只准犯人看经书之类的书籍，其他书报不但没有，而且也不准看。但由于杨靖宇很有成效地做了看守人员的工作，使他能看到许多"犯禁"的书刊。看守李景常从外边给他买来报纸和其他进步书籍。他就利用当杂役头的条件和夜间帮看守坐班的机会，经常阅读书报，有的还作了笔记。因此，他虽然被关押在狱中，但通过一些报刊，还能及时了解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情况①。

---

① 同97页注①。

电网、高墙、铁窗、大锁，只能限制人身的自由，却无法束缚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和闪光的信念。杨靖宇不仅个人在狱中不倦地刻苦学习，对同牢里的难友，特别是那些爱国青年学生，也不断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年多的时间里，狱中有数十名青年受到他的教育和启发，“九一八”出狱后，许多人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战争中①。

1931年元月，张学良在东北实行一次大赦。为此，2月4日高等法院检查处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呈报了一份特赦政治犯的报告。报告中对周世昌等四人报请赦免，杨靖宇却被排在赦免之外。报告中写道：“张贯一一名，系未经自首之共产党犯……依政治犯大赦条例第四条，不在赦免之列。”由此就可以看出，杨靖宇在狱中一直保持着革命气节，对敌人从未低头②。

靖宇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6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1931年4月下旬，刑满出狱。

残酷的监狱生活，丝毫没有磨掉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一出狱他就马上找到了党的组织。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接待了他。

解放后，何成湘有这样一段回忆：“一天，有个人来找我，这人瘦高个儿，四方脸，因为衣服的破烂，加上那一头蓬乱的不肯驯服的头发，使人感到生活把这个年轻人折磨得不轻。那风尘仆仆的模样象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可是，他那双浓眉下面的大眼，却闪闪有光，这眼光给人一种坚强不屈的感觉。这就是刚刚出狱的杨靖宇同志。”

省委让他先看看文件，等待分配工作。当时他住在沈阳市内

① 见于济源编著的《杨靖宇》第62页。

② 见《辽宁高等法院检查处给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呈文》（现存辽宁档案馆，辽革第94号卷，第47～48页）。

一家旅馆内，这所旅馆里还有互济会的同志在这儿居住。互济会是一个专管救济狱中我党同志的组织，他们为了了解狱中情况，请靖宇参加了他们的会议。不幸的是，靖宇出狱仅3天，互济会的一位同志被捕，在他身边的笔记本里，敌人发现了靖宇出狱后的住址。于是杨靖宇又第二次被捕，关押在奉天高等法院看守所（北未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监狱敌伪人员，警察、宪兵想发外财，受贿成风，当时交1000元钱的赎金，就可以从监狱里赎出来四五名犯人。因此，满洲省委向党中央请领了一笔经费，于1931年11月初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将杨靖宇等同志营救出狱。

靖宇同志再次出狱后，满洲省委指派省委常委赵毅敏同志同他谈话，分配他到哈尔滨任东北反日救国会长兼道外区委书记。

1932年春，杨靖宇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代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1932年秋，他代表中共满洲省委赴南满巡视工作。

杨靖宇走向广袤的林海雪原，走向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他带起了一支钢铁的队伍：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

从此，他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至到1940年2月23日壮烈牺牲于蒙江。

历史不会忘记他身披军大衣，手持驳壳枪的英姿。

历史也不会忘记他血肉模糊地挺立在敌人面前的威武形象。

历史将永远颂扬他的铮铮铁骨、耿耿丹心。

1990年1月于沈阳

特殊身分的特支书记

——记地下党员刘作垣在吉林第二监狱内领导中共长春特支的活动

宋国琛

位于长春市四道街的吉林省第二监狱，是奉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年代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座法西斯监狱。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这座高墙森严、电网纵横的监狱里，竟有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下组织在这里隐蔽战斗了4年之久。这就是中共长春特支。

一

长春处于东北腹地，是进出北满和东满的门户。20年代末期，这里处在奉系军阀的严密统治之下，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猎取的目标。

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革命斗争的领导，于1929年冬，特派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支，并由在吉林省第二监狱当“教诲师”的地下党员刘作垣任特支书记。当时刘作垣和另一名地下党员傅根深（看守）一起，以监狱为“根据地”，用他们的特殊身分为掩护广泛地开展了秘密的革命活动。

他们以合法的公开身分，在监狱里广交朋友，首先团结了一批看守警。傅根深通过拜把兄弟的方式，跟吉广善、傅寿恒、韩玉英、杨春思、杨乃山等五名看守警结成了生死弟兄。六个人经常

在一起谈心，交流思想，议论国事。他们共同认为："要想不受欺压，就得团结起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干，和反动军阀斗！"从此以后傅根深时常带领他们几个把兄弟，在夜间到大街上去张贴"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民主、要自由"等标语。由于他们是警察，不被人注意，多半标语都贴在了醒目的地方，使反动当局极为震惊。

刘作垣、傅根深还经常把党组织寄来的《红旗》、《实话》、《世界周刊》、《环球周刊》等党内刊物和进步杂志，秘密传给一些进步同志阅读，使这些同志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经过刘作垣、傅根深的努力，很快在吉林第二监狱里发展了6名党员，成立了监狱党小组，傅根深为组长，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中共长春特支的领导下，以监狱党小组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互济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们开展了反帝反军阀统治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他们针对狱中卫生条件差，"放风"时间短，吃菜少等问题，授意犯人向狱里提出"每天放风两次，每次由15分钟增加到半小时，高粮米饭要加菜，牢房要讲卫生"等要求。经过他们的努力，这些要求得到了实现。刘作垣还以"教诲师"的身分，经常向监狱的统治者开展合法斗争。有一次监狱的上层人员，要克扣犯人的伙食口粮，刘作垣在会上进行了强有力的争辩，使监狱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

中共长春特支在监狱里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以后，逐步把斗争从狱内扩展到社会。一些地下党员经常深入到工厂、学校，通过各种秘密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刘作垣亲自发展小学教员张郁亭入党，

1932年又亲自介绍省立二师教员唐吉昆入党。他还经常深入到吉长铁路和油房、火磨工人中去，做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他们先后在长春监狱、满洲制油厂、吉林铁路和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工人，教员中发展党员40多人。1933年5月，在满洲省委特派员的帮助下，成立了特支干事会，成员有刘作垣、傅根深、唐吉昆等人，刘作垣任特支干事会书记，下设监狱，油厂两个支部。

中共长春特支的不断壮大，加强了对长春工人、学生运动的领导，使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人、学生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更加深入。如1930年10月，长春省立二师的党员，发动全校学生进行罢课，反对校长唐树人、训导主任刘梦石、教务长张秋凡等人限制学生运动，开展了驱逐反动势力的斗争。并组织300余名进步学生举行集会，进行宣传讲演，散发传单，要求民主自由，并把唐树人、刘梦石、张秋凡推至马车上游街示众。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惨案宣传大纲》，要求扩大群众的反帝工作。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在中共长春特支的领导下，长春省立二师、二中和女子中学等200多名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结队游行，高呼口号，进行演讲，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日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以沉重打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长春特支根据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满洲的宣言”和“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精神，提出了“没收敌人武装，拿起刀斧、梭标、单枪，由小到大，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的口号。一方面通过贴标语、撒传单，组织群众集会等形式，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号召广大群众同日寇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另一方面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开展武装斗争，从而把长春的抗日救亡运动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1932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一周年的时候，长春特支开展了大规模

的宣传活动，并组织了有700多人参加的飞行集会，向群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就在这期间，地下党员肖丹峰在双阳参加了宋国荣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并准备武装袭击长春的日本侵略军。肖丹峰曾与刘作垣联系，计划在袭击日军时，由长春特支组织狱中犯人暴动。后来由于情况有变，计划未能实现。1932年12月，特支在满铁机关区领导了一次反对资方取消每月3元5角钱房租补贴的罢工斗争，并提出“中国工人同日本工人做同等工作，要同等工资！过节放假工资照发！反对随便开除工人”等要求；在满洲制油厂领导了一次反对降低工人工资的斗争，迫使资方答应日工资由6角5分恢复到8角5分，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933年6月，他们又发动领导了长春11个油坊3000余名工人的大罢工，要求发还欠薪和增加工资。日本帝国主义对这次罢工极为恐慌，惊呼这是“满洲从来没有过的大罢工”。

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长春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的中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血腥统治，建立了密如蛛网的军、警、宪、特等各种统治机构。在这种恶劣的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长春特支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特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注意，更加紧了对我地下党组织的破坏。1932年“九一八”国耻一周年纪念日时，由于搞“飞行集会”和大量散发传单，使长春省立二师40多名师生遭到逮捕。

为了坚持战斗，长春特支采取种种办法，对敌人的恐怖破坏活动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特支书记刘作垣将地下党员赵俊山派到宽城警察署当警察，从中探取敌人内部情报，对配合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上级党组织发来的文件、书

信、刊物以及搞宣传活动用的油印机、宣传品等等，都确定由刘作垣的教务所里的文书张某（地下党员）统一保管，防止了意外情况的发生。过去上级寄来的书信、直接写“张人权”（刘作垣的化名）收，有一次被别人拆看了，险些出了问题，刘作垣机警地骗过了监狱长，化险为夷。后来再来信时，就以《施公案》等旧小说为掩护，用化学方法密写在书里，接到后再用化学方法把字显现出来。

1933年冬，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长春特支也受到了影响。特支得到通知：“哈总号倒闭，涉及长春分号，速做准备。”因此，特支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及时地撤离了长春。特支书记刘作垣转移到关内，干事会成员唐吉昆去了抗日联军。

傅根深留下来继续坚持战斗，并担任了中共长春特支书记。他根据当时的紧张形势，整顿了党组织，勇敢地担负起了领导长春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长春市郊又开辟了多处联络点和工作基地。

这期间，日本特务机关更加紧了对我地下党活动的严密监视，派出许多特务进行侦察。傅根深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向监狱派了一个叫贺英杰的特务，伪装成犯人在暗中进行密探。1934年初的一天，傅根深从外边回来，刚进看守所的办公室，就有人进来让他到监狱长办公室，说有一个从河北老家那边来的朋友找他。傅根深马上意识到要出问题，于是，他机警地拎起水壶装作去水房打水，便直接走出院外，一气跑到头道沟赵俊山家。赵俊山也是伪警察署的警察，共产党员。正巧，这天赵俊山有押车任务，当天就护送傅根深到了哈尔滨。

傅根深虽然脱离了虎口，但他的一个17岁的弟弟傅海洲却被敌人抓了去。敌人通过拷打、灌凉水等酷刑，逼着让他供出傅根深是共产党员。由于傅海洲从小就受哥哥革命思想的熏陶，知道哥哥干的事业是正义的，因此，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问，他只字

未有透露实情，并义正词严的怒斥敌寇。敌人问："你认识傅根深吗？"傅答："不但认识，我们是亲兄弟。"敌人问："他是共产党，你知道吗？"傅答："不但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兜里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敌人问："为什么？"傅答："他不想叫别人知道的事，能让我知道吗？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有本事你抓他去，为什么拿我是问？"气得敌人目瞪口呆，毫无办法。后来，傅根深的老乡、监狱医官张华昌，通过内部一个姓高的武官把傅海洲要了出来。

长春特支再次遭到破坏后，满洲省委立即派人前来对特支进行整顿，并于1934年4月将长春特支改为新京特支，重新组织了干事会。不久，由于团满洲省委刘明佛等人被捕叛变，致使新京特支也遭到破坏。后来，只剩下油厂一个支部在坚持活动，但由于斗争环境越来越恶劣，加上支部本身组织上涣散，终于在这年的7月停止了活动。

中共长春特支成立后尽管遭到多次破坏，但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他们创立的光辉业绩，定将彪炳史册，激励长春人民永远前进。

疾风知劲草

——记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及被捕同志的狱内斗争

傅乃礼

1930年初，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好转，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得到发展。这时在中央开始萌发了左倾盲动思想。于2月26日和3月13日中央连续发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和《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的第70号和71号两个“通告”。要求各地举行示威运动。

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在新任书记李子芬的主持下，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71号通告，通过了《满洲党团省委对“五一”工作的决议》。提出：“五一”全国总示威的运动，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或号召工人进行政治罢工①。并突出强调要贯彻中央“通告”精神，反对右倾。在这一决议的指导下，省委在沈阳组织了左倾冒险行动，因而暴露了党的行踪，招致一些党团员被捕，省委被破坏。

叛徒出卖与省委遭破坏

1930年4月12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举办国民常识讲演会。

---

① 见《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集325页。

请留美学生苏上达讲演。满洲省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和散发传单，并安排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成员陈尚哲和省委工作人员赵尚志到会开展工作，派做秘密交通工作的张光奇等携带传单到会场二楼散发。

讲演会刚刚开始，赵尚志便站起来，打断了讲演，向群众作反帝爱国的演说，揭露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同胞的罪行，痛斥帝国主义罪恶。演说激起了与会者的愤慨，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尚哲、杜兰亭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张光奇则乘机由二楼向一楼散发反帝传单。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的活动引起了在场敌特人员的注意，散会时他们三人被便衣特务挤在后边秘密逮捕。

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被捕的当晚10点，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雷恒成便分别对赵、陈、杜进行审讯。赵尚志在受审中只讲反帝爱国无罪，其他一概否认；而陈尚哲、杜兰亭二人则态度动摇，请求宽恕。雷恒成从中看出有隙可乘，一方面通知陈尚哲的父亲（哈尔滨法院院长）陈克正来沈阳做陈尚哲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借其父名义敦促陈尚哲叛变。

陈尚哲在敌人恩威并举的情况下，向敌人低头招供，并答应去做杜兰亭的工作。杜兰亭在敌人的刑讯威胁和陈尚哲的劝诱下，于16日叛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团省委秘密机关、省委交通站大德生药房及各级组织人员和反帝大同盟的情况。雷恒成听后，喜出望外，对杜说："杜兰亭，你在这个案子上出不少力，我一定亏不着你。"卑躬屈膝的杜兰亭受宠若惊，急忙回答："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决不辜负处长好意。"可耻的叛卖为敌人猖狂的搜捕提供了条件，宪兵侦缉队立即将杜所供我地下组织及进步组织的地点、人员，进行了严密地监视。

4月17日早6时，雷恒成便带领侦缉队员前往平旦中学，逮捕了我地下党员刘陆晨、袁效之等人。上午搜查了反帝大同盟机

关，抄走了大量的党内文件。下午到我省委交通站大德生药房逮捕了交通站负责人王小坡。19日凌晨，宪兵侦缉队长苏润浦、队副李圭率20余人包围了共青团省委机关。

在赵、杜、陈被捕后，党的省委书记李子芬和中央巡视员邱旭明发觉省委机关不安全，急需转移。但是，限于当时经费紧张转移不便，饶漱石又再三强调此处安全可靠，于是团省委机关继续在此处工作，李子芬等人于17日住进团省委机关，18日还在这里召开了党团省委联席会议。会议进行到翌日凌晨2点休会，准备9时继续开会。当时有人留住在这里，有的人回自己的住处。

清晨6时左右，一阵叫门声将住机关的关碧云惊醒，她以为是自己爱人陶惠明由上海回来了，便急忙前去开门。开门一看是持枪的敌人，在这紧要关头，她想到在裤兜里有党的重要通讯地址，便以还未穿好裤子为由，离开敌人的监视，乘逮捕李子芬、饶漱石几个人之机，她机警的到厕所里将上海党中央及哈尔滨两个秘密通信地址处理掉。

敌人搜查一阵之后，就将李子芬、饶漱石、邱旭明、王文德等人绑好，连同关碧云一并押到宪兵司令部侦缉处。

就在这天的早6时，叛徒陈尚哲带领宪兵队到小东门外天齐庙胡同郭任民家将郭逮捕。7时许，敌人将关碧云押回住处，交给在这里守候的便衣看管。关碧云到家后，以给孩子做饭为名，将传单放在灶里烧掉，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敌人没法进屋。

这时省委秘书长刘明俨来开会，刚一进门就被捕了。约9时，丁君羊也来参加会议，他见有扇门开着，情况异常，在门前徘徊观望，又见院内有人喝面茶，知道不好，拔腿就跑，被敌人发觉追上了。就在这期间，关碧云乘机抱着孩子从后窗逃走。敌人发现关碧云逃走之后，追了一程，没有追到，又不敢长时间离开现场，只好回原处守候。

这时敌侦缉队副队长李圭回来说："这个地方是共产党地下

机关，准有东西，翻。”于是他们进行彻底搜查，从夹壁墙里搜出党的机密文件、革命书刊、传单、油印工具和100元现洋。李圭说：“文件物品速送侦缉处，这是物证，大洋留咱哥们几个分掉，每人20元。”

4月20日，侦缉处在王文德住处守候，逮捕了前去取文件的党员张干民；在伪财政厅逮捕了我地下党员崔果政；在沈海路逮捕了我地下党员王心斋。23日，绿野书店被查封，书店经理刘丹岩被捕。29日，在奉天兵工厂工人宿舍逮捕了刘文治等人；在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第三中学、文会中学、兴权中学、女子同泽学校等地逮捕教职员和学生多人。从4月12日到29日，在沈阳共逮捕我党地工人员30余名，革命群众近50人。

经宪兵侦缉处长雷恒成分批审讯后，将崔果政、袁效之、刘陆晨、王绍棠等人以另案处理为由，取保候审。张干民因叛徒不认识他，又没有抓到证据，经刘伯刚托兵工厂的技师取保出狱。其他关系不大的学生群众，先后分批释放，最后全案只剩有19人，其中党员有刘树清（李子芬，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宋振华（饶漱石，满洲团省委书记）、李禄森（丁君羊，前届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山（刘明俨，满洲省委秘书长）、邱九（邱旭明，中央巡视员）、孙昆（王文德，团省委干部）、王笑山（团省委干部）、王心斋（王纯一，沈海铁路工作）、赵尚志（省委工作人员）、宋小坡（大德生药房经理，省委交通员）、郭任民（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秘书）、共青团员有王嵩山（学生）、吕凤祥（学生）、方景清（学生）、刘仲武（学生）、张梦影（工人）、魏学武（工人）、商振铎（工人），进步群众有绿野书店经理刘丹岩（刘桂成）。这些人于5月10日被转送军法处，羁押在沈阳地方法院看守所。

由于叛徒的出卖，使满洲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东北三省我党地下组织均受影响。哈尔滨当局就根据沈阳提供的线索采取了行

动，逮捕了哈一中教员周一粟，以及戴海洲、李振起、王某等人，并押送辽宁，交奉天军法处审理。据1930年5月17日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自4月9号至5月5号在奉天、哈尔滨、抚顺等同志及革命群众，被捕者成群打伙，几数批。"①

杜兰亭、陈尚哲的叛党，为敌人所利用，已成为可耻的叛徒，1930年9月18日，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刑讯与斗争

赵尚志被捕后，敌宪兵侦缉处长雷恒成在三天内连续四次进行审讯。开始时，雷恒成以软招，以同情的口吻哄骗赵尚志说："你只要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承认自己年轻幼稚，误入歧途，悔过自新，就可以释放你。"赵尚志当即斥问雷恒成："青年爱国有什么罪？难道爱国是误入歧途？"问得雷张口结舌。赵尚志接着宣讲反帝的必要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当雷制止他讲时，赵尚志当堂大骂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雷恒成恼羞成怒，便施以各种酷刑。

赵尚志虽身受各种刑伤，仍坚持反帝爱国无罪，痛骂雷恒成是走狗、奴才。雷恒成见赵软硬不吃，便叫叛徒杜兰亭出来对质，企图以此逼赵屈服。赵尚志大义凛然，目光炯炯，吓得杜兰亭连头都不敢抬，不敢说话。气得雷当场打杜一记耳光，骂他是熊包。审讯后，雷的打手们背地说："赵尚志真是英雄，有中国人的骨气。"敌人因对他无能为力，便称他为"滚刀肉"。

李子芬、饶漱石、邱旭明等人被捕后，均关押在侦缉队的宿舍里。当天上午，他们避开看守的视线，研究了口供，定下"个人准备口供，坚持互不认识"的原则②。开饭时，李子芬将研究

① 见《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集2页。

② 刘蕾云：《关于1930年前后，满洲省委的情况》。

后的要求写个条子传给刘明俨，刘再将条子传给其他人。按照要求，每个人都编了一套既有利于党组织，又有利于个人的假口供，以应付敌人的审讯。后来曾借机将这些假口供转给了满洲省委，省委又报告中央，请求在外边找好关系，以防敌人核实。

4月20日上午，雷恒成开始审讯。敌人从叛徒口里得知些丁君羊的情况便将丁作为重点，第一个就审讯丁君羊。雷恒成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山东来的丁君羊？"丁听后一楞，心想，我在东北的化名是李禄森，就连杜兰亭也不知道我的真名字，敌人怎么一下子就叫出我的真名①。因而预感到问题的严重。但他仍是冷静地回答说："我叫李禄森。"雷马上又问："有个叫李渤海的你认识吗？"丁这下明白了，李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曾代表北方区到山东省委视察过工作，他知道丁的底细。如今李是张学良秘书处的人，早已叛变。可是，丁君羊还是一口咬定叫李禄森，不认识李渤海这个人②。雷恒成软硬兼施地进行审讯，丁君羊只承认有反帝爱国思想，其他一概不知。雷恒成又问了几句，见无成效，只好先让丁下去再想想。

接着审讯郭任民。雷恒成开始就以肯定的语气威胁说："你是共产党，要如实招供，免得受苦。"郭说："我只有反帝爱国思想，不曾参加过什么共产党！"雷见郭不承认是共产党，便给郭指出三条罪状：（一）搞反帝活动，是给国家外交找麻烦；（二）与徐话萤合办刊物，搞宣传，煽动民众，攻击东北政府首脑张学良；（三）写匿名信是恫吓法团领袖。以这三条罪状足以说明郭在进行共产党活动。郭说："反帝这正是给外交做后盾。徐话萤是我代管房子的房客，来和走，派出所都有根据，请你们查实。我没有写匿名信，恫吓法团领袖，哪有写匿名信还露自己

① 丁基石：《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经历》。

② 丁基石：《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经历》。

笔体的呢？”①这样就把雷恒成顶了回去。雷无话可问，令打板子，打了几十板子后，叫人将他带下去。

下午开始审讯宋振华（饶漱石）。宋在法庭上冷静地回答雷恒成提出的问题。他说："我本是上海大陆大学学生，现年22岁，因学校被蒋介石解散，来东北到父亲的朋友家养病。4月份投考汽车公司稽察，录取第一名，后以身体过弱，公司拒用。在沪我曾加入国民党，因我目睹北伐后屠杀民众，投降帝国主义，故气愤而退党。房东陶家在我住处后院，故常来谈及日本帝国主义毁北宁路炸死张作霖等问题。陶家同我相处很好，后来就邀我到他家居住，每月伙食费10元，我们准备合伙开书店，不曾想于昨晨而被捕。"②雷恒成叫把叛徒杜兰亭带出来对质。逼迫宋承认自己就是饶漱石，追问团省委机关和负责人。宋坚持不认识杜兰亭，并按原准备好的供词坚持下来。雷叫用刑打板子、压杠子。宋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仍一口咬定所供是实。

雷接着提审邱旭明，他神情自若地回答说：我是上海暨大学生，因来疗养肺病，4月18日到辽宁，想开书店做生意，故经人介绍到陶先生家商议。不巧陶去沪，宋先生留宿一夜，不幸19日早受连累被捕，"故同拘者累累，我实无一识者，冤哉"③。雷恒成指着传单说："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看这东西除了你们共产党之外谁还能有？"邱坚持不知底细，说："陶为何人，我实不得而知，且前亦未谋面"④。雷打断邱的话说："你不讲！给我打！"边打边问，邱始终坚持原供，打了一百多板子，邱依然是原供。雷只好转向别人，提审李子芬。

---

① 郭庆芳：《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事件的回忆》。

② 参见《中共满洲省委致中央的信》——为被捕同志找口供之关系。《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集53页。

③④ 同上。

李在敌法庭上自称是安徽桐城人，叫刘树清，上月14日来奉，到陶家想谋书店生意，但是陶不在家，宋某人叫我暂住几天等陶从沪归来。不料，19日晨陶家被抄，连累被捕。由于敌人对李的身分不清楚，叛徒杜兰亭不认识，故没给李上刑，仅问问就过去了。

侦缉处从4月20日到5月10日，对被捕的人进行长达20天的审问、刑讯、诱骗。雷恒成本想能从这些人中，再找到类似杜兰亭的叛徒，结果一无所获，只好上送。

5月10日上午9时左右，雷恒成将被捕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假惺惺地说："在这里没有难为你们，到了司令部也不会难为你们，但一定要复审的，你们不要翻案，翻案对你们没有好处。"

李子芬、丁君羊、饶漱石等人被转到军法处后，军法处长颜文海安排几名军事法官，几乎天天轮番审讯，施以酷刑。他们认为丁君羊是重要人物，知道共产党的重要情况，于是将丁君羊作为重点审讯，并派员到山东进行调查。5月中旬到山东调查丁君羊案件的人回来后，由宪兵司令部、高等法院、军法处三机关联合审讯丁君羊，妄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我党的重要情况。

审讯仍集中在他是不是山东来的丁君羊，丁君羊继续否认，坚持自己是李禄森。法官亮出了由山东找来的照片，强迫丁承认。丁看后说："这张照片不是我，这个人戴眼镜，我根本不戴眼镜。"①敌人见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便下毒手施以重刑，丁君羊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了，审讯不能进行，只好将丁丢在禁闭室。他慢慢苏醒过来，他心想，"有两个叛徒作证，敌人还派人专程到山东找来了我的照片，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已经不行了，应该公开自己的身分和敌人作斗争②。于是他喊来了看守，告诉他通知法官："我就是山东来的丁君羊，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①② 丁基石：《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经历》。

吧，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①敌人得知丁君羊供认自己身分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在报纸上宣称：“李禄森其人实为大名鼎鼎的丁君羊，系为中国共产党中最有力之人物。”②妄图以此造成声势，逼迫丁君羊就范。随着接连数次对他进行刑讯，丁仍坚贞不屈。

为了对付军法处的频繁提审和叛徒的出卖，给敌人造成审讯思路的混乱，李子芬让大家一致否定认识杜兰亭，继续坚持“互不认识”的原则，这样案件就再没有扩大。

从4月22日到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喉舌《盛京时报》和东北统治者的一些报纸频频地报道了这次案件进展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各界的不同反响。党组织又通过上层人士营救，军法处的逼供劲头逐步下降。至6月以后，军法处和高等法院对被捕人员既不追问，也不判刑，就这样搁置下来。

狱中支部与狱中干事会

张学良统治下的辽宁第一监狱，从典狱长到看守，对待犯人，只要你不跑、不死、不闹，他们就算完成任务，只要你给他钱，一般的事都可以办通。这就为我被捕党员在狱中的活动带来了有利条件。在案件稍稍稳定之后，李子芬、饶漱石等人便积极组建狱中党的组织。

李子芬等19人，入狱初期分别被关押在各监号里，主要靠党员自己去进行斗争。1930年7月初，鉴于狱中同志相对集中，经过串通商量，决定以省委几位主要领导李子芬、饶漱石、刘明俨、邱旭明、丁君羊等五人为核心组成临时党支部，由李子芬、

---

① 丁基石：《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经历》。

② 1930年6月10日《盛京时报》。

饶漱石分别任正、副书记。支部组成后，又针对狱中情况，组织了赵尚志、郭任民、王心斋为核心的经济委员会，对外边送进狱内的钱物统一使用；郭任民具体担任对内外的联络工作兼管财经；还组织了读书会，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秘密传阅狱外送来的材料、文件，并适时地进行狱内斗争。

1931年一二月间，根据斗争的需要，在临时党支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党团员合组的，由李子芬、饶漱石、刘明俨、王文德（孙昆）、张梦影五人组成的狱中干事会。

狱中支部组成后，深入分析了狱中的客观环境和案情的实际状况，提出：当前在狱中不需要而且不应当将全部精力都用在日常斗争，而应当依据客观的可能，做好争取尽速出狱的工作。在狱内发动被捕的党团员开展争取团结教育看守人员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郭任民、王心斋、邱旭明做得比较好，他们与看守人员的关系搞得很熟，有的甚至交上了朋友。同看守交朋友，便取得了比较宽松的活动自由，既加强了狱内同志间的相互联系，又保证了狱内党组织对外联系，不仅使狱内情况及时汇报给省委，而且使省委可以通过看守人员将党的文件传递到狱中来；狱内同志也可通过看守购买一些进步书刊和狱中没有的药品。一次，王文德将传进狱里来的文件不慎掉在监号外面，就是由郭任民通过看守打开门去取回来的，避免了一次事故的发生。

1930年5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组成不久，工作刚刚恢复，便与狱中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临时省委在互济会经费十分困难，活动经费又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曾两次派人向狱中送过东西。狱中同志深知组织上的困难，在狱中支部的领导下，凡沈阳有亲属和有社会联系的同志都主动将狱外送进来的钱和东西统一交给狱中经委会的郭任民保管，由支部统筹支配。当时王心斋的堂侄王化一、丁君羊的夫人于培真（党员、互济会成员）以及进步人士刘丹岩的夫人等都送过钱和东西，特别是郭任民的夫人共产

党员梁丽茹，通过关系每月必送现洋30元，救济狱中同志。

经费开支由狱支书记李子芬统筹使用。让看守往外送信、往狱内带书信，代购狱内没有的药品等，都要付车马费给看守。另外照顾受刑致伤的难友，也要用钱，如，丁君羊刑伤很重，狱内支部就叫郭任民通过看守买来鸡蛋，用蛋清涂伤口，来防止感染促进伤口愈合。团省委干事王笑山患鼠疮，狱内治不了，狱中支部便决定用钱买动看守，带到狱外到社会上的医院治疗多次，才得治愈。对南方人，因不习惯于北方的饮食，在生活上也给一点照顾。监狱发的咸菜很难吃，支部便决定买些酱油泡一泡再吃，促进食欲，保证同志们身体健康。同志们也都互相照顾，亲如手足，团结友爱的气氛很浓。

1930年10月，由于叛徒、内奸范青的出卖，抚顺县委的同志与到抚顺视察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职委书记林仲丹被捕，于1931年1月押来沈阳辽宁第一监狱的"北未决"号。一天在放风时，李子芬见到林仲丹，两位省委领导在狱中相见，百感交集，但也只能说几句话。李问林有什么要求，林说："在从抚顺押来沈阳的路上，有许多同志的耳朵和脸冻伤了，希望搞点冻伤药。"放风后，李子芬立即转告郭任民通过看守购买冻伤药，很快将药买来了，转给了林仲丹，医治了难友的冻伤。

为了争取生活上的改善和活动自由，狱中干事会认为，不能"完全抛弃日常斗争"①要适时地领导日常斗争。在同志们集中被关押到青年监之后，一次，狱方又令李子芬等人去"教诲室"听教诲课。同志们就在教诲室高唱《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教诲师"无法制止，狱方既怕造成影响，又有些惧怕这些能说能写的政治犯揭他们的疮疤，因此，从那以后再不叫李子芬等去听教诲课了。同志们就利用犯人都去听教诲课这个空隙，

① 狱中干事会给满洲省委的信。《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集320页。

阅读一些材料、文件或讨论一些狱内外的问题。

1931年的端午节快要到了，为改善生活，狱中干事会决定由郭任民到各号房串联，派代表到狱里要求改善节日伙食。并由郭任民、刘明俨为主要代表，其他人前去助战，终于迫使狱方答应了改善伙食的要求。当时有个绰号叫“许大绝户”的看守长很坏，他秘密组织看守将郭任民、刘明俨绑上毒打一顿，并把他们送到环境恶劣的重刑犯监号。这消息传出来后，难友们立即以绝食抗议狱方非法拘禁政治犯。接着狱中干事会研究营救他们的办法，向狱方提出抗议，揭露虐待犯人的阴谋，并大造舆论说：狱方要秘密杀害政治犯。这一来，整个监狱人心浮动，政治犯义愤填膺。狱方怕把事闹大了不好收场，三日后，便将郭、刘送回原监号。难友們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大家高兴得互相握手拥抱，庆贺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同年11月，为庆祝十月革命节，狱中干事会组织人力自编自排了反帝爱国的小话剧，分别由丁君羊、饶漱石、王文德、郭任民扮演角色，在监狱院内演出，教育了一些犯人和看守，从而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同狱方的斗争从未间断，这些斗争为狱中的同志们争取了更多的活动自由和生活上的改善。正如狱中干事会给省委的报告中所说：“我们现在生活能够比较自由，能有自由读书的机会，这都是过去和监狱方面不断斗争的结果。”①

狱中党组织认为：同志们在未被释放以前，主要应当注重武装头脑的工作。于是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难友学习进步书刊，秘密传阅狱外送来的党的文件。由于加强了对外联络，党的文件得以传到狱中支部，使同志们及时地了解狱外的情况和党的重要决

---

① 狱中干事会给满洲省委的信。《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集320页。

定。李立三的左倾路线被纠正后，文件传到狱中。狱中干事会及时组织党员学习，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李子芬检查自己犯了左倾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

李子芬与林仲丹分别被关押在两个牢房，为交流情况，经常以信或纸条交往，通过传递信件交换了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看法，检查了过去省委的工作。林仲丹也经常以各种名义为借口来病号监与李子芬相见，谈论一些问题，或交流一些在狱中斗争的经验。李子芬在近两年的监禁中一直是狱中支部和狱中干事会的负责人，他带领难友们有理有节地同狱方进行斗争。

营救出狱

1930年5月上旬，以林仲丹为书记的临时满洲省委组成后，除努力恢复整顿组织工作外，也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5月3日，省委秘书处徐克峻写信给党中央，报告了省委遭受破坏的情况。9日，廖如愿又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了省委的破坏和目前的工作。临时省委又在17日和23日两次向中央报告，报告了省委被破坏的原因、经过及其教训。

省委派丁君羊的夫人于培真同志去上海和南京找丁君羊的叔父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丁惟汾，请求设法营救。在沈阳，临时省委又派人通过阎宝航等人多次找王心斋的堂侄辽宁教育会长，张学良的少壮派人物王化一，请他出面去找张学良疏通。经过上述一系列的营救工作，使审讯工作趋向停顿，案件得到稳定，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1930年6月9日，省临委秘书处上报了《中共满洲省委为被捕同志找口供之关系致中央信》，请求中央根据被捕同志的口供安排反调查对口供的工作。从1930年6月以后，军法处虽然没有再提审被捕同志，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很宽松，但实际上东北长官

公署内部以及南京政府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东北以军法处长颜文海、侦缉处长雷恒成为首的一伙人主张从严惩处这批共产党人，起码要枪杀三人，首要的是山东通缉的要犯丁君羊。但是，由于营救工作的进行，丁惟汾和王化一对张学良做了工作，因而使军法处无法实施他们要杀害这批共产党人的阴谋。

对这批政犯，当时南京政府多次来密电，令军法处从速将这批共产党人解往南京。颜文海和雷恒成又准备执行这一命令。省临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过王化一、丁惟汾去说服张学良。王化一立即前往北陵新别墅找张学良，为李子芬、丁君羊等人求情，希望不要听南京政府的命令。张学良对王化一说："这些人虽然是一时错误，走入歧途，但都是热心的爱国青年，不能对他们处置过严，恐怕我太忙，一时照顾不到，你去通知颜文海处长，传达我的意见，不许用刑，尽管南京来电提人，无论如何不能将这批人解走，尽量拖下去。"①王化一立即将上述精神传达给颜文海，颜却说："人证物证俱全，虽然有些人不招认，但确确实实是一批共产党人，我们不亲手杀他们，正好顺水推舟，遵照中央命令，解送南京，一举两得。"王化一马上说："这是司令部的命令啊！"颜说："我一定向司令建议，赶快解走。"后来，颜文海见到了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力陈解往南京的必要。荣臻答复说："总司令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你何必多此一举呢？"颜文海碰了一鼻子灰。

1931年5月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王化一是辽宁国民会议代表之一，在会议之余，王陪同张学良前去拜访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丁惟汾当面向张学良提出狱中人员问题，张说："案件复杂，尚未定案，一时不能解往南京。"

国民会议闭幕以后不久，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

---

① 王化一回忆录。

本帝国主义占据了沈阳，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王心斋在狱中得知他的老师冯子敬是沈阳维持会的负责人之一，又兼任临时警察局长，有实权。便从狱中写信给冯子敬，信中说："沉重冤案被押近两年，现在是困病交加，故请求保释。"冯子敬见信后，批上"重新审查此案"，转辽宁省临时高等法院，并用电话关照余院长一番。

这时，狱中干事会也积极组织难友联名写信要求释放。丁惟汾也继续派专人到沈阳活动，找到清朝遗老，当时的维持会长袁金凯，袁让秘书找出狱中送来请求释放的呈文，说："我已60多岁了，也不会再出来做事，现在做件好事吧！"于是在呈文上批写了四个字"审讯释放"。省临时高等法院接到冯和袁两位上司批示后，立即派法官薛叔平去监狱简单问问，认为是无辜的，允许开释。

1931年末，李子芬等人买了保条，到社会上打了铺保之后，便分批释放了。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距今已经是60年了。在狱中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出狱的同志，有的为革命牺牲了，有的因年老多病离开了人世，现健在的同志也是耄耋之年，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狱中英勇斗争的事迹。

宁肯坐牢 决不改变信仰

白文升

刘伯刚（原名刘懋镛），1899年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县。1921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苏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到满洲省委做秘书工作。

他在白色恐怖中，孤身一人，打入敌营，开展秘密斗争，发展党的组织；他在身陷囹圄的逆境中，意志坚强，忍辱负重，对党无限忠诚；他在日伪统治时期，不为名、不图利，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保持革命情操；他在与党失去联系和以后的全部工作中，不灰心、无怨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革命奋斗了一生。

1930年7月3日，他不幸被捕入狱，在身陷牢狱的4年间，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为何逮捕我们的教官"

1929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同志与中央特科沈阳负责人"蔡麻子（蔡伯祥）"研究决定，将刘伯刚派到奉天东山嘴子东大营陆军讲武堂做党的地下兵运工作。为防止打草惊蛇，首先通过先期派去的地下党员赵唯刚① 的关系，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挂个

① 赵唯刚1926年在日本东京工农学校读书时与刘伯刚相识。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由中共中央特科派到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以中校教官身分为掩护，做军事情报工作。

录师的名头。又以机、迫、平炮传习班班长杨炳森① 朋友的身分，打进讲武堂，以教军官日语做掩护，在学员中开展兵运工作。由于他的日文水平较高，教学态度又好，很快获得学员们的好评和尊重。他常同学员谈心，交朋友，甚至利用逛公园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他先后在学员中发展了卢透云② 等四名共产党员。他还常到东陵驻防的山林警备队，广泛接触士兵，宣传革命道理。他在警备队的一些活动，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暗中监视。

1930年7月3日，刘伯刚又到东陵警备队活动，在回营的路上因为天气炎热，出了一身汗，便到浑河边洗把脸，消消汗，有个农民打扮的人在那里割草，借机寻衅。这时，东陵设卡的公安巡逻小分队赶到，那个自称叫高学富的农民，先发制人，说刘抢了他的衣物。巡逻小分队的队长魏绍峰，将他们带到了东陵公安派出所。经搜身，在刘的衣兜里发现了党的文件《红旗》及调查表等。警方认定他既有抢夺衣物又有重大共党嫌疑，当即将他上绑。在押往沈阳县清乡委员会路过讲武堂门口时，赵唯刚、杨炳森听到士兵报告后，急忙跑出来拦住警方质问："为何逮捕我们的教官？"警察当即拿出从刘身上搜出的文件示众，赵、杨二人再三解释和请求也无济于事。

刘伯刚被捕后的第二天，赵唯刚就积极展开了营救工作，并采取了保存讲武堂地下党组织的措施。赵唯刚一方面将刘被捕消息及时转告特科。另一方面又积极协同杨炳森到沈阳县清乡局组织营救。通过到县清乡局活动，从主审官嘴里得知："已过了一堂，他没供认什么东西，别的事都好说，从他身上搜出共产党文

---

① 杨炳森当时是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机、迫、平炮传习班班长，中校教官，非党积极分子。刘伯刚被捕后不久，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② 卢透云是河北省人，懂法语，在博克图兵变中壮烈牺牲。

件是摆脱不了干系的。”主审官还说：“这个案子不小啊！明天将上送东北清乡总局，到那里要严加审讯的。就看他自己了，如果始终不供什么，也只能定个嫌疑罪吧！”赵唯刚将摸到的情况和打算托纵队长、教育长去营救刘伯刚同志的想法，当夜向特科老蔡作了汇报。老蔡经过一番沉思，对赵说：“你同教育长他们仅仅是认识，交情不深，把握不大；再则你怎么跟人家说呢？说刘伯刚不是共产党？可在他身上又搜出党的文件。所以先别急。得看一看。如果搞不好，把你的身分也暴露了，那党组织的损失就更大了。再说，刘伯刚同志是坚强的，可以信赖的，目前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不过，以后你可以找个机会，以给他送行李为名到狱中接见一次，除鼓励他外，要将他掌握的组织关系带出来。”特科领导同志的正确分析，给同志们保存组织，营救战友，增添了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我姓刘的是一条男子汉”

1930年7月5日，沈阳县清乡委员会写一份公函，连同第一审笔录及有关材料一并送交东北清乡总局，同时将刘伯刚羁押于辽宁第一监狱。入监后，敌人对刘多次刑讯，重点追问共产党文件的来龙去脉。在一次审讯中，刘有意戏弄当局说：“不是什么党内文件，只是友人王守春给的还未来得及看的普通刊物。”敌人信以为真，派人前往刘编造的假地址去查王守春。那当然是找不到了。敌人恼羞成怒，多次对刘严加用刑。面对敌人的酷刑，刘伯刚坚贞不屈，不供一字。敌人只好无可奈何地于同年8月6日将此案移送辽宁高等法院处刑。

8月上旬，赵唯刚以刘的朋友身分到监狱接见。当看到刘伯刚面黄肌瘦，头发蓬乱，戴着重镣走到接见室铁窗前时，赵心里非常难过地对他说：“外边朋友们都非常关心你，向你问好！”

刘感到党没有忘记他，在白色恐怖中党还派人到狱中接见，不禁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说："请你转告我的朋友，请放心，我姓刘的是一条男子汉……"趁看守不注意时，刘把讲武堂四个人党的关系告诉了赵唯刚。第二天赵唯刚将行李及小布褂等物品交给了互济会负责人佟英翘①同志，由他转交刘伯刚。不久，杨炳森探监时，刘仍感慨地说："上次送的东西收到了，请朋友们放心好了！"组织的关怀，同志们的看望，更增添了刘伯刚同敌人斗争的信心，多少次的酷刑逼问，都没供出一点不利于党的事情。他所知道的省委机关、沈阳特科、讲武堂的党组织，均未受到破坏，也无一人受牵连而遭不幸。

1930年9月8日，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检查官鲍树铭对刘伯刚以反革命及强抢罪提起公诉。1931年6月12日，辽宁高等法院以上述罪名判刘伯刚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8年。刘伯刚不服，声明辽宁高院是非法判决，并向最高法院东北分院提出上诉。8月12日，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以"(20年)度裁字第16号"，驳回刘的上诉。写道：

"刘伯刚：声明人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案，对于中华民国20年正月十二日判决声明疑义本院裁定如左：

"声明人前因反革命案不服辽宁高等法院判决，提出上诉。经本院审理，判罪时之法律与裁判时之法律适遇变更，遂将原判决关于罪刑部分撤销，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十条，刑法第二条仍适用反革命罪法，量处有期徒刑八年……声明人持有军事通讯等重要文件，关于赣、闽等处之军事计划报告为翔实。其为共产党中之重要分子无疑，故改判之际量处有期徒刑八年，虽较之五年有期徒刑为重，然此次改判原因，由于法律变

① 佟英翘是平旦中学的进步教师，负责互济会工作。

更，并非因原判量刑不当而撤销原判，之后依法科刑又属本院固有之职权……”

最高法院东北分院裁定是终审判决。

恐怖、阴暗的旧监狱，给难友们带来的是饥饿、疾病和死亡。刘伯刚入狱后，为改善难友们狱中生活条件，同敌人进行了斗争。他刚入狱时，关在辽宁第一监狱“北未决”（看守所），这里是关押“重刑犯”和“未决犯”的地方。由于监狱克扣囚粮，生活条件和环境十分恶劣，“犯人”整天吃的是高粱米稀粥和臭咸菜，而且还吃不饱。

1931年除夕，刘伯刚组织起一批政治犯，带头在“忠”字号搞起绝食斗争，随后“孝”字号里的难友也开始响应，向狱方强烈要求改善年关伙食，给予温饱生活，反对克扣囚粮。狱方怕事态扩大，被迫答应了“犯人”的要求，改善了生活。从此，日常犯人生活也好于过去。绝食斗争的胜利，使难友们很受鼓舞，刘伯刚在群众中也树立起较高的威望。

“我决不改变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

1931年8月下旬，刘伯刚被移送到辽宁第一监狱已决监服劳役。在那里他遇上1930年11月被捕，判1年徒刑的杨一辰同志。当时杨在麻绳厂劳动，条件环境较好。在杨的帮助下，刘也被分配到麻绳厂服劳役。由于他时刻没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很快就成为难友们的知心人，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同他商量，请他拿主意，大家还推选他为监号的“收发”。他借此机会，广泛接触难友，经常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主动教难友日语，一传俩、俩传仨，越学人越多，连看守和狱中一些管理人员也主动向刘学习日语。他借机对狱中敌伪人员做些争取、教育、团结的工作，使他们对犯爱国罪的难友们表示理解和同情。

以后不久，狱里请他当几次日文翻译。狱方认为他有学问，就调他到监舍当杂役。这是个较轻快的差事，只打扫卫生和领些用品，余下时间可以看书和到其他监房活动，行动也较为自由。这也是他做敌伪人员工作后所获得的成效。从此，他更不间断地做各方面工作。

有一次周铁衡①到监号为犯人诊病时，正遇上刘在大声地宣讲共产主义理论，当时周怕他惹出事来，就低声对刘说："以后要注意，尽量少说话。"刘随之哈哈大笑地说："我脑袋没有了，就不说了。"据周铁衡在1967年回忆说："刘懋镛在狱中据我所见，表现得很坚强，对我的影响很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所以能在敌伪统治的几十年中，没有替敌人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这与刘懋镛在狱中给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刘伯刚被捕后，严刑拷打没有使他屈服，规劝利诱也没能动摇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他在南满中学堂有许多同学均在沈阳做事，对他的被捕入狱都很担心、焦虑，但那时去营救一个政治犯不仅困难，也有生命危险。周铁衡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他冒着风险去托南满中学堂英语教师楼原（日本人）帮忙。有一天，在医务所，周把这个打算对刘说了："有一些同学知道你被捕了，他们想托中学英语教师楼原把你要出去……"话还没说完就遭到刘的严厉拒绝："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我怎能叫日本人营救我出狱呢！"说完他就走了。后来周铁衡又通过楼原，给南满中学堂校长日本知名人士内堀雄文送礼，请求他利用他的社会地位，设法将刘伯刚从狱中保释出来。内堀校长当时不愿办此事，后来经过周铁衡等人的苦苦哀求，并谎称刘在狱中得了久治不愈

① 周铁衡原名周德舆，是刘伯刚在奉天南满中学时的同学。当时在小南门开"兴记药房"，为营救刘伯刚托人每周两次去狱中行诊。

的慢性病，才勉强答应到监狱里去看看。一天，内堀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来到了监狱，并在周的亲自带领下和刘伯刚进行了面谈。内堀说："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不清楚，以后能不能实现我也不知道，我看你还是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前途，只要你能承认过去自己是做错了，这样我就可以设法托人把你保出去。"刘伯刚听后，态度很强硬地对内堀校长说："谢谢老师对我的关心，不过我宁愿在监狱里呆一辈子，我也决不改变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说完他就走了。内堀校长见此情景，摇了摇头，并恶狠狠地看了周铁衡一眼，气冲冲地离开了监狱。

刘伯刚家里人为营救他出狱，卖些家产筹集了不少钱，由他哥哥亲自来沈阳进行活动。在狱中接见时，哥哥眼含热泪劝弟弟向日本同学写信求救，均遭到刘伯刚的拒绝。他对哥哥深情地说："花钱是买不了我的，你们不要指望靠我当汉奸来做官。"在狱中，他也接到许多在日本的同学来信（有的就在奉天警察厅做事），都劝他只要写个"悔过书"即可获释。所有这些，不仅遭到他的拒绝，甚至连个信都不肯回。

刘伯刚身处逆境，信念不变，永远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操。就连监狱里的许多看守人员都称赞地说："刘伯刚可真是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硬汉子！"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刘伯刚在狱中，经常帮助难友们写呈子、家信、教授看守们日语，很受大家尊重。他所在的监舍共关押二百多名难友，都称他为刘老师，有事情都愿找他商量，有什么纠纷都请他给评理，别的监房里的人称他为刘先生。自从当上杂役头头之后，活动更为方便和自由。他随时可以到各监舍及工场，以办事为名，宣传革命道理，鼓励难友团结奋斗。

旧监狱里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刘伯刚的同学、朋友较多，连同他家里，经常送来些吃的和用的东西。他都是和难友们分享，从不一人独用。有一次，周铁衡看见他的鞋破了，就买了双新鞋送给他。过几天周看见刘将这双新鞋送给一位没有社会关系的“政治犯”穿上了。

1933年6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奉天特委被破坏，特委书记杨一辰同志第二次遭敌人逮捕。特务科长田中叫杨一辰写组织情况，杨坚决不供，并以绝食反抗。绝食已达六七天之久，生命垂危，他仍不屈服，决心以死抗争。正在南监当杂役的刘伯刚，从新收的犯人中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通过看守关系请来奉天警察厅司法科的张股长（他是刘的留日同学）。刘问：“杨一辰能死不？”张说：“现在颁布了新的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多处长刑。”刘把摸到的情况用纸条子告诉了杨一辰，最后写道：“你这样死不是白死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杨看到后立即停止了绝食。刘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杨的生命。刘伯刚还十分关心“政治犯”的生活和劳役。有些“政治犯”从“北未决”转“已决监”时，他就通过看守人员的关系给他们安排较好的劳役岗位，如赵毅敏、杨坚白、孙己泰，杨一辰等，就是由于刘的努力而使他们干上了“俏活”，受到了关照。刘伯刚在辽宁第一监狱被关押的四年间，尽管他的精神和身体备受折磨与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未被软硬兼施所吓倒，从未有过悲观或消沉，从未停止过对敌人的斗争。

1934年溥仪登基，做了伪满皇帝，改大同为康德元年。为“天下同庆”，同年3月和6月分别特赦了两批犯人。6月24日《大同日报》第二版刊登司法部恩赦令，在特赦的92名“犯人”中就有刘伯刚同志。6月24日刘伯刚同赵毅敏、廖如愿、杨先泽一起被特赦出狱。

刘伯刚出狱后，失去了组织联系，几经曲折、坎坷，终于在

1945年重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分投入到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他献身的共产主义理想，走完了他自己的光辉的一生。

“虎口”里的战歌

——张浩①同志在狱中斗争纪实

姚贵贤

身陷虎口

1930年1月，林仲丹根据全国总工会党团第五次会议的决定，以特派员身分赴东北指导工作，并兼任满洲省委职委书记。

抚顺当时有10多万产业工人，是我党搞职工运动的重要城市。林仲丹对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以工人身分为掩护，去抚顺检查指导工运工作。抚顺的工人运动在他的指导下，迅速发展起来了。这引起了敌人，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恐惧与仇恨，加紧了对我党地下工作的破坏活动。

初冬，万物萧索，寒冷过早地来到了东北大地。

戒备森严的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刑事宫崎秀之助正在向特高系主任峰须贺重雄汇报：

“永兴铁工厂的‘王’②说，奉天最近经常有人来。”

---

① 林仲丹，又名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省黄冈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候补中央委员。1936年任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后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3月5日在延安病逝。

② 王，潜伏在我抚顺地下党组织内部的日本警察署联络员胡杰三的代号，公开姓名叫范育。

“不要打草惊蛇，要放长线钓大鱼。”须贺说。

“是！”宫崎转身要退下。

“慢，让陈明起巡捕和‘王’联系，再拨一些活动经费，让他好好做‘生意’！”

11月9日，林仲丹再次从沈阳赶到抚顺检查工作。

当天晚上，县委扩大会议在抚顺万达屋华工街共产党员刘荣之家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特派员杨一辰（化名李德禄）、县委宣传委员李贺年、团特支书记李爱民（化名赵发财），还有列席会议的永兴铁工厂经理范青，林仲丹认真听取了县委的汇报。翌日晚，会议快结束时，林仲丹代表省委做了指示。他说：

“我们的事情不要操之过急，要谨慎从事。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成熟了才能行动。没有成功把握的事情不能蛮干。发动群众的同时，要保存好革命力量。”他说到这里，加重了语气：“还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

听到这，范青一怔，原来他就是永兴铁工厂的“王”。他毕竟是给日本特务机关当了3年多的情报员，学会了如何伪装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慌恐在脸上一闪即逝。

散会后，范青赶到七条通①日本警察宿舍，把县委会议的情况和林仲丹讲话的内容以及县委驻地——北窑地，都向宫崎作了详细的报告。

“看来奉天来的这个人是重要人物。他叫什么名？”宫崎放下记录本，用较为流利的中国话问道。

“不知道叫什么名。”范青答。

宫崎又问体貌特征。范青说：“他中等个子，团脸，稍胖，宽额头，湖北口音，穿浅蓝色短棉衣，毡子礼帽，围一条紫红色围脖。”并告诉宫崎：“这个人明天早晨就要乘火车回奉天。”

---

① 七条通即现在抚顺市的西七路。

第二天（11日）早晨，杨一辰等同志送林仲丹经千金街去抚顺火车站，准备乘6点15的火车回奉天。

与此同时，在千金街路东头永合旅馆里，日本高等系主任须贺和高等刑事宫崎、横烟以及宋成有等一伙特务，在范青的指点下，仔细地辨认着林仲丹。

“横烟、宋成有跟上去！”须贺命令着。

日本警察署高等系特务满脸络腮胡子的横烟武吉和巡捕宋成有，从车站尾随林仲丹上了火车，伪装成中国旅客，坐在林仲丹侧面的座位上，并不时瞟一眼林仲丹。

凭多年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林仲丹觉察出一直尾随身后的两名“中国旅客”，十有八九是跟踪自己的“尾巴”。于是林仲丹站起身来，拿起礼帽，佯装准备下车。横烟一愣，屁股稍欠。“果然不错，是特务！”林仲丹又把礼帽慢慢放回原处。这时他想到揣在怀里用小字写在烟盒纸上的抚顺县委的行动计划和帽子里的抚顺县委党员名单，这些党的机密决不能落在敌人手中。林仲丹思忖着应急的万全之策。

火车缓缓地驰入深井子车站，一些旅客准备下车，车厢内一阵嘈杂。林仲丹乘机从怀里掏出纸条，扔进嘴里，横烟发现后，急红了眼，立即向林仲丹扑去。用手抠林仲丹的嘴。林仲丹狠劲一咬，血顺着横烟的手指流了下来，横烟疼得把手抽出来。林仲丹一扬脖，就把纸团囫囵地咽进肚里。

横烟凶相毕露，“刷”地掏出手枪：“不许动！”拿出手铐把林仲丹紧紧扣上，先押到深井站派出所。

林仲丹被捕了。敌人用摩托车将他拉到抚顺日本警察署。

当天晚上，由叛徒范青带路，日本警察署出动6名警察，包围了抚顺县委驻地北窑地。当场逮捕了李爱民和一个清脸麻子的人。省委特派员杨一辰来接头，也被逮捕，日特还搜出一大包党的文件、宣传品和印刷工具。

铁骨傲敌顽

11日深夜，阴森恐怖的抚顺日本警察署审讯室内，高等系主任须贺身穿笔挺的青色洋服满脸杀气地坐在太师椅上，宫崎、横烟等十几名特务凶神恶煞般地站在两旁。

审讯前，警察署长寺田良之助打来电话严令："务必使奉天来的共产党招供，一举破获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须贺决心要撬开林仲丹的嘴巴。

林仲丹被宫崎、横烟押进审讯室。他昂首而立，目光直逼须贺。

须贺问："你叫什么名字？由什么地方来？到抚顺干什么？"

"我叫张春山，是由上海来的失业工人，到抚顺来找工作。"林仲丹从容不迫地回答。

"你是由奉天来的，在万达屋开的会，还讲了话。"

"我人生地不熟，不知哪里是万达屋，千达屋，我整天忙于找工作，给谁开会？又能对什么人讲话呢？"

"你是共产党的头目！"

"我不是共产党，怎么能当共产党的头目？"

须贺忽地站起来，威逼着说："奉天的、抚顺的，谁是共产党？住在什么地方？你要统统地讲出来！"

林仲丹蔑视地一笑："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失业工人，不是共产党。奉天和抚顺的共产党我怎么能知道！"

须贺手往桌上猛地一拍，喊道："上刑！"

宫崎、横烟等几个日本特务如狼似虎，蜂拥而上。把林仲丹拖进了刑讯室。

刑讯室设在审讯室下面的一个昏暗的地下室里。室内摆放着

皮鞭、木棍、大挂、老虎凳等刑具。

“你是不是共产党？”宫崎高声喝问。

“不是！”林仲丹坚定地回答。

“给我打！”随着宫崎的贼叫，皮鞭雨点般的落下来。顿时，林仲丹身上被抽出一条条血痕。

“你的上司是谁？抚顺党员的是谁，统统的讲！”宫崎狼一般嚎叫着。

林仲丹咬紧牙关，不予回答。

“坐老虎凳！压杠子！”宫崎指挥日特把林仲丹捆在木凳上，用一条木棍牢牢地压在林仲丹的腿上。先是两个人上去踩，后又增加到四个人。汗珠从林仲丹的头上大颗大颗往下滚落，而宫崎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

“灌凉水的！”随着宫崎的贼叫，酷刑不断地升级。两名日特上前把林仲丹的头压在一个木槽内，用自来水往嘴和鼻子里灌。

“讲的不讲？”宫崎越发凶狠，“不讲，踩！给我使劲地踩！”

几个日特穿着军用皮鞋轮番在林仲丹鼓起的肚子上狠劲地踏着。不一会儿，林仲丹就昏过去了。宫崎走上前，用脚踢了一下说：“浇凉水！”横烟拿起水桶，哗地倒下去。

林仲丹醒过来后，须贺还是让林仲丹交代谁是共产党，以及奉天、抚顺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林仲丹仍然守口如瓶，只是愤怒地盯着敌人。须贺又命令日特给他灌辣椒水，煤油和马尿。林仲丹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苏醒后，还是一言不发。

室内，敌人气急败坏地嚎叫着；室外，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宫崎的眼珠突然一转，走到须贺跟前小声说：“把他的衣服扒光，放到地下室。”

“好的！”须贺命令几名日特立即将林仲丹衣服扒光，拖进

地下室。

地下室又冷又湿，林仲丹躺在如冰似铁的水泥地上，咬紧牙关，鼓励自己：挺住、挺住……手冻僵了，脚麻木了，浑身失去了知觉，他还在顽强地坚持，坚持……

严刑拷打，寒冷的折磨，没有使林仲丹屈服。须贺的招法几乎用尽了。

第二天夜晚审讯时，没问几句，敌人就用绳子把林仲丹的两个大拇指绑上，然后吊起来，疼得林仲丹汗水淋漓，很快就人事不省了。

"是谁派你从奉天来的？你是不是共产党？把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名单交出来！"须贺见林仲丹醒过来，俯下身来问道。

"噗"，林仲丹二目圆睁，一口血水向须贺喷去。

"神经的不正常！疯子，是真正的疯子！"须贺连连后退。宫崎、横烟等也都惊呆了。

敌人千方百计要求找到突破口。在审问林仲丹的同时，对杨一辰（李德禄）、李爱民（赵发财，狱中化名赵金发）等同志都分别进行了残酷的刑讯。杨一辰受刑后吃饭不能端碗，穿衣不能系扣，但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年仅18岁的李爱民，敌人审讯时装哭，坚持说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但是，那个麻子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动摇了，他经受不住刑讯，承认了自己是工会会员，同时供出了古城子李贺年，大山坑薛敬斋等3人是工会会员。

李贺年、薛敬斋等三人当夜被抚顺日本警察逮捕。从李贺年家中又搜出了宣传品。

5天后，与麻子在矿里一起工作的五六名工会会员也被日本警察署逮捕。

李贺年被捕后，经受不住刑讯，供出了抚顺县委的组织与人员和他历次参加会议的情形及讨论内容。并证实麻子是县委书

记，杨一辰是满洲省委特派员，林仲丹（陈子真）是奉天派来的代表，承认自己是宣传委员，供出了古城子支部党员名单。据此，日特又逮捕了古城子支部的6名党员。薛敬斋被捕后，当晚供出的2名同志，也遭到被捕。

抚顺日本警察署从11月11日至16日，先后分三批共逮捕党员、工会委员、工会会员和进步群众34人。只有县委委员朱东山、郝金贵闻讯离开抚顺，得以幸免。抚顺县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敌人破坏了抚顺县委后，还急欲得到奉天党组织情况。但"奉天派来的共产党"林仲丹却一再让须贺恼火。须贺在审讯室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苦无良策。忽然，他又想到了那个麻子。他根据范青的告密和李贺年的口供，几天后又命令宫崎演出了一幕诱供的鬼把戏。

"奉天来的共党（指林仲丹）他的什么都说了，给你开过会你为什么不说？"宫崎厉声威逼着那个麻子。

麻子犹犹豫豫地又一次动摇了。他……

"他……他是奉天派来的，姓陈，给我们开过会，叫我们办工会……"

宫崎如获至宝马上用这个口供来诱逼林仲丹。

"陈子真，你是奉天的共产党，到抚顺来干什么？"宫崎胸有成竹，端坐在转椅上。

"我叫张春山，由上海来的失业工人，到抚顺找工作。这些，想必你们是知道了，重复说还有什么必要呢！"

"有人说你姓陈，给他们开过会，商量办工会的事。"宫崎显得十分得意，说话时慢条斯理。

林仲丹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花招，但也感到问题很严重。他要找机会教育同案被捕人员，保持革命气节，粉碎敌人的阴谋，使党组织不再进一步遭到损失。于是，他将计就计地说："如果

真的有人认识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可以对认。”

宫崎听后大喜，自以为得计，马上命令把同案关押的人集合起来，准备让林仲丹就范。

人集合起来了，不料林仲丹先发制人，不等敌人开口，就厉声地说：“我是南方人，名叫张春山，是来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把我捕起来。”宫崎一看不对头，慌忙往牢里拖林仲丹。林仲丹边挣脱边喊道：“前天，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人说认识我，说我姓陈，简直是乱讲，以后大家不要胡说，要有个起码的为人道德！”

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而同案被捕人员杨一辰等人，从林仲丹的暗示中却受到鼓舞和启示，更加坚定了对敌斗争的信心。那个麻子耷拉着脑袋，感到十分懊悔和羞愧。

敌人耍尽了花招，林仲丹却“彻头彻尾地否定一切事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①尽管叛徒、内奸范青一口咬定林仲丹是奉天派来的共产党，并有麻子的某些招供，但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仍始终没有弄清林仲丹的真实身分。

须贺等无奈，只得把林仲丹等人由高等系转交司法系审讯。

司法系主任仓田庄五郎是一个比须贺更加奸诈狡猾的家伙。他知道对付林仲丹这样的人只用刑讯是无效的，就改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

林仲丹转到司法系后，仓田就连续突审。让韩国铎，林玉润，王明月等三个中国翻译轮流翻译，自已亲自审问了四五天。

仓田问：“你在前几天为什么不说话呢？”

“警察署是否是依照法律办事？”林仲丹反问道。

“当然是按照法律公理办事了。”

“即按法律办事，‘打’这一条又在哪儿写着呢？我看你们是

---

① 赵毅敏、杨一辰、张干佩等同志回忆录。

不讲理的。说话也打，不说话也打，那我何必说话呢！白费我的唇舌。所以我就不说话。现在你们还是开打吧！”

仓田又把话锋一转，问道：

“你到东北的目的是什么？”

“看看东北有无地方适合建立大的纺纱厂。”

“你是工人，哪来的钱设立纺纱厂呢？”

仓田自以为抓住了林仲丹回话的破绽，紧紧地追问。

“我自己没有钱，还有别人给我出钱呢？”林仲丹不慌不忙地回答。

“你说得不对！”仓田声调突然变高。

“你既知道我说的不对，那你就必然知道我那个对的。你既知道我那个对的，何必又来问我呢？那你就随便写那对的吧！”

仓田半天不语。心中暗暗想：“陈子真果然厉害！”

连续几天的审讯，林仲丹发现敌人已经掌握了我党组织活动的大量情况。为了转移视线，迷惑敌人，保卫党的组织秘密，便称自己是由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总部派来奉天办工会的。果然，狡猾的仓田上了圈套，他以为这回可抓到了重大线索，于是步步紧追不放，沿着林仲丹引导的思路，反复在工会这个问题上打圈子。

“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办年月日及该组织状况和总部现在的代表者、所在地等等，你说一说。”

“关于那样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那么是谁派你来奉天的呢？”

“派我来的是谁，我也不能告诉你。”

“那么满洲办事处的创立年月日及其组织状况到底是怎么个样子？”

“创立年月日及组织状况我也不知道。”

“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办事处是以何宗旨而创设的？你可以

把那个主义目的详细说一说吧？”

“主义目的是不能告诉你的。”

“满洲办事处里现有几名组织员？”

“有几名我说不上。”

“上海总部派你来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吗？”

“是单骑独马，不错。”

“照上边所说的各节推测起来，我认定你是当满洲办事处代表，你以为如何？”

“代表绝不是我。”

“那么谁是代表呢？”

“谁是代表我是绝对不能说的。”

“满洲办事处和代表这个办事处的人的住址姓名你说一说。”

“那人的住址姓名我也不能说出来。”

“你们组织在纺纱厂的状况如何？”

“那个状况我更不能说。”

转来转去，就是在工会问题上敌人也没捞到任何组织秘密。狡猾的仓田并没就此休止，他进一步逼问，让林仲丹把共产党的活动状况不准“隐藏”地详细说出来。

“我未曾入所谓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团体，焉能知道你所说的那些事呢？”林仲丹坦然地回答。

仓田并未甘心失败，突然又打出了一发炮弹，亮出了从麻子和李贺年处搜出的文件，借此发起了一个新的攻势。仓田拿起文件，两眼逼视着林仲丹说：“你是抚顺工会代表。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文件，当然你是十二分的知道了。”

“我是此次才来当抚顺炭矿工会代表。怎么会有这么些文件，我亦是不知道的。”林仲丹仍然坦然地回答。

“抚顺炭矿代表系由何人委任你当的，与何人对调的，将其

情形说一说。”

“这个啊，凭你怎样说，我都不能告诉你！”林仲丹坚决地说。

仓田有些急了，“屡次跟你说的，官家已经搜出这么多的证据文件了。你们一帮人所计划的各样情形全部也明白了，本警署和各处警署已掌握了被举发的许多共产党员，就是你的资格和你向来的行动也都明白了，所以不必作那么没有诚意的答复，别隐藏，快把实话招出来！”

“我要说的话早已说完了，除此之外，今后就是质讯几十年我也不说了！”林仲丹回答的更加坚定而有力。

但仓田仍不死心，接着又打出了一发炮弹。他把一个所谓林仲丹的秘书带到了司法系，当面指认林仲丹。仓田满以为有了物证（被搜出的文件），再有人证，林仲丹就无法推脱，就不得不如实“招供”，借机追问下去，林仲丹就会把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情况交待出来。

林仲丹沉着、冷静，大义凛然地说：“你不是捉共产党吗？共产党犯什么罪，你就判什么罪，愿杀就杀，愿押就押，你随便，我没有谈其它的必要！”

仓田的如意美梦破灭了，敌人仍然是一无所得。

为了“感化”林仲丹，在审讯期间，仓田还从“中国饭店”叫来饭菜，让林仲丹在主任室吃。

林仲丹问仓田：“监狱里的犯人一律都吃这样的饭吗？若不是这样我就不吃，我不接受这样的优待！”

仓田无计可施，哀叹：“软硬不吃，真是个疯子！”

在酷刑、逼供、诱供面前，林仲丹毫不动摇，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党的任何组织情况。当时担任审讯翻译的韩国铎，在解放后的一篇证实材料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对陈子真的审讯，……，在我的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十分令人钦佩，他是一个真

正刚毅坚贞的英雄。”①

抚顺日本警察署妄图通过林仲丹等人破获我党满洲省委各级组织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同年12月25日，以“治安维持法违背犯”的罪名将林仲丹等24人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羁押在辽宁省第十五监狱（在抚顺）。

在抚顺县公安局候审室里，趁看守管得不严的空隙，林仲丹、杨一辰等人悄悄地研究了对策。大家认为：将他们交给中国当局，证明日本人没有掌握充足的证据。经过对形势的简单分析后，林仲丹说：“麻子（指动摇者），你怎么乱说认识我，给你们开过会呢？打官司你一个人顶着。到法庭上你要翻供，说不认识我。杨一辰做些群众工作，有情况你随时同我沟通。在法庭上我们都要说互相不认识，以前的口供是屈打成招。”

在看守所里，大家统一了口径。

“你叫陈子真吗？多大岁数？”敌人开始了对林仲丹的审讯。

“我不叫陈子真，我本叫张春山，今年34岁。”

“怎么在日警署说你真名叫陈子真呢？”

“那是日本警署用刑逼着叫我说的，其实我叫张春山。”

你与×××（麻子），李贺年都认识吧？”

“我和他们全不认识。”

“你不是满洲总工会代表吗？”

“那全是日本人用刑逼的叫我说，实在冤枉。

敌人问他的原籍是哪，来抚顺干什么？林仲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湖北汉口刘家庙人，是来千金寨做生意的。”审讯结果敌人不但没弄清林仲丹等人的真实身分，反而使林仲丹借机否认了自己是满洲总工会的代表，揭露了日本警察署刑讯逼供的罪行。

① 见韩国铎1962年2月26日写的证实材料。现存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胡杰三案卷”。

审讯在继续逐个进行，被审者都在按着预定的统一口径对付着敌人。

被审者有的否定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有的说互不认识，都说过去在日本警察署所说的是屈打成招。就连那个麻子也翻供了。

抚顺县公安局、法院因为没有口供及充分的证据，无法弄清林仲丹等人的真实身分。但此案是日本警察署移交过来的，关系重大，他们的上级又非常重视，因此于1931年1月底将林仲丹等24人用火车押送到辽宁高等法院，羁押于沈阳地方法院看守所（北未决）。

在省高等法院法庭上，在林仲丹同志的领导下，同案的党员和群众仍是众口一词，高喊冤枉。审判长杨士庸，检察官陈士杰等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始终无法弄清案情。

1931年3月14日，省高等法院不得不开庭宣布马德水、李爱民、薛敬斋等19人，无罪释放。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煽动工潮”等罪名判处林仲丹等人有期徒刑5年，判李贺年、刘荣芝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杨一辰有期徒刑1年。杨一辰、刘荣芝、李贺年等三人被送往辽宁第一监狱服刑。林仲丹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继续留在看守所关押。

浩气撼铁窗

沈阳南关监狱“北未决”（看守所）有“孝”、“悌”、“忠”、“信”四排大号筒，东西南北对头排列成十字。大号筒尽头，黑色的铁栅门上终日挂着头号大锁，把充满着污浊气味的十个小监号与世隔绝开来。四个大号筒中间圆形的“中央看守楼”里，不时传来看守警的喝骂声，伴着早春料峭的寒风，使只有10平方米的小监号，更增添了几分寒意。

林仲丹转到"北未决"后，开始住在"悌"字号，不久就转到了"信"字号。

林仲丹同关在"孝"字号的难友商议从要求改善难友们恶劣生活环境入手，发动一次罢食斗争，借以团结教育广大难友，打击敌人。难友们都很赞同。借着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号难友串联，其他号都赞成罢食，并定以摔铁碗为信号，统一行动。

翌日，早晨开饭时，号筒里静得出奇，往日的吵骂声消失了。

突然"哗啦"一声，一个铁碗摔在地上，声音响彻牢房。

"饭稀，吃不饱！"

"要改善伙食！"

叫喊声首先从"孝"字号里传出，接着其它三个号筒摔碗声、呼喊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这天，犯人们都拒绝吃饭，绝食斗争开始了。

所官接到报告，慌了神儿。他怕事情闹大，上司责怪下来，自己承担不起。他快步走到号筒，向犯人们表示："我们要搞好伙食。"

从第二天起，犯人的早饭变干了，有时还有些菜。

改善伙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场斗争，难友们对林仲丹更加尊重和信任了，他们总愿意和林仲丹在一起，听他讲述革命道理。

一天，一个难友问他："听说共产党已经闹起来了，他们是干什么的？"

"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穷哥们闹革命，和地主资本家斗，和反动军阀斗，和日本帝国主义斗。"林仲丹回答着。

"他们最终要干什么？"另一个犯人也凑过来问。

"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

林仲丹就这样以唠家常、闲谈、讲故事的方法，在狱中进行着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剥削、反压迫的宣传。他还经常为穷苦犯人免费写上诉、声明等呈子，从而使"政治犯"在狱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一天，看守突然打开铁栅门传呼林仲丹，说有一要枪毙的"胡子"要见他。

"谁呢？我不认识什么胡子？"林仲丹说着，跟看守走出了"信"字号，来到中央看守楼前。

一个脚戴重镣身穿着死囚服装的犯人，见到林仲丹，扑腾一声跪倒在地，说："我认识你们（指共产党）晚了，若早认识几年就同你们一起干了……"说着，说着，恸哭失声了，"如早知道有你们这条路走，我还去抢人家吗？现在我要死了，死就死吧……"他呜咽着，又把家里的情况和地址告诉了林仲丹，委托林仲丹出狱后照顾一下。

林仲丹把"胡子"扶起来，深情地点了点头。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秋季。

9月18日，日本军队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大好山河从此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所蹂躏。

林仲丹在狱中义愤填膺，利用代写文书、家信、请假条等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和狱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一些有爱国之心的看守、所官在林仲丹等同志的教育下，对林仲丹等政治犯越来越敬佩，越来越爱接近。有些知心话也都愿意和他们说，并给他们许多方便，有的人还给林仲丹传递纸条，报告外面的消息。

1931年11月间，有个看守告诉林仲丹："悌字号又进来几个共产党，过堂时啥也不讲，被打得够呛。"

这几个人是赵毅敏（省委宣传部长、化名刘昆）、老廖（廖如愿）、张应龙、杨先锋。

林仲丹得知后很快就给赵毅敏传去纸条，表示慰问。

林仲丹还在纸条上介绍了四个监号的情况。“信”字号是木板铺，住五六个人。其它三个号是土炕，狱方不让烧火，又湿又潮，跳蚤、臭虫到处可见。一般是住10人至11人，最多住15人。小屋里还要放一个尿缸子，气味呛人，条件极恶劣。他希望赵毅敏通过斗争到“信”字号去住，并指出了斗争的方法。同时又介绍了狱内有关情况，告诉他狱中谁是叛徒、谁是同志，提醒他防备叛徒出卖。

林仲丹传递的纸条使赵毅敏受到很大鼓舞和宽慰，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联合其他几名政治犯很快就向狱方提出了到“信”字号的要求。在林仲丹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斗争取得了胜利，赵毅敏等同志不久就住进了“信”字号。

对于林仲丹在狱中的斗争事迹，赵毅敏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一批被捕后，张浩（林仲丹）同志已在狱中，他很有经验，也了解许多狱中情况。他以秘密传递纸条的方式把监狱里黑暗的东西告诉我们，要我们注意，并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斗争。那时狱中未决监（即看守所）有‘孝’、‘悌’、‘忠’、‘信’四个监号。他告诉我们要争取到“信”字号去……”又写道：“我入狱时间不久，就接到他传来的纸条，上边写着‘好样的’话，对我进行鼓励。”

在狱中，林仲丹同志一方面机智顽强地坚持斗争，一方面又坚持利用一切机会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经常对大家说：“坚持就是胜利，动摇和妥协是没有出路的，”并破指血书“要坚持到底”来激励大家的斗志。

林仲丹同志在狱中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学习。狱中没书，他通过关系弄到一本书，每天都借着牢房窗口透进来的一

缕光线孜孜不倦地翻阅，遇到问题就向同志们请教，有了心得体会就同大家互相交流。由于坐牢时间长，他反复学习，这本书出狱时都被他翻烂了。

早在1931年春，右倾分裂主义分子就到监狱里来活动，他们企图欺骗一些在狱中有威望的同志来反对中央。林仲丹同志对他们的阴谋诡计给予了无情地揭露，严厉斥责了他们的卑鄙行径，坚定地说："我是服从中央的，以前和你们好的，是因为党的缘故，除了党以外，我们没有什么交情可谈的。"从而粉碎了分裂主义者的阴谋，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烈火炼真金。林仲丹同志是一个无限忠于党和人民、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林仲丹同志的老战友王鹤寿同志对林仲丹的被捕入狱有这样一段回忆："按照白区地下党秘密的工作原则，一个同志被捕，凡属他知道的人都立刻转移。张浩（林仲丹）被捕时，党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经费很少，搬个家很不容易。大家都认为张浩是位好同志，他决不能变节，不会出卖组织和战友，因此大部分同志没有搬家。这样做违背了当时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可面对张浩这样的好同志和我们党当时的困难处境，也就这样做了。这只能说明张浩是大家信得过的好同志。"

是的，林仲丹同志没有辜负党和同志们的信任，林仲丹同志以其大智大勇，不屈不挠地同敌人在狱中斗争着。在虎口中谱写出一曲响彻云霄的战歌。

1932年1月，党组织抓住日寇准备成立伪满洲国，实行大赦的有利时机，花300元现大洋，买通监狱张翻译官，将林仲丹营救出狱。

2月，林仲丹回到上海，任全总常委兼"海总"书记，从此又投入了新的斗争。

忠贞不渝

——记陈潭秋、王鹤寿、孟坚同志在狱中

周建国

1930年，白色恐怖和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武装入侵的乌云笼罩着东北大地。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陈潭秋同志于8月受命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12月7日，省委书记陈潭秋同王鹤寿等人到哈尔滨参加中共北满特委扩大会议，布署和领导纪念“广州暴动”工作。会议在北满特委书记孟坚住处（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五道街9号）秘密召开。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钟，正当散会的时候，敌警察突然闯进会场，除二人逃脱外，陈潭秋、王鹤寿、孟坚等六人被捕。他们先被敌人押送到道里警察署受审，然后又被转到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军法处拘留所羁押。1931年2月被判刑后，关押在哈尔滨道外监狱。陈潭秋、王鹤寿、孟坚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们以拘留所、审讯室、监狱为特殊的战场，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残酷的刑讯　坚强的意志

道里警察署抓捕了陈潭秋、王鹤寿、孟坚等人，如获至宝，为了从他们嘴里得到邀功请赏的资本，对陈潭秋等人施以酷刑逼供。敌人刑讯的重点先是孟坚同志，因为敌人在他家搜出一只箱

子，里面装有党的文件。尽管敌人不断地毒打、灌凉水，但孟坚始终否认箱子是他的，只说是一个朋友寄存在他家的，并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敌人没有从孟坚身上捞到东西，又把希望寄托在陈潭秋、王鹤寿身上。敌人往他俩的鼻子里灌辣椒水，妄图以酷刑撬开共产党员的嘴巴。但是，陈潭秋、王鹤寿顶住敌人的百般折磨，守口如瓶，什么也不供，使敌警大失所望。警察署无奈，关押一个月后，将陈潭秋、王鹤寿、孟坚押送到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军法处审理。敌军法处处长亲自上阵，搞了多次突击审讯，结果仍是一筹莫展。敌人不得不于1931年2月进行判决，判处孟坚有期徒刑7年，判处陈潭秋、王鹤寿等人有期徒刑5年。判决后，陈潭秋、王鹤寿、孟坚等人被送往哈尔滨道外监狱关押。

敌人的监狱是折磨共产党人的魔窟。在狱中，敌人对陈潭秋同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但他却以超人的毅力承受了难以忍受的酷刑，用鲜血和意志同敌人抗争。每次受刑后，他都鼓励狱中的同志要坚持斗争，严守党的机密，并教同志们对付敌人酷刑的方法。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介绍说："当敌人灌凉水时，要把嘴张开，要用嘴呼吸以免呛水……"

陈潭秋、王鹤寿、孟坚同志在敌人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深深教育和感染了狱中的其他同志，使绝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恶劣的条件　乐观的精神

道外监狱是个条件非常恶劣的监狱。十几平方米的监舍住了16人，拥挤不堪的监号里虽有火炕但终年不烧，冰冷而潮湿，一日三餐都是高粱米粥大咸菜，对于"政治犯"的监管则更加严厉。陈潭秋、王鹤寿、孟坚等同志在这残酷的铁窗岁月中，始终

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改善文化生活，陈潭秋教难友们用高粱米饭和面粉做围棋子，耐心地教大家下围棋。他十分关心狱中同志们的身体，想方设法改善狱中难友们的生活。外面送来一些钱，就买东西大家一起吃，有时还通过关系搞点白面包饺子吃。陈潭秋还号召大家在狱中尽可能地锻炼身体，以待出狱后迎接新的战斗。

王鹤寿同志经常教狱中同志唱革命歌曲，鼓舞狱中共产党员的斗志。他教大家唱《国际歌》，还给大家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攻打“巴士底狱”的故事，并且充满信心地说：“等我们革命成功后，也把反动派关押在地下室和监狱里。”

组织起来　团结斗争

为了在狱中更好地开展斗争，尽快把狱中的同志们组织起来，陈潭秋细心观察，物色可以争取的敌伪下层人员来为我党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他争取了一个姓李的看守，让这个看守经常为狱中同志通风报信、传递消息。陈潭秋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很快地将王鹤寿、孟坚等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并建立了狱中党组织，在狱中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陈潭秋十分关心青年党员的成长，经常给刚从校门毕业就被捕入狱的青年党员赵尚朴等人讲解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使赵尚朴提高了革命斗争觉悟，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陈潭秋善于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有一天，陈潭秋通过关系把唐宏经找到他监舍，向唐宏经询问了他参加北方会议的情况和看法，听完唐的汇报后，他对唐宏经说：“你是工人出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这些年来你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但你不应该参加‘非常委员会’。”陈潭秋的帮助，使唐宏经深受教育。同时，陈潭秋还对赵尚朴等同志说：“唐宏经同志是工人出身的党的干部，党

培养这样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应把老唐看做是同志。”陈潭秋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狱中同志之间的团结，为开展有组织的狱内斗争打下了基础。

当时，监狱对“政治犯”监管十分严格。监狱中有不准“政治犯”通信和与亲属会面等苛刻规定，大家对此极为不满。为争取通信和会见亲友的权利，孟坚等17名同志发动了一场要求与亲友通信和会见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迫使狱方答应政治犯“每月与亲属通信和会见一次”。

狱中共产党员不仅发动了旨在改善自身条件的斗争，而且还寻找机会主动向敌人进攻，以扩大政治影响。有一次，一个看守打“犯人”，孟坚同志看到后带头“闹”了起来，王鹤寿、唐宏经等同志也紧跟着“闹”。大家向监狱长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狱方今后不许虐待犯人。监狱长起初态度蛮横，骂孟坚等共产党员是“阶下囚”，想把大家恐吓住。但同志们毫无惧色，据理相争，监狱长见势不妙，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连忙许下今后不再发生打人现象的承诺。

利用关系　筹划出狱

陈潭秋在狱中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利用社会关系营救同志们出狱。1932年初，陈潭秋找孟坚商量，让孟坚给其兄写信，请他出面找人营救狱中的同志。因为孟坚的哥哥是个大知识分子，孟家与国民党要员孔祥熙家有些关系。孟坚欣然接受，按照陈潭秋的要求立即给其兄写了一封信。不久，孟坚哥哥为此事专程到哈尔滨找张文丰，请张文丰从中帮忙。张又找到护路军恤金处长王焕章，王直接向护路军总司令丁琛微求情，以孟坚有病为由，请求保外就医。丁某应允，孟坚顺利出狱。

孟坚的出狱，实现了陈潭秋营救计划的初步设想。在孟坚即

将出狱的时候，陈潭秋又与孟坚研究了如何想办法营救其他同志出狱的问题。孟坚出狱后，经过一段的工作和活动，由孟坚的哥哥出面又走了护路军总司令丁琛微的门路，示意丁做点好事，释放狱中的青年政治犯。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的混乱时期，丁碁于形势答应了此事。1932年7月，陈潭秋、王鹤寿等被捕的同志，全部被释放出狱。

经过一年半的斗争，陈潭秋、王鹤寿等同志终于闯出了魔窟，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狱中的夏大姐

冀芳林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轻工部副部长，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夏大姐”的夏之栩同志，曾于1931年3月，被东北边防军逮捕，先后关押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在被关押的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敌人进行斗争；以火一般的热情，向狱中难友、囚犯以及看守人员，宣传进步思想，把革命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田。夏之栩同志，不愧是党的好女儿，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一

夏之栩同志1906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18年在湖北女子师范读书时，受到在该校任教的陈潭秋等同志的影响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了反对该校长迫害革命教师的学潮。1923年，江岸发生“二七”惨案，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她的母亲黄友梅——后被同志们尊称为“革命母亲夏娘娘”——在腥风血雨中，勇敢地担起了党的地下工作的重任，她的家成了党的秘密机关。此时，夏之栩已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她积极协助母亲做了许多工作，受到党和同志们的称赞，“母女同时革命”，一时被传为佳话。

1923年秋，夏之栩在武汉搞地下活动时被敌人察觉，党组织决定她去北京，任北方区团委委员，负责宣传和妇女工作。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刚从苏联回国的我党早期领导者之一，当时担任党

的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的赵世炎同志。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结为革命伴侣。此后，他们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并肩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夏之栩积极参加了起义，并为取得的胜利欢欣鼓舞。但是，正当起义步步前进的时候，蒋介石勾结外国反动势力，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捕、被杀。党的领导人之一，夏的战友和伴侣赵世炎，也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并于7月19日英勇牺牲。夏之栩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她无所畏惧地说：他们死了，我们要努力干，我死了，还会有人干，终究有一天，革命会胜利的。

1927年7月，她被党派到苏联学习，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1年2月起程回国。3月6日，在越过苏中边界时，突然被中国的东北边防军逮捕。此后，就开始了为时九个多月的狱中生活。

二

夏之栩被捕后，首先被关押在哈尔滨女犯看守所。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为了有利于对敌斗争，她化名许佩英，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军方为了弄清楚她的身分，对她多次提审，都毫无结果。又因无确凿证据，只能把她作为“党案嫌疑”暂时关押。

一天，她又被带进了审讯室。那位在审讯中好几次被她顶撞得狼狈不堪的审讯官，竟泛着得意的冷笑。当她正在思考这种微妙的变化时，旁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那人毕恭毕敬地给审讯官行了个礼，然后把脸转过来，与夏之栩面对面地站着。

审讯官指着那个人，问夏之栩：“你认识他吗？”

在那个人进门时，夏之栩就认出他来了。他也是在越界时被捕的，不过他与夏之栩并不十分熟悉。“莫非他……”一个不祥的阴影在夏之栩的心头闪过。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没等审讯官再问，那个人就比比划划地说：“小夏，你不认识我了？我是……”

夏之栩心里明白，这个没骨气的东西，已经当了叛徒。她马上打断他的话，不无嘲讽地说：“我姓许，不姓夏。这位先生一定是贵人多忘事，认错人了。”尽管审讯官和那个叛徒又说了许多废话，夏之栩一口咬定自己叫许佩英。审讯官无可奈何，只好把这出“当面对质”的闹剧草草收场。

夏之栩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使一些难友深为感动，甚至某些看守人员和刑事犯人也都很敬佩她。有一个女犯，是因为对封建婚姻不满把丈夫杀死后上山当了土匪被当局抓获的。她膀大腰圆有力气，性格暴躁嗓门大，犯人都不敢惹她，她自然也就成了“狱头”。她经常标榜自己“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当她听说夏之栩是共产党，共产党也“杀富济贫”时，便对夏之栩产生了好感；又见夏之栩一身正气，更使她折服，就主动把自己睡的热炕头让给了她。看守夏之栩的人员，多数人都向她投以尊敬和佩服的目光，有人偷偷给她摘去刑具；有人悄悄告诉她谁当了软骨头。当她被党营救出狱时，有人还主动给她拿东西、问长问短、十分友好。而那些在狱中当了软骨头、“哈巴狗”的人，走出监门时，常常受到监内“囚徒”的嘲讽和看守人员的刁难。

三

夏之栩同志身陷囹圄，仍不忘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一有机会，就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从哈尔滨押往奉天的途中，曾在长

春监狱停留一宿。正巧，女牢中关押着十几名朝鲜族女青年，她们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反对压迫而被捕的。当她们得知夏之栩是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党嫌疑犯时，都对她很敬慕，她们要求夏之栩给她们讲点"外面"的新情况。夏之栩本人也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女青年，看着这些姑娘天真纯洁的神情，巨大的责任感，立刻冲淡了途中的疲劳。她与这些姐妹坐在一起，仔细地给她们讲述了苏联的情况，还讲了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和青年人的使命。她侃侃而谈，革命道理化作亲切的话语，如同涓涓细流，淌入了每个女青年的心田。离别时，这些青年人握住夏之栩的手久久不放，难舍难分，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夏之栩被押到奉天第一监狱。这里的环境和条件更为恶劣。与她押在一起的人，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她们之中，有的是官宦之家的丫头、使女、佣人，因不堪主人的污辱、迫害，被迫进行反抗而遭横祸；有的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因反抗公婆、丈夫的打骂欺凌而出逃，犯了所谓"背夫窃逃"罪；有的是任人欺辱蹂躏的妓女、娼妇，为了追求人的正常生活，打伤业主老鸨出逃而被抓获……这些人多数都没有文化，生活穷困，甚至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再加上狱内环境恶劣，饭里有沙子，床上有臭虫，身上有虱子，她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更可恨的是，有的男看守，借口提审，经常把女犯提出去进行污辱，强行奸淫，使这些女囚们，只能把泪水咽到肚子里，在非人的环境里，苦苦地忍受着熬煎。

夏之栩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她们非常同情，对女囚遭到的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非常痛恨。她给这些人讲人生的意义，讲社会的黑暗，讲妇女解放，使这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开始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和自己为什么受穷、受压迫的道理，重新振作了精神。她亲自带领大家，一同清理室内外卫生，拆被子，洗衣服、剪头发，发动难友们一起向狱方开展斗争，要求改善犯

人生活，不准男看守凌辱女犯；并且向狱方发出警告：如不答应这些条件，将向社会发出呼吁。监狱当局怕事态扩大，被迫接受了她们的要求。此后，狱内环境确实有了改观，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夏大姐”。从此，夏之栩成了难友们的知心朋友和主心骨。谁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谁有什么事，都请她给拿主意。她也积极为这些难友们服务，替她们写信，写申诉。后来听说，在她的鼓舞和激励下，有些人出监后投入了革命队伍之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满洲省委抓紧时机，积极开展营救活动。由于监狱当局始终没有夏之栩是共产党的确凿证据，也没有正式判刑，所以同意将她交保释放。满洲省委派一名姓胡的同志给她办理了保释手续，她和其他几位同志，终于在1931年末获释。1932年2月回到上海，中央分配她到全总女工部工作。

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夏之栩同志又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与帅孟奇、钱瑛、何宝珍等同志被关押在南京监狱，夏之栩又在新的战场上，与敌人进行了更加英勇顽强的斗争，敌人监狱长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夏之栩是‘牛皮糖’，软硬不吃。”夏之栩曾坚定地说：“我要斗争。我要把牢底坐穿。我向往共产主义，我等着我儿子打着红旗来接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亲自到南京狱内，把她和钱瑛、熊天荆三人保释出狱。出狱后夏之栩被留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开列了狱中同志名单，使大批同志获释出狱，奔赴抗日战场。

此后，夏之栩同志又转战大江南北，1941年到达延安。194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和建国后，一直在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担任要职。1987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中央在为她发表的讣告中，称她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她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鲜血绣成的心声

——记抗日女英雄金贞吉烈士

金泰甲

翻开延边抗日斗争的史册，就能看到每一页都闪耀着用鲜血书写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名字。其中也有许多妇女。金贞吉烈士便是她们当中的一个。她作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唤醒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的妇女走向革命的道路，为了抗日救国斗争的胜利，她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10年3月20日，金贞吉烈士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安农面。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朝鲜半岛。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父亲金秉奎，带着出生不久的长女金贞吉，渡过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一带，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他先后在延边的珲春，延吉县等地从事反抗日寇的地下活动。1919年，他在局子街（今延吉市）参与了处死罪大恶极的巡警“黄胡子”的行动。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金秉奎领着全家逃往黑龙江省宁安、牡丹江等地。年幼的金贞吉跟随父母，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时代。

“我们为什么无家可归，这样四处流浪？国破和家亡？这一切都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他是我们的不共戴天之敌。要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赶出家园，我们必须学习文化知识，找到真理。”金秉奎常对女儿这样说。

金贞吉经过父亲的谆谆教诲，逐步萌发了革命的意识。1928年春，她怀着寻求真理的愿望，从千里之外来到龙井，考入大成

中学。当时的龙井，既是朝鲜族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延边革命斗争的发源地，而大成中学又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校期间，金贞吉通过进步教员的教育和引导，迅速成长。她不仅积极参加反日爱国学生运动，而且走向社会，为劳苦大众开办夜校，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还亲自参加了“五·三〇暴动”等革命斗争。在斗争的实践中，金贞吉逐步领悟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金贞吉政治上日益成熟，1930年，经大成中学教员、地下党员李容国（后任中共东满特委共青团书记）的介绍，金贞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夏，组织上决定派金贞吉到延吉县凤林洞从事地下活动。她欣然接受了新的任务，离开大成中学，来到凤林洞。她在教师名义的掩护下，负责妇女工作和保护位于凤林洞的中央东满特委联络站。

是年12月，在朝鲜全罗道光州市，以日本鬼子调戏、污辱朝鲜女学生为导火线，发生了“光州学生事件”。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怒火，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抗日的浪潮迅速波及到“满洲”。根据中共东满特委的指示，凤林洞的群众组织了示威游行。在金贞吉的带领下，凤林洞妇女夜校的五六十名妇女，人人手举红布条，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们步行三十余里，来到龙井日本领事馆东山坡上，挥动着红布条，向日本领事馆高呼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调戏妇女的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和朝鲜滚出去！”

警察们惊慌失措，开枪镇压示威群众。次日，日本龙井警察署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凤林洞，把全村群众强行带到学校操场上，勒令今后不许再举行示威游行，并将金贞吉作为这次事件的

主谋予以逮捕。

在龙井警察署的拘留所里，金贞吉受到了敌人的审讯。

“这次游行示威，是谁组织的？”

“是我们妇女自发举行的。”

“胡说！看来，不给你个颜色瞧瞧，你是不肯招供啦。”

敌人开始拷打起金贞吉，金贞吉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我们早就知道，凤林洞是共产党的一个黑窝。你老实交待，谁是共产党？”

金贞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没泄漏半点秘密。一看这招儿不灵，敌人又准备采取卑鄙的手法要把她的衣服扒光，拿到外面“亮亮相”。

金贞吉朝敌人唾了一口，厉声喊道：

“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在朝鲜光州污辱了我们的女学生还嫌不够，又要干这种无耻的勾当！扒就扒吧！‘满洲’的人民是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一看金贞吉如此顽强，敌人只好将她关起来，又在暗中调查她的情况。不过，直到那时，凤林洞的党组织还没有暴露，敌人没能掌握什么线索，所以，几日后，他们不得不释放了金贞吉。

进入1931年以后，延边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热潮更加高涨。金贞吉被这种大好形势所鼓舞，积极组织凤林洞妇女夜校的学员放哨、跑交通，竭力保护东满特委联络站的同志们，而且把革命传单向四处转送和散发。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

1931年5月的一天夜里，金贞吉正忙着整理和分发传单。突然，从村口传来了一阵犬吠声。原来，这是延吉的权正三讨伐队搞的突袭。权正三曾在独立军干过，后来叛变投敌，现在成了镇压共产党的急先锋。这家伙经过长时间对凤林洞的监视，决定先将金贞吉等主要人物抓去狠狠整一顿，以此来遏止就在延吉眼皮

下的凤林洞的革命活动。

金贞吉从激烈的犬吠声中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寻常，便急忙把手头的一捆传单塞进了院子里的烧柴垛内，然后进屋装作写教案。直奔她家来的权正三一伙，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一张传单。但他们还是按照原定方案，将她捆绑起来，押送到延吉监狱。从第二天起，敌人又开始审问金贞吉。

“凤林洞的传单是谁写的，又是谁贴出去的？”

“不知道！”

“你们那儿的女人天天晚上凑在一起都干些什么？”

“学文化！”

“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你是大成中学的‘黑美人’（金的绰号）。你为什么中途退学，去了凤林洞？老实交待，东满特委在什么地方？”

“我家里穷，只好辍学当了教员。什么东满特委，我可头一回听说。”

气急败坏的敌人多次向金贞吉施以酷刑，她昏过去几次，也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这样一来，敌人明知她是个革命者，却抓不到任何证据，不好作出判决。但他们又不想就这样放她走，怕她再闹出什么事来。因此，他们决定暂时把金贞吉关起来，一旦抓住什么证据再作处置。

从那以后，金贞吉犹如笼中之鸟，失去了自由，又一次开始了铁窗生涯。然而，她丝毫没有消沉和气馁。敌人的几番严刑拷打，使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尽管阴暗、窄小、潮湿的牢房将她和外面的火热斗争隔离开来，但她怀着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乐观地生活和斗争着。

和金贞吉关在一起的8名女犯人中，有一个名叫李誉玉的姑娘。不知为什么，她整天哀叹或流泪，也不跟别人说话。金贞吉断定其中必有什么缘故，便找她谈心：

“善玉呀，我们都是为革命献身的人哪。好象你有什么心事，你能不能跟大姐说一说？”

听到金贞吉的话，李善玉忍不住哽咽着说：

“大姐，我实在冤枉呀。在这种地方，我怎么能过12年呀？”

随即，她握住金贞吉的手讲了起来。原来，李善玉被打成了“6·10万岁”事件的主谋，同崔仙日一起被抓获，并判了12年徒刑。她哭着说，实际上那次事件的主谋是崔仙日，自己仅仅参加了游行示威，但又不能出卖同志，只好一同坐牢受罪。

“善玉，你没有出卖同志，这真是做得对极了。别看你年纪不大，倒是满有志气的嘛。”

金贞吉先是夸了她几句，然后又帮助她鼓起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过了几年，最晚不超过十年，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到了那时，同志们会砸碎这牢门，把我们营救出去。即使我们等不到那一天就死了，同志们也会为我们修纪念碑，我们将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所以，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丧失信心和勇气，要和敌人斗争到底！”

在金贞吉的影响下，李善玉变得坚强了。她不再那样消沉，还跟金贞吉学起了文化，而且利用放风的机会认真锻炼身体。后来，她被提前释放。据说出狱后，马上参加了抗日队伍，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金贞吉所在的牢房里，还有因贩毒、投机倒把、盗窃等案子关进来的四个女犯。金贞吉也向她们宣讲革命的道理，教育她们多做些利国利民的事，不应当做那些对人民有害的事。在金贞吉的帮助教育下，这几个女犯也逐渐觉醒。她们表示，即使自己不能为国为民去参加战斗，但也不会再干什么坏事。她们还挤出时间跟着金贞吉学识字、唱歌。从金贞吉的牢房里传出来的《延吉

监狱之歌》，鼓舞了关在这里的其他革命者。

金贞吉被监禁后，组织上和同志们始终没有忘记她，而且给予深切的关怀。每周的探监日，同志们都要带上衣物、日用品、钱和食物等去看望金贞吉。其中不少人她也不认识。和她同牢房的人问她："听说你家在牡丹江，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亲戚呀？"金贞吉高兴地答道："同志可比亲戚亲呀。"她还把同志们带来的外面的消息和抗日斗争的形势讲给难友们听，以激励她们的斗志。

有一天，探监结束后，金贞吉神色严肃地回到了牢房里。和她在一起的车贞姬（中共延和县委开山屯区妇女委员）问她出了什么事，她用极其悲愤的口吻告诉大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整个"满洲"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听到这一消息，难友们禁不住抽泣起来。有的还绝望地说："日本鬼子一直追到'满洲'，叫我们不得安生，今后可怎么办哪！"金贞吉耐心开导她们说：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满洲'，但社会还是会向前发展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就象孩子长大了，就会脱掉旧衣服，换上新衣服一样，社会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发生变革。别看现在这些日本鬼子、地主、资本家这样猖狂，但这个社会必然会灭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实现。要想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不怕牺牲，顽强战斗。"

已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金贞吉料到"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肯定会大肆镇压革命势力，因而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同时，她也想到，虽说身陷囹圄，但只要活着，就应为革命而战斗，使自己的一生更有意义。

那么，应当怎样去战斗呢？假如手里有枪，就能打倒敌人，砸碎牢门，出去和同志们并肩战斗。可我手里没有枪，也没有翅膀能飞过铁窗高墙，到同志们身边去。不过，我有一颗火热、赤

诚的心，它在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不屈的信念而跳动着。对，就把自己心中的歌绣出来！

想到这里，金贞吉眼前亮堂了许多。在大成中学搞勤工俭学时，她学会了钩针编织技术。她打定主意用钩针织一个大被单，在里面绣上几句心里话。

就这样，在延吉监狱阴暗的牢房里，金贞吉用同志们送来的两捆白线开始一针一针地织起来。

"我说贞吉呀，怎么突然想起钩织被单？是不是想在牢里出嫁呀？"

不知缘由的车贞姬开玩笑道。金贞吉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说：

"出嫁倒是没想过，但我做了牺牲的思想准备。谁能肯定我会活着出去呢？所以，我要给能活下来的人留个值得纪念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能知道我们是怎样生活、怎样战斗的。"

就这样，金贞吉把纯洁而崇高的心中之歌，化作一针一线，绣在了被单之上，融进了各个图案之间。

为了不使敌人发现自己的意图，金贞吉先后钩织了四个被单，只把其中的一个绣上了字，而且这些字被花纹图案所掩饰，又是由下往上，从右到左读的，很难辨认。一共是二十七个字，内容是：

延吉县第四监狱金贞
吉呻吟苦痛之结品青
女子解放世界的高唱

金贞吉在牢房里织被单的消息，背着敌人传遍了整个监狱。同志们都被这位不屈不挠的女志士的行为所感动。他们默默地展开被单望着那些字，眼前仿佛出现了取得胜利的情景……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对难以定罪的在押犯发布了特赦令，一些证据不足的政治犯得以释放。就这样，金贞吉结

束了长达10个月的铁窗生活。一出狱门。她就直奔延吉的舅母家，将被单交给了舅母：

"舅母，这是我在监狱里织的被单。我还有急事，不能回家去看看，请您将这个转给我父母，希望他们看见它，就象见了女儿一样高兴。"

随后，金贞吉路经凤林洞，去了八道沟，逗留在叔父家。不久便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延吉游击队，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在游击队里，她任政治工作员，随部队到各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和热情。

1933年秋，袭击老头沟的战斗结束后，金贞吉给父母写了一封短信，大致内容是：

……人民大众彻底得解放，都过上美满的好日子的那一天，我一定回家拜见您们二老，到那时，拿出在狱中刺绣的被单，给你们讲故事听。请把被单保存好，想念女儿时，把它拿出来看看，看见它就当做见到了女儿，有朝一日，女儿一定回到父母身边，孝敬您们二老，报答您二老的养育之恩……

然而，金贞吉没能活到这一天。

1933年冬，金贞吉同其他两名同志从三道湾游击区出来做地方工作时，在八道沟口附近的山谷里，与日本鬼子的讨伐队遭遇，一直战斗到最后，壮烈牺牲。

金贞吉用心血绣成的被单，如今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在花纹图案中排列的二十七个大字，闪耀着烈士的崇高精神，激励着人们不要忘记过去，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成龙哲　译

冲 破 牢 笼

——金明柱等人在延吉监狱中的越狱斗争

金哲洙

延吉监狱位于今延吉市河南，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称之为吉林省第四监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延边后，监狱被日本侵略者接管，称“延吉模范监狱”。

延吉监狱围以青砖高墙，占地面积有百米见方。围墙内又有一堵东西向的墙，把整个监狱隔成前小后大的两个院子。前院有监狱办公室、看守室等机构，后院有“十”字型牢房，其交叉点矗立着一个高四五米的通体玻璃瞭望台。从瞭望台向四面伸展的牢房各有名称。向南的叫“元”字号，向东的叫“享”字号，向西的叫“贞”字号，向北的叫“利”字号。这里监禁着从延边各地押进来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

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曾在1931年初成立了以原汪清县委书记金勋为书记的中共延吉监狱委员会。同年夏根据斗争的需要，建立了由金勋、李进、吴世国、尹范、苏胜镐等人组成的越狱斗争指挥部。指挥部又组织了爆破、放火、抢枪等11个分队，他们加紧了越狱准备。鲜族青年金明柱参加了爆破队。

金明柱，共青团员，是延吉县茶条沟丰兴洞人，1930年秋，在减租减息斗争中，被敌人逮捕，判刑15年。他和金勋关押在一个号里。

狱中党组织通过被争取过来的看守吕保元，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用外部秘密送进来的锉、钢锯等工具，砸开脚镣，准

备冲出牢狱。但是，由于叛徒告密，越狱失败了。狱中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看守吕保元被捕，不少同志被加刑。

第一次越狱斗争失败后，狱内的党组织和外部的联系中断了。但金勋等同志重新建立了党组织和由39人组成的越狱斗争队伍。

1933年4月，一切准备就绪。同志们用第一次越狱时留下来的钢锉等工具锉开了脚镣。挂钟敲过12点，预定时间已到，但负责发出信号的朴春植那里杳无音讯。原来，朴春植叛变了，他怕越狱失败会延长刑期，向敌人泄露了越狱计划。这时，同志们要求冲出去。但金勋劝阻大家，不要打无准备之仗，若是蛮干，免不了会大批伤亡。这样，同志们停止了行动。监狱当局对这次砸开脚镣事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审查，对主要当事者们加了刑。金明柱被加刑3年，并转禁到"享"字第18号牢房。

18号牢房里被监禁的都是刑事犯，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同志。金明柱离开了同志们，心里很苦闷，他决心转房。他曾几次向看守提出要求，但监狱当局置之不理。金明柱就故意找茬儿跟同监的囚徒们大吵大闹。当时每个牢房里都有一个便桶，除放风时间可以上厕所外，其它时间都在便桶里大小便。牢房里有个规矩，谁一旦往便桶里大便，就得一连三天在放风时上厕所时，负责倒便桶并洗刷干净。金明柱故意往便桶里大便，第二天早晨放风时却不按规矩把便桶提到厕所里去。而且，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只便不倒。这就引起了同牢囚徒们的不满。金明柱便借此机会，与众人顶撞起来，甚至把一个人摔倒在地。旁边的人见此情景，马上围上来，金明柱连踢带打，整个牢房一片混乱。

这时，看守长跑过来，不问青红皂白打了金明柱几个耳光，让他搬出去。这正是金明柱所希望的，他高兴地卷起行李，跟着看守长到了"元"字第3号牢房。

金明柱转到"元"字3号牢房后不久，金勋同志也转来了。

与党的领导同志又在一起了，金明柱非常高兴，斗争意志更加坚强起来。

1934年冬，敌人把金勋同志秘密杀害了。狱中党组织失去了领导核心。金明柱和同志们都很悲痛。同时狱方又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经常转房。金明柱从“元”字第3号牢房转到“亨”字第7号牢房后不久，又转到“元”字第8号牢房。由于经常转房，同志们之间无法通气。在这种情况下，组织集体越狱就更加困难了。金明柱曾考虑过个别越狱方案，但又想起了金勋生前的话：“不要个别越狱，要组织集体越狱，越狱后要找党。”金明柱暗暗下决心，要担负起组织越狱斗争的重任。

监狱当局对金明柱非常注意，他的行动受到严格管束，甚至不让他参加狱内工厂劳动。他知道，要想与同志们取得联系，就得参加工厂劳动。于是他装成很老实的样子，看守说什么，他听什么，而且还时常讨好看守。结果，看守们都认为他有悔改的表现，终于让他去工厂干活了。

当时监狱内有木工厂和被服厂。金明柱在工厂里做裁缝活。他利用每天只有两次休息时间，背着看守同李英春商议越狱斗争问题。李英春也同意金明柱的意见。

李英春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同志，曾是和龙县游击队队员，1933年初被捕入狱。

1935年春，金明柱在偶然的机会得知：今年端午节监狱的看守们休息5天，除几个值班看守外，都参加运动会。这是个很好的越狱机会。金明柱马上和李英春商量，并组织了越狱指挥部。李泰根任指挥，金明柱负责联络工作。

李泰根原来在珲春游击队里战斗过，是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敌人摸不清他的底细，只判了5年。当时，他的刑期已经过半，所以没给他带脚镣，让他在工厂里干木工活。为了不暴露他的身分，越狱指挥部只分配他负责越狱组织工作和后勤，不让他

直接参加越狱斗争。这样，越狱斗争实际上的指挥是金明柱。

经过慎重周密的准备，两个月以后，建立了由被服厂的姚子令、木工厂的朱风勋、马贵发等17人组成的“越狱敢死队”。行动日期定于阴历五月初六，具体步骤是：下午3时，由3名敢死队员收拾头一道门岗，两个队员收拾二道门岗，两个队员切断二科电话线，其余10个人负责缴下大门右侧看守室的武器。

这天，一切准备就绪。17名敢死队员吃完饭就等着金明柱的命令。这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一个叫李志善的敢死队员担心越狱不能成功怕加刑，在关键时刻打了退堂鼓。这件事给越狱行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是队员的情绪不稳定，二是原来由17个人的分工行动计划，出现了漏洞。在这种情况下，金明柱果断地下命令，把行动计划推到第二天。

晚上，金明柱布置可靠的队员看住李志善和一些不坚定分子，以防走漏风声。同时在可靠的人当中，补充了敢死队员。

第二天下午3点，晚饭端来了。看管工厂的王看守也回去吃饭了。敢死队员抓紧吃完了晚饭，各自怀里藏着砸脚镣的器具回到原来的位置，暗暗地开始锉脚镣。他们的行动，连一起干活的100多名其他囚犯也没察觉出来。

一会儿，王看守进来了。这时，敢死队员们已经把锉断的脚镣用绳系着，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王看守发现工具箱空了，惊异地回过头来。此刻，站在看守身后的金明柱霍地举起明晃晃的手斧，对准王看守的鼻尖，厉声喝道：“不许动！”王看守吓得瘫在地上。两个敢死队员立即扑上去把他捆缚起来，绑在工具箱上。

金明柱见第一个计划进行顺利，马上跳到木箱上，挥动着手斧发出了行动命令。李泰根等人马上敲响了木桶，咚咚的木桶声遮住了砸铁镣的声音。金明柱满头大汗地帮助别人砸脚镣。100多名囚犯们也跟着砸起自己的脚镣。过了20多分钟，在门口望风

的同志传来了有新情况的口哨声。

原来，是日本指导官鹤岗向工厂走来。这时，还有不少人没砸开脚镣，金明柱立即命令大家马上把脚镣戴上。工厂里顿时显得很寂静。日本指导官鹤岗走到门口，发现情况似乎有些异常。他手扶门框，不敢贸然迈步。这时，不知是谁，手中的锉刀落在砸开的脚镣上，发出"当啷"一声，指导官的目光，锐利地射向发声处。站在那个人身旁的朱凤勋敏捷地用身体掩护落在地上的锉刀，并机警地用手指敲响桌面，转移了鹤岗的注意力。朱凤勋知道指导官正在学汉语，经常说几句磕磕巴巴蹩脚的汉语，为了稳住他，朱凤勋边敲桌子边用汉语问道："这个好不好？"指导官脸上露出了笑容，放心地跨进门槛，走到朱凤勋敲击的桌子前。这时，金明柱一递眼色，原来站在指导官身后的陈磕巴（外号）一跃而上，紧紧抱住鹤岗的腰，金明柱举起锋利的手斧，照他的脑瓜猛砍一斧，结果了这个日本指导官的狗命。陈磕巴马上把尸体拖进刨花堆里。

金明柱命令大家赶紧砸开脚镣。不到10分钟，剩下的脚镣全部砸开了。

为了不使敌人过早发现，金明柱让大家扛着桌椅，走出工厂大门，装成把木制品搬进仓库的样子。一名敢死队员一手握着王看手的缚绳，一手用手斧捅着他的腰窝走在前头，其他队员扛着桌椅，带着木工工具紧跟在后面。队伍走进二门岗哨时，看守长祁凤山走出哨所向王看守走过来，当他看到王看守吓青的脸色和胳膊上的缚绳时，吓得打了个趔趄，转身就跑。敢死队员们马上扔掉桌椅，甩掉脚镣，分头向二科、看守室、大门口冲去。不一会儿，办公室的敌人被解除了武装，电话线也切断了。

金明柱冲到二门向哨兵喊道："放下武器，快滚开！"哨兵一楞，倒退了两步就要逃跑，李英春几步赶上去，把他结果了。正当金明柱缴下哨兵腰上的手枪时，一个看守向大门跑去。金明

毫不迟疑地朝这个家伙的后脑勺开了一枪，看守应声倒在地上。

在监狱右侧看守室门前，有20多名喝得云三雾四的看守，正在划拳行令呢。敢死队员的突然袭击，将这伙人全吓呆了，魂飞胆散地跪在地上求饶。敢死队员们厉声大喊："不许动！动就要你们的命！"金明柱命令敢死队员快进看守室摘枪。不多时，难友们用50多支步枪，10几支手枪，数十枚手榴弹武装起来，向大门口冲去。

这时，驻在监狱附近的日本守备队方向响起了枪声。金明柱为了让更多的难友冲出牢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他又跑向监舍去砸牢门，在过道处与拿着一支步枪的伪监狱长狭路相逢，在朱凤勋的帮助下，将伪狱长打死。他让朱凤勋快走，自己却拿着大斧子将10多个监号全部砸开了，众难友们潮水般地涌出了监房。金明柱大喊："跟我来！"向大门口跑去。

冲出大门后，他看见朱凤勋倒在血泊中，便停住了脚步，要去背他，朱凤勋推开他说："你别管我，快跑吧！"

"不行，我得背你跑！"

朱凤勋说："我已经受了致命伤，不行了。我来掩护你，你快跟上队伍吧！"

这时日本守备队的子弹象雨点般地射进来。朱凤勋重新握紧枪，向追来的日本守备队射去。他为了掩护越狱的难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越狱后的一百多名难友，冒着瓢泼大雨，分成两路，一路奔向瑞甸山，一路奔向帽儿山，准备去投奔游击队。

不久，大批的日本守备队、警察、特务追上来了。在这紧要关头，金明柱、李英春等6人组成掩护小队，阻击敌人，由李泰根带领难友继续向山里转移。

在阻击敌人时，李英春受了重伤。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对金明

柱说："我已经不行了，你快去找游击队，向党汇报这次越狱情况。"金明柱不肯扔下他，李英春说："别管我，你看敌人又集结了，你们快撤吧，我还有一背带子弹呢，够讨还回血债的了……"

金明柱等人挥泪告别了身负重伤的战友，向树林撤去。

以金明柱同志为首的革命者，冒着连绵细雨，忍着饥饿，历经坎坷，在森林中跋涉两三天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最后找到抗日游击队。

金明柱和越狱的同志们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踏上了血与火的征程。

虽死犹生

——梁永盛同志短暂的一生及其在奉天监狱内的斗争

关桂声

"烈火见真金"。在监禁、酷刑和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党的一个普通党员、奉天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永盛同志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赤胆忠心，使我们看到在那残酷的地下斗争年代，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

成　长

梁永盛同志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过着贫寒饥苦的生活。一家人成年累月辛勤劳动，仍得不到温饱，当然也就无钱供他上学念书了。20多岁时，他到营口市一魏姓资本家经营的同和福铁工厂学徒，并当了铆工。不久，又到奉天兵工厂当铆工。由农村到城市，使他饱尝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榨，他认识了旧社会的黑暗，有了想翻身、要革命的思想基础。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组建后，党的组织有了发展，并领导工人开展了罢工募捐和宣传活动。梁永盛在这些活动中，接受了革命影响、受到了革命教育。

1929年11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奉天兵工厂附近开办一所学校，以便接近工人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当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派省委成员杨一辰同志选择距奉

天兵工厂较近的东三家子开办了这样一所学校，取名“静远学馆”。学馆白天教工人子弟读书，晚上教工人识字，宣传革命道理。这样不仅到学馆学习的工人子弟渐渐增多，到学馆学习的工人也多了起来。梁永盛和他10岁的儿子梁贵玺都经常去学馆学习。在学习时与杨一辰同志的接触中，梁永盛受到了深刻影响，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与杨一辰和后来接替杨工作的地下党员郝振广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0年8月，满洲省委成立了以省委组织部长杨一辰为书记的奉天市委，决定“大批发展组织”，“建立兵工厂支部”。此后，梁永盛由奉天市委委员王文德和兵工厂支部地下党员魏国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兵工厂党支部的核心骨干和杨一辰同志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

战 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我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群众陷于苦难饥饿的深渊，革命者和爱国者随时处于遭逮捕，被屠杀的境地。

这时的梁永盛，早已失业，一面靠打短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面不顾生活的艰难，环境的恶劣和自身的安危，坚持开展党的工作。他先后到新利鑫饭店安装过暖气，到三盛炉铁工厂造过铁房架，还到铁西羊毛公司等处干过零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了兵工厂党的组织，重建了兵工厂党支部，并担任了支部书记。他带领十几名工人积极分子，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避开暗探的侦察，永盛同志经常召集进步工人在北市场卢家胡同德沛里一个工人家里聚会，向他们宣传讲解：要想不当亡国奴，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闹革命，抱成一团，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兵工厂粮栈以高价赊粮给工人，发工资时扣还，从中盘剥工人血汗。后来，失业工人不断增多，大批工人生活无着，无钱买粮。工人们怨声载道，强烈要求解决粮食问题。永盛同志抓住群众心理，经过秘密串联和精心准备，领导发动了抢粮斗争。

一天，上午9时许，几千名工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粮栈。永盛同志果断发出信号，人们一拥而上，砸开粮仓。人越来越多，原来犹豫观望的也加入了抢粮的人群。最终把30多个粮仓全部抢光。这一事件，震动了奉天城；这一胜利，鼓舞了广大群众团结抗日的斗志。

永盛同志还多次组织、领导工人积极分子，在北市场、南市场、皇寺大街、小津桥以及兵工厂附近等繁华场所和行人注目的地方，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麻痹敌人，避免引起怀疑，也为了便于工作，永盛同志与接触较多的几名骨干，拜了把兄弟。他们活动的方式、方法很灵活、很巧妙，有时竟把传单贴在警察所的墙上，甚至放入警察巡逻车内。

到1932年初，永盛同志所领导的兵工厂党支部，已团结了厂内外40余名骨干力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反满抗日的爱国活动。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永盛同志准备夺取敌人的兵器库。为了这次行动，永盛同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做了精心安排和周密准备。他把看兵器库的人发展成为自己人，把库内的枪支弹药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把30余名熟悉情况，坚定勇敢的进步工人，组织训练成了夺枪斗争的骨干力量，秘密商定了夺取武器后迅速外运的行动方案。为此，永盛同志还带领几名骨干，打死两名日本军官，夺取了两支手枪，以备应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为了求得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和领导，永盛同志向奉天特委作了汇报。由于奉天特委负责人没有批准，致使永盛同志的行动计划夭折。过后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湘同志谈起此事时曾说：“在1932年4月22日，我曾与兵工厂几名工人谈话

询问过此次准备抢枪斗争的准备情况，工人们说，当时有三百多人急切要求夺取武器，武装起来抗日。兵工厂的工人知道枪支弹药的详细数目，放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夺取的方法。如果当时党组织敢于去领导，抢枪斗争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奉天特委负责人，当时没有大胆去领导这次夺取武器的斗争，结果把机会错过了。”

被　　捕

夺取武器计划没能实现，永盛同志十分惋惜，但丝毫没有灰心，他继续坚定地贯彻执行奉天特委的指示。

193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梁永盛同志接到中共奉天特委指示，为了纪念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节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要他在节日期间领导组织兵工厂支部开展一次活动。

按照沈阳当时的习俗，农历三月二十八，是天齐庙庙会。每到这个时候，天齐庙一带总要热闹好几天。天齐庙就在现在的大东电影院附近。庙会那一天，整个小东路，从小东门到老龙口酒厂，呈现出一片节日的气氛：有说书的、唱戏的、耍猴的、卖艺的、摆摊的、算卦的，还有求神拜佛的、讨药还愿的……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永盛同志在前一天晚上，通知十几名党员和进步工人，中午12点，到天齐庙集合，利用庙会散发传单。

考虑小孩子不引人注意，不易被人怀疑，当日上午，永盛同志按照事先想好的行动计划，带着他的儿子梁贵玺去“逛庙会”。走到小东门“稻香村”，他让儿子买了两盒点心，将中共奉天特委印制的传单，放进了点心盒内。他让儿子拿一盒点心走在前面，并告诉儿子如果遇到敌人检查就摸摸鼻子，给后面发出暗

号。他又把另一盒点心交给了其他同志。他们顺利地到达了预定地点。人都到齐后，永盛同志将点心盒里的传单拿出，分发给参加行动的同志们。同时还给每人一小包白灰。如果散发传单时被敌人发觉，便撒白灰迷敌人的眼睛，摆脱敌人的追捕。永盛同志安排部署完毕，便带领同志们分头行动起来。过了一会，庙会上出现了壮观的景象：人群云集之处，几乎都有传单四处飘散，还有人高呼："反满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庙会上人群沸腾，争相抢阅传单，有的脸上露出了振奋的表情，有的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永盛同志怀中的传单最多，他在一处撒完，又到另一处去散发，等他把传单撒完，发现自己已被敌人跟踪。他一次又一次地想摆脱敌人，但都没有成功，终于被捕入狱。

不 屈

一间昏暗的牢房，地上躺着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遍体鳞伤的永盛同志。自从他被捕之后，不知已受过多少次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半点党的机密。他的坚强，使其他被捕同志受到了鼓舞，增强了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在敌人的审讯室里，主审人气势汹汹地发问："你的同伙都是谁？"

永盛同志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无论敌人怎样问，用什么样的刑，永盛同志只是回答这样一句。

敌人气得暴跳如雷，火冒三丈，打手们蜂拥而上，用惨无人道的恶毒手段对永盛同志进行折磨。

凶手们把凉水灌进永盛同志的鼻孔里，永盛同志忍住痛苦，沉默不语。敌人嚎叫："快说，你的同伙是谁？"

永盛同志冷漠地回答："我已经说过了，全中国的工人阶级

都是！”

一个敌人狂叫：“往凉水里掺小米，再继续灌！”“灌火油，灌辣椒水！”边灌边用胶皮鞭子蘸凉水，一下一下向他猛抽。他一次又一次昏了过去，昏过去回答敌人的是无声，苏醒过来回答敌人的是沉默加轻蔑、痛斥加唾骂。凶恶的敌人，气急败坏，却没能从他嘴里问出丝毫口供。

狡猾的日本侵略者，见酷刑与残暴不能使永盛同志屈服，便改用软招法，选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汉奸，进行劝降。那个汉奸满脸堆笑地走到永盛跟前，还没说完一句话，永盛同志便开口痛骂：“你是中国人的败类！”“你长的是亡国奴的脑袋！”“中国人替日本人帮腔，还知道羞耻吗！”直骂得汉奸哑口无言，灰溜溜地滚了出去。

于是更加残酷、更加凶暴的刑罚向他袭来，使得永盛同志经受了死去又活来，活来又死去的更加难以忍受的摧残。

坐老虎凳，对永盛同志不管用，敌人就给他压杠子。压两个人的杠子不管用，就压四个人的杠子；压四个人的杠子不管用，就压六个人的；再不管用，敌人就把碎碗碴子放在他膝盖下再用杠子压。敌人越来越凶，越来越残暴，但他们除了使永盛同志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外，还是什么也得不到。敌人更加疯狂了，他们用刀刮他的肋骨，肋间的皮肉被刮得翻了起来，惨不忍睹，血肉模糊，衣服被血染红，粘在身上。

永盛同志由于一直受到敌人的非人对待和惨无人道的摧残，伤痕累累，身体十分虚弱。党组织通过关系派人到监狱看望他，同志们流下了眼泪。他强忍痛苦，扶住铁牢的栏杆，支撑着站立不住的身体，镇定刚强地表示：“打死我，刮死我，我也不会说出党的秘密，不会说出你们。”表达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永盛被捕后，妻子和儿子也被关进了监狱。为了软化永盛同志，敌人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释放出

去，而后让她探监，企图使永盛同志留恋妻儿，留恋人生，产生动摇，供出党的秘密。然而永盛同志却对妻子说："不要哭，把孩子抚养大，告诉孩子，记住这个仇恨。告诉同志们，加紧工作，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敌人的阴谋彻底落空后，杀机毕露。永盛同志虽然面临着随时被杀害的危险，但他想到的首先是同志和战友的安危。他对同牢房的三位被捕的同志说："你们要注意掩护自己。我宁可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也不会暴露任何同志。从我嘴里敌人什么也别想得到。你们出去后，要好好地为党工作，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我死了也含笑九泉了。"

敌人没有从永盛同志嘴里捞到任何口供，还不甘心，继续用各种酷刑，对他进行折磨、摧残。7月的一天，永盛同志，壮烈牺牲于敌人的奉天监狱之中，年仅31岁。

永盛同志可歌可泣的短暂一生和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党、对祖国的赤诚，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形象。永盛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虽死犹生，永远鼓舞我们维护党的崇高威望，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夜　光

——中共吉林特支被捕人员狱中斗争纪实

田昌烈　周建国

夜幕笼罩着松江大地，熠熠的夜光把隐藏在人间的阎王殿——伪吉林高等法院看守所显露出来。

在看守所的一间牢房里，几个疲惫的革命青年正聚集在铁窗前，凭借着射进来的缕缕月光，亲切地阅读着狱中支部创办的刊物——《夜光》。

《夜光》是他们自喻坚持真理，向往光明的象征；是坚持斗争精神的生动写照；是自勉保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圣洁称号的心声。

临危不惧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就连日伪严密控制的吉林省城，各种抗日斗争也异常活跃。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中共满洲省委于1933年4月底，派巡视员张弓到吉林省城部署“红五月”①宣传工作。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中共吉林特支研究决定，于5月6日统一组织全市党团员搞一次抗日秘密宣传活动。同时，油印了《为“五七”、“五九”

① 每年五月包括“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等纪念日，我党习惯称“红五月”。

国耻纪念告吉林同胞》的传单。

5月6日晚7时，全市数十名党团员几乎同时出现在东关、西关和城区的各主要地段，秘密张贴传单。一小时后，特支宣传干事、市一中学生金景和同校学生、团员郭连郊一起上街检查散发传单活动情况。当他俩行至小东门里天主教堂附近，通往松花江岸的胡同时，发现地上有一卷未散发的传单，正要拾起，突然一阵江风把纸卷吹散，飘散的传单被巡逻到此地的警察发现，不由分说，将他俩带到东莱门警察分所。

在警察分所，警察从金景身上搜出未能销毁的传单底稿。此时再作任何辩解也无用了，金景便向在场的警察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我们都是中国人，希望不要自相坑害。"

郭连郊紧跟着说："我们宣传抗日有什么罪？你们把我们抓住送给日本人，就不怕老百姓骂你们吗？"

他们所讲的道理使警察无言以对，有的颇表同情。警察们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理，最后决定以怀疑他们二人散发传单为名押送警察署。

到警察署后，几经审讯，敌人未能从他们身上捞到什么东西。最后，他俩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受审。残酷的刑讯，终于撬开了金景的嘴，他供出了一些同志和"红五月"的行动布署。意外的收获使日本人欢喜若狂，但又对如此严重的"赤患"十分震惊。于是下令全城戒严，纠集全市的军、警、宪、特进行一场疯狂的大搜捕。

5月7日早晨，冯仲云（省委秘书长）和付天飞（团省委巡视员）在李家园子正与李福惠研究金景昨晚失约的情况时，突然接到文光中学教员、共产党员于汉章关于常家椿（一中学生、团员）被捕的报告，冯仲云马上意识到常家椿被捕与昨晚宣传活动有关，立即指示李福惠采取应变措施，迅速组织同志转移。

冯仲云和付天飞急速返回吉林交通站住处①，通知站长邓晓村等人转移。邓妻阎庆莲送走丈夫和同志后，又及时销毁党内材料。不一会儿，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闯进她家，追问邓晓村的去向，阎庆莲面无惧色地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一把从阎庆莲怀里夺过不满周岁的婴儿，恶狠狠地摔在炕上，又抽出战刀，将阎庆莲砍伤后抓走。

李福惠回家处理完文件刚走，宪兵和警察便接踵而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知情况有变的张弓②朝李家走来，被敌人围在院子里的李母见状心急如焚，急中生智，立即挥手示意。张弓看到李母的反常动作，心领神会，及时逃脱。敌人见未能捉到上钩的"大鱼"，就将李母残暴地殴打了一顿。

由于吉林特支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使得满洲省委和吉林特支一些主要领导人如冯仲云、张弓、关芳忱、李士超等脱险，从而保存了党的领导骨干，使敌人一网打尽的企图破产，但仍有20多人被捕入狱。被捕后绝大多数同志以监狱为特殊战场，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血的洗礼

囹圄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接受了死神的威胁、刑具的折磨、叛徒的游说、自我一时困惑的检验，经受了血的洗礼，使其党性得到锻炼，思想得到升华，情操得到陶冶。

在第一轮的审讯中，敌人使用了各种刑具，但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第二轮审讯敌人不得不打出叛徒金景的王牌，妄图以当堂对质来打开缺口。对叛徒金景的出现，同志们既表现了愤

① 交通站位于河南街富裕胡同7号，是中共党员、吉林一中学生邓晓村租的房子。

② 于琫1970年4月回忆材料。

怒，又采取了应付的对词。已暴露党员身分的，只承认身分而不泄露党的机密；没暴露身分的党、团员谎称自己是互济会员或读书会成员，力求缩小目标和线索。敌人没有捞到任何实质的东西草草收场了。

敌人不甘心对质的失败，又把金景放回南屋同案人的牢房里，企图搞渗透游说。大家对金景的叛变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周以佐、冯毓生等人指着金景愤怒地说：你出卖组织和同志是叛变行为，性质是严重的；并警告说，我们党对叛徒处置是严厉的，你要想想自己的严重后果，你必须立即悬崖勒马，不要再扩大招供的范围。叛徒被震慑住了，恐惧、内疚的情感使他无地自容。同时，周以佐、冯毓生还鼓励大家要坚决挺住，宁死不当叛徒。这次斗争揭露了叛徒的嘴脸，制止了叛徒继续为虎作伥，坚定了同志们的斗争信心。

叛徒这张王牌没有奏效，敌人又重新动用失效了的刑具。这次刑讯的重点是冯毓生、郭连郊和王诚忠。敌人首先刑讯年仅17岁的郭连郊，欺他年小，妄图打开突破口。

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布满了各种使人不寒而栗的刑具。刺鼻的血腥气和烧焦的糊味令人恶心。几个凶神大汉瞪着幽灵般的眼睛注视着来人。郭连郊已是第五次被带进这间魔窟，他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疲惫的身体，挺立在魔鬼面前。

居中而坐的主审本间，朝着站立身旁的翻译权人采摆头示意。又高又瘦的权人采走过去，拍拍郭连郊的肩头，挤出少有的强笑，假惺惺地说："你的小孩的，跟着共产党胡闹是要杀头的，你说出同伙，皇军会宽恕你的，让你回家继续读书，前途是大大的好。"

回答他的是沉默。

敌人在逮捕郭连郊时，曾在他的宿舍里搜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装着进步书籍和党的宣传小册子。敌人便问："少先队小册

子是谁的？”

其实，小箱子是同宿舍的另一个同志的。郭为掩护同志就说：“是我的。”

“是你的为什么放到别人的箱子里？”

郭说：“这样会更安全些。”

“谁交给你的？”

郭顺水推舟地说：“是金景。”

“你们同伙是谁？”

“不知道！”

矮胖的曹长小出庚子郎在一旁沉不住气了，挥舞着拳头，擂得桌子山响：“小孩，你的说不说？”

回答他的仍是沉默。

本间知道继续问下去已毫无意义，便把手一挥，立刻扑上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打手，又一次开始了对年轻生命的折磨。

夹指头、压杠子，这些传统刑罚跟往日一样不起作用。他们又将郭连郊的头部按在水管子下面，用一根筷子般长短的铁棍别在他的口中，拧开水笼头，水流就象从水枪里喷出的那样，向他的面部喷射。水顺着口、鼻注入体内。他开始只觉得气喘胸闷，肚子急剧膨胀，继而头昏眼花，胸膛胀痛。接着，一切感觉都消失了。

“哗”一桶凉水将他浇醒，他无力地睁开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又一声不响地闭上了眼睛。

“叭嘎！你的说不说？”胖曹长抽出战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声嘶力竭地嚎叫。接着，用胶皮管子左右开弓，抽打着他的头和脸，他又一次昏迷过去了。

深夜，他被拖回牢房，大家看到他面部被打得紫肿，手指被夹得皮肉分离，都心疼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模糊了敬佩的眼光。过一会，周以佐用激动的语调号召大家向郭连郊学习，做一名坚

强的革命者。

继郭连郊被审讯之后，冯毓生也遭到敌人惨无人道的摧残。敌人从金景嘴里得知他曾是特支组织委员，就追问他特支组织情况。他以现在不担任这个职务为由，与敌人巧妙周旋。敌人岂肯善罢甘休。就给他压杠子、灌凉水，最后竟操起铁钎将他的踝骨打坏了。但他回答敌人的仍然是"不知道！"

敌人的残酷刑讯，同志们都尝过多次了。虽然刑具能够摧残共产党人的身躯，但不能征服他们的意志，反而使他们更坚强。

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

一天夜里，敌看守突然将一个骂不绝口面带伤痕的青年人推进北屋牢房，顿时十几双眼睛都投向这个来路不明的青年人身上。只见他面部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样子真叫人心疼和同情。可他一进牢房，就自称是抗日义勇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同时还大谈抗日救国的道理，摆出坚贞不屈的英雄姿态。

这个陌生青年过早地自我暴露身分和在狱中过激的言辞举动是很不正常的。立刻引起周以佐、冯毓生等人的警觉，马上向难友们使了个眼色，大家很快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不理睬他。这个青年见大家对自己敬而远之，不得不收住话头，又装出关心人的样子向一些人询问案情，早有警惕的人，有的说要休息，有的扭过头去，都不搭理他，他自感无趣，只好找个地方尴尬地呆着。第二天一早，宪兵将这个青年提了出去。这个"不速之客"再也没回来。后来情况证实，这个青年是扮演苦肉计的特务。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残酷的折磨，未卜的后果，使狱中有些人难免产生一时的思想彷徨和消沉，但经过狱中党组织的帮助教育，绝大多数同志很快地坚定、振作起来了。

每当夜幕降临，十几个青年就倦伏着身子依在窗前，遥望天上的繁星，各自想着父母、兄弟、师生、理想、人生、爱情

……

有一天，常家椿怯懦的提出，能不能搞个“假自首”欺骗敌人，出狱后，我们还可照样干革命。这个想法得到一些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们的赞成。当征求关押在对面牢房的党员周以佐、冯毓生等人的意见时，他们感到这种想法很危险，必须立即制止。冯毓生趴在小窗口对吕纹（一中团支部书记）小声而严肃地说：“向敌人自首，不管真假，未经组织批准，都是一种叛变行为，是党铁的纪律所不允许的。”

简短严励的批评，大家既折服又内疚。

冯毓生原是特支负责人之一，在狱中与敌人斗争表现得沉着、坚强，并且年长几岁，是狱中同志的老大哥。因此，大家对他的主张、观点是相信和尊重的。同志们经过认真地思考，认识到“假自首”是错误的。使一些年轻同志受到了一次严肃的纪律教育，摒弃了那种错误念头，毅然决然的站到了党的立场上。

常家椿却还坚持自己的想法。未过两天他又嘀咕说：“即使表现再坚定，出狱后党也不会信任我们，再干也没有前途。”并且还说：“出狱后只好自找出路，只有个人生活有了保证，才能谈得上为社会谋福利。”

针对这种消极观点，在牢房中展开了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讨论。吕纹强调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忘记我们入党时的誓言。那种只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是不配当党员的。眼前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国哪有家，没有民族的解放，怎能有个人的解放……若甘当亡国奴苟安一时，还谈得上什么个人理想幸福！”

有人还说：“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要我们不做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党和同志们是会信任我们的，即使犯了错误，只要改正错误，坚决干革命，经受考验，党组织是欢迎的。”

经过同志间交流和撞击，使坚定的同志更加义无反顾，使彷徨的同志也受到教育和启迪，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念。思想在牢房里有了新的升华，前途在逆境中变得宽广，追求在危难中注入新的动力。

巧妙斗争

1933年6月，吉林警务厅将冯毓生等11人的材料移送吉林地方检察厅。在检察厅审理前后，他们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各种有效的斗争。

当时，冯玉祥、吉鸿昌在察哈尔高举抗日同盟军旗帜，在察哈尔、热河一带与日寇血战，准备进军东北。这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吉林社会各界反日情绪高涨。狱中的同志通过亲友探监得知了这一情况。他们决定利用这有利形势开展合法斗争。他们给吉林省教育厅长荣孟枚写一封"请求营救信"，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营救。信中说警察乱抓无辜，使他们蒙受了不白之冤，还列举了日本宪兵队的种种残酷刑罚，请求教育部门出面营救无辜的学生。

此信通过关系发出后，在吉林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教师相继到看守所探望他们，为他们出谋划策。伪教育厅长迫于社会压力，也不得不表示同情。他们又不失时机地给检察厅写了申诉书，督促检察厅重新审理他们的案子。一些有良心的法官、律师也帮助周旋。吉林律师会会长朱炎免费担任他们的律师，为他们辩护。郭连郊和王家祚的父亲，利用不满18周岁可不在狱内服刑的法律规定，找关系人帮忙更改了户口上的年龄，为他俩出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吉林检察厅在当时社会舆论下，也只好重新审理此案。

吉林地方检察厅开庭调查，重点是金昙、郭连郊两人，关键

是路遇传单还是撒传单。郭连郊与出庭作证的东莱门警察驻分所所长杨青山展开了一场舌战。

检察官问郭："传单是不是你们撒的？"

"不是。"郭连郊坚定地回答。

检察官又问所长："传单是不是他们（指金、郭）撒的？"

"是"。杨青山肯定地答。

郭当即质问："你说是我们，那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撒的？"

杨答："5月6日晚，你们在小东门里撒的。"

郭反驳说："你有什么证据？"

"我亲眼看见你们经过的地方有传单。"

郭连郊马上说："你单凭我们经过的地方有传单就断定是我们干的，那么你也从那里路过，我说传单是你撒的！"

"这……"杨青山对郭的有力回答吱吱吾吾，有苦说不出。因为他当时报案时就亲笔写明传单是从金景、郭连郊路过的地上捡的，如果现在又改口说从他们身上搜出过传单底稿，怕犯包庇罪承担不起。

检察官不耐烦地问："杨警长，你到底看没看见他们撒传单？"

杨象斗败的公鸡，无可奈何地说："没看见。"

检察厅辩论取得关键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捕同志的斗志。

狱中坚定的共产党员都是一颗磁石，只要有机会相遇，就会聚集在一起。郭连郊、王诚忠等人在吉林地方检察厅被审期间，又结识了在哈尔滨盘石被捕的共产党员刘中和、李春元和谭励。经过双方相互考察了解后，刘中和首先向郭连郊等人提出要把狱中的同志重新组织起来，在狱中建立临时支部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他们的赞同。经过一段酝酿，狱中党团临时支部正式成立

了。成员有：刘中和、谭励、李春元、郭连郊、张其义、王诚忠、吕纹等人，刘中和、谭励为负责人。

临时党团支部成立后，秘密组织难友学习革命书籍，提高同志的觉悟。他们先后阅读了《社会发展史纲》、《帝国主义论》和小说《母亲》等书。还组织了互助活动。

由于牢房屋小人多，阴暗潮湿，卫生条件十分恶劣，加之伙食很差，各种疾病不断发生，李春元身上长满疥疮，支部通过亲友从狱外搞药给他治疗。谭励是南方人，由于水土不服，患有严重的痢疾。同志们凑钱为他弄药和补养品，同时支部还指定与谭同住一个监号的王诚忠负责照料他的生活。革命的情谊温暖了同志们的心，鼓舞了同志们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

为了交流思想，启迪向上，临时党团支部秘密创办了一个"微型"刊物。谭励同志为这个在黑暗中诞生的小刊物起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刊名——《夜光》，并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生活在黑暗阴森的牢狱里，大家都向往着光明，但愿这个《夜光》能给难友们一点光明。

《夜光》为64开，不定期出版，每期7～8页，一律为手写，一共出了六期。它便于传递、阅读，便于收藏，适合狱中的特殊环境。

《夜光》编辑形式多样，有散文、诗词、杂文。每期都由编辑郭连郊进行征稿修改。刊物征稿和发放范围限于临时支部成员和部分党、团员和一些爱国难友。刊物通过狱中可靠的杂役苗某进行传递。

《夜光》的内容短小精悍，富有狱中生活特色。有的介绍国内外的形势，使同志们知道狱外斗争情况；有的介绍斗争"炕头"（狱霸）的经验，有的交流狱中生活的感受；有的介绍"打粮"（改善伙食）斗争的经验；有的揭露监狱对"犯人"所谓"反省"教育的阴谋。

《夜光》既富有革命思想内容，又严守不暴露党组织活动情况，因而在语言文字上为含蓄而不激烈。如有一个同志在《夜光》上发表短诗言志：

小鸟何自由，

翩翩自欢欣；

我们，

我们渴望自由身。

短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血气方刚的青年向往自由，冲破牢笼，重新返回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的强烈愿望。

小小的刊物，是监狱中一面斗争的旗帜。临时支部通过她来引导狱中斗争，难友们通过她看到希望和光明。

经过狱中同志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吉林高等法院于1933年9月18日判处郭连郊、朱殿超、王家祚犹豫刑各3年，取保释放；判处金景有期徒刑10年；吕纹、常家椿有期徒刑各8年；张嘉珍、冯毓生、王诚忠、张春融、张其义、于璋有期徒刑各5年。吕纹等九人不服上诉，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吉林法院重新改判冯毓生等六人取保释放。吕纹等三人分别减刑5年、3年。

郭连郊同志出狱后潜往北平，继续投入革命斗争。

大浪淘沙

——记中共奉天特委第二次被破坏及杨一辰等在狱中的斗争

赵清泉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关于红五月运动决议》号召"各级党部在红五月中……彻底转变职工运动，加紧厂内活动，领导工人的斗争与罢工，加紧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①。

奉天特委根据满洲省委的这一精神，曾多次指示本溪特支，要加强扩大党、团组织，成立赤色工会，"尤其是本溪铁厂与华子沟工作，你们最大努力去开辟"②。

本溪特支根据奉天特委的指示，决定在铁厂、熔铁炉和南矿的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出工人小报，散发传单、标语等。

1933年，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运动时，本溪湖特支在煤铁公司两次散发传单，引起了本溪湖警察署的注意。本溪湖警察署同奉天警察署秘密联系，预谋6月18日在本溪举行的满洲建国第二次运动会上逮捕共产党。

运动会期间，本溪湖特支组织委员陈相谷到会场活动，被日伪警察发现，遂将其逮捕。在审讯中，陈相谷惧刑，供出了青年团员杨于典（杨坚白）和本溪特支书记王子明（孙己泰、孙季

① 引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集63页。

② 引自《中共满洲省委文件汇编》第1033页。

周）等人，使王子明在本溪被逮捕。陈相谷怕敌人继续刑讯逼供，于6月19日5时，在监房内上吊自杀。

敌人根据陈的供词，得知杨于典已潜伏奉天。他们又通过杨的胞兄杨于经，查清了杨于典在奉天任职的通信地址和替杨转信人的王毓南。

本溪湖警察署于20日到奉天第一师范学校逮捕杨于典落空后，将王毓南抓获。

6月22日下午3时，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特务带王毓南到奉天小河沿植物园接头处坐守，逮捕了团奉天特委宣传部长王树德。在审讯中，王树德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身分，还供出了团特委书记张柏生和杨于典等人的地址。日警于当日晚在奉天逮捕了张柏生和杨于典等人。

张柏生被捕后，在敌人的刑讯和引诱下，又供出了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刘孟平，即杨一辰。还供出了团特委组织部长田玉清等人及接头地点和暗语。

6月23日下午，敌人出动军警到接头地点——奉天大西关褡裢胡同魏某住处逮捕杨一辰，捕了个空，却意外地逮捕了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王德海（安哲）。不久田玉清也遭逮捕。后经查明，杨一辰于6月22日因叛徒内奸李芳五的出卖，已被沈阳警察厅逮捕。

几天的时间里，敌人先后在本溪、奉天共逮捕我党团员及进步群众38人，中共奉天特委遭到严重的破坏。

1933年10月22日，日本《奉天每日新闻》报道："满洲国沈阳警察厅，根据本溪湖、领警①两署完全不同的线索，从6月22日以来，也对同一系统的共产党开始逮捕。6月22日，早晨6时，在奉天车站逮捕了秘密接头的中共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

---

① 领警，是指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

从本溪湖开始的对中共奉天特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奉天党员的逮捕。参加搜捕的单位从本溪湖署扩大到领事馆警察署和沈阳警察厅。一举捕获38名，一网打尽，以胜利告终。”

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并未因此而吓倒。他们被捕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法庭、监狱的特殊战场上，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敌伪警察厅和日本宪兵队的斗争

沈阳警察厅押犯所，是一端开门的长筒状监舍。监舍的一端设有小便池，屋顶有一个仅能射进一点微弱阳光的小天窗。监舍内是对面通长的板铺，中间有一条只能走一个人的通道。屋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气味难闻。在这里关押的犯人最多达百余人。杨一辰、王德海、王子明、杨于典等共产党员就押在这里。

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被捕后，敌人想从他的口中得到党的机密，对他进行了多次刑讯逼供。1933年6月下旬，沈阳警察厅开始对杨一辰进行严刑审讯。敌人迫不及待地想搞到共产党的情况，单刀直入地问道：

“党徒有多少，都在哪里？”

“党员成千成百，到处都有，我不知道在哪里……”杨一辰铿锵有力地回答。

敌人暴跳如雷，疯狂地吼着：

“那你带我们去抓！”

杨一辰一直想找机会把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去，让其他同志快些隐蔽，免遭连累。他稍一沉思说：

“可以！”

杨一辰被敌人押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挂斗里。当敌人的摩托车队按照杨一辰指引的路线驶到奉天大西门里东北浴新池附近

时，杨一辰从车斗里猛然站起来，用戴手铐的双拳朝警察头上奋力击去，敌警被打翻在地。杨一辰趁机向群众大声疾呼："我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杨一辰，被日本人逮捕了！他们叫我……"话音还没落，敌人就把他强行按在车斗里。但他仍然不停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①。

穷凶极恶的敌人给杨一辰带上"嚼子"，押回沈阳警察厅押犯所。

杨一辰又被提到"特高课"②继续审讯。特务们把他两臂反剪带上手铐，捆绑在椅子上。杨一辰死死地盯着敌人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汉奸、走狗！"

恼羞成怒的韩翻译官，掏出手枪吼叫着："他妈的，再骂，我毙了你！"

杨一辰放声大笑，指着韩翻译官的鼻子说："爬一边去吧！就凭你这哈巴狗敢毙我？甭狗仗人势！你把枪给我，我可敢毙你！"③

韩翻译官无可奈何，只好把枪悄悄地收了起来。

敌人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又轮番给他上大挂、压杠子、灌凉水……

杨一辰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仍不露半点真情，豪迈地说："你们灌吧！大衙门④抓我时用水管子灌，我都不在乎，拿水壶灌算得了什么！"

重刑动摇不了杨一辰的钢铁意志，敌人又采取"疲劳战术"，昼夜不让他休息，杨一辰毅然绝食5天与敌人进行斗争。

---

① 引自杨坚白《一位威武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文。

② 特高课，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专设的特务机构。

③ 引自温建平《峥嵘岁月的怀念》一书126页。

④ 大衙门，在此指日本警察署。

酷刑没有使杨一辰屈服，敌人恶狠狠地说："你这个亡命徒！"杨一辰蔑视地一笑，赋诗道：

法西残暴世间无
文明新刑灌"醍醐"①。
力竭声嘶犹苦斗
赢得荣名亡命徒！

1933年10月22日，奉天《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首魁》，副题《大胆的杨一辰》的报道："满洲国方面所逮捕的党特委书记杨一辰（刘孟平），是当地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即使死也不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如果出卖党的内容，就会使党遭到根本的破坏，过去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因此，为了主义就是被判死刑也心甘情愿。他对于机要事项守口如瓶，实在是胆大包天。"②

沈阳警察厅对杨一辰无计可施，只好把他交给奉天高等法院。

但是，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在向法院的起诉书上写道："杨一辰是共产党的首魁，醉心共产主义，应以无期徒刑。"杨一辰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伪高等法院只判他有期徒刑。

敌人没有从杨一辰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又在王子明身上打主意。

1933年7月上旬一天，敌人把与王子明同案的团本溪特支书记徐殿孚、宣传部长江俊祥、组织部长朱福金、团员宋思尧等人带到刑讯室，强迫他们跪在王子明的面前，抡起皮鞭猛打，逼他们承认王子明是他们的领导人。王子明高声痛骂伪警察"是名副其实的狗崽子。"③伪警察举起棒子，猛击子明的头，王子明立

① 指灌凉水。
② 引自中共沈阳市委党史办《狱中支部的建立及活动》卷之三"敌伪资料"。
③ 引自监狱看守马世清回忆录。

刻昏死过去。

接连两个月，敌人几次对王子明刑讯，逼供，用锥子刺股，用烧红的大铁钳子烙大腿。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1933年10月22日，《奉天每日新闻》刊登了审讯王子明的报道，说王子明"……表现首魁常有的态度，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使审讯感到十分棘手"①。

教育叛徒　团结难友

1933年9月，多数被捕人员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只有杨一辰、王德海、王子明、杨于典等人陆续被移送到奉天地方法院，羁押于奉天地方检查厅看守所即"北来决"。看守所有"孝"、"悌"、"忠"、"信"四个监号。其中信字号是"贵人"或花钱疏通才能住进的优待号。

为了进一步搞清特委被破坏的原因，争取教育一时动摇的同志，杨一辰同王子明、杨于典等人秘密碰头研究，争取集中关押。

1933年10月的一天，杨一辰同1931年底就关押在这里的原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商量说："能否想个办法，把我们被捕的这些人集中在一个监号里，这样便于活动。"赵毅敏沉思一会说："可以试试看。"几天后，赵毅敏找到与他拜过把兄弟的副看守长王惠风说明了情况，王表示同情，答应办好此事。

不久，被捕的主要人员基本上都集中在"悌"字8号监房里了。

王子明在警察厅押犯所时，特意住在长筒房紧靠小便池的位置，每个被捕人员来解手时，他都偷偷地询问怎样被捕的。到

---

① 引自中共沈阳市委党史办《狱中支部的建立及活动》卷之三"敌伪资料"。

"北未决"后，了解调查工作继续进行。有的在放风闲谈时，互相串通情况；有的用粉笔在自己的鞋底儿上写几个字来传递情况。情况基本明了后，杨一辰因势利导，教育有变节和叛变行为的人自我解脱，主动翻供。

一次，自首叛变的张柏生、田玉清、王树德等人为编造口供口角起来。杨一辰严励地批评他们："咬！咬！咱们大家都咬，都咬成无期徒刑，看革命成功后杀谁的头？"①随后又启发大家说："日本当前在伪满对付共产党的办法，看来既不是杀头，也不是象日本国内那样的转向政策，又不是国民党那种或杀头或自首的两手政策，而是刑事判罪的办法。不管你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如何屈膝投降、出卖组织，也还是把你关在监狱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还是自我解脱为好，不要自供、供人，咬住别人不放。"②

张柏生、田玉清、王树德三人懊悔地低下了头，他们痛心疾首地检查说：由于自己贪生怕死，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重大损失。

杨一辰望着他们，提高了声调，十分严肃地说："要用你们的热血来洗清你们的罪恶。今天我告诉你们，或杀敌人，或者被敌人杀，这由你们自己来选择。"③

就这样，张柏生、田玉清、王树德等人，在杨一辰等同志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表示要在法庭上翻供，挽回给党造成的损失。

---

① 引自中共沈阳市委党史办《狱中支部的建立及活动》卷之二，王毓南交待材料。

② 引自杨坚白《我们的狱中斗争和奉天监狱支部》回忆录第6页。

③ 同①。

不久，王子明、王德海、杨于典等先后转到“信”字一号——优待号。

我党被捕同志在同敌人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杨一辰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并通过监狱副看守长王惠风和看守桑玉贵同狱外党员栾芳有①、春日町胡同的山东人张某及兵工厂党员刘清涛等人分别接上了头，并能经常同奉天特委书记夏尚志秘密联系。王惠风和桑玉贵实际上已成为我党的交通员。

在狱内党的核心组织领导下，争取团结难友的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了。帮助难友写呈子，是在狱中教育团结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这项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使共产党（政治犯）的威信越来越高。

“信字一号”是犯人们可以较为随便出入的“犯人办公室”。凡是要写呈子的难友都直接到“信字一号”来找“政治犯”。“政治犯”们通过写各种“呈子”，帮助难友们分析案情，为他们伸张了正义。很多案犯得到了减刑，有的完全翻了案，被释放出狱。他们对“政治犯”感恩不尽，激动地说：“共产党救了我们。”有的难友为表达对政治犯感激之情，还通过看守特意从狱外饭馆买来饭菜，或送来礼物，但都被政治犯婉言谢绝了。

杨一辰、王德海等同志非常注意利用各种机会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如以讲故事的形式给难友们讲解革命道理，组织他们学习进步刊物等。他们又把《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词写在墙上。由王德海偷偷地教唱。

杨一辰有时还写诗言志，勉励难友：

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

---

① 栾芳有（老栾头），中共党员，全家被捕。其儿子虽不是党员，但在地下党的工作下，顶替父亲打官司，使父亲栾芳有出狱。栾芳有在北关八王寺胡同以掌鞋为掩护，设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狱中党员保持联系。

不愿苟且生，但愿壮烈死。
大节有微亏，志士所深耻。
布尔什维克，顽强与坚持。
坚决复坚决，勖哉我同志。①

在“已决监”（南监）的斗争

1934年5月，奉天高等法院以“紊乱国家之结社的叛徒罪”判处杨一辰有期徒刑12年；王德海、王子明有期徒刑6年；杨于典有期徒刑5年，先后在南监服劳役。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当时，奉天监狱的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张学良时期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在监狱里混个差事，养家餬口，维持生活。他们不愿甘当亡国奴，给日寇卖力，对反满抗日的共产党员有同情感。

杨一辰与一些党员骨干分析了敌伪监狱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后，决定尽力争取教育他们为我服务。他们主动接近狱中工作人员，与他们聊天、唠家常、谈兴趣、说爱好。在闲谈当中，发现有人爱听古典小说，杨于典就给他们讲《水浒》中引人入胜的篇章，感染吸引他们。有时，在给看守人员讲的历史故事中，用借古喻今的方法，来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从而潜移默化地向他们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狱中的看守们对这些故事很有兴趣，当时狱中的医生王常泰，解放后在自传中，对这段经历写道：“……我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是混一天算一天的，不考虑为什么给日本人‘服贴’地做牛马呢，认为这是命里注定的。自从接触了这些共产党员，我的思想开了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和真理，开始认识了

---

① 引自杨坚白《一位威武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文。

我们要想幸福地生活着，必须跟着共产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驱逐日寇。另外，使我对共产党更有了正确的认识和了解。”①

经过赵毅敏等人的宣传教育，王常泰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共产党逐步有了认识，并表示愿意为政治犯们做些工作。为此，王常泰利用在监狱当医生的合法身分，先后抽调赵毅敏、廖如愿、王子明、杨于典等共产党人到监狱医务科当杂役。

他们到医务科当杂役后，活动更方便了。除了利用讲故事、唠家常等形式开展工作外，还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当时医务科长李士瀛（李岩）想做一次临床实验，急需译一本日文版的《法医学》。杨于典日文很好，他听说后，就很快帮他翻译出来，并且在王子明协助下，完成了这一项很重要的临床实验，李士瀛非常满意。

后来，李士瀛经组织介绍到张家口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当了军医。解放后，他见到杨于典时说："当年我知道你们在狱中有活动，我参加革命完全是你们影响的结果。"

看守马世卿、勤务员李树久在社会上办了一个冰果店，不大景气，王子明等人听说后，就帮助他们出主意，使他们的生意很快兴隆起来。

由于对敌伪工作人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争取教育工作，与他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对"政治犯"有了同情感，从而为地下党在狱中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

当时，在监狱里犯人只能看一些《圣经》之类的书籍，其他书一律不准看。但这并没有难倒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禁书、禁报"他们仍然照看。王惠风、王常泰、马世卿等都曾在家里给他们代订过《盛京时报》。李树久经常到日本书店买《世界知

① 引自中共沈阳市委党史办《狱中支部的建立及活动》卷之二，王常泰自传。

识》等杂志，偷偷地带到监狱给“政治犯”们看。教务官宋大公以工作之便，为我党被关押人员保存了很多进步书刊。他的办公室成了政治犯的秘密图书馆和阅览室。监狱医务科是狱中党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阵地，他们经常在这里组织难友学习《辩证法》、《反杜林论》、《大众哲学》、《社会科学论》等革命书籍。

杨于典在1983年10月回忆当年我党被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的同志与王惠风、桑玉贵、王常泰等监狱工作人员的关系时说：“这些人和我们的关系好到无话不说的程度。当时他们在刊物上看到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工作很兴旺，李树久、李银波（监狱医务科大夫）就说：‘你们是共产党，我们是人民阵线。’”

由于这样的特殊关系，王惠风、桑玉贵、王常泰、李树久、曹洪祥（监狱医务科听差）等人，实际上已成为狱内和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交通员，王常泰的家成为狱中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狱外党组织给狱中地下党的来信，都先寄到王常泰的家，再由他秘密带入监狱，交给赵毅敏和杨一辰。

1936年春，由于形势进一步紧张，皇宫宪兵队又把杨一辰从监狱提出追查狱中党组织的活动。杨一辰回监狱后，同王子明、杨于典商量决定为保证党组织的安全，暂时停止活动，并放弃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

1938年6月到9月，杨于典、王子明刑满出狱。

杨一辰1940年底身患丹毒病，在“教诲师”宋大公和难友牛平甫的多方努力下，以患重病症的名义办了假释，回到山东金乡老家。

无数先烈和革命前辈，在狱中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坚持信仰　至死不渝

——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张有才狱中斗争纪实

王枫　陈焰

中共奉天特委领导着南至大连，北至铁岭，西到北镇，东到安东等广大地区党的工作。特委机关第二次被破坏后，满洲省委又任命张有才为特委书记，重建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一

1933年7月15日，张有才化妆成商人从哈尔滨奔赴戒备森严、充满白色恐怖的奉天城。先住进奉天属地旅馆，后搬到大西关十字街华振旅馆，几天后，与大连派来的党员李长贵（原名安子章）接上关系后，一起住在会升店。他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不避艰险，忍饥挨饿，为重建和恢复奉天特委在日夜奔波。

奉天特委非常需要干部，这时同店住着一位失业工人张智山，常与张有才等同志谈心，这个人要求进步，有一定爱国思想。张有才指示李长贵抓紧做这个工人的工作，拟吸收其入党。

8月间，李长贵向张有才推荐他的同乡于冀贤（于贵芳）来奉天特委工作。李介绍于是原山东省日照县县委委员，曾于1932年组织过鲁南游击队，后因失利，在上海党中央训练班学习，今年春来大连同党接上关系，目前在野蚕丝厂做工。张有才考虑特委正在用人之际，表示同意于来奉工作。

9月29日于冀贤来到奉天会升店同张有才接上关系。几天来，张有才同李长贵、于冀贤等人多次研究了特委工作，并拟派于在奉天开个成衣店做秘密机关。同时还计划派李长贵到抚顺煤矿，张智山到奉天兵工厂，准备从大连调一名女同志到奉天纱厂工作。这样奉天特委的工作基本得到恢复。

但是，计划尚未实施，于冀贤就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被奉天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于同年10月初即向伪奉天高等法院和奉天宪兵队本部自首叛变。向敌人供出了他到沈后与张有才谈话的全部内容及特委工作计划等重要党内机密。10月18日晚，张有才、李长贵、张智山三人在会升店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二

张有才原名张适、张适斋（曾用名张来顺、张弓），字子良，绰号“黑张”，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朱留乡圈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天资聪明，童年就发奋读书。在昌乐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济南育英中学读书，各科成绩优异，尤以诗词歌赋见长，是当时该校学生中出类拔萃者之一。

张有才在中学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在19至21岁时，曾写过《我对段执政之感想》、《五四纪念之我想》及《农业为兴国之本论》等数篇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面对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景，他忧国忧民，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1926年在育英学校，经教师王翔千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张有才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光辉的革命生涯。

1926年12月，张有才到南京、上海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在上海的一家报馆当过记者。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选送他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一分校）学习。曾参加过保卫

武汉、回击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战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张有才参加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并身负重伤。起义失败后，部队撤到范县进行整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张有才任第三营党代表（营长是郭声镛）。部队在师长叶镛的指挥下向海陆丰转移，途中，与民团数次激战，战斗中张有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他坚信挫折失败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他隐姓埋名，一路乞讨，历尽艰辛，北上找党。先后在林区当过伐木工人，在绥化县四方台镇博文学校当过教员。1930年通过呼海铁路特支代理书记罗烽（洛蚌）找到了杨靖宇，与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1931年10月10日，中共四方台站特支成立，张有才任特支书记。1932年春，他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同梁道静等人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张有才任参谋长。后来与江北游击队合并，由赵尚志等人领导。他先后调任满洲省委巡视员，哈尔滨市道外区区委书记等职。1933年7月，调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

三

张有才被捕后首先关押在城内日本宪兵队拘留所。日寇对他施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过电”等各种酷刑，但张有才咬紧牙关，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巧妙地回答了敌人的多次审讯，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操。在宪兵队将张有才移交给警察厅的《移交材料》上有如下记载：

“张有才对宪兵队数次审讯，从头到尾称说‘不是共产党员’，在精神上准备一死。他说：‘把我杀了罢。’坚守着所谓共产党铁板纪律的秘密。

……

“张有才是为重建已经衰落的奉天特委，而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到奉天特委来的……因此没有同情的余地，故认为有根据《满洲国暂行惩治叛徒法》处以极刑的必要。”

日寇除对张有才施以严刑外，还将叛徒于冀贤带来与他当堂对质，企图迫使张有才屈服，供出更多问题。而张有才却利用于刚到东北，不了解奉天特委这一弱点，与叛徒进行周旋。使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下面是1933年12月25日审讯（对质）笔录摘抄：

问：“于冀贤，你到奉天跟张有才见过几回面？”

答：“我到奉天以后，跟张有才差不多每天都见面。”

问：“张有才是不是共产党特委？”

答：“张有才是共产党特委。”

问：“信是在张有才那搜出来的不是？”

答：“信是在张有才住的会升店搜出来的，在他被捕以后给他寄来的。”

问：“刘凤德（特委机关代号，编者注）是张有才不是呢？”

答：“我不知道他叫刘凤德。”

问：“张有才，你叫刘凤德不？”

答：“我不叫刘凤德。”

问：“谁叫刘凤德呢？”

答：“我不知道谁叫刘凤德。”

问：“这信是哪来的？”

答：“我不知道这信怎么来的。”

问：“你是多咱被抓的？”

答：“我是8月19日（旧历——编者注）被抓的。”

问：“张有才你跟李长贵说无论何人来信全交给你，你就是刘凤德吧？”

答："我从绥化到奉天住会升店就有病了，绥化朋友给我邮钱来，我怕店给领了，我才对李长贵说来信收下交给我，以后来信全是我自己收，哪跟他说那话来。于冀贤是卖友求荣栽赖我是共产党。"

叛徒于冀贤仍不死心，又拉李长贵对张有才进行"劝降"。张有才对李、于二人义正词严地说："于冀贤破坏共产党的规则，把同志的事都向人说了，实在是个坏蛋。你也与于一样都说啦，可是我至死也不能说。我要有出去那天，非把于冀贤杀了不可！"

日本宪兵队得知这个情况后，派军曹角光太审问李长贵："本日你与于、张二人会面时张有才说什么来？"李长贵说："于与我极力劝他自白，可是张有才说至死也不能谈，一定忠于主义，至死不自白。"

日本宪兵队本部绞尽脑汁，一无所得。最后只得以扰乱满洲治安的罪名于1933年11月13日将张有才移送伪奉天警察厅。

张有才在警察厅仍坚持同敌人作斗争，决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同年11月22日夜，警察厅警佐田中秀一审讯张有才的笔录中，有如下记载：

问："你是由哈尔滨到共产党奉天特委来的么？"

答："共产党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要回山东去，才到奉天来了，因病得很厉害不能走动……"

问："于冀贤与李长贵已经陈述，你为什么不陈述共产党的事呢？"

答："我说不知道，依于冀贤与李长贵的陈述处分吧……"

转到奉天高等检察厅后，张有才继续同叛徒于冀贤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在看守所里积极耐心地做李长贵的思想转化工作，教育他叛党是可耻的，是对人民的犯罪。并向他讲：你与于冀贤不同，他是主动自首叛变，你是被逼供的。将李分化出来。因此，李长贵有了觉悟，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表示在实际上立功

蒙罪。同年12月14日，在奉天高等检察厅厅审时，他终于翻供。

问："你跟张有才怎么认得的？"

答："我跟张有才是乡亲。"

……

问："他是共产党不是？"

答："他占（赞）成共产党，大概也就是吧。"

问："他跟你说过共产党的话没？"

答："他没跟我说过共产党的话。"

问："他为什么用你的名字给于冀贤写信？"

答："做买卖。"

问："明之做买卖，暗之是宣传共产主义吧？"

答："就是做买卖。"

同年12月26日，奉天高等检察厅再次审讯时，李长贵又进一步翻供。

问："刘凤德是不是就叫张有才？"

答："我不知道刘凤德叫张有才。"

问："你在宪兵队、警察厅全供了，到本厅怎么否认呢？"

答："我在宪兵队受不了刑罚，不说就打，在警察厅不说也不行。"

……

经奉天宪兵队本部、警察厅、检察厅先后五个来月的刑讯、调查，除叛徒于冀贤供述外，他们没有抓住张有才任何证据。伪奉天检察厅于1934年3月中旬将案子移送奉天高等法院处刑。

同年3月26日在伪奉天高等法院厅审时，张有才对检察官的指控当厅予以了驳斥："把我当作共产党奉天特委，对我施刑12年，我想这是不妥当的。总之，如果有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那固不得已。但是，单凭于冀贤一人的供词就把我当做共产党员，我觉得遗憾。"驳得伪检察官理屈词穷，无话可答，但最后伪奉

天高等法院仍于同年4月2日以"张有才虽然顽迷，但由于智虑浅薄以致犯罪"定"国事犯"罪，强行判处12年徒刑，夺去公民权12年。

四

1934年4月中旬，张有才、李长贵从"北未决"号转入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分在监狱里的印刷厂当排字工。当时，狱中没有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只有杨一辰、王德海（安哲）、孙已泰等原党的领导作为狱内党的负责人，来组织难友们活动。为了与外面党组织取得联系方便才使用"狱支"这个名称。张有才积极参加"狱支"活动，后来也是狱内党的负责人之一。

监狱党组织对狱里医务所大夫及看守的长期争取教育工作，使我们的党员同志孙已泰、杨坚白在那里当上了"杂役"，创造了党内"北未决"及监内各单位联系活动的方便条件。杨一辰、张有才等人也经常以看病为名来医务所进行秘密活动。使监狱的医务所成为同狱内外联系的重地阵地。

在狱中，张有才对党内叛徒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使叛徒在狱中十分孤立，没有市场，狼狈不堪。不敢正视张有才和其他党的领导同志。这样既教育了叛变分子的本人，而且对狱中的难友也是一次鼓舞。

当时狱中生活很苦，"狱支"曾组织发动过几次绝食斗争。张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鼓动大家一定坚持下去，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难友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张有才作为一个革命者，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他在狱中给祖父母的信中写道：

"……家中可安心过日，莫将我事置心。常言：不受折磨不成佛。我再受几年锻炼，将来还会有出息……再者，孙之衣

食，皆不困难，家中不必着急，来信只说家事，别话不必提。”

张有才在狱中经常对难友们进行革命教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一些狱中青年难友识字，为多人写家书，深受难友们的尊敬。抓住监狱几件坏事，发动难友与凶恶的狱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监狱当局感到很恐慌，狱吏们怕他继续煽动“犯人”闹事，1936年秋借机把他转到伪满新京（长春）监狱。

1942年3月初，时逢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张有才遇赦提前出狱。

张有才出狱后在北满数年，历经坎坷到处寻找党，终于在1946年3月初在哈尔滨找到了李兆麟同志，李安排他担任了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1946年3月9日，在李兆麟将军被害的同一天晚上，张有才也被国民党特务暗害，时年41岁。

1957年9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有才为革命烈士。1958年3月6日，山东省昌乐县人民政府在张有才的家乡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

松江监狱的震颤

——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后被捕同志狱中斗争纪实

周淑珍

中共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1936年6月撤销。这期间，满洲省委曾几次遭受敌人破坏，而1934年的破坏，是历次破坏中较为严重的一次。本文介绍的就是满洲省委这次遭受破坏的经过和被捕同志狱中斗争的情况。

“九一八”日寇占沈阳 避锋芒省委迁哈市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后，中共满洲省委曾遭到部分破坏。为了坚持开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2年1月，满洲省委由沈阳转移到哈尔滨。从此哈尔滨就成为我党在东北活动的中心。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哈尔滨。在残暴的敌人面前，哈尔滨人民毫不畏惧，毫不屈服，就在当天夜里，有几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日会员把许多“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各种颜色标语，贴到了全市几条主要大街的楼房墙壁上。第二天，哈市人民看到反日标语，心中无比痛快，而敌人却惊慌失措。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满洲省委不仅组织了声讨日寇侵略罪行的宣传、集会，而且还不断组织人去袭击日军的军用列车和破坏他们的军用设施。

1932年4月12日，党组织获悉，夜间将有一列满载日本关东军多门师团的客货混编军车通过高城子车站。党派赵尚志和范廷桂担负这次炸车任务。为了万无一失，白天他们进行了现场观察，选定了破坏地点。

当夜深人静时，他们便破坏了铁道。午夜里12点40分，一列军车准时开来，突然一声巨响，从机车到机身（共17节车皮，5节客车，其余货车）全部脱轨，滚到路基下面，并发生了爆炸。车上的军火和物质随着爆炸声全部报销，几百名日军无一幸存。

1932年8月，松花江水暴涨，道里、道外全部遭淹，到处一片汪洋，民房倒塌，人民纷纷逃难，5万余人无家可归，啼饥呼寒，其状惨不忍睹。

中共满洲省委发布《告满洲灾民书》，指出：这次水灾“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政府统治的结果”，号召灾民“不还债、不缴房租、地租及一切捐款，要救济金，要免费食堂，要饭吃，要衣穿，要房住！抢日本的军米、日商的米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当时担任哈尔滨东北区（道外）委书记的杨靖宇和西区（道里）区委书记杨德如等，到灾民中开展工作，散发党和反日会印刷的《红旗》和《工人事业报》等进步报刊，进行宣传和慰问，组织道里、道外、南岗等处灾民集会，要求日伪政权妥善安排灾民生活，撤走灾民聚居点的警察和宪兵。

面对已经组织起来的灾民，日伪当局只好答应了灾民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党的基层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满洲省委十分重视哈尔滨工人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经常在三十六棚，老巴夺、电业局（包括电车厂、发电厂两部分）工人

中进行革命教育和抗日宣传，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3年4月2日，伪宪兵王文昌乘车不给钱，打伤了车掌张鸿渔。此事引起了电车工人的极大愤慨。满洲省委负责工人运动的冯仲云、老曹、赵一曼等决定利用这个事件领导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当晚即召开司机车掌大会，到会的有党团员、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100余人。经过宣传鼓动，群情激愤，一致同意罢工。大家连夜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等传单分别贴在全市各个重要角落。向全市人民说明罢工的原因，揭露了宪兵殴打工人的血腥罪行。

敌人很惊恐，派电业局总办亲自出马动员工人出车。工人代表提出了4条复工条件：①肇事祸首要交工人处办；②给伤者恤金50元；③医药费由宪兵队负担；④宪兵要通过报纸公开向工人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罢工两天，市内交通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敌人不得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这次罢工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鼓舞了哈市人民的反满抗日的斗志。

但是，这次事件也暴露了党的组织，引起了敌伪反动当局的警觉。1934年2月，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在第三期非常警戒时期，举行所谓"政治犯大检举"，由于内奸甯成瑞告密，中共哈尔滨电业局党支部书记王成栋（即王知一）等5名党员、6名团员和22名反日会员被逮捕；3月上旬，警察厅特务科又以"赤色嫌疑"在电业局逮捕15人。自此，日伪反动当局拉开了大搜捕的序幕。

大检举日伪逞凶狂
泄机密组织遭破坏

1934年4月初，敌人在哈尔滨逮捕了一个朝鲜人。他与共青

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有联系，被捕后他供出了杨波。4月7日，杨波被捕，杨经不住刑讯又供出了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刘亦被捕，杨波、刘明佛经不住敌人的严厉刑讯，他们又供出了团省委的情况（包括奉天团特委的通讯处和清原团特支的关系）。因刘明佛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从而暴露了满洲省委的机关。

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耀奎因“盗匪”嫌疑，改名王达礼被押在道外监狱。杨、刘的叛变暴露了李耀奎的真实身分，敌人随即将李耀奎由道外监狱提到日本领事馆拘留所，重新审理。因杨波曾到吉东巡视过工作，从而又暴露了吉东局的交通组织和吉东转到台（安）辽（中）方面的党员文甲松。

敌人根据杨波、刘明佛的供述，迅速进行了搜捕准备。从4月7日晚9时开始，在哈尔滨破坏了团省委秘书处，逮捕了团省委秘书周向南、印刷人员胡雅仙、工作干部刘宝琪（被捕后亦叛变）、高德义、李东圃（现名李维新）；破坏了团道外区委，逮捕了区委书记董雨航（又名董振国、董洁夫）；破坏了团道里区委，逮捕了区委书记张晓岩（又名郑继光）；破坏了双城团小组，逮捕了赵文章、贾凤喜、于湘涛；破坏了中共满洲省委的机关，逮捕了徐乃建、宋兰韵等。

敌人在哈尔滨的逮捕告一段落后，令刘明佛、杨波带领日伪警察赴奉天、牡丹江地区破坏党的其他组织。

4月15日，杨波带敌东下，沿滨绥线破坏了吉东局中心交通站，逮捕了负责人杨光庭、苏长德、窦玉山、王德纯、王德明；在珠河逮捕了陈士清。

4月27日，刘明佛带领敌人由哈南下，在长春逮捕了长春特支的林中山等。在奉天，首先破坏了奉天特委的通讯处（南市场诗书里第五巷），当场逮捕了张鸿生，后又以分头在巷口坐等的方式逮捕了奉天临时特委书记杨大聪。杨叛变后，带敌逮捕了满蒙毛织支部的高廷臣、王梦奎，伪靖安军支部的曹林清，电车厂

支部的白广琮及交通关系的介绍人陈凤侯。又通过白广琮在本溪湖歪山村逮捕了白广琮的族兄，奉天特委组织部长白广泽。

5月6日，杨大聪又带敌破坏了清原特别支部，逮捕了特支书记张观（又名张恩荣）及任水若（又名任桂栋）、陈克惠（又名孙锡五）、华方振。同时，在台安逮捕了台辽县委宣传部长文甲松。

根据李耀奎的供述，5月11日，敌人逮捕了王鼎山（又名王铸）、宋兰韵、徐乃建，并导致满洲军委书记彭亭璋和罗锋（又名付乃琦）、胡起（又名胡荣庆）、张玉福等被捕。这次满洲省委被破坏，导致44人被捕，其中在哈尔滨就有10名党员，12名团员被捕，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

陷囹圄斗争不停止
受严刑意志更坚定

被捕同志先是关押在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拘留所里。这个表面上称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外事机构，实则是残酷迫害中国人民的魔窟。拘留所设在能容纳百余人的地下室，凡被捕的我地下党、团员和反日爱国志士，都要在这里被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被捕后许多同志在残酷的刑讯下，坚强不屈，经受了考验。但也有人经不起死的威胁，供出了党的组织，供出了其他同志，成为可耻叛徒。

后来，被捕同志分别被转移，关押在道里、道外监狱。

道外监狱坐落在南14道街，是民国初期建立的。监房分仁、义、礼、智、信五个条型房子，形成扇子形。监房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地面大部分是土地，小部分是砖地。一个屋两个窗户，门上有一个门眼，看守在外面可以监视里面的情况。日寇对中国革命的镇压，使监狱人满为患，犯人染病者很多。当时有一个顺

口溜，形象地反映了监狱的恶劣生活条件："白天坐立无地，夜间转侧艰难；卫生条件极坏，常有病疫传染。"

狭小的牢笼限制了革命者的行动自由，却关不住革命者为人类解放而战斗的决心；严刑拷打摧残了共产党人的皮肉，却动摇不了共产党人推翻旧世界的坚强意志。关押在道外监狱的胡荣庆、张晓岩、王景侠、王铸、高凤鸣、董雨航、陈涤非、程尔康、陈屏章等政治犯，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互相鼓励，虽身陷囹圄，对革命必胜充满了信心。董雨航曾作诗一首，表达了狱中革命者的心情：

黑暗的牢房，关不住阳光。
镣镣铁窗，挡不住共产主义的巨浪。
铁棍木棒扭不转新时代发展的方向。
折大饼子（一种刑罚——编者注），折不倒活金刚。
灌凉水，灌不伤舍身为党的心肠。
坚贞不屈，为党为国争光。
真金不怕火炼，好党员不怕考验。
宁叫一人寒，不叫众人单。
我们今天战斗是为了幸福的明天。
我们誓把奴隶的枷锁挣断。
——禁锢的牢监凿穿，
——敌人的政权打烂，
——誓把乾坤扭转！

在狱中，还有一些被俘的抗日游击队员，他们经常唱一些抗联歌曲，时间长了，狱中的难友也都学会唱了。每当唱起这些歌曲的时候，难友们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激发了斗志。这些富于战斗激情的歌声，冲破牢笼，传向远方，震动了敌人。当时的报纸曾用显著的位置这样描述被捕的共产党人："首脑都均为优秀的赤色斗士，极为顽

强，自供之后尚讴歌共产主义，谓吾军殉于共产主义高尚之牺牲者，身体虽灭而精神不死，有向理想建设猛进之豪语。”

狱中的党、团员不仅把自己的同志团结起来跟敌人斗争，还非常注重对看守和狱中其他犯人进行宣传教育，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狱中的中国看守，多数是张学良时代留用的人员。他们同情犯爱国罪的政治犯，对政治犯的硬骨头精神很敬佩，只有少数人死心塌地地当汉奸。政治犯们对监狱的看守开展了争取、教育、团结工作，很有效果。他们暗中为政治犯做了许多好事，为难友改善狱中生活，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些普通犯人，受政治犯的影响，也积极地参加政治犯组织的狱中活动，有些成为活动的积极分子，出狱后参加了革命，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反虐待绝食为改善
斗叛徒群起而攻之

1935年4月，一部分关押在道外监狱的政治犯，被转送到道里监狱。道里监狱坐落在中央大街北头路西警察街（现友谊路）拐角，狱门向北开，四面围有高墙，墙上设有岗楼和电网，带棒持枪的看守象“鬼魂”一样来回游动。道里监狱戒备森严，一进去就搜身，每个犯人都脱得光光的，检查完后填身分簿，再分别送进监号里去。

牢房里阴暗潮湿，仅在屋顶上方靠外侧的墙下开有两扇钉有铁栏杆的小窗，可以透一点光亮。白天犯人盘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大小便不许出屋，都便在屋角的马桶里，每天由犯人在放风时轮流抬着倒两次。牢房臭气熏人，苍蝇、蚊子、臭虫、跳蚤、在屋里乱飞、乱跳、乱爬。铺和墙都是湿漉漉的，犯人身上常出现脓泡，严重的流浓淌水，皮肉溃烂。

在这里关押的政治犯有张观（即张恩荣）、李耀奎、杨波、宋兰韵、刘宝琪、刘明佛、李维新、姜学文等。后来董雨航、王铸、陈屏章、高凤鸣等也由道外监狱转到这里关押。他们都是1934年满洲省委被破坏时，遭逮捕关押在这里的。一直没有正式判决。

犯人的伙食很差，一日三餐，每人一小铝碗饭和咸菜，一点油水也没有。监狱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很多革命志士病饿而死。一次，狱中送饭的老高头递进几个木槽子，装着又黑又红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饭，上面放了几颗盐粒。难友们一看就够了。董雨航问："两角三分钱的伙食怎么吃这样坏的饭呢？简直连猪伙食都不如。"老高头偷偷地说："你们的伙食费都让大鬼子、二鬼子们贪污了，听说他们分脏不均，还狗咬狗呢！"难友们听了非常气愤。经过商量，觉得与其慢抽零割地拖死，不如团结起来通过斗争求生。为了反虐待，争生存，难友们决定开展绝食斗争。由姜学文、王铸、王景侠、陈屏章、董雨航等人秘密组织了领导绝食的核心小组。

开始，他们利用放风机会，秘密串连，选少数坚定、可靠、机警的难友做骨干，分头活动，逐步扩大绝食队伍。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绝食斗争已经酝酿成熟，时机已到，就趁放风机会在厕所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研究了绝食的具体步骤，提出了复食的条件：一要求早日送法院，有罪判罪，无罪立即释放；二要求允许和家人见面，允许家人送东西，允许和家人通信；三要求改善生活，改善伙食，一周吃一次肉和细粮，洗一次衣服，洗一次澡；四允许看报纸。难友们认为，敌人不会轻易答应这些条件，因此，绝食的时间要长，绝食只是与敌人斗争的手段，而不是真的饿死自己，绝食期间可以喝食盐水，吃糖块，体弱有病的可以偷着吃点东西。一切准备就绪，绝食斗争开始。

早饭时，老高头和往常一样，把盛着和猪食一样的黑高粱米饭的木槽子送进监房，可是，呆了好常时间也没有人去接饭。两天了，难友们都不吃饭，老高头把饭挑进来，又照样挑出去。对犯人的绝食，敌人装聋作哑，漠然视之。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外号"林大头"，对绝食的难友们说："你们不怕饿肚子就随便绝吧。"到了第四天，大家躺在床上了，食盐也不足了。难友们互相鼓励，坚持绝食，斗争到底。普通监号的难友们把饭中的盐粒，亲友送来的食盐和糖，支援给绝食的难友。绝食的第五天，狱方做了面条，动员大家吃饭。"林大头"挥舞着饭勺劝大家："吃点吧，顺顺肠子，不要饿死的吧！"难友们坚决地回答："不答复条件，饿死也不吃！"绝食领导小组的成员随时分析研究敌情的变化，掌握难友的思想动态，鼓励大家保持旺盛的斗志。

同时，他们通过普通犯人的出狱、转押、与亲友会见、通信等渠道，把绝食的消息向社会上广泛传播，积极争取有力的外援。社会各界人士对绝食斗争非常关注，为难友的生命担忧，街谈巷议，奔走相告，造成舆论，难友的家属也纷纷到监狱质问。

绝食第六天，病弱的难友饿得昏迷了，大家喂他们盐水和点心救急。普通监房的难友，不论是俄国人、朝鲜人，还是中国人，纷纷送来盐、糖和点心。监外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也给予了支援。

在这次绝食斗争中，叛徒杨波和刘明佛又进行了一次可鄙的表演。

在绝食斗争的第一天，几个监房的难友都不接饭了，唯有18号监房的杨波、刘明佛无耻地接过了饭槽子。送饭的老高头愤愤地说："人家都齐心不吃了，你们是饿死鬼投生的吗？"其他监房的难友也厉声喊道："叛徒无耻，他们又叛变了！"杨波翻了翻死羊眼珠，喃喃地说："你们班房住够了吗？绝食是要枪毙

的，你们不怕？”和叛徒关在同一监房的高德义气愤地把杨波拉到风眼前，怒斥道："呸，怕死鬼，你这是在替敌人说话。”说完狠狠打了他两个嘴巴。姜学文隔着风眼说："我们绝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的出路，你应该趁此机会改恶从善，立功赎罪。谁再耗子给猫捋胡子——溜须不顾命，就是自己走死胡同！”董雨航也厉声谴责说："绝食胜利了对你们也有利，你们为什么用枪毙来威胁我们呢？你们丧尽了共产党员的品德，难道连一点人味也没有了吗？”

全体坚持绝食斗争的难友，集中火力，群起而攻之，用软的、硬的，又打又拉的办法，终于逼迫叛徒们也参加绝食斗争。

绝食第七天的下午，“林大头”在监房里急得抓耳挠腮，惊惶地说："七天没有饿死，算你们本事大大的，你们的要求，统统的答应，顶好的是快快的吃饭，上面火啦火啦，我的遭罪的有啊！”

敌人被迫答复了条件：在一个月以内把全部案情整理好，过高等法院检查厅，不克扣伙食费，按上面拨款，调剂好伙食；可以洗澡送东西，可读指定的书报。

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领导小组决定复食。

经过医生检查，认为肚子饿了几天，开始只能喝米汤，以后才可以吃饭。正当难友们在监房里秘密欢庆绝食斗争胜利的当晚，两个看守搭一副担架，将杨波抬出去了，原来，复食后，杨波抢人家的高粱米干饭，不要命地吃，一下子撑死了。杨波一死，为革命除了一害，人死无对证，造成了翻供打出去的有利条件。

大闹狱牢笼得脱险
获自由走向新里程

1935年6月，政治犯被提交到伪高等法院检察厅审讯。经过

判决，有几个难友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还有一些难友被判为有期徒刑。被判了刑的难友，被分到道外监狱的工厂做工或干杂活。

在狱中，为了生存就得想办法对付日本人，跟他们斗。难友们在服劳役时采取“磨洋工”，多领料少干活，适时的破坏生产。难友们还经常用多领来的原料，暗中与看守换吃的，好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有时，难友们还把做椅子省下来的棉花和布等材料，送给从游击队来的被俘人员，让他们做褥子，因为他们在哈尔滨无亲无故，很苦。

1937年以后，日寇加紧了对政治犯的迫害，经常有政治犯被拉出去枪决。监狱中党的同志感到与其坐以待毙，莫如越狱暴动，死里逃生。于是，越狱暴动的准备工作在无声无息中紧张地进行着。王景侠、胡起、张晓岩与王平、石风鸣，尹凤田、高金荣、蔡森、王连儒、曹锡九等人秘密地组织着力量。

越狱斗争从1938年3月开始酝酿。狱中的党团员秘密串连，团结了一批越狱斗争的积极分子，制定了越狱计划。越狱行动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切断电话，夺取敌人的武器，掩护难友越狱；另一个小组负责消灭敌人岗哨，打开监狱大门，放出被关押的难友。

越狱前，在江边码头上卸煤的难友，注意观察了监狱外面的情况，绘制了监狱周围街道的地形草图，提供给狱中的难友。6月3日晚，四名难友（经狱中党员发动，愿意参加越狱的包金和、王鸿业、艾福常、张××）乘在洋裁工场加班的时机，提前采取了行动。他们砍倒一名看守，得到一支枪，直奔戒护科准备抢夺敌人的武器。这时，在洋裁工场干活的难友，一齐冲出洋裁工场的大门。监狱里的日本人吓得张皇失措，四处躲避，口里不住地喊：“梯子的拿来，梯子的拿来！”准备越墙逃窜。由于越狱行动没有按原计划进行，电话没被切断，武器库没有打开，宪

兵、警察闻讯赶来，夺到手的枪支由于子弹与枪型不对号，不能进行反击，没有逃脱的难友又被赶回牢房。

这次越狱，有8名难友脱离了虎口，获得了自由。他们是：石风鸣、王连儒、曹锡九、王志清、李春华、高金荣、张××和尹春田。其中石风鸣、尹春田、张××是我党同志。他们脱险后，立即和组织取得了联系，又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里程。

一腔热血献中华

——记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就义前后

赵清泉

一

辽东山地，战火纷飞。

邓铁梅①率领“东北民众自卫军”万余健儿，驰骋在千里辽东。“灭暴日，铲除敌寇。”②

1931年8月23日，自卫军攻克凤城，不久，又轻取庄河。

1932年1月至8月，自卫军进行近百次大小战斗，大战黄花甸，袭击岫岩城，占领黄土坎，三打大孤山……

1932年9月，自卫军血战洋河，歼敌两千多人。

1932年12月，自卫军猛攻文家街，打死日军70余人。

气急败坏的日伪统治者，对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根据地——“辽东三角地带”进行了残酷的军事大讨伐。

从1932年11月底到1934年3月，敌人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扫荡。他们到处设卡，反复搜山，在自卫军经常出没的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军事行动的同时，敌人又强制推行“保甲制”、“连坐法”，企图断绝自卫军与人民的联系。

---

① 邓铁梅，原名古儒，字铁梅，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县磨峪邓家村。

② 见自卫军布告。

敌人的四次“讨伐”后，邓铁梅的自卫军仅剩下五六百人。

但是，他们仍在顽强地战斗。

奉天伪警备司令部向驻凤城警备第二旅悬赏：捉到邓铁梅者，赏“国币”两万元。

二

驻凤城伪警备二旅旅长赫慕侠，将捕捉邓铁梅的任务交给了驻大营子地区的伪营长郑希贤。

郑希贤是只狡猾的狐狸。他手中有个大钓饵——邓铁梅的妻子张玉姝①。他知道邓铁梅与张玉姝结婚才一年多，而且感情很好。只要不让张玉姝离开大营子，邓铁梅就会来营救，就有机会抓到邓铁梅。

郑希贤又通过大营子的两个头面人物王子久和徐辅廷，买通了邓铁梅的朋友，劣绅宁善一和邓铁梅的亲信、民众自卫队学生大队的大队长沈廷辅。

郑希贤向他们宣布：如果抓住邓铁梅，赏1万元②。

沈廷辅秘密投降了。他又勾结自己的本家沈廷栋、沈吉昌、沈廷相、沈吉富、沈吉春、沈信武，与宁善一一起，组成了八人便衣队，暗中监视邓铁梅的行踪，伺机下手。

“七沈一宁”③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4年5月末，民众自卫军的苗可秀部远下庄河，邓铁梅的

---

① 张玉姝，(1910～1934)凤城县庙岭人。1932年冬与邓铁梅结婚。1934年农历元宵节，为掩护邓铁梅而被捕。

② 另1万元被郑希贤独吞。

③ 后来有顺口溜：“七沈一宁，出卖老邓。”

卫队奉命北上，另两支部队也远离大营子地区。对邓铁梅的安全警卫工作，直接由沈廷辅的学生大队负责。

当时，邓铁梅因病正在头道干沟的小蔡沟他岳母家养病①。

急不可耐的“七沈一宁”瞅准了这个机会。

5月29日深夜，八个鬼祟的黑影包围了邓铁梅的岳母家。沈廷辅敲开了房门。

邓铁梅被捕了。

三

1934年6月上旬，邓铁梅被押解到奉天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开始，敌人企图软化邓铁梅。

在“特监号”里，敌人特意为邓铁梅安排了一套舒适的住处，并且给予一定范围的活动自由。敌人的一些高级官员常来“躬身谒拜”，并送来礼物。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芷山，军法处长王冠英，都给他送来了好吃好喝的东西，甚至送来了大烟土。但都遭到邓铁梅的拒绝。

一天，来了一个日本军官，企图用花言巧语劝说邓铁梅投降。邓铁梅义正词严地说道：

“白墙上不能划黑道，粉墙上不能沾黑点，我绝不会投降！”

那鬼子军官还要说什么，邓铁梅打断他：

“吾但知有汉，不知有日满，请勿再饶舌相烦。倘不住口，三尺之地，吾有权逐汝也！”

那个鬼子讨了个没趣，悻悻而去。

---

① 一说是邓为了等人，准备组建手枪队。

为了拉拢邓铁梅，敌人又找到了一些邓铁梅的老朋友来劝降。这些老朋友中，有一些是爱国人士。他们一面假装劝降，一面说些“双关语”。一个老朋友对他说：

“你活了多少年，还能活多少年……”

邓铁梅心里明白，这是暗示他不要为了多活几年就当汉奸。

还有的朋友说：

“一个人可以流芳百世，也可以遗臭万年，一念之差，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邓铁梅对什么是“流芳”，什么是“遗臭”，更是心明如镜。

劝降反而更坚定了邓铁梅的意志。

邓铁梅对真来劝降的老朋友和伪军政人员，除陈述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外，还劝说他们要有民族气节，能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希望他们不要当汉奸，不要祸国殃民，把有些伪军政人员说得无地自容。

如果是日本官员来劝降，邓铁梅则以有病为借口拒绝谈话，或大骂“日贼”。在刚刚入狱时，邓铁梅曾多次以绝食来抗议日寇的侵略行径。

铁骨铮铮的邓铁梅，身陷囹圄，不忘国难。他满怀忧愤地浮想历代民族英雄，百事索怀，不胜感慨。经常吟唱岳飞的《满江红》，气得日本人让他唱伪《满洲国歌》。他凛然回答：

“我不会唱！”

一次，日寇让他给部下写“招降信”，他大笔一挥，写下了文天祥的《正气歌》。

软化不行，劝降不行，敌人又换了招数。他们把张玉姝押来，让她和邓铁梅住在一起，并把张玉姝的母亲也“接到”奉天，企图用温情来动摇邓铁梅的意志。敌人自以为得计。家人团聚，夫妻情爱，难道不是人生最值得留恋的东西吗？

敌人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邓铁梅和张玉姝互相鼓励，决心要与敌人斗争到底。张玉姝对邓铁梅说：

“我决不做民族的叛徒，愿和你共生死！”

邓铁梅对岳母说：

“岳母，你对我太好了，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忘你对我的好处……”

邓铁梅已经下了以身殉国的决心。

伪“一军顾庶第七号”记载：“邓铁梅现在的心情及感想：他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之望更重于求生……”

虚伪的客套过去了，软招子不行了，敌人开始对邓铁梅进行严刑审讯。

四

对邓铁梅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匪首”，敌人的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队临时组成了一个特别审查小组，由这个组负责审讯。

邓铁梅昂然走向法庭。

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答：和家人久断音信，不知住在什么地方。

问：你为什么要反满抗日？

答：因为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反满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给我判什么罪，随你们。

问：你有多大力量，竟敢反抗日本这样强大的国家？

答：我只是尽自己的责任。可是我有信心，因为我们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是绝不会被你们消灭的。

问：要知道，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答：我现在虽然被叛徒出卖，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头可断，血可流，救国之志不可夺。

问：如果你能幡然悔悟，新国家（指伪满洲国，下同——编者）不但能饶恕你，还能给你安置一个重要职位。

答：日寇来侵略中国，中国没有去侵略日本。反满抗日，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责任。我们的祖国遭受侵略，我起来反抗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承认我有罪。真正有罪的人不是我邓铁梅，而是你们侵略者和帮凶！

问：你现在是否可以通知你的部下，接受招安，共同为新国家效力呢？

答：这是妄想！你们可以杀掉我，但我绝不能给我的部队下这样的命令。

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敌人的拉拢、引诱、威胁、审讯等一系列手段都失败了。

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了——死！

对此，邓铁梅早有准备。

审讯后不久，一个日本军官来找邓铁梅，并声明不谈政治，只请"邓先生"在折扇上题字留念。邓铁梅扫他一眼，从容地接过扇子，不假思索地写起来。

日本军官凑到邓铁梅身边，说：

"你们也有皇帝，我们不是侵略你们，我们日本也保护你们的皇帝……"

"你别来这套！"邓铁梅将毛笔一掷，断言喝道，"事到如今，我活，将与草木同休；死，可与古人并存。我宁愿死，绝不贪生！"

那个日本军官拿起折扇，只见上面写着：

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①

---

① 在各有关文章及资料中，此句略有出入，分别为："五尺之躯"、"不足惜"、"何时收"。最大出入者为《伪满洲国史》所载："七尺躯何足惜哉，四省土几时收复？"

五

敌人果然对邓铁梅下了毒手。

1934年9月27日，关押邓铁梅的奉天伪陆军监狱，从狱吏到门岗，都换成了全副武装的日本人。

28日夜，邓铁梅被秘密处死于狱中。

同日，邓铁梅的妻子张玉姝被活埋在浑河沿。

为掩人耳目，伪《大同日报》于9月30日发表了一条假消息：

“匪首于本月28日午前5时30分于军法处住居内，染患急性肺炎，当即毙命……”

关于邓铁梅的死，传说很多。有的说是电刑电死的，有的说是叫洋狗咬死的，有的说是活埋的。据直接参与谋害邓铁梅的赫慕侠于解放后交待，是敌人用毒药毒死的。

那年，邓铁梅43岁。

为挽救民族之危，邓铁梅坚持了三年的艰苦斗争，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就在邓铁梅牺牲后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中称邓铁梅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本文根据《丹东史志》连载的《我所知道的邓铁梅》〈孙永泉著〉、《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一集中《民族英雄邓铁梅》〈陈广荣撰〉以及丹东市史志办公室提供的有关材料整理编写）

哪管花落水流红

——记王铸在狱中的斗争

张福山

日伪时期在哈尔滨监狱难友中，传颂着“王教头痛打狱霸”的故事。这位“王教头”不是别人，正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干事王铸同志。他是1934年4月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时被捕入狱的，1937年11月牺牲在狱中。

教书办报　总为革命奔波

王铸字昆山，又名王鼎山，笔名铁魂。1901年3月1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大白庙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在校读书时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进步活动。1929年冬于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原，致力于普及教育工作。1930年担任开原县教育局视学委员，后因组织三百名教师员工反对当局拖欠工资而被撤职。

1931年10月，王铸携带全家来到哈尔滨，经同乡吴雅泉、安希伯介绍到《哈尔滨新报》社工作。《哈尔滨新报》是中共北满特委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公开报纸，报社编辑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同年11月经安希伯介绍，王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铸一家六口，除妻子秦可新外，还有四个女儿。为了不给

组织增加负担，他在东省特别区立第二中学谋得一个教国文课的职务，白天教书，下班后便去报社工作。1932年2月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哈尔滨。根据上级决定，《哈尔滨新报》停刊，报社里的共产党员陆续改赴新的岗位。王铸被省委派往牡丹江、穆棱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入冬时又被调回哈尔滨，分配到满洲省委宣传部工作。为了便于掩护，王铸又去二中教书，利用学校课堂这个阵地，经常向学生宣传反满抗日，启发学生们的革命觉悟，很快在二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和反日会员，正式建立了二中党团支部。王铸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党团组织领导下，许多爱国学生投笔从戎，离开学校奔赴抗日游击区，参加了抗日武装队伍。

营救同志　不幸被捕入狱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由于党中央与东北党的联系不便，党的经费出现了困难。王铸有职业，他把自己的工资计划使用，留一小部分维持家庭生活，剩余的全部交给党组织。当时与王铸有工作联系的同志都得到过他的接济。他的家也成为党的机关或临时安排住宿的地方。

1933年10月30日，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李耀奎去道里十三道街绣湘花店接关系时，因使用暗号不当引起店主人的怀疑，遂即报告警察，李耀奎当即被逮捕。李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土匪，名叫王达礼。最后敌人就以土匪罪判处他1年零6个月徒刑，关押在吉林第三监狱。

省委掌握到李耀奎被捕判刑的情况后，决定设法营救他出狱。党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王铸去办。

旧社会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所谓营救，就是用钱打通关节。当时党组织经费很困难，没有钱，全靠

王铸去筹集。为了营救李耀奎，王铸除了把自己的薪水都用上外，还借了几十元的债。经过多方求人，基本打通了关节，吉林监狱典狱长单作善答应很快就放人。王铸利用亲属探监的机会，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李耀奎，让他耐心等待一时，不久就可释放。

正当李耀奎就要释放的时候，1934年4月初，共青团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团省委宣传委员杨波、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胡彬）相继被捕，他们经不起敌人的严刑，供出了在狱中的王达礼就是省委代理书记李耀奎。为此，敌人推翻李耀奎的土匪案，由狱中提出送交伪哈尔滨警察厅重新审理。因王铸在出面营救李耀奎活动中暴露了自己，省委大破坏也牵连到他。

5月11日，王铸正带领学生在道外南马路小学实习时，道外日本宪兵队出动摩托车、警车，将南马路小学校团团围住，王铸同志当场被捕。

王铸被捕后关押在道外日本宪兵队，第二天又转押到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

面对酷刑　更显英雄本色

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设在南岗区义州街27号（今花园小学校址），它是1907年2月设立的。馆内设有警察署特高系和可容纳百余人的地下拘留所，并豢养了数十名日本特务和便衣警察。“九一八”事变后，该领事馆地下拘留所成了拘押我反满抗日志士的魔窟。在王铸没进来之前，这里关押了十几名党、团员和反日会员，他们都是这次满洲省委遭破坏时被捕的。王铸在牢房里看到许多同志受刑时被打得遍体鳞伤，从心里产生了对敌人的愤恨，并做好了接受严刑拷打的思想准备。

在王铸被押进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当天晚上，敌人便急不可待地把他从牢房里提出来，送进了刑讯室进行审问。刑讯室也

在地下室，一进来就使人产生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整个房间除有一张审讯犯人用的桌子外，其余地方都布满了刑具。屋子东面放了一条凳子，是专门灌凉水、灌辣椒水用的；西面是上大挂的地方，墙上镶着滑轮和绳索；南面的一侧放着皮鞭、杠子、竹签子、滚地笼等刑具；另一侧有一个火炉，插着烧红的烙具。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迫害政治犯，有多少革命志士在他们的刑讯下被折磨致死、致残。满洲省委的这次被破坏，是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特高系主任花岛浅吉一手策划的，每次审讯当然也少不了他。审讯开始，花岛浅吉问：

"你叫什么名字！"

"王铸。"

"你在共产党里担任什么职务？"

"我是二中教员，不知道什么共产党，更谈不上担任职务。"

"说出你的同党！"

"我是教员，没有什么同党。"

敌人暴跳如雷，立即命令特务上刑。王铸被绑在长凳子上，敌人给他灌凉水。王铸被灌得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后敌人又审问。王铸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他咬紧牙关，坚不吐实。在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的牢房里，他被关押了6天，敌人审问他10余次，灌凉水、灌辣椒水、上大挂、烙铁烫等刑法都用上了，在淫威面前王铸总是用"不知道！""没有！""不认识！"回答敌人。王铸被打得遍体鳞伤。

敌人一无所得，束手无策，只好把他转押到道里监狱。

严惩狱霸　受到难友尊敬

道里监狱坐落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央大街北端，原名叫东省特

别区监狱。它是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时建立的，主要关押俄国犯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后，为镇压中国人民反抗，大肆逮捕所谓“国事犯”，造成哈尔滨其他监狱暴满。因此，日伪当局不得不把被捕的部分反满抗日志士送到道里监狱关押，并把监狱改名为哈尔滨监狱。此后这里便成了既有俄国犯人，又有中国犯人、朝鲜犯人的混杂监狱。这里经常发生俄国犯人称霸欺负中国犯人的事。

王铸住的是大号牢房，房里共关押20余人。由于人多拥挤，每个犯人只有很狭小的地方容身。大小便不得出屋，在屋角处放了一个便桶，先来的住里边，后来的只得靠近便桶，那气味使人难以承受。这个牢房里住着六七个俄国犯人，为首的是一个外号叫“狗熊”的家伙，因杀人被判无期徒刑。这家伙仗着身大腰粗，在犯人中称王称霸，经常欺负同室难友。一天傍晚，难友们刚躺下睡觉，他却走到便桶处撒尿，故意将尿撒在旁边睡觉的一个中国犯人身上。那个中国犯人说了他几句，“狗熊”便大打出手。那个中国犯人被打得鼻嘴出血。王铸见“狗熊”如此猖狂，非常气愤。他大喝一声：“住手！”随即站起身来上前制止。“狗熊”乃为狱中一霸，平时连看守都不放在眼里，他见王铸竟敢顶他，于是直奔王铸而来。牢房里难友都为王铸捏了一把汗，因为王铸的身体、个头都比“狗熊”差，特别是王铸又刚刚受刑不久，身上的伤还没痊愈。可王铸的精神饱满，沉着冷静。“狗熊”举手冲着王铸就打，王铸抬手去挡，两人立即扭打起来。“狗熊”拳打脚踢，王铸拳脚相加，针锋相对。开始“狗熊”挺猛，可渐渐地支持不住了。只见王铸左一拳右一拳把“狗熊”打得东倒西歪，最后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王铸一脚踏在“狗熊”的身上，警告他以后不许欺负人。此时“狗熊”早已变成丧家之犬，爬在地上连连求饶。发誓决不再打人。

王铸为什么能制服狱霸狗熊呢？原来他从小练得一身武功，

平时练武是为了健身，到哈尔滨后整天忙于教书和从事革命活动，从未显露过，如今却在狱中有了用武之地。王铸严惩了作恶多端的白俄狱霸，也警告了在狱中随意欺负中国犯人的其他白俄坏人。王铸坚持正义，打抱不平，英气动人，在狱中受到难友们的敬佩。一些政治犯为了对付坏人和锻炼身体，以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纷纷向王铸拜师学习武术。王铸也热心施教，大家称王铸为“王教头”。

为了大众　愿把牢底坐穿

王铸在道里监狱逐渐了解到，1934年4月满洲省委大破坏中被逮捕的人达三四十人，最后都集中关押在这所监狱里，而且大部分都没判决。同时他还了解到这都是叛徒刘明佛、杨波等人供出来的。王铸对这两个叛徒十分痛恨，曾组织狱中同志同他们展开斗争。对一些有轻微变节行为的人，他则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争取他们翻供。有一个叫刘宝琪的共青团员，原是二中王铸的学生，被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供出了道外团区委书记董雨航，导致了董雨航被敌人逮捕。当时正好刘宝琪和王铸关在一个牢房里。王铸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使刘宝琪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提出翻供，使敌人无法为董雨航定罪，最后不得不将董雨航无罪释放。

王铸在狱中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在道里监狱，针对敌人尚未判决的机会，一方面教大家习武学文，另一方面教育难友要挺刑拒供，争取早日出狱继续革命。一天，他在牢房里作了一首《狱中快乐歌》，唱给难友们听。其歌为：

“满怀喜气，全般快乐，这里不与世间同，不要奇异妖艳的花朵，乐在个个心中。碰碰球，球儿好，似转动；逗逗草，草青

青，谁能占上风？今日说，明日玩，玩也无始终。哪管花落水流红，大家都在笑语中。”

这首歌，很快在狱中传唱，对难友们鼓舞很大。

在狱中，王铸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没有向敌人低头。为改善狱中的恶劣条件，争取早日通过法院判决，他曾与难友们一起展开了绝食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最后迫使当局不得不重新审判，有许多同志因找不到证据获得释放（而王铸却被敌人判处5年徒刑）。董雨航就是这次无罪释放的一个，临出狱时，王铸告诉他：“出狱后要设法找党组织接关系，然后去抗联或关内，继续做好革命工作。”董雨航安慰他说：“老师，你要保重身体，坚持刑满出狱后再为革命出力。”

王铸被判刑后不久，即被转到哈尔滨道外监狱。这座监狱关押的都是已决犯人，每天到工厂做繁重的劳动。由于监狱条件恶劣，加上饥寒劳累交迫，王铸在狱中染上了肺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不断恶化。狱中的难友对王铸十分关心，大家千方百计照顾他，为他到处弄药，甚至委托看守弄来了乌龟血给他喝。这些都未能挽回他的生命，他终于在1937年11月1日病逝，时年36岁。

王铸被捕后，他的哥哥专程来哈尔滨，将他的妻子和女儿接回原籍。王铸病重时，组织捎信给他的妻子秦可新。秦可新立即赶来探望，夫妻见面仅八个小时，王铸就与世长辞了。临终时王铸嘱咐妻子说：“要记住我是怎么死的，孩子要靠劳动吃饭，将来找共产党，继承我的革命道路。”

王铸逝世后，葬在南岗极乐寺墓地。解放后移至哈尔滨烈士陵园，每年草绿花红时，都有少先队员为他扫墓。

抗日不怕死　怕死不抗日

——记辽宁抗日英雄苗可秀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事迹

张作岫

投笔从戎

苗可秀（1906～1935）字景墨，号而农。出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1928年转入本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到北平后的第三天，他便找有志向的同学商议，筹建学生军，准备打回家乡，驱逐日寇。响应者一百余人。

9月末的一天晚上，同学们齐聚刑部大街江西会馆，举行学生军成立典礼。同学们面对惨白的秋月，思念起失去的家乡，不禁放声痛哭，苗可秀擦干眼泪，昂起头，坚定地说：“我们学生军，是中国青年的先锋，完全有能力自治自谋，训练军操，勇往直前，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打回老家去！”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此后便投入了军政训练。

当年12月，全体学生军参加东北民众赴南京请愿团，乘火车南下，到南京要求国府对日宣战，收复东北。下车后，国府派人严加监视，东北学生们吃了“闭门羹”，听了“依靠国联”的老调。学生们的抗日热情，如遇冷水浇头。这反而使东北学生军的头脑都清醒了，他们终于明白了蒋介石政府靠不得。苗可秀慷慨陈词：“收复东北，东北人应做先锋，吾人愿与全国同胞同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强盗，保持世界和平。”

1932年3月，东北学生军首批50多人，分别回到东北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战斗。苗可秀受驻北平的“东北民众救国会”的派遣，作为东北大学生参与抗战第一人，他巧妙地躲开了日本特务的监视，秘密地来到辽宁东部山区，参加了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第28路军，任总参议，帮助邓铁梅建军、整军，建立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队伍发展到万余人。

1933年夏，为发挥青少年在抗战中的骨干突击作用，他集结各部义勇军中的优秀青年，组建了“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任司令，赵同任参谋长，基本队伍共500余人。他们的行动口号是：“爱护老百姓，唤醒伪国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少年铁血军成立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打了一些胜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5年6月12日夜，苗可秀率铁血军60多人，行军到羊角沟（今岫岩县岭沟乡孤家子村境内）宿营，被特务告密，敌军分两路连夜赶来“围剿”。13日拂晓，敌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山头、道口。苗可秀为掩护部队迅速突围，被敌人的炮弹碎片击中臀部，负了重伤。战友们抬着苗司令转移到凤城县碑碣岭的教师朱运斌家中养伤。6月21日晨，因叛徒告密，苗可秀被敌军捕住，当日，就被押送到凤城县铁路附属地日本警察署。

狱　中

当地日伪军警头目听到苗可秀被俘，高兴异常，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都争着来看苗可秀，就连伪县长董毓基和新上任不久的日本人县参事官渊田正三也来到了苗可秀的牢房。

苗可秀见到这些家伙，怒不可遏，他忍着伤痛扶枕起身，厉声喊道：“我就是苗可秀！我就是专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

走狗的苗可秀！”这一正义的声音，弄得敌人狼狈不堪，面面相觑。

自恃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日本人渊田参事官，想要挽回面子，劝苗可秀投降，躬着腰斯文地说："我们是不忍你们东北民众呻吟在自已的政权之下，辛辛苦苦来替你们求解放，替你们争自由，你们不来谢我们，反而要打倒我们，你也太没情感了！”

苗可秀竖起眉，气愤地说："你们是吃人如麻的饿鬼！你们是贪得无厌的猪狗！你们要灭绝我们的生路，糟蹋我们的人格，还假装面目来欺骗我们，诱惑我们，请问自由在哪里？解放在何时？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不过是满目凄凉的景象罢了，只恨我太无能力，不幸被你们俘虏了！”

日本警察署长田上乾吉在一旁见顶头上司——县长和参事官处境很尴尬，于是接上话茬，问道："你们由北平一共来了多少人？”

苗答："四五十人。”

田上接着说："这些人都以你为领袖，你现在既然被捕，他们量也无能为力了……”

田上的话还未落音，苗可秀便义正辞严、信心十足地说："什么话！我们那些人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各个都有做领袖的资格，不过因为我的年龄较大，所以我先做了几天领袖，你现在虽然把我捉住了，他们还一样的打你们，也许更厉害呢！”一番话说得田上署长无言以对。

一个伪官吏奸笑着问苗可秀："你上几年山了？”

苗可秀大怒，斥道："你是什么东西？是人是鬼？我全分不清楚！你不配和中国人谈话，赶快滚出去！我天天在山上走，同时，天天在地上走呢，不象你们这些狗腿子，天天在日本人的胯下走！”

日本参事官渊田正三，虽然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但却

很狡猾。他见众伪官、伪军警官员个个都很尴尬，为缓解一下气氛说：“你们都出去！让苗司令好好养伤！”同时又让日军老翻译前山给另找一间较洁净的监室，好好地“招待”苗司令。

嗣后，日军政要人屡屡来找苗可秀，百般设法劝其投降，并给他制作了一套中将军服，要任命他为某地区的警备司令官。苗可秀一身正气，劝降、高官厚禄都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

日军老翻译前山，对苗可秀的英雄行为十分敬佩，殷勤地照顾他的一日三餐，常买些菜肴和点心给苗可秀补养身子，使苗可秀的伤势有了好转。

日伪当局对苗可秀并未死心，日伪军政官员反复地对苗可秀说：“你快投降吧！不然你的性命就难保了，如果你肯应允我们的要求，那你还有一线生机，同时，那高官厚禄，是你一生用之不尽的。”

苗可秀坚定地说：“我愿意死，死是我最后的归宿。”

日军老翻译前山和守护士兵，连日听到军政官长和苗将军的对话，深深感到中国人不可侮，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日本军政官员见苗可秀志不可移，知无可挽回，遂密议于7月25日处死苗。事情被日军老翻译前山和守护士兵听到，他们含泪对苗可秀说：“我们太无能了，不能救你了。我们是不忍心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你身后的事，赶快预备，我们都能给你办到的。”

苗可秀知死期已近，就向老翻译要来纸笔。7月23日深夜，他忍着伤痛，写了两封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遗书。一封是写给流落在关内的东北大学的老师和抗日爱国人士王卓然、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车向忱的，信中表述了他抗日到底的爱国之心，并请求代为寻找流离失散的妻子和6岁小儿，给儿取名为苗抗生，请老师劳心代为培育。最后说，“生自入狱以来，心地坦然之至，此境殊不易做到，生不知由何修养得来也。古语谓：慷慨

就死易，从容赴义难，生观之两皆易易耳。”

另一封信是写给正在抗日前线的同学张雅轩（即张金辉）、宋忱（即宋黎）的，信中致语好友：“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每当休假日，弟等千万要到此一游，每到此处要三呼老苗，我之孤魂其可以不寂寞也。山吟水啸，鸟语出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为矣……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做事不可因为一次的危险，便退缩。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不过我们的希望务须正大而已。”为了答谢日军老翻译前山和守护士兵多日照顾，应他们的请求，苗可秀写了两幅字赠给他们。给翻译前山写的是“正气千秋”，给守护士兵写的是“誓扫倭奴不顾身”。老翻译和士兵当即表示谢意，要珍藏永志。

就　义

1935年7月25日上午，日本警察署楼前，一队队鬼子兵，扛着机枪，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惊慌慌地冲到街上巡逻。霎时，这个仅有三千人口的集镇，被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全街仅有的十几辆马车，也被特务们征到警察署门前备用。

10点多钟，从警察署里走出几个警察和特务，陪伴着一群垂头丧气、戴黑袖标的男女老少。他们是被抗日军处死的日军官员家属。他们被分别让到马车上就座后，又见几个日本警察，架着一位英俊青年走出警察署。这位青年身穿蓝色毕叽制服，头戴蓝帽子，干净利落一身凛然正气，警察把他强拉到马车上。马车群朝二道河北走去。到了桥上，人们才看清，这位青年就是东北大学毕业的抗日英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参议，中国少年铁血

军司令苗可秀。他忍着伤痛，微笑着向道旁的群众频频点头致意。他是那样地威武，那样地镇定自若。

马车群在河北岸的公园边停住。原来日军和伪政府准备在公园内的"忠烈碑坊"前召开所谓的"建国六勇士祭悼会"，然后再枪杀苗可秀。被苗可秀处死的伪凤城县公署参事官友田俊章的碑前，摆满了各种果品。出席祭悼会的有伪县公署参事官渊田正三、伪县长董毓基、日本警察署长田上乾吉和日军守备队长、县署各科长等百余人。日本和尚先为死者诵经超度亡魂，接着日本警察叫苗可秀跪在碑前忏悔。苗可秀忍着伤痛挺立不跪。敌人又叫苗可秀给死者家属施礼赔罪，苗可秀大骂他们死有余辜，碎尸万断也不解恨。日官又逼他读祭文，苗可秀读的却是自己写的一篇檄文，他历数日寇侵略东北杀人放火的罪行，斥责汉奸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最后高呼抗日口号。日军恐慌已极，怕激起众怒，急忙将苗可秀押上备好的汽车，驶向城南南山刑场。沿途群众见此情形，无不悲痛流泪。

到了刑场，敌人用绳子将苗可秀捆在一棵松树上，从脚下一直捆到胸前。临刑前日本警察署长田上，拿着战刀，走到苗可秀跟前，说："你现在能答应我们的条件——投降，我还可以保证你不死。"苗可秀怒视敌人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你就来吧！"田上署长有气无力地退下山坡，命令行刑。当场，被我抗日军打死的敌人的家属每人领了一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和一些子弹，站到了距苗可秀几十米的地方。苗可秀冷笑一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被苗司令处死的日本警官贺门的妻子向苗可秀颤抖地开了第一枪，日本警官死鬼白井的哥哥开了第二枪。苗可秀仍然昂首怒视着他们。另外几个人也开枪了，都没打中要害。苗可秀身上流着血，脸上仍挂着冷笑。最后，日本警察冈野和诸岗等人也开了枪。

苗可秀英勇就义了，时年29岁。

苗可秀的名字，很快传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象凤凰山上的青松一样，流芳千古，万年常青。

风城人民为了缅怀英雄的光辉业绩，激励子孙后代继承先烈的遗志，集资10余万元，在秀丽的凤凰山下，建了一座汉白玉的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1988年10月落成，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苗可秀的高大形象，永存天地间。

青春献沃土　碧血染红旗

——赵一曼狱中斗争纪实

温　野

一

1935年秋，日寇对我珠河游击区①进行了疯狂的大"讨伐"。我根据地变成一片烟云火海。

为避开敌人的锋芒，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②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依兰、汤原一带远征，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原珠河地方游击连和青年义勇军合并为新二、三团，留在珠河铁道南、北继续坚持战斗。

当时担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的赵一曼，根据县委会议的决定，把她领导的铁北区游击连也编入新二团，团长仍由原团长王惠同担任，赵一曼兼任新二团政治委员。

三军主力部队远征后，敌人加紧了对珠河地区的进攻，企图把我新编成的二、三团和地方党组织彻底消灭。

1935年11月14日，二团50多人来到铁北五区亮珠河西左撇子

① 当时为珠河县，故称珠河游击区，位于哈尔滨市东南部山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烈士，于1946年11月改名为尚志县。

② 该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35年1月建立，军长为赵尚志。该军活动在珠河、宾县、延寿、方正等地。

沟附近的安山屯。

由于坏人朱景才告密，15日晨，日伪军警共300多人，分别从乌吉密、一面坡、梨树镇和珠河县城向左撇子沟扑来。

上午10时，我二团发现敌人，立即抢占南山有利地势，在王惠同、赵一曼的指挥下，一直战斗了六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击毙了横山部队机关枪队队长古谷清一大尉、小队长芹泽、特务曹长户塚等日伪军30多名。

这次战斗我军也受到很大损失。队伍被打散，团长王惠桐负伤被俘①，赵一曼左手腕受贯通伤。

负伤后的赵一曼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战士老于、16岁的妇女委员杨桂兰及交通员刘福生等五人，隐蔽在小西北沟一个看林子的窝棚里。

敌人知道我军被打散，一定有人潜伏在附近，于是加紧了搜山。

一天，伪百户长、反动地主廉江进山到小西北沟，发现半山腰的小窝棚里有炊烟飘起。他急忙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特务米振文。米振文又去沟里侦察，发现了雪地上有脚印，便向正在"围剿"的敌人做了报告。

珠河县警务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和警察第三中队长张福兴，立即带领30名警察，乘两辆大车由米振文带路，来到小西北沟山上，控制了赵一曼她们住的窝棚。

刘福生正准备出去探听消息和买药，刚出门，敌人就开枪打死了他。

听见枪响，赵一曼和周伯学、老于一起依着门框向敌人还击。

怕死的警察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射击。战斗持续了两个小

---

① 王惠桐负伤被俘后不久被敌人杀害。

时，赵一曼的手枪子弹打光了，战士老于想冲出去引开敌人，刚跑出两步就中弹牺牲了。赵一曼要冲出去救他，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她的左大腿骨。由于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炸开很大，鲜血涌流出来，赵一曼昏倒在地上。

就这样，赵一曼、周伯学、杨桂兰三人被俘。

那天是1935年11月22日。

二

赵一曼、周伯学、杨桂兰被押送到珠河县城。

当时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正来珠河调查抗日活动情况。远间指着躺在牛车上的赵一曼向大野报告：“这个女人被打伤了，流血过多，有丧命的可能，必须赶快审问。”

大野看看赵一曼。

赵一曼脸色苍白，头戴黑色军用皮帽，脖子上围着一条旧毛巾，身披黑色军用半截大衣，下身是青棉裤，已经被血染红了。

大野叫喊：“起来！”

赵一曼抬起头，狠狠地瞪着他，吓得大野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敌人把周伯学关押到别处，把赵一曼和杨桂兰临时关在拘留所旁边的一间喂马的草料房里。

赵一曼非常关心杨桂兰，不愿让她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受敌人的折磨。她叮嘱杨桂兰编造假口供，就说是赵一曼找她来侍候枪伤的，别的什么也不要说，一切都由赵一曼承担，这样敌人查不到实据就有可能放她出去。

这时敌人对赵一曼的身分还不清楚。大野决定连夜进行审讯。当大野问她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一般情况时，赵一曼编造了一些假话，回答得很坦然、明快。大野又问她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三军的情况，赵一曼坚决回答：

“关于抗日军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

“我同共产党没关系。”

“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

赵一曼忍着伤痛，义正辞严地说：

“我是中国人，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民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接着赵一曼又对敌人散布的“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强盗言论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驳，使这个洋洋自得的侵略者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最后，赵一曼坚决地说：“你们不用问了！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这次审讯的失败，使大野看出赵一曼是个了不起的人，认为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在共产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责任者”。而这样强硬的对手不是轻易就能审问得了的。同时，他也看出赵一曼的伤势很重，有可能会很快死去，那样损失就大了。大野找到远间商量：

“这么重要的犯人不能让她轻易死掉，得找个高明的大夫来治疗。”

于是远间叫一个警察去找大夫。

大野又回到草料房进行审问。

赵一曼为了解脱杨桂兰，叫大野赶快把她放回去：

“杨桂兰是一般老百姓家的孩子，是我找来侍候伤的，与抗日活动无关。”

大野本想把杨桂兰分开关押，单独审问，但又担心赵一曼伤

势严重，无人护理，会发生意外，就还让她看护赵一曼。

大野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有些恼火，就用马鞭子梢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赵一曼怒瞪着他。这个家伙又用鞭杆狠戳赵一曼的腿部伤处，一阵剧烈的疼痛，赵一曼几乎昏死过去。杨桂兰跳起来护着她。大野叫警察把杨桂兰拉开，然后狞笑着说：

"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还是主动把你的共产党身分说一说吧！"

赵一曼愤怒地回答："我没有什么共产党身分，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

大野恼羞成怒，用马鞭子狠抽赵一曼的手和脸，赵一曼咬着牙闭口不语。

这时，警察领进来一位30多岁的中国医生。大野命令医生说：

"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他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10天。"

医生给赵一曼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了腿部的伤口，摇着头说：

"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明天，那再看吧。"

大野蛮横地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保住她的生命。这是你的责任，你就守在这给她治疗！"

审讯停止后，下半夜，医生又给赵一曼打了 3 针。

为弄清赵一曼的身分，大野开始对县警务科原来关押的20多人进行提审。从早到晚，增加了四五名警察和翻译，对被审的人施以各种毒刑。一个30多岁的矮个子男人挺刑不过，说出了赵一曼是个抗日工作人员，在村子里曾召集过群众开会讲话，宣传抗日思想，指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又经过用重刑，这个人供出了另外

一个人，说他了解赵一曼。于是大野对那个人又施加酷刑，经过几次拷问。那人才说出他看见赵一曼曾参加过赵尚志在村子里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给他的印象是赵一曼的地位和赵尚志差不多。大野还嫌不够，又用刑，于是那个人又说赵一曼是县委中握有领导权力的人……

大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20多个人的刑讯中，也就得到了这么点仍不确切的情况，对赵一曼的真实身分还是没有搞清楚。但这个家伙确认"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3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

第三天，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也听到在珠河逮捕了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便派来两名宪兵审问赵一曼。赵一曼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这两个家伙什么也没得到。

大野感到在珠河这样审讯下去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决定把赵一曼带回哈尔滨去审问。

临行前，赵一曼再次强烈提出：一定要把杨桂兰释放，不能叫她去哈尔滨，她没有罪，由于赵一曼的庇护，杨桂兰在珠河县警务科被关押了28天后释放了。

5天后，赵一曼被解送到哈尔滨，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拘留所地下室里。

三

大野向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副股长大黑照一报告了有关审讯赵一曼的情况后，说：

"把赵一曼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做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

大黑和大野在日本国内就是同事，同任上高知县巡查，是十多年的好朋友。大黑担心大野负的责任太大，于是反对说：

“这样顽固的女人，要想把她当反间用，办不到，而且伤那样重，还是杀了为妙。”

大野仍坚持他的意见：

“其实，利用她，还是利用别人，都可以。总而言之，我们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的效果还大呢！”

山浦听完大野和大黑的议论，考虑一阵后，做了决定：

“可以按大野的意见办。监视的责任由大野来负。”

大野把治疗赵一曼枪伤的事交给曾留学日本的医生、警务厅卫生科长王亚良。但因赵一曼伤势太重，伤口已经溃烂化脓，有生命危险，王亚良感到困难，于是又请一个白俄医生来看。白俄医生认为必须进行手术，锯掉那只伤腿才可能保住生命。大野叫王亚良和赵一曼说明锯腿的事，赵一曼坚决反对，提出宁肯被杀也不锯腿。大野又和山浦等人商量，最后决定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去监视治疗。

12月13日夜里，大野派南岗警察署特务系警长张兴武把赵一曼送到市立医院，并派南岗警察署管内邮政街派出所警士董宪勋、范迪民、田××等三人轮流监视。

为赵一曼治伤的主治医生是中国人张柏岩①，他有爱国思想。他知道赵一曼是抗日人员，又见她受这么重的伤仍如此坚强，从心里敬佩，所以治疗特别认真。他给赵一曼腿部受伤处照了X光片子，看出大腿骨碎了，24块碎骨片散乱在肉里。他知道赵一曼坚决反对锯腿，所以也想尽量保住她的腿。当大野问他诊

① 张柏岩是爱国医生，辽宁省法库县人。原任哈尔滨市立医院院长。日本侵占该院后，降为外科主任。赵一曼牺牲后他愤然辞职。建国后任哈尔滨市卫生局长、副市长。1963年病逝。

断结果时，他说：

“若是把大腿锯掉，治疗的时间会快一些，若是不锯掉，身体不发烧，顺利地度过去，也许会僵化的，僵化以后，只不过腿略微短些。”

大野听了，只得同意不锯腿治疗。治疗期间，大野仍经常带着翻译来病室审讯。一次大野假装关心地问赵一曼：

“伤好了以后，你打算怎样呢？”

赵一曼嘲讽地回答：

“反正你们不能放我，如果我的伤治好了，我愿意做负伤的警察队员的看护妇。”

大野听了奸滑地说：

“你这是说胡话。若是叫你当看护妇，警察队会全部叛变的。你把我当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错算盘了。”

又过了两周时间，大野到长春检查官事务所受训去了。后又调到阿城县。此后，赵一曼再也没见到这个狡猾凶狠的家伙。

监视赵一曼的任务交给了特高股长登乐松。

四

经过张柏岩大夫三个多月细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很快好转，已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敌人为了便于审讯，于1936年4月上旬，把赵一曼从人多的大病室转移到单人的第六病房第二号室①。

赵一曼感到这个环境很有利，作为一个革命者，敌人的酷刑只能摧残她的身体，但动摇不了她的坚强信念。

---

① 这个病室也是伤病“犯人”住的。现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中西医药库。已定为哈尔滨市重要革命遗址。

据1936年8月11日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在给伪满洲国政府民政部警务司的一份题为《关于赵一曼逃走前后的状况以及其死》（滨警特秘第8853号）的报告记载：

“赵一曼在其治疗经过日渐好转的时候，在她的脑子里时时刻刻想着的事情，就是在退院后被处刑的问题，认为总难免于死刑或是无期徒刑，那么，她一生所希望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毁灭满洲国的事情，将永久难以实现。所以要在退院以前，排除万难而逃脱，再投到赵尚志的麾下去，做一个抗日战线的斗士。她日日夜夜地苦心于寻求这一机会。”

赵一曼就是这样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缜密地思考着对策。

要想逃走，首先必须解决看守这一关。同时她的腿伤还未好，不能自由行动，需要有一个男子帮助才行。

经过几个月的考查和接触，她看出三个看守警察中，董宪勋这个人与别的警察不同，他比较老实正派，有民族感情。赵一曼决定把他作为争取对象，主动和他谈话，表示亲近。

赵曼很一快就掌握了董宪勋的经历和思想状况。

董宪勋，27岁，山东省肥城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念过几年书，由于生活困难，下关东来找出路，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当上了警察。

赵一曼对董宪勋说：“你每月只挣十几元钱，还受日本人的气，挨老百姓的骂，太不值得。”

董宪勋很羞愧：“实在是为了生活才当这个差，不是愿意为日本人效劳。”

经过多次交谈，两个人更加熟悉。

赵一曼看到董宪勋有中国人的良心，就加紧对他进行教育，进一步提高他的觉悟，激发他的爱国心。她向他表明自己是珠河铁道北的抗日工作者，并讲述了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情况。

董宪勋对“东北人民革命军可歌可泣的活动情形，以及在宾县、珠河、延寿等地深山里的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富有意义并多感兴趣。”① “于是警士更为所动，以至对于赵一曼的所谓山里生活抱有无限的羡望。”②

赵一曼看到董宪勋思想有进步很高兴，于是对他进行更深刻的教育。

《关于赵一曼逃走前后的状况以及其死》中有如下记载：“为了灌输给警士以抗日思想的目的，她又是费尽了苦心。她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写作形式把她在满洲事变爆发当时于奉天所目睹的日本军暴虐状况，成立伪满洲国肮脏的目的，被虐待之中国人的惨状、驱逐日本人打倒伪国是活在中华民国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使命等，在药纸和其他的纸片上，用通俗的且富有兴趣的小说文体，加以记载。因为她用了使任何人在一读之后即能憎恨日本而要起来打倒满洲国的写法，所以使该警士在思想上成为赵一曼的俘虏，以致表示愿做一个反满抗日的斗士参加这个战线的坚固决心。这个时期，是她对于警士开始工作的4月下旬前后，仅不过是20天的工夫。”

董宪勋就这样提高了认识，坚定了抗日决心。他向赵一曼表示愿意参加反满抗日斗争，今后一切行动听从赵一曼的领导。

敌人对赵一曼只用20天的时间就把董宪勋教育争取过来，表示非常佩服。他们惊叹道：“她的拢络诱惑手段的巧妙以及这样容易地就能获得警察官，这对于我们是有很多启示的地方的。”③

董宪勋被争取过来后，赵一曼按照预定计划开始第二项工作。

要想逃走，还得有一个可靠的有治疗经验的女护士帮助才

①② 敌档：滨警特秘第8853号“报告”。

③ 敌档：滨警特秘第8853号“报告”。

行。以前的几个护士经过赵一曼的观察和试探都不理想。5月上旬，换了一个见习护士来护理赵一曼。这是一位俊俏的小姑娘、叫韩勇义。赵一曼经过短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发现韩勇义是可以教育争取的。

韩勇义，17岁，出生于辽宁省桓仁县农村，从小性格活泼、刚烈，见义勇为，所以她父亲的老朋友以"勇义"二字为她命名。1929年冬天，她家搬到哈尔滨。由于家庭环境和大城市生活的影响，她思想比较开阔，见多识广，泼辣，好动，家里人都嫌她"不安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的大伯父韩文贵出于民族义愤，积极筹款支持马占山、李杜等抗日义勇军。当时韩文贵正任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经理，他销毁了帐目，不让日本侵略者掌握，然后进关到北京隐居。日寇占领哈尔滨后，找不到韩文贵非常恼火，就把韩勇义的父亲传去审讯，逼他交出韩文贵留下的银行帐目，他经受不住日伪的压力，怀着对日伪的仇恨，1933年夏天忧闷成病而死。这件事对韩勇义影响很大，她知道父亲是被日本人逼死的，从而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父亲死后，在哈尔滨生活有困难，也为了避开敌人的纠缠，她母亲就带着韩勇义及其姊妹四个孩子搬到呼兰县城居住。韩勇义读完高小后，又在呼兰女子实业学校（相当于中学）念了一段书。1935年8月，由她父亲的老朋友帮助，进入了哈尔滨市立医院办的"看护妇养成所（即护士班，二年制）"插班学习。1936年春天毕业后到医院病房成为见习护士。当时的市立医院也是由日本人统治，见习护士没有薪金，而且受欺压，脏活累活都得干，更激起韩勇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就在这时她来到了赵一曼身边。

日本人派韩勇义护理赵一曼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他们担心成年人有民族观念，容易被赵一曼拉过去，认为韩勇义年龄小，便于掌握。他们警告她：赵一曼是女匪首，大政治犯，要看好她，

不能叫她死了，也不许和她多说话，送完药就走。

他们哪里知道，韩勇义心里早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韩勇义和赵一曼一接触，立即感到这位“大政治犯”是个很不平常的人，产生了敬佩之情。

又经过几次谈话，赵一曼和韩勇义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赵一曼感到，韩勇义那种敢说敢干的性格和反对男女不平等的思想，都和自己学生时代很相似。她非常喜欢这个小姑娘。

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在韩勇义的眼里，赵一曼是一位十分可亲可敬可信的大姐，她把自己的家世和心里话都向赵一曼倾吐出来。赵一曼针对她伯父和她父亲的遭遇，讲了许多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必须进行抗日救国的道理，也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和在山里有意义、有情趣的动人生活。这些具有神秘色彩和惊险的抗日斗争生活，极大地吸引着韩勇义，更加激励了她的爱国热情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她曾向赵一曼提出入党要求，赵一曼告诉她：“你现在年龄小，将来有机会先参加抗日青年同盟（即共青团组织）。”

敌人关于赵一曼对韩勇义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有具体的描述：

“有着锐敏感受性的共匪赵一曼，对于韩在一见之下，即能洞悉其性格，遂伸其诱惑的魔手于韩，这也是当然的事情。赵一曼向韩护士恳切地说：‘自己所受的伤是不容易完全好的，就是假使完全好了，在家庭方面失去了幸福的自己，结局也是难以找到在世上生活的兴趣的’。具有同病相怜性质的韩护士，更持有着女性的感伤。遂对赵发生同情，并向赵一曼申诉自己的不幸和不满。赵一曼对于韩的不平、不满表示同情，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得到了一致的观点。她努力向韩说明：韩所抱有之对社会制度及穷困的疑问，除了用实行共产主义来解决它，是没有其

他的方法的。”①

“由于赵一曼的说明使韩护士稍微理解共产思想之第一页，遂对赵提出：‘如果实现了共产主义，自己应就什么样的地位呢？’赵对于这个质问说：‘自己到山里去以后一切都能明白。’与对以前的董警士一样，灌输以反满抗日的思想，并说：‘要实行这个主义，就有必要到山里去，一切的疑问，到了赵尚志那里，才能明白。’并举所有的例子加以说明，韩也信任赵的话，誓约要协力于她的逃走。”“韩遂成了赵一曼的一党。”②

韩勇义在赵一曼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她发誓要帮助赵一曼逃出医院，加入抗日斗争行列。

赵一曼把董宪勋和韩勇义都分别争取过来后，才把他们两个人介绍到一起，三个人誓约一定共同行动，一切听从赵一曼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出卖别人。

五

敌人对赵一曼的被捕一直严加保密，直到5月中旬才允许公开。

5月17日指令敌伪报社记者到医院对赵一曼进行“采访”。

从5月20日开始，《满洲日日新闻》、《大北新报》、《大同报》等各大报上陆续登出了赵一曼负伤被俘的报道和她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污蔑赵一曼是什么“红装白马女匪首，奔驰于丛山密林”还恶毒地造谣说赵一曼对敌人给治疗腿伤“很感激”，等等，妄图丑化赵一曼的英雄形象。

敌人的反动宣传丝毫没有达到目的，相反使她的英名更加响亮，在群众中更广泛地传扬开来。许多爱国的东北人民，从赵一

①② 敌档：滨警特秘第8853号“报告”。

曼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把赵一曼看做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象征！

董宪勋和韩勇义看见敌人的报纸上也登载了赵一曼的抗日事迹，对她更加敬重，认为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更坚定了帮助赵一曼逃出虎口的决心。

赵一曼伤势逐渐好转。敌人派经常监视赵一曼的南岗警察署特务系警长张兴武找赵一曼"谈谈"。这个愚蠢、凶狠的家伙进入病室后，对躺在床上的赵一曼皮笑肉不笑地说：

"赵先生，日本人对你不错吧，给你治好了伤，你应当感谢。我劝你赶快弃暗投明，跟我们合作吧。我这可是一片好心啊！"

赵一曼对这个忘了祖宗的家伙非常憎恨，嘲笑地回答说：

"野兽还会有人心？老虎戴佛珠，假充善人，留着你的好心吧！"

张兴武听出赵一曼是在骂他，气得满脸横肉直抽搐，象被蝎子蛰了似的，一下子跳起来，把赵一曼的被子掀到地上，抽出佩刀对准赵一曼腿上的伤处狠刺了一下，顿时鲜血涌出，赵一曼疼得昏了过去。

张兴武劝降未成，向警察厅作了报告。于是南岗警察署特务系主任鹿井，警察厅特务科警尉泉屋利吉和外勤警长，外号叫"小阎王"的吴树贵，多次到赵一曼病室进行刑讯，他们把赵一曼掀到地上，用皮带抽，用皮鞋乱踢，抓住她的头往墙上撞，用烟卷头烧她的脸，成绺成绺地揪下她的头发。

敌人轮番地刑讯，赵一曼始终没有低头。她的坚强精神，深深地教育着韩勇义和董宪勋。他们关心她，爱护她。特务们再来审讯，韩勇义总是想方设法应付，不是说赵一曼的伤口恶化，就是说她刚吃过安眠药喊不醒。因此，赵一曼少受了不少折磨，伤势又渐渐好转起来。

为了早日逃走，赵一曼和董宪勋、韩勇义秘密研究了有关逃走的各种问题。最后决定由董宪勋负责拟定逃走的方法、路线；由韩勇义负责筹备逃走的经费。

由于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自己行走，市内出租汽车又不去外县，董宪勋在道外五道街轿房定做了一顶轻便小轿。

这期间韩勇义的筹款工作不够顺利，由于她自己不挣钱，到医院时间又短，熟人少，向同事借钱没有成功。她曾几次回家向母亲要钱，母亲以为她学坏了，对她很不满，而她又不能明讲，母女关系闹得很僵。

这时已是6月上旬，董宪勋听说警察在7月份将有调动的消息，如果他一调走就不好办了。这个意外情况，促使他们必须尽快做好逃走的准备工作，关健是解决经费。

韩勇义再次回到呼兰县家里，向母亲谎说她现在就要结婚，要取走父亲留给她结婚用的金戒指和呢料衣物。母亲无法，就生气地把她的嫁妆都给了她，并声称和她断绝母女关系，没有她这个女儿。韩勇义一再向母亲表明，她没有学坏，没有做对不起母亲的事，将来母亲会明白的。

临走，她把父亲留下的一只精致的小牛皮箱也要了出来。

她把拿回来的嫁妆和自己的几件皮衣呢料送到旧货商店卖了，得到一部分现金。她又偷偷准备了一些医疗用品和药物，连同现金和金戒指装在小牛皮箱子里，藏到了赵一曼的床下。

6月中旬，敌人在珠河地区遭到我抗联三军留守部队的打击，因而又加紧了对赵一曼的审讯。

形势紧迫，必须尽快地逃走。

6月24日夜里，他们三个人再次密议，决定在28日夜里行动，这天是星期日，警察厅和医院都放假，闲杂人少，便于出入。

28日早晨，韩勇义在南岗新市街东方旅馆定了一个房间，把

从医院里带出来的装经费、医疗器具、绷带和药品等东西的小皮箱放在这里。午后4时，韩勇义与董宪勋最后联系，并交给他一部分钱，用专雇车和付给轿房。

至此，一切准备妥当。

当晚9时，董宪勋用8元钱雇了一辆小汽车，到东方旅馆把韩勇义接出送到医院。韩勇义到病室给赵一曼换上一身新蓝布裤褂。董宪勋又坐车去道外五道街轿房，把定做的小轿和抬轿的五名轿夫运到市郊文庙附近的屠宰场后边，让他们在这里等候。然后他又乘汽车回到医院。由于董宪勋是看守赵一曼的警察，别人没有注意。恰巧这时天降大雨，更增加了有利条件。董宪勋和韩勇义把赵一曼背出后门，坐上汽车，在大风雨中开到屠宰场后边，他们下了车，把汽车打发走，赵一曼坐上那顶小轿子，一直向东奔去。

雨掩护了他们，也给他们增添了困难。河水暴涨，轿夫们挣扎了好一阵才过了阿什河。路上又是一哧一滑，迈不开步，一夜才走了几十里路。来到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

董宪勋的亲叔叔董元策就住在这里。董元策也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贫苦农民，他有爱国心，恨鬼子汉奸。当董宪勋告诉他是去找抗日联军时，老汉非常高兴。

因为怕敌人发现，这天白天赵一曼他们没敢走，就住在了董家。吃完晚饭，董元策去找同村要好的朋友魏玉恒，求他套车送客人进山。董元策告诉魏玉恒，客人是赵尚志队上的，老魏虽然觉得风险很大，但感到能为抗日救国出力是应该的，就答应了。

下半夜，魏玉恒赶车上路。因为天黑，道路泥泞，大车走得很慢。他们怕遇见警特盘查，还得避开屯子绕道走。因此大半夜只走了20来里路。

6月29日早7时，换班的警察发现赵一曼失踪，立即向南岗

警察署报告，署长蓬世隆一面向市警察厅报告，一面下令署员紧急集合，并到现场进行检查。警察厅特务科也派出许多特务到市内各区搜查。敌人断定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自己行走，必定坐车，于是对汽车、马车行加紧盘查。终于在午后2时找到了一个白俄司机，他自称：象是载过赵一曼等人，根据他的供述，特务们又调查了道外制做小轿的铺子和回来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逃走的方向。

这时已是晚上9时了。

蓬世隆召集本署保安系主任袁功瑜，特务系主任日人鹿井，司法系主任千叶，总务系主任中野，警务系主任增子等和特务系、司法系的特务及附近派出所的警长，警士30多人，乘警察厅开来的大卡车连夜追赶。

到了阿什河边，因桥坏过不去，他们就弃车过河继续搜索。敌人到了金家窝棚董元策家向他要人，董老汉没有承认，鹿井就叫特务们在屯子里抓马骑上，顺着大车印向前追去。

6月30日早5时，赵一曼他们走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的李家屯① 附近时，敌人发现了他们。望着追上来的敌人，赵一曼镇静地对韩勇义和董宪勋说：

"你们什么都不要承认，都推到我身上，就说我用钱收买你们，别的什么也不要讲。"

敌人终于追上了他们。

赵一曼再次落入敌人的魔掌。

六

赵一曼、韩勇义和董宪勋三人被带回哈尔滨，关进了市警察

---

① 一说是王永汉屯，在今黑龙江省宾县境内。

厅刑事科拘留所，由警察厅特务科分别审讯，决定由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亲自出马。

这个外号叫“林大头”的老鬼子是个中国通，专门审理重要复杂的政治案件。他没把赵一曼放在眼里，自以为审讯过多少有名的硬汉子，这么个年轻女人还用费多大力气。他认为女人毕竟是女人，总是脆弱的。

以林宽重和特务科警佐滑宝珊为主审，周质彬为翻译，吴树贵为用刑主凶，开始对赵一曼进行极其残酷的刑讯。

赵一曼被架进审讯室。

“林大头”一惯先玩弄软花招，他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假惺惺地站起来说：

“欢迎，大大的欢迎！本人能和赵女士这样有名的人相见，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快请坐！”

说着，他搬过来一把椅子。赵一曼眼皮都没抬，忍着伤痛，傲然地坐到椅子上。

“林大头”又倒了一杯茶递过来，赵一曼一挥手把茶杯打落在地上。

“林大头”感到对手很不一般，但他仍厚着脸皮说：“赵女士，不要生气，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没什么可谈的！”赵一曼斩钉截铁地回答。

“林大头”沉默一会儿，试探地问：“我真不明白，你这样一个年轻人不在家里好好过日子，为什么要到处奔走抗日呢？”

赵一曼愤怒地反问：“那你这个日本人，为什么不在你们的岛国老老实实的呆着，却要不远万里横渡大海侵略中国呢？”

“林大头”被质问的无话可答，连忙绕着圈子说：“好，好，我们先不谈这个。告诉我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哈尔滨还有哪些人帮助你？”

赵一曼冷笑着回答：“不知道！”

"林大头"故做聪明地说："我可知道！"

"你既然知道还问我干什么？"赵一曼嘲讽地说。

"林大头"摇晃着大脑袋阴险地说："我是关心你，你自己说出来我们会宽恕你，你还年轻，要好好生活，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去留学，回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赵一曼坚决地回答："少说废话，快收起你的鬼花招吧！既然又落到你们手里，我根本没想活着出去。"

林大头又晃了晃大脑袋，故做感叹地说：

"死，可是十分可怕的呀。"

赵一曼为了赶快结束这种无聊的对话，她大声地说："死，对于你们这些掠夺成性，贪图享乐的强盗来说是可怕的，但对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忠实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尽快消灭你们这些畜生，流血牺牲是伟大的、光荣的！"

林大头终于沉静不下去了，他狞笑着说："那好，比你嘴硬的我见过，不给你点滋味尝尝，你是不会老实的！"他猛地拉开门，喊了声："来人！"

两个满脸横肉的打手扑进来，把赵一曼拖了出去。

在一间阴森的地下刑讯室里，打手们用皮带、皮鞭、棍棒等各种刑具对赵一曼进行毒打，赵一曼咬紧牙挺着。凶手们又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一阵绞痛，赵一曼昏死过去。凶手们拎过一桶凉水泼到她的脸上，过了好一阵她才苏醒过来。

凶手吴树贵嚎叫着："你说不说？"

赵一曼怒瞪着他，不吭一声。

吴树贵又叫打手们用烧红的铁棍烙赵一曼的背部，往她的嘴、鼻子里灌煤油，赵一曼被呛得直喷血沫子，又昏死过去了。

不管敌人的酷刑怎样狠毒，赵一曼始终没有动摇屈服，没有暴露党组织的半点机密。她的这种无比坚强的英雄气慨，使用刑的几个残忍成性的凶手都不禁为之发抖，无可奈何地说：

“这个女人简直是块铁！”

是的，赵一曼的身体虽然是肉长的，但她的革命意志却是钢铁铸成，不管敌人怎样凶残，也动摇不了她对党的无比忠贞。自以为很有本事的“林大头”，尽管很不甘心，也不得不承认在赵一曼面前是失败了。“林大头”没有审出任何口供，只得先把赵一曼关进监狱，再进行调查。

董宪勋和韩勇义由于受赵一曼的影响教育，被捕后也都表现得很坚强。

董宪勋受尽各种酷刑折磨，最后死于狱中。

韩勇义也受尽各种毒刑。“林大头”亲自审讯她，给她上大挂，用烟头、炭火烧她的脸和背部，给她上电刑。韩勇义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满身伤痕，但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

敌人在写给伪警务司的报告中，描述了韩勇义的高尚民族气节：

“目前在哈尔滨警察厅拘留审讯中的韩护士，她仅是在很短的期间受了赵一曼的宣传，但她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她壮烈地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马车，使用着满洲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体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

韩勇义后来被关押在哈尔滨道里监狱女监房，她在狱中仍乐观顽强地与敌人斗争。为了不连累母亲弟妹，她编造了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很小就死了母亲，现在是继母，关系很不好等等。但敌人仍多次去她家搜查勒索。她母亲这时才明白，女儿的行为是正当的、高尚的，为救女儿，她变卖了许多东西，花了很多钱找人帮助。

敌人对赵一曼在监视治伤期间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善于进

行革命思想宣传非常惊叹，竟提出要从这一事件中很好吸取教训。敌人在《报告》中写道：

“回顾赵一曼等逃走的事件，使我们要加以考虑的是：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之王道主义的宣传工作，在以前实感觉有只讲理论或流于事务的形式，因而有加以改善的必要。例如象宣传文件等的东西，要做到通俗易懂且富有趣味，无论何人都要抢着去看的地步才好。”

我们也可以从大野和大黑两个家伙的议论中，看到赵一曼的斗争精神对敌人的巨大的震慑。

大黑：“你让一个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结果呢，她同警士和看护妇结成一伙，逃跑了。”

大野：“我到阿城去的时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须改变监视的方式。怎能这样说我呢？对一个能组织起3万多群众的人，就应该考虑到她会把警士和看护妇拉过去。失败的原因是把同一个警士和看护妇留在他身边的时间太久，而没有调换。”

大野最后哀叹地说：

“好歹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让她逃回原来的地方，不知道将有多少日本人被杀掉呢。我们是受了一次骗，凡是叫共产党的人，我认为杀了是没有错的。”

七

前后经过一个月的审讯调查，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7月末，哈尔滨市警察厅把赵一曼送回省警务厅，警务厅长涩谷三郎批准了警务科把赵一曼送回珠河县“示众”处死的报告。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

敌人在《报告》中记述了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情景：

“在押送的中途，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一个儿子写一遗言，从押送的职员（省警务厅特务科警尉补森口竹治）处要了笔纸，写了如下的反满抗日之遗言书①：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火车到了珠河县，车站上布满了武装军警。

赵一曼下了火车，敌人又把她放到一辆马车上“游街”，妄图以此威胁我爱国群众。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赵一曼激昂地唱起了她最喜爱的《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

① 敌档：滨警特秘第8853号“报告”。

尸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红了旗帜……
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
誓不战胜，终不放手……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站在马路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马车来到了小北门外的刑场。赵一曼下了车，两个特务要来架她，被她甩开了，她移动着艰难的步子，昂首挺胸，迎着灿烂的阳光向前走去……

魂 系 北 国

——金剑啸烈士被捕前后斗争纪实

金 伦　　刘延辉

一

1936年8月15日晨，乌云笼罩着齐齐哈尔城的上空，一辆刑车呼啸着驶向北门外刑场……

金剑啸同四名爱国青年被推下刑车。剑啸沉着地摘下眼镜，轻轻揉了揉已经适应黑暗牢房的双眼，然后大步地走到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裹尸芦席上。一个法警端着一盘馒头和几碗酒，这是为死刑犯一种惯例的“饯行”。头一个送给剑啸，剑啸愤怒地打掉了馒头，接着他端起酒碗，狠狠砸到一个日本宪兵少佐的头上，然后仰天大笑起来。行刑的宪兵惊恐万状，一阵骚动后，宪兵队长下令开枪。枪声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久久回旋在万里北国的上空。这位党的忠诚战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一年，金剑啸只有26岁。但，他那短暂的生命，处处闪烁着耀眼的共产主义光芒。

二

金剑啸，满族。原名金承栽，字培之，笔名健硕，巴来等。

1910年12月15日出生在沈阳城内一个刻字工人的家庭。3岁时随父迁往哈尔滨。他的学生时代正值"五四"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他较早地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他是画家、作家、剧作家、也是革命诗人，从学生时代便开始写作，曾在哈尔滨进步报刊《晨光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1927年底担任《晨光报》文艺副刊"江边"的主编。1928年哈尔滨学生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强修"五路"，他不仅积极参加，而且还在报纸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的罪行。1929年初去上海艺术大学学美术。1930年在上海由梁白波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由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区委决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夏天受上海地下党的派遣，剑啸带着左翼文化动动的新气息回到哈尔滨。

他一到哈尔滨就看到刚刚萌芽的文艺领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他既要拿起笔来写诗写小说，又要拿起画笔来作画；他既要写剧本又要导演戏……他有着传播新鲜事物的活力，又有着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魄力。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他组织了抗敌剧团，演出了他自编自导的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话剧《海风号》。哈尔滨沦陷后，1932年春，剑啸在市委书记张贯一（杨靖宇）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西区（道里）区委宣委，曾与罗烽一起编辑反日总会的《民众报》，同年8月哈尔滨水灾后，他联络一批爱国画家，举办了"维纳斯"赈灾画展。1933年，组织"星星剧团"，排演了三个进步话剧：《居住在二楼的人》（又名《小偷》）、《一代不如一代》、《娘姨》。

此后，他受到地下党的委托，以发展反日会员的名义，团结了一大批哈尔滨的左翼文化名人，如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群、梁山丁等，在长春《大同报》上创办"夜哨"文学周刊，发表了大量带有反满抗日倾向的文学作品。同年底《夜哨》周刊被

迫停刊后，他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了“文艺周刊”，引起了敌人注意。

不久，敌人对进步文人进行迫害，实行了大逮捕，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有些作家秘密出走，而剑啸却握紧拳头对白朗说：“我是不能也不甘心放弃满洲的，我要创造第二次事变，用我沸腾的血浪，把那些强盗卷回老家去……”坚决留下继续进行斗争。

为暂避敌人的锋芒，1935年5月，他去齐齐哈尔创办《黑龙江民报》“芜田”文艺副刊；发动进步学生和工人，组织“漪澜读书会”；帮助青年写作进步文艺作品；组织《白光剧团》、演出了他自编、自导的话剧《母与子》和由他改编的美国犹太人革命作家高乐特的话剧《钱》等进步话剧。增进了广大群众的反满抗日的意识，唤醒了沉睡的北国大地。同时剑啸又创办了“艺文周刊”，并发表了歌颂抗联战士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等。由于剑啸的活动受到敌人的监视，被报社辞退。1936年2月又回到了哈尔滨。

三

剑啸回哈市后，正值日本浪人山本久治创办的《大北新报》（群众都管它叫“大背心报”）副刊、《大北新报画刊》已濒临停刊。剑啸抓住这一良机与地下党员姜椿芳商量，决定把这一画刊接兑过来，利用此画刊不受检查的特殊条件，以日本浪人名义做掩护，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把它作为我党宣传抗日思想的前沿阵地。接兑成功后，于同年4月出刊，因为内容编写得生动活泼，而且具有反满抗日的倾向，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大北新报画刊》共刊出了11期，这期间，画刊曾揭露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国民党“剿共”失败等重要消息。4月下旬在“五日大事

记"栏里刊载了："四月二十三日，肖克、贺龙共产军席卷云南西半部，向大理县进攻"的一则报道……尽管画刊享有特殊待遇，但已引起敌人注意，尤其是第11期刊载的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病危的消息和东京留日学生上演高尔基的剧作《夜店》的剧照，山本久治由此认定编辑部里有共产党，便向日本总领事馆特高系打了报告。

6月13日下午，天空突然阴了下来，暗灰色云彩遮住了天上的日光，松花江边刮起了湿漉漉的南风，一会儿便洒下了濛濛细雨，商市街在雨雾中显得异常宁静。《大北新报画刊》编辑部依然十分忙碌，金剑啸在那间光线很暗的房子里伏案创作。

正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大北新报画刊》编辑部门外停下来。从车里跳出三个身穿长衫的日本便衣特务，提着手枪，快步走进屋里。一个矮矮的特务，把右手插在长衫的口袋里，站在剑啸的房门口，监视着屋里的动静，另外两个大汉满面杀气地冲进编辑部，把屋里的人围起来，对每个人进行搜查，之后将编辑部又翻了一遍。接着，这些人又冲进剑啸的家里乱翻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最后将金剑啸和来登广告的十来个人逮捕。他们都被押送到日本领事馆特高系，关在地下室的监房里。

四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特高系，坐落在南岗车站街（今红军街）西侧，是一幢面临大街的二层楼房。楼的最低层是一个阴气沉沉的地下室，中间有一条水泥铺的过道，两旁依序并排五个监房，牢门都是森严的铁栏，约1米高，进出要大弯腰，监房里都是水泥地，地上铺些零碎谷草，被子都放在木板上。

这里关押的都是日本和朝鲜的刑事犯或民事犯，中国人极

少。从画刊社抓来的十来个人，就分散在这几个牢房里。所有被押送到地下室里来的人，必须脱光衣服，只许穿一条短裤，然后换上和服式的囚衣，按“罪行”轻重关押待审。一般认为，关押在一号牢房里的都是死刑犯。而剑啸恰恰被关在一号牢房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画刊社的人都被一一叫到过道里，依序按指纹，剃光头，填表格。虽然大伙见面了，但相互不能对话。剑啸在人群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姜椿芳，不觉心里一阵悸动：“他怎么也被抓来了？”他正在思索着如何来应付这个场面时，一个日本人把他叫了过去问道：“你的朋友都在什么地方？”

剑啸回答：“我的朋友不是都在这里吗！”

日本人用棍子猛敲了一下剑啸刚剃光的头，厉声道：“不许这样说！”

剑啸愤愤地闭住嘴，再也不说一句话……

敌人对剑啸监视得非常严密。他同在押的画刊社的人，谁也听不到谁的消息。他既不能写信告诉朋友、同志和家里人，也没有人来看望他。组织上和他家里人都设法全力营救，均未收到效果。

这期间，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特高系，却一直在搜查他的全部活动情况。他们从齐齐哈尔警特机关得知，有一个叫“巴来”的共产党重要人物，曾编过《黑龙江民报》的副刊，组织过《白光剧社》，发表过倾向性过浓的《兴安岭的风雪》等文章，但他们却不知道金剑啸与“金巴来”就是一个人，更不知道他们现在关押这个“要犯”就是金巴来。尽管敌人不分昼夜地对他进行灌凉水，上大挂，跪木桦等极其残酷的刑讯，但每次都一无所获。姜椿芳同志后来回忆道：“我和剑啸有组织关系，也可以说我领导过他，但他被捕后没有把我供出来，他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品德。”

某天下午，剑啸又被带到特高系主任小池的审讯室。这是一

间20平方米左右的大屋，阴沉得象一座阎王殿。屋里有一铺日本炕，一张桌子，地上摆着刑讯的竹签、绳子、三角木桦子、举棍、皮鞭……接着，一个外号叫大洋马的日本人，又带进来一个中等身材，穿着和服式囚衣的中国人，他叫晋驼，曾以《大北新报》记者身分为掩护，在第三国际做情报工作，因为善文，和剑啸有过交往，也是前不久被捕的。小池让剑啸站在一边，不许说话，又把晋驼叫到桌边，指着剑啸厉声问晋驼："他是不是金巴来？"

晋驼已经受过刑讯，毫不思索地回答："他是金剑啸……"

小池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冷笑，一摆手，那个叫大洋马的日本人押着晋驼就走。晋驼走到剑啸面前，争辩地说："金剑啸，不是金巴来！"剑啸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用没有戴眼镜的眼睛看了一下晋驼，摇摇头说："已经晚了！"

敌人终于查明了剑啸的身分。接着小池就讯问谁是张福林(我地下党的领导人)？剑啸始终坚贞不屈，紧闭着嘴一言不发。

一场酷刑又开始了……

当剑啸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牢房里。牢里黑漆漆地伸手不见五指，他既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来的，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只觉得周身疼得如刀割，心在急速地跳动，脑子涨得象塞满了棉花似的，烦闷、燥热，脸上冒出了串串汗珠。严酷的刑讯已使他精疲力竭，他大口地喘着气……

剑啸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顶住了敌人的酷刑，为了掩护姜椿芳和画刊社的同事，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有意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齐齐哈尔的"民报"事件，引到自己身上。

五

1936年6月21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一辆押送犯人的囚车，在

四台摩托车的护引下，从齐齐哈尔车站向闹市口开去。车的速度很快，驶到一个高墙围着的院落旁停了下来。高墙四角设有岗楼，正面是深严的大铁门，这就是伪第三军管区的陆军监狱。

剑啸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号监房里。监房的角落里有一个火炕，一个便桶，从位置很高的窗子向外瞧，窗外的天变得比洗脸盆大不了许多。

这是当年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在任时修建的一座监狱，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齐齐哈尔后又进行了重要改建。监狱的高墙上面装有电网，夜里照明灯雪亮。办公室在黑漆铁门的北侧，是敌人刑讯的地方。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刑具。那些审讯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们用灌凉水、坐老虎凳、手指头之间夹筷子、手指头插竹签、上大挂、烙火棍等种种酷刑来对付革命者。

然而，最令人难忍的是一天两顿"饭"，每顿给一个铁碗装着的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一个铁碗装着的清汤，不给筷子。窝窝头都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咬在嘴里，外面是软的，里面却是硬的。虽然每隔一周给一顿小米饭或高粱米饭，但饭里有很多泥土和沙子，没法咀嚼，只好把嘴张得大大的，一口一口硬吞下去。

身上穿的囚服，不知曾被多少人穿过，留下令人难以忍耐的血污和气味。特别是炎热的夏天，由于许久不洗澡，汗和身体的各种分泌物融汇在一起，发出使人作呕的臭味。穿到身上一会儿，便会觉得满身都有东西在蠕动，打开一看全是虱子！

恶劣的环境，严酷的刑罚折磨着剑啸。可是，最痛苦的是没有人和他说话，有事也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书报可看，没有纸笔可写，这种孤寂，严峻地考验着他的革命意志。在这可怖的监牢里，熬过一天要付出多少精神和血的代价啊！

六

敌人认定剑啸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将他关押在秘密监房

里。当时，所有的难友都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犯的什么"罪"，但渐渐地在难友中传颂着他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

一次，审讯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剑啸唇边淌着血丝，刚毅地挺立在审讯室里，两只没有戴眼镜的圆眼愤愤地盯视着一方。同时受审讯的还有四个青年人。一个是《黑龙江民报》的编辑，两个是曾经受过他影响的"漪澜读书会"的学生，另一个是参加《白光剧社》活动的朋友。审讯他们的是日本警特课长，这是个手毒心黑的家伙，凡是反满抗日的案子，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严刑拷打更是他的专长。但是，这次对剑啸却表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耐心和"宽厚"。他先围着所有的人转了一圈，上下打量着，最后停在剑啸的面前，显出十分关切的样子，用生硬的中国话先责备剑啸不该那样的"固执"，否则也不会吃这么多"苦头"。然后便单刀直入地问剑啸：

"这四个人都是共产党吧！"

剑啸漫不经心地望了他一眼，摇摇头说：

"不，我不认识。"

警特课长追问：

"那——你们谁是共产党呀？"

剑啸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已经说过了，共产党只有我一个人。《芜田》副刊是我创办的，文章是我写的，《白光剧社》的戏是我导演和组织演出的，跟别人都不相干，你应该把这四个青年人放了！"

警特课长冷笑了一下，又问：

"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

剑啸理直气壮道：

"你们有国家，我们也有国家，难道我们就不爱国吗？难道爱国也有罪吗？……"

警特课长碰了一鼻子灰，突然，脸变成了猪肝色，吼叫道：

“你……你要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有许多人是被我判决枪毙的！我看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才来好意相劝，不然……你不要怪我不客气！你是招，还是不招？”

剑啸淡淡的一笑，说道：

“我生在世上的任务，就是要和你们这伙帝国主义分子，以及骑在人民头上的强盗、走狗决斗的……”

凶恶的警特课长，把桌子一拍说：

“八格牙噜！我的统统的明白，你们都是反皇军的匪首！叫你们统统地人头落地！”

话刚说完，两个日本打手上来就把剑啸吊了起来，一场酷刑又开始了。

夜，静悄悄的，剑啸带着满身鞭抽火烧的伤痕，回到了牢房，他艰难地躺了下来。忽然窗外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他知道又进新“犯人”了，便缓缓站起来，一点一点向门边挪过去，从门上的小洞往外看。啊！押进来的又是青年学生！他心头一阵酸楚。这些学生都被用绳子捆着双手，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是没有一个精神颓丧的，都昂着头挺着胸，神态自若的走进监狱。剑啸暗暗数着走过来的人，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是九个人。他没有戴眼镜，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况且灯光又非常昏暗。他们都是谁呢？这一夜，剑啸又没有睡好。

第二天早晨，“囚犯”们都被赶到院子里跑步，剑啸站在自己监房的门口，留神看着兜圈跑步的难友，这时，他看到一个人快跑到他监房门口时，故意放慢了脚步，并且一直望着他。啊，看清了，是《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剑啸痛苦地向他点了点头，还没来得多看一眼，王甄海就被狱卒赶走了……

剑啸在齐齐哈尔陆军监狱被提审、受刑是家常便饭，凶恶的日本打手把他的牙打掉了好几颗。使他很难咀嚼食物，只好把窝

头泡到水里用手抓着往喉咙里送，常常噎出泪来，吃饭和受刑不相上下，尽管这样，他仍然保持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并且鼓励帮助同牢的青年爱国者坚持下去，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

一天夜里，约摸12点钟的光景，剑啸的监房门被打开了，送进来两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这是他入监以来第一次有了同伴，当天夜里彼此都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才慢慢谈了起来。两个学生一个姓王，是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传阅进步书籍被捉了进来；另一个姓马，是昂昂溪中学的学生，因为他同学的朋友被捕，日记上有他的通信地址，故而被牵连进来。剑啸非常同情他们，每当学生们受刑回来，他都用手帕轻轻地给他俩擦掉身上的血迹，安慰并鼓励他们："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不了几天，非正义战争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失败。""要挺起胸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同日寇战斗到底。"两名学生在剑啸的宣传带动下坚强起来。

剑啸十分清楚，不管是不是地道的"反满抗日分子"，进了这个牢笼就有吃不尽的苦头。于是就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党的宣传工作，进一步启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教育难友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学习，坚持斗争，并用手沾着血水，将自己创作的诗句写在水泥地上，教大家吟诵。这样剑啸在狱中坚持斗争的事迹，渐渐被传颂出来。

有位体育教师，无辜被抓了进来，关押在剑啸监房隔壁。他经常见到剑啸戴着镣铐满身鞭痕地从他的监房门前走过，表现不出丝毫畏惧的样子，给他以很大的鼓舞。监狱里没有书，但剑啸能背出普希金的不少诗，还能背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并把这些诗一字一句教给同监的难友。这位教师在隔壁，虽然不能将全部诗句都记住，但普希金的《囚徒》，他仍记得十分清晰：

我们飞去吧，是时候了，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飞去吧。
飞到那乌云的后面明媚的山峦，
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岛。
只有风在舞，还有我在作伴。
……

七

8月15日清晨，大约7点多钟，看守长向剑啸的监房走来。有个"犯人"一看见就说："今天又有人吃馒头了（吃馒头意味着被处决）。"那家伙打开监门，头一个点到剑啸，接着，他又到别的牢房里，点出了王甄海和另外三名青年。剑啸脱掉了那身穿了两个多月的囚服，换上了自己的旧式西装，戴上了眼镜，环顾了一下同室的难友，然后一声不响地昂着头走出了牢门。

按惯例在死刑执行以前，要履行宣判手续。但是，日伪反动当局不允许"犯人"有起诉的权利。他们被领到一间办公室，站成一排，两旁早已布置好了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宪。军法官一一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剑啸当场大声斥问："你们这些汉奸走狗，我犯了什么罪叫我死？你们投敌卖国，才真正是罪大恶极，中国人民迟早有一天要审判你们……"军法官无言以对，赶快叫看守兵把剑啸和另外四名爱国志士推上刑车。

金剑啸同志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自己酷爱的艺术事业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间。

烈士忠魂永系北国，北国人民不会忘记他，全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永远怀念这位为争取祖国光复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

越 狱 记

适 石

1939年9月中旬，阴霾漫天，凄风苦雨笼罩着古城吉林。

9月23日，伪《大同报》披露一条惊人的消息：吉林省第一模范监狱两名"政治犯"越狱脱逃。

这个爆炸性新闻，轰动了全东北。伪吉林省警务厅连发三道十万火急的《通缉令》，省城的警、宪、特倾巢出动，进行大搜捕。敌人折腾了几天，不得不哀叹："案情极为重大"的越狱犯，竟"毫无痕迹"，"脱逃方法极巧妙，观其动作从容不迫之情形，似有长期计划"。日伪当局"不禁为之瞠目"。

身陷囹圄 壮心不已

伪吉林省第一监狱(吉林监狱)，关押着许多反满抗日的"思想犯"(政治犯)。他们中有共产党员，有被俘的抗日联军的战士，也有爱国青年学生和教师，还有普通的百姓。

狱墙高险，锁不住革命者的雄心；监牢残酷，摧不垮爱国者的意志。

共产党员于树功，河北沧州人，20年代跟随堂兄于树德到北平读书。于树德与李大钊是同学，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

于树功在于树德的引导、教育下，也参加了革命活动，能经常与李大钊、陈乔年，邓中夏等共产党人接触，思想进步很快，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于树功和乌兰夫、马骏、伍修权、朱瑞等同志，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1927年毕业后，于树功、朱瑞等人又被派到苏联炮兵学校学习军事。结业后，正准备回国之际，“中东路事件”发生了。于树功被苏联派往远东（伯力）军区，担任俘虏营营长，管理“中东路事件”被苏联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经教育、这批俘虏于1930夏、秋全部释放。

1931年3月，远东军区派于树功潜回东北做情报和策反工作。于树功提出异议：好多东北军俘虏都认识他，回东北工作不方便、不安全。他的意见被驳回，只好奉命化装成商人，越过尚未解冻的黑龙江，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他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刚到富锦县城，就被释放回来的东北军官兵认出了他，当即将其逮捕，并要就地枪毙。于树功机警地编了一套供词，经过辩白，案子转到吉林省高等法院。最后以“叛徒罪”判处于树功无期徒刑，关押在吉林监狱。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1933年溥仪登基，实行大赦，于树功减为15年有期徒刑。

于树功在狱中表现十分“老实”从不违反监规，因而得到“信任”，被提到监狱医务科做杂役。每天烧水、扫地，有时帮助抄写病志等，相对得到一些“自由”。

但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国难当头之时，怎能甘心做敌人的驯服囚徒？

1936年末，吉林监狱医务科新调来一位年仅18岁的药剂员赵绍先（即赵公民同志）赵绍先是永吉县乌拉街人，3年前，由于生活所迫，从永吉县中辍学，托人进入吉林私立希天医院学徒。

赵绍先年轻好学，人又机敏，自已偷学了一些病理知识。调到监狱医务科后，他除了调剂投药外，有时还代替医生为犯人诊病。这样，他同在医务科做杂役的于树功混的很熟，两人逐渐成了忘年之交。赵绍先尊重于树功，认为他不但有学问，并且有一股中国人的凛然正气。于树功认为赵绍先虽然年轻，但有正义

感，没有染上官场上的俗气，具有一些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每当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于树功就讲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启发他的觉悟。

赵公民同志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写道：

“我调到医务科时，于树功就在药局做杂役。我们天天在一起，他经常给我讲社会发展史，使我认识到旧社会是污秽的，必然灭亡。他还讲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形，使我非常向往。用老于给我讲的观点，我学会了从伪满报纸上分析形势，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通过老于的开导和介绍，利用我的职务便利，我又认识了很多政治犯，交了不少朋友。李复同志就是1938年冬新结识的要好朋友之一。”

李复，原名赫长荣，现名赫洵。1911年生于长春县一个地主家庭。1932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书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任秘书。1932年春，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决定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安葬仪式，当时年仅21岁的赫长荣接受了撰写碑文的任务。1934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北平地下党遭破坏，他同爱人何怡平被迫离开北平，流落到哈尔滨，在私立大陆中学教书。

当时赫长荣同组织失掉联系，思想非常苦闷。但他深知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党的工作，经常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并搞了一些革命宣传活动。1938年，因坏人告密，赫长荣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被判处15年徒刑，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押解到吉林监狱。

赫长荣与于树功在狱中相识了。

于树功又把赫长荣介绍给赵绍先。

由于理想和信仰的一致，他们三人交往日深，彼此信任，无话不谈。1939年二三月份，赵绍先果断地提出要带领他们越狱。于树功同赫长荣交换意见后，表示赞成。

一场越狱斗争开始了

巧施妙计　逃出牢笼

赵绍先新婚燕尔，有个温暖的小家庭。妻子金晰文是个年轻貌美的女高学生。如果苟且偷生，生活也算美满幸福。但是，自从接受于树功，赫长荣的教育后，赵绍先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已不贪恋个人的幸福。他目睹祖国大好河山沦陷，同胞惨遭外族蹂躏，决心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不在敌人的监狱里为虎作伥。

赵绍先常以干活，看病为由，把于树功、赫长荣提到医务科商量越狱的办法。

他们仔细地分析了以往各监狱越狱成败的经验、教训，制定出比较周密的越狱方案。一是规模不能大，只限于他们三人；二是外面要有人接应，事先要把钱款、服装、车票准备好；三是选好暂时隐身地点，联络人员要绝对可靠；四是尽可能寻找最好时机，利用合法手段混出监狱大门。

方案确定以后，赵绍先照常应酬他的差事，还一本正经地准备功课，参加晋级考试。而且考试合格，晋升为“委任官”、“看守部长”，加薪一级。在同僚看来，赵绍先年轻有为，加官晋级，前途无量。可这些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想掩人耳目而已。余暇时间，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越狱的准备上。他利用特殊身分，频繁地同赫长荣的爱人何怡平联系。

何怡平与赫长荣都曾在北平读书，他们既是夫妻，又是共患难的战友。为了营救丈夫，何怡平担负起狱外联络和接应工作。她奔波于吉林、长春之间，找掩护关系和隐蔽地点，并密秘地同北平通信，安排转移去向。她又同婆母商量出卖一部分土地，加上托亲靠友借款，共筹借1000多元伪币。

赵绍先带着于树功的亲笔信，找到曾是于树功同监的难友谢雨天。

谢雨天是1930年10月因国民党员朱一士诬告被捕入狱的，即所谓"吉林五中共产党案"的受害者。于、谢二人在患难中成为莫逆之交。谢雨天出狱后仍不断资助于树功。

谢雨天看了于树功的信，非常高兴，表示支持他们越狱举动，慷慨资助200元伪币。并叮嘱赵绍先，设想要周到，安排要仔细，时机要恰当，行动要沉着，稍有不慎，出了漏子，就会造成千古遗恨。

赵绍先自己当卖了部分衣物，凑了100多元伪币，加上何怡平的1000多元，共计1300百元。费用基本够用了。

金晰文在赵绍先启发影响下，赞助丈夫的义举，并且愿意为越狱出力。赵绍先让她同何怡平一起担负接应掩护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到1939年9月初基本就绪。

一天，赵绍先兴奋地对于树功说："机会到了！"

这时，吉林、奉天（沈阳）、间岛（延吉）三个监狱的典狱长轮流对调。吉林的典狱长走了，新的还未到任。善于拍马屁的看守长令赵绍先带犯人给典狱长公馆搞卫生，消毒。

真是天赐良机。

经过碰头商议，他们把越狱时间定在9月15日。

仅剩几天时间了，赵绍先既激动又紧张。他冷静地想到：在这关键时刻，绝对不能慌张，如有一点疏忽，就将前功尽弃，酿成大错。为延缓越狱后敌人追捕的时间，他首先将家里和亲属家中保存的他本人的照片，全部销毁，不向任何亲属透露出逃的秘密；然后又在监狱里将于树功、赫长荣的"犯人"身分簿（档案）调出来烧了。他还趁值夜班的机会，把自己的档案也盗出来销毁了。

9月15月快到了。

赵绍先让赫长荣装病，这样可以临时搬到病号监休息，这里看管较松。然后再以治病为由，从病号监提到医务科，谁也不会怀疑。并且告诉赫长荣将自己的便衣穿在囚衣里面。

于树功坐牢时间长，自己没有衣服，赵绍先给他一套，让他在里面穿好，以便出狱后脱掉囚衣，最后，赵绍先通知何怡平买好9月15日中午去长春的火车票，并务必等候在车站。

天有不测风云，9月15日到了，可天竟下起大雨。监狱规定，雨天禁止犯人外出作业。眼看到点了，人却未到，可把等在车站的何怡平急坏了。她和赵绍先通了电话。赵绍先很机智，一语双关地说："下雨天，留客天。明天晴了再送客人走吧。"何怡平会意，又换了第二天的车票。

9月16日，天气晴朗。

上午11时许，赵绍先穿着笔挺的警服，挎着"洋刀"，押着两名扛着扫帚和消毒器的"犯人"，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的三道大门。

赵绍先事先就侦察好了地形、路线。他领着二人拐了几道弯，进入没人看管的旧法院的空房里。于树功、赫长荣迅速脱掉囚衣，赵脱掉警服，然后直奔通天厅，雇了一辆车坐到车站。何怡平、金晰文已在车站等候多时。他们从提箱里拿出3套西服，3双皮鞋，三个人在车站的厕所里穿好，衣冠楚楚，显得阔气多了。他们五人顺利地通过剪票口，到站台等候开往长春的火车。越急越出事，火车偏偏晚点10分钟。这10分钟多么难挨呀！直到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大家才松了口气。于、赫二人在洗漱间刮了胡子，若无其事地坐在车上，内心却异常激动。他们意识到，逃出监狱算不得成功，逃离伪满洲国这所大监狱，尽快找到组织，那才是最后胜利。

火车到达卡伦车站，于树功、赫长荣、赵绍先三人按事先约定下了车。何怡平、金晰文则到长春亲属家躲避。

赫长荣对长春郊区较熟，他带路步行几十里，傍黑到了西河堡屯。赫长荣先到表哥家探听动静。表哥李万镒一见惊喜交集，未及多谈，便把于、赵二人接到家里。吃完晚饭，李万镒把早准备好的三套棉衣拿出来，趁夜幕把他们领到村外的高粱地里隐蔽起来。

此刻，号称"吉林省模范监狱"的景况又是如何呢？

当日晚点名时，发现缺了两名"犯人"，监狱上下哗然。经追查得知，"两犯"是经某代理典狱长签发手续，被新任看守部长赵绍先带领外出做工的。犯人脱逃，责任重大，各部负责人难免失职、失查之咎，可也不得不上报伪司法部。

次日，在法院的旧房内发现了囚衣、警服。

日伪当局捉不到赵绍先，便把他的父母抓去拷问，没有结果，不得不放了两位无辜的老人。

历尽艰险　奔向光明

秋天的田野是丰硕的、凉爽的，但夜晚却十分难过，既潮湿又阴冷，加之蚊虫的袭击，使于树功他们三个人难以入眠，只能挨到白天打个盹。

李万镒每天按时送水送饭。

赫长荣让表兄请来小学读书时的朋友李风桐。他是伪村公所的雇员，为人忠厚老实。赫长荣向他讲了实情，请他协助掩护。李风桐慨然应允。

他们三个人在野外度过了七个昼夜。9月下旬，天气更凉了，农民开始磨镰收割庄稼，青纱帐已不能藏身，他们研究了分散转移的新方案。

三位患难战友分手时约定，9月26日中午，在长春吉祥公寓会面，决定下步行动方向。赫长荣让李风桐先去长春探听消息。

赵绍先按时到达约会地点，见到李凤桐，得知长春风声很紧，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敌人搜查了，而且派人监视，亲属家决不能去了。

于树功、赫长荣仍在郊外，不敢进城。何怡平、金晰文①到长春后不知去向。

赵绍先很着急，不能向于、赫请教，也为他俩担心。急中生智，他买了一套新衣换上，又买了一副眼镜，当即搭上火车南下，在开往北平的列车上，他恰好与一个日本商人同座，他故意装作亲密的样子与那人交谈。这为他增添了一些保护色，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到了北平。

按照赫长荣、何怡平提供的地址，赵绍先找到了地下联络站刘静君老人家。经刘老太太帮助，会见了何怡平的好友——北平地下工作者黄绍岩同志。黄绍岩答应向上反映。

随后，赵绍先把经过情况给赫长荣写了封密信。

赫长荣接信后很受鼓舞，也决定动身进关。他有位旧相识叫高孟君，是伪蒙自治政府驻伪满代表机构的事务官，刚好奉调回张家口，路经北平。姓高的很贪财，赫长荣借拜访之机送给他一些钱，他便满口答应愿与赫同行。在高的掩护下，赫长荣顺利地到达北平，也住到了刘静君老人家里。

经过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初步审查后，赵、赫被介绍到京西革命根据地，终于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于树功同赵绍先、赫长荣分手后，因没有可靠关系掩护，没能去北平。日伪当局搜捕松动以后，他辗转流落到西安（辽源），隐名埋姓，在煤矿做工，艰苦度日，直到“八一五”光复。

---

① 何怡平、金晰文二人到长春后，因敌通缉，搜查甚严，站不住脚，便乘车到北平，找到组织，参加了工作。何怡平1942年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幸死在狱中。

1945年东北光复后，赵绍先、赫长荣被组织派往东北工作。

赵绍先曾任永南县县长，改名赵公民，建国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1967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离开人世，年仅49岁。

赫长荣后改名李复、赫洵，曾任吉林省科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委员，1984年3月病故。

于树功由辽源回到北平，靠拉洋车度日，历尽艰辛。北平解放后参加工作，1950年重新入党，曾任北京市文物考察队队长，1985年在北京病逝。

逝者长已矣，伟绩留青史。于树功、赫洵、赵公民同志如今都逝去了。但是，他们不畏强敌的革命精神，英勇机智的斗争事迹，将永远留在人间。

浩 气 长 存

——记抗日英雄王凤阁将军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事迹

刘福德

东北抗日战争初期，在东边道大小罗圈沟的广袤山区，活动着一支民众抗日劲旅。这支队伍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长达6年之久，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使敌人闻风丧胆，并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这支队伍就是王凤阁将军率领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

王凤阁，字阿亭，1895年出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通化县城（今吉林省管辖）。父亲王林，以教书为业，因排行老四，人称王四先生。母亲毕氏，人称王四奶奶，为人贤惠善良，持家教子有方。家里有房、有地、有伐木场，是个富有人家。

王凤阁幼年入私塾读书，毕业于通化县立中学。王凤阁聪明好学，文武双全。他精通乐器，会唱东北大鼓。常跟姐夫李子祥玩枪弄棍，后拜东边道武林高手程东阁为师，练就一身高超过硬的武功。

1925年秋，王凤阁被东北军汤玉麟部聘为中尉武术教练。1926年任12军11师炮兵团上尉教官。因军阀混战，内战不停，他不愿为军阀卖命，1927年便辞职还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凤阁目睹国土沦陷，人民倍遭涂炭，悲愤异常。他主张东北人民必须自卫自救，成立民众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东北。

抗日救国，义不容辞，时不容缓。他立即奔赴奉天海龙、西安（今辽源市）、柳河、临江等地，撒传单、贴标语、街头演讲、演唱东北大鼓书，宣传自卫自救的主张。

1932年4月21日，王凤阁组织伐木工人、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及各界爱国志士600余人，在通化县与临江县交界处的红土崖，揭竿而起，组建了“辽东民众义勇军”，公推王凤阁为司令。

5月8日，王凤阁率部攻克柳河县城，捣毁伪县政府和日本领事馆，收编了公安队，缴获了一部发报机。王凤阁用这部发报机向全国通电，表示“此头可断，此志不丢”的抗日决心，号召爱国志士“奋力兴起，……同雪万方之辱。”

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得知王凤阁占领柳河县城，便派人与王凤阁共商联合抗日大计。王凤阁非常赞成这一主张，将辽东民众义勇军改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王凤阁为十九路军司令。

6月，王凤阁率部在金川（今辉南境内）鹿尾林取得伏击东边道保安司令部田团千余人的重大胜利，占领了金川县城。

8月，王凤阁被委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三方面军中将司令，下属六个路军，3万余人。王凤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率部在通化、柳河、海龙等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的打击了日伪军。敌人将王凤阁视为心腹大患，加紧了对他的部队的围剿和诱降。

日伪当局为动摇王凤阁的抗日决心，企图诱降王凤阁，逼迫通化绅士李某，以师生关系写劝降信，并将其岳母和妻子逮捕，拍了照片，强迫妻舅将信和照片送给王凤阁。王凤阁见信后，当众宣布：“日本人将我岳母和妻子捕去，也决动摇不了我王凤阁的抗日决心！”他告诉妻舅说：“你回去告诉日本人，我王凤阁钢条一根，宁折不弯，抗日到底了！凡我亲友同情我抗日的亲之友之！为日寇甘当汉奸者杀之戮之！”说罢把信撕得粉碎。

1936年秋，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限期消灭东边道一带的抗日联军和自卫军。10月至1937年3月，敌人调重兵对王凤阁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讨伐、围剿。王凤阁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殊死决战，日伪军伤亡惨重。

1937年1月，王凤阁的主要山寨被攻破，大批军用物资被敌运走，王凤阁被迫转移到老虎顶子山寨。

3月初，由于叛徒告密，日本东边道讨伐司令部得知王凤阁转移的情报，便以小越、梁籁、中川为首，重新布置兵力，调动日伪军两千余人，将老虎顶子团团围住。

3月24日，敌人向老虎顶发起进攻，王凤阁指挥部队顽强拒敌三昼夜，部队损失大半，尔后退守一四三四高地。日伪陆空军联合向一四三四高地进攻，飞机轮番轰炸，施放催泪瓦斯，投掷烧夷弹。由于数日苦战，饥寒交迫，弹尽粮绝，部队伤亡殆尽，王凤阁身边只剩40多人。王凤阁决定向大南岔突围，投奔杨靖宇。行至大南岔的王凤阁沟（今称）与敌邵本良部遭遇，激战后撤往小南岔沟，又与敌遭遇，血战一夜，子弹打光了，王凤阁左臂和腿负伤，牺牲了30多名战士。王凤阁对仅剩下的八名战士说："要坚持最后胜利！我们要有中国人的志气，宁死不当亡国奴，同日本血战到底！"说罢把枪摔碎了。

1937年3月27日清晨，王凤阁将军、他的妻子张氏、4岁的儿子（乳名小金子）和蓝德学等八名战士被俘。八名战士押到小南岔沟门被处决。王凤阁与他的妻子和4岁的儿子被押到大南岔老邵家。凶狠的敌人怕王凤阁逃跑，将王凤阁的双手钉在磨盘架子上。4岁的小金子已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有个伪军拿个白面馒头给他，他怒视伪军说："中国人不吃亡国奴饭！"当老邵家的媳妇给他拿了一个玉米面的大饼子时，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下午，敌人用汽车将王凤阁一家三口押送通化县城。临上车

前，王凤阁对乡亲们说："别看我让日本人抓住了，抗日一定胜利。中国不能亡！"

王凤阁一家三口，被押在通化县城南门里混成第一宪兵队本部的秘密监狱。他们虽然身陷囹圄，但毫无惧色，一身民族正气，同日伪当局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

王凤阁一家三口坚决不吃敌人送来的东西。4岁的小金子饥饿难耐闹着要吃的。日本宪兵给他送来了大米干饭团子，里面放两个酸杏子淹制的咸菜，他却摆着小手喊："我不吃日本鬼子的东西！我不吃亡国奴饭！"在隔壁监号里的王凤阁将军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每当听到儿子的喊声，也止不住泪水长流。在场的汉奸，也不得不暗自咋舌惊叹。敌人只好让通化县城东门外的东盛园饭馆徒工刘树斌为他们一家人送饭。

日伪当局先是以诱降手段，企图迫使王凤阁屈服，放弃反满抗日的决心，一天，王凤阁被取下手铐脚镣，由日本宪兵押到通化县城最有名气的东江春饭店。王凤阁走进餐厅。厅内陈设华丽，热闹非凡，几张桌上摆着名酒佳肴，香味扑鼻。桌边围坐着通化县警察署长纪大作、驻通化二团团长廖弼宸等汉奸走狗和一些土豪绅士。王凤阁见到这些衣冠禽兽，大为震怒。王凤阁走到桌前，纪大作面带奸笑地凑到王凤阁面前说："王司令请。"王凤阁怒发冲冠，厉声痛骂这些汉奸卖国贼："见到你们这些忘了祖宗的行尸走肉，真是一生不幸！"廖弼宸强带笑容说："王将军，兄弟今天请客，没有外人，都是乡里乡亲的，请不必客气。我想人生在世，无非为个荣华富贵，做人得识时务，何必自讨苦吃！目前时局你也清楚……"王凤阁猛拍桌面说："住口！当前时局你们是应该清楚！日本滚出东北，中国不会亡，这就是时局。荣华富贵、卖国求荣，卑鄙！我王凤阁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光明正大。你们这些狗东西，当汉奸是民族的败类，绝没有好下场！"说罢，猛地掀翻桌子，酒菜洒落一地，弄得汉奸们

狼狈不堪。廖弼宸只好收起奸诈的笑脸，将王凤阁押回监狱。

敌人见软招征服不了王凤阁，便组织联合审讯。一天，一个宪兵来提审王凤阁，他说："队长要审讯你。"王凤阁怒气冲冲说："我是中国人，你们队长是日本人，他有什么资格审讯我，日本人审讯中国人，天大的笑话，真正应受审讯的是你们。你回去告诉你们队长，我王凤阁不能去，要杀要砍随他的便吧！"宪兵回去向队长报告了情况。队长说："你这次去就说我找他谈谈。"宪兵再次来到王凤阁的监号说："王将军，队长想找你谈谈。"王凤阁说："谈谈可以。"王凤阁随宪兵来到宪兵队部。

"王司令，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卖掉你的家产，买枪买马，当红胡子，与我们作对？"日本宪兵队长问。

"我哪是什么司令！我是普通的中国人。我们也不是红胡子，而是反满抗日的中国军队！为什么与日本人作对你自己明白。你是日本人吗？"

"我是日本人。"

"你爱日本国吗？"

"因为我是日本人，当然也就爱日本国啦！"

"我是中国人，我也爱我的祖国，也绝不容忍你们这些强盗侵略我的祖国！我们反抗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一定能胜利，强权必遭失败！"

"你能与皇军提携，共建王道乐土的新满洲，必享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不是两全齐美吗？何必自讨苦吃。"

"你们有什么乐土？你们侵占中华，烧杀掠抢，残害百姓，无恶不做，中国人决不会答应你们。同你们提携，就是汉奸卖国贼，怎么能对得起祖宗和子孙后代。让我王凤阁投降，办不到。此头可断，此志不移。不过你要记住，中国人是不会饶恕你们这帮强盗的！"

宪兵队长恼羞成怒，便叫几个宪兵把王凤阁架出去。穷凶极

恶的敌人把王凤阁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身负重伤的王凤阁，在敌人的重刑之下，忍受痛苦，没有呻吟。他痛骂汉奸走狗卖国贼，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日伪当局毒刑用遍，软招使绝，一无所获，便对王凤阁一家三口下了毒手。

1937年4月15日（阴历三月初五），天一亮，日伪当局就派人在大街小巷敲锣叫喊，强迫群众出来观看“罪大恶极的反满抗日匪首王凤阁伏法”的场面。通化县城戒严，伪警察、宪兵队荷枪实弹，十步一岗，巡逻队川流不息，城区高建筑物上架着机枪，全城森严壁垒，寒气逼人。

街道两旁站满了人群，人们怀着沉重悲愤的心情，暗暗为将军送行。

9点多钟，警车嚎叫，运送王凤阁一家三口的刑车开了过来。警车鸣笛开道，第一、二辆卡车上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队。第三辆车上便是王凤阁将军，王凤阁的妻子和儿子在第四辆车上。

当日寇将他们一家人押上车时，王凤阁的妻子张氏，看到全家人要赴刑场，特别是看着4岁的小儿子也要惨遭杀害时，心如刀绞，两腿发软上不去车。王凤阁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在日本鬼子面前发抖，抬起头来，勇敢地去死，人一辈子免不了死，能为国为民去死是最大的幸福。”张氏便抱起孩子上了汽车。

敌人为向群众示威，车开的很慢，从日本混成宪兵队本部到柳条沟门刑场，仅3里路程，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王凤阁将军身穿灰色军装，气宇轩昂地站在车上。

四月的山城，冰雪已融，杨柳发青，万物复苏。城区被白色恐怖笼罩，人们的脸上阴沉忧郁，无不暗自伤叹，眼含热泪。

王凤阁望着生他养他的通化县城，和在日寇压榨下的父老乡

亲，感慨万分，他遗憾没有亲眼看到日本强盗滚出中国。他一路上眼含泪水，不断地向父老乡亲亲切地点头致意，把他忧国忧民的心意悄悄地告诉乡亲。当刑车开到柳条沟门刑场停下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放开喉咙高喊："父老乡亲们！为了不当亡国奴，不受鬼子气，这些年来，我王凤阁总算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没有出卖灵魂，对得起祖宗。今天要永别了，可我不在乎，遗憾的是没有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我相信，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伪满洲！乡亲们，再见了！"声音镇定庄严，语气激昂壮烈，震动着人们的心弦，使鬼子惊慌失措。

柳条沟门刑场岗哨林立，警戒森严。几个鬼子兵一拥而上，要架王凤阁下车。王凤阁把他们甩开，昂首挺胸，走向刑场。日寇事先挖了两个坑，让王凤阁跪在西边的坑边，王凤阁坚决不跪，他向日本鬼子说："我不能跪，我活着没向日本人下跪，死了也要站着做鬼。"日本人无奈，只好强把他按坐在地上。通化治安队日本相马教官用战刀将王凤阁砍杀。王凤阁将军为抗日救国，冒危难，抗强敌，一腔热血洒落黄尘，为国殇，为鬼雄，大丈夫可歌可泣。乡亲们都眼含热泪低下头去。

王凤阁夫人张氏，紧紧抱着小儿子，慢步走向刑场，小儿子紧紧搂着母亲的脖子说："妈妈，我不怕，你紧点搂着我。"王夫人抱着孩子跳进东边坑内，慢慢地给小儿子吃奶，小儿子吸吮母亲的乳汁，饱尝最后一次人生的母爱。突然，她看见西边的坑有血迹，她抱起孩子跳进王凤阁的殉难坑里。她对日本鬼子喊道："我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你们杀吧！"话音刚落，敌人从她背后开枪了，母子俩双双倒在血泊里。

噩耗传开，东边道的父老乡亲无不为之流泪，无不为中华民族失去一个优秀儿子而感到痛惜。

新中国成立后，王凤阁遗属所在地的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追

认王凤阁为革命烈士，对王凤阁的遗属给予优厚的待遇，赡养终身。各级报刊以东北抗日名将的称誉，宣传王凤阁的事迹。1982年，通化市人民政府在通化市玉皇山公园，为王凤阁将军树了纪念碑，以永远纪念王凤阁将军。

王凤阁将军英灵不泯，浩气长存！

血 沃 圈 河

——宾县特支副书记吕大千狱中斗争纪实

孙 岩

1937年7月21日傍晚，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圈河四周，日伪警察荷枪实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街道两侧挤满了群众，他们注视着远处开来的一辆囚车。日伪警察从车里押出20几名革命者。他们戴着重镣，步履艰难，脸无惧色，昂首挺胸，一步步走向刑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就义者们激昂的口号声在圈河上空回荡着。这20几名就义者中就有中共宾县特支副书记吕大千同志。

吕大千少年时代就读于宾县中学和哈尔滨二中。从那时起，他就接受了进步思想，曾参加过反对张作霖将东北三省铁路修筑权出卖给日本人的游行示威。1929年，他从北平民国大学（预科）毕业后，任宾县中学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员。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与王哲、孙太仪、季铁中、赵俊臣（现名赵三声）等创建了读书会，向学生推荐革命书刊，同敌人的奴化教育作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吕大千与李梦久（现名李光复）一起在宾县中学组织了抗日宣传队。他经常起草传单和讲演稿，到哈尔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

1933年2月，吕大千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宾县特支宣委、宾县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为帮助游击队解决子弹问题，宾县特支曾派学生韩谋智打入到警察队，多次搞出子弹，顺利转交给游击队。

游击队医疗设备简陋，药品极其缺乏，吕大千便在宾县中学成立了一个医药部（医务所）和化学工艺社。由化学教员王凤元（宾县中学地下党支部组委）负责，以给学生治疗创伤为名，配制些药品，秘密送给游击队。

1936年，日伪政府将宾县图书馆查封，将进步书刊全部烧掉，强迫读书会解散，迫害革命教师，妄图以此扑灭反满抗日的烈火。

1937年4月，中共哈尔滨特委遭到破坏。4月15日，敌人开始大逮捕，我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叛徒供出了宾县特支领导及特支联络点新宾书局。

5月7日，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特务、日本特务警长及十几名伪警乘汽车到王家屯逮捕了宾县特支书记。他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问，供出了吕大千、韩谋智（新宾书局联络员）、赵俊臣、李新东（李有）、季铁中（季兴汉）、季兴周、王希贤、黄静亚等人。

5月13日，伪滨江省特务科对宾县的地下党开始大搜捕。

早晨，宾县中学的教师们正准备上课。教师李梦久（中共宾县中学支部宣传委员）突然发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出现在校园，心中一怔，立即转身将情况告诉吕大千。吕大千沉思一会儿，果断地说：

“看来，走是来不及了。如果我被捕了，你一定要坚持住，不要为我担心。”

李梦久激动地说：“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还是……”

吕大千忙推开李梦久：“我知道该怎么做，快去上课吧。”

吕大千镇静自若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三个特务踹门而入，一个家伙用枪逼住吕大千，另两个家伙

在屋里乱翻了一遍。他们没有搜出什么，只好阴阳怪气地说："吕先生，对不起，跟我们走一趟吧。"这时候，又从外边闯进来几个人，将吕大千按住，拿出绳子。

吕大千奋力挣脱，厉声说："要走就走，用不着这样。"

见捆不住吕大千，站在旁边的日特忙上前说："不要对吕先生这样无礼。实在对不起，请吕先生走吧。"

吕大千蔑视地一笑，坦然自若地走出了办公室。

校园内挤满了人，他们望着吕大千，都为他捏把汗。吕大千微笑着，会意地向大家点着头。

与此同时，另一伙特务闯到吕大千家，他们钻天棚、撬地板，翻箱倒柜地折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

同一天，赵俊臣、韩谋智、李新东也先后被捕。

吕大千被带到伪宾县警务科特务股受审。

特务股办公室是里外套间，外屋是候审室，里屋是审讯室。日本特务警长戴金丝边眼镜，身佩战刀，见吕大千进来，客气地让吕大千坐在他的对面，翻译坐在右侧。

审讯开始了。

日特警长问："你就是吕大千吗？"

"是的！"

"你为什么要抗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你这样做，不觉得有罪吗？"

"我没有罪，你们无故逮捕我，侵犯我的人身自由，你们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有罪的是你们！"吕大千厉声驳斥。

"你不必再和我兜圈子了，你是宾县特支副书记，只要你将宾县共产党的重要情报讲出来，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日特警长显得有些不耐烦。

吕大千斩钉截铁地回答："你说的这些，我全不知道，即便

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你……”日特警长被气得脸色发白，忽地站起来，又故做镇静地将战刀摘下，靠墙站了一会儿，然后背着手来回踱步：“看来你是不想说了，不过有个人你是认识的，他就是你们的特支书记，他供出你也是宾县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你能象他那样和我们合作，不要让我们失望。”

“我根本不认识他。”吕大千镇定地回答。

日本警长说：“既然这样，不防就让你们见一面，认识一下吧。”说完，他转身告诉翻译去提宾县特支书记。

吕大千面对这个阴险狡诈的日特警长，思索着应变良策。他看到那把战刀，精神一振。此时屋里只剩下他和日本警长。吕大千暗想：何不乘此时机把他杀了，也算我为国报仇，替死去的同胞雪恨。

日本警长离开桌子，背过身去。吕大千迅速跳到墙边，拿起战刀向日本警长砍去！日本警长听到响动，忙侧身躲闪，夺门逃窜。吕大千挥刀追赶，日本警长拚命顶住屋门，吓得嗷嗷直叫。吕大千见没有砍中敌人，又推不开门，此时门外一阵大乱，敌人警卫纷纷赶来，在这一瞬间，吕大千下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宁自杀身亡，也不让敌人折磨死。他毅然举刀颈下，用力一抹。敌人冲进门时，吕大千已昏倒在血泊中了。

日本特务机关妄图经过审讯，把宾县的共产党全部捕获。没想到吕大千竟夺刀拚命，把他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经过抢救，吕大千脱险了。敌人把他、赵俊臣、韩谋智、李新东，还有已经叛变的那个特支书记押解到了哈尔滨警务厅刑事科第四监。

哈尔滨刑事科监狱地处道里江沿附近。第四监关押的都是政治犯。多数是抗联战士，还有部分苏联人。监舍中间是一条走廊，两侧是牢房。为了防止串供，敌人将吕大千等五人分别关押

在四个监号。

吕大千一连三天昏迷不醒，后经狱医治疗，逐渐好转。他的身体刚刚恢复，便开始考虑这次党组织被破坏的善后处理的问题。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被捕，他开始做那个已经叛变了的县特支书记的工作。

吕大千在一次放风时，趁看守不在，来到县特支书记的身边，低声说："你背叛了组织，泄露了党的机密，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由于你的过错，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声音虽然很低，却重重地击打在原特支书记的心上，他怯怯地说："在敌人严刑拷问下，我实在坚持不了了，不得已才说的，现在后悔莫及，我对不起组织和同志们……"

"现在不是讲这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大家坚持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一个奋斗目标斗争到底。告诉你，就是死也不能再扩大面了，千万不要再牵连任何人了。"

听完吕大千的一席话，县特支书记感到无地自容。在吕大千视死如归的精神影响下，他再也没有暴露党的其它秘密。

吕大千又转身走到赵俊臣身旁说："你们要挺得住，千万不能暴露身分，豁出我一个人和敌人拚。敌人若问，你们就说我们是师生关系，别的什么也不要承认。只要你们坚持住，敌人就不会把你们怎么样。出狱后，你们要继续干下去！"

吕大千对抗日救国忠贞不渝，在狱中以各种形式同敌人展开斗争。

吕大千受伤后，敌人未给他戴脚镣，而其他四名同志却拖着沉重的镣铐。他向敌人严正提出抗议，指问："这里的政治犯是不戴镣铐的，你们凭什么给他们戴上？"开始敌人不理睬他，吕大千据理抗争。敌人觉得吕大千很难对付，"纠缠"下去怕惹出麻烦，只好答应去掉四人的镣铐。

吕大千为鼓舞难友们的斗志，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暗淡

的光线下，挥笔疾书，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时代转红轮，
朝阳日日新；
今年春草除，
犹有来年春。

他将这首诗念给隔墙的原特支书记，政治犯们也暗中传诵着，关押在二号监房的抗联战士们更是齐声称赞，拍手叫好。吕大千牺牲后，这首诗由赵俊臣从狱中带了出来，今天仍珍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

这期间，吕大千曾多次被提审。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利诱，施用种种酷刑，吕大千始终坚贞不屈。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的！"

1937年年6月13日，伪警务厅特务科将此案送交第四军管区伪军事法厅审理后，将吕大千、县特支书记、赵俊臣、韩谋智、李新东等五人用囚车押送到哈尔滨道里监狱（中央大街北头警察街，现在的友谊路）关押。

监狱四周戒备森严，高大的院墙，密集的铁丝网，使这座吃人的魔窟更显得狰狞恐怖。

牢房里潮湿阴冷，光线暗淡。白天，从狭小的窗口透过一丝微弱的光线。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在寒气袭人的地上。牢房里的卫生条件极差，蚊蝇乱舞，粪便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恶劣的环境，使许多犯人病倒了。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犯不断死亡。如狼似虎的看守、狱吏横眉瞪眼，不准犯人相互讲话，违犯者，轻者挨一顿臭骂，重者便是一顿毒打。非人的待遇，恶劣的卫生条件，使犯人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吕大千看到这一切，认为狱中的难友们只有团结起来，经过

斗争，才能改变现状。难友们推选吕大千为代表与狱方进行交涉，提出改善伙食，到户外活动，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合理要求。吕大千理直气壮地对狱官说："如若不答应上述条件就绝食，一切后果概不负责。敌人唯恐这些政治犯闹事，只好满口答应。斗争取得了胜利。从这以后，伙食有所好转，饭也给得多了，汤里有了些菜，还另给一份咸菜；放风时间也延长了，还可以排队走动；牢房的卫生也有好转，重病号得到了医治。

敌人虽然作了让步，但对带头闹事的吕大千却怀恨在心。一天，监房里一阵喧哗，政治犯们预感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敌人在搜查监号时，发现吕大千的监号里有半根锯条。敌人终于找到了报复吕大千的机会，以预谋越狱的罪名，把吕大千关进了"黑号"。

"黑号"是一间特殊的牢房，专门惩治"特殊"的犯人。它设在地下室，里面十分潮湿。墙上、棚顶全是发霉的黑斑，还不时顺墙滴下串串水珠。墙上到处是蜘蛛网。地上堆满了拉圾粪便，老鼠满地乱窜。"黑号"没有窗户，不点灯，一片漆黑。狭小的屋子里臭气扑鼻，令人窒息。

吕大千戴着沉重的镣铐，被看守推进这所人间地狱。敌人为了治服吕大千，从肉体到精神上对他进行百般折磨。每天两餐给他吃发霉的饭菜，轮番施行残酷的刑罚。他们常常将吕大千高高吊起，用皮鞭不断地抽打，打得吕大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吕大千怒视敌人，一字不吐。敌人见他咬牙不语，又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等各种酷刑。吕大千被折磨得七窍流血，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在"黑号"里关押一周，吕大千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始终没有屈服。

吕大千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使党组织免遭更大的破坏。

1937年7月20日，第四军管区伪军事法厅判处赵俊臣、韩

谋智、李新东5年徒刑，缓期执行。7月21日，判处吕大千死刑。

年仅28岁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吕大千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在敌人的枪声中，倒在圈河的土地上，鲜血涓涓地流入身下的泥土……

逆境显本色

——记中共大连市委1937年8月遭敌破坏及被捕同志的狱内斗争

张庸富　　陈后言

1937年4月，哈尔滨特委遭破坏。敌人在特委书记韩守魁(孝先)住处搜查时，发现了大连市委的通信地址（当时大连市委归哈尔滨特委领导）。大连日本宪兵队协同关东厅警察部于4月17日将李明吾、王清志及李明吾之妻一起逮捕。7月，敌人开始对王、李进行刑讯，因二人惧怕酷刑而变节，供出了大连市委及所属的组织情况。于是，敌人从8月2日到12月末进行了大搜捕，被捕者达124人之多。中共大连市委遭到严重破坏。

敌人的疯狂破坏使我党在大连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后，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始终不动摇，保持了革命气节。无论是在警察署和宪兵队的刑讯室里，还是在法庭上和监狱中，他们不惧酷刑，不被利诱，与敌人进行了特殊的斗争。

不畏酷刑

魏翊纲（魏荣森）山东省寿张县人，1936年3月在满洲铁道工厂做工时，由翟清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前曾任沙河口铁道工场党支部书记。1937年8月2日，在敌人大逮捕中落入敌手。

被捕后，初期被关押在大连独立宪兵队。为了保守党的秘密

和同志们的安全。在敌人审问时，他抱着一死的决心，拒不承认任何问题。敌人使用了种种酷刑，跪木板、压杠子、灌凉水，用烟头烧他的脸。在敌人的百般折磨下，他不动摇，宁死不招。并用绝食的方式同敌人抗争。敌人为了不让他死去，给他打针，强灌流食。他决心以死与敌人抗争，想触电自杀，却够不着电线。用木头狠砸自己的睾丸，虽一时昏死过去，但又苏醒过来。

日宪兵队问他："你参加共产党干什么？"

魏答："反满抗日，打倒一切在华帝国主义。"

日宪兵吼叫："那么一吉（日文音译，意为吹牛）。"掌刑的鬼子又给他灌凉水，然后用大皮鞋踩他的肚子。这样灌了踩，踩完又灌，反复好几次。血从他的口鼻里流出，惨不忍睹。后来日警又叫他跪地举起椅子，魏怀着满腔怒火，举起椅子照窗户砸去，随即一头撞上去，想跳楼自杀，身子虽出去了，脚却被敌人扯住。几个日本宪兵把他拽回屋里。

尽管他被折磨得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可日本宪兵还要他供出其他党员的情况。为欺骗敌人，拖延时间，他供出几个假姓名、假地址。日宪兵便派便衣去调查。结果什么也查不到。敌人更加恼羞成怒，再次对他进行审问拷打。

魏说："他们都是活人，不会跑呀！我领你们去！"

他本想找机会干掉两个敌人，然而敌人一边一个架着他走，他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跟着几个日宪兵到了船坞。敌人把工人都排起来，让魏一个一个认。

魏说："一个没有，大概他们都跑了。"

又到寺儿沟去一趟，也未找到，他对敌人说："他们对我说过家在这一带，我也从未来过。不知他们搬到哪去了。"

他就这样蒙骗敌人，保存了基层党的组织和同志们。但他几乎被日宪兵打成残废，最后他被判处6年徒刑，转"关东刑务所（旅顺监狱）关押。

机智斗敌

工人出身党的基层干部郎廷常(龙超)是山东省东阿县人，后因家贫到大连南满铁路当工人。1936年由市委书记王清志介绍入党，曾任大连市委下属特别支部(几个单位党员编在一起)书记。1937年8月2日被捕。

郎廷常被捕后，关押在大连小岗子警察署，日警对他施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灌凉水，灌辣面子，坐电椅、坐“飞机”，藤条抽，一连几天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好几次，但他抱着坚定的信心，同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不暴露身分，不泄露党的秘密。

在审讯中，敌人问他：“红军白军是啥？红党白党是啥？”

郎说：“不知道。”

警察拿几个人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不认识。”日警用刑，郎当场表示：“你们愿埋就埋，愿烧就烧，我是不知道！”敌人继续用刑，郎说：“我知道了。”敌人马上给他端茶，又给拿点心。郎用戏弄的口吻不慌不忙地说：“红布在头上就是红军，白布在头上就是白军。”敌人恼羞成怒，又将他毒打一顿。郎廷常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只说参加了“同乐会”，后来又装疯。

敌人将市委书记王清志押到郎廷常监房对面号里，他趁机写纸条给王说：我什么也没承认，只说参加过同乐会，没承认是共产党，也没供出其他人。”放风时，他机警的作手势，对王清志咬手，拍拍心，表示谁也别连累。后来敌人再审问王清志时，王翻了供，否认郎廷常是共产党员，并说“同乐会”是群众自己搞的一般朋友义气组织，和共产党没有关系。”

因为敌人始终没有从郎庭常口中得到任何证据，加之王、郎

二人口供一致，使日本警察署无法定罪。郎廷常被关押6个月后即获释放。

郎廷常出狱后，回原籍山东又找到了党的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奋斗不止

王其焕（王英武）、翟清平（翟治臣）二人，是1937年8月在敌大逮捕中落于魔网的。被捕后均遭受各种毒刑拷打，后在王清志与他们对供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分，但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后被关东厅法院分别判处5年徒刑，关押在旅顺监狱。

他们在旅顺大狱中，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积极开展狱内斗争，秘密建立了党小组，以“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力量”为指针进行工作。为此，他们经常与一些比较进步的难友接触，了解情况，进行教育。1939年春他们监房来了一个叫宁学贤的难友。这人原在日本人开的服装店学徒，因不堪忍受日本人欺压，刺杀日本经理未遂而被判8年徒刑，他对日本人非常仇恨。王其焕、翟清平便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利用在一起劳动的机会和他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宁学贤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共产党有了明确的认识，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

1941年秋的一天，王、翟利用“放风”机会，将宁领到一个墙角，郑重宣布：“我们两人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王其焕领着宁宣了誓，从此由王、翟、宁三人组成了狱中支部（没有准确名称），王其焕为负责人。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中利用特殊的形式继续领导着狱内斗争。如监狱当局强迫“犯人”喊“大日本帝国万岁”时，他们就以发音不清的办法将“板再”（日语为万岁）喊成“板过来！”意思就成了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在监内广为传播，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中共大连市委遭敌破坏，被逮捕的同志普遍受到了敌人酷刑拷打，备受折磨。有的被判处5年至12年徒刑，其余被捕人员也都在大连警察署或大连宪兵队被拘押很长时间，带着满身伤痕才被释放。被捕同志虽然身陷囹圄，除个别人叛变外，绝大多数同志革命信念毫不动摇，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许多同志出狱后，都重新回到了党的组织，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他们的毕生力量。

煤都忠烈

——记1937年抚顺特支被捕同志的狱内斗争

王宝来

抚顺素以“煤都”著称于世，已有近百年的开采史。这片土地和人民先后受到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蹂躏。工人阶级曾自发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非常重视抚顺煤矿的工人运动，并把抚顺作为党的中心活动区域之一，多次派得力同志到抚顺领导矿工斗争，发展党的组织。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加之党内存在着组织不纯的问题，致使抚顺党的组织一次次地遭受破坏。特别是1937年10月的破坏，对我党的损失和影响最大。

一

1933年4月，中共抚顺特支被破坏后，抚顺地区党的组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1936年1月29日，抗联一军军长杨靖宇派张佐汉[①]到抚顺做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1936年2月，据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建立了中共

① 张佐汉，别名王心一。1933年参加革命，担任过《抚顺大同报》社记者，1935年3月入党。牺牲时31岁。

南满省委，杨靖宇任书记，兼抗联一军军长和政委，张佐汉直接受中共南满省委的领导。

张佐汉到抚顺后，找到了亲属王绍纯① 和石翔振② 立即着手工作。他秘密宣传革命，认真考察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展了周鼎仲③、许士博④ 和李壮猷⑤ 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建立了抚顺支部，张佐汉任书记。同年9月15日，经周鼎仲介绍，张贵恒⑥、佟书庵⑦、石翔振、佟保功⑧、丁宝珩⑨、蔚占春等又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抚顺支部的党员在各种行业里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和领导广大煤矿工人开展斗争。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抚顺地下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党在抚顺工作局面也已打开。为适应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根据南满省委的指示，抚顺支部于1937年4月改为中共抚顺县委，张佐汉任书记，王绍纯负责组织工作，周鼎仲负责宣传工作，张贵恒负责救国会工作。县委成立不久，又有肖

---

① 王绍纯，又名王精一。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抚顺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牺牲时28岁。

② 石翔振，又名左鉴。1945年光复后出狱。1961年任哈尔滨松江罐头厂车间主任。

③ 周鼎仲，又名周绍雍。1936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为抚顺县委、抚顺特支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牺牲时25岁。

④ 许士博，又名许迪生。1930年8月入北京高等学校县治专修科。后回家乡任小学教员。牺牲时29岁。

⑤ 李壮猷，抚顺县人。参加革命之前，于县公署工作，任雇员。牺牲时30岁。

⑥ 张贵恒，又名张立久、立夫。历任抚顺县公署、中东铁路传习所等部门的文读员、科员、科长等职。牺牲时37岁。

⑦ 佟书庵，又名佟雅男。“九一八”事变后失学在家。后到锦州省公署财务科当雇员。牺牲时20岁。

⑧ 佟保功，又名佟有光。历任小学教员、抚顺县公署财务局催征员、抚西分局主任。牺牲时32岁。

⑨ 丁宝珩，又名丁子佩。任过小学教员、雇员等职。牺牲时29岁。

启亮①、贾富英②、崔、尧章等加入了党组织。这时，抚顺县委有党员二十余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围剿抗日武装，加紧镇压革命运动。为适应形势，继续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开展斗争，中共南满省委派联络员纪儒林③到抚顺县委指导工作，并传达了中共南满省委关于“抚顺县委由于经费很困难，而且人员较多，不易统制，故废止县委，成立抚顺特支”的指示。8月11日午后3时，于抚顺城东二道房子王绍纯家中，召开了改组中共抚顺县委为中共抚顺特支的会议，宣布了中共抚顺特支组织机构及领导成员名单：张佐汉任抚顺特支书记，王绍纯负责宣传工作，苏振久④负责组织工作。特支还不知道，五个月之前，苏振久已经叛变了革命。

二

那是1937年3月上旬，叛徒陶少经向日本宪兵队报告：“苏振久与东边道之红军及抚顺县委有关。”奉天警察厅马上将苏振久逮捕。在审讯中，敌人软硬兼施，仅三天的时间，贪生怕死的苏振久，便变节投敌，答应做敌人的密探。并于5月29日，隐瞒其日寇密探的真面目混回抚顺县委机关，编造理由骗取了党的信任，

① 肖启亮，抚顺县人。1937年7月，报考抚顺县街村会计员训练班。在恒泰旅馆学习时，经张佐汉、张贵恒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在方晓屯村公所任会计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牺牲时27岁。

② 贾富英，号叔田，抚顺县人。1937年6月，在恒泰旅馆学习时，经张佐汉、张贵恒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光复前夕牺牲于狱中。

③ 纪儒林，又名王品三。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调盘石中心县委秘书处工作，曾任中共南满临时特委委员，省委联络员等职，牺牲时28岁。

④ 苏振久，河北省人。1927年在沈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8月至1929年1月曾先后任抚顺特支负责人。1937年10月出卖抚顺地下党组织，致使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张佐汉等13人被害。解放后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刑前病死于狱中。

恢复了组织关系。

6月13日，抚顺特支临时改组委员会，于西公园（现儿童公园）召开秘密会议，苏振久事先将会议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情况密告给奉天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遂派特务武田事先埋伏在会场附近，偷拍了整个会场和参加会议的人员。苏振久还先后窃取了《县委决议事项》、《县救国会章程》、《张佐汉给南满省委之报告》、《王明自莫斯科寄给中央之通讯》、《东北抗日救国南满总会行动纲领章程》、《新政策》、《民族统一战线》等文件及宣传材料。此外，苏振久还经常将我党活动情况向日寇密告。

中共抚顺特支改组后，苏振久窃取了特支的组织大权，掌握了党员名单，工作方针、计划及一些重要文件。他以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和搞经费为名，回到奉天。但一去就没有消息。

9月下旬抗联三师师长王仁斋同志派机枪连长傅景生和指导员石振华二人前去联系，到奉天后被捕。王仁斋又派纪儒林和张佐汉二人去奉天探听消息，也被苏振久出卖，被捕入狱。

10月3日，奉天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和奉天城内宪兵队长，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带领20名宪兵特务乘火车到抚顺。在站前筑紫旅馆与抚顺伪分遣队、伪警察署、伪警务局等高等官员，协商研究逮捕共产党人的具体方案，组成了有94名宪兵特务的逮捕队，分成七个小组，开始了对抚顺特支的大破坏，对共产党人的大逮捕。

10月4日上午9时30分，抚顺城乡到处响起狼嚎般的警车笛声，敌人到处搜查捕人，到5日下午3时许，敌人共逮捕了29名我地下党员和抗日骨干分子（其中佟书庵在锦州被捕）。下午4时，敌人把被捕人员的眼睛蒙上了黑布，押送到奉天，关押在宪兵队和警察署里。敌人又到清原县财神庙和抚顺县城，将王绍先和石翔振逮捕。至此，抚顺党组织遭到一次空前严重的大破坏，

共有31人被捕。

三

抚顺特支被破坏后，敌人为了防止被捕的共产党员互相联系，互通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分散关押的方式。开始，除了张贵恒和舒玉洗①关押在一处外，其他人都是一个人一个监号。

敌人从10月7日开始，以奉天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西田少佐为主审官，分别对我地下党员用尽了各种残酷的刑罚，进行了法西斯的刑讯。刑讯也是单独进行的，为了使革命免受更大损失，许多同志宁死不屈，在严刑拷打下，不肯吐露一句真情。

纪儒林是1937年夏接受中共南满省委和杨靖宇的派遣到抚顺指导工作的。被捕入狱后，敌人从叛徒那里得知他的身分，所以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轮番审讯，严刑拷打，不让他休息和睡觉，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拒不招供。后来，当他得知苏振久叛变革命，出卖了党的组织，敌人对自己的身分早已了解时，便毅然承认自己是省委的联络员，并编造了一些假口供，对付敌人。

张佐汉在敌人的刑讯中，受尽了摧残，但他无所畏惧。为了保护他在临江办报时结识的所有同志的安全，他故意把1934年春到临江工作的时间说成是1935年底，以麻痹敌人。对于抚顺县委，抚顺特支的活动及党员情况，张佐汉拒不承认。敌人拿出苏振久提供的组织机构表、党员名单、会议照片、会议纪要及一些机密文件，张佐汉大吃一惊，才知道苏振久早已叛变投敌。

共产党员朱成业②是被打得最严重的。敌人用尽了种种刑罚，

---

① 舒玉洗，曾用名舒依革。抚顺县人，小学教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被释放后脱党。1960年任抚顺矿务局制材厂业校教员。

② 朱成业，又名朱毅[illegible]，抚顺县人。1928年托人到大东洲医院与栾德轩医生学医6年。牺牲时28岁。

夜以继日地审讯，使他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但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不肯向敌人屈服。

抗联三师机枪连连长，共产党员傅景生，在刑讯中，敌人把石翔振带到他的面前，问他认不认识，傅景生为了保住同志的安全，矢口否认："我们不认识！"敌人见傅景生不承认，气急败坏地把他勒晕过去好几次。敌人还用"压杠子"的酷刑折磨傅景生，把他的两个腿肚子都压开了花。但是，傅景生至死没有承认。

在狱中，共产党员们不仅不向敌人屈服，不吐露一点党的秘密，而且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敌人虽然分散关押被捕的共产党人，企图割断同志之间的联系，但是狱中的同志并没有因此而失掉联系，他们千方百计地传递信息。王绍纯得知党组织是苏振久出卖的以后，立即秘密地告诉了关押在隔壁的王静久、舒玉洗等人。他说："我们是苏振久出卖的，谁出去也不要忘了报仇。"

敌人在审讯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就耍花招，让特务扮作犯人，打进狱中，企图了解情况，抓住线索。但是，共产党员们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没有给敌人一点可乘之机。

共产党员石翔振，被捕前是学校教员，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他把从张佐汉那里学会的《红旗歌》教给学生们，激发了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强烈不满。石翔振被捕入狱后，敌人就说："你们这些个教员，把学生的心都给教红了。"审讯中，敌人对石翔振施用种种刑罚，打晕过去就泼凉水，直打得石翔振的脊背没了皮，打碎的背心粘在肉上，鲜血淋淋，晚上睡觉不敢躺着，只能趴着。一次审讯，有一个中国翻译对石翔振紧问不舍，石翔振乘日寇审判官外出解手时，义正词严地对翻译说："煮豆燃豆萁，何苦逼太急。你我都是中国人，祖国观念我

是有的，什么叫共产党，我一点也不懂。看你问的那样详细，你也许是个共产党。”问的翻译官哑口无言。他接着说：“如果逼我承认是共产党，你能升官发财，那么你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然的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是个教书的，只知道赚几个钱养活一家老小，其它事我一概不知道，只好由你们处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翻译官。

就这样，狱中的同志不仅和敌人硬碰硬，而且还变换着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斗争。

他们在狱中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表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崇高精神。共产党员张贵恒，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因为他是伪县公署的股长，又是抚顺特支的骨干，敌人对他的迫害尤为凶残，施用了灌凉水、灌煤油、上大挂、坐老虎凳、冷冻、过电等种种酷刑。敌人日夜审问，百般折磨，但他拒不招供。当他知道党的秘密已被叛徒暴露，就毅然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开脱同志们的责任，减少党的损失，他说自己是“主谋”。主审官西田少佐听了很不满意，并用枪毙来威胁他。张贵恒怒目相视，高声喝道：“我是共产党员，反满抗日，理所当然，纵然一死也在所不惜！”气得西田暴跳如雷，马上给张贵恒施用重刑。心狠手毒的敌人用日本木剑把张贵恒的左臂骨劈折，两个手的指甲全被打紫了，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同室难友，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主张。

清原农民王绍先因帮助抗联，于10月28日被捕。敌人把他押到沈阳宪兵队后，投入张贵恒所在的牢房。张贵恒很同情他，一方面在生活上关心他，劝他不要着急上火。另一方面向他宣传鼓动。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因为抗日救国而被捕，为了让王绍光对共产党有所认识，张贵恒给他讲党的性质和主张。他说：“我们不抢不夺，为的是国家。有国才有家，无国便无家。我们就是死了，也是光明磊落的！”他的共产党员的气质深深感动和教育了

王绍先。

张贵恒同志虽然身在狱中，被敌人酷刑至残。但他毫无悲观情绪。为了同敌人斗争，为了争取活着出狱继续为党工作，他每天坚持做早操，采取各种方法锻炼身体。他还以顽强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牢房里黑暗潮湿，条件十分恶劣，但他始终坚持学习俄文。敌人的一次次刑讯使张贵恒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常常彻夜不眠。他的嗓子哑了，嘴唇干裂了，整个左臂和手肿得老高老高，连饭碗都不能端，可同志们还常常能听他哼唱革命歌曲。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次，他哥哥给他送衣服，他挥拳将自己的鼻子打破，给党组织写了一封血书，让他哥哥设法将此信交给党组织，以便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情况。

四

残酷的刑讯进行了一个月，除叛徒提供的情况外，敌人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不得不于11月5日将刑讯结束。

17日，敌人做出奉警委第八〇六号《关于对逮捕之抚顺特支有关人员之处理的报告（通报）》称纪儒林、张佐汉、王绍纯、张贵恒、周鼎仲、李壮猷、许士博、朱成业、佟保功、石振华、傅景生和王绍先等十二名“据其犯罪事实已无酌量余地，且又无悔改之意，故按违反暂行惩处叛徒法第一、七条附处以极刑之意见，于12月19日连同人犯材料，证件一并移送第一军事管区司令部军法处依法惩处（羁押于奉天陆军监狱）”。

12月3日，奉天第一军管区军法处又将丁宝珩、肖启亮、佟书庵三人判为极刑。对傅景生等人分别判15年徒刑和10年徒刑。王绍先等因证据不足释放。

宣判的当天，天气寒冷，北风凛冽，路边的树枝发出呜呜的

响声，象在为即将赴刑场的共产党员们哭泣，象在诉说着这人间的不平和悲愤！

敌人将被宣判处以极刑的纪儒林、张佐汉等13名同志用黑布蒙上了眼睛，五花大绑推上了汽车，汽车上架着机枪，坐满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直奔奉天小河沿。一路上，十三名同志视死如归，气势雄壮地高唱着《国际歌》和《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尸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红了旗帜……
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
誓不战胜，终不放手……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悲壮的歌声在奉天的上空回响着，在东北的上空回响着，在祖国的大地上回响着……

铁骨巾帼　气贯长白

——记抗联女战士李桂顺的狱中斗争事迹

唯　雪

1937年12月26日，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东北大地上熊熊燃烧的时候，又一位巾帼英杰壮烈牺牲，鲜血洒在长白山麓的雪地。

这位女烈士就是东北抗日联军二军六师八团女战士李桂顺。

李桂顺，1914年11月出生在吉林省和龙县金谷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家庭。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年满14岁的时候才在金谷村一所小学里得到了读书机会。因为这个学校的老师具有爱国思想，经常间接地向学生讲些革命道理，使李桂顺从小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入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面临中华民族危亡的形势，李桂顺毅然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担任了共青团秘密交通员。不久，因工作需要，又被组织派到药水洞担任了平岗区的妇女主任。

1933年5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被调到安图县车厂子从事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1936年春，李桂顺所在的游击小分队与东北抗日联军二军六师八团会合，被正式编入抗日联军。这一年的冬天，李桂顺所在的团部奉命向长白县黑瞎子沟进军，后又转战到抚松县。因为冬季寒冷，李桂顺没有棉鞋穿，

冻伤了双脚，便留在抚松县后方医院养伤。在医院里，她与另一位伤病员南昌洙建立了感情，伤愈不久，他们结成了革命夫妻。结婚后，双双回到各自的队伍。

1937年春天，李桂顺所在的部队要向蒙江县（今靖宇县）远征。由于李桂顺已经怀孕，不便于频繁的行军作战，便被派往长白县黑瞎子沟密营医院，一边等待分娩，一边护理伤病员。

1937年12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告密，日寇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我密营医院。

当时，这个医院里只有军需部的朴部长，四连长李斗洙，司务长老王和老崔，加上李桂顺，共计五个人。

李桂顺正在为几位伤员做饭，听到枪声后，她迅速通知几位伤员转移，又赶紧把剩余的粮食藏了起来。五个人正准备往后山突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人越逼越近。在这严峻的时刻，朴部长宁死不屈，跳崖身亡。老王和60多岁的老崔当场中弹被捕。为掩护四连长李斗洙突围出去，李桂顺机智地把敌人引向自己。李斗洙脱离了险境，李桂顺却负伤被捕。她和老王、老崔两位战友同时被押送到长白县第四监狱。

多少天来，敌人到处寻找抗日联军的主力，抓到李桂顺后如获至宝，在她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敌人以为，一个年轻的女子，只要上了酷刑就会软下来。于是，对李桂顺施行了各种酷刑，钢鞭、皮带抽得她皮开肉绽；尖刀、铁锥扎得她浑身流血。但是，李桂顺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和未出生的孩子的安危，只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中华儿女，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一切。每当皮鞭抽在她的身上，尖刀扎进她的肉中，她便想起和她在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有的伤员用罐头盒做手术刀，锯掉肉体中化脓的部分；有的伤员用斧头砍掉了自己腐烂的脚趾，又有多少人壮烈牺牲……每想到这些，李桂顺就好象忘记了疼痛，她咬紧牙关，对敌人怒目而视。抽吧！扎吧！打吧！共产党人的骨头是

钢铁铸成的。

敌人为了威胁她，摧残她的意志，竟残忍地杀害了老王和老崔，将血淋淋的人头扔到她面前。

“说吧，不说你也是这样的下场！”面对牺牲的战友，李桂顺十分悲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坚定地对敌人说：

“要杀就杀吧，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说着，她把头伸向敌人。

敌人从李桂顺嘴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共产党人不怕死”的精神使他们感到动硬的无法达到目的，便由威逼改成利诱。敌人假惺惺地对她说：

“只要你说出抗日联军到了什么地方，我们马上就给你自由，给你官当。”

坚贞不屈的李桂顺根本不听这一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就是给我一座金山，也别想在我嘴里得到什么。”

1937年12月23日，在敌人的监狱里，李桂顺带着满身伤痕临产了，生了一个男孩。

产后不到三天，敌人再一次提审她，并狡猾地对她说：

“现在什么也不问你了，只要你当着老百姓说共产党不好，抗日联军有罪就行了。我们可以释放你，还可以给你官当，保你母子平安。否则要把你的儿子点‘天灯’，把你的头砍下来示众。”

一听说把儿子点“天灯”，李桂顺的心都要碎了。以前她曾有过一个孩子。1933年初，她在和龙县参加游击队以后，曾与和龙县委书记金日焕相爱并结为夫妻。婚后，他们并没有迷恋于家庭生活，仍然同往常一样奔波于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想不到，1934年11月，正当他们烽烽火火地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时候，丈夫金日焕因“民生团”嫌疑被错杀。这时候，她已经怀孕。她忍着悲痛埋葬了丈夫的尸体，又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当她参加抗日联军，并要随军向长白县黑瞎子沟进军时，她的女儿还不到两周

岁，就忍痛交给婆母，从此母女再也没有见面。现在，这个儿子还不满三天，又要成为敌人的牺牲品，她心里怎么能承受呢？作为母亲，哪个人不心疼自己的儿女？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抗联战士，又怎么能做有损于共产党，有损于抗日联军的事情呢？宁可洒尽鲜血，也不能为敌人做宣传；就是把儿子的身体点燃了，也不能屈服，不能背叛党，背叛抗日联军！可她又一想，如果能和群众见面，不正是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好机会吗？于是她假装答应了敌人的要求。

敌人以为李桂顺是因为心疼自己的儿子而发生了动摇，对她的答应没有丝毫怀疑，而且非常得意地为她拟好了污蔑共产党和抗日联军的讲话稿。

12月26日，这天是集日。敌人把进城赶集的老百姓逼到满洲街朝鲜族小学院内，让他们参加大会。学校周围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四处架起了机关枪，站满了持枪的日伪军。

上午11点多钟，天空布满了乌云，长白县城处于黑暗之中。李桂顺在敌人的押解下，从容不迫地走进了会场。敌人狞笑着把事先拟好的讲稿递给她。可是，愚蠢的敌人又一次打错了算盘。只见李桂顺怒视着敌人，把讲稿撕得粉碎。随即昂起头高声喊道：

“穷苦的乡亲们，抗日无罪！抗日联军是为了解放全中国的老百姓而打敌人……”

她的话铿锵有力，吓得敌人目瞪口呆。

“团结起来吧，乡亲们，勇敢地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口号还没喊完，敌人就疯狂地朝她开了两枪，打中了她的腿部，鲜血滴滴流下，可她仍然坚强地拼尽全身力气喊道：

“乡亲们，日本人欺压中国人的日子长不了，一定要同他们斗争到底，快快参加抗日吧，坚决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

姐妹们，为了解放和自由，快，快起来参加抗日吧……”

李桂顺的话没有讲完，敌人便慌忙地扑上去堵住了她的嘴，将她推到摩托车上拉出了会场。

通往梨树沟大湖岭道的山路上，鲜血染红了白雪，在阳光的照耀下，血是那么鲜红，雪是那么耀眼。

当李桂顺就要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凶狠地把她推入了峡谷。

这一年，李桂顺才23岁。

23个岁月，在人生的旅途中是多么暂短啊。23岁，又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她，就这么匆匆地走了。用她那青春的热血浇灌了中华大地，用她那战斗的年华谱写了一曲中华儿女抗日斗争的颂歌。

长白山记着她，中华大地记着她。

铁窗岁月

我在吉林第一监狱所见所闻

张有仁①

我是中东铁路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1925年5月，由吴丽石、姜文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党又在机务段和三十六棚总工厂发展了一批党员②。不久，建立了中东铁路第一个党支部。

最初，这个支部由吴丽石同志兼书记，后来由姜文周担任支部书记。机务段成立党小组后，就由我任党小组长。

我和吴丽石经常联系，并从他那里弄到《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阅读。吴丽石给我的任务，主要是领导中东铁路工人运动。我曾组织青年工人惩治过白俄大总管。接着又组织工友进行了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

所谓黄色工会就是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它成立于1918年，是在官方操纵下选举成立的一个工会。这个工会刚成立时，确实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工人的事，但逐渐被官方收买。会长们又千方百计为自己搂钱，使工业维持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黄色工会。

当时一些工友怕打了饭碗，明知道他们贪污腐化，敲诈勒索也不敢讲。经过我们认真调查，将工业维持会的坏事列成罪状，以传单形式散发给工友，使工业维持会头头们十分狼狈和恐慌，不

---

① 张有仁同志1931年离哈去苏，1952年回国，曾在铁道部工作，已故。

② 有王光录、刘风阁、张国舟、郎鹏臣、杨长春、小孔（名字记不起来了）、郑升、马新吾等。

敢再明目张胆地干坏事了。

我入党后，还有机会接触了一些从外地派来的党员。有一次，吴丽石带我到道里十四道街《东北早报》社，在那里我认识了任国桢、彭守朴和陈晦生等同志。他们曾以该报编辑作掩护，在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任国桢是1925年9月到哈尔滨的。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桢、彭守朴曾参加了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的工作。

这时期，哈尔滨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党中央和关内的同志经常有人来哈，或经过哈尔滨去苏联。因为我的家住在地包（地名）水塔附近，是人口稠密的工人居住区，吴丽石同志认为我家比较安全，所以有些会议经常在我家召开，有时还接待一些路过的同志住宿。

1925年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王荷波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途中，曾住在我家，还作了一次报告。

1925年11月间的一天，我正在给机车加油，准备出车去安达。这时一个姓吴的工务兵对我说："段长叫你到办公室去。"我来到段长办公室一看，除了俄国段长以外，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中国人。我问段长："你叫我有事吗？"段长说："是他们找你有事。"我说："我正要出车，没有时间啦。"段长说："不要紧，耽误时间由我负责。"这时，那几个人立即拔出手枪，对我说："别罗嗦了，快跟我们走。"原来这几个人是便衣特务。

特务押着我先到刘跃祖、郎勋臣家搜查，什么也没搜出来，就把他们放了，最后来到我家，他们搜出《共产主义ABC》、《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中国青年》、《向导》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小册子等材料，立即将我押到铁路路警侦探处。审问我的是副侦探长高大蒙，他指着那些搜来的材料问我："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货车分厂的工人马大个子放在我家的一个柳条包，他回南方娶媳妇去了，人家的东西我

没看。”高大蒙不信，命令警察打我，让我承认是共产党。不管他们怎么逼供，我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

我被路警侦探处押了不到一周，他们怕工人集伙来抢我，就把我转到路警处。在那里呆了十几天，过了三四次堂，我始终坚持原来口供。后来又把我转到滨江县地方法院。这里审讯很勤，整天逼供，我仍然不承认是共产党。

1926年初，又把我解到吉林高等法院看守所，在这里以“宣传赤化”，意图颠倒政府，组织工人暴动，预备阴谋，紊乱国宪，言词狡辩，送到吉林第一监狱服刑。

在吉林第一监狱我遇到彭守朴、陈晦生、韩守本、赵尚志等同志。大约在1927年春中共北满地委遭到破坏，又有十几位同志被捕，也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他们是何安仁，高洪光，海涛、金伯阳，姜文周、吴宝祥、吴晓天、韩心怦、高洁心、王寒生、张冲等。当时政治犯之间互相帮助，非常团结。

彭守朴经常教我学古文和俄文，姜文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狱中仍然对我帮助很大。我入狱后一直被关在独立监，很不自由，是姜文周花钱买通看守，使我脱离了独立监。从此能到印刷所做工，能在厕所里和同志们交谈一些问题。当时狱中同志还和外面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组织上经常派人到监狱看望大家，每月每人给5元钱，作为生活费。尽管这样，我们仍有两位同志死在狱中，他们是陈晦生及我敬佩的战友和老师姜文周同志。

陈晦生在哈尔滨时虽然搞革命活动很激烈，但他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入狱后受了不少监狱“炕头”的虐待，精神受到刺激。在印刷所做工时，他用铅条抹脖子自杀，实际并没有拉破，就不省人事了，最后不食而死。

党组织知道后，派杜省吾同志到狱中领尸，买棺木，把他埋在吉林北山坡上。我们在狱中为他做了一个木碑，刻写了“陈晦生之墓”。但是，陈晦生死时，其家属恐怕一点也不知道，而我

们也不知他家还有什么人。陈晦生是我党早期党员，是哈尔滨和东北地区建党者之一。对于他的不幸去世，我们在狱中的难友都很悲痛。可惜，他的坟墓早已找不到了。

监狱里的"炕头"是很坏的，他们都是些无期徒刑或者要枪崩的土匪。除此以外，还有"五殿阎君"、"十八罗汉"的组织，专门欺压新人，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我才进去时，他们把我的钱都勒索去了。后来还逼我，我气极了就用尿桶把"炕头"的脑袋打开了花。从那以后我出了名，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了，还推举我当"炕头"，可我没干。

姜文周是河北省东鹿县人，早年在海参崴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工作，1924年回到上海，接着又被派到哈尔滨。姜文周原也是铁路工人，他会电工。到哈后打入机务段当工人作掩护，一直从事工运活动，曾在我家住过。不幸在狱中得了肺病而去世。他和陈晦生一样，都被埋在吉林北山。解放后我曾设法寻找他的亲属，但未找到。

为了适应斗争需要，我们也学会了一些狱中黑话，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大概很早就有了，跟土匪黑话一样。例如，进门问候话是"老哥哥，小弟弟托福"；吸纸烟叫"啃草卷"；火柴叫"红头子"或"崩星子"；衣服叫"叶子"；喝茶叫"抄海"；烙饼叫"翻张子"；喝酒叫"搬三"；买东西叫"抄来的"；眼睛叫"灯笼"；吃肉叫"姜串"等等。

1928年东北军易帜，换上了国民党的旗号，张学良准备释放一批政治犯。因为被捕的共产党员当中，有一些是以国民党的面目被关押的，所以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员准备释放。12月底的一个晚上，把我们这些所谓"国事犯"，全叫到监狱的第二科。科长念了一份文件，宣布了吉林第一监狱18名政治犯名单，并调到奉天听候处理。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吉林。

到达奉天后，仍将我们押在奉天第一监狱里住了一天。晚

上，监狱看守通知我们去奉天上将军公署。我们在上将军公署的大厅里稍等一会后，张学良出来了。他说："诸位都是国民党员，过去你们被抓那是政治不统一，现在东北换了旗帜，决定将诸位释放，你们辛苦了……"

这时吉林一个老国民党员叫李忠选，他对张学良说："我们都在监狱中押了多年，这次来奉不知道是释放，过去在吉林监狱做工的钱，也未来得及领。都是贫寒出身，离家又远，出狱后吃住盘费分文没有。"张学良说："既然诸位有困难，可以派代表去吉林第一监狱领取工钱，来做盘费吧。"我们回到奉天监狱后，立即派李忠选和何安仁为代表连夜去吉林。记得当时给我的工钱换成哈大洋有六七十元。

这时何安仁对我说："出狱后要和金伯阳住在指定的旅馆，那里有党的负责人会见你们。"我们住上某旅馆后，果然来人找我们，原来是满洲省委委员韩心平同志。他对我们说："明天一早立即离开奉天，夜长梦多，恐怕军阀有反悔。"说完从腰里取出40元日本票，每人20元作路费。事不宜迟，第二天，我和金伯阳起程回到了哈尔滨。

整理人：张福山

狱中斗争①

于全福②

被捕入狱

1927年7月24日（星期日），我们沙河口铁路工场的几个同志，约定早晨8点钟在场西大井开会。我正准备赴会，不料日寇特务小川等突然闯进我的家，将我逮捕。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在开会地点辛培源和韩冈清也被捕了。

起初我们被关押在沙河口警察署，在这里不但吃不饱睡不好，甚至连水都不给喝。敌人对我们的审问更是惨无人道，他们每次审问都是用刑，再问，再用刑。当时对我就施用了压、打、灌凉水、夹笔杆、用火烧等酷刑。

我们在这里受了两个多星期的折磨之后，被押上一辆暗玻璃的大汽车，被沙河口警察署送往岭前监狱。我被关进了11号牢房。

法庭上的斗争

在关进岭前监狱两个月左右的一天上午，敌人把我们五花大

---

① 本文选自《大连地下党史资料选编》。

② 于全福，1927年3月在大连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4日被捕，1945年11月重新入党。曾任大连第一建筑公司第四工区农场主任，已故。

绑，一个个串连在一起，戴上监狱特制的犯人“草帽”（形状象瓶子式），再用暗玻璃汽车将我们送至地方法院（现在的中山广场西大楼）。大约在10点钟左右，把我们带到楼上第一号法庭。法庭上布置的森严，十几名看守全副武装站立在法庭的周围，生怕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一口气把他们吃掉似的。敌人为了表现资产阶级那一套所谓“民主”，当时法庭也搞公开审讯。那天法庭的旁听席上挤满了被难者家属和一般市民。敌人可能想借此威吓旅大人民并显示一下他们对处理共产党案件的“高明”伎俩。可惜，敌人却打错了算盘。

当我们被押进法庭时，吵嚷的法庭立刻静了下来，我们在“被告席”上站了长长的一大排。首先受审的是当时旅大地委书记邓鹤皋（又名邓洁）同志。他在法庭上毫无惧意，反而声色俱厉、理直气壮地反问着敌审判官。利用敌之法庭做了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与揭露敌人的临时课堂，极其巧妙而艺术地借回答审问之机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

审判官问：被告所奉行的是共产主义？邓鹤皋同志回答（大意）说：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现阶段要限制资本家的暴利，分配均等，平均地权，限制资本……将来要在我国建成人类极为美好的共产主义。敌人又问：据说要从资本家手中没收铁路、工厂、电气事业……劳动时间要缩短。邓鹤皋同志回答说：是的！如果这样，不但职工可以得到恩惠，即使是一般人民也可得到很好的生活……敌人又问：你们是要学生、工人、农民等巩固的团结……回答：这是必要的，当然要这样做！！……结果，使敌人非常被动，弄得他只好既野蛮而又狼狈地说：就是你们的主义好，可是，但是……他把拳头举在半空凶狠地说：谁拳头大谁的说话的算！反正你们得遭点罪！此时，法庭上一阵骚动，我们每个同志的心里都甜滋滋的，为邓鹤皋同志的斗争胜利而高兴。我们心想，虽然我们肉体受苦，为革命坐牢，可是，在政治

上我们却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人民由此受到了应有的教育，敌人被动已极。

继邓鹤皋同志之后，我们十几名同志逐个被审讯。我们大部分同志除了姓名、住址有别而外，在回答为什么入党时，大体上都是说：现在大连的中华工人受到社会上的虐待，工资仅仅维持全家半饱的生活，衣着极差，不仅如此，还受着牛马似的残酷虐待，为打破此社会制度为目的而加入共产党。当受到共产主义教育之后，我们更加努力于人类平等和共产主义事业。

魏长魁同志在法庭上，更是据理不让，一问一答，没有半句吞吐。弄得安住审判官和三谷检察官手忙脚乱，难堪万分。如审判官在审讯我们团组织研究和宣传共产主义时，问："被告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断地宣传过共产主义是不是事实？"魏长魁同志坚定而有力地回答说："本团既然是为了研究共产主义而设立的，向团员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那是当然的事！"

在法庭上，敌人梦想使我们屈服在他们的强权之下，可是这一切都落空了。弄得敌人不得不在1927年9月28日午前，手忙脚乱地组织了对我们的第四次公审。这天，法庭上仍然挤满了旁听者。敌人觉得几次"公审"已"圆满"结束，于是，这次便进入了由三谷检察官的求刑阶段。这个家伙连珠炮似地叙述了他们的治安维持法。"……任何人说要统治国家他必然要制造国家政策的危机，违犯治安维持法，那是不用说的了。"接着又说："本件共产党案就是这样的……然而被告所说的共产主义，即便从这个主义上说是个好事……"他觉得说走了嘴，因此，支吾了半天才荒谬地说："但是，如果执行者的人格、学识不佳，随着而来的必然会是使人不甚战栗……因此绝对不能允许！"接着他便胡说八道起来，最后威吓说："只要在我们统治之下，无论如何宣传共产主义也要被彻底检举的，一定使其不致再起。"但是中国人是吓不倒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前赴后继，被捕一批，又起

来一批。在旅大地区，日本侵略者始终没能安静下来，我们党一直在领导着人民同敌人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

当天，敌三谷检察官代表“关东州”当局，宣布判邓鹤皋禁锢10年，我和另外几名同志判征役7年，还有的同志被判5年和3年劳役。

在敌检察官宣布后，为了保存力量，继续战斗，邓鹤皋同志据理不让地反驳说：我们的同志中，既然如同你们所说，有的不清楚有关道理，有的还不识字。那么你们就应立即释放他们，不应判刑！对此，敌人没敢回答，哑巴悄声地就回去了。此时，我和另外几名同志对判7年征役不服，要求上诉。

1928年2月9日那天，敌人把我们送到旅顺“关东州厅刑务所”。此间的关押是为了等待上诉，当然上诉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敌人企图压服我们服罪，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斗争。我们知道，我们是政治犯，到哪也可以讲话，因为我们没有罪。由于敌人的无理刁难和强行压服，当时我们已进行了绝食。后来由于我们的坚决斗争，敌人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只好给我们改判为5年。当然5年我们也不服，可是我们清楚，在当时日寇统治的小天地里，想被释放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才为革命穿上了红衣裳（当时犯人在牢狱穿红色衣服）。

在旅顺牢狱里

在旅顺牢狱，我和辛培源、张启秀、韩冈清、杜继曾、纪幼柏（后二人系1928年被捕）在一个牢房，而邓鹤皋同志单独押在另一个牢房，我们不得相见。监狱里的生活是残酷的。敌人经常对我们进行种种压迫和虐待。不仅在生活上受到非人道的待遇——不给吃饱、不给医疗……而且在人格上经常受到污辱。如，我们每天干活上下班时，都要经过一番“全面大会诊”，即每天早

晨上工前要将衣服剥得光光的（冬天也如此），受检查，从两手两脚到耳鼻眼喉都要被检查，然后再跳一条“独木桥”，以便发现肛门里是否有“危险物”。再如一年到头不准我们讲话，强迫我们当“哑巴”。如说话被发现，便要遭到一顿毒打……如此等等。

可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仍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向敌人进行斗争。如在工厂做工时，我们经常是手在做工，眼睛注意着看守，脚便在桌子下面打起“电报”来。有时为了更确切地传通一点事或者说说笑话，便拿着工作物到要讲话同志身边去小声私语。如果被看守发现，我们便以问活计怎么干为由，哄骗敌人。不仅如此，有时还借机揭露敌人对我们的虐待。

在狱中辛培源、杜继曾、邵福年等同志都很注意为党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辛培源同志。他非常乐观，经常以各种形式逗得大家憋不住笑。有时晚间在牢房常常拿起清扫工具，小声唱着小曲，跑起“旱船”来。当听到看守脚步声时，便马上装着扫地的样子，避开看守的监视。一天早晨，老辛打了两桶洗脸水回来，边倒边打趣地说：同志们！我去买香皂和雪花膏没买到，买来了“冰糕”啦，请原谅。以此揭露敌人不给香皂、冬天给冰水洗脸的虐待。狱中敌人虽能随心所欲地折磨着我们的肉体，但他们却不能损伤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当时，辛培源等同志就多次表示：将来出狱后还要干革命，不怕为革命穿上“红衣裳”。

狡猾的敌人，一时也未放松对我们的诈骗，每星期还搞一次欺骗宣传，美其名曰“教悔”，用个老“和尚”给我们讲什么“道德良心”之类的鬼话。

可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斗争意志。如，杜继曾有次对我讲：在地方法院时，我把青大衫里面的小领子撕下一块布条，塞在牢房的地板缝里，待将来革命胜利后可到那拿出它来，作为我们蹲监牢的纪念。在狱中杜继曾同志常常以革命的理论来教导我们这些工人出身的理论水平不高的党员，并

常把外面传进的零星消息、南方党领导工农红军革命斗争情况，告诉我们。不仅如此，老杜在狱中还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革命气概。有一次，看守领着日本和尚到工场发莱牌（上面写个褒字）给老杜。发牌时敌人要求我们跪着接，而老杜却不跪，只是在地上蹲着。看守看到后，按着杜继曾同志的头，令其跪着接牌。杜始终未跪，给看守很大难堪。老和尚也只好夹着尾巴悄悄地溜了。为此，敌人曾毒打了老杜。老杜虽然肉体受苦，但其坚强的意志却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打击了敌人。之后杜继曾说：我上跪父母，再下我谁也不跪。至于日本帝国主义更不跪，给个牌就拿着，不给就算！……

由于同志们的斗争，不断教育和影响着人们，不少的非政治犯的难友对我们这些政治犯很有好感。我们认为，这就是他们对我党的初步了解和认识。如邵福年同志在狱里就影响与教育了一位姓安的难友（该人在狱中做护士工作），他常常冒着极大的危险偷点饭给邵福年同志吃。为表示毕生之友谊，在狱中还结拜为盟兄弟。该人出狱后，还到邵福年同志的家乡表示慰问和关照。另有个姓刘的难友，他因枪杀一名日本警察而被判死刑，由于我们对他的影响，他曾几次感慨地说：你们共产党是些好人！

不仅中国难友，就是当时在押的日本和朝鲜难友，对我们这些政治犯也常常投以敬慕的眼神。甚至也还冒大险地伸出大拇指，表示对我们正义事业的佩服。总之，在狱期间，我们不少同志，从没放过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在为党争光，为革命工作！

我是1931年10月被释放出狱的。在我出狱的前几天，同狱的同志对我鼓励说：黑夜总会过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出去要好好干！

我在东北三次被捕的回忆

王鹤寿

我是河北省唐县人。青年时代就读于保定第二师范学校。

1925年4月参加革命。1926年12月赴苏联，在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

在白色恐怖年代，东北是我多年工作的地方。我在满洲省委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曾三度在那里工作过。满洲省委时期我曾在沈阳（那时叫奉天）和哈尔滨三次被军阀逮捕、坐牢。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同我一起坐牢的难友，目前健在的已是寥寥无几，但，我们被捕前前后后的许多场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1928年秋，我在参加共产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与唐宏经一起从苏联莫斯科回国到了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的奉天。当时陈为人同志是省委书记，我被分配到团省委工作，主要任务是到奉天兵工厂建立青年团。当时奉天兵工厂党的负责人是张子安同志，他是个很好的知识分子党员。我们一起住在沈阳东三家子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前后门裂缝很大，冬天夜里刮大风，吹得屋内特别冷。张子安同志有肺病，体质很弱，在那种恶劣条件下，他仍坚持工作。我们在兵工厂工人聚居的地方进行革命活动，吸收了青年团员也吸收了党员，开始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青年团支部。

1928年11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国路经沈阳时，在沈阳

北市场一个草房里向省委部分领导成员传达了六大精神。他听说兵工厂有了党和团的支部很高兴，并在一天夜间来到三家子，与党员和团员一起开了个座谈会。

1928年12月初，省委考虑兵工厂团的支部已建立起来了，抚顺有几万产业工人需要开展工作，于是把我派到抚顺去组建党团特支。我去后，建立了党的特支，由我做特支书记。团的负责人是小苏（苏振久后来叛变）。

1928年12月23日，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黄土坑（党员牛思玉同志家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14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议地点选的不好，离兵工厂很近，是敌人很注意的地方。再说，这么多人，穿什么服装的都有，在一个普通人的家里半天不出来，因此引起了邻居的怀疑，报告了警察。在我们的会议刚结束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七八个警察，声称查户口，对在场的人员逐个盘问。吴丽石很机警，他将很少的一点文字记录作了处理，因而什么文字的东西也未落敌手。随后敌人将我们参加会议的14人全部带走。当走到半路时，唐宏经乘人多之机逃跑，但没成功，当即被警察抓回来了。而参加党省委扩大会的青年团省委负责人张刃光却趁敌人抓老唐混乱之机跑掉了。剩下我们13个人被带到小东门警察分局，在这里对我们审问了一阵。虽然按当时秘密工作的惯例，在开会之前商定了相互关系的口供，但是审问中发现我们什么地方口音都有，这就更加引起敌人的怀疑。所以不但一个人也没有释放，反而把我们分开送到两个地方审讯。唐宏经、潘敬久、王赞升三人送宪兵队，我和其余的人都被送市警察局。我们在警察局大部分都受到刑讯，有几个同志受刑很重。王化民（王占春），是这次被捕人中最小的同志，他是我在兵工厂发展的团员，又和我拜过把子。他虽然年纪最小，又是新介绍入团的年轻团员，而且受刑很重，但是却表现很好，没有泄露任何秘密。我在拘留所与他在一起，也注意向他做思想工作。

他终于坚持下来了。我被打的也很重，血肉和衣服粘在一起，上衣脱不下来。

不久，我们这两伙人又被全部送东北军法处审讯，羁押在奉天第一监狱。我同李梅五关在一个号。李在狱中表现很好。后来又把我们押到独居间的小监房里。陈为人同我是对门，其他人也是分开关押。当时狱里没有党的正式组织，因为完全无法联系。只是同外面的省委通过互济会有联系，党的关系主要是吴丽石出头联系，团省委则派小邹（邹立孟）来狱接见我。

有一天，把我和吴丽石同志押去军法处，由军法处长颜文海审问。这可是个非常严重的局面，因为军法处的惯例是，一些土匪案或其他大案经过军法处的法官审讯后，该判刑的就判刑了，如果军法处长再提审就是要判死刑枪决了。我和吴丽石在候审室里候审时，有的看守好心地说："你们有什么话要告诉你们家里，我们可以替你们传。"这话就使我们明白了：大概是要枪毙了。虽然如此，我们没有惧色，我和吴丽石商定：在刑场上不要喊口号，因为喊口号其他同志就会被暴露。结果军法处颜文海审问了我们两个人后，并没有押去刑场，又把我们两人押回监狱了。这一案我们13人都很坚决，没有人叛变，敌人也没抓住什么证据。有人说我们在狱内搞很多斗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第一，敌人不是以共产党抓的我们，13人当中没有一个承认是共产党的。那时我们主要是保存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做好隐蔽，一搞狱内斗争，无形当中就暴露了我们的身分；第二，我们在狱中是分别关押的，根本无法见面，也无法联系。我们这次被捕后，满洲省委通过各种关系对我们积极地开展营救工作，最后于1929年夏天，军阀当局无条件地释放了我们。

1929年7月间，我们出狱回到了省委，这时的省委书记是刘少奇同志。我被分配到团省委任组织部长。当时正是"中东路事件"，省委提出"保卫苏联"、"拥护苏联"的口号。在工人中

当时主要是进行经济斗争的宣传工作。那届省委成员有：林仲丹、李子芬、刘若云、丁君羊、廖如愿，团省委书记是饶漱石，宣传部长是一位姓孙的（名字我忘记了），秘书长是小陶（陶惠明），赵尚志当时也在团省委工作，主要是作工人运动。1930年春，立三路线传到了满洲省委。这时少奇同志已调回党中央，省委书记是李子芬同志。立三路线在东北的贯彻执行是有争论的。当时提出在东北搞：（1）总政治同盟罢工；（2）组织革命兵变；（3）组织地方武装暴动。对此我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们在东北的工作基础很薄弱，党和团的力量还很弱，大多数工厂、学校还没有党和团的支部，所以提出了怀疑的意见，认为这样的口号在关内也许可以，但在东北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我的意见不但没被省委采纳，反而批评了我，给我戴上"关东特殊论"、"东北例外论"的帽子，并撤了我的职务，由邹大鹏接替了我的工作。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做基层工作。

1930年4月，满洲党团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由于杜兰亭叛变，供出了团省委机关地址，因而正在团省委机关开会的党团省委同志大部分被敌人逮捕。这时我正与林仲丹在哈尔滨工作，组织急令我火速回奉天，恢复党团组织。回到奉天后看到了廖如愿，他是刚从上海回来的。我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为了研究恢复省委工作问题，5月2日我们在大南门外，文家坟野树林里（因为当时找不到开会的地方）开了一次当时在奉天的党团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廖如愿、郭隆真、王永庆、潘敬文、宋奇和我六个人。当会议即将结束，老廖刚讲完话的时候，警察马队就来了，将我们围上，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照事前商定的口径说了，警察就把我们带到附近一个村子的村民家让村民辨认。因为头天晚间这家出了盗案，警察是将我们当盗贼抓起来的。由于那家村民不认识我们，警察就将我们几个人带到沈阳县警察局拘留所羁押。幸好是县里，如果将我押送市警察厅那就糟了。因为

我在1928年被捕时，曾在市警察厅扣压审讯过，如送那里，可就麻烦了。到县警察局后，警察当夜就对我们进行了审讯。在审讯中大家都是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讲的。我们几个人都说是给郭隆真和潘敬久介绍对象的。警察又没抓住什么证据，那个村子的村民又证明不是盗窃他们家的那一伙，但是俗话说错拿不能错放，因而就暂时把我们押在县警察局拘留所里。当时老廖有一位在东北军司令部海军部做事的亲属，经过他的活动四天后我们就被全部释放了。这是我在沈阳第二次被捕。

1930年5月份，满洲省委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林仲丹同志任临委书记，我任团临委书记。当时立三左倾路线仍很严重。省委根据中央6月30日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撤消满洲省委，也取消青年团省委，党和团合并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同时在南满、北满、东满也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我担任南满行动委员会书记。东满行动委员会书记是廖如愿同志，北满行动委员会书记是孟坚同志。南满行动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当时我在清原，盘石一带依靠朝鲜农民组织所谓武装暴动。在农村杀了一些朝鲜狗腿子和坏人。8月下旬，陈潭秋来到东北任“总行委”书记。9月24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陈潭秋、林仲丹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纠正了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陈、林回东北后，10月份撤消总行委，恢复了满洲党和团省委，陈任省委书记，林任职委书记，我重新回团省委。

1930年12月初，我同陈潭秋同志去哈尔滨向北满特委布置广暴纪念工作。我们先在小旅店住了两天，同孟坚研究召开北满特委党团联席会议问题，我们确定这个会议在孟坚家召开。据孟讲，他准备搬家。一时没找到其它合适开会的地方，就最后利用一下这个地方开会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孟坚、陈潭秋、小葛（葛凤鸣）、金享哲（朝鲜族）、我等八九个人。会议开到晚间10点多钟，正要散会时，道里警察署的警察突然闯进屋。除跑了两个

人外，其余人都被捕了。我们在警察署遭到了很残酷的刑讯，因孟坚是主犯，受刑很厉害，但他很坚强，什么也没有供。我和陈潭秋也都受了向鼻子灌辣椒水的严刑。

我们被捕后过一周左右时间，就将我们押送到南岗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军法处。开始我们都关押在一个拘留所内，后来不知为什么把我和孟坚提出关押到一个地下室，那里关押的大都是要犯。地下室上不见天，日夜开着昏暗的电灯，活象地狱。军法处王处长亲自审了我们几次，案子就放下了。大约是在1931年2月末或3月初，敌人将我们几个人提出去进行宣判，孟坚判7年徒刑，我和其他同志都判了5年徒刑。判决后我们就被送往哈尔滨道外监狱（吉林省第三监狱）。在监狱中始终带着脚镣。我和陈潭秋、孟坚、葛凤鸣等都关在那里。

1931年夏，赵尚朴、唐宏经也关进来了。在监狱对看守人员进行了争取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所以有的看守还不时的偷偷给我们带报纸看，也帮我们带信与家属联系。

孟坚在狱中给他哥哥写信，让他想办法营救。孟的哥哥是大知识分子，他家姓孟又与孔祥熙家有些联系。经过他哥哥的活动后给孟坚办了个保外就医先期出狱了。他出狱前陈潭秋与他研究出狱后如何想办法营救狱中的同志。他出狱经过一段活动，走了护路军总司令部丁大头的门路，其哥哥要求丁做点好事，释放青年政治犯，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混乱时期，丁答应了。1932年7月我们全部被释放出狱。出狱后，我和陈潭秋就离开了满洲省委，到上海去，由党与团中央分配工作了。

整理人：张大庸

我在旧监狱的日子里

王赞升

1924年春，我在大连参加了工学会活动，翌年3月经邵福年介绍加入了青年团。1926年"福纺"举行大罢工时，我是骨干分子，敌人已注意上我了。大连党组织认为我继续呆下去会有危险，所以党组织负责人邓鹤皋叫我转移到沈阳。我拿他一个条子，到奉天兵工厂找一个名叫庄忠深的工人地下党员，他安排我在那里先干三个月的小工。后来，王传碧将我安排在迫击炮厂当工人，以这个公开职业作掩护，搞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元月，经王传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2月23日，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黄土坑地下党员牛思玉家里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我记得有陈为人（别人叫他老韩，是省委书记）、吴丽石、唐宏经（唐韵超）、王鹤寿、法国李（李梅五）、潘敬久、牛思玉、张甦生（称牛大嫂，牛思玉的妻子）、张寿禄（河北省人），还有些人我记不清了，总计出席会的有十几个人。我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的，但那时省委想派几名同志去苏联学习，其中有我一个，参加这个会是想让我听一听省委交待有关出国政策。组织上先安排我在门外放哨，会议传达的内容我不知道。会议进行到中午了，牛大嫂正在给大家做饭时，我在外边放哨，突然看见远处有十多个警察往这边来，我急忙进屋对大家说："警察来了，快跑吧！"屋里一个负责人说："不怕，就说我们是请会的，每人拿10元钱在牛思玉家请会，帮助解

决他们的困难。”大家迅速统一了口径。过后我曾想，如果当时就跑，他们也抓不住几个人。这个会议的地点选的也不够好，开会的人穿什么衣服的都有，集中一家，一上午都不出来，引起老百姓的怀疑，认为是搞赌博或是盗匪什么的，所以就报告了警察所。我个人认为这次主要原因是缺乏高度警惕性，并没有发现谁叛变。

警察进屋后，对所有人员逐个进行盘问。然后，在下午3点来钟，将我们都带到小东警察分局。这时，他们只认为我们是赌博犯，对我们看押较松。路上大老唐（唐宏经）跑了一次，又叫警察抓回来了，被狠狠打一顿。乘乱之机，只有张刃光跑掉了。我们被带到小东警察分局后，又进行了审问。敌人发现我们口音不一致，有山东人、南方人、北京人、东北人，便产生了怀疑，怕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放我们。决定分三处审讯。我同唐宏经、潘敬久送北市宪兵队，其他人送市警察局和南市警察分局审问。这个宪兵队离北市场很近，在妓院后边。

大约晚间10点来钟，宪兵队牛队长开始对我们过堂了。将我们三个人提到候审室里时，老唐小声嘱咐我："你是个小孩儿，要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你只说在迫击炮厂当徒工，不识字，是牛家请会，找你来帮助做饭的，其他都说不知道，敌人对你这个孩子儿就没办法，你要记住。"敌人第一个提审的就是我。牛队长先用软招对我说："你是一个小孩儿，有什么都说吧，别怕，不打你。"我就按着老唐在候审室教我的那一套讲了一遍，然后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几天过了五六次堂，我都是按商量好的说的。宪兵队牛队长发火说："你这个小孩子真顽固，问你什么都不知道，来人啊！打他一百手板子。"我的手被打得肿的老高，钻心痛，但还是说不知道。后来，宪兵又用棍子打我屁股，打得我够呛，我还是没有供认什么。过几天敌人就不管我了，对老唐和潘敬久严加审讯，他俩受刑很重，拒不招供。敌人没搜去什么党

内文件。听说一部分文件大家吃肚子里了，另一部分让牛大嫂保存起来了。敌人在被捕同志身上没有得到任何情况，又想出新的花招儿，把牛大嫂抓去，妄图从这位普通家庭妇女身上得到情况。出乎敌人意料的是，尽管牛大嫂受尽了种种刑罚，但始终没说出被捕同志的真实身分。敌人没有办法，又把她放了。她真了不起！解放后，我同王鹤寿总想看看她，但一直未找到牛思玉一家的下落。

我们三人在北市宪兵队看守所关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生活很坏，一天两顿高粱米粥，只给一块咸菜。后来转送军法处，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一个军犯监号里。不久，军法处对我们这十几个人分别过堂。按吴丽石指示，我们都编好了假口供和假名字，我叫李树桐，在狱中我一直叫这个名字。过堂的是军法处的一个军官，他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又没有证据，所以严格追问我们的政治背景。我还是在宪兵队讲的那一套话，什么也不知道。那军官吓唬我说："你这个小孩太顽固了，问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知道也得死，不知道也得枪毙。"我说："死了算我倒霉。"那个军官又引诱我说："他们都招供，就你不招？"我说："他们招供不招供同我没有关系，反正我一个小孩儿能知道什么？"军法处虽没给我们上刑，但每人反复过了五六次堂。

我们在狱中是分着关押的，每天两次放风，不参加任何劳动。在狱中没有建立党支部，但党的工作都由吴丽石、王鹤寿负责，大老唐也参加活动。老同志为了教育和鼓励我们几个年轻的同志，经常通过传纸条的办法写上几句简短的话。大部分纸条上写着"革命要坚持到底，坚决保守党的秘密""党的机密决不能暴露，任敌人怎么严刑拷打，也不能向敌人屈服"等口号式的语言。传纸条的方法是借放风时机或从墙上小洞里传过去。狱内有什么事都是吴丽石通知我们。

李梅五（法国李）是华工，曾在法国一家飞机公司做过技术

工作，对飞机制造方面有一定水平。张学良时代，沈阳航空处来人，想叫他去搞技术工作而被李拒绝。监狱官有时给我们训话说："你们一定要交代问题，不讲不行，你们看，有人讲实话了，我们就释放他们了。如果你们讲实话，我们也放你们。"大家知道敌人是诱骗我们，所以同志们都不讲实话，以沉默来对抗敌人。

当时在监狱里没有建立"互济会"这样的组织，但难友们有互相帮助的情况。那个年代狱中生活很苦，条件极差，瘟疫病到处流行，特别是受了刑伤根本没有什么药品医疗，只好凭天由命了。我记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丽石、大老韩（陈为人）等同志在狱中为报社写点稿子，然后托看守送出去换点稿费来。可是看守还要克扣一半，只能将仅剩下的钱再请看守在外边购买点药品、食物、酒一类的东西，帮助受重刑的同志和其他身体较弱的难友。在那个黑暗的旧监狱里，这点东西真是十分可贵的啊！

由于敌人没有抓住我们任何可靠的证据，被捕的同志又都十分坚决，没有一个叛变的。军法处过了几次堂之后，案子就放下了。这时，吴丽石写信让他父亲找人。他父亲来奉天同上层人物走动通融一番，中共满洲省委又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1929年夏秋之季，狱方宣布释放我们。吴丽石分别通知大家："出狱后要分散到各地，不要留在奉天，不然还有可能被敌人逮捕。"第二天，看守押着我到狱外去打铺保。我在南站叔伯兄弟王占清家打了铺保，给警察两元钱就被释放了。根本不象"文革"时讲的我们写了"自白书"才出狱的，这是对我们革命同志的诬陷。

出狱后，我想回大连，因没有路费，只好徒步往大连走。走到太子河时，看见正在修桥，我就去做了三个月的临时工，挣几个钱做路费，才回到大连。到大连同地下党取得联系后，我又进了大连铁道工厂。

整理人：张大庸

三 次 去 探 监

邹立孟

1928年6月末，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派我到营口太古码头组织海员工会。因为我们的活动被敌人发现，省委又调我回沈阳在团省委工作。这年9月间，团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在沈阳工业区成立一个团区委。这个决定由团省委书记张刃光在陶惠明家（团省委机关）宣布的。他说："团区委书记由邹立孟担任，小徐（名字记不清了）任组织委员，王赞升任宣传委员。"沈阳工业区团区委在团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与沈阳团市委没有关系）。这个团区委的工作范围是奉天纱厂、迫击炮厂、东北大学校办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等。为了开展工运工作，这些地方我们经常去。

1928年12月23日，在沈阳召开了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本来有我的名字，但省委派人通知我去开会时，正好我去皇姑屯一个工厂召开儿童团会议，没接到通知，所以这次会议我就没参加上。中午12点左右，我从皇姑屯工厂回来，先到陶惠明家里。关碧云问我："小邹，你没去开会吗？"我说："没接到通知呀！省委开会让我去参加，我得去。"我正要动身走，陶说："不要去了，他们就要散会了，回来由他们将会议精神传达给你就行了。"我们正在谈话时，张刃光突然跑进来，满脸是汗地说："糟了！开会的人都被捕了。是兵工厂卫队和警察

逮捕的，可能是房东报告的，他们是按盗匪抓的。”张立即对工作进行了安排，分配我要快速完成两项任务：一是通知秘密印刷所机关迅速将油印工具及文件转移；二是通知几名未被捕的干部马上隐蔽起来，以防万一。这些我都很快地按要求完成了。

张刃光调走后，调来了刘子奇任团省委书记。他与团省委组织部长陶惠明研究决定，让我到奉天第一监狱去给被捕的陈为人等13名同志送点钱并代表省委看望他们。1929年元月上旬左右，我以王鹤寿表弟的名义去奉天第一监狱。登记时，看守问我接见谁？我说："接见王鹤寿。"又问："是什么犯罪？"我说："是窃案。"然后就叫我和王鹤寿见了面。他双手提着重镣，哗啦哗啦地向我走来，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哎，小邹你来了！"同时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在狱中受了很多刑，吃了不少苦，看到党派人来看望他，心情非常激动。看他被打成这个样子，我也很难过，流下了眼泪。我说："妈妈（指党）很关心你，让你不要着急上火，保重身体，舅舅还在想办法托人活动，你放心吧！"我说这些话都是暗语。王鹤寿他刚把钱接到手，看守就一把给抢了过去，只留下一少半给他。王鹤寿马上火了，斥责敌人说："你不能抢我钱，你给我拿回来，不然我饶不了你，我向法院告你！"并声色俱厉地对看守说："你快把钱还给我！"看守怕事态搞大了不好办，只好把大部分钱还给王，只留下两张票。王鹤寿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的这种勇敢斗争精神，今天回想起来仍是记忆犹新。

过些日子，我第二次去奉天第一监狱探望王鹤寿时，又给他送了些钱。以后我又第三次探望王鹤寿，给他送去一床棉被。这次我见到了高景阳，他在监狱里做杂役，没给他带脚镣，很受优待。登记时我说："王鹤寿是偷窃案由。"但高景阳①说：

---

① 高景阳系大连双和栈店员，地下党员。1928年2月11日，周世昌在大连被日水上警察逮捕，周供出高是他第二个接头人，高即被日警逮捕。审讯时，高招供了。2月25日被日警署驱逐大连境外。后在瓦房店被东北当局逮捕。高继续供出自己是共产党，被判刑，同周世昌一起解押奉天第一监狱。

“是党案，我们是一样的。”高景阳的举动使我有些怀疑，回团省委向刘子奇作了汇报，经几个同志研究，认为高可能有问题，为确保陈为人等同志的安全，决定暂时停止探监，以防万一。

陈为人等13名同志在奉天第一监狱关押期间，我受省委指派，先后三次去监狱探望被捕同志，每次都是只见到了王鹤寿。不久，我就被省委调到辽阳纺织工厂做工运工作去了。

整理人：张大庸　李志民

我和刘少奇、陈潭秋一起坐牢的岁月

一

孟用潜

1928年时的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的青年。当时党派我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我党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苏联回国以后，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告诉我党要派我到满洲省委去工作。恩来同志热情地召见我，并给我详细地分析了当时东北的形势。我坚决服从了党中央的分配。

我于1929年初，秘密地由上海到了东北的奉天。不久，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关系，省委分工我负责组织工作。

1929年夏，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派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同志来奉天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任省委书记。他于1929年7月14日到达奉天。省委决定我正式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当时和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一起工作的还有王力功、丁君羊、金伯阳(即金永绪)、韩心怦、廖如愿、杨一辰、李文玉、任国桢、饶漱石等人。廖如愿同志是满洲省委秘书长，任国桢等同志均在基层工作。那时我党在满洲省委及奉天支部工作的同志总共约有三四十人。当时少奇住在奉天市工业区78号（现为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四段宏业里二号）。

少奇于大革命时期在江西有搞工运的丰富经验，他到满洲省委任书记后，我心中特别高兴。当时，为了保证少奇的安全，我没有把少奇的真名告诉大家，所以都称他老赵。我以后也改了

名，叫孟坚。中共满洲省委在少奇的领导下，主要是搞城市工运工作，也搞些学生工作，当时农民工作不太多。我们除了在奉天、大连、哈尔滨、抚顺开展工作外，在吉林、营口、齐齐哈尔、牡丹江、安东（现丹东市）等城市和盘石、东宁、宁安、阿城、珠河等县也都开展了工作。

我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期间，主要是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29年8月间，少奇与我研究奉天纱厂（现沈阳纺织厂）党的组织和发动罢工等情况。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白色恐怖十分厉害，敌强我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举行罢工一定要进行周密的安排"。并严肃地说："光凭热情干，那可不行啊！"他要同我一道去参加纱厂的支部会，与纱厂支部仔细研究一下情况。

8月22日下午5时，天气闷热，少奇同志与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离奉天纱厂不远的树林子里，等待纱厂支部的同志们前来开会。

不一会儿，奉天纱厂"呜——呜"地响起了下班的汽笛声，我的双眼就一直望着厂门口。张望了一会儿，只见厂门仍然是紧闭着，一个下班的工人也没出来。少奇立即警觉起来，问我："平时也这样吗？"

我当时也十分惊奇，回答说："平时不是这样啊！"

少奇果断地对我说："哦！当心有变！我们最多只能再等一刻钟。"

一刻钟很快过去了，厂门依然紧闭，一个人影也不见出来。

少奇迅速站起来说："可能出事了，我们不能再等了，快离开这里！"为了安全，少奇决定我们分开转移，以便缩小目标，他让我向一条大路跑去，他自己转身也快步顺着一条小路往下走。

正在这时，奉天纱厂大门突然大开，从里面冲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厂警卫队，并狼嚎般地吆喝："不许动！站住！快站住！"几个厂警边追边喊地赶上前来。前边几个厂警拉着一个工人，一看见我，那人就指着我告诉厂警说："就是他！就是他！"几个厂警跑过来把我围起来。那个在厂门旁站岗的厂警指着刘少奇说："他也是，他们一块来的。"于是厂警把我和他两个都抓起来。我和少奇当时都佯装不认识，但也没有用，厂警把我们押到了纱厂厂警队队部。

原来，酝酿罢工和我到奉天纱厂来发动群众的事，由于工人党员崔风翥被厂方利诱威胁而暴露，厂方头天晚间先逮捕了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常宝玉。这个人不坚定，供出了省委要派人来发动工人罢工等情况。所以，我和少奇二人前去奉天纱厂门口等人时，被厂卫队盯上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少奇镇定自若。他决定利用别人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有利条件，编造一通假"口供"，以蒙蔽敌人。

当天，我们俩和常宝玉一起被厂警押到厂警队队部。晚饭后，厂里一个上层人物开始对我们审讯。

他们先拉过来少奇，喝问："你叫什么名字？"

"成秉真。"少奇不慌不忙地说。

"你是哪里来的？"

少奇回答："我从武汉来。"

敌人紧逼着问："来干什么？"

"因为武汉没有工作，生活不下去，听说奉天日子好过，就闯关东来了。"

主审官发火了，厉声问："那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少奇还是很镇定地回答道："为了找一个同事，想请他帮忙介绍工作。我是外地人，下火车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同事还没

有找到，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我正犯愁呢，就莫名其妙地被你们抓来了。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审问我们的人，看来是一个说话很算的人，都是他开口主审。他听了少奇这一通似懂非懂的湖南话，禁不住更来火了，他打断刘少奇的话，喊道：“少罗嗦！少罗嗦！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说就给你点儿板子尝尝。”

少奇从容地回答：“我是做工的工人。”

这时，厂警队的一个头目瞪着一双狡猾的贼眼，上下打量刘少奇，突然喊道：“做工的？把手伸出来看看！”

少奇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厂警头子一看少奇那细长柔松的手指，用鼻子挤出两声奸笑，并得意忘形地咧着大嘴说：“工人？什么工人！你他妈的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老子。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连个茧子都没有，还敢跑到这里来冒充工人！”这个家伙两眼射出凶光，吼道：“来人哪！叫他老实交代，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说就给他点厉害！”

我当时一看这阵势，心里暗想，这回可糟了，可能要露馅，少奇确实没当过工人，手上也没有茧子。我心里很着急。正在这当儿，少奇操着他那湖南腔开了口，他神情坦然地说：“我是个印刷业的排字工人，若是你们这里有排字的活儿干，我可以干的蛮好哩！”

那个自以为得计的厂警头子一听，顿时被噎得没词了，把手一甩，结结巴巴地说：“混蛋！谁叫你干活来！”便灰溜溜地退到一边吸烟去了。

闷了好一会儿，那个“主审官”模样的厂子上层人物，突然又问少奇道：“你为什么要来煽动工潮，反对当局？”

“什么工潮不工潮，我根本不晓得。”刘少奇若无其事地回答。

这时那个厂警头子又发火了，窜到少奇面前恶狠狠地拿起木

板，照着少奇的手打来，边打边说："叫你工人！我叫你工人！"并边打边指着常宝玉问："你和他什么关系？快说！"

"他是哪个？我不认识。"少奇沉着地回答。

敌人又把常宝玉拉到少奇面前对质，因常宝玉根本不认识刘少奇，只好向敌人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敌人无隙可乘，便恶狠狠地说："我看你是从上海来的。上海工人闹的可凶了，你们南蛮子都是有来头的。"于是敌人命令厂警打了少奇20大板子。

最后敌人审问我。那个"主审官"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回答说："我是在学校教书的。今天回家路过此地，听人说纱厂工人生活很苦，要求按八成现洋开支，这是应该的，我根本没讲什么工潮。"

敌人听到这里，气急败坏地说："开工资兑现是我们纱厂自己的事，绝不允许你个穷教书的来干涉！"

厂警头目不由我分说，把我捆绑在一个长板凳上，用一个天津大水壶往我鼻子里灌冷水。灌一阵，就问我："招不招！是不是闹工潮？"

我咬紧牙关坚决不招。敌人就再灌，灌的满地是水。

敌人把常宝玉拉来，追问他是受谁指使搞工潮的。常一口咬定是我指使他干的。敌人给我上刑，我就是守口如瓶，咬牙不招，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敌人轮番审问我和少奇，灌凉水、打板子，问了打、打了问，折腾我们好长时间。上完刑后、他们把少奇和我带到纱厂警卫队住的房子里。由于他们从少奇那里找不到任何借口，所以让他躺在炕上休息，而把我倒背弓捆住吊在窗户上，只有两个脚尖可以触到地上。

这一夜敌人看的很严，我和少奇不便说话。少奇曾领导过著

名的安源煤矿大罢工，有丰富的工运经验，他在敌人面前显得那样沉着、老练，而我在这方面是缺少实践经验的。

次日天亮后，奉天纱厂厂警队就把我们俩和常宝玉一块送到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

关押我们的三分局看守所，有点象北京故宫的大长廊，里边是对面炕。少奇和我分住在对面炕上。炕上躺的人拥挤不堪，连翻身都很困难。

当天，三分局在一所大厅里对我们进行审问。审问官坐在台上，我们站在大厅内，用一条绳子挡住，有警察看着，等审讯时才让走到前面去。

审讯的情况和纱厂时差不多，先审少奇，他还是坚不吐实，和敌人周旋。审讯常宝玉时，他还是一口咬定是我指使他闹工潮的。

审讯官问我时，我说："我是教书先生。"

审讯官大声喊道："一个教书的去干涉人家纱厂的事，你他妈应该受到惩罚。"

结果又打了我20大板子。但我还是忍痛不招。

到三分局第二天，又把我们三人押送到奉天法院检察处看守所。在法院看守所我和常宝玉押在一个屋里；少奇住在我对面的小屋里，我们这个监号住十几个人，相当拥挤。当时地方法院看守的并不严，放风时除可以大小便外，彼此还可随便谈话。少奇在放风时找到我，对我说："他们把我们送到地方法院而不是军法处，这说明我们的案情并不严重，没有把我们当成政治犯。敌人没有抓到我们什么证据，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个工人的口供。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工人常宝玉，如果能动员他翻供，那我们就好办了。"并说："常宝玉在政治上还幼稚，我们应当帮助他，使他坚强起来，有些话让他自己去推翻。我看你向他做做工作，这样对我们的案子判决是有利的。"

我遵照少奇的指示去做常宝玉的工作。

晚上，我和常宝玉被押在一个炕上睡觉，我紧挨着他，我启发他说：“我们搞这个(指工潮)也是为了工人好，你一口咬定是我指使你，你也免不了被押。敌人现在押我们并没有什么证据，只凭你一句话，就抓了我。如果你翻供，干脆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说不认识我们，那咱们就都可以没事了，不然你自己也好不了。”

最初，常宝玉不吱声，不理我。我又找机会多次对他进行教育，他有些活动了。他晚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思想在斗争。我按少奇的布置进一步说服教育他后，他的态度也坚强起来了。表示同意翻案。

一个星期后，法院开始审讯了。主审法官是个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年纪不大，派头不小。他拖着长腔问刘少奇：“你同奉天纱厂的工潮案有关，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去煽动工潮？”

少奇十分镇静地回答道：“我是个外地来找工作的人，什么煽动工潮？我根本不晓得。”

“那怎么把你抓来啦？”

少奇一听这话，知道敌人没抓到什么把柄，便随口答道：“我是冤枉的。那天我刚下火车，还未找到住处，我路过纱厂门口见吵吵嚷嚷的很热闹、就去看了看，谁知正赶上纱厂警卫抓人，就把我抓来了。我也莫名其妙！”他又理直气壮地反问：“大白天平白无故地抓人，这还有王法吗？”

法官被问得目瞪口呆。

审问常宝玉，他推翻了以前的供词，既不承认自己闹工潮，也不承认是我指使他闹工潮。法官问他：“为什么以前承认，现在又不承认啦？”

常宝玉回答说：“以前的供词是在纱厂受刑，不过被逼着说的。”并申辩说：“纱厂私自给我上刑，厂警打我，我受不了才编

了一套口供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

法官又审讯我：“为什么到纱厂去煽动工潮？”

我说：“我是一个教书的，怎能去工厂煽动工潮呢！那天纱厂门口围了很多人，我也围上去看看，正赶上纱厂警卫乱抓人，连我这个过路看热闹的也抓了起来，我是无辜受连累的。说我闹工潮，你们有什么证据？”

法官问我：“你和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我回答：“我同他们素不相识。纱厂乱抓人，我是无辜坐牢啊！”

那时的军阀官僚法庭是不会搞什么调查研究的，全凭法官的主观臆断案子。这个装得十分开明、仁义的年轻法官，审讯不到一个钟头，就宣布休庭了。

休庭后，我和少奇同志被押在奉天第一监狱。

奉天监狱犯人接见的地方，是用铁网隔起来的，看守叫谁，谁才能站出来。杨一辰代表省委以家属的身分接见了少奇，也给我们送来了水果、点心，留下了大洋20元。并与少奇用暗语勾通了情况。

在满洲省委的多方营救下，法院很快发下了判决书：“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宣判后，监狱的一个看守立即同我去办取保手续。我是花了几块现洋，在一个原来和我有关系的小铺打保出狱的。少奇是经组织托皇姑屯铁路工厂的一个工人给打的保，在我出狱两天后出狱的。前后我们在狱中共禁闭了约半个多月。

少奇出狱后，中央仍让他继续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我出狱后还和少奇到上海（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一次组织会议。

从上海回来后，我就离开奉天到哈尔滨去任北满特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

此时正逢“中东路事件”发生，少奇亲自到哈尔滨领导中东

路工人群众开展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

在北满特委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有饶漱石、邹大鹏（做团的工作）、唐宏经、金永绪（伯阳）、韩心怿（做工会工作）、周一粟等人。

我当时住在哈尔滨道里的一个小公寓里，因那座房子不适合秘密工作，我们已准备离开，但在搬家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到哈尔滨来布置“广暴”纪念工作，7日在这座小楼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共九个人，其中有：陈潭秋、我、王鹤寿、小葛等人。那天会议开的时间较长，从早晨一直开到半夜。正当我们准备散会的时候，也就是1930年12月7日，道里江沿警察局借故查户口，逮捕了我们七个人，只有两名同志逃走了。

我们被捕后，头一天没啥动静，只是禁闭着我们。第二天开始过堂，最初审问我的是警察局的人，一个个特别凶。因为我是主犯，每次过堂审讯都用一次刑，除了打以外，每次都给我灌凉水。第二次审问我的时候，敌人把我放文件的箱子拿来做证。我一看到箱子，心里就核计怎样对付他们。因为箱子里还有两份文件，所以我坚决不承认箱子是我的。

敌人用严刑拷打我，穷凶极恶地吼道：“这箱子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是谁的？”

我回答说：“这个箱子是一个朋友寄放在这里的，里边装的啥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受人之托。”

敌人没得到什么，给我灌完凉水后，就把我拖回了监号。

过了一个星期，敌人又把我押送到了哈尔滨南岗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军法处的看守所地下室。我一到军法处，心里就想：这回敌人一定是按政治案件审讯了，我坚决不能承认箱子的事，否则将牵连到其他很多同志，这是大事，死也不能承认。

在军法处审问我的是一个姓王的处长。他装着和善的样子，拉着长声问我：“箱子是你的就承认吧！没什么大关系嘛！”

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敌人没掌握我们啥证据，警察局和军法处都只是在箱子上作文章，叫我承认。我果断地下了决心：就是不承认箱子是我的，这样，敌人对我们也就没啥办法。即使判刑，我们也不能全部牺牲，这样就能保护革命同志，使我党少受损失。

我在军法处写了一份申辩书，以进行翻案。敌人审讯我时，我说："这箱子是朋友寄存的，是我交错了人，我对这个朋友也不了解，他把箱子放在我这里就走了，一去无信儿。这个箱子与我无关，与其他几个被警察局抓来的人就更无关了。"

敌人听得不耐烦了，喊道："算了！算了！"

从此以后，很长时间没有过堂。

最后一次过堂是在监狱进行宣判。判我有期徒行7年，其他几个人都是判5年。宣判之后就把我们押送到道外监狱去了。

这时已是1931年初了。当时我和陈潭秋、王鹤寿等同志关在一起。

在狱中我参加了不少次的狱内斗争并取得了一定胜利。到1931年"九一八"后，我与陈潭秋等同志商量我们应该找人活动，设法营救我们出狱，不能这样在大狱里打徒刑。

我当时给很长时期没有通信的家里写了一封信。我哥哥接到信后就到哈尔滨托张文丰想办法。张文丰托一个叫王焕章的处长，王又托一个叫丁大头的伪护路军总司令。丁在哈尔滨很有势力，军方和当局他都认识人，最后给我办了一个保外就医。

我出狱后到我哥哥的朋友张文丰家拜访了一次。王焕章等人又在哈尔滨道外大饭店宴请了丁大头，在酒桌上大家都恭维丁大头，说什么，丁司令是哈尔滨的大人物，应多积德做好事呀；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呀；姨太太早生贵子呀等等。大伙都求他把我和年轻的政治犯都释放了。丁大头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丁某也讲义气，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从北京回来算了一

卦，也是让我多做好事。”他大大呼呼地说：“你们大家说的释放年轻政治犯，可以！都让他们回家！”就这样丁大头答应释放政治犯。

事隔不久，当局决定：在哈尔滨监狱押着的年轻政治犯全部释放回家，年轻的刑事犯都编入了伪满洲军。

这也算丁大头做了件好事。我们于1932年全都被释放了。释放后，我们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接受党给予我们的使命，各自继续为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的这段经历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一段回忆，它既不惊险，又不曲折，但它是我革命生涯中不平凡的一段经历。我并以此文来纪念我的直接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潭秋等同志。

我在延边的回忆

刘建璋

1928年春，我受北方局组织的委派，从北平香山慈幼院来到了延边。我们分两批共去40多人，其中有20几名党员。到达延边后，4 月份的一天，我按照组织上交待的联络暗号与当时在龙井以《民声报》文艺主编的公开身分担任特别支部书记的周东郊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

当时，延边党组织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第三国际“十二月提纲”和中央的指示精神，满洲省委坚持“一国一党”的原则做出决定：加入其他各国共产党组织的人，也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延边地区的党员，很快发展到上千名。根据斗争需要，1928年10月，在延边地区成立了东满区委。周东郊同志任书记，我和赵志刚同志任区委委员。当时，我们两人的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后来周东郊同志被捕，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1929年 2 月 9 日，我受组织之托准备将周东郊的爱人、孩子送回奉天。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戒备森严。我从和龙来到龙井，一下车就被捕了。被捕时，我身上带着为组织筹集的钱款和一些宣传反日的传单，“罪证”确凿。敌人企图从我身上得到党组织的线索。在我被捕的第二天，他们把我押到延吉镇守使署，严刑拷问。我估计敌人并非知道我真正的身分，因此采取软磨硬抗的对策，只说自己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员。敌人以我身上带的宣传品为把柄，继续拷问，妄图弄清我的真正身分。我说那是一个不知姓名的人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敌人被我搞得一时辨不清真假，就把我当做共产党的嫌疑犯，判了1年徒刑，投进了延吉监狱。我被捕后，由赵志刚接替我的工作。

在狱中，敌人把我和抽大烟的的，当土匪的，还有盐贩子关在一起。我明白敌人没把我当成政治犯，这使我稍稍放下心来，并开始琢磨如何利用这种身分和条件，继续为党做些工作。当时监狱里有一个为了谋生从四川来到东北的典狱长，平时对犯人看管不甚严厉。还有一个是从山东来的专管给犯人讲课的教务主任，是吃喝嫖赌之徒，对监狱里的事则不大关心。他成天给犯人讲课，尽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类的说教。大概是他讲得腻烦了，有一天他忽然把我叫去，让我给犯人讲几堂课。其实，我早就想接触狱中难友，做些工作。既然意外的机会来了，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

开始，这个家伙还不大放心，找个看守在旁监听我的课，有时他自己也来听。后来，他看我并无“谋反”之意，就不大介意，干脆任我自己随便讲去。这样，我便开始在八个牢房中以讲课为名秘密地宣传抗日。八个牢房转完了，敌人又让我到监狱的工厂里去讲课。我给这些难友讲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也讲朝鲜族人如何身受双重压迫。我还宣传汉朝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如果遇上教务主任来监听，我就讲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故事（这个他们还是允许的），还讲“义和团”、“红灯照”等为抵御外来侵略奋起斗争的事迹。

我利用讲课这一难得的有利机会，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正义感。久而久之，我与群众的感情逐渐加深，他们也更加信任我了。

后来，敌人给我换了牢房，和我押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苏联

人。这个人是苏联红军军官，大学毕业生。他是在边境线上执行任务时被抓来的。他懂德、法英语和世界语。为了不使自己在囹圄中虚度光阴，我发愤努力跟着他学起了世界语，还学会用俄语唱《国际歌》。如何为党多做工作，这是我在狱中经常思索的问题。通过长期的观察，我发现有一个叫申守义的看守，言谈中时而流露出进步的思想，于是心理产生了慢慢接触感化他，发展他入党，并通过他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想法。当然，这事要冒险，弄不好有马上杀头的危险。但考虑到斗争的需要，我决定同申守义进行正面接触。意想不到，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久，东满委派赵志刚、李晓露来探监。那天，看守长恰好派申守义在旁监视。趁此机会，我向两位同志介绍了申守义的情况，并请区委批准他入党。事后不久，申守义被批准入党（申守义后来在满洲省委当过交通员，在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此后，我同党组织联系恢复了。不久，我所在狱中成立了党的组织。从此，和难友们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了。

在这段狱中生活中，使我永生难以忘怀的是那个苏联人。日常，他操着不大流利的日语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苏联的情况。看得出他非常想念祖国，思念故乡。“十月革命节”那天，他把那页日历染红了，我们拿出仅存的一点好食品一起美餐了一顿，还用俄语小声唱起了《国际歌》。

1930年春，我刑满出狱了。出狱那天，狱中的难友们自动捐钱，给我买长袍、礼帽等物相送。那位苏联难友抑制不住依依惜别之情，竟放声哭了起来。这些年来，我没有听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这真是一件永生难忘的憾事。

出狱后，我来到延吉北山小学当教员。学校里，要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宋振庭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不久，北山小学建立了党支部，有五名党员。他们是教员中的曹振家、徐振基、贾庆云，还有学生党员李世风，我担任支部书记。这时，延吉、和龙联合

建立了中共延和中心县委。

这年“五卅”惨案纪念日的前一天，我们党支部研究决定第二天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根据这一部署，支部委员曹振家、徐振基召集部分学生到公园开会，研究行动方案。不巧，有人走漏风声，让校长刘庚辰知道了。刘庚辰大为恼火，当即宣布解雇曹徐两位教员。县长闻知，也下令逮捕这两人。幸亏当时姓宋的教育局长思想比较进步，他只给两位教员以限期离校，离开延吉的处分，就算作罢。

就在“五卅”这天，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举行了暴动，曹振家穿着朝鲜族服装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可惜的是，当时各级党组织忽略了反日武装斗争，而把重点放在分地、分财物上，因而暴动最后失败，敌人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者。这年秋，校长察觉出我的活动，勾通警察到学校抓我。幸亏进步教师张乐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告诉了我，才使我幸免于难。当天晚上，我找到东满特委见廖如愿、李小录。廖如愿告诉我东满特委决定让我到珲春任县委书记。于是我离开延吉到了珲春，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整理人：李宪虎　尚　颖

两次被捕入狱的回忆

张干民

我是山东省人，1925年参加革命。最初，在山东、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我的身分在那里有些暴露，不便继续工作。1925年5月份，山东省委决定将我调往东北满洲省委。党组织分配我在省委机关秘书处工作。1929年10月，我被省委调到大连地区工作，任大连特支书记。两个来月后，1930年1月份，省委又派我去上海开工会会议。后来又留在上海学习，到三四月间回沈阳，在兵工厂工作。

这时满洲省委遭破坏，我刚从上海回来，省委被破坏我一点也不知道。就在丁君羊他们被捕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我从东关兵工厂去王文德家取文件，刚一推门就叫守候在那里的宪兵便衣给逮捕了。问："你是共产党么?"我说："是从山东来沈阳学拉洋车的。""在什么地方学拉洋车？"宪兵追问。我说："在孙焕起家学拉车（事先我同孙讲，如有人问就说我跟孙学拉车）。"宪兵到洋车场将孙焕起叫来与我对质，孙讲的与我说的相同。敌人把我和孙押到侦缉队一个临时关押人犯的大屋子里。我一进屋，看见饶漱石、丁君羊、郭任民、赵尚志等十七八个人都关在那里，我们互相点点头。

第二天早上，侦缉处长雷恒成开始提审我。这个人很凶，常给被捕者用重刑，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雷锤子。"他吓唬我一顿，打我几十板子，压了一阵杠子，我仍按昨天讲的，说自己是

学拉洋车的。当堂将孙叫来，孙说："他是我的老乡，是来跟我学拉洋车的。"审了一阵没结果，将我俩送回监号。孙焕起是给沈阳兵工厂一个姓纪的中校级工程师拉包月车的。纪第二天上班听说车夫叫侦缉队抓去了，马上给侦缉队打电话要人。那时，纪在兵工厂很有地位。下午宪兵队就将孙放回去了。

我们在侦缉队关押了20多天。头十几天几乎每天都提审刑讯。我亲眼见到赵尚志最为坚决，每次提审，他在堂上都是大骂雷恒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气得雷叫掌刑的狠狠地打，而赵连哼都不哼一声。敌人拿他没有办法，都管他叫"滚刀肉"。丁君羊受刑也很重，敌人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常委丁惟汾的侄子，是山东通缉的大共产党。雷追问他东北党组织情况，他拒供，后来在叛徒的指认下，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尽管受严刑拷打，其他情况始终未供。

5月9日，我们被押送军法处，寄押在奉天第一监狱的幼年监。军法处过堂将丁君羊狠狠地打了一顿。他的刑伤很重，全身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难友们都很关照他。他坚持到底未说出党的组织。

在幼年监押一周左右，转"北未决"（沈阳地方法院检察厅看守所）的病监小院里关押。那里不让犯人看书报，只让读些《圣经》、《佛经》之类的东西。赵尚志带头同狱方交涉。赵说："我们是政治犯，不看那些东西。我们要看进步书刊。"后来，狱方被迫拿些普通报纸给我们。这也是我们经过斗争所得到的，难友们很受鼓舞。那里有个看守长很坏，长得很胖，外号叫"肉罐子"，常打犯人。我们想治一治他。他一来到我们监号，赵尚志就带头骂："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这老家伙以后就很少来了。我们共产党人替其他难友们出了一口气。

从我被押到军法处后，刘伯刚（地下党员）就托兵工厂的纪工程师，东北陆军讲武堂中校队长贾陶联合出保。当时宪兵队规

定，有两个校级军官就可以从狱中保出一个人，加之叛徒杜兰亭不认识我，敌人又没有抓住我什么证据，因此5月底我被保释出狱。

1930年5月底我出狱后，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代组织部长）。不久省委派我到抚顺工作。自从1929年8月份，杨靖宇等同志被捕后，抚顺特支就全垮了，省委去人几次都因种种问题未恢复起来。

我到抚顺后，化名赵金山，先到露天矿当推煤工人。在基层进行了一段工作后，发展了三名党员。后又到大山坑矿当工人，下煤洞子又发展了两名党员。不久，又到老虎台等矿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时已有党员五六名了，经请示省委批准，成立了抚顺特支，我任特支书记。

10月份，省委决定将特支改为抚顺县委，我任书记兼组织委员，李贺年为宣传委员，郝金贵为职工委员兼工会工作，朱东山为县委委员管农村工作，还有一个范青（叛徒内奸）。省委派杨一辰来抚顺担任省委特派员，协助县委工作。这时，抚顺县委下设三个基层支部，发展党员20余名，工会会员60余名。我到抚顺四个月，结合那里的实际情况，适时地开展些小型斗争。如：反对打骂工人，反对克扣工资，要求给患病的工友发生活费等，搞的比较活跃。工人们取得一些小胜利，尝到点实惠，对斗争充满了信心。

自从8月份中共满洲省委改"总行委"后，在东北积极推行立三左倾路线，抚顺的工作就较为困难。我也被吸收到"总行委"里去了。要求下边搞武装暴动，还要搞个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破坏抚顺发电厂。抚顺炭矿的要害部门是发电厂，发电厂一破坏，全矿就算垮了。可我一想，那样工人不都失业了吗？抚顺老百姓也就没电了。我本人对这种做法就想不通，加之发电厂又没人，所以根本就没有执行"总行委"的指示。

1930年11月，省职委书记林仲丹（化名陈子真，狱中叫张春

山），来抚顺检查工作，在县委机关——千金寨后窑地开了几个小会，传达了中央纠正立三左倾路线的精神。10日晚他又参加了在万达屋华工街刘荣芝家召开的抚顺县委扩大会，听取了县委的汇报。他又作了指示："我们的事情不要操之过急，要谨慎从事，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成熟了才能行动，没有成功把握的事不能蛮干。现在首先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保存好革命力量……"这就是他讲的精神。范青也出席了会议。会后范青连夜向日本特务机关告密。第二天（11月11日），我同杨一辰亲自送林仲丹到抚顺火车站，他乘6点15分火车回沈阳。而叛徒范青领日本特务到火车站对林进行了监视和指认，日本人派两名特务上车跟踪林仲丹。当列车行到沈阳东郊深井子时，特务逮捕了林仲丹，押回抚顺。当晚8点，敌人又包围了县委机关。这时杨一辰、李爱民和我三人开会刚结束，杨一辰刚开门往外走，就被日本警察逮捕，随即将我和李爱民也抓起来。当夜日警又去古城子将李贺年等人逮捕，一夜间凡是范青知道的人全被抓起来了，有20多人。

当天夜里，日本人分头对我们进行了审讯。不承认是共产党，他们就给灌凉水，灌煤油，上大挂。把我给带到刑讯室，问："你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共产党，是工会会员。"日本人火了，就把我的头压在一个木槽内，一动都不能动，用自来水猛往口鼻里冲，几分钟就昏过去了。醒来又问，不招供还冲。这样几次就把我折磨得半死。我在受刑最难受时的心情，一是恨；二是叮嘱自己一定咬紧牙关。当时也想不如死了好，这种罪真难受啊！有一次正给我灌凉水时，敌人把林仲丹带到我面前说："他的（指林）什么都说了，给你开过会的有？你的还不承认？"我就顺水推舟地说，是他给我们开过会，他讲工会的事，他是南方人，说话我们听不懂。我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也没供认林、杨是共产党领导人。

林仲丹受刑重，日本人连续折磨他五六天，打得全身是伤，

还把他浇上水，送到地下室，想冻死他。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杨一辰被打的也很重，双手一吊就是大半天，吃饭和结衣扣都得难友帮忙。转到奉天第一监狱后，他吃饭还是双手捧着窝头啃着吃，一只手拿不了东西。就这样，他依然在监号里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日本人对我说：杨一辰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你也是共产党的。我说不对，你把杨一辰叫来，我问问他。日本人没加思考就将杨带来。我说："二哥！咱不都是苦力嘛，怎么是共产党呢？"杨一辰说："我也没有说是共产党啊！也说是苦力。"这时，日本人才感到上当了，马上叫杨下去。我们统一了口径，我心里有了底。

我们在抚顺日本警察署，关押了40几天。12月25日左右，日本警察将我们20几个人提出来，集体照了一张像。上午10点多钟，用大马车把我们送到千金寨抚顺县中国法院过堂。在候审室呆了一个多小时，看守管的不严，趁这个时会，林仲丹找我同杨一辰碰头。林说："'麻子'（指我），你怎么乱说我给你们开会呢？打官司你一个人顶着，到法庭上你一个人翻供，说不认识我。杨一辰做些群众工作，有情况你随时与我沟通。"

法院简单地问问后，下午送千金寨抚顺县公安局看守所。两三天后，警察送我们到抚顺城火车站，乘火车到沈阳北站。敌人用马车将我们这批人送到辽宁高等法院。法官过堂时我翻供了。我说："陈子真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们工会会长是朱东山（当时他已跑了，把事推给他无证可查）。一切材料都是他拿来的，我是工人，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什么也不知道。我参加工会就是为了我们穷工人生活好点。日本人严刑拷打我，我是被屈打招供的。现在在中国法庭上，我得说真话。"当时的法官是杨士庸，检察官叫周伯甲。我陈述后，法官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成立工会的目的是不是要破坏矿山？会员有多少人？被捕的人谁是共产党？谁是工会会员？有什么行动？我都按在抚顺看守所同林仲丹研究的口供一一作答。敌人对我们每个人都审问了一次。始终

没有充分证据认定我们是共产党。下午三四点钟，押送我们去沈阳地方法院检察厅“北未决”看守。

这个看守所在奉天第一监狱北院，分孝、悌、忠、信四个大号筒子，一个号筒10间小监房。我住孝字8号监房。林仲丹住悌字3号监房，以后他又调到信字优待号。杨一辰在孝字号。每一个监室有10平方米，一般一室住10人或11人，最多住15人。土炕不烧火，等于住在地上。夏天蚊虫乱飞，屋小人多喘气都难。这么个小屋还要放一个尿缸子，十几个人撒尿，屋里气味难闻。犯人生活极差，“未决号”冬夏两顿高粱米稀粥，一块大咸菜，很少有菜吃。未决犯穿自己的衣服，多数人没有被子，更谈不到卫生条件了。难友们患病的很多，年年瘟疫在监内蔓延，很多人有病、死亡的也很多。看守的打骂，狱头的欺压，疾病的折磨，使难友们生活在最黑暗的底层。

1931年3月下旬，我们全部被押到辽宁高等法院一庭接受宣判，我同林仲丹以“危害民国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李贺年、刘荣芝同一罪名被判1年半徒刑，杨一辰被判1年徒刑，其他人无罪释放。我和林仲丹不服判，并由许克俊为我们请了律师冯涵清代写了诉状，冯律师又到监内同我们谈话，因此继续留押在看守所。其他服判的人转到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去了。

旧中国监狱的看守，同日本和国民党时不一样，政治上不那么敏感，只要犯人不跑、不死、不闹他就算完事。其它的事一般不管。你若给他几元钱，什么事都能办。因为我们是政治犯，是有知识的人，看守对我们管的不严。他们在监狱长期受政治犯宣传的影响，称我们是犯爱国罪的政治犯。我与林仲丹要想谈谈，就向看守讲：“我们俩研究上诉的事，请方便方便。”于是我们就可在中央岗台下，小声研究些我们活动的事情。

林仲丹与我研究了要同难友们串通向狱方开展斗争的方法，以改善恶劣的生活环境。我首先在“孝”字号把这个问题提出

来，难友们都很赞同。又在放风时与其他号难友串联，大家心很齐。在第二天早饭时，我把饭盒一摔做信号，大家一齐呼喊：“这饭太稀了，我们吃不饱，这顿饭大家都不吃了！”开展了罢食后，看守报告了狱方。所官都很紧张，怕闹出事来上司责怪他们。所官们向大家表示，要搞好伙食。经过这次斗争，以后的早饭就干多了，有时也给点菜吃。这次斗争取得胜利，对难友鼓舞很大。

我们在狱中经常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剥削、反压迫。主要是通过讲故事、唠家常、闲谈的方法进行宣传渗透。有许多难友，从前不知道这些，稀里糊涂地混，只对社会不满，但什么道理不懂。通过我们的宣传，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知道我们是爱国的，是高尚的政治犯。狱中许多难友吃冤官司，没人给写申诉书，托人写份“申诉呈子”也得两三元钱。我们政治犯宣布，不收任何代价给难友特别是穷人代写申诉、上诉、声明等呈子。我在狱中化名赵金山，大家都管我叫“赵先生”。我住监狱这几年，仅我一个人就给上百人写过呈子，其他人也都写了很多。从而使共产党人在狱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影响也很大。

旧监狱看守是社会上低级职业，多数都是穷人，没有文化，都是想混碗饭吃的，对当时政治都不太关心。由于我们共产党人在那里不断地向看守做渗透性的宣传，以及我们政治犯的种种行动，对看守影响也很大。有时他们到监房来同我们闲谈、或听我们讲故事等。有一个姓常的所官问我什么叫共产党？我向他做了宣传，以后他对政治犯的态度有了改变，对狱里克扣囚粮也很不满。我们也常为看守代写些文书、家信、请假条等。所以他们对共产党政治犯给予了很多方便。他们认为我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政治犯，将来出去会做大事的，所以对我们管得很宽，处处高看一眼。有一个副看守长叫王惠风，他有点文化，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与我处得很好，后来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1931年冬天，一个看守对我说："赵金山，你们又来了几个朋友，你去看看吧。"我去一看，是刘昆（赵毅敏）。他将如何被捕经过说了一下，又说老廖（廖如愿）、张应龙、杨先泽都被捕了。并让我想办法给他爱人凌沙送封信，要点东西。我说托看守长王惠风办准行。晚间，我同王讲了，王第二天就去了。并从凌沙那里带一个条子和东西，全部送给赵毅敏。凌沙给王两元钱酬谢，王说啥也没要。后来赵毅敏同王关系处得很好，又多次托他办事。凌沙同老廖爱人来会见时都找王惠风帮忙。王这个人有些头脑，他认为共产党正派、有知识、将来出去能做大事，也许能沾点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主动提出同我和赵毅敏拜把子。我同赵毅敏共同研究了利弊关系，认为同他拜把子不仅对我们在狱中活动有利，而且对今后其他同志进来都会有照应的，因此就同王拜了把子。王说："我救不了你们，但在狱中我照顾你们还是能做到的。"后来杨一辰入狱患重病，王多方照顾他，给他搞好药，杨一辰才免一死。1932年之后，他在狱中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狱中，晚间枪炮声听得很清楚，难友们已感到外边出事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扛枪的日本兵站在墙头上，这时监号的门全上了锁，放风也停了。过了一会儿，日本人到监号走廊走一走，说些话就走了。"九一八"后，看守基本没换，还是原来人马。林仲丹曾与我研究过，想趁乱之机发动暴狱，但因条件不行，工作不成熟，所以没有行动。

1931年10月间，在日本人支持和操纵下建立了临时伪政权治安维持会。1931年末，伪政权决定凡张学良军法处押的人犯都释放。但李子芬他们是明牌的共产党，所以当局没敢立即释放他们。后来我听说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关系，经省临时高等法院办个手续才分批释放的。林仲丹出狱大约在1932年1月份左右，省委拿几百元钱经他爱人许克俊的活动，买通了一位姓张的翻译，以

提审为名到监狱外放了。

1933年3月，经奉天高等法院重新审理，改判我为八个月徒刑，同年5月被释放。出狱后，我立即找党接关系，几次未能接上。后来王惠风给我5元钱做路费。我因生活无着落，6月份到临江找狱友赵金山（与我同名），经他托人介绍到森林警察大队任文书。到祖国光复，这11年我走过一段很曲折的弯路，1945年我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

监狱内斗争是我党另一个战线的斗争，可以说是血与火的斗争，是非常严峻的，对人们是一场信念、毅力和韧力的严峻考验。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同我住狱的同志今天尚健在的没有几个了。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斗争的壮举，虽然事隔这么久，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晚年，党对我的照应很好。离休后的生活很幸福。在有生之年要尽自已的余力，为改革开放做些贡献。

整理人：张大膺

狱中生活琐记

周东郊

1907年我出生于沈阳。1924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5年参加了沈阳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的"6·10"运动，接受了党的教育。这年底由杨韦坚，佟汝励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翌年六七月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夏，由于我参加进步活动被师范学校开除。我更名考入东北大学，第二年春又被勒令休学。至此，结束了我一生中的学生生活。

1927年4月起，我先后到营口，海龙两县任中学教员，并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1月，省委调我来沈阳参加党员训练班，结业后派往延边进行建党工作。我以《民声报》编辑身份在延吉工作了11个月，建立了东满区委，并任区委书记。1929年1月18日，我在延吉县龙景村被捕，1930年7月中旬出狱，被关押一年半多一些，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狱中生活。

1929年1月18日晨，天蒙蒙亮，我被驻军逮捕，解往吉林第一监狱。

吉林第一监狱是清末仿外国监狱形式修建的一座模范监狱，坐落在巴虎门里。我被押着从黑大门上开着的一扇小门进去，右边的门房是登记室。陆军监狱附设在这里。我是属于吉林边防司令公署军法处的犯人。登记时，在案情栏里给我填的是"共产"。不一会儿，我被领进一间大厅，交给了两个值班看守，他

们问几句话后，再交给牢房的看守。在牢房的小方厅里，有十几个人，看样子是囚徒，他们从看守手里看了我的名签，便争着同我握手，原来都是我党同志。他们知道我的名，也都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有几位的名字我以前也听说过，我们是相知而未相识的同志。我记得有在哈尔滨被捕的铁路工人张有仁，刘同志；有在长春被捕的赵尚志、韩守本；有在吉林被捕的海涛等同志。看守把我送进一个号房。之后，张有仁等通过看守，又把我请到他们号房吃饭，边让我吃，边问我何时何地怎样被捕的。我将情况简单地介绍给他们，他们惋惜为什么我不早点躲起来，东北易帜，为国民党熟知的同志一定要遭殃的。

海涛对我说，自从东北易帜后，对1927年上半年以前被捕的政治犯都将被释放，这里的同志只有赵尚志、韩守本两人因为尚未判罪不在此例。

张有仁说："你来的真赶巧，因为我们即将出狱，借我们当前身分和处境对典狱长具有一定威信，可以要求他把你拨入优待号里。"所谓"优待号"，房舍同一般犯人住的一样，但白天不锁门，可以在本甬道内活动，在通道里的便所大小便，还有读书写东西的自由，可以吸烟，可以保有烧劈柴的小火炉，自己烧饭。

同志们还介绍了狱中情况，交给我应付审问的技术：供词要前后保持一致；能否认的一定要否认；不怕法官恫吓，不受法官诈诱；以及怎样挺刑，贿赂掌刑者……高洪光对我说："军法处的法官大都没有政治知识，就是他们手中握有证据，有的也看不懂，过堂时千万要镇静，不要表现出畏惧的样子。"这些亲切的嘱咐，对我后来应付审讯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天，我又被同志们找去，在赵尚志住的号里呆了一天。这天同志们除了教我一些狱中应付的事，法庭上应付官司的种种办法外，还给我介绍了一位姓佟的看守长。佟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受难，我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是我觉得你们都

是好人，有什么事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官场里就是这么回事，你骗我，我骗你，纪律规章一大堆，照着办，一件也行不通。有什么事别客气，对我讲。”佟看守长出身于警察学校，30多岁，在这里已经工作五六年了。通过同志们做工作，他思想很进步，同情革命，为人谨慎小心，从来不受我们一文钱，但替我们办过许多事，而且一直办得稳妥，连党里的文件他都偷着带进来，可以说他是狱内外党组织的联络员。

我入狱10天左右，一天上午看守长唤我到军法处听审。军法官姓洪，他首先问我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然后说："是南京政府来电缉捕你的，你如果是共产党就据实招认吧，省得皮肉受苦。”他说到这，眼睛转向堂下两边侍立的卫兵，我随着他的目光也往那儿望了一下，左右侍立的卫兵每人手里都提着刑具：皮鞭、黑红棍、杠子、铁锁，还有些叫不出名的折磨人的刑具。我申诉说："我在民国14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宣传部长，15年就不干了，此外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他问我："苏子元是干什么的，据说他在你们报社也呆过，同你是老朋友，这个人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把他交出来，南京方面指示，他是个著名的共产党员，你交不出他来，你就脱不了干系，案子就结不了！”我回答说："我念书时同苏子元认识，但说不上是朋友，去年夏天他到龙景村是来投奔当时的《民声报》社长安怀音的，安怀音现在天津呢，听说已经做了国民党高官啦，他也许知道苏子元下落。苏在《民声报》主持编辑事务只一两个月，后来参加拒绝日本在东北修筑'五路'的延边民众团体一道去了吉林请愿，听说请愿团体已从南京动身回东北，现在也许回到延边了，他们或许知道苏的所在。我国法律罪且不及孥，个人做事个人当，不能认为抓不到苏子元就不放我呀！如果查出来我有罪，我不推给别人，别人好坏我也不能替他负责啊！”法官无言以对，最后讲了些忠孝立身之本的东西，告诉我："回去你仔细想想

吧，我们东北人放着太平福不享，替南蛮子捣什么乱呢？”这样审讯结束了，卫兵把我又押送回监狱。

春节过后，大约在3月间，我又被提审了一次，这次同我一起被捕的翟哲文审讯后就被释放了。捕后我们对他进行了工作，使他对生存的社会有了初步认识，了解了什么叫革命，人们为什么闹革命。在临分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活着有些闷人，怪不得你们这些青年人有福不享，找罪受呢！”赵尚志接着对他说：“我们并不是有福不享的人，天底下没有福享的人太多了，罪也不是我们愿意找的，罪总在找人啊！受罪的人，被罪找上的人，有一天懂得惟有推翻使人受罪的东西——这就叫革命吧！这才有真正的福可享呢！这是为人人能过上不发闷的日子。记住我这个魔怔的话，也许不会虚度你以后的岁月呢！”说着他把磨得相当锋利的用来剃发的一只白铁片送给翟哲文做纪念。我想赵尚志真会抓机会进行工作，我要很好向他学习。

不久的一天上午，甬道上又喊我接见的呼声，我估计母亲不会这么快又来，是谁呢？从领我去接见的看守长手里捏着的登记单上看到是李学勤。这是苏子元的化名，前几天军法处第二次审讯还追问他的下落，还拿不交出他我就没有出头之日来恐吓我呢。他真大胆，竟来狱里同我接见！但同时我也感到他对同志的信任和照顾，便有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心头。隔着两层铁丝网罩着的窗口，望见了子元胖胖的圆脸，他的两只眼投给我以希望的目光。他对我说：“收到你的信了，你被捕时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了，但是不了解你押在什么地方，过了堂没有？”我说：“看见你我真高兴，告诉家里放心，案子不严重，不会有其他麻烦。别牵挂我，我会照顾自己。过了两堂啦，没什么，但是结局怎样很难说啦。看你的面色，好象不怎么健康，多多保重吧！有事来信，不必来接见了，手续麻烦。”这时看守走过来，我便说：“大表哥，谢谢你，还在第一小学教书吗？回去给我老姨请安，给石

官屯的亲友同好，案子拖到哪一天还说不上。”子元是了解我说这些话的意思的。他说：“给你带来点吃的和衣服，是你姨妈给你的，你还要什么？我是来这办事，顺路来看你的，有事给永吉县政府章科长写信，我们家里人都好，我在奉天还住在老地方。”

子元给我带来几筒罐头牛乳，几件衬衣裤，还有帐房存了一些钱。过几天又送来些食品和一部铅印的《戊戌六君子传》。我读着书，回忆着这次会见，无限感慨，曾留诗一首：“戊戌六君子，巍然谭嗣同。引刀仰天笑，肝胆蔑时穷。危难交真见，时乖志愈宏。宝刀应护惜，勿使贼蹑踪。”每当我想起子元冒着危险来狱中接见我，都感激他对同志的关怀和信任，并佩服他的胆量。

苏子元同我接见后不久，省委给我来了信，勉励我在狱中坚持奋斗，并给我寄来几本省委办的公开刊物《关外》，希望我给它写稿。省委的交通还是宋小坡，通信处还是奉天大德生药房。一直到1930年5月前，我同省委一直保持着联系，党内文件都寄到佟看守长那，由佟设法递到我手里。

1929年3月，赵尚志和韩守本也被解走了，走前，赵尚志把他的被褥、狗皮和一些零碎的东西都给了我。我给他一封密写信，是写给省委的，并嘱咐他如果在奉天或南京获得自由，可以到奉天中街大德生药房找宋小坡，取得同省委的联系。赵尚志用下边的话同我告别：“我们都还年轻，会有重逢的日子，但征途险恶，也许从此永诀啦！但愿我们谁也不辜负人类对我们的期待吧！”语重心长，今日回忆起来仍感字字铿锵有声。

1930年端午节前后又一次提讯我，洪法官当堂宣布，我这个案件由司法机关审判，即日起解送吉林高等法院。我又被转入看守所的十字监里，这里关押的都是未决犯，整天关在号里。

我转入看守所半个来月后的一天，高等法院检察处提审了。检

查官除问我同苏子元的关系之外，又向我提出几个问题，一个是我的一位朋友给我的信上写着：十字之信，尚未收到。问："这十字是什么意思？十字就是红十字，是谈赤化的事吧。"我回答："我们年轻人常弄新花样，彼此通信有时把信文写成心形、十字形、圆形，请法官查一下，从我家搜出来的我的朋友的信里，一定会找到信文写成心形一类的信。这里并没有别的意思。"他提出："从你那搜出的书、杂志、传单里边有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打倒军阀、国民党的字样，有几本书还是苏俄出版的，这不是共产党干的谁干的。"我回答："我在报馆里做事，报馆是舆论机关，什么政党，什么团体，总是把他们的宣言、通电、宣传品寄给报馆。张大帅的通电也给广东、武汉的报馆呀！他们送来我们还能往回退么。而且报馆也必须从这些东西里了解国家大事、各地情况。苏俄出版的书，也是从邮局寄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报馆的编辑部里搜来的，我一个做编辑的没有可能替它们负责。"检查官又提出一些问题，都是1927年以来我存的男女友人的信文里找出来的，还有我亲笔写的一张可以给《民声报》写稿的人名单。他硬说这是我们党人的花名录。我一一对他解释并反驳了他的论据。

这一堂过后，我初步放点心。因为他们只注意我的私人信件和没有问题的东西，那些油印的小册子他们没有注意。其中我亲自刻写的《东满通信》，单是这一本东西就可以肯定我是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了。不过我还不能完全放心，我是这次提审中唯一有物证的人。

不久，我接到起诉书了。10月间，我被高等法院提去预审，是在一间小型法庭里审问的，站堂的只有一名法警。法官问的还是以前检察官问的那一套，只是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南京通缉令说你是共产党，你总得提出一个有根据的反证证明你不是共产党啊！"他的意思是，如果我能找到政府中的有力人物或延吉方面

人物提出证明或具体保证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或许据此定判我无罪。我回来后反复想了想，政府中有力人物我是找不出来的，延吉方面《民声报》去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反倒有失自己的身分，不如挺着，争取早日定判，以免他们深入查阅我的其它物证。我将起诉书交给了我请的律师，他告诉我，军法处解到法院四个人，已经对三个人不起诉开释了，"你总有点东西，把你也定判无罪，对军法处有点说不下去，我们最好想法子取得个最轻的刑。"

过了几天，法院又提讯我，这次那个法官提出一个严重问题，他翻出了我的那本有关延边四县东北军部队部署情况的记事册。这个册子是从我家搜去的，不过混到从报社搜去的东西一起了。他问我："记这些东西准备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准备暴动用？"我当时回答他："我们是报馆，对地方军情况必须了解，平常就不能不搜集登记这类事情，而且中央政府去年就提出了裁兵问题，今年还召开全国裁兵会议，国内各大报都登过各省的现有军队编制情况。"法官再没有往下深究。我回到看守所，马上设法通过永吉县的章科长帮助我剪各大报发表过的有关裁军和军队编制情况的新闻，并立即写了一纸申辩并附上这些剪报，证明报馆应该具有这类资料。同时为自己申辩，我从1926年就与政治党派断了关系，去延边前当过教员，到延边做报馆编辑，不过为谋生餬口，从无党派活动。在社会上我无地位较高的亲友，得不到这类人的奥援，无处觅得书面保证，希望法院依据事实，早日定判。这个以攻为守的申辩书，至少对辩解报馆存有那册军备调查登记簿生效了，法官再不提这个问题了。

这年12月的一天，法院开庭了。检查官申述了起诉理由，除过去审讯过的几点内容外，没有新内容，但对我的年岁和知识方面提出应予照顾，请法院从轻量刑。我对自己提出了几点无罪申诉。律师做了对起诉的答辩，认为起诉书上所据的起诉理由均出

自臆测，并无具体事实能证明我是共产党。希望法院依法处断，并对检察官照顾我的年岁和学识表示赞许。这样就休庭了。第一天开庭，审判长宣读了判决书，除采用了起诉书中的部分理由外，并提出我在《民声报》上确有煽惑青年的赤化言论，但念我年轻，被捕后从未向法院呈递过什么申辩书，依据刑法按条例判我徒刑一年，未决前关押日以二日折合一日。没有把我打成共产党，我当庭表示放弃上诉权。

判决后，我从看守所转入吉林第一监狱。1930年7月上、中旬的一天我出狱了。我同难友饯了行，将些衣物送给了难友，作为我们前后相处一年多的友谊纪念。大约在上午10时我离开了监狱。出狱后，我回到沈阳找寻组织，宋小坡已被捕，使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我又去大连《泰东日报》任编辑。至1931年1月，经赵暗炬又找到了省委，接上了关系。

（此材料根据周东郊遗稿《铁窗内外》及其生前的一些回忆资料整理）

整理人：付乃礼

坎坷的历程

唐宏经

今年我已经89岁了，参加革命整整65年。经历了晚清、军阀、国民党、伪满和新中国五个时期。半个世纪以来，我走过了非常复杂而曲折的道路，经历异常坎坷。

我是大连人，从16岁开始在工厂做工，受尽了资本家和工头的剥削压迫。1923年12月2日，大连"工学会"宣告成立，我是第一批会员。"工学会"实际就是工会组织。为什么叫"工学会呢？因为那时，大连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统治得很严，叫工会怕日本人不准。关东当局规定，凡是要挂牌子成立什么社团的，必须到警察署备案。实质是他们不想让工人成立自己的团体。在备案问题上，工人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叫"工学会"顾名思义，就是工人学习文化，增加知识会，日本人就没法反对，最后也批准了。

大连还有一个进步组织叫"中华青年会"。这个"青年会"有个干事叫杨志云，河北省滦县人。杨早年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大连的活动很有成绩。1923年，李振瀛到大连后，首先接触的就是杨志云。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大连也开始大逮捕，抓了很多人。杨被捕后，被日本人驱逐出关东州。后来到了奉天，任奉天党支部组织委员。同任国桢他们搞制麻会社工人罢工，由于有人告密，在南站邮局被日本警察署特务诱捕。因日

本人知道他在大连的事，被捕的人都放了，只有他同任国桢被关押着。后来日本人把他引渡给张作霖的军法处，要求严惩。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杨正在狱中，他写了一篇日本侵略中国罪行录的文章，引起奉天当局的重视和好感。同时，任国桢同他又联合写了上诉书。张学良刚上任不久，正为父服丧，军法处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们是共产党，不久就将他们释放了。

大连这地方，俄国人、日本人建了不少工厂，20年代初期就有五六万工人。他们很有斗争性。1923年底，李振瀛、陈为人从上海到东北来，先到大连进行了一些革命活动。

1924年初，我第一次见到的共产党人是李振瀛。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知道他有文化、有知识，同情工人、给工人办事，很受工人欢迎。他在大连"工学会"中开展了许多活动，向工人骨干同志介绍了《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并开始建团活动。"工学会"的傅景阳就是那时入团的。当时关向应是《泰东日报》的职工。1924年入党。他在大连活动很积极，很快就被敌人发现了。李振瀛同志也不能呆了，他们一同离开大连到上海去了。

在搞活动中，我们感到光有工会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组织。1926年1月，经中共北方区批准，将超龄的8名青年团员转为党员，正式建立了大连特委。我就是这一年初在大连入党的。

1927年7月份，大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先让我撤到沈阳，在东北大学附属工厂边做工边找党。1927年12月间，有一个人来找我，自称叫王立功（大王立功），是大连铁道工厂的，说："有个朋友今晚在北市场要见你。"我下班后，应约到北市场。一见面，我认识他，是吴丽石（当时满洲省委已成立，并设在沈阳，我一点都不知道）。他说："咱到饭馆先去吃点饭

吧！”到饭馆后吴说：“你让我找了好久，最近听人说你在东北大学工厂干活，才派人找到你。”吴丽石打听了我的生活情况及大连党组织的破坏情形等。接着他说：“省委决定调你到省委搞工运工作。”我说：“我没文化，也没有政策水平，还是在下边工人中活动较好，请组织考虑考虑。”吴说：“这是组织的需要，文化不要紧，边干边学嘛！”又说：“现在干革命就是为了许多人家将来过上好日子，你要考虑一下组织的意见。”过两天，我辞去工厂的活，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省委。到省委机关后，才知道是接替小王立功的工作。他有肺病需要医治，王带病领我去抚顺、辽阳、沟邦子、沈阳兵工厂等单位接上头，交待一下工作，就住院去了。

1928年4月份，省委接到中央通知，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满洲省委五个名额，要求以工农出身为主的党员做代表。当时各地党支部不太健全，所以省委决定不进行民主选举。委派我、张刃光、王傅碧、于志勋、朱秀春五人为六大代表。省委指定由我领队。我们五个人中只有张刃光（团省委书记）是知识分子，其他都是工人出身。到哈尔滨后，我们还承担了往边境护送南方来的代表过境的任务。我一个人送三批同志到满洲里，有广东、广西、云南的代表。第三批送的是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三人。我同他们一起过境。

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一个乡村原大地主的院落里举行。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他是秘书长），瞿秋白同志作了报告，布哈林（共产国际主席）在大会讲了两次话，并由他作了总结报告。“六大”会议进行了20多天。我党“六大”开完后，正值共产国际“六大”开幕，让我也列席参加了国际“六大”会议。会后又组织我们到乌克兰等地参观。

1928年10月份，我回国了。省委准备开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这期间周恩来同志回党中央路过沈阳，在北市场一个

秘密机关给省委干部传达“六大”会议精神。但基层领导都未听到，所以省委决定开一个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及研究下步工作。原先让我传达“六大”精神，我说：“还是让张刃光传达吧！他记的比较全。”张同意传达了，他说：“有遗漏的老唐再作些补充吧！”

1928年12月23日，省委选定在党员牛思玉家里开省委扩大会议。这个开会地点在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地点选得不好，是一个离兵工厂很近的贫民区，人员很杂乱。开会的人员穿什么的都有，进屋一呆就是大半天不出来，引起周围一些人的怀疑，报告了警察所。当牛思玉老婆将要做好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七八个警察，声称查户口，逐个询问。吴丽石同志很机警地将党的文件扔到牛思玉小孩的尿桶里，并说：“老牛啊！你孩子的尿桶还在屋里，怪臊的，快拿出去。”并把尿桶举得很高，递给老牛拿出去。就这样将文件处理了，使重要文件未落到敌人手里。有一份“六大”的《十大纲领》和一份刚起草的《互济会章程》，叫警察拿去了，问了好一顿。约下午3点钟，警察将我们全部带走了。当走到小东门时，路上人就多了，我怕省委机关出事，决心趁人多时跑掉。不幸被警察又抓回来，狠狠打了一顿。在警察抓我的时候，张刃光趁机跑掉了。中午，他跑到了团省委机关关碧云家，布置了其他机关转移。

我们被押到小东警察分局。敌人听我们南腔北调的，口音不一，在牛家又搜到《十大政纲》、《互济会章程》等文件，警察头目对我们更加怀疑起来。他们经请示后，将我们分三个地方审问。我同潘敬久、王赞升三人送南市宪兵队审问，刘国栋送兵工厂，剩下的都送警察厅审问。我们在宪兵队住了近半个月，过了五六次堂。宪兵打我最重，把我手打得肿的老高，我也没说什么。当我回去时，小王同潘敬久看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就掉眼泪了。我说：“哭什么？自己干什么的不知道？拉出去枪毙也不

能掉眼泪！”听我这么说，他俩也就不哭了。那时他们才20岁左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党员，鼓励他们年轻人的一种方式。

过几天，我们都转送军法处。到军法处预审室，我们都见面了，互相关心地问怎么样？受刑没有？送警察厅的受刑很重。王化民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孩。敌人想从他搞突破，因此被打得最重，但他终于顶住了，什么也没讲。交换情况后，大家心里有底了。我们这批人没有一个交待问题的，全坚持下来了，同志们都很高兴。这13个人中，有一个叫李正权的，是中学教员，沈阳人。他的亲属通过奉派实力人物汤二虎的关系，从军法处将他保释出狱。不久我们均被送到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号关押起来。

到奉天第一监狱后，我们被分别关押，除放风外，相互难见面。我与潘敬久、张寿禄住在“孝”字监号。当时监狱里没有党支部，有什么事都由吴丽石出头办，总的由他负责。他同外边“互济会”有联系，外边送来的钱，由他托看守分给我们些。在大号，还可以托看守买些东西吃，不过也必须给看守点好处。有一天下午2点钟，军法处长颜文海及两名军法官突然来监狱，将牛思玉、吴丽石、陈为人、王鹤寿还有我等五人提出审问。那时监狱有一个常规，凡下午两三点提人，都是拉到西南角刑场枪毙。我们认为这回是要枪毙了。在候审时，陈为人对我讲：“咱们在刑场上别喊口号了，喊口号其他同志会暴露的。”我将他的意见传给了其他人。但实际并不是枪毙而是提审。第一个提审的是牛思玉，追问在他家开的究竟是什么会。他按规定口供又讲了一遍，被法警狠狠打了几十板子。第二个提审的是吴丽石。颜文海以长者的口气说：“你有书不好好读，闹事玩，让老人操心，以后不要瞎闹了，你要好好读你的书。”原来这位颜处长与吴丽石同志是同乡。后来才知道吴在狱中托人，给他父亲去一封信。吴父是江南的大地主，接信后马上来沈阳，接见了吴丽石。随

后，他到颜处长家又走动一番，并通过秘密关系与满洲省委领导同志进行了接触，他出些钱上下进行打点和活动。这一下很有效，不久我们就被转到小监房优待号里去了。

1929年春，从吉林监狱解来十几名难友。我去一看有金永绪、吴晓天、老安（开原人）等，我们互相谈起来都很高兴，我们共产党人在狱中能见面很不易啊！

1928年11月我代表省委去吉林第一监狱看望他们，那时我就传达了省委对形势的看法，如张学良易帜，以国民党身分被捕的共产党人将会被释放的。大家说："老唐说的事终于实现了。"住两宿后，他们在沈阳全部被释放，许多共产党人回到了党的怀抱。

1929年7月间，狱方通知我们出狱，由看守押着我们到外边去"打铺保"。我找亲属打一个铺保，并给警察两元钱，就算出狱了。吴丽石、潘敬久同志因没有社会关系，当天没有出狱。次日，他俩想起了以前在押的一位难友，现已出狱，在一个菜园子当把头，于是，他们从他那里取保后获释。

我出狱后，同孟坚接上头。不久，党组织送我到上海党中央学习。"中东路事件"爆发时，党中央命令我们立即回东北，参加新的斗争。

"中东路事件"之后，我回省委任工运书记。1930年12月初，因陈潭秋、孟坚、王鹤寿等七人被捕，让我回哈市任特委临时书记。特委刚刚恢复工作几天，省委又来急电，让我到上海党中央去开会。在沈阳南站刚出站台，省委秘书长詹大权正在等我，将去上海的路费交给我，并提出一些希望和注意事项。

到上海的接头地点是日升客栈，等了6天接头人才来，是个跑交通的。我问什么时间开会，他说："会已开完了，是四中全会。"我说："怎么没叫我去呢？"他说："没参加更好，会开得不好，打翻了，大家都不赞成开四中全会。是王明一部分人组

织开的。等会儿有人来和你详谈。”第二天，罗章龙来了，对我说：“四中全会，王明以反立三为名，实际更左，王明要夺权。”我说：“王明是个学生，领导中国革命能行吗？”罗说：“他有后台，是俄国人，叫米夫。大家都不同意开这个会，全国做党的基层工作的人都反对。”我说：“如果是这样，我也反对。”我们谈到这里，罗说找机会再谈，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人，让我马上搬家。说中央机关出叛徒了，何孟雄、李秋石、林育楠等20多名同志被逮捕。我搬到三马路新新旅社住。一天晚间，罗章龙来旅社找我，我们又说了一阵。他说：“四中全会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形势，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央非常委员会，请你参加。你回东北去，我给你派一个助手，他叫徐文亚（现名徐宾玉），你到哈尔滨也要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我接受了。

1931年2月，我回到东北，组织了“哈市非常委员会”，我任书记。潘敬久、肖海田、黄玉珍、老才、王番林他们都参加了这个“非常委员会”。因活动经费不足，我们分别到乡下去筹款。1931年3月份，我去宁安县，那里有一个支部，坐火车行至阿城时，护路警察上车检查毒品，在我身上查出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哈“非常委员会”写给宁安支部的。警察把我押往一面坡，第二天又押送南岗路警处关了一个多月。审讯时，我说是别人托我捎的信，别的我什么都未供。4月份，转到护路军司令部地下室关押。这个看守所阴暗、潮湿，空气混浊，人满为患，生活条件恶劣。这里还关押了40多名朝鲜爱国者，他们为了改善狱中生活条件而发动了绝食斗争，我也参加了。后来将这40多名朝鲜人解往吉林、朝鲜各地。我入看守所不久，陈潭秋、孟坚、王鹤寿、葛凤明等人不知什么原因又从哈尔滨道外监狱押回护路军司令部地下室。不久陈潭秋通过关系将我调到他们监舍去了，见面后，陈潭秋说：“老唐，现在党内有斗争，你去上海参加会了，给我们谈一谈情况。”我如实讲了到上海的情况，谈了个人

对“四中全会”的看法及参加“非常委员会”经过。陈潭秋同志说：“你是工人出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这些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党内有斗争是必然的，但你不应该搞分裂，参加‘非常委员会’，你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

“九一八”后，我们又都转到哈尔滨道外监狱。监狱是平房，以中心岗向四周放射形的建筑，监房是土坑，不烧火，16个人住一屋，一日三餐都是高粱米粥大咸菜。我们通过一个看守（我们党内的一个同志）在外边买些书籍、报刊等，供我们学习。

王鹤寿这时患了淋巴腺病，很利害，烂的不象样，流血水，痛得很，我常给他换药冲洗。我们在监狱里同敌人有斗争，有一次看守打犯人，我们闹了起来，孟坚带头直闹到前院，向狱方提出抗议：看守不能虐待犯人。我和王鹤寿都去了，监狱长出口不逊，骂我们是“阶下囚”，我们毫不让步，与其理论。最后狱长软下来，表示今后不再发生打犯人的事。

一次，一个犯人腿有病，走路很吃力，站队慢些，看守踢了他两脚，犯人倒在地上。我们不让了，大家团结一致，又提出抗议，闹得看守只好给犯人道了歉，才算了事。

1932年春，日本人占了哈尔滨，这时孟坚的哥哥来哈市，他托中东路理事会长李少庚帮忙，孟坚获释了。孟坚出狱后又托人走了丁大头（护路军司令）的门路，将陈潭秋等同志全部释放。我比孟坚同志还早出狱几天。

整理人：张大　庸范霞

铁窗生活回忆

刘若云

1929年11月，党中央调我到沈阳担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是刘少奇，团省委书记是饶漱石，组织部长丁君羊，宣传部长是个四川人（忘其名），秘书长廖如愿，我去以后，廖改为搞军事工作，我担任秘书长。

1930年3月末，刘少奇得到中央电召，急忙去了上海。4月初，中央改派刘树清（即李子芬）做满洲省委书记，邱九以中央巡视员的身分协助刘树清工作。省委书记刘树清住在小饶那里。一天饶漱石陪同刘树清、邱九来找我。见面后，邱九向我问了多方面的情况，如党员人数、支部生活、延吉地区的农民工作等等。

一天早晨，丁君羊来通知我："上午到小饶那里去开会。"我吃过早饭就去了，敲开门后，只见一个陌生的汉子出来问我："找谁？"我知道事情坏了，就反问他："这里有房子出租吗？"他说："进来吧！"我就这样被捕了。他们把我押送到侦缉处，只见黑压压的一屋子人。邱九、刘树清、饶漱石都在，还有交通站的老宋（是个西药房的老板）。过了一会儿，丁君羊也被抓来了，还有兵工厂的两个青年同志。全案被捕的一共16人。当即就以邱九、刘树清为中心，进行了紧张的研究口供。他们是怎么研究口供的我不了解，只是乘中午买些点心来吃的机会，由刘树清传给我一个纸条，意思是："各人准备口供，坚持互不相识。"

我把这个原则传达给其他同志，并进行了研究。

这天下午，侦缉处对全部被捕人员进行了初步审讯，提问了姓名、职业、住址等。审讯时，有一个人悄悄地站在门后暗地认人，就是早几天被捕的团省委工作干部杜兰亭，因而大家都明白这次遭到破坏的根源所在了。

晚上，侦缉处进行正式提审。知道叛徒指认了丁君羊、饶漱石、团的干部王文德和一位肤色黝黑、意志坚强的小伙子（忘其名），还有两个兵工厂的工人、两个中学生。我和那个叛徒只在饶漱石处见过一次面，他可能还不认识我，所以我当晚未被提审，刘树清、邱九也未被提审。以后，侦缉处又再次提审了丁、饶和赵尚志，但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就把全案转送给军法处，所有被捕的人都羁押在看守所（北未决）。

在军法处，敌人也是集中审讯他们，并对丁、饶施用了肉刑（饶因病弱关系，受刑较轻）。大家仍是坚持"互不相识"的原则，一致否认认识杜兰亭。这样一来，案情就没有再扩大，而且内容也简单化了。同时，由外面的党组织通过同案中一位王同志的侄儿王化一（辽宁教育会长，张学良少壮派中的人物）的关系来缓和案情，在统治阶级内部疏通。他们缓和的说法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凡事应和缓些，不易操之过激。"由于这些活动紧张时期过去了，案子停下来了，不追问、不判刑，但也不释放。

案情稍稳定后，我们就开始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作斗争。开始对斗争的目的和方式方法不是都经过详细研究的。例如监狱里雇了个教诲师向青年犯人讲道（我们都住在青年监），我们就在讲堂里和他驳道理，随即又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把讲堂给闹翻了。这样激怒了监狱当局，把他们认为闹得最激烈的三个人饶、我和另一个东北学生提出来毒打了一顿，改押在关强盗和烟犯的一所最恶劣的监房里。我们以绝食表示抗议，绝食了两天

后，敌人无奈，只好把我们送回原来监房。

经过斗争，我们的处境有了好转，有病可互相照顾，再也不送到病号监去遭磨难，还可以看些书籍，借此机会，组织上秘密送进狱中一些书籍和党的文件来学习（这次案件发生后，从开始我们就与满洲省委和在上海的党中央经常联系，并不断得到外面的指示和物资援助）。在生活上，大家一块从外面买些食品，有计划地分配使用。

这样拖到"九一八"事变后，到1931年12月，外面传来了"快要释放"的消息。这时军法处来了个人，到看守所草草审问了大家一次，听他说话口气，似乎没有任何原口供做依据了。于是，当时又传开了一种说法："我们的全案卷宗都在'九一八'事变中散失了。"这句话也可能是事实。我们都很高兴，通过本地同志找好了铺保。过了几天，敌人用大汽车把我们拉到法院，一个个点名后，就交保释放了。

我出狱后，在沈阳进行了短期停留即返回上海。

整理人：贺　玲

我的铁窗生活

郭任民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的破坏，距今已59年了。今年我已82岁。亲历其事，被囚两载，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省委被破坏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满洲省委从少奇同志调走后，积极推行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轻举妄动；另一个就是不严格执行在白区的秘密工作原则。破坏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也是极为沉痛的。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回忆一下我们党的艰苦历程，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胜利和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对我们大家，尤其是对青少年都是有教益的。

一

1927年春，我（当时19岁）去武汉，考入了当时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官学校第5期）”，成了军官候补生。在总政治教官恽代英同志的教育下，我接受了革命思想，认识到要革命必须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军阀夏斗寅攻打武汉，军校学生进行了坚决抵抗，我在战斗中负了伤。当我从武昌后方医院伤愈出院时，军校已经解散，有些同学去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有些同学不知下落。因

我的原籍是沈阳，便于1927年秋返回家乡。不久，在沈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中共满洲省委派我去台安县中共特支工作，公开身份是台安县立第七小学教员，校长是王纯一同志（台安特支书记）。暑假后，党组织又派我到铁岭县立师范中学当教员，同年冬又调我回沈阳，进入张学良新成立的汉学研究机构“萃升书院”学习，兼同泽女中国文教员。不久，我又兼任张学良授意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外文协会秘书，所以我的经济情况比较好。

我有一个亲属在沈阳市小东关下头的天齐庙南胡同住，他有一所三正三厢的六间房子，托我代管，我同妻子梁丽如住一间。根据党组织的需要，我将两间正房让出做省委宣传部机关，宣传干事徐话萤（男）常住在那里。这个机关由我和妻子做掩护。省委和宣传部开会时，我妻子梁丽如便在外边做针线活给我们看门。来去的同志无论是报户口还是注销户口均由我办。

1929年秋冬之间，少奇同志命我去上海党中央参加短期学习，同一组的还有赵尚志，李维周。学习结束回沈后，我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秘书，协助部长工作。

二

李子芬这位省委书记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比较积极。他为了显示党在东北的力量，曾在1930年4月5日和12日两次派人到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喊口号和讲演，从而暴露了党的组织。

4月12日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开大会，请该会委员苏上达（留美学生）讲演，会议名称为“泛太平洋会议讲演会”，是吹捧帝国主义的。为此，省委特别重视，并让我在会前办两件事：一、停发给东北宪兵司令部的邀请信；二、搞20张入场券。两件

事我都顺利地完成了。这天晚上开会时，赵尚志同志突然在会上挺身而出，站在第一排的凳子上，面向听众，沉痛地控诉英日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工人、学生的罪行，宣传我党主张，呼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会场秩序大乱，讲演中断。主持会议的急忙叫人去通知东北宪兵司令部来人。与赵尚志同时在会场的党员还有陈尚哲、杜兰亭。当时我正在台下忙着，看到这个情况，马上给赵尚志同志暗示，叫他快逃走，但他头脑正热，根本听不进我的话。散会时，便衣把他们挤在后边，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三人当场被逮捕

当时，省委对他们的被捕，没有采取立即搬家、营救等积极措施。省委领导认为杜兰亭等三人能经起考验，相信他们不会叛变。

最初，敌人审他们时，他们表现还算好，没供出什么，都说自己是爱国青年、爱国无罪，敌人对他们也没动大刑。不久，敌人将陈尚哲的父亲陈克正（哈尔滨高等法院院长）请来（又听说是其父派人来），做陈的工作，使陈叛变，陈又去做杜兰亭的工作，杜也叛变了，只有赵尚志坚持下来了。

从4月12日赵、杜、陈被捕，到4月18日，这7天的时间内，敌人做了大量的审讯和收买工作，为4月19日大逮捕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我们省委对此却一点情况也没掌握，反而于4月18日在团省委机关（关碧云家）召开了满洲党、团委联席会议，省委主要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当时有人提出：在这开会能否出问题？饶漱石说，杜兰亭不知道这个地方（实际上杜早知道这个机关）。18日晚，参加会议的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留宿在团省委机关，准备次日继续开会。没料到19日一大早，敌人就闯进了团省委机关，将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逮捕了。

三

赵尚志、陈尚哲、杜兰亭被捕的事情发生后，省委不但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疏散、转移机关文件和人员，反而继续采取“左”的做法，组织党、团员每人写10封匿名信，要求商会出面让宪兵队放人。但别人都没写，只有我写了10封。匿名信邮出后，被外交协会的人认出了我的笔迹。4月19日早6点多钟，陈尚哲带领五六个宪兵到我家将我逮捕。我被带到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小西门外三贤祠），关押在侦缉队员宿舍里。我进屋后，看见王纯一、崔国政等人已先关在这里了。

4月19日晚7点左右，敌人把捕来的人全部点了一次名，叫到谁，谁就到院中间站一会儿，回去后再叫第二个人。后来听说这是让叛徒在暗处辨认。丁君羊当时化名李禄森，被叛徒指认出是山东省委来的丁君羊，丁否认是山东来的，所以他受刑最重。4月20日早7点钟，在侦缉处西厢房里，由侦缉处长雷恒成亲自过堂，逼问我们是不是共产党，让我们交出组织活动的地点、名单等。不说就上刑，打手板子，抽鞭子。于是，我们大家都编了一套有利于自己的假口供，都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南方人有的说是到东北来谋职业或经商的；东北人大部分说是来奉天求学的。我由于通过沈阳市警察局侦缉处（是我的亲属）同宪兵侦缉处走了门子，所以对我动刑还轻一点。

我们在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押了一个月左右后，被转到军法处，当天过了一次堂，就把我们同批被捕的崔国政、袁效之、刘陆晨、王绍堂等六七个人，以“救国会”另案处理为由，暂时取保候审了。这是满洲省委通过人情关系而变相释放的。最后剩19人关在狱中。

四

1930年5月下旬，军法处频繁地对我们提审。丁君羊被打的最重，因他拒供党组织情况，其他人也都上过刑。为了对付军法处的提审，李子芬让大家一致否认认识杜兰亭，坚持“互不相识”的原则，因此案情再没有继续扩大。

赵尚志同志在狱中斗争性很强，也很有宣传力，看守们都不敢惹他。有一天，狱方让我们去“教诲堂”听课。教诲师讲的都是些因果报应迷信的玩艺儿，为此赵尚志毅然站起，公开与教诲师进行辩论。教诲师理屈辞穷答不上来，惹得犯人们哄堂大笑，就连那些流氓、小偷、骗子们也不爱听讲了。闹的教诲师上不了课。狱方怕政治犯闹事，后来就再也不叫我们去听课了。为了防止我们分散在各个监号里搞赤化宣传，又将我们这19名政治犯全部集中在病监中的一个大号里关押。这在客观上却给我们帮了忙，使我们有机会在狱内建立了党支部。

1930年7月间，李子芬同志认为在狱中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有必要成立狱中党支部，以便领导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和争取教育狱内中、下级看守人员为我们办事。经研究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狱内党支部委员会，原省委书记李子芬任支部书记，团省委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委员有刘明俨（刘若云）、邱九（邱旭明）、丁君羊。狱支让我做监内外联络兼管理经济工作（原来赵尚志负责，因与看守闹翻，命我接替）。从此，狱支在监内积极地开展了组织党员学习，秘密传阅党内文件，支配经济（外部送来的钱物统一管理使用）和对敌伪人员的争取教育工作，并适时地开展了对敌斗争。

1931年端午节前夕，按狱支指示，我们要求狱方给难友们改善生活，各号都派一名代表同狱方交涉。我是首席代表，李子

芬、饶漱石怕我一个人孤立，也同我一起去找狱方。当时狱方表面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但我们回号后，看守长“许大绝户（一个很坏的家伙）”却把我们三个人绑上毒打了一顿，并给我带上了30斤的重镣（“震北猴”），送“北未决”关押。一到“北未决”我便开始绝食，以示抗议。我绝食有两三天，李、饶在“青年监”也开始绝食。这样狱方压力很大，也很慌张。第四天有一个杂役犯人送一碗饺子给我，在碗底我发现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要求回青年监”。我知道这是“狱支”的指示，于是，我就向狱方提出要回“青年监”，否则就继续绝食。“北未决”看守长怕我出大事，对他不利，经请示狱方，很快就将我送回“青年监”。为此，我们几个人还庆贺了一番。

在监狱内，我们这19人过着“苏维埃式”的集体生活。不管是外边“互济会”送的钱，还是个人家属送的钱都由我统一管理，经支部书记同意后，就可以在饮食上做些安排。对病号要特殊照顾，给买点药物和东西吃。如丁君羊刑伤很重，我就托人买鸡蛋，用蛋清给他涂在刑伤处，效果很好。青年团干事王笑山同志脖子生疮很重，我们运动看守带他到社会医院花钱治疗，去了好几次，他的疮才算好些。对看守，我们除了教育他们外，还用钱来买通他们。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效，一些看守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什么信他们都能给送出去，中央、省委的文件也能带入狱中。一些狱中不让看的书报，他们也能帮助我们购买带进来。

1931年1月，天气很冷。在放风时，李子芬意外地见到了林仲丹。两位省委书记在狱中见面真是百感交集。林只简单地说他们是最近从抚顺监狱押到“北未决”的。李问林有什么要求，林说他们从抚顺押来的路上有好几个难友耳朵及脸部冻伤了，希望能搞点冻伤药，李说：这事能办到。李回号后，找到我说明了情况，让我想办法。我同看守混得很熟，拿几元钱，托一个看守很快就把药买来了，及时治好了难友们的冻伤。

另外，我们也经常利用文艺形式在狱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31年春，我们编了一个小话剧，主要内容是反帝的。饶漱石扮演洋鬼子，丁君羊扮演翻译官，王文德扮演女人，我演老太太。在难友中演出，看守们也前来观看。这对难友们是一个鼓舞，对看守也是一次教育，在狱中影响很大。有时在难友中，我们还宣讲东北的形势。

1930年6间，南京政府特务部要求将沈阳捕获的“共产党犯”解送南京严办，但东北长官公署内部有很大分歧。于是，省委抓住敌人内部这一矛盾，及时派丁君羊的爱人于培真去南京找丁的叔叔丁惟汾（国民党中常委），丁同张学良讲了这个问题，求其设法阻止把我们解送南京，留在东北从宽发落。王纯一的侄儿王化一（辽宁教育会长，张学良的好友）也去找张学良说情，因此，我们没被送往南京。

“九一八”事变后，形势变了，通过维持会长冯子敬出面，同辽宁省高等法院研究复审后，终于释放了我们这批人。

出狱前夕，李子芬、饶漱石同我们个别谈话时说：“出狱后，如果同组织接上关系，就好好干革命；接不上，要很好地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再干。”

释放后，组织让我筹备75元（银元）钱，给南方的同志做路费，我按时送到了。

1932年初出狱后，本来组织部门让我在沈阳同党接关系，但由于那时义勇军攻城，我没接上。后来，我就回到北郊新城子区指挥屯村老家了。从此，我和我妻子梁丽如就失掉了党的关系。

整理人：张大庸

我们在狱中的活动①

王纯一

我于1925年在沈阳第一师范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六月间我和苏子元被派到绥芬河国境线工作。在那，我们办了一所小学，苏子元任校长，我做教员，以校长和教员的身分做掩护，护送我党去苏联过境的同志，同时还组织了一部分工人掌握了铁路工人工会。

1927年我回台安，在黄沙坨小学任校长。在那里建立了台安支部，由我负责。这个支部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吴丽石在沈阳，后来孙广英、李维舟等又来台安。我们在该地的小学教员和师范学校学生中吸收了一些积极分子，扩大了党团组织，共发展团员30多人，还出过一种油印刊物。

1929年9月间，我到沈海铁路公司当职员，住在公司附近一家木厂院内。我在一个职员党小组参加活动。小组成员有：郭任民、郭尊三，还有一两个人（不记得姓名了）。党小组开会常在郭任民家（大东关水簸箕胡同）。

1930年4月的一天，郭任民跑来告诉我，杜兰亭、赵尚志等人被捕了。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

① 根据1961年11月25日王纯一写的回忆录《1925～1930年党在沈阳地区的活动情况》及1983年6月4日张广恩整理的王纯一回忆录《谈谈1930年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情况》综合整理。标题为整理人所加。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在1930年4月12日请一位留美学生讲演。我们党准备借机争取群众。因此，省委决定除各校团员、学生参加外，还派去五六个党员参加这个会。事先研究好在开会时用提意见的办法，由赵尚志登台讲演，下面学生拥护，扩大反帝大同盟的影响，从而争取群众。但被敌人发现了，伪警备队派出密探，逮捕了参加会议的杜兰亭、赵尚志、陈尚哲等三人。

因为我和杜兰亭有联系，郭任民叫我躲一躲。我还没来得及躲，杜兰亭、陈尚哲就很快招供叛变了，供出了很多人和党的机关地址，因此使党团组织被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我也是其中一个。我党损失相当大，这次被捕的有中央来东北视察的同志邱九（邱旭明）、省委书记刘树清（李子芬）、团省委书记宋振华（饶漱石）等；还有省委其他几名常委李玉山、丁君羊及联络站和几个学校的教师、学生30余人。

事情发生后，外面互济会负责人陈德森，一面想法和狱中被捕同志联系，一面积极组织营救。

我们这些人最初都被关在奉天第一监狱的幼年监里，这个监号每天有活动时间，可以出外透透空气。由于大家到各监房宣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狱吏们又把我们分到各个监房中去了。

我们这些被捕的同志，在狱中建立了监狱支部，支部书记是刘树清（李子芬）。他在狱中发动犯人进行过要求改善伙食和治疗疾病的斗争。最初监狱看管很严，进去三四个月后，我们就开始和外面取得了一点联系。刘丹岩的爱人托人往狱中送一些行李。我的堂侄王化一（辽宁省教育会会长，张学良少壮派人物）通过监狱看守跟我私自通信。丁君羊的妻子于培真正做互济会的工作，也想尽办法和监狱取得联系。

由于我们在监狱里的宣传和斗争，敌人对我们看管的严起来了。把饶漱石等人送到“未决监”，严密监视。我们一看有人被

隔离了，邱九、刘树清等人和大家互相联系，大造舆论，说饶漱石等人被押走了，监狱里要暗杀政治犯了。我们这么一喊，果然有效，饶漱石等人又被送回了原来监房。

在狱中我患痢疾很厉害，眼看支持不住了。我给王化一写了一封信，让他在我死前见见我。王化一来后，监狱支部几个负责同志告诉他我的病很重，让他把我领出去，保外就医。在当时，按他的身分，保我出去是能够办得到的。但他没敢保我出去，只是说："不用上火，不用着急，慢慢想办法。"当时张学良正准备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王化一也同去。我们说丁君羊的叔叔丁惟汾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叫王化一到南京找丁惟汾给想想办法。王化一属于政客，听说有丁惟汾这样重要关系，他满口答应了，并且与张学良也谈及此事。到南京后，丁惟汾特意请了一回客，此案得到缓解。同时，党又派于培真直接到南京找丁惟汾商量此案的解决办法。

我们同案人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也未放出。"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成立了维持会，会长冯子敬，并兼任临时警察局局长。此人在一师专当过历史教员，是我的老师。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向监狱支部提出：冯子敬还有些爱国主义思想，他对我印象还不错，不妨求求他来了结此案。大家同意这个办法，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们一批青年人，因为反对日本而被捕。现在国破家亡，你担任重要职务，完全有权了结我们这一案件。这封信我请即将出狱的李华锋带去（李是另种案子的）。

李华锋这个人很认真，三番五次为此事奔波。冯子敬也有心开脱我们。但不久冯子敬辞职不干了，李华锋盯住冯子敬不放。正赶上临时高等法院成立，院长姓余。冯子敬带着李华锋一起找到余院长，把我们的案情说的比较轻松。余院长听说此案未判，遂派薛叔平到监狱中提审我们。薛叔平问的比较简单，我们也是轻描淡写地讲一讲。于是经高等法院同意，分几批把我们放出。

这个时间是1931年12月20几号。

从监狱释放时，每人都要找门牌保。党组织给家住外地的同志安排了保人。我们出狱后，满洲省委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重新安排。

整理人：孙桂荣

我在狱中的一段日子

赵尚朴

1931年春天，党组织要我做互济会工作。一天，中共北满特委一位负责同志叫我去特委机关。我去后，他指示我说："你代表党组织到护路军司令部看守所去，看看陈文辉（孟坚）。"他是1930年12月7日在北满特委会上同陈潭秋同志一起被捕的。

第二天，我以陈文辉表弟的身分去会见孟坚。见面后，我说："现在家里（指党组织）有些事不太如意……"并把四中全会的决议材料夹在东西里给他，暗示说："你要好好看看东西。"

1931年5月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有些活动被敌人察觉。这年7月间，滨江警察厅长高其栋派人来我家搜查，说是我与韦卓亭（国民党左派）有关系。因此，我被押送滨江警察厅拘留所，后又转押于中东路护路军看守所。

这个看守所有个看守员外号叫"梁巴篱子"，这人很坏，经常打骂犯人。我同他吵了好几次架。一次吵架时，一个人给我使个眼色，意思叫我不要与他争吵，这样没有好处。后来我与那人谈话时，才知道他是党的领导人陈潭秋同志。

敌人恨我，不久把我调到地下室最坏的关押场所。众难友挤坐在一起，无法躺着，用汗水来擦地板。那时去一趟厕所，都感到空气非常新鲜，可想见囚室里是如何了。

不久，陈潭秋转到第三监狱去了。1931年冬，我也转到第三

监狱，在那里又遇上了陈潭秋。

陈潭秋告诉我，在狱中要保住身体，将来出去干革命还需要呢。并向我介绍了一些简单的锻炼方法。在狱中，陈潭秋教会我下围棋，用高粱米饭做红棋子，用白面做白棋子。当时我请教他什么叫"赤色帝国主义"？他说是国民党把苏联叫做"赤色帝国主义"，这是做反苏宣传欺骗人的。我又问什么叫"国际路线"？他说"国际路线"是第三国际对中国的分析。我当时对唐宏经等同志参加罗章龙非常委员会的活动抱着敌对态度，问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时，陈潭秋说："唐宏经是工人出身的党的干部，党培养这样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仍把老唐看做是同志。"

当时在狱中，王鹤寿很活泼，并在狱里常唱些歌曲，如《国际歌》、《马赛曲》和民间小调来鼓舞难友。我会唱《国际歌》就是王鹤寿教的。他这个人很乐观，给我讲了"巴士底尔大狱"的法国大革命故事，又说革命成功后把反动派也押在地下室狱中。大家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并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在那里，大家共同对变节分子葛风明进行了斗争；该人以后成为叛徒。

1932年2月，由家中保我出狱。当时陈潭秋的意见是用钱也要把他们买出。我出狱后，经过活动，带医生到狱中给他们看病，假定些病名，想使他们保外就医。1932年6月左右，他们都出狱了。

1938年，我到延安抗大学习时，在中央组织部见到了王鹤寿同志，他那时是中央组织部干部处长。

整理人：李志民

革命风雨伴我行

赵毅敏

我到东北做党的地下工作是1928年。

1925年，我在法国因参加“五卅”斗争支援上海工人时被捕入狱，同年9月间出狱后，党派我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1928年毕业。这时正是我党在苏联召开党的“六大”闭幕之后，很多参加“六大”的代表及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毕业生，都从苏联陆续回国。当时回国的一般分三条路线进入国境。一条是从海参崴乘轮船到上海。第二条从满洲里入境。第三条从绥芬河进入国内。回国的人多半是扮成小商人、工人、苦力之类。在夜间爬山越岭偷入国境，然后再由各交通站向内地转送。

1928年11月，我从绥芬河入境回国。原来决定我到上海由党中央分配工作。当我到哈尔滨时，“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做交通工作的负责人对我说：“哈尔滨市的国际交通站已部分被破坏，希望你留下来，帮助我们整顿一下交通联络机关，待任务完成后再送你回党中央。”因此，我就被留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绥芬河交通站出了点问题，又派我到绥芬河国际交通站去主持工作。1929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在边境上打起仗来，车站被轰炸。我们在那里的交通工作无法进行了。这年8月间我回到上海，党中央分配我到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0年4月间，由于李子芬那届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于5月间派我到满洲省委同张浩（林仲丹）一起组建

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张浩任临委书记，我任宣传部长，杨一辰任组织部长，王鹤寿任团委书记。同年8月陈潭秋来，成立了中共满洲省委，他任书记，张浩改任职委书记，何成湘任组织部长（曾代理书记），我的工作未变，仍任宣传部长，韩源波任军委书记，凌莎任妇委书记。这年12月，陈潭秋在哈尔滨参加北满特委会议时同孟坚、王鹤寿等同志一起被捕。中央于1931年2月间又派张应龙来继任省委书记。张应龙是上海纺织工人出身，“五卅”运动的骨干分子。他担任省委书记时，何成湘的工作未变，我在担任宣传部长的同时曾兼任过一段奉天市委书记，时间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到我被捕。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很混乱，日本人没有来得及正式建立政权，只利用旧民国的官僚机构成立了“治安维持会”。日本宪兵在大街上随便搜查逮捕行人。1931年11月21日上午10点钟左右，廖如愿（军委书记）、杨先泽（宣传部秘书）刚走到商埠地三经路俄国领事馆门前，突然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搜身，在廖如愿的马褂袖筒内发现两张反日传单。杨先泽走在前边，本来敌人没有发现他，这时杨回头看见廖被日本人抓走，表现出紧张的样子，日本宪兵认为可疑，也将杨一起逮捕。

当时将他俩带到东城日本宪兵分遣队。敌人对廖、杨二人严加审讯，并动了酷刑，他俩顶刑不过都招供了一些问题，杨供了自己的住址（商埠地南三经路布荣里胡同）。他同廖住一个院，当夜敌人对廖、杨家进行了搜查，并派便衣特务在那里守候，因而凌莎（我的爱人）在22日早上到廖住处拿文件时也遭敌人逮捕。22日上午张应龙刚给工人训练班讲完课去廖家碰头，一进门也被在那里守候的敌人逮捕了。

敌人对凌莎进行了审讯，她挨了不少拷打，但她什么都没讲，自家的住址在何处也始终未说。也许日本宪兵看见她怀里抱着孩子，象一个家庭妇女，因而也没有再逼供。

张应龙这个人不坚强，胆子很小，顶不住敌人的刑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很快就供出来自己的住址（即我的住址，南三经路东乡承里88号。因为他是单身汉不好租房子上户口，故同我住在一套南房的东西屋）。

当11月22日张应龙供出我们的住址以后，敌人对凌莎说：“刘太太，你住在哪里，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了。”随即把凌莎带到家里（此时我正在省委开会）。

11月22日，张应龙、凌莎二人很晚还未回家，我已预感到他们出问题了。于是我连夜销毁了大部分文件和资料，将一部分重要的文件装在一个铁饼干筒里埋了起来（解放后我去找过一次，因房屋变迁太大未查到）。此时已到下半夜，我不便再到省委去报告请示，如果这时去一定会引起在街上执行宵禁的军警的盘查，会发生新的麻烦，所以我一直等到23日。天一亮我就到了省委，在省委秘书处同何成湘、詹大全等同志进行了研究。看形势当时回去赶快搬家还来得及，省委决定我马上回去搬家，同时还决定省委准备迁往哈尔滨。我走到家门以前，先在大坝上往家里望了望，转了几圈，看门前没啥异常情况，才向门前走去。但我上前刚一推门，在那里守候的日本宪兵就用枪逼上我了，问我：“什么的干活？”我说：“是来租房子的……”本想蒙骗敌人。可是，我那不懂事的只有两岁多的女儿见我就喊：“爸爸回来了……”日本宪兵一听女儿的喊叫，就指着我说：“你的说谎的……”于是我被捕了。

当天，日本宪兵把我带到东城宪兵分遣队地下室，进行严刑逼供，扒去衣服，灌凉水，夹手指头，打鞭子，面墙长时间的站立……总之要搞的使你身心忍受不了。但我看透了，这一切手段都是为着一个目的，逼你招供，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已是常识性问题了。于是我咬牙顶住，什么也没说。敌人看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把杨先泽带来，指着我问杨：“你说的那个姓刘的是不是

他？”杨立即说“是。”我高声叫：“我不认识他！”但敌人不管我说什么，即刻把杨带走，并狂笑说：“通通的明白了。”

廖如愿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廖起初曾说些假的地点，来蒙骗敌人，如旅馆、妓院等地址。敌人去核实，对方均不承认，又查无实据。敌人仍不放过他，继续上刑。他又讲了一处省委早已不用的空房子。敌人前去该处搜查，将互济会负责人陈德森逮捕，日本人带陈与廖对质时，他说不认识此人，就将陈释放了。后来台安特支李醒华因不知道这个联络点已废弃，去接头时被守候的敌人逮捕。李任何东西未供。廖如愿又说不认识此人。不久因无证据而释放。

杨先泽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刑讯，不仅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宣传部的秘书，而且将省委机关情况全部讲了，并在敌人面前指认我是他的领导和入党介绍人（实际上他不是我介绍的）。他成为党的叛徒。

有一次日本宪兵队审讯我们，中间日本人要休息一下，将我们四个人临时放在楼梯下边一个旮旯里，挤坐在一块。我趁日本宪兵不备，对他们三人进行了斥责，我说：“你们不要乱说了，那样是对党组织的背叛。敌人一用刑，你们就说点，他们看到用刑有效，就会继续用刑。只要你们坚持一下什么也不招供，敌人看到用刑无效，就不再严刑逼供了。”这番话看来发生了作用，后来他们再没有供什么重要情况。有的还翻了供，由此制止了党组织破坏的扩大，省市委机关和负责干部罗登贤、何成相、詹大全全都保住了。杨、张、廖三人的叛变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所以省委决定开除了他们三人的党籍（我们在狱中接到了省委开除他们的通知）。

1931年底，法院开庭审判我们。我被判了5年徒刑，他们三人均判3年徒刑，因我同廖如愿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仍留看守所羁押等候高院的复审。张、杨服判送南监（奉天第一监狱）服劳

役去了。

我在看守所时，张浩（林仲丹）依然在“信”字号关押。我在“悌”字号。张应龙在“孝”字号。杨先泽在“忠”字号。张浩曾传给我纸条，除对我的坚贞不屈的精神表示赞许外，并告诉我狱内一些情况和黑暗面，让我争取到“信”字号。“信”字号是优待号，一屋住六个人，是板炕。其他普通号是土炕，永不烧火，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环境很坏。

我们同看守所当局交涉，要求到“信”字号（优待号），看守长说：“没有什么优待不优待，都一样！”他同我们打官腔。我们反问他：“如果都一样，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看守长说：“那要看你们的品行，不能随便答应你们！”后来我们按张浩同志说的让我们写呈子给法院告他们，揭露他们的黑幕。我们在呈子上写着某某人花多少钱给看守所，就住进了优待号，他们优待杀人犯，不优待政治犯……并有意的交给看守，请转法院。所方看后怕弄到法院去，把事闹大了，于是赶紧让我们搬到“信”字号去住了。

我们搬到“信”字号后，他们来个下马威，平时“信”字号白天只是从外边插门从不锁门，我们搬去后门给锁上了。我们想了个办法来对付他们，一会叫开门小便，一会要开门去大便。我们轮流搞，弄的看守忙个不停，后来，门就不再上锁了。看守们把我们这里一些政治犯叫“邪神”，说：“这邪神，得罪不起啊！”看守对政治犯有些害怕和头痛。

我常同青年难友们一起学习，谈形势，讲一些革命道理和我党的主张。有一段时间因奉天特委遭破坏被捕的李丕文（李维周）、杨坚白（杨于典）等同志也都是当时学习的参加者。

“九一八”事变后，监狱当时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张学良时代留用人员，他们大部分对日本人占领东北不满，有些人还颇有民族气节，他们比较同情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有个所

官（看守所长）在公开场合讲："在我们这里你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什么人都得听我管……"而背地当我们面却说："唉，老弟！将来北边有苏联，南边有红军。一夹攻，满洲国就得完了。我看准了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将来天下准是你们的。到那个时候可别忘了咱兄弟对你们还不错，给兄弟一碗饭吃。"当时，我们把争取、教育、团结狱内中下级人员为我们服务，作为一项主要的任务，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狱中斗争。

1931年，看守所调来一位副部长（副看守长）王惠风，他有点文化，当过小学教员，对政治犯有同情心理，与我们常接触。我们就找机会向他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揭露日本人侵华罪行，在他思想上起到一定作用。张干民（狱中叫赵金山）与王较早地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我进看守所不久，张干民就通过王惠风给我家捎过信，又将家里的东西带进来。渐渐我们熟悉了。1932年春，一天，张干民同我说："王惠风想同我们两个人拜把子，你看如何？"我们经过研究分析了利弊关系后，决定答应他的要求，和他拜把子。王惠风同我们拜把子后曾说："我救不了你们。但，在狱中照顾你们一下还是能做得到的。"他还同我单独讲过："我一家有老小不能同你们一块干，我相信共产党，天下早晚是共产党的。"他后来确实为我们做了不少事，经常为我们往狱内外捎信，带东西以及党的宣传品。

我们党在狱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有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我一进看守所的监房，手中还提着小包袱，刚把身体靠着炕沿的时候，一个狱头（炕头）很严厉地问我："你也不问问，就往炕沿靠，炕沿是木的，木能生火，小心烧着你的护眼毛。你是打什么官司的？"我听到他这种粗鲁蛮横的口气，也就不客气地说："告诉你，你也不懂！"狱头说："吓！我在这里什么官司没有见过？""是共产党官司。"我没好气地回答他。狱头装着什么都懂的样子："啊！共产党咱可见过的，我认识吴

振明，我俩一起蹲过监号，他是我的朋友，你是共产党也是我的朋友了，把行李拿上来就睡在我身边吧！”对我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旧监狱都很黑暗，那些长期坐牢的土匪、惯盗、杀人犯和看守勾结在一起，欺压、折磨、拷打新进来的犯人，以勒索他们的钱财，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个被判处死刑的土匪，在拉走执行枪毙的时候，指名要见见我，不然，他不去死。当我见到他时，他跪下大哭说：“我认识你们共产党太晚了，要是我早认识你们，知道有你们这条路，我不会去抢人家……”他叫王叶锦，在“悌”字号曾同我住在一个监号，对他有较大影响。我们经常无代价的为难友们写申诉呈子，有些人得到了改判。因此，有不少犯人来找我们政治犯为他们写呈子，就是那些狱中的亡命之徒，死刑犯、无期的重犯，也愿意听我们说的话。那时监狱里，共产党犯比其他犯吃香。在犯人中冒充自已是“共产党”的事也发生过，据说这样一讲，狱头就不敢欺压他了。党在狱中的影响，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而是由一批接一批的共产党人，在狱内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所形成的。

1933年冬，高等法院改判我的刑期为3年徒刑。廖如愿维持原判。改判后，我俩被解往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去了。监狱有个医务所，有几个医官，其中一个叫王常泰的人，颇有民族气节，有爱国思想。前段经早期党员刘伯刚等同志做他的工作，使他比较同情共产党。还有一个地位比他高的刘医官是他的领导，经常背地讲日本侵略者的坏话，也有民族气节。当我们从看守所转入监狱时，他们正往医务所选人，我同廖如愿被他们调到医务所工作。这里管理较松、活动余地大，能到各监房走动，便于同难友接近，难友们有病无病常来医务所看病，互相交流监内外情况，这是个很好的条件，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帮助。王常泰是住所医官，每天从早到晚都同我们在一起，很便于我们对他进行宣传教

育争取工作。王也很靠近我们，为我们办了不少好事。他在家里订一份《盛京时报》，每天带来给我们看。至于捎书送信、购物已是经常的事了。

1934年春，孙己泰等同志也送到了南监。我经过努力先将孙调入医务所做杂役，这样医务所力量就大了。不久杨一辰也过来了，他在铁工厂。我们几个党员分别做工作争取了看守桑玉贵（他在入党后被调到满洲省委分配工作，1935年牺牲在北满）、看守曹洪祥，以及卫生所长李士瀛等人。杨一辰在铁工厂争取了技师王宏久。这些人在狱中帮助我们做了许多我们办不到的事。我走后，杨坚白等同志也调到医务所了。杨一辰经常以看病为名去医务所同我们商量情况，医务所变成我们党在狱中活动的阵地。医官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那时狱中没有建立党的支部，杨一辰和我等几名同志就自然形成党在狱中的核心。我走后，杨一辰还继续负责狱中党的工作。

我被捕后省委考虑凌莎一个人在东北不合适，就叫她暂时到河南我弟弟家住了一段时间。在我的刑期快满时，她回到沈阳，同廖如愿的妻子、杨先泽的妻子在小南监狱附近共同租了一间官僚熊士辉的房子。她们一起常去接见，送东西，主要通过王惠风、王常泰等人，他们给予了多方的照顾和方便。

1934年6月24日，伪满洲国在报上正式公布，依照康德元年3月1日赦令（第八号恩赦令）释放一批犯人。约6月末，我与廖如愿、杨先泽、刘伯刚等人从奉天第一监狱释放出狱。记得出狱那天，我还同刘伯刚同志在街上一个小饭馆吃了一次饭，并谈了今后的打算，他由其家属陪同回大连老家去了。

我出狱后因患严重的肠结核，还在奉天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动了手术，切除一段肠子。住院期间，王惠风、王常泰都到医院看过我。

我出狱后不久，通过凌莎与省委接上关系，党仍让我留在东

北工作。那时省委书记是杨光华，唐果夫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我的公开职业是在中东路一个高级职员家里当家庭教师。过一段时间，省委派我到抗联三军去，解决赵尚志的党籍问题。我代表省委到三军，经过实际调查后，我认为赵尚志同志是对的，开除他是错误的。对此，我给省委打了报告，后来省委给赵尚志同志恢复了党籍。我到三军不长时间，省委来信让我到苏联去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我是1935年初到苏联的。

到今天，我离开东北已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战友目前健在的已是寥寥无几了。作为幸存者来说，能赶上祖国的今天，伟大的时代，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果，感到非常的幸福。然而，我们必须让青年们明白，今天的共和国是由昨天千百万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每个人必须时刻牢记。

没有千千万万为共产主义奋斗献身的干部、先烈们，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他们忠心耿耿，铁骨铮铮，赴汤蹈火，不怕牺牲，他们是我党的光荣和自豪。

整理人：赵东埠

难忘的岁月

李维周①

我于1926年在沈阳师范英文专修科学习时经齐景隆、于维贞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沈阳小南门外定图志坟②，经任国桢、杨韦坚同志介绍，由团转入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我就在沈阳和台安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10月，中共奉天特委遭到敌人破坏，共有10名同志被宪兵队逮捕。当时我的掩护职业是在女一中学做庶务工作（开始当教员）。

这次中共奉天特委被敌人破坏的原因是这样：当时特委让我找房子，办训练班并推荐两名党员来学习。我还没有找到房子，叛徒张光骞就在小西关马泡沿胡同（今清真寺胡同）找了两间房。特委搬进去后，挂起民乐铁工厂的牌子办训练班。不久，由于张光骞的出卖，很快就被敌人破坏了。当时被捕的有：郝培庄（吴天星）、张志和、张俊芝、张蔼风（张俊庸）；另在别处被捕的有李君镐和他的爱人柳顺春及崔运河、尹昌燮、黄喆焕等

① 李维周同志又名李丕文，1902年生人。于1982年离休。离休前是辽宁省政协常委，现住沈阳市。

② 定图志坟是茔地的名称，在沈阳小南边门外。

人，后五人为朝鲜族人。我是最后在女一中被捕的。

我们被捕后均被押在日本宪兵队，后来关在日本警察署。日本人将黄喆焕等五名朝鲜人解送到朝鲜平壤，我和郝培庄等五人于1932年冬被引渡到奉天高等法院，押在奉天高等法院看守所（北未决）。先是分住各监房，不久，经法院初审后，由于党的活动，我们便住进了“信”字号监房。我们到看守所时，赵毅敏、廖如愿、赵文栋同志已在这里关押，他也在“信”字号住。在南监被关押的还有满洲省委搞兵运工作的刘伯刚同志。

对上述人员被捕入狱后的情况，现仅据我所知，作如下介绍：

李君镐，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在特委搞“交通”的。1932年特委调辽中县张景全、史春祺两人来学习，让李君镐去辽中送信。信中写道“张、史来沈后到女一中找李丕文。”李还没有走就被捕了，信也被敌人搜去了。因信中有我的名字，因而我也被捕。李在狱中表现很好。尤其是他的爱人柳顺春，被敌人抓去后，表现的很坚强。记得她在宪兵队曾和敌人大吵大闹：“为什么把我男人抓来？”“不行！”“放我回去！”等等。

尹昌燮，这个人很沉着，在狱中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分，表现很好。他在特委担任何职不详。

崔运河，当时年龄不大，在特委是搞技术工作的，即刻钢板、印材料。钢笔字写得很好。黄喆焕在特委也负点责任，详情不了解。

我和郝培庄等五人被送到奉天高等法院后，不久就过堂。我们五个人同堂被审，法官侦讯，无供无证。张蔼风当时是兵工厂的工人，他可能是李兆麟同志发展入党的，也是因为到特委学习而被捕。当时他闻警逃跑，被日本宪兵队开枪打伤抓住。过堂时他机警地编造说，他在那里过路，正赶上宪兵队开枪抓人，流弹把他手打伤了。过完堂法官就把他放了。剩下我们四个人仍回看

守所，住在“信”字号。

郝培庄，1932年在沈阳担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他工作很积极。在民乐铁工厂参加特委会议时被捕。培庄同志在狱中表现很坚决，学习时专攻英文，出狱后由大连乘船去了南京。

张志和（又名叶正良），当时他虽不是特委书记，但在特委也负一定的责任。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很坚强。他的理论水平不低，我们俩常辩论革命阶段论、革命继续论，曾引过西藏问题做例证。出狱后我帮他备置服装去哈尔滨满洲省委。当时还通过信，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张俊芝（张寒）是负责沈南支部工作的。也因到特委来学习而被捕，在狱中表现也很好。被捕前，他为了工作学会了算卦，偶而也搞六爻，谈易理。他劳动观点强，帮我们做好吃的，还常向大家叙述农村情况。出狱后又回沈南了。

我们四人都没有口供，敌人又没有抓到证据，于是我们就提出申辩。1933年6月经伪奉天高等法院判决，宣布无罪释放。而检查官却提出公诉到伪最高法院。我们不服，要求伪最高法院公断。党建议我们通过私人关系活动，遂请张作霖时代的典狱长王忱帮助。1934年1月，伪最高法院将原案驳回，“维持原判”。1934年1月，伪奉天高等法院奉命宣告我们无罪释放。

赵毅敏同志在狱中化名刘一成，表现很好，群众威信高。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理论水平高，经常不顾风险地找机会到其它监号秘密地向难友们宣传革命形势，鼓舞大家斗志。如1933年初，日本鬼子进攻山海关，他就及时向我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还热心为大家伙解决问题，所以难友们有事都愿意去找他。1933年冬，伪最高法院驳回他的申诉后，转南监服刑。

廖如愿是原满洲省委的秘书长，狱中化名黄云腾，他在看守所常给住监狱的犯人写状子。他不大活动，苦攻日文。1933年初冬，伪最高法院批驳申请，转南监服刑，在狱中表现较好。

赵文栋是山东人，逃难来到沈阳，首先以拉洋车为党工作。他是"九一八"事变前被捕的，他一直在看守所，表现不错。他会写，先是所里把他当先生，后虽被判刑，但看守所申请将他留下在中心岗服务，因此他消息灵通，情况熟悉。通过他的活动，所内王副部长常为党向外送信。1933年冬底刑满出狱。

1933年6月，奉天党、团委先后遭到破坏。党、团特委这个案子牵扯的人很多。我记得团特委被捕的有团书记张柏生（叛变已死）、本溪市团负责人孙己泰（孙季周）、沈师团员杨于典（杨坚白）、韩作舟（韩立中）、王毓南、沈阳城南团员李兆斌（李兆麟的妹妹）、李的弟弟李兆坤、何清晏、韩锦华，还有肇新窑业务公司的工人。党特委被捕进来的有杨一辰、栾佐臣，一个警察，还有一个工人（病死了）。由于被捕的人多，为便于生活管理，经党的活动，都被关押在"忠"字号监房里。杨一辰同志在监号里起到了核心作用。当时团特委的同志都很年轻，常闹意见，有的在政治上动摇、恐惧。杨一辰（辅之以孙己泰）对他们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杨大哥。栾佐臣，捕前不是党内同志，他父亲是党员，他们家是党的联络点。奉天特委遭破坏，栾佐臣全家都被捕了。为了党的工作和栾家的生活，同志们叫栾佐臣承认下来，替他父亲打官司，把他父亲替出去。老栾头出狱后，以掌鞋为掩护，搞个联络点，夏尚志来奉天特委工作后，常和他接头，老栾头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栾佐臣在狱中表现很好。

经活动，我在狱中当杂役，每天去监房写菜簿子。监号里伙食很不好，我在狱中当杂役，行动比其他犯人方便，消息也灵通一些。一天，我听说法院要来检查，于是我就利用写菜簿子的机会，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各个监号。法院的人一到，各监号提出了不少意见，迫使看守所不得不做些让步，对伙食做了一些改善。同时，我每天还利用串号写菜簿子之便，为案犯传递纸条（通

信），互相交换情况。当时，押在“孝”字号监房里的是城南义勇军燕子部队被捕的战士，他们串联暴动，我曾利用写菜簿子之机，给他们传纸条，互通消息。以后他们终于举行了暴动，并把佳部长（即看守长）打死了，这件事是在1933年发生的。

整理人：林风山

铁窗岁月纪实

杨坚白

我是1933年初在本溪市由李兆麟介绍加入青年团的。同年4月调到奉天特委做刻印秘密文件和宣传品工作。由于本溪党团组织遭破坏，我被叛徒出卖，于1933年6月22日夜在沈阳被捕。1934年被判徒刑12年。上诉后，于1935年初改判5年徒刑。1938年6月刑满释放。

组织被破坏经过

1933年6月中旬，本溪开运动会。本溪党特支组织委员陈裕谷在会场上撒发传单，被本溪日本警察署逮捕。陈被捕后供出了孙已泰、徐殿孚和我。孙、徐当即在本溪被捕。由于我当时已调到奉天特委工作，敌人通过我与家中通信的线索，由奉天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把我逮捕。

张柏生被捕后叛变。又带敌人抓了王德海、何清晏、何李氏、李超坤等人。田玉清（奉天团特委组织部长）听到组织被破坏后，马上去给王毓南送信，但王早已被捕，敌人在那设了坐探，田刚一到就被捕了。田被捕后受不了刑也叛变了，带敌人抓了兵工厂的韩锦华、叶兴武、白金凯和肇新窑业的孟庆海、解多润、杨奎斗，以及打入伪警察署内部工作的张玉琛等同志。这次破坏使本溪党团特支和奉天党团特委遭到严重损失。

6月末，本溪抓的人也被送到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不久一并转送到伪满奉天警察厅，大约9月移送到伪满奉天高等法院，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即未决监）。

我们来到看守所时，赵毅敏、李维周同志也关押在那里。不久，李维周被释放，赵毅敏转到已决监（南监）。1934年春，杨一辰被判处12年徒刑，孙已泰被判处6年徒刑，都转到已决监去了。我于1935年二三月间（春节后）也转到了已决监。

狱中的党组织和活动

1. 狱中党组织的形成

奉天监狱中，同志们与狱外党组织联系时称做“狱支”。实际上狱中没有正式的党组织，只是形成了一个以杨一辰（原奉天特委书记）为核心的集体。其中有孙已泰和我，还有栾佐臣、刘锡纯、张玉琛、张适（被捕时化名张有才）等同志。

张适是在奉天特委组织被破坏后，由满洲省委派来接任奉天特委书记的。可是他刚到沈阳，还未来得及工作，就被叛徒于冀贤出卖，被奉天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坚贞不屈，只字未吐，被判处了12年徒刑。

狱内工作由杨一辰总的负责。当时同狱外党组织是有联系的，奉天特委书记夏尚志（是在张适被捕后又派来的），曾通过王惠风、王常泰等人往狱内给我们送党内信件及学习材料。

2. 关于查叛徒斗争

奉天党团组织的大破坏是由于张柏生、王树德、田玉清叛变造成的。在看守所时，由杨一辰领导进行了查叛徒、查破坏经过的斗争。叛徒们交代了他们叛变经过。例如：王树德说他带着敌人查户口把我查出来。张柏生讲了他的叛变经过，并说：他向敌人提供了一个《告密名单》。查本溪组织的破坏经过是由孙已泰

主持查的。这就使叛徒的嘴脸暴露出来了。

3. "信"字1号的活动

未决监有孝、悌、忠、信四个号筒，信字号是"优待号"总共有10个监房。"信"字1号为杂役房（犯人在狱中参加某些劳动，叫"杂役"），可以说是"犯人办公室"，白天门不上锁。住在这里的犯人可以到其他号筒去。曾经住过"信"字1号的，以前是黄云腾（廖如愿）、赵毅敏，后来是杨一辰、王德海，再下来就是我。

在狱中住"优待号"或出来劳动，是要向看守送钱的。我们能够住在这儿和劳动，既不是花钱买的，也不是看守对政治犯的优待，而是靠我们的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赢得了看守人员的同情，使"信"字1号一直由共产党"犯人"交替住。

我们这些人先后住在"信"字1号，给犯人写呈子（包括上诉、辩诉、申请、声明等）。狱中犯人要写呈子就找到"信"字1号，我们也可以到各号筒直接找犯人交换意见。求人写呈子一般是要花钱的，或者请吃饭，送东西，而我们什么都不要，这就扩大了党的影响，连看守人员也称赞我们。特别是得到减轻处罚或获释的犯人，更是一片感激之情。这是我们在特殊环境下所能做的一点儿事情。

4. 狱中的学习活动

我们在"信"字1号，把《国际歌》词写出来贴在墙上，教人学唱。

"信"字1号有以前被捕的革命者留下来的几本书，有《社会科学概论》，还有文艺刊物等，都成了我们后来人的学习材料。监狱不准犯人看报纸。我们为了解社会上的情况，由别人代订报纸，偷偷送给我们看。在"北未决"时，由王惠风代订，在南监由监狱医官王常泰代订，再以后由看守马世清代订。当时在日本书店可以买到日文的小说和杂志。我们在医务所托李树久

（勤务员）去买日本的《改造》杂志，小林多喜二著的《蟹工船》，林房雄著的小说集《无画画本》，《牢狱的五月祭》等。我有选择地翻译了一些，或者讲给大家听。后来经常请李树久去买日文的《世界知识》杂志。这个“月刊”是日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办的，它对左派的东西及法西斯的情况都敢登载、介绍。例如：《八一宣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等，都刊登过。此刊物也摘译了斯诺《西行漫记》的片断，如周恩来骑着一匹大马的照片，肤施（延安）儿童学共产主义ABC的照片等，至今记忆犹新。我不断从这个刊物上翻译点东西传送给狱中的同志和同情者看。

5. 医务所成为我们秘密活动的联络点

监狱医务所的工作是由赵毅敏同志开辟的。接着孙已泰也来到这里。孙知道我判决后，事先就同王常泰大夫说好，把我安排在这里劳动。所以，我一到“已决监”就来到这里。我和孙在这里一直劳动到1938年出狱。孙担任的是文书报表之类的杂役活，后来他还帮助医务科长做试验。我干药剂方面的活，也兼做翻译。我到这里来，本来早由自己人做了安排，但在形式上是经过日本看守长批准的。王大夫向日本人说要找一个会日本语的犯人来帮助工作，这个日本人对我做了口试以后就同意我到这里劳动了。这是个极好的掩护。

赵毅敏、孙已泰两人来到医务所之后，还不断对医生王常泰、勤务员曹鸿祥等进行工作，他们虽然没有入党，但是完全可以信任。例如：王常泰曾为我们往狱中带进党的秘密信件；曹鸿祥充当我们的“联络员”去和外面的党组织负责人接头。至于在生活方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更不在话下。尤其是王常泰，我们处处倚重他，外面党组织同我们的秘密通信，也主要是通过他，把来信寄到他家，再转给我们。后来到医务所工作的人员有勤务员李树久，医师李银波，看守李荣珠等，由于我们的影响，都成

了自家人，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监狱需用科的工作人员马世清也因受我们的影响，常到医务所来聚谈。我们的进步书籍也交给马世清保管，他把书藏在他管的库房里某个角落。医务所这块地方，只要"头头"不在，日本人不在，就是我们的"小天下"。我们可以谈政治，谈革命，骂鬼子和汉奸，宣传中国、苏联的革命形势，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等。在我们的影响下，李树久、李银波等人也参与我们的交谈，他们曾经说，你们是共产党，我们是人民阵线。我们当即劝告他们，千万别这样说，这要传出去可不得了。

保持医务所这块活动阵地，既有利于同外边党组织的联系，也有利于狱中同志的互相往来。孙已泰和我在这里劳动，常以随诊为名跟着大夫或看守到监狱工厂去转转，趁便与同志们通信息。同志们生病可以通过看病来住病监（杨一辰当时就"住过院"），如果谁太累了或有事需要商谈，也可以通过大夫把他作为病号来此"住院"、"休养"。自从刘伯刚、赵毅敏等同志出狱后，狱中同志除孙和我在医务所劳动外，杨一辰一案的四个人和张适同志均在工厂服劳役。1937年后，又有李子敬、牛平甫（现为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关进来。他们是受左翼群众组织的牵连而被捕的。他们来后，我们都主动地与之联系，互相关照。

为了保持医务所这块活动阵地，我们也做了些上层应付工作。如孙已泰帮助医务科长李士赢做临床实验，受到李的重视（医务所后改为医务科）。李是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的，技术职称为保健技正，月薪200余元，与日本人来往很多，我们当时对他有警惕（附记：解放后我见到了李士赢，他在解放战争中由北平去张家口，参加了解放军，改名李岩。据他说，他当年看出我们这些人在狱中是有活动的，不过假装不知。他还说，他去参加革命也是受了我们的影响。此人已去世）。我有时给医务所的那位日本看守长当口头翻译，有时把汉文材料译为日文。后来医务所

来了日本大夫（嘱托医），诊断时由我做口译。当时李士赢要翻译一本日本的《法医学》，绝大部分是我代译的。这样一来，我们虽然有些活动，也未引起狱方的注意。

6. 联系群众

杨一辰经常教导我们要联系群众。他说，监狱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不大体面，是与人民为敌的，然而其中大多数人是迫于生活而干了这行（当时的看守工资每月不过十几元），所以是可以教育、争取的。至于其他犯人，他们犯罪原因虽很复杂，然而大多数人也是为了弄几个钱而出此下策，所以也是可以教育、争取的。我们狱中的同志依此教导，在各自的周围都团结、联系了几个人，包括监狱工作人员。除上面提到的与我和孙己泰关系较深的人之外，还有两位值得提出。

一位是秦乃仁先生。他是西医，因气愤杀人而入狱。从在“未决监”起，他就同共产党案犯的同志有来往，判刑后一直在医务所工作，同我们是患难之交，狱中知己。他的医术比一般大夫要高明些，对我们帮助很大。解放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委员，现已去世。

一位是宋大公，原名宋思禹，是监狱的教诲官。有趣的是，教诲犯人的教诲官，反而接受了我们的“教诲”，跟我们走了。他主要是接受牛平甫同志的影响而转变的。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特别是杨一辰的出狱，他帮了大忙。解放后，他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与我们常来往。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帮助杨一辰出狱这件事被说成是“策反”，而被关押了两三年。后来真相大白才得以平反。

杨一辰于1940年冬感染丹毒，病情危急，幸亏李士赢大夫及时确诊，并特许批准购入丹毒血清，才保住了性命。在抢救中，秦乃仁大夫在具体治疗上出了大力气。接着宋大公、牛平甫等暗中出力，杨一辰乃得于1940年12月以假释名义获释出狱。出狱之

时他的病尚未痊愈，由监狱铁工厂的王宏久技师代出车票钱，又求人把他抬上火车，才回到他的家乡——山东金乡。到此时，在奉天监狱中的党员只有张适、牛平甫两人了。其他同志均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出狱。不久，牛也出狱。张适也于1942年出狱，然而他不幸于1945年冬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总之，这个阶段被捕入狱的同志，除王德海（安哲）病死狱外，其他人都先后出狱了。

7. 同外面党组织断绝联系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下我们忍痛同外面的党组织断绝联系这件事。

1936年春，杨一辰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讯，过一两天才送回监狱来。杨一辰又一次受了酷刑，但敌人并未得到什么。杨一辰来住病监养病，他说：从审讯情况看，无疑是组织又被破坏了。他同孙已泰和我商量，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这样下去，如果外面组织破坏，暴露了狱中活动情况，不仅我们要做无意义的牺牲，同时还要牵连好多人，看来，不如向外面党组织说明情况，主动要求断绝联系。我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起草了秘密信发出。从此忍痛与外边党组织断了联系。杨一辰当时说，只要我们有决心革命，出狱后一定能找到党。果然，后来我们都找到了党的关系。

整理人：张大膺

被捕·斗争

孙已泰

1933年6月我在本溪煤矿被捕，距今已56年了。时间虽过去这么久，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狱中的艰苦斗争，总是感慨万分。

一

1932年冬，我受奉天特委的派遣，同李烈生（李兆麟）、侯维民（侯新）先后到达本溪湖。我在本溪湖煤矿当矿工。1933年2月中旬正式建立了中共本溪湖特支，我任特支书记，李烈生为组织委员，侯维民为宣传委员。相继发展了陈相谷等人入党。

1933年6月18日，本溪湖开运动会，陈相谷没和特支商量，就盲动的到会场散发传单，结果当场被密探抓住，送到本溪日本警察署。他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我和徐殿孚、杨坚白等人。傍晚，我出坑刚到牌子房，就被两个守候的特务抓捕。

在本溪日本警察署，第一次被审讯时，我拒供任何情况。5天后，第二次审讯时，特务叫徐殿孚（团特支书记）、江俊祥（团特支宣委）、朱福金（团特支组委）、宋恩尧等人在我面前跪成一溜。敌人用鞭子抽他们，威逼他们承认我是他们的领导人和入党、入团的介绍人。当时我骂了他们一句。这时一个拿大棒

子的特务朝我猛地打来，一棒子就把我打昏过去。以后敌人再审讯，我就借头昏不说话。

敌人根据陈相谷供的线索，到杨坚白家抓人。杨在奉天，没抓到，就把他哥哥杨于经抓捕。杨于经说，杨坚白和家里通信是由奉天第一师范学生王毓南转的。敌人立即转向奉天一师抓了王毓南。王在酷刑面前，供出了接头人王树德（奉天团特委组织部长）及接头地点小河沿。敌人就带他到小河沿去守候。当王树德来接头时，他并没指给敌人。特务问他这个人是否叫王树德，他说不是。敌人不信，还是把王捕了。

王树德由于受刑不过，终于招供。他带领敌人以查户口、画人像的方法，抓了杨坚白、张柏生（奉天团特委书记）等人。张柏生被捕后，也叛变了。张带敌人去抓杨一辰（奉天特委书记）。由于杨不在家，而意外的逮捕了去那里工作的王德海（特委宣传部长）。后来又抓了田玉清（团特委秘书长），田没经得起考验也叛变了。由于几个叛徒的出卖，造成了兵工厂、窑业公司等团组织的破坏。

6月，杨一辰被一个自称小姚的人邀出接头，也遭敌人逮捕。

二

我住监狱的时候，没有正式的狱中党组织。而是由被捕的党的各级负责人自动自觉地形成核心，带领党团员在一起活动，同狱外党组织保持一定的联系。

那时，杨一辰是特委书记，年龄比别人大，斗争资历长，经的多，见识广，狱内的同志都很尊重他，称他为大哥，一切听他的。他在狱中自觉地担起了领导责任。

我听说，在我未入狱前曾发展过一名看守桑玉贵入党（是

由谁发展的我不知道），这个人很好。我入监后看见他，狱里狱外的为大家做了不少事情。有一天看见一条狗，大家让他抓。他就把狗唤来，大伙动手把狗勒死，煮了狗肉。老桑大约在1935年后半年离开监狱，是党组织调他去满洲省委工作了。

温建平是一个进步学生，家住安东，在烟台念书。从烟台回家途中，在安东浪头镇下船时，被日本人从书里检查出一封信。敌人根据这封信，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将他逮捕，后转到奉天高等法院，羁押“北未决”号。温在看守所与杨坚白等人经常为难友们写呈子。1935年1月他在“北未决”被释放后，经医官王常泰领进监狱医务所与我见了一面。杨坚白曾向我讲过温建平在狱中表现很好，我也向狱外党组织介绍了他的情况，并接了头。温在奉天特委工作一段，又失掉了联系，他便去烟台，与我通信来往，我回信叫他找当时在山东海阳教书的谷牧（当时叫刘曼生）。我给谷牧去了信，让谷牧引导他参加革命。后来知道，温没去找谷牧，而在烟台找了吕其恩，由吕介绍入党，参加革命后，调泰岳地区做地委领导工作。

三

在奉天警察厅押犯所里，我们搞过查叛徒的活动。押犯所是个长筒房子，对面炕，炕上挨坐着两排犯人。除杨一辰、王德海、张柏生外，我们都插坐在犯人当中。我在炕梢紧靠便桶的位置。有人来撒尿时就说说被捕的情况；有的在放风时互相串通串通；有的还弄块粉笔头在鞋底上写几个字，传递情况。从每个人说的被捕经过看，我们很快就大致分清了谁好谁坏，也基本弄清了张柏生、王树德、田玉清三个人是叛徒。

我们被转押到看守所后（北未决），我和杨一辰、江俊祥、朱福金、刘锡纯、张柏生、王树德等被关押在一个号里，继续搞

查叛徒活动，每个人都说了自己被捕以后的情况。大家讲得很严肃，很认真。我们要求有叛变行为的张柏生、王树德、田玉清赶紧向敌人把口供翻过来，事后他们都翻了供。

四

我们在监狱里注意到争取狱中的中下级工作人员。在医务所我们争取了医生王常泰等，医务所就成了我们活动的据点。杨一辰争取了铁工厂的技师王宏久，王就提他当了杂役。这些人主动给我们办了许多事情，给了我们许多方便。

我们在争取狱内工作人员时，除了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给他们一些必要的物质外，还十分注意不给他们找麻烦。在号里不闹事，维护团结，使他们认为“打共产党官司”的人都信得过，不用多操心。

另外一些担当杂役的党员，在帮助他们做行政事务时，如记帐、统计报表等，都是很认真细致的，使他们很省心，几乎是离开我们就不行。他们有了为难的事，我们就替他想想办法。如看守马世清、李树久在外边开设个冰棍厂，我们就帮他们出出主意，使他们生意兴旺起来，这两个人很感激我们。时间长了，就把他们团结过来了，对我们的活动给了不少的方便。

五

原来押在这里的赵毅敏（刘一成）留下了一部分书籍，后来又通过医务所的王常泰、李树久等人经常从街上买书买报，其中还有日文的，书的数量越来越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学习、看书。那时都是青年人，大家都很爱唱歌，记得在“北未决”时，有一天早晨，我们十几个人象军训似地高声唱起了《国际歌》和

《少年先锋队队歌》。看守长听到歌声，慌忙出来制止。杨一辰当面损了他一顿，说你不要太过份了，只是唱唱歌，也没搞别的，有什么不行。说得看守长闭口无言。以后，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唱歌就不用那么高的声音了，在号里相互能听见就行。

有的同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敌人搞了一些破坏性的工作。杨一辰在铁工厂做铸件，按要求要把铁化成水状才能浇铸，而他却在铁水呈粥状时即行浇铸，使铸件质量不合格；他在做行军帐篷的铁支架时，也不按要求加工，用不多久就得散架；刘锡纯在木工厂做装子弹的箱子，故意把箱子两头的系绳搞松，搬动几次就会掉下来。当然，他们不能都这样做，而是采取几个好的夹个坏的，使敌人检查不出来。

1936年前后，国际形势紧张，日伪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加紧了破坏活动。1936年春，日本宪兵队把杨一辰从监狱提走，追查共产党的关系，并施以酷刑。杨一辰由于长期监狱生活，身体日趋衰弱，已经受不起更多折磨。他为了保护党的组织，被宪兵队送回来后，就想办法将眼睛弄肿，被送到医务所抢救治疗。当日本宪兵来看杨一辰的伤情（受伤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时，他气愤地抓起身边的墨水瓶子砸向宪兵，宪兵狼狈离去。杨一辰曾找我商量，说敌人正加紧活动，要十分谨慎提防，不能再同狱外联系，避免给党造成损失。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此后，我们主动放弃了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后来，我被移送南监（已决监）服劳役，前后在印纸厂、织布厂劳动。经狱中骨干同志的活动，两个多月就到医务所当杂役了。这个活很轻，做些党的工作又很方便。那时，赵毅敏、廖如愿都在医务所。那里已成为监狱党的活动中心。杨坚白上诉改判后，也在医务所服刑。另外，张玉琛、张适在印刷厂，杨一辰在铁工厂；刘锡纯在木工厂；栾佐臣在缝纫厂；刘伯刚在酿造厂。他们经常以看病住院为由，到医务所去

沟通研究狱内情况。

狱中的苦难岁月，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整理人：清　野

峥嵘岁月的怀念

温建平

旧监狱充满了黑暗、阴森、恐怖……无数的共产党人、爱国志士，在狱中倍受摧残和折磨，他们象一块块烧红的钢坯，在黑暗的牢房里闪光发热。他们团结难友，争取教育敌伪人员，在狱中组成一条无形的战线，时时刻刻同敌人抗衡，同敌人斗争。

我在看守所同共产党人一起坐牢仅仅三个月，真是胜读十年书。受到的教益和启发，使我醒悟，使我放远视野……在社会上没找到党，在狱中终于找到了，是同号的共产员杨于典同志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虽然已经过去55年了，但我每每念及，还是非常感慨。

一

1934年，我在山东烟台念高中，7月放暑假时，我搭乘“政记公司”的“纯利号”客轮回安东家。第二天午后，客轮在安东的浪光港下碇了。这里距离陆岸尚有数里之遥，可是已不许再向前傍靠，因为要等待警方和海关人员的检查。不一会儿，一艘汽艇迎面滑过来。汽艇靠近大船后，一伙日伪人员，当中夹着几个“白帽子”（东北人对日本警察的恶称），狐假虎威地登上了客

艳，开始进行检查。大家都很紧张，都屏住气，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运气。

其中一个汉奸向人群中高喊，“温骏声！”这是行李上标明的，我临时的化名，随着我的答应，他们向我走来，把一封信举到我面前，厉声问：“这是什么？”我原以为他们拿到我什么犯法的凭证，一看，原来是我替一位同学（周庆荣）顺便捎回的一封普通家信。信上写着“军训完毕”几个字，日本警察产生怀疑，因此将我押上岸，用卡车拉到日租界的“安东警察署”。从此开始了我的铁窗生活。

我在安东日本租界警察署，先后被审讯三次，每次对我都施以刑讯。我入拘留所第二天早晨，就被提审，把我带到满是刑具的审讯室，几个打手一个劲地让我招供。“不说，对你就不客气了！”两个打手厉声地吼叫。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叫我承认什么，当然就无从回答了。不由分说，打手们将我绑在长凳上，头朝下给我灌起凉水来，边灌边问“说不说”！我不知说什么。凉水紧一阵，慢一阵地往口鼻中猛灌，到后来我完全失去知觉，昏死过去。几经折腾，我还是供不出来什么。敌人看无任何收获，就将我拖进牢房。我昏昏沉沉地躺了一天多才能起来。

第二次提审是在头次审讯两三天后的一个晚间。日本课长亲自主审，他问我是哪国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中国人。”只这一句，日本警察立刻暴跳如雷，狠狠地毒打我，让我承认是“满洲国人”。我不吱声，敌人又是一阵痛打，随后拿出一张宋学骥的照片，追问我与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去山东前的一位朋友，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店员。我告诉敌人“他是我的朋友，可现在回山东老家了”。后来日本人又摘了一套软招子，我也没有承认什么。

第三次审讯依然由冈本课长主审，他重复一遍从前问过的话，我还是以前的那套话回答，又招来一阵痛打。日本人依然无

收获，只好作罢。

我在日本警察署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将我和宋学骧（日本警察按照照片在安东市将他抓住）一起引渡到了满洲国安东警察厅，先关押在地牢里，后来送看守所。不久，我又被解往设在东坎子的安东地方法院，由一名50多岁的老检察官过了一堂。后羁押于奉天第七监狱（在东坎子法院的后院）。

1934年10月，敌人又把我押送奉天处理。我父亲陪同我一块去的。早6点钟在日本站（沈阳南站）下车，由看守雇一辆马车，将我送到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号。

二

"北未决"，正式名称叫奉天地方法院检察厅看守所，"北未决"是人们对它的通称。沈阳人有一句谚语："官司好打，北未决难住！""北未决"号是未决犯的羁押场所，其中有待决死囚，判终生监禁的囚徒，待判决的人犯，以及等待上诉的各类犯人。看守所设有"孝"、"悌"、"忠"、"信"四个监号。监房里潮湿、阴暗，人满为患，通常关押200多人。每天喊声、叫骂声，吊打声，死囚被处决前的哀鸣声，不绝于耳。只有"信"字号是优待号，比其他监号环境好些，管理也比较松。

我到"北未决"时，意外的被关在"信"字号，那里已有共产党员杨于典、王树德（有变节行为）。杨对我这个青年学生很好，介绍了监内很多情况，教我应注意什么。对我做了许多的开导。在黑牢里我感到了温暖。"信"字号的门是不上"挑子"（锁头）的，只是挂着装装样子，号里的人一般可以串串号、说说话。杨于典经常给难友们写呈子，我有时帮他抄清。听说从前赵毅敏也在这里给难友们写呈子。每天来这儿要求写呈子的难友很多，共产党人经常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这纷乱的活动

中，共产党员们借机在一起研究问题。就是那些看守们也常来这里走动，串门办事。难友们都管"信"字1号叫"犯人办公室"。

我到"信"字号时，就看见墙上写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国际歌歌词。后来，我跟杨于典学会了唱《国际歌》。我还在狱中看到了俄国人绥拉菲维支写的《铁流》；德国人雷马克写的《西部战线平静无事》；高尔基的《母亲》等书，这些书是我在烟台念高中时想看而看不到的，可在狱中我却奇迹般地看到了。

在夜间我常常抚弄着脚镣，并瞅着它，既有锒铛入狱的愤恨，又有巧遇革命者的喜悦。在这儿，与其说是被囚禁监狱，不如说是我真正走入了社会，投身到了现实的斗争中。

三

我到"北未决"信字号不久，就知道在另外一个号里关押着一个叛徒叫张柏生，大家都不理他，他整天灰溜溜的。王树德被捕后表现也不怎么好，不过他尽力靠近杨于典他们，争取让大家信任他。狱中同志对叛徒是十分愤恨的，每当从外边买些小菜或家人送些好吃的东西，大伙就一块吃，就是不给张柏生吃。张气得够呛。杨于典说："叫他萝卜干跳舞去（晒干）吧！"

1934年12月的一天上午，高等法院将杨于典（包括张柏生、王树德）传到法庭。我们在监号焦急地等待审理结果。快开午饭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杨于典一进监舍就兴奋地对我们说："这回张柏生算是出够了风头！法官问他在共产党里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说是'主席'，那法官就咪起眼睛点着脑袋瞅着他，一字一板地拖着腔儿说：'噢！主席？发号施令者曰主席啊！'结果，法庭照样判他7年徒刑，王树德也判7年，我被判5年

……"

杨于典在狱中对我们讲："不管王树德怎么靠近我们，必须要警惕他，对这种人不能麻痹。在狱中他曾表现过同张柏生划清界线，有次张同他要烟头，他不给，还用脚碾粉了，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他的叛徒本色是不能改变的。"果然，有一天，一个看守匆匆来到我们面前，掏出一封信急促地问："杨先生！你看，老王这东西能往上边转吗？"杨接过来看看，鄙夷地笑了笑，对那位看守讲："他叫你递，你就递呗。"我问杨："王写的是什么？"杨说："别管他！"王树德又写了第三个《悔过自新书》。可是这个"悔过自新"的王树德，并没有从此喜笑颜开，反而更加愁眉苦脸起来，7年徒刑吓得他丧魂落魄，以至于后来颓废堕落到吸白面（海洛因）寻求麻醉……

四

争取、团结、教育敌伪中下层人员（特别是看守）为我们办事，是党在狱中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听老同志讲，从前赵毅敏、孙己泰、杨于典等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不仅争取了看守桑玉贵、李树久、副看守长王惠风，而且还争取了一位监狱医官王常泰，他们为我们共产党人办了不少好事。

监狱的看守大部分来自社会的底层，多数是穷人出身。虽然职业使他们置于同政治犯（包括普通犯）对立的地位，但有些人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压榨中国人民也是不满的。他们同情我们这些政治犯。经过我们做教育、争取的工作，他们也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方便。如：让我们在狱中每天有《盛京时报》看，看守李树久从社会书店给我们买书，等等。

你简直想象不出，我们在这里，怎么敢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和"走！上前去呀！曙光就在前头，同志们奋斗

……”这些歌词写在我们监号的墙上，有时我们还可以纵情歌唱一会儿。这是在外边“自由天地”也绝对办不到的，可是偏偏在这四面高墙围起的与世隔绝的囹圄中，在大批看守的监视下，我们反倒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唱，并不会因此遭来横祸。有时在夜间，我们通过看守从小厨房里买来烧酒和菜肴，在监号里痛快畅饮一场。巡逻的看守在窗外摇头打趣地说：“哈，你们又在那儿共产（餐）啦！”我们连忙回敬他说：“喂！×老爷，请你也进来参加吧！”他们摇摇头笑嘻嘻地走过去。

有谁能理解，我们怎么会创造出这样一种新型的“敌我”关系呢？而我们所能给他们的有形的“报酬”，仅仅是星期天（假日）他们回家或上街时，我们为他们写一张请假条。他们出身贫寒，目不识丁，所以连这些必要手续也都请我们来办。

但是，旧社会的监狱毕竟是极其黑暗而残酷的。别看有些看守对政治犯表面客气，可对一般刑事犯却是一样的暴虐无情。他们利用“炕头”（狱霸）对一般犯人进行折磨、勒索、压榨，谋取私利。所谓“炕头”就是那些被判了死刑、无期和重刑的惯匪、惯盗。他们无亲无故、无家无业，无人探望。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就同看守勾结起来，对新收的犯人，有“油水”的犯人，进行百般折磨、摧残，手段非常毒辣，弄出来的钱、物，和看守分享。监狱里的这种罪恶勾当，事实上是与反动统治者的要求不谋而合的。

我们政治犯看到这些黑暗勾当，真是忍无可忍，便组织犯人同“炕头”斗争。所以一般犯人都拥护、敬佩我们共产党人，连“炕头”对我们也让步三分，从不敢同我们斗。

五

我在山东省烟台上高中时，就想加入共产党，但几经寻找都

没有遇到。真没成想在狱中我却找到了党。在与杨于典接触的过程中，他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又介绍了杨一辰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的事迹，我跟他学会了许多革命歌曲，使我对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我对杨于典讲了我要求入党的心愿后，杨说："根据党的规定，监狱内党的组织，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你不久会出狱的，我将你的狱中表现和你的愿望介绍给地方党的组织。"

1934年11月中旬，法院将我提到法庭。在法庭上我据理答辩。因在语言上顶撞了法官，他将我训斥了一通，回监后我把法庭上的情况向杨于典作了汇报，杨说："你这样回答，他能不发脾气骂你吗？你这小傻子！但，这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他们会放你的。"

1935年1月11日，我被释放了。我出狱后一周两次到看守所会见杨于典。1935年2月，杨判决后转南监服劳役去了。

我出狱前，杨对我说有什么事情，可找王惠风办。我在2月末找到王的家。王领我找到监狱医务所，通过医官王常泰的关系，在医务所一个小屋里又见到了杨于典。经他介绍认识了孙己泰，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杨于典对我说："我们对面坐着看一会吧！"我们三人默默地对坐了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你回去等着，过几天有人找你。"第四天，一个穿蓝色工人服，自称姓刘的人来找我（我住在日本站附近的堂兄家），告诉我说，后天有一个人来找你。按约定的时间，我赶到春日町的一条胡同，和一个姓张的接了头。以后经张介绍，见到了夏尚志同志。夏领我到小河沿开过会，听他讲了国际形势；他布置我刻钢板蜡纸，内容是赵尚志成立满洲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的八条纲领。我很快刻了出来。夏又布置我做"青年反日会"的工作。我就到南市区一带的贫民中，找一些人谈话，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夏还叫我报考苏家屯铁路警务队，因体检不合格没录取。夏还说有些书要放在我

家里，但没有送来。以后，夏又约我去春日町接头，我去了两次都没见着，我与组织联系就中断了。

1935年，我随母亲回山东老家，还给杨于典写过信。后来几经辗转变化，1936年在山东经吕其恩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忘杨于典同志。他是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我的启蒙者，我的良师益友。

整理人：张大庸

在伪满哈尔滨监狱的斗争

樊继光①

1934年的夏天，我在哈尔滨二哥樊继才家里等待升学期间，认识一位名叫傅天飞的抗日游击队员。他经常给我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介绍抗日游击队的战争事迹，提高了我的觉悟，并在他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加入了共青团。这年10月，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了四个月，回来后仍住在二哥家。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我于1935年8月被捕。但因为我年龄小，当时只有16岁，敌人也想利用我，逮捕后不久又放了。出狱后，我又继续在医专学校读书，敌人的企图落空了。于是，在1936年6月月13日，我又第二次被捕，我二哥樊继才也同时被捕。

我第二次被捕后，先押在哈尔滨日本领事馆，后转到哈尔滨道里监狱。1936年10年送到伪第四军管区会审判刑，这次一共判了21人，其中8人被判处死刑，我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后，把我转到道外监狱（吉林第三监狱）关押。当时在道外监狱的政治犯有30多人，能记得的有胡庆荣、张晓岩、王景侠、刘宝琪、高凤鸣、高成儒、高金荣、陈涤非、傅昌、宋景文、王铸、桑祥玉、樊继才、尹春田、石风鸣、蔡景田、赵德祥、谭义、陈屏章和任宝功等人。

① 樊继光解放后在通化钢铁公司工作，现已离休。此事根据回忆，由哈尔滨市医药供销公司外贸公司钟洪滨整理。

在监狱中，政治犯之间能够做到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当时高凤鸣很活跃，他原是工大学生，俄文很好，他不仅翻译了俄国歌曲，而且还编写了一首《牢笼之歌》（脚镣舞），是用白俄一首《卖列巴圈》的曲子填的词。不久我们都学会了。

高凤鸣翻译的俄国《祝福神圣的贝加尔湖》一首歌，也在狱中政治犯中传唱。这首歌的意思是：一位布尔什维克从狱中跑出来，到了贝加尔湖畔，他没有船，便坐在一个渔桶里，很艰难地渡过了贝加尔湖。歌词因年久都忘了，现在只能记住前面几句：

“祝福神圣的贝加尔湖，
祝福渔桶权做船渡。
希尔嘎河河水冰透骨，
阿尔图山山路险阻。
……”

另外，在狱中还有些被捕的游击队员，他们带来了抗联的《露营之歌》、《红旗歌》等，也在狱中传唱。每当难友们生活苦闷的时候，唱起这些歌曲，受到了很大鼓舞，增添了勇气和力量。

1941年，道外监狱迁到了香坊，这是日伪当局新建的监狱。当时叫哈尔滨模范监狱，通称香坊监狱。新监狱的条件比道外监狱略好一点，监号稍大一些，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有火墙、有板铺，但随着犯人增多仍然很拥挤，而且还增加了二层铺。政治犯除道外转来的外，记得还有廖春潮、李清茂、李光复、佟琪、陶蕴璞、周维斌、张秀生、刘忠民、常作臣、董丽泉等，总共不到一百名。

香坊监狱的看守大部分是中国人。日本人不多，都担任主任看守以上的职务。

犯人在狱中的行李都是自己预备的，穿的只发给一套“和尚

领”的灰色上衣，冬天发给一套棉袄，到了暖和时又给收回去。犯人经常挨打。日本人最坏的是黑田，他是作业科长，打人非常狠。中国看守当中最坏的是“高大棒子”，他成天拎个棒子，好打人。还有一个姓于的看守，对犯人经常勒大脖子。

在香坊监狱，教诲科在每个星期日进行一次训话，由日本典狱长向全体犯人讲话，由医务科的一名大夫做翻译。讲的内容都是些老实守规矩啦，争取得“赏牌”减刑啦，等等。政治犯都不听他那一套。我们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除了学唱革命歌曲外，还偷着阅读一些书刊，如鲁迅的《呐喊》，巴金的《家》，还有俄国小说《复活》等。这些书都是通过看守从外面弄进来的。阅读后，大家还进行议论，互相启发，从中吸取教益。

香坊监狱在后期，有一批被捕的国民党员被送进监狱。他们也是反满抗日的政治犯，我记起的有罗永年、罗富雍、罗明哲、刘克济、何正卓、孟宪荣、孟宪林、宋玉谭、杨顺有等。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几个还是留日学生。虽然有些观点和我们不同，但因为在反满抗日上是一致的，所以在狱中还是比较团结的。

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除了自己加强团结外，还特别注意团结其他刑事犯和看守，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斗争。如刘毓文并不是政治犯，但经过我们的帮助教育，出狱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另外还有李甲德，他原是个伪军，在狱中被我们发展成积极分子，出狱后在“东光寮”① 加入共产党。我们还发展了几个看守，如陶纯润、郭晓山等。还有一个土匪叫杨青，经过帮助教育、出狱后参加了解放军。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在哈尔滨扔下了几个

---

① “东光寮”即日伪时期日特在哈尔滨的一所公寓的对外名称，光复后被狱中出来的政治犯占领，成为我党活动的场所。

炸弹，监狱里的日本人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到。这期间，监狱曾接到上面命令，要处死全部政治犯，当时全体政治犯已做好决战的准备。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残酷的屠杀计划没有实施。同年8月17日，我们这些被关押在香坊监狱的政治犯陆续地被释放出来。

东省特别区监狱琐忆

樊继才①

我是黑龙江省阿城县人，1927年考入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1931年毕业后曾在航务局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当时我心中非常苦闷，总想为抗日救国出把力，于是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些反日活动，并于1932年10月经高凤鸣介绍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日本侵略者实行“大检举”。6月13日夜里12点钟，日本特务和警察闯入我家，让我和弟弟樊继光把衣服脱光，扔给我们一件蓝色和服式囚衣换上，然后就把我们抓走了。先关押在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不久转押到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同年9月送到东省特别区监狱，即哈尔滨道里监狱。

和我同时被捕的吴宝丰、徐乃仁、樊继光、宋景文也送到了道里监狱。我被送到楼上7号监房。在填写身分簿时，我认识了负责填写身分簿的小张（他也是犯人）。小张和一个姓陈的看守较好，很快就给我家送了个信。在监号里我碰见了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同乡、同学，叫甘霖，是阿城县伪武装警察副队长，因为给赵尚志部队买子弹犯了案。

早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张恩荣（现名张观）很快与我联系

① 樊继才解放后在哈尔滨铁路局担任领导职务，已故。

上了。他把道里监狱的大致情况向我做了介绍。从而知道在这里关押的有满洲省委的负责人李耀奎、胡彬等，还有宋兰韵、高风鸣、陈平章、刘宝琪等党、团员。他们都是1934年前后被捕的，大部分还没判决。

道里监狱的中国看守，一般都对政治犯不错，同情政治犯，称我们为"先生"。有个姓焦的主任看守对我们很照顾，我们五个刚进来时，他就对狱里的人说："他们几个是刚来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家里又不知道，你们要多关照一下。"难友们都主动伸出友爱的手给我们提供了方便。张观同志还献出一条铺盖。中秋节以后，家里给我们送来了铺盖等物品，我立即把大家给我的东西还了。

犯人每天到监狱院内约有50平方米的圈子里活动一次，叫"放风"。犯人排着队，绕圈走步或跑步，重犯带有手铐、脚镣。时间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男女犯人的放风时间是错开的，地点也不在一块，偶然碰上了也不许说话。在政治犯中，有夫妇两个人都被关押在狱中的，如李耀奎和宋兰韵等，也只能在放风时隔道相望，不能说一句话。监狱订有不许吸烟，不许说话，不许在监号内走动等"狱规"，如果违犯了，轻的蹲黑屋子，重的卧"逍遥自在床"①。

有一天，突然把我转到小黑屋子（暗牢），我大喊大叫要求放我出去，怎么闹也没人理。一直关了我一天才放出来，又送回大牢里。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刚进来时曾提出反供，所以日本人用蹲小屋来惩罚我。对违反狱规的犯人还有一种处罚，是多加一个手铐和脚镣。当时最重的脚镣重14斤，是大汉奸姚锡九送来的。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姚锡九被枪决。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所监狱经常有"挂"出去的危险。"挂

---

① "逍遥自在床"见哈尔滨监狱简介。

人”是一句常用的口头语，意思就是拉出去处决。当门外的卡车响声刚一停，监房门风眼的小门“呼”地一声，一个一个被关上了，于是看守们在门外大声地叫喊人名，喊出去一个，马上被门外站着的两个黑衣警察用双手一挟，向外拥去，只听到一双铁脚镣的响声，由高而低以至最后听不到为止。一批有40人左右，正好一卡车。他们被“挂”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是拉到朝鲜的边境上，在一个医院里住下，每天要给抽去一管血，抽到20天光景，看你支持不住，最后注射一管药针，马上性命就完了；有的说拖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山里，给日本人挖工事，完工之后全给活埋了；有的还说到下江一个镇上用电火烧掉，尸骨不留。传说虽然各不相同，但一卡车一卡车的人都运向死亡的深渊了，能证明这些传说的就是“死镣子”都运回来了。犯人的铁镣有两种带法，在铁镣的开闭眼处，用锁锁上的叫活镣子，带上卸下都很容易。在镣子的开闭眼处，用铁钉砸死的叫“死镣子”，卸下很困难。敌人认为是案情重大的，一进牢房就被砸上“死镣子”。戴“死镣子”的犯人被处决后，退回的铁镣子上，原来砸上的铁钉依然是死的，而且镣子的外层不再是黑色，而是被什么东西烧得发黄褐色，这证明被“挂”者是用电流或者烈火烧掉了。

这个监狱的女监在院里一个角上，单有一个小院，共3间平房，分三个监号。我在道里监狱时，共有女犯300多人。女犯中有政治犯较少，记得宋兰韵、韩勇义和杨桂珍都在这里关押过。宋兰韵是省委机关工作人员。韩勇义是市立医院外科病房护士，因为帮助赵一曼逃跑被捕入狱。韩当时是一名爱国青年，在狱中表现很坚强。杨桂珍是女一中学生，当时只有16岁。她哥哥叫杨金涛，也是地下党员。杨桂珍是受其哥哥影响参加革命的。1937年4月15日，哈尔滨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被捕。她在狱中受刑很重，但表现很坚强。女监中还有几个政治犯是从下江被捕的，她

们叫李桂兰、刘志敏、赵张氏（吴秀芝）。赵是孕妇，进监狱后生了个女孩，没活多久就死了。赵的丈夫叫赵明久，是共产党员，牺牲于狱中。还有一个叫艾风林的，也是1937年4月大破坏时被捕的，她后来死于狱中。

道里监狱犯人每天吃三顿饭，按一、二、三等分给饭食。犯人服劳役干重活时多给，干轻活时减量，不干活更少。使用铁饭碗，碗上边卡上等级。主食是苞米和高粱米，菜是咸菜或白菜汤、萝卜汤。犯人每天早6时出工，下午5点回牢房。干活时男女犯人分开，女犯做被服或在印刷厂拣页子，男犯干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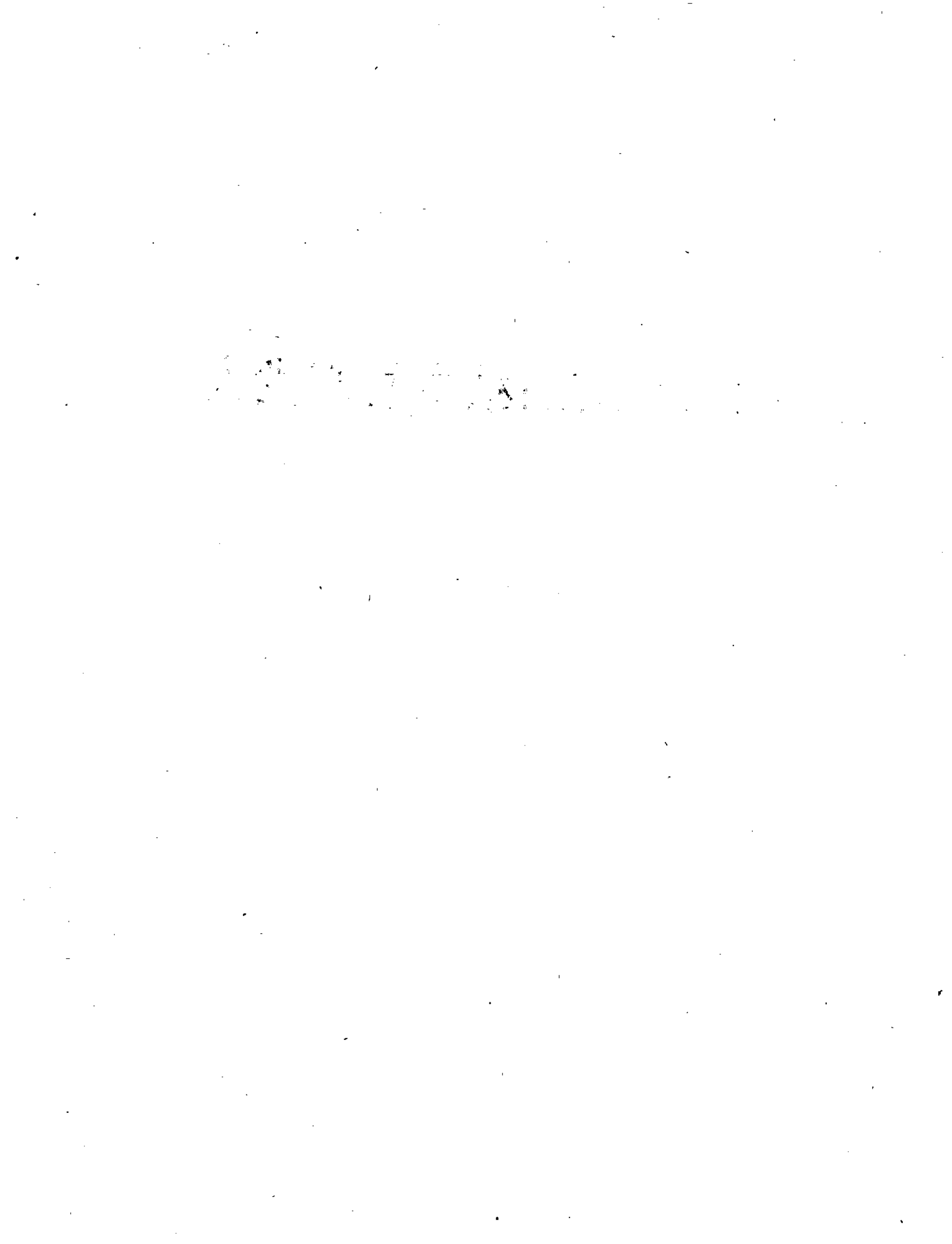
关押在道里监狱的政治犯，大多数是未决犯，少数是已决犯。对未决犯敌人管的比较严格。这些人在牢房里不许说话，不许随便走动，不能到工厂做工，而且随时有被秘密处决的危险。

在道里监狱，我们的一些党团员表现得很好，起到了团结群众，领导群众的作用。并经常教育难友，克服困难，要有勇气和敌人斗争下去。特别是新入狱的同志，除生活上关怀外，主要是鼓励他们坚定立场，给他们出主意，讲革命故事，介绍对敌斗争方法和策略。我们的党员、团员还特别注意团结教育看守，把他们争取过来为我们做事。有一些看守除了为我们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外，还常为我们通风报信，共同对付日本人。

1936年10月，我们一共21人被送到伪第四军管区会审处宣判，其中有8人被判死刑，他们是丁立足、王学尧、吴宝丰、徐乃仁、赵中甲、李绍刚、李硕明，还有一位姓张的。判无期徒刑的有两名，他们是桑祥玉和樊继光。我和石风鸣判处15年徒刑。其余9人分别被判处13年、10年和缓刑。宣判后，除将死刑的8人押到圈河枪毙外，剩余的人都被转到道外吉林第三监狱。

整理人：张红艳

我所知道的狱中共产党人



回忆长春特支在吉林监狱的活动

刘作垣

我是唐山人，曾叫刘树屏。参加党组织后，叫刘人权。

我于1927年秋到吉林第一监狱(模范监狱)当教诲师时，赵尚志、韩守本等同志已经被押在这里。

1928年，吉林第一监狱在押政治犯50多人。他们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左派，也有被怀疑的无辜市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一年，除赵尚志、韩守本以外，其他政治犯陆续被释放。

据赵尚志以后给我来信说：因东北当局怀疑他是共产党，所以没释放他，而将他和韩守本解到南京去了。我知道赵尚志是共产党，至于韩守本是否是共产党，我就不清楚了。

在吉林第一监狱时，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我在上"教诲课"时，赵尚志突然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是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是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答上来。后来，我作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在狱中我还从经济上多次接济过他。

吉林第一监狱的监狱长，是一个旧军阀出身的官吏。由于他对监狱的看守和犯人的统治与镇压过苛，因此在1929年看守兵曾闹过事，犯人也开展过绝食斗争。当时，我很同情，并支持这些斗争。不久，监狱长被拱走了。

1929年夏，我被调到长春市四道街吉林第二监狱，仍然当教诲师。在这年的初秋，赵尚志在南京释放后到吉林第二监狱找我，向我谈了关于让我参加党组织的问题。经过一番谈话，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我们俩人商量决定，我在组织内改名叫刘人权。从此我就归赵尚志直接领导。

1929年冬，赵尚志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让我积极发展组织，负责建立长春特支。并指出特支的主要工作对象：一是负责吉长铁路局的职工运动；二是负责益发合油房、火磨的工人运动。

1930年春，赵尚志派我去沈阳参加一次满洲省委会议，同时打算叫我直接去上海学习。后来因多方面原因没去上，我便又回到长春市。

1930年4月，赵尚志在沈阳的一次会议上，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会议上高呼口号而遭逮捕入狱。

赵尚志被捕以后，我就归赵尚朴（满洲省委巡视员赵尚志之兄，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已去世）领导。他每隔一个季度左右，就从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来长春特支巡视一次，他每次来长春时，都住在我这里，我对别人说：他是我的亲戚。经常来长春特支巡视工作的还有王鹤寿、张寿录等人。

我任长春特支书记期间，曾去哈尔滨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十多次工作，经常接见我的是赵尚朴引见的省委成员谭白华。记得最后一次是在一家小酒馆里，我和谭白华坐下后，进来一个比谭的职务高的大个子青年，他和我简单说几句就走了。大意是：要认真按照省委的指示执行。

长春特支干事会书记一直是我，其成员先后有傅海龄（傅振深）、金同志（朝鲜族）、张郁亭、唐久荣（唐吉昆）、唐瑶圃

等同志。他们的分工是赵尚朴开会给定的，谁管组织、宣传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金同志是朝鲜族，长的黑胖，是满洲省委派来的，负责朝鲜故衣摊一带的活动，他在特支的时间很短，“九一八”以后到部队去了。傅海龄是吉林第二监狱的看守兵。唐久荣当时是长春省立二师的英语教员，我和他是在一个革命同情者张吉忱的家里认识的。1932年秋，我发展唐久荣入了党。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长春特支的主要任务：一是发展组织，二是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任务更明确了。根据满洲省委的要求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长春特支提出了“没收敌人的武装，拿起刀斧、梭标、单枪，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的口号。我们一方面通过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利用张贴标语，游行集会等形式动员、宣传群众，掀起抗日高潮；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和创立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长春特支机关的中心设在监狱里，根据上级的指示，首先发展壮大组织，在监狱工作人员中，先后发展了看守班长傅守恒、服务员杨德盛；还有教务所的文书，当时是十几岁的小孩，叫什么名字记不住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记不清名字了。共发展了四名党员。在监狱里成立一个党小组，组长是傅海龄。党小组在狱中做了不少工作。

吉长铁路局是原来省委介绍的一个关系，有四五个党员。我去过几次，由于他们活动很少，也没有发展组织，后来由于形势紧张与他们失去联系。铁道北的油房、火磨工人中，也是省委介绍的关系，这里有四个党员，我都见过他们，曾向他们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

吉长铁路局和油房这两个点，是我直接负责的。张郁亭主要负责城里小学教师，唐久荣主要负责省立二师学校。

长春特支的党员，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最多达40多人。

"九一八"前，满洲省委介绍给我一个地下党员赵俊山，我把他安排在监狱里当看守兵，他当时干得很好。后来我又把他介绍到二道沟警署，给夏应乾署长当服务兵。因为夏很反动，我把赵俊山派去主要是为了监视夏的反动活动。赵去后，经常向我反映情况。

监狱教务所，是我们长春特支组织宣传活动地下中心和秘密阵地。在这个戒备森严的教务所里，放着满洲省委派来的金同志给带来的油印机，我们利用这台油印机，经常印刷标语、信件和宣传口号等材料。同时，还担负着收发省委和外地秘密寄来的《红旗》、《实话》、《世界周刊》、《环球周刊》等进步刊物和秘件。这些秘件都是由我那个小文书保管着。

来往信件的收件人都是用我的化名——张人权。一次从上海寄来一份刊物，不慎被别人拆开，被监狱长发现后告诉转信人说："监狱里没有张人权这个人。"一时马虎险些出事。

从此后我们更加警惕了。"九一八"后，凡是省委寄党内文件，都是以《西厢记》、《施公传》等旧小说为掩护，用化学方法密写，接到后再用化学的方法把字重新显示出来。

1932年8月，在双阳的共产党员肖丹峰，参加了抗日救国义勇军宋国荣部队。通过他的同学唐吉昆到长春找到我联系，他们部队要打长春守敌，让我们做配合。我答应在义勇军攻打长春时，我们组织犯人"炸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没有行动。

一次，长春监狱的上层统治者开会研究克扣囚粮的问题，我在会上表示坚决不同意，当时和监狱长以理据争，最后取得了胜利。

1932年纪念"九一八"一周年时，我们写了宣言，并给省立二师学校的学生发些宣传品，让他们散发。当他们往信筒里投放时，被日本特务发现，结果日本特务按照信上的名字，把二师

的学生逮捕了40多名。校长知道后，认为此事与唐久荣有关，便找他谈话。唐为掩护我，从此离开长春走了。

一年后，形势有所缓和，唐久荣又回到长春，住在我那里，名义上是作客，实际上我们是进行革命活动。

1933年冬，我收到从哈尔滨寄来的一封信，其内容是："哈总号倒闭，涉及长春分号，速做准备。"当时我和唐久荣商量，我去北京，唐久荣从大连乘船去上海，到关内再碰头。我就这样匆忙地离开了长春。

我到关内一直没见到唐久荣。后来听唐久荣的一位老师马仲云说：唐早已在抗联部队牺牲了。

我到北京后，曾接到一封私人来信，说傅海龄正在整顿组织，我走后由傅海龄担任长春特支书记。

（此文根据刘作垣同志1960年6月29日回忆录和有关资料收集整理）

整理人：赵清泉

《关外》·监狱·韩守本

赵　范

1926年冬，我在长春吉林第二模范监狱当教诲师时，经刘弄潮、谢惠桥介绍加入国民党。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很融洽，因共同反帝反军阀，被奉系军阀统称为赤化党，禁止公开活动。

谢惠桥先生当时是长春中华书局经理，老国民党员。刘弄潮是吉林省立二师的教师。当时我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关外》，由刘弄潮主编，参加编辑的有谢惠桥、韩守本和我。第一期让我来编，一共四篇文章：《谈青年问题》、《谈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说》、《列宁年谱》、《唯物论的警钟响了》。最后我还写了一篇后记，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成语，表达了我们的信念。编好后送到长春福文印书局印刷。

尽管我们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但还是走漏了风声。1926年10月22日下午，长春警察厅派人搜查了福文印书局，查获了正在印刷的《关外》第一期和中国国民党党员登记证等材料，逮捕了去取材料的省立二师宋立功等两名学生。由于《关外》刊物被查获。韩守本预料要出事，由学校后大墙翻墙逃走，离开长春去哈尔滨。刘弄潮到吉林第二监狱找我，我让他在监狱内我的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同谢惠桥一起送他去火车站，由我一人又陪他去了四平。

从这以后，长春警察厅也注意了我。吉林第二监狱看守长宋文林，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他听到要逮捕我，就偷偷告诉我，

叫我赶快离开长春，临走还送我40块银元，于是我连夜启程跑到关里老家。

1927年春，我又回到吉林。吉林高等检察厅厅长何同椿，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能在东北工作，主要是靠他的关系。他一见我就说："你又回来干啥？"

我说："回来找碗饭吃呀。"

他说："你是赤化党的宣传部长，你不知道宣传赤化，送终有余吗？我费了很大力气，买通了张作相的军法处，才把你的名字划去了。"

我知道军法处长熙洽和他的关系很好，划掉我的名字是可以办到的，但我毕竟不是宣传部长，估计是叛徒乱供出来的。最后何厅长又问我回来要干什么。

我说："还是干以前的工作吧。"

他说："长春就不要去了，吉林暂时没有缺，你就去哈尔滨吉林第三监狱去当候补看守长吧。"

临去之前，我到吉林第一监狱去看望韩守本和谢惠桥。他们都是在我离开东北后被捕的。

韩守本又名韩孝生、韩绍文，1903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是长春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是以国民党的身分出现。《关外》刊物被破坏时他跑到哈尔滨。1926年11月受北满地委派遣，同赵尚志一起来长春，与国民党中央派遣来的董海平等筹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

1927年2月20日，在长春日本租界地的一家旅馆里召开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成立大会。

会上，韩守本、赵尚志、杜继曾、董海平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韩守本兼任秘书，董海平兼任会计，赵尚志兼任庶务。

按照分工，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印章应由韩守本掌管，但董海平却把持着，不肯交出。韩守本很气愤，你不交，我就再刻一

枚！3月2日他和赵尚志一起在日本附属地一家刻字店刻印章，结果引起日本特务怀疑。是日下午，韩守本、赵尚志被长春宪兵二营逮捕，后转押到吉林第一监狱。

在监狱中我还看到了谢惠桥和黄子元，他们都带着脚镣子。韩守本和一个老同盟会员李序亭关在一个牢房里，也带着脚镣子。李序亭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精神相当消沉。其他三人都很乐观。韩守本最为活跃，他虽然脖子上生满了瘰疬疙疽，仍然和周围监房的同志们秘密地联系，互相交换情报，狱外的政治情况他差不多都知道。

我告诉他们，我要到哈尔滨吉林第三监狱去。韩守本要我给第三监狱带去一封信，他说那里关押了几名政治犯，是自己的同志，应取得联系。启程前我又到监狱去了一次，韩守本把信交给了我，并嘱咐我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交给收信人。还告诉我收信人关在独居监里，信封上的姓名是假的，监房的号码写在信封上。我理解这是暗号。

到哈尔滨后，第三监狱典狱长商鼎臣派我在第三监狱第三科当会计，看守长级。第三科是管生产的，所以需要会计，现金出纳科长管，会计只管簿记。看守长和候补看守长要轮流值夜班。犯人出事，自己有责任，所以值夜班的看守长就要不断地查监房，各处巡查。因此我同政治犯交谈，没有引起看守们的怀疑。

我趁着值夜班的机会，将那个单人监房查看了一下，从房门小窗口将信交给了那位同志（他的姓名完全忘记了）。那个同志对我说："你要来，我们早就知道了，以后有必要时，我们会找你，这里不能多谈，你也不要常来。"我本想为他做点事，见此只好罢休。

过了近一个月，门房（传达室）的人告诉我，有个叫何林生的人来找我，声称是我的表叔。我来到门房，见一个陌生人坐在

那里，我明白这是党派来同我联系的人（我这里说的党，指的是国的民党）。见面后，我们来到江边的一个象公园的地方。他告诉我蒋介石叛变了，在沪宁发动了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并与武汉政府分裂。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指望他们，应另起炉灶。"他听了高兴说："对，咱们一起干吧。"我当时是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对蒋介石的叛变和"清共"非常痛恨，并从此下了反蒋的决心。

后来知道这个叫何林生的表叔，真名叫杜省吾，是中共北满地委委员，当然也是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成员。他问我愿不愿意到道里铁路工会当书记，我告诉他："吉林高等检察厅有训令，准备调我到吉林去，恐怕我得离开哈尔滨了。"他说："那也好，不过不要在长春停留，要直接到吉林（省城）去，到了吉林会有一个姓刘的来找你接关系。"他将在吉林基督教青年会阅报室的接头暗号和时间作了安排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到吉林后不久，于1927年8月间党就派人（老刘）与我接上了关系。这时吉林高等检察厅已委任我做德惠县管狱员（监狱长）。我不想去，想留在吉林市工作。后来找到何厅长，他又派我到吉林第一监狱当候补看守长，但告诫我不要再和赤党的人交朋友。

当时北伐军已越过武胜关，并占领了河南的大部，继续北进。根据这种形势。东北的军阀要监狱优待政治犯。

我到吉林第一监狱后，发现关在那里的政治犯比过去增多一些，谢惠桥和黄子元还没有正式提审过，韩守本和赵尚志已经在军法处过了一次堂。有一次，敌人枪毙土匪头子，把韩守本和赵尚志拉去陪决。想以此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我到监房去看望他们时，韩守本高兴地说："我已经尝过死的滋味了，没有什么，再也不怕死了。"我对他们过了生死关也非常高兴。死是生命的完结，谁都不愿意。敌人往往用死来威胁犯人，陪决是威胁手段的

最野蛮的方式，但却动摇不了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

吉林第一监狱当时的典狱长姓肖，湖北人。他的家乡已在北伐军控制之下，他对于优待政治犯表现积极。我趁机劝说一科长（即管行政事务的看守长）提出设"优待号"的建议。肖典狱长同意了。于是将关政治犯的监房打开，允许他们在筒子巷中散步。但在晚上或有上级官员视察监狱时，还是锁在监房里。其实，监狱里的政治犯已经秘密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韩守本是领导人之一。帮助他们联系的是看守，其中已有党员和团员。

设优待号以后，韩守本等人更活跃了，他们对一些看守进行革命教育，争取看守们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不久，他们便与狱外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我在吉林第一监狱，仍然在第三科管簿记，有机会和政治犯交谈，从中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同韩守本的接触，对我帮助更大。那时在狱中，国民党员内部也发生了分歧，有的拥护蒋介石赞成"清共"，有的则反对。政治犯中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也不象从前那样团结了。这时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秘密地传到狱中，这是持国民党改组派观点的刊物，表面上提出反对蒋介石，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但是在政治犯中，有人反对，也有人拥护。因为事实上改组派头目汪精卫也在"清共"。

1927年末，何厅长卸了任，我失去了靠山。本来有些看守对我就有成见，此时乘机攻击我是赤化党。韩守本对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呆了，去苏联学习吧。"去苏联学习是我的心愿，我表示同意。当时恰好有一位姓李的同志服役期满释放，出狱后要路过哈尔滨去莫斯科。韩守本已和他谈好，要他带我一同去，我便先到哈尔滨去等他。

哈尔滨地方检察厅有一个候补检察官，叫田竣凯，是我的同

僚，我们的老家在同一个村子。韩守本叫我先住在他那里，等李同志去找我。我要求先和李同志认识一下，韩守本说："他认识你，你现在被看守们监视上了，不便在这里和他接触。"韩又将我与李的接头暗号讲了一遍。我到哈尔滨后，一直盼望姓李的同志来找我。

一天，我看电影回来，有一个人见我就上前问："你叫田介人吧（我当时的名字。赵范是我1947年在解放区时改的）？"我说是。"你有没有5元钱？"那个人问。"有！"我拿出5元钱。对上了暗号，接上了关系，他告诉了我们去苏联的时间，叫我准备好，届时就找我一块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老家的一封电报，说我祖母病逝。我本不想回去，但本家不同意，坚持让我回去，我只好依从了。苏联没有去成。1928年左右，韩守本曾给我写过信，让我回东北去，因缺少路费也没有去成。

关于韩守本的情况，我一直很关心。大约在1930年秋，我到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看报，发现在北平的《晨报》上有一条消息，题目是《韩守本遇害》。大概内容是：共产党员韩守本在哈尔滨被捕，在押解吉林途中，韩守本跳车遇难。实际报纸上的消息并不可靠。解放后我才知道韩守本的详细情况。

1928年12月份，东北军阀易帜加入南京国民党政府后，大赦政治犯。吉林第一监狱中的国民党政治犯释放了一大批，但韩守本、赵尚志却仍关在狱中不予释放。为此，韩守本、赵尚志几次向东北当局上诉。要求解决他们的案子。后来，吉林督军军法处按南京政府的指令，将他们俩人解往南京，由国民党政府司法部处理。

1929年5月间，苏州高等法院裁决"不予起诉"。韩守本、赵尚志终于被释放，他俩回到东北。此后，韩守本回到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工业维持会当秘书，从事工人运动。

1930年2月，韩守本领导组织了哈尔滨反帝大同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受到东北军阀当局的通缉。同年5月韩守本离哈

尔滨去宽城子，以东省特别区第七中学教师做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5日被逮捕，当日由5名警察押解韩守本去吉林。当火车行至拉林附近时，韩守本提出肚子痛要求上厕所，进厕所后跳窗逃走，警察发觉后也跳车追赶。当时正是黑夜，又是青苗遍野，韩守本得以脱险。

韩守本逃脱后，携全家搬到边境瑷珲，参加了共产国际情报传递工作。1932年初，日寇侵占了瑷珲，韩守本全家又搬到海参崴居住，继续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其弟韩守魁在韩守本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1936年初，曾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到哈尔滨，组建了中共哈尔滨特委，韩守魁任特委书记。1937年4月15日，哈尔滨特委遭到破坏，韩守魁被捕后被日寇杀害。就在同一年，苏联实行肃反扩大化，韩守本遭逮捕也被杀害，时年34岁。

（此文根据赵范同志本人口述，并做了调查，补充后整理）

整理人：张福山

我在狱中所见的共产党人

宋大公

我现年79岁，又名宋延浚。1983年3月31日在沈阳市第28中学校离休。在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1号小区居住。

1936年(伪满康德三年)我曾在伪满奉天第一监狱教务科当教务官。1943年调至伪吉林监狱。在奉天第一监狱干了7年。这所监狱是伪满洲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监狱，许多反满抗日的政治犯都被关押在这里。

现就我所知道和回忆起来的一些政治犯在奉天第一监狱中同日伪当局进行斗争，宣传抗日等情况介绍一下。

奉天第一监狱当时一任典狱长叫冯恩澜，监狱下设七个科室。作业科、需用科、会计科，以上三个科长均系日本人。另四个科是文书科，科长徐子修；戒护科，科长苏耀庭；医务科，科长李士灏，医官李银波、徐汉平、王常泰；教务科，科长于广富，教务官于正平，宋延浚。我当时是教务官，具体工作是管幼年犯教育，负责给幼年犯上小学课。

当时在奉天第一监狱关押的反满抗日的政治犯在我的记忆里有：杨翼辰（杨一辰）、杨于典（杨坚白）、王子明(孙己泰)、牛贾林（牛平甫）、李子敬、李为众、杨维众（杨野）等多人。这些共产党人在狱中与监狱当局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杨一辰在狱中表现是很坚决、顽强的。有一次敌人提审他，让他去认证一个同案人员，他为保护自己的同志免遭敌人的残害，

抗拒敌人的提审认证，用镪水把自己的眼睛弄坏，当时两眼红肿，不能辨认。使敌人毫无办法，阴谋没能得逞。

监狱里新进一个叫范爱民的小青年犯人，他曾因杀死一个日本人被当局判成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杨一辰知道后，对这个小青年很同情。就利用他自己在监狱铁工厂做计数夫报生产计划的便利条件，和看守主任关春山说："我那里人手不够用，想把这个小青年调去帮助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那时我常给这个范爱民上中文课，所以我也在旁边帮助说情。最后看守主任关春山同意了。这样，范爱民就被调到了铁工厂。在这里，杨一辰对这个小青年在生活和其他方面给予了很多的照顾。

在监狱教务科里有一些书籍，其中有小学生课本。另外还有伪满洲国宣传宗教的书刊。这些书都放在我办公室里的几个书架上。在我手里还有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有的是我平时暗中保存起来的，也有牛平甫在外面买来存放在我这里的。还有一部分都是别的"政治犯"、"思想犯"买的，存放在这的。但具体是谁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在我办公室屋里有一个小柜，因为当时监狱内是不允许犯人看进步书籍的，所以这些书刊都被我锁在这个小柜里。其中有《列宁文集》、《反杜林论》、《左派幼稚病》、《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民快览》等进步书刊，还有高尔基、托尔斯泰、鲁迅、茅盾的著作。

杨一辰、牛平甫等人经常对我谈论人生的意义，讲"正义必胜，邪恶必败"。同时还经常借读书之机向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说在苏联是人人平等，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人民当家做主人，生活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富强……

通过他们经常的对我进行宣传和引导，使我从中知道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我十分同情他们。他们有时在我这看书，有时在我这闲唠。他们在外面弄到了一些违禁的书报就都送到我这里保管，以便供大家阅读。

牛平甫那时在教务科帮助我整理一些教学材料。教务科是在原教诲堂的一个没有暖气的小独楼里，冬天生火炉子。为此，牛平甫就利用木工厂生产的手榴弹柄来烧火取暖（成麻袋成麻袋地烧），以销毁日寇杀人的工具。

那时，杨一辰在监狱里患了睾丸丹毒症，病情十分严重。我知道后，马上去找医务科长李士瀛请其为杨一辰治疗。李说："监内医务科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讲："可以找人在外面买药。"我即到会计科和一个叫清水的日本老头联系。清水说："杨一辰有一份他自己劳役挣的钱存在会计科，可以用这个钱去买药。"我于是就提款到外面买来药，经医务科治疗，总算把杨一辰的命保住了。但病情还很严重，如继续在狱中拖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就想方设法为他办假释。

我那时深为杨一辰的爱国行为所感动。我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他早日脱离监狱，尽快得到自由。但为了避免日官吏们的反对（因杨一辰是重要的政治犯），我就把杨一辰的身分簿与其他犯人办假释的身分簿子夹在一起，一块报上去。虽得监内通过准许办理假释，但上报到高等法院后，第一、二次均遭驳回，不准释放。为了达到目的，我又第三次重新为其申请并上报假释。可现任典狱长齐正冕知道后，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老宋啊！你为杨一辰办假释上报两次均遭批驳，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犯，你不是不知道。你现在这么搞，那日本人知道了怎么行呢？"我听后，就做他的工作，并向他宣传。后来他才勉勉强强的准许了，并给盖了章。几经周折，终于在1940年12月下旬，为杨一辰办妥假释手续，放出监狱了。

因为我经常与思想犯接触并为其办事，曾多次遭到日伪官吏的指责。于1943年被贬到伪吉林监狱。

杨一辰等人在狱中对敌伪人员，从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他们不卑不亢，充分表现了高尚的中华民族气节，使不少在监狱

的敌伪人员深受感动，并受到了教益。我就是深受其益的一个。我之所以能够冒着风险为他们提供方便，并允许他们看一些进步书籍，还为他们购买、秘密保管进步书刊，就是受到他们感化教育、引导的结果。

整理人：金伟刚

回忆杨一辰同志

牛平甫①

1935年10月12日我在锦州育贤中学任教时，日伪宪警捏造罪名，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奉天特委宣传部长，将我逮捕入狱。1937年被判刑。1938年冬转到奉天第一监狱。

我到监狱时，杨一辰同志在监狱第一铁工场当计数夫（杂役）。我在作业科当计数夫。因为他每天都要送报表到我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能常见面。交谈的机会也很多。不久，我们又同住一个监房，时间约有10个月。在我们未见面时，彼此都有耳闻。见面之后，一见如故，倍感亲切。以后，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杨一辰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事迹，在狱中广为流传。不但难友们十分钦佩，就是一些看守人员也很尊重他。甚至某些日人官吏，也对他另眼相看。

---

① 牛平甫，1915年4月22日生于原热河省朝阳县。1937年7月毕业于沈阳文会书院理科。9月任锦州育贤中学教员。10月12日被日伪宪警以共产党罪名逮捕入狱。1941年5月出狱。

建国后，历任北票中学校长，热河省教育厅厅长，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民主促进会辽宁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常务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等职。

现在，就记忆所及，把他可歌可泣的事迹，写两件在下面。

一辰同志当时用的名字是翼辰。他以前曾被捕过。获释后时间不太长又回到奉天做地工，这本来冒有容易暴露的风险。但为了工作需要，他毅然不顾个人安危，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为了工作方便，他有时做小工，有时当换玻璃的工人，背着玻璃箱子走街串巷，四处奔波。另外，为了掩护他，他的妻子也来到沈阳，住在贫民窟里，从事替人洗衣服等苦工。他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一辰这次被捕是被一个刚联系不久的一个叛徒出卖的。

一辰组织观念强，热爱党，热爱同志。为了保护组织不受损失，他甚至甘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伪警察厅时，一次，他避开拘留所同室其他“犯人”的注意，暗中把一根筷子插入耳中，然后猛力向墙上撞去，力图刺穿脑部致死。可惜，筷子太脆弱，一撞就折断了，只是耳部受伤。敌人再次被他这种顽强精神所震慑！

后来，一辰送法院后被判徒刑12年。接着，移送奉天第一监狱执行。

1935年冬或1936年春，沈阳城内皇宫日本宪兵队为了“追查余党”，竟不顾一辰是已决犯，而把他从监狱要到宪兵队进行轮番审问，搞疲劳战术，一连七昼夜没有让他睡觉。一辰虽经如此残酷摧残，但一句口供也没有。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暂把他送回监狱，并告诉他，过几天还要把他带到宪兵队重新审问、对证。一辰对于敌人的酷刑一向是无所畏惧，但他怕敌人使用药物或催眠及疲劳战术之类的办法，使他的意志丧失，精神失控。这样，万一泄露了党的机密，损失就太大了。因此，再三考虑之后，在重回铁工场时便毅然决然把一瓶镪水倒在了自己的脸上，脸部和眼睛受了严重的灼伤。一辰同志这样不惜牺牲自己，其目的是采用另一种对敌斗争的办法，既想烧坏自己的眼睛，使敌人无法

再让他去对证、认人、抓人，又不至于使当时第一铁工场的值勤看守受到过重的连累。因为那个看守是同地下党组织有关系的人。一辰在去宪兵队以前，一直与外面地下党有联系，联络人就是那个看守。当然，为了慎重，从宪兵队回到监狱后，便中止了与外面地下党的关系。

这件事在监狱里震动是比较大的。引起了监狱当局的重视。因为伤重，不得不把他送往病监治疗。当时，病监的杂役中有地下党员，而医务科长是中国人，有一定的民族观念，对政治犯态度较好，因而医护方面均暗中受到照顾，治疗比较及时、认真。后来，一辰的视力虽受到一定影响，所幸的是没有致残。正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宪兵队再来要人时，监狱当局为了自身职责关系，竟未应允。

1940年秋初，一辰突然得了丹毒症，再入病监。当时，病势严重，非常痛苦，且有致命危险。但他表现坚强、乐观，勇于同疾病作斗争。后来，在一些人的暗中照顾、救助下，终于战胜了病魔。1940年末或1941年初，他获释出监。出监后便回到了他山东故乡——金乡县。

一辰同志是假释出狱的。他之所以能假释，是因当时监狱内经办假释手绪的教务科长宋大公（当时名宋延浚）是一个比较有爱国心，民族意识较强、思想比较进步的人。他对于政治犯，尤其是同共产党有关的犯人，态度颇好。同时，他也受到了其他人的鼓励和影响，接受了别人的意见。因此，甘冒风险，采取了一些欺骗日寇的方式，监狱当局终于同意申请假释。后来，伪司法部竟也同意了。这样，使一辰能够提前两年多脱离苦海，重新加入了革命行列。

一辰同志从20年代开始，为了党的事业，不避艰险，九死一生。虽然几次被捕，受尽折磨，但立场坚定从不动摇，舍命保卫组织，使损失止于最小范围。他学问渊博，道德高尚，却为人忠

厚谦虚，朴实正派，平易近人。对朋友满腔热情，爱护备至，教育帮助，不遗余力。对相知，肝胆相照，待人以诚。他是我第一个直接密切接触的真正共产党人。他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和待人处事的高尚作风，给我深深的教育和影响。他是我的益友，更是我的良师。

1955年冬，他在城市服务部长任内，我去北京时曾经见面长谈。以后，天各一方，难得见面。1979年在北京又一次见面，匆匆而别，不料竟是永诀。患难之交四十年，今日回忆，不觉潸然泪下！

共产党员在狱中

王常泰①

1932年，我经同善堂的老师刘雨辰介绍，到奉天监狱医务科当医生。当时，刘雨辰在该监狱当医务科长（是嘱托性质的），因刘又在沈阳自己开业，不经常到医务科来，所以他就把科里的医务工作交给我一部分。现在就我的回忆来谈谈监狱的情况，还有地下党员在狱内的活动，以及与我的联系等问题。

当时的监狱和看守所是分开的，被捕后没判决的人先被送到看守所，判决后的人就被送到监狱。共产党员们在这里都表现了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我记得共产党员杨一辰，在把他从看守所送往监狱的时候，在汽车上他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监狱里有很多工厂，如铁工厂、木工厂、纺织厂、酱油厂等。当时的共产党员在这些工厂中都有。监狱里的负责人都是日本人。除了他们外，还有狱吏、看守长、看守等。他们血腥地对待中国人，对共产党员更是不同于一般人，管制、戒护非常严格。他们在监狱里设置很多刑具，如手铐、脚镣、暗牢、绞刑室等。另外还设有“独居间”，这是为他们认为是“罪大的犯人”预备的。要有这样的人，就给带上手铐、脚镣送进“独居间”，

① 王常泰曾于1932年1月～1937年7月在奉天第一监狱医务科当医生，建国后在鞍山市立山区工业局卫生所当医生，1970年逝世。

去。那里阴森、恐怖、环境恶劣，不许与别人接触。总之，他们是用各种各样的刑罚折磨着狱中的中国人，尤其是共产党人。

当时因为医务人员少，我就把狱中的政治犯调几名到医务科帮助工作。先后调到医务科的有刘一成（赵毅敏）、杨坚白（杨于典）、黄云腾（廖如愿）、王子明（孙季周）等人。他们在医务科比在工厂里自由多了。在工厂里，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没有自由。可是在医务科就不然了，这里的工作比较轻，行动比较自由，这就给他们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方便条件。这些共产党员与医务科的中国看守关系很好，他们用革命道理和事实说服教育这些看守，因而这些看守都很同情他们的遭遇，憎恨帝国主义，并从各方面帮助他们。在不被日本人发现的情况下，医务科的党员们可以随便到各科去，不受任何限制，有时也可以到工厂去与那里的党员联系。

这些共产党员调来医务科，不仅减轻了他们的劳动，而且也使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经常帮助我提高思想认识，给我讲解革命道理和马克思主义，还讲怎样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进行斗争。在这些共产党员的帮助教育下，我的思想开了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因而我也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帮助他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彼此不分了，有什么事都大家一齐谈论，他们说什么话也不背着我。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们讲杨一辰被捕时的情景，说杨很坚强，日本人把杨一辰的双手钉在大车后板上，前边赶车的跑得飞快，而杨一辰不停地高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听他们讲完以后，我很受感动，使我的爱国心更坚强了。

我与他们处的时间长了，他们看我忠厚老实、可靠，思想提高的也快，因此对我比较信任，就交给我一些革命工作做，并向我介绍了狱中其他一些党员。当时，我经常给他们往狱中捎信，带宣传品和吃的东西。刘一成的爱人，为了接见方便，把家搬到

小南关居住。我常去她家捎信和往狱中带吃的东西。刘一成在小西红十字医院养病时（做胃溃疡手术），由于在狱中我俩互相帮助，使我知道了很多的革命道理，我很感激他，所以常去看他。在这里他给我介绍了地下党负责同志老夏。我和夏同志相识后，紧密联系，他将党的复写材料和宣传小册子交给我，让我带到狱中交给狱中的地下党员。这些宣传品都是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的，我看到后对我的帮助教育是巨大的，使我更加憎恨日寇，更加拥护共产党，更加同情党员们的遭遇。所以我觉得，为党员们做工作，哪怕是极微薄的一点点，也感到无尚的光荣。

党员们不但与我一个人联系，而且还与其他看守有联系。当时有一位姓桑的病监看守经常到医务科和我闲谈，党把他作为培养对象，以后被党分配到狱外工作，参加了抗日军队，后来被捕牺牲。

在狱中，有的党员病了，其他的党员就殷勤的照顾他，想尽各种办法给他增加营养和用好药治疗。狱中的医生也为有病的党员用好药治疗。如当时医务科李医生，狱里没有好药，他就从外边带药给病党员杨一展医治。

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他们不但坚强勇敢，而且宣传工作也很出色，他们与中国看守和职员都有联系，关系都很好。经常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宣传革命道理争取更多的人为党工作。在狱中，我和这些党员相处了三四年之久，后来由于我转勤的原因，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根据王常泰1956年6月写的两份回忆录及其本人自传有关部分综合整理）

整理人：林凤山

坚定的信念　高尚的情操

周铁衡①

刘懋镛②是我在奉天南满中学堂学习时上四班的同学。在校时，由于他学习成绩好，为人正直、倔强、爱打抱不平，因而我很敬佩他。他在学校时的绰号叫“老宝刀”。我和他仅仅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入狱前接触不多。

1932年的一天，我的同学对我说：“刘懋镛已经入狱了，现在狱中正缺少兼职医生，你最好争取去狱中做兼职医生，以便设法营救刘懋镛。”当时我是开业行医的大夫，明知道营救共产党是有危险的，但出于民族的气节和同学的义气，我就硬着头皮去给当时在奉天第一监狱做兼职医生的中医大夫熊应五（该人是狱长的岳父）送礼，要求他介绍我到监狱去当兼职医生。经过多次送礼后，熊大夫答应我每星期去狱中诊病两次。

当时我听同学们说，刘懋镛是在日本留学时入党的“洋共产党”，回国后，就有便衣特务跟踪他，在沈阳东陵河边被警察逮

---

① 周铁衡原名周德舆，沈阳解放后先后被聘为东北文物管理处顾问，辽宁省美协理事，沈阳市文史馆员，沈阳市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市政协委员。1958年后历任沈阳市沈河区洋楼街联合诊所医师，天益堂药房主任医师，沈百二商店医务所医生。“文革”中被迫害，于1968年10月15日逝世。

② 刘懋镛为刘伯刚的原名。1930年7月于沈阳被捕，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

捕。刘懋镛被捕后，据我所见，表现得很坚强，对我影响很大，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之所以能在敌伪白色统治的几十年中，没有替敌人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是与刘懋镛在狱中对我的影响分不开的。对于他在狱中的表现，从下面几个事例就可以看清楚。

宁可坐牢，信仰不动摇

刘懋镛被捕后，凡是有民族正义感的同学，都非常焦急和担心。但是，营救政治犯实在有些困难，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我们的英文老师楼原，通过他给我们满中的校长内堀维文（该人是日本的著名人士）送礼，请求他利用他的社会地位设法将刘懋镛从狱中保释出去。内堀校长最初不答应，后来经过我苦心地请求，并说明了刘懋镛在狱中得了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他才答应和我一块儿到狱里去看看。一天，内堀校长来到监狱，在我带领下和刘懋镛进行了面谈。当时内堀对刘懋镛说："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不清楚，以后能不能实现我也不知道。我看你还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暂时先改变一下你过去的观点吧！只要你能承认过去自己做错了，这样我就可以设法托人把你保出去。"刘懋镛听后，态度很强硬地对内堀校长说："我谢谢老师对我的关心，不过我宁愿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也绝不改变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说完，刘懋镛就走了。内堀校长见此情景，摇了摇头，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气冲冲地离开了监狱。

身陷囹圄，革命工作不停止

刘懋镛入狱不久，监房的难友就推举他在本监房当收发，他借此机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有一天，我到监房诊病，见他正在

大声地宣传共产主义，我怕他惹出事来，就对他说："以后要注意，尽量少说话。"他哈哈大笑地说："我脑袋没有了就不说了。"

他所在的监房里的难友，都称呼他为刘老师，有事情都愿和他商量。难友中有什么纠纷，也都愿意请他来评理。在他被押期间，有一次大规模的炸狱，不知是否和他有关系①。

舍己为人，关心难友

因为我和刘懋镛是同学，我见他生活很苦，就经常给他带些吃的和用的东西，另外他家里也经常通过我给他送些东西去，而刘懋镛对亲友送给他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人独用，都是和难友平分享用。有一次，他的鞋破了，我给他买了一双新鞋送去，结果他不舍得穿，转送给另外一个政治犯穿了。

1934年3月1日，大赦了一批人。6～7月份又特赦一批人。刘懋镛是被特赦出来的，至于刘懋镛出狱以后的表现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根据1967年6月7日周铁衡写的证实材料并参阅刘伯刚档案有关材料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整理人：林凤山

---

① 1931年10月7日清晨，辽宁第一监狱第四杂居监房刑事犯暴动，被日军镇压。据查此事与刘伯刚无关。

我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在狱中的斗争

马世清

我于1934年到奉天第一监狱当看守兵，1939年离开监狱。

夜晚，在集体宿舍里看守兵们互相闲谈的时候，老看守们常常讲起共产党在狱中斗争的故事。

杨一辰的斗争事迹最动人。他被捕入狱后，警察厅审讯他时，把他绑在椅子上，然后再审问他。逼他把共产党人都讲出来，他坚决不说。有一个警官威胁他说："如果你不交待就把你枪毙了。"杨一辰两眼斜视，对那个警官笑了一声说："你敢把我枪毙了，今天晚上就把你的狗窝给剿了。你把枪给我，我可敢把你毙了。"那个警官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还有一次，伪警察厅将杨一辰押在三轮摩托车的车斗里，走在大街上时，杨一辰即大声喊道："我是共产党，被狗崽子捉着啦！"监押他的警察打他一拳，令他不要喊！此时杨一辰从车斗里猛地站起来，把那个警察打倒在三轮摩托车下。

当时几二十岁的杨一辰虽然被囚，可是监狱的上上下下对他都感到束手无策，有时还有几分敬佩。这样的共产党员在犯人中的威望就不胫而远扬矣。

1935年的一天，我亲眼见一个日本特务到监狱找杨一辰，问：

"共产党在哈尔滨的活动怎样？"

"你们日本人全是饭桶！"杨一辰答道。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日本特务反问。

杨一辰蔑视地回答说：“你们抓共产党，只能把我抓住，因为我现在身居监牢带着脚镣。你们自然不费大力就能请功受赏，可是与你们做对头的共产党遍地都是，你们日本人一个也看不见，更抓不着。因此，我才说你们日本人全是饭桶……”

话音刚落，杨一辰冲向特务坐的桌前，猛地把桌子推翻，把那个特务压在桌子下面动弹不了了。这时，如果杨一辰不带手铐、脚镣，日本特务就有被打死的可能。

第二天，日本宪兵队把杨一辰传去，对他进行严刑逼供。杨一辰为了严守共产党的机密，不为敌人辨认共产党人，自己还用镪水把眼睛烧得红肿，什么也看不见。回来后，在难友牛平甫的帮助下，托人买药治疗。经过王子明（孙己泰）和杨于典（杨坚白）等人的护理，几天后杨一辰的眼睛逐渐恢复了。

孙己泰被关押在奉天日本警察署时，腰板总是拔的挺直，扬眉吐气的。看守警看他不老实，说他：“这家伙真捣蛋！”

孙己泰用手指着那个警察痛骂：“你们在穷人面前耀武扬威，在有钱人面前点头哈腰，摇头摆尾，哪有一点人的样子，叫你是狗崽子，真是名副其实！在共产党面前，你有啥脸说话！”

骂的那个警察不敢仰视，只好低头躲开。

（此材料根据马世清1983年8月15日写的情况介绍整理）

整理人：赵清泉

忆共产党员陈子真在敌人法庭上

韩国铎①

1929年二三月间②的一天，我在抚顺日本警署听高等刑事巡捕宋成有说："昨天在深井子（奉抚线）火车站，从火车中捉来一个共产党，可能是共产党的头目。"又说他们从其他共犯中问出了陈子真(即林仲丹——编者注)要乘火车从抚顺去沈阳的准确消息。于是，他就和日本人高等刑事横烟武吉乘摩托车搜查③。发现有一人很象，还没走到他眼前，就见陈子真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纸条，很快用手一搓，填进嘴里。见此情景，横烟武吉马上扑过去，用手抠他的嘴，想从他的嘴里把那个纸条抠出来。可是为时已晚，这时陈子真不但把纸条吞进了肚里，而且还把横烟武吉的手咬出了血。疼的他不得不把手抽出来，然后打了陈子真一个嘴巴。

陈质问他："你为什么打人？"

横烟说："你咬我的手，我就打你。"

陈反问道："你的嘴可以随便让别人抠吗？"

横烟又问："你刚才吃的是什么？"

陈说："吃的是好吃的东西，你还敢割我的肚子吗？"

---

① 韩国铎是当时抚顺日本警察署的日语翻译。

② 此处有误，事实是在1930年11月间。

③ 实际是乘同列火车跟踪。

横烟一看纸条抠不出来了，就给陈子真戴上了手铐子，从火车上拖下来，用摩托车把他拉回了抚顺日本警察署。到警察署后，就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刑讯，但陈子真一言不发，什么口供也没问出来。接着又连续问了几个昼夜，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以上这些都是我听宋成有说的。在那以后，高等系就把陈子真交给了司法系主任仓田庄五郎审讯。审讯中由中国人翻译，林玉润、王明月和我，三个人轮流翻话。

审讯的第一天由我担任翻译。这一天，陈子真从监房里被提出来，带到了司法系主任室。仓田搬一把椅子叫他坐下后，审讯就开始了。仓田庄五郎知道利用刑讯对陈子真已经无效，于是就采用了软的手段。

他先从自己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递给陈子真，假惺惺地说："请吸烟吧！"

陈子真当即拒绝说："我不吸烟。"

接着，仓田就按电铃叫"博役"① 送来一杯茶水，但陈子真没喝。

仓田见陈子真烟不吸、茶不喝，就开始审问：

"你是哪儿的人？"

"上海人。"

"什么职业？"

"纺织厂工人。"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

"上过小学三年。"

"你在前几天为什么不说话？"

陈反问："你们警察署是不是依照法律办事？"

仓田答："是按照法律办事。"

---

① "博役"相当于现在的勤杂工。

陈接着说："既按照法律办事，'打'这一条在哪儿写着呢？我看你们是不讲理的。说话也打，不说话也打，那我何必说话，白费我的唇舌呢。所以我就不说话了，你们打吧！"

仓田问："你只上过小学，怎么还明白法律呢？"

陈反问："上小学就不准自学法律书籍吗？"

仓田接着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上海。"

"你来东北干什么？"

"旅行。"

"你到东北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看看东北哪场可以适合设立较大的纺纱厂。"

"你是工人，哪来的钱设立纺纱厂呢？"

"我自己没有钱，还有别人给我出钱呢。"

仓田说："你说的不对。"

陈反问："你既知道我说的不对，那你就必然知道我那个对的。你既知道我那个对的，何必又来问我呢？你就随便写那个对的吧！"

审问一阵后，陈子真又对我说："你这个翻译，我有点不相信。"

我说："你不相信我？你说我在哪句话上给你翻译错了？你会日本话也可以自己说吗！"

陈说："我不会日本话，不过我看时间不对，我说话的时间长，你给我翻话的时间短，我认为你没把我说的话全部都翻出来。"

仓田不知我们说的是什么，就问我："他说什么？"

我说："他不相信我给他翻的话，要求另换一个翻译。"

仓田说："好！"当即就叫我到司法室把林玉润找来接替我。大约问了两天左右时间，陈子真又要求换翻译。于是，仓田

又叫王明月把林玉润替换下来，不到半天时间，陈子真又要求换翻译。这样，仓田又把我叫到主任室再次为他翻话。

我第二次为他们翻话时，陈子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用钢笔把他的答复写出来。于是，就把我的钢笔借给他，但他嫌不好用，仓田就把自己的钢笔借给他用，就这样又审问了一两天。

仓田问："陈子真，你来东北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证据你还不说实话吗？"

陈说："你有证据就拿出来吧！"

随后，仓田就叫人把陈子真的秘书带进来，问陈："这个人你认识吗？"

陈说："不认识。"

但这个人却指认陈子真是共产党的东北党员。

接着，仓田逼问："陈子真，你还不说实话吗？"

陈说："我是中国共产党。"

仓田进一步逼问："你把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情况谈谈吧！"

陈子真大义凛然地说："你不是捉共产党吗？我是共产党。共产党犯什么罪你就判什么罪，愿杀就杀，愿押就押，你随便！我没有谈其他的必要。"

最后的回答是陈子真自己拿笔在纸上写的。

仓田庄五郎为了收买人心，在审讯期间还从"中国饭店"叫来一桌饭菜送到主任室，让陈子真吃。陈见到饭菜后，问："监狱里的犯人一律都吃这样的饭吗？若不是这样，我就不吃，我不受这样的优待。"

对陈子真的审讯① 在我的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十分令人钦佩。他是一个真正刚毅坚贞的英雄。这件事到现在，虽然过去了

---

① 据敌伪"问案笔录"载，此次审讯时间是在1930年11月中旬。

30多年，但回想起来脑中仍有记忆，思索了三四昼夜，才整理出来这份残缺不齐的材料。可惜，这一案件是轮流担任翻话，中间一段问答的情况被隔断，我不能系统地整理出来，深感遗憾。

（根据1962年2月26日韩国铎写的证实材料，并参阅敌伪档案抚顺日本警察署第四次“问案笔录”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整理人：林风山

王凤阁慷慨就义

迟曼青①

1937年4月24日，天一亮日本鬼子就派人在大街小巷敲锣吆喝，强迫群众都要出来看"罪大恶极的反满抗日匪首王凤阁伏法"的场面。群众怀着悲愤沉重和英雄最后永别的心情，低垂着头站在寒风袭人的大路两旁。宪兵队在通化南关，刑场在东关玉皇山后柳条沟。在3里长的大路上，到处是日寇和伪军，荷枪实弹，穿梭般来往巡逻。在路旁群众中到处布置警察和便衣队，以防群众暴动劫"法场"。约9点钟，两辆车从宪兵队内缓缓开出，日本鬼子和伪军前后警卫着。第一辆车上就是王凤阁，蓬乱的头发剪短了，身上还换了一套新棉衣，脸红红的，瞪着英武的两眼，向路两边的群众扫视着。后一辆车上坐的是他的妻子和4岁的孩子——金子。当日寇将他们一家人押上车时，孙氏（一说张氏）当时有些恐惧，尤其是看到4岁的孩子也要惨遭杀害时，心内更如刀绞，双腿颤抖上不去车。王凤阁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在鬼子面前发抖，抬起头来，勇敢地去死，人一辈子早晚免不了一死，能为国为民族去死是最大的幸福。"孙氏听了顿时抬起头来，抱起孩子跨上车去。鬼子为了向群众示威，大车走得很慢。从南关到柳条沟约3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一个钟头，英雄在车上始终高昂着头，神色自若，眼睛始终扫视着路两

① 作者是王凤阁发妻迟凤英的胞妹，是王凤阁就义经过的目睹者。

边的群众。

大车终于到了柳条沟刑场，日寇在山坡旁挖了两个坑，先把英雄从车上押下，指着一个坑让他下去。英雄知道最后的时辰到了，他猛地转过身来面向群众，慷慨激昂地作了最后的讲演："父老兄弟们！姑嫂姐妹们！我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是叔叔大爷和婶子大娘们看着我长大的。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使同胞们不当亡国奴，不受鬼子气，把日本鬼子消灭干净，这些年我王凤阁总算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没有出卖灵魂做对不起祖国的事。现在我虽然就要和父老兄弟们永别了，可是我不在乎，遗憾的是没完成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志愿。不过我相信，一个王凤阁倒下去，会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中国人是杀不尽砍不光的。起来战斗吧，父老兄弟们！再见了！抗日战争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这一番临危不惧，正气凛然的话，使日寇惊慌失措，好一阵呜哇乱叫，于是刽子手们赶忙把他推入坑内，让他跪下。他说："我不会跪，活着没向日本人下跪，死也要站着做鬼！"日寇无奈，强把他按坐在地上，一把雪亮的刀，在他身后举了起来……我们的民族英雄倒下去了，周围群众既为英雄慷慨陈词与悲壮牺牲而怆痛，又对日寇的凶狠残暴而愤慨，大家都含着泪肃然低下头去。此时此景真是太阳黯然，失去光辉，佟佳江水为之呜咽不息！

日寇当即把烈士的头颅装入一木匣内（据说拿各县示众去了），尸体也被用土盖上了。接着日寇又从第二辆车上把孙氏和孩子押了下来。孙氏这时十分镇定，下车后，抱起孩子让他撒了最后一泡尿，稳步走向土坑。鬼子指着第二个坑让她下去，她看看另一个坑上有血迹，便毅然走进烈士殉难的坑里说："我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你们杀吧！"话音刚落，她的身体便随着枪声倒在坑里。可怜刚满4岁的孩子，从宪兵队出来坐在妈妈的怀里，看到路旁黑鸦鸦的人群，车前车后全副武装上着刺

刀的兵，只觉得不同寻常，不断地向妈妈发问，可是妈妈一句也不回答。当妈妈把他尿时，他也顺从地尿了。可是一到坑内，只听一声枪响，妈妈倒在血泊中，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向孩子射来，可能是目标太小，或者是乱蹦乱跳，一颗子弹竟没能结束这小小的生命，孩子还是哇哇哭叫，于是第二颗、第三颗接连射来，孩子终于停止了哭声，随着父母倒下去了！枪声、哇哇的哭声，撕裂了千万群众的心，人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有的竟呜呜咽咽哭了起来。就这样，又有许多群众被便衣警察逮捕起来，说他们是王凤阁的同党而被残暴地投入监狱。

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虽然岁月流逝，当时目睹的老一代人已所余无几，可是烈士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英勇献身的事迹，却在白山黑水之间广泛流传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广大人民。

（本文选自吉林文史资料第五辑《抗日救国风云录》48～50页）

我们在奉天被捕的经过

仲肇发①

杨志云是我在大连中华青年会②时期（约在1920年至1923年间）夜校部的同学。那时，我在大连老精华眼镜公司"住地方"③。1924年，我由大连老精华公司调转到奉天老精华眼镜支公司当经理。当时，这个支公司包括我在内，共有门德忠、阎宝德、董廷臣、史立荣、王德令等六个人。

1927年3月初旬的一天早晨，杨志云突然来到奉天老精华支公司找我。他乡遇故知，倍觉亲热。他说他这次来奉天的目的是考奉天南满医科大学，准备学医。同时又谈了一些其他闲话。他说医大现在没有中国人宿舍，问我们眼镜公司有没有闲房？他要暂借一间。当时我答应把楼上那间闲房借给他住。然后，他又谈到另外还有一位同学，因为没有宿舍，也要和他一起在这里居住。我说也可以。于是，杨志云、任国桢（当时任国桢的别名叫刘子厚。他出狱后，我看报纸才知道刘子厚就是任国桢）就在奉天老精华眼镜支公司楼上的一间小屋住下了。我本打算不要他们的房钱，但任国桢、杨志云向我说："不要感情用事，这个店是

① 仲肇发，群众。当时是奉天老精华眼镜支公司经理，建国后在大连市中山区眼镜生产社工作。

② 大连中华青年会是1920年7月1日由大连的爱国知识分子付立渔等倡议成立的，是一个向青年学生和工人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和新思想宣传的进步性的群众团体。会长是付立渔。

③ "住地方"即当店员。

人家的，你是'住地方'的，还是算房钱为对。”于是，我就按照他们二人的意见按月收了房钱。每月收 5 元还是收 10 元我忘了。过了几天，我就向大连老精华眼镜公司作了报告。说将奉天支公司楼上一间房子租给了两个医大学生做宿舍，按月收费。任、杨在这里住下后，和我们同事相处甚得。他们向我们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如帝国主义怎样侵略我们的祖国，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地主怎样压迫农民，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买办阶级等。任国桢还时常拿些小册子给我们看。

任国桢、杨志云和我们在一起住了四五个月。当年农历七月初十[①]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到了老精华眼镜公司。他说他姓郭，是从大连来的，以前住过西德泰，要找杨志云，说从大连给杨志云带来了一封信，必须亲自交给他。因当时杨志云不在，这个人叫杨回来后到一家“买卖”[②]去取信，留下地址就走了。当晚七八点钟时，杨志云回来后，按照那个人留下的地址前去取信。不料，走到中途，在车站邮局就被便衣逮捕了（这是我入狱后才知道的）。当晚10点钟左右，任国桢回来后，我把大连来人，杨志云出去取信的事向他说了，听后，他很沉默。到晚11点前后，就听有人打门，叫“开门”。我们由窗户上向下望，见有很多鬼子警察、刑事和腿子，把老精华团团围住了。开了门之后，他们在楼上楼下大肆搜查一遍，随后就将任国桢及我的同事全部捕去，其中有阎宝德、门德忠、董廷臣、史立荣、王德令等，共计六个人。只把我一个人留下了，由一个鬼子警察看着我。我感到大祸临头，惶惶不安，不知所以，怎么也镇静不下来。一夜也没睡觉，好歹挨到了天明。到上午10点钟前后，医大学生邓述明[③]来到了眼镜公司。他一进门我就主动向他说：“你买眼

① 此处有误，实际是在1927年 6 月29日。

② “买卖”即商店。

③ 邓述明是中共地下党员，南满医大学生。常到奉天老精华眼镜支公司开会。

镜吗？”他说：“是的。”我说：“那么请你来，我给你配光。”于是，我把邓述明让到配光室假装配光，借机把昨晚发生的任国桢、杨志云等被捕的事简略地告诉了他。随后，他出来假装看货样子，以没看妥为由走了。这样才把鬼子瞒过去。邓走后向地下党组织及时反映了这一情况，因而其他人幸免遇难。此事我常以为是自己一生中光辉的一页，每次回想起来我都感到很高兴。

那一天，我连饭都没吃。到午后4点钟左右时，开来一辆汽车，把我的五个同事送回来了，但却把我抓走了，押在鬼子警察署奉天西塔监狱，当时就过了一堂，问我是怎样认识任国桢、杨志云的。我坚持说：“他们俩人是医大的学生，我把房子借给他们住，他们每月都给我房租钱，我有帐，已向大连本店报告过了。”鬼子又问为什么不向派出所报户口。我说：“他们是医大学生，医大若有宿舍他们就搬走了，所以没报户口。”还问他们都和哪些人来往。我说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同学。又问我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鬼子说：“你是不是和他们一起的干。”我说：“没有。”鬼子又说：“你好好的想想，好好的说，你今天不说出来，不能回家去的。”我说：“没什么说的。”因为没问出什么口供来，随后就把我押到了杨志云同一个牢房里。杨志云见到我后，低声对我说，他是昨晚去取信时中途被捕的。起初进狱的三五天内，敌人常将任、杨提出去过堂，用苦刑。过堂回来后，杨的面色苍白，心情烦闷，沉默无言。而任与我不住一个监房，情况怎样我看不见。但有一天，我们听到了任国桢在牢房里被那个外号叫“活阎王爷”的日本鬼子看守久保田毒打的叫喊声。当时牢房的人都气愤极了，我们恨不能把这个鬼子活剥皮。

我在这阴森森一股血腥气味的牢狱中住了21天。后来，托韩刚紧（是当时沈阳纺织厂经理）才把我保出来。7月末的一天午前，鬼子把我提出来过堂，说我是大连的人，要把我送回大连

去。当天晚间，由一个日本鬼子刑事押着，我同前来奉天营救我的二叔，一起回了大连。第二天到大连后，在日本鬼子警察署又过了一堂，判我犹豫执行（即监外执行）3年。当天午后，日本警察署就派狗腿子冯鼎新用马车把我送回了我的故乡黄泥川。由于这件事，大连老精华眼镜公司财东谢忱山不信任我了，把我辞退了。另派杜向欣去奉天老精华接替了我的经理工作。

我回大连后，才知道任国桢、杨志云二人在我从奉天日本鬼子监狱出来后，就过给了城里张作霖办的监狱。听说押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了。

（根据仲肇发1960年至1966年期间写的回忆录及证实材料综合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整理人：林凤山

狱中诗抄



滨江抒怀

赵一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东北烈士纪念馆温野提供）

无题

王德海

我们的心的火焰在熊熊地烧，
我们的急流的血在激动地跳。
起来，工作！工作！
灰暗的雾正弥漫在云宵。
用赤裸的手和足，
把塞途的荆棘踏折了；

用鲜红的沸腾的血，
造一座虹的桥。
天国不在幻想者美的梦境里，
天国是靠人间的前驱者的工作勇骁。

（抄自山东烈士传《光照千秋》）

言志

杨一辰

统治阶级，
设置监牢。
囚吾志士，
肆彼横暴。
但吾志士，
忠贞在抱。
心非石兮不可转，
汤可赴兮火可蹈。
善摄生兮保此身，
持其志兮气勿躁。
奋斗！奋斗！
红日五洲普照。

（抄自温建平著长篇回忆录《峥嵘岁月的怀念》一书）

古体诗五首

周东郊

公堂对簿（1929.2）

对簿公堂五尺躯，
死生何事记区区！
青春掷处流光灿，
雄鬼他年舞废墟。

寒　夜（1929.2）

北国冬寒夜拥书，
挑灯觅句记复初。
海澜江远冰封岸，
巴虎门森血染居。
往日亲朋孰尚健？
此间岁月莫轻输。
柝声渐远疑无处，
破晓霜空映壁朱。

子元兄送来《戊戌六君子传》寄句答之（1929.5）

戊戌六君子，
巍然谭嗣同。
引刀仰天笑，
肝胆蔑时穷。
危难交真见，
时乖志愈宏。

宝刀应护惜，
勿使贼蹑踪。

陟　屺（1930.1）

北堂何日依老母？
徙屺徒伤游子心。
愧我人间空汗漫，
是谁白夜苦鸣琴？
此生未计秋风煞，
百死还期春雨霖。
望处霜花幻岩壑，
何当砺剑试锋新。

留别陈、赵、佟、武诸兄（1930.7）

禁中倏二载，
时尔思朋侪。
朋侪仆有继，
桃李天下栽。
亦哀堂上亲，
倚闾望儿还。
茅舍容依旧，
屠场血未干。
忆昔被枷锁，
千里来江干。
对簿藐公堂，
粗粝勉加餐。

东苑移西园，
西园亦暗昏。
仰头蛛丝麻，
俯视陈年灰。
我志在沧海，
岂此委尘埃。
每蒙诸兄助，
情逾手足间。
还欣德不孤，
有怀磬腑宣。
狱门一分手，
覆载同地天。
天下方未宁，
步履期共坚。
愿祝诸兄健，
重担共仔肩。
勿忘在沟壑，
同心臭如兰。
悠悠者岁月，
鬓发无空颁。

（抄自吉林文史资料《铁窗内外》）

诗二首

温建平

觉　醒

虽然说这儿充满了死的寂静，

但是这儿却深埋着大众的悲痛！
脚镣，一刻也未停息它凄厉的哀鸣，
“当叮！当叮！当叮……”
终天在给囚人们申诉苦衷。

虽然说这儿充满了死的寂静，
但是这儿却潜伏着一大群斗争的生命。
囚人在夜梦中发出愤怒的吼声，
“不平！不平！不平……”
象一群睡狮渐渐觉醒。

（1934年12月作于狱中）

年　前（节选）

守着，静静地守着，
白昼又悄悄逃走了一个。
夜雾溶溶浸澈了全监……
你满怀激愤的狱囚哟，
该怒发一曲悲壮的雄歌，
叫一切失掉自由的人们都奋起应和。
当着这残年的深夜，
让万众的歌声荡涤耻辱与污浊……
莫把它们从新年放过，
莫叫它们世代在人间传播。
一天、一月、一年……
一定会有一年，
地覆天翻，重造一座乐园，
重造一座乐园。

………

1934年12月30日作于狱中

（抄自温建平著长篇回忆录——《峥嵘岁月的怀念》）

赠友人

王　铸

凄凄的牢监，
锵锵的镣声。
为社会革命，
哪怕牺牲一生半生。
我今天不幸被捕，
坐监依然是光荣。
倘要不幸被杀，
是为革命，
也是为大众；
是为民族，
也是为大家庭。

（哈尔滨市党史办张福山提供）

答友人

董雨航

你遭难，我再冒险，
火和焰交织心愿。

散兵线，不分女和男，
再相见，白山黑水间。

暴风雨，霹雳响起，
滚洪涛誓把仇恨洗。
飞大鹏，展翅恨天低，
红旗飘，打倒小鬼子！

（哈尔滨市党史办张福山提供）

无 题

孙宝忠

看宇宙充满毒烟，
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人间；
榨尽了我们的血和肉，
逼得我们受饥寒。
弟兄们，勿迟延，
武装起来努力向前！
打倒一切资产者，
改造社会除黑暗！

（哈尔滨市党史办张福山提供）

牢笼之歌①

佚 名

看那窗小，

① 狱中的同志们用俄国歌曲《列巴圈》的曲调传唱。

天高云淡，
星稀月遥。
时刻已经不早，
起来舞蹈，
振起铁的脚镣，
奏起前进的曲调。
冲出黑暗的牢笼，
奔向光明大道。

（哈尔滨市党史办张福山提供）

信　念

佚　名

毒蛇般的皮鞭，
在我的躯体上缠绕；
通红的烙铁，
可以把我的皮肉烙焦。
但，我对主义的信念，
决不动摇！

（沈阳劳改分局张大庸提供）

绝食歌

佚　名

肝胆壮烈，
愤怒火焰贯胸膛。

日寇、汉奸、走狗莫要猖狂，
中国人民站起来，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
握紧自己的枪，向敌方。
恨不幸，入高墙，
铁窗寒，血如汤。
来，高歌吧，
红色的太阳！
既是革命英雄汉，
绝食斗争逞刚强，
要使布尔什维克精神扬！

（哈尔滨党史办周淑珍提供）

对歌（三首）①

佚　名

一

在那寒风呼啸的满洲荒原，
高举红旗，英勇争战。
身虽入监成囚徒，
誓为革命志更坚。

① 延吉监狱中的革命志士在绝食斗争中，为鼓舞斗志，各牢房的难友相互对唱。

二

我虽身陷囹圄带镣铐，
不向严刑拷打跪折腰。
从前大洒热血为革命，
今后定把世界来征讨。

三

日帝走狗别耍横，
莫要仗势气太盛；
辽阔大地红旗扬，
抗日军民齐冲锋。

（摘自《延吉党史资料汇编》）

诗词四首

姬守先①

满江红二首

其一

国破家亡，
民族恨不共戴天。
掀起来，
反抗巨浪，革命狂澜。

---

① 姬守先1934年由苏联回国，“国际工作班”领导人。1942年被敌人绞杀。

武装工农几百万，
抵住强敌五六年。
要生存不怕斗争久，
决死战。

身入狱，志愈坚；
头可断，志不转。
看敌人气馁进退两难。
铁血冲开自由路，
奋勇打破胜利关。
建设起中华苏维埃，
死无憾。

其　二

气愤填胸，
按不住满腔仇燃。
可恨那，
叛徒走狗，国贼汉奸。
出卖民族谋己利，
陷害同志讨敌欢。
丧天良不顾廉和耻，
子孙患。

绝同类，背祖先；
贩人命，花血钱，
当狗奴破坏抗日战线。
群愤生啖贼子肉，

众怒活剥狗心肝。
誓杀尽帝国主义者，
偿大愿。

无 题

中国地，
高跨于满洲。
全洲变成活地狱，
人民涂炭如马牛。
侵略者迫害我民族，
假立傀儡，欺骗全球。
除汉奸，灭国贼，
打倒日寇！
工农兵学商一齐奋斗。
最后胜利，
还我河山，人民自由！

七 绝

志士从容入狱中，
身心如铁气如虹。
农工革命胜利日，
万里江山一色红。

（抄自《大连地下党专题资料》）

狱中书信遗抄

赵一曼就义前给儿子的遗书[1]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张有才给树栋弟的信[2]

树栋弟：

在前几日给你之信，想已收阅。我现在生活如常，身体无恙，物质供奉，尚属裕如。而心神方面亦极愉适，祈转告家祖，请伊老勿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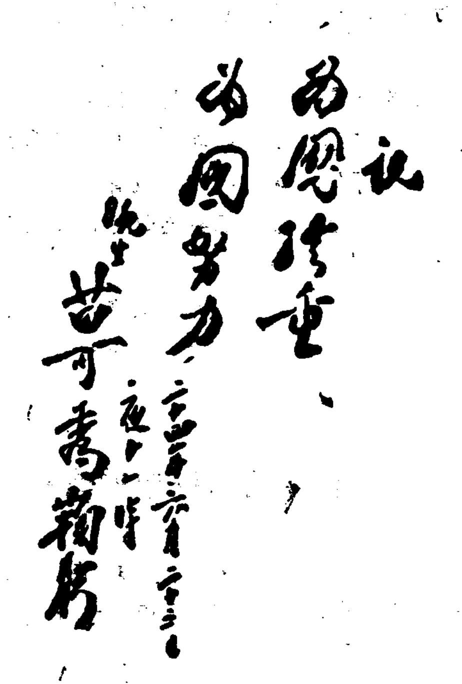
北地天气与内地天渊之别，现在初夏时暮此地仍甚寒冷，我早晚尚需棉衣，而且环境冷静大有人间地狱之感。好在我能达观

---

① 这篇遗书写于赴刑场的途中。摘自东北革命烈士馆《革命烈士书信》。

② 烈士张适（张有才）给其亲属的信。此信系张适之子张同嘉提供。

一切，心地宏亮，能随遇而安，故亦无苦恼之处。不过不能任心所欲，行动受限，是为恨事耳。我的通信处已有变更，以后来信寄奉天四烈街九号陈钧玉转便妥，望注意！


认
为您珍重、
为国努力、
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夜十二时
晚生
苗可秀鞠躬

苗可秀书信手迹

苗可秀给王卓然老师的信

卓然恩师：

生于6月13日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当被炮弹中伤臀部，在养伤期中，于21日又被日军侦骑所得。作此书系卧床伏力疾为之者。一烛萤然，四窗外虫声唧唧，似悲余之有志不遂者然。而生则以为余之事业于此已告大成矣。

日军守护士兵求余书以为纪念，余书“誓扫倭奴不顾身”诗一首赠之。日本老翻译前山，人甚和善，求余作书，余书“正气千秋”四字赠之。彼人频频嘱余遗书友人，盖今夜其为余死期也。余死固无所顾虑，所虑者二事：

一、余父所遗之产业无多，悉为余读书之故耗费荡尽，致令舍弟于今竟作流门户，且负债五百余元之多，日积月累将来更不知为何？此皆生不事家事之故也，吾师能为生解决此一问题，则生可以少慰吾弟，即生之私心亦可以少慰于地下矣。

二、余妻至愚鲁，生一子今年大约六岁，斯子幼失识其父，长谁教之？！其将与鹿豕同矣，此生之所最痛心者！生拟名此子为苗抗生，勉其继余之志耳。但谁为教之者？生筹思至在，愿以此事劳吾师以为何如耳？生意吾师可以义孙此子（抗生），即令抗生以祖父礼事吾师。余妻即令为吾师家做仆妇，人虽愚鲁，吾师而善用之，伊尚能任劳苦也。如此，则吾子可以不失教，吾妻可以不失吃饭之所，生自为谋者至矣尽矣，不识吾师究以为何如耳？吾师待生之厚谊，生惟有图报于来世，吾弟吾妻现在流落何处？生亦不详，但令赵氏叔侄设法总可以得其梗概也。

生自入狱以来，心地坦然之至，此境殊不易做到，生不知由

何修养得来也。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生观之两者皆易易耳，予视其能知义与否。吾师负整顿中华之责任，至为重大，望乞努力而珍重之，不多谈了。

一（王化一） 庚（卢乃庚）

衡（阎玉衡） 忱（车向忱）

醒（李猛醒） 光（杨大光） 诸公同此不另

祝

为国珍重！为国努力！

晚生苗可秀鞠躬

二十四年① 6月23日夜11时

（摘自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绿水英魂》）

苗可秀给张雅轩、宋忱的信

雅轩（张雅轩）、忱（宋忱）二位老弟：

不见面者二年矣，念念！兄今为日本阶下囚，伏床自思，尚堪自慰，慰者死得其所耳。昨夜秉烛作书，寄与卓然师，其主要用意在于托孤，但此书能否到达王师左右，则未可知。今再与吾弟话陈一切。

（一）被难经过：6月13日，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兄为炮弹中伤臂部创甚剧，遂潜伏地方养伤，21日为日本军所搜获，遂罹于难。

（二）嘱托吾弟者：

---

① 即1935年。

（1）家属：

甲、吾家至贫，弟之所知也。舍弟析吾所累，吾心实觉不安，吾弟当向卓师及吾有关系诸公处恳祓设法少为周济。

乙、吾妻至愚，吾子尚弱，教育抚养无人负责，此兄最为关心之一事也。昨日与卓然师书，大意如下：秀与吾子拟名为苗抗生，令吾妻即在王师家做仆妇，令抗生即以祖父礼事王师，王师即以义孙视抗生而善教之，吾弟以为如何？我身后事，大家要看在我的身上，时时关照也。

丙、我家属事，我余七弟沛料理，亦系线索。

（2）其他之一：

弟等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竖一短碣，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之行事。墓旁植梨树四五株，小亭一间，每有休假日，弟等千万要到此一游。每到此处，要三呼老苗，我之孤魂其可以不寂寞也。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为矣（泣系为国事而泣，非为私人泣也，要注意此点）。

（3）其他之二：

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文告我。

（4）其他之三：

少年团所印诸书，皆系余一手作成。在余被难前，亦曾删订几册，弟等可与赵氏叔侄谋之，付之石印局少印几本，分赠我之友，以做纪念。此外尚有几篇信稿，亦可付印，文章大致可观也。

（5）其他之四：

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要手。做事不可因为一次的失败便灰心，不可因为一次的危险便退缩。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

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不过，我们的希望务须正大而已。

一手执笔，一手执纸，仰面而书，故笔迹至拙也，不多谈了。

再会吧！祝

你们健康！快乐！

希尧（张德厚）

凤生（陈凤生）

……

诸公同此不另

兄　可秀书

6 月24日

余妻等不知流落何处？请诸公等分神照顾。以妻子累人，此大丈夫之耻也，然而奈何！肃此敬祝　　铎安！

衡、一、雅轩、忱、同、伟……卓然恩师

苗可秀拜书

7 月25日

（摘自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绿水英魂》）

狱中斗争大事记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中斗争大事记

（1927～1937）

林凤山

1927年

1月31日　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部长杨志云，被大连警察署逮捕。敌人从杨志云住处搜出《中国青年》、《劳动青年》等期刊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五卅凶手供状》、《向导》、《工人与政党》和《共产主义与ABC》等宣传材料。日本殖民当局对杨志云多次审讯，他只承认在上海加入过国民党。因证据不足，判处杨志云一个月拘留，于2月末释放并驱逐出大连。

2月20日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在长春日本租界地的一个旅馆里召开了成立大会。共产党员韩守本（李泽民）被选为宣传部长，赵尚志被选为青年部长，杜继曾被选为监察委员。

3月2日　奉系军阀驻长春宪兵队查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赵尚志、韩守本在长春头道沟31区满铁医院东边民宅被捕，同时搜出关防两颗，并党证、宣传书、党员武装行动计划、党员名单及印刷品等。

4日　赵尚志、韩守本被解往吉林省城吉林第一监狱关押。

4月17日　哈尔滨地方当局派出警察，先后在道里商市街、药铺街、马家沟比乐街等处我党的活动地，逮捕了警察党支部负责人吴宝祥、中共北满地委委员何安仁、地委交通员金永绪（狱

中化名辛永溪）、吉林军运兼做国民党工作的王寒生（狱中化名王有亮）、地委工运负责人姜文周、党员韩心怦（狱中化名鲁长发）、共青团地委书记吴晓天（狱中化名胡友三）、地委组织部长、代理地委书记高洪光（狱中化名王洪皋）和负责平民教育的高洁新以及地委宣传部长海涛（海明清）等10名党员干部。同时被捕的还有国民党员张冲、杨克俭、齐东野三人。以上13人被吉林省法院以"共产嫌疑罪"分别判处1～3年徒刑。同年8月转送哈尔滨道外监狱关押。

4月 因国民党奉天省党部遭破坏，为免遭牵连，中共奉天特支书记杨韦坚潜回吉林。任国桢取得上级党组织同意，重新组建了中共奉天特支，任国桢任特支书记，杨志云任组织委员，高子升任宣传委员。

5月2日 奉天制麻株式会社300多名机纺工人要求把工资的三成改成现洋，举行罢工。次日参加罢工人数发展到750多人，罢工持续27天，斗争取得胜利。中共奉天特支领导了这次罢工。

6月29日 中共奉天市委书记任国桢、大连地委组织部长杨志云因于5月初，组织奉天制麻会社工人罢工，被日本警察发觉，当晚先后在奉天南站邮局和奉天老精华眼镜店（今太原街）被日本警察署逮捕。

7月13日 中共大连市委青运部长兼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魏长魁，因于本月上旬在大连码头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时被敌人探知，于当夜2点，大连小岗子日本警察署派人到大连市长安街29号魏长魁家中将其逮捕，并在其家中的炕洞里搜出一些党的文件和刊物。

21日 奉天日本警察署将任国桢、杨志云二人引渡给中国奉天商埠地警察局，经过两次审讯，又转送奉天督军公署军法处，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辽宁精密仪器厂现址）。

24日 清晨，中共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场党支部在西沙河口马

兰屯小山沟里召开党员会议。由于叛徒胡杰三（后改名范青）告密，当日早8点左右，潜伏在会场周围的沙河口日本警察署的便衣警察，陆续将前来参加会议的党支部书记韩冈清和支部委员辛培源逮捕。接着，将迟到会场的党支部委员于全福在其家中逮捕。25日，敌人相继又逮捕了中共大连市委工运部长兼交通员丁文礼（又名丁子明、丁菊畦）和市委书记邓鹤皋，随后即在大连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从7月至8月的一个月时间内，在大连先后共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51人被逮捕。使大连党的组织遭到第一次严重破坏。

8月5日　大连日本警察当局把邓鹤皋、魏长魁等被捕人员作为"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嫌疑犯"将其证据及罪犯本人"分别由所属警察署转送地方法院检察局，羁押于大连岭前监狱。

21日　被解送大连地方法院的邓鹤皋、魏长魁等51人，经三谷、池内两检察官审理，对邓鹤皋、丁文礼、于全福、魏长魁等17人"起诉问罪"。接着，于29日又有林春生、宫相承等5人被起诉。

10月10日　下午，日本大连地方法院对在大连被捕的共产党人及有关群众共17人进行宣判。邓鹤皋禁锢10年；丁文礼、韩冈清、毕庶通、王天民、魏长魁、于全福等6人有期徒刑7年；迟文诚、石华源、王玉增有期徒刑5年；刘林秀、邹继升、侯立鉴、朱长德、林春生等5人有期徒刑3年；裴德亮、宫相承无罪释放。

24日　由陈为人主持在哈尔滨召开中共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成立了第一届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称省临委）。陈为人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吴丽石任组织部长兼农运负责人，胡步三任军委书记，张刃光（张福堂）任共青团省临委书记，韩慧芝负责妇女工作，王立功为工运负责人。会议决定省临委机关设在奉天。

11月7日　11时，日本大连地方法院对在大连被捕的共产党

人及有关群众开庭继续宣判，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名判处共产党员邵福年、辛培源徒刑5年；共产党员梁学发徒刑3年；有关群众苏崔氏（女）罚款200元；门若棠（女）罚款100元。

1928年

1月21日　大连水上警察署逮捕了从长春路经大连赴上海的中共满洲省临委执委、中共长春市二道沟支部书记刘相益（刘立名），由于证据不足，日警署假意释放，派人跟踪到长春。

2月1日　刘相益于长春被东省特别区路警处第六段警察逮捕。刘被捕后叛变，供出省临委通信机关及吉长、哈尔滨等县委的秘密机关和党的主要负责人，使吉长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哈尔滨县委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

12日　大连水上警察署逮捕了从天津到大连拟往上海的中共中央交通员周世昌。受其牵连，中共关东县委联络员高景阳也随之在大连被捕。

20日　省临委发出关于开除刘相益党籍的通告。省临委决议指出：刘相益"帮助敌人破坏满洲党的全部组织，他是无产阶级的罪人，我们队伍中走出这样的败类，真是共产党的耻辱。"为此，省临委决定撤销刘相益省临委执委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3月15日　中共关东县委会农运部长杜继曾，从大连去旅顺联系工作时，在旅顺被日本桥派出所逮捕。日本警察当局借机大肆搜捕，至4月14日，在旅顺、大连先后共逮捕19人。

16日　周世昌被镇威上将军公署军法处以"内乱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南监（已决监）。1931年2月出狱。

4月21日　大连地方法院对杜继曾、周祥富（群众）、田立华（中共党员）、王耀先（中共党员）、张义堂（共青团员）、

秦月新（中共党员）等6人，按违犯《治安维持法》予以起诉，其余13人无罪释放。

29日　中共关东县委书记曲文秀，在大连沙河口永安街八番地张贴、散发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标语、传单时，被沙河口警察署“密行班”逮捕，并从曲的住处搜出标语、传单、其它文件和印刷机等。经审讯，曲即供认与杜继曾等组织关东县委等情况。敌人根据曲的口供等材料，从4月29日至5月上旬，在大连共逮捕47人（其中包括在奉天、营口逮捕2人）。中共关东县委遭到严重破坏。

6月4日　“皇姑屯事件”发生。不久，张学良为父发丧释放政治犯。借此机会任国桢、杨志云写出上诉呈。6月28日，二人在奉天第一监狱获释。

9月　中共满洲省临委在奉天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满洲临时省委正式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以下简称省委），陈为人继续担任省委书记。

11月　东北最高法院成立，同时成立奉天高等法院和奉天地方法院。

12月22日　中共满洲省委在奉天市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共产党员牛思玉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以及王鹤寿、张刃光等14人。在会议进行中，10多名警察破门而入，除张刃光（团省委书记）逃脱外，其余13人全部被逮捕。经审讯，李正权（党员、教师）被保释，刘国栋（中共奉天兵工厂党支部书记）被兵工厂要回处理，其余11人于1929年1月被移交军法处，在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关押。省委遭到第一次大破坏。

29日　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政府，改旗易帜”。即所谓“东北易帜”。期间，大赦政治犯，中共北满地委代理书记高洪光等10人全部获释。

1929年

1月18日　中共东满区委书记周东郊，在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被东北军逮捕，送吉林第一监狱关押。吉林高等法院以“宣传赤化”罪名，对其判1年徒刑（未决前关押日以二日折合一日计算），于1930年7月中旬出狱。

是月　共产党员牛思玉的妻子张璇生被沈阳警察厅逮捕。敌人妄图从她嘴里得到省委陈为人等被捕同志的真实身分。但她不惧酷刑，没透露任何真实情况，敌人无奈，只好将她释放。

2月5日　奉天省改为辽宁省。

9日　中共东满区委书记刘建璋，受组织委托，准备将周东郊的爱人和孩子送回沈阳。由于叛徒告密，在龙井火车站被敌人逮捕。第二天被送往吉林第四模范监狱（延吉监狱）关押，以“共产党嫌疑”判处1年徒刑。在狱中刘建璋将监狱长的勤务兵申守义发展入党。这是延吉市发展的第一名党员。1930年刘建璋出狱。申守义改名申昌毅到省委当交通员，后来在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

3月　共产党员赵尚志、韩守本从吉林第一监狱解送南京。在南京审讯时，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因国民党案而被捕的，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分。于5月20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奉南京政府司法部之令，对赵尚志、韩守本案进行审理，认定他们是“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即行开释。

4月2日　奉天市改称沈阳市。

17日　大连地方法院对1928年3～5月，中共关东县委遭破坏被逮捕的杜继曾等人宣布判决。其中，杜继曾、纪幼柏判徒刑8年；曲文秀7年；张振忠（张明阳，中共关东县委工运委员）3年；其余被判2年8个月的1人；2年2个月的1人；1年8

个月的34人；1年2个月的7人。在被捕的66人中，共有47人被判处徒刑；共产党员王可义、田永盛在拘留期间死于岭前监狱。有17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判决后，被判刑人员从大连岭前监狱转送关东厅刑务所（旅顺大狱）关押。

是月 奉天第一监狱改称辽宁第一监狱。

7月 经过党组织营救，陈为人、吴丽石等11人，于本月底从辽宁第一监狱被全部取保释放出狱。

30日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济总的报告》中记载："目前满洲尚在狱者，锦州4人，奉天2人，大连50人。"

8月22日 省委书记刘少奇、组织部长孟用潜(孟坚)在奉天纺纱厂北门外被逮捕，被送辽宁第一监狱临时看守所关押。

30日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抚顺特支书记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从本日起，抚顺日本警察署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至9月5日止，在抚顺共逮捕杨靖宇、王振祥等10人，另在沈阳逮捕1人（苏振久）。其中共产党员8人，工会会员3人。抚顺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9月9日 抚顺日本警察署将王振祥等5名共产党员以"治安维持法违反犯"罪名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由在存等3名工会会员因无证据，不久即被释放。省委交通员苏振久，在沈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交中国当局东北宪兵司令部处理。经其家属活动，于1930年1月28日获释。

15日 与杨靖宇、王振祥同案被捕的共产党员韩恩贵、因证据不足，被抚顺日本警察署释放。

中旬 由于刘少奇、孟用潜的机智斗争和党组织积极营救，被取保释放。赵尚志从哈尔滨到长春，介绍吉林第二监狱教诲师刘作垣（又名刘树屏、张人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他以监狱教诲师的公开身分为掩护，积极地开展了党的地下工作。

28日　抚顺日本警察署将受严重刑伤又患赤痢的杨靖宇以"治安维持法违反犯"罪名，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

是年　冬，长春特支成立后，刘作垣任书记期间，以吉林第一监狱教诲师的公开身分做掩护，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监狱工作人员中发展了傅守恒、杨德盛（看守班长）、教务所的文书等四名党员。并在狱中成立了党小组。组长傅海龄。

12月25日，辽宁高等法院以"被告张贯一反革命嫌疑罪予以起诉"。两日后，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1年半；王振祥先期以"妨害公共秩序罪"判处1年2个月徒刑。

1930年

1月30日（春节正月初一）　辽宁第一监狱将馒头里掺包米面，引起犯人的强烈不满，杨靖宇借此机会发动200多犯人的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在第二天给补上了春节的伙食改善，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

4月12日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在沈阳举行国民常识讲演会，请留美归来的苏上达介绍"泛太平洋会议"的情况。我党派出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和赵尚志、陈尚哲等几十人进入会场。当讲演会开始时，赵尚志挺身而起，面向群众，慷慨激昂地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惨杀工人、学生的暴行。接着，撒传单、喊口号，会场秩序大乱。东北宪兵司令部闻讯派人前来，将杜、赵、陈三人逮捕。杜兰亭、陈尚哲抵刑不过，招供叛变。敌人根据他们的口供，对我党展开了大肆搜捕活动。

17日　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队长雷恒成带领20名侦缉队员到沈阳平县中学逮捕了我地下党员刘陆晨、袁效之等人，下午到省委交通站——沈阳大德生药房逮捕了交通站负责人宋小坡。

19日　早6时，敌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将我设在沈阳的

团省委秘密机关（共产党员陶振邦家）包围，先后将参加满洲党、团省委联席会议的李子芬、丘九（丘旭明）、饶漱石、孙昆（王文德）、丁君羊、刘碧云等逮捕。之后，又相继在沈阳逮捕了郭任民、张干民等。至此，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从12日到29日，敌人在沈阳共逮捕我党、团员30多人，革命群众近50人。省委遭到第二次严重破坏。这次破坏还波及到了哈尔滨、抚顺等地的党组织。

5月1日 哈尔滨一中党员教师周一粟被警察秘密逮捕。共青团员杨奠坤（杨佐青）发动全校师生罢课，并带领300多名学生包围了特警处。要求交出周一粟。不久，周一粟被解送辽宁。8月18日，被判刑1年6个月。

5月2日 下午，由廖如愿主持在沈阳小南边门外草地，召开省委干部会议。会议刚结束时，被当地警察发现，参加会议的廖如愿、郭隆真、王鹤寿、王永庆、潘敬久、宋奇等6人全部被逮捕，关押在沈阳县公安局。5月6日经组织营救，全部获释。

3日 省委职委秘书徐克俊，向中共中央写信报告满洲省委遭受破坏的情况。

10日 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将李子芬、饶漱石、丁君羊等19人转送辽宁第一监狱。其余被捕人员均被先后释放。

是月末 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大肆捕人，中共抚顺特支的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几乎全部被逮捕。抚顺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6月9日 为内、外配合，积极主动地开展狱内斗争，省委向中央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为被捕同志找口供上之关系致中央信》。

7月3日 中共地下党员刘伯刚在沈阳东陵浑河边被东陵派出所逮捕，送沈阳县清乡委员会，后转辽宁第一监狱关押。

是月 中共辽宁第一监狱狱内秘密支部成立。李子芬任支部

书记，饶漱石任支部副书记，丁君羊、刘明俨（刘若云）、丘九（丘旭明）为支部委员。秘密支部成立后，领导我党被捕同志和难友积极主动地开展了狱内斗争。

8月1日 共产党人在吉林省额穆县各处组织群众暴动失败，有13人被捕。

9月5日 吉敦铁路沿线军警以防止共产党暴动为名，在吉林省蛟河、敦化两处共逮捕200人，并将其中的15人在敦化城郊枪决。

8日 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刘伯刚提起公诉。不久，辽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刘伯刚5年徒刑，因刘不服上诉又改判8年。

11月3日 吉林省政府和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派出大批宪兵、警察以"共产党嫌疑"和"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等罪名，逮捕了吉林省立第五中学（在长春市）教务主任谢雨天、教员郑效洵、校长肖汝沦、学生方秀春、黄受天等人。敌人从搜出的信件中发现线索以后，当晚又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键。5日，又在哈尔滨逮捕了东省特区女一中教员楚图南。此即当时震惊东北的"五中党案"事件。

7日夜 驻延吉日本警察，在布尔哈通河以北进行大搜捕，中共延吉区委组织部长许澈等50余名党员被捕，区委及大部分支部遭到严重破坏。

11月9日 中共满洲省委职委书记林仲丹到抚顺巡视，指导工人运动。11日，由于叛徒胡杰三（范青）的告密，林仲丹乘火车回沈阳途中，被日本特务逮捕，押回抚顺日本警察署。当晚，日本警察署又逮捕了抚顺县委书记张干民和省委特派员杨一展及团抚顺县委负责人李爱民（赵发财）。次日，在古城子又逮捕了李贺年等人。从11日至16日在抚顺先后共逮捕党员、工会会员等34人。

12月7日 中共北满特委在书记孟坚的寓所召开党团员联席

会议。晚10时许，巡警以查户口为名，将参加会议的陈潭秋（孙杰）、王鹤寿、孟坚、葛凤鸣、全亨哲、陶敏（陶文久、小陶）等逮捕，中共北满特委遭到破坏。孟坚被判有期徒刑7年；陈潭秋等人被判有期徒刑5年。判刑后被转送哈尔滨道外监狱关押。

20日 黑龙江省密山县朴秉律、李春基等13人因“从事共党活动”被捕。

25日 抚顺日本警察署以“治安维持法违背犯”的罪名将林仲丹等24人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羁押在辽宁省第十五监狱（在抚顺）。王全荣（王二姐）等10人被释放。

是月 朝鲜族女共产党员金贞吉在吉林省延吉县凤林洞（今朝阳乡）小学被捕。押入延吉监狱。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特赦政治犯时，获释出狱。

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分别判处谢雨天、楚图南有期徒刑9年零11个月，褫夺公民权10年；判处郑效洵、郑键、黄受天有期徒刑8年；判处方秀春有期徒刑5年；判处肖汝岭有期徒刑3年。

是年冬 吉林省当局调派驻敦化的陆军第7团赴延边镇压革命运动，在延吉、汪清等地大肆逮捕与残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从11月至12月，延边各地党团组织连遭破坏，党团员被捕200余人，革命群众被捕700余人。

1931年

是年初 关押在吉林省延吉监狱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延吉监狱委员会。书记为金勋，组织委员李进，宣传委员吴世国，军事部长尹范，监察委员苏胜镐。狱中党组织建立后，积极进行了越狱的准备工作。同年夏，成立了由金勋、李进、吴世国、尹范、苏胜镐等人组成的越狱斗争指挥部。分别组织了爆破、放火、抢枪等11个分队。

1月3日　为领导东北军15旅38团士兵的革命兵变，省委军委书记韩源波（化名王文成）到博克图与打入该团的共产党员卢透云接上关系。第二天，由韩源波主持在博克图西沟以北的旷野召集该团共产党员及进步官兵40余人开会，研究兵变问题。不料，被参加会议的排长方锦桥告密，韩源波等5人被捕。1月14日，韩源波、卢透云、李庚辰、李广海、高欣等共产党员在博克图车站西沟被杀害。

21日　中共汪清（现属吉林省）县委书记金勋（又名王克奎，朝鲜族），在三岔口被"讨伐队"逮捕，送吉林省第四监狱（延吉监狱）关押。

1月下旬　林仲丹、杨一辰、张干民等在抚顺被逮捕的24人，从抚顺监狱被解送辽宁高等法院，羁押于沈阳地方法院看守所（北未决）。

2月3日　吉林省当局派兵在延吉县逮捕"共产党嫌疑犯"200多人，经逐个审讯后，于6日将其中的2人杀害。

8日　辽宁高等法院以大赦为名释放被捕之政治犯杨兆峰、张云普、何子芳等6人，扬言决不释放张贯一（杨靖宇）、陈义增二人。

3月3日（阴历正月十五）　驻吉林省延吉的日本警察在局子街（延吉市内）进行大搜捕，逮捕了中共延吉区委书记李成九、军事部长权泰山等60余人。区委及其有关支部惨遭破坏，曹基锡接任区委书记工作。

6日　共产党员夏之栩（女）从苏联回国在黑龙江省绥芬河越境时，因道路不熟被东北边防军逮捕。捕后送哈尔滨监狱关押。同年7月，从哈尔滨监狱被解往辽宁第一监狱关押。经组织营救，于本年12月取保释放。

13日　狱中干事会给满洲党团省委写信，报告被关押在辽宁第一监狱的党团员成立了党团员合组的5人干事会。由李子芬任

书记，并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党内关于反立三路线及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发动狱中进行年关斗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反立三路线决议案》。要求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在没被敌人宣判死刑之前，要特别加紧武装头脑，团结党、团员开展狱内革命斗争。

4日　辽宁高等法院判处林仲丹、张干民有期徒刑5年，判处李贺年、刘荣芝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杨一辰有期徒刑1年，马德水、李爱民、薛敬斋等19人无罪释放。

3月16日　韩绍文（韩守本）等人在哈尔滨因发行进步刊物而被捕，同时被捕的"嫌疑犯"还有刘崇昆、付毅勋、牛俊英等人。

是月　苏联远东军区派遣中共党员于树功回东北搜集国民党情报，被东北军逮捕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后在1939年9月16日，由监狱医务科药剂员（通称看守）赵绍先（赵公民）带领于树功、党员赫长荣（现名赫洵）以给典狱长公馆打扫卫生为名，走出监狱大门，越狱成功。

4月上旬　中共吉林省柳河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李昌日等20多人被逮捕。

下旬　杨靖宇从辽宁第一监狱刑满释放，3天后又被敌人逮捕，关押在沈阳地方法院看守所（北末决）。

5月13日　中共南满特委向满洲省委报告柳河党支部完全被破坏，约有20名同志被捕。

6月中旬　辽宁第一监狱狱中干事会利用过端午节之机，派出郭任民到各号串联，发动难友向狱方开展了要求节日改善伙食的斗争，迫使狱方答应了改善伙食的条件。

7月　哈尔滨道外监狱，孟坚等17名政治犯向狱方开展了要求与亲友会面和通信待遇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狱方答应了政治犯可与其他一般犯人同样，每月和亲友会见或通信一次。

是月末　共产党员赵尚朴在哈尔滨被捕，押于中东路护路军

看守所。1931年冬转哈尔滨道外监狱关押。1932年2月被取保释放。

9月12日　吉林省和龙县公安局在牛心山一带逮捕共产党人姜泰元、金昌龙等数人，使当地党的组织遭到破坏。

18日　日军炮击“北大营”入侵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

20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任命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伪奉天市长。23日，土肥原贤二就任，组织伪市警察局查封东三省官银号等，并大肆逮捕我爱国群众。

27日　驻吉林省延吉局子街日本军警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逮捕中共党员及反日群众18人。

11月上旬　杨靖宇经过党组织营救，从辽宁第一监狱释放出狱。

20日　日伪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

21日　上午，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和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在沈阳商埠地南三经路被日本宪兵逮捕。

22日　下午，日本宪兵队在沈阳商埠地南三经路布乘里胡同廖如愿家，将省委书记张应龙和省委妇委凌莎逮捕。凌莎于23日被日本宪兵队放回。

23日　晚，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在沈阳商埠地南三经路东乡里88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至此，中共满洲省委又遭到一次破坏。

11月　辽宁第一监狱狱中干事会利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之机，组织难友自编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小型文艺节目，在监内公开演出。丁君羊、饶漱石、郭任民、王文德等人参加了演出。

12月11日　南满地区游击队主要领导在吉林省海龙县白石沟开会，被山城镇日本领事馆发现，命翻译金永祚、于大清带领日本领事馆警察包围会场，将到会的12人逮捕。

12月下旬　辽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罪名判处赵毅敏5年徒刑，张应龙、廖如愿、杨先泽各判3年徒刑。

是月　经过党组织营救，1930年4月在沈阳被捕的中共满洲省委李子芬、饶漱石、丁君羊等同志，从辽宁第一监狱先后全部被取保释放。杨一辰本月从辽宁第一监狱刑满释放。

△　日本警察在吉林省龙井附近的琵岩村及和龙县药水洞等地烧死反日妇女和儿童团员6人，并逮捕共产党员与反日群众10多人。

1932年

1月　林仲丹（陈子真、张浩）于辽宁第一监狱被营救出狱。

下旬　刘伯刚在辽宁第一监狱以要求改善节日犯人生活为由，发动同号筒的犯人进行绝食，并取得了胜利，迫使监狱当局对春节期间犯人的伙食有了改善。

3月1日　伪满洲国成立，以"大同"为年号，伪国都为新京（长春）。

9日　辽宁第一监狱改称奉天第一监狱。

28日　中共东满特委宣传部长兼延吉区委书记曹基锡，在延吉县北山村（现延吉市橡胶厂东北角）被日本军警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共11人，被押送延吉监狱。中共延吉区委遇到严重破坏。

4月12日　在中东路工人的配合下，赵尚志等人在哈尔滨香坊与城高子之间，炸毁5辆载有几百名日军的军用列车。事情发生后，中东路职工40余人被捕。全路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当局逮捕工人。

21日　黑龙江省伪肇州县监狱"犯人"乘劳动收工之际，拥

入卫兵室，用铁锹打死卫兵，抢走枪支，并毁坏枪支113支、迫击炮2门及大批子弹，烧毁监狱第一科、第二科办公室及大批卷宗文件。

23日（农历三月十八日） 上午，驻延吉的日本军警把监禁在延吉监狱里的曹基锡等人押往兴安乡实现村的一家破产地主的两间茅草房里。灭绝人性的日本军警，首先用机枪扫射，然后往草房上浇汽油，放火烧死了曹基锡等30名共产党员和群众。曹基锡等人在牺牲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曹基锡牺牲时年仅27岁。

5月3日 中共奉天兵工厂支部书记梁永盛和共产党员魏国荣、乔恩普（乔兰亭）等人，以逛天齐庙（在现沈阳市大东电影院附近）为掩护，在人群中散发传单，被敌人逮捕入狱。梁在狱中虽遭残酷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于当年7月壮烈牺牲在狱中，年仅31岁。

7月 经营救，陈潭秋、王鹤寿、葛风鸣等人从哈尔滨道外监狱全部获释出狱（其中孟坚先期被营救出狱）。

10月6日 中共奉天特委在沈阳小西关马泡沿胡同民乐铁工厂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使与会人员彭克明（郝培庄、吴天星）、黄喆焕、张志和（叶正良）、张俊芝（张寒）、张蔼风（张俊庸）遭宪兵队逮捕。接着，由于黄喆焕叛变，使崔云河、李君镐、柳顺春、尹昌燮、李丕文（李维周）等人被捕，前后共有10人被捕，奉天特委遭到第一次破坏。

12日 省委发出《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奉天特委遭受破坏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奉特于6日遭了一次大的破坏，被捕了十几个同志，破坏了两三处机关区。光生和北扬辛未碰着，奉天的下层尚无影响，并且新的特委也成立起来……”

1933年

3月 经奉天高等法院重新审理，张千民被改判为8个月徒刑（原判5年）。同年5月从奉天第一监狱释放。

4月11日 由于抚顺特支的党员桑兰亭向敌人告密。下午4时许，抚顺宪兵分遣队包围了千金寨铁道南李万富煎饼铺后院——中共抚顺特支机关，逮捕了奉天特委委员刁和卿和党员张海文，搜出团组织宣传工作计划一份。当天夜里，又逮捕了党员刘玉祥等人。抚顺党的组织又一次遭到了破坏。

23日 山城镇（现吉林省海龙县）日本宪兵队四处搜捕，中共海龙中心县委负责人李明春、团县委负责人李景汉及其妻李仁顺一同被捕，县委遭到严重破坏。

5月6日 晚8时许，中共吉林特支成员金景（现名金田）及共青团员郭连郊（现名郭锋）在吉林市小东门里附近散发反满抗日传单时，被伪警察发现逮捕。随后，日本吉林宪兵队和吉林市伪警察当局，在吉林市内大肆搜捕。至5月27日止，共逮捕我党、团员及进步青年25人，其中党、团员21人，使中共吉林特支遭到了严重破坏。

是月 在满洲省委特派员赵尚志的帮助下，成立了特支干事会。成员有刘作垣、傅根深（看守）、唐吉昆。书记刘作垣。领导长春特支和油厂支部。

6月18日 中共本溪湖特支组织部长陈相谷，因行动不慎，被日寇本溪湖警察署逮捕。

20日 由于陈相谷被捕后供出的线索，致使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毓南（团员）被沈阳日本警察署逮捕。

22日 中共奉天特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党团特委领导人等24人被逮捕。特委书记杨一辰被判12年徒刑，关押在奉天第一监

狱。在审讯期间，22日《奉天每日新闻》发表题为《大胆的杨一辰》的报道："满洲国方面所逮捕的党特委书记杨一辰（刘孟平）是当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即使死也不泄露党的机密……为了主义就是被处死刑也心甘情愿。他对机要事项守口如瓶，实在是胆大包天。"1940年12月，杨一辰以监外治病为名，被假释出狱。

是月 在吉林高等法院看守所里，吉林特支被捕同志成立了临时党团支部。成员有刘中和、谭励、李春元、郭连郊（郭锋）张其义、王诚忠、吕纹。刘中和、谭励为负责人。

临时支部成立后，为交流思想、互相启迪向上，秘密创办了64开本微型《夜光》刊物。谭励为本刊写了发刊词。刊物通过指定杂役苗某秘密传递给党团员和爱国难友。共发行了6期。狱中临时支部通过《夜光》指导狱内斗争。

9月18日 伪满吉林高等法院对中共吉林特支被捕人员做出判决，其中：金景判有期徒刑10年，吕纹、常家椿有期徒刑8年，冯毓生、张嘉珍、王诚忠、张春融、张其义、于璋判有期徒刑5年；王家祚、郭连郊、朱殿超等三人犹豫刑3年，被取保释放的其余被捕人员在此之前被先后释放。金景、吕纹于1938年8月刑满出狱。

是月 日伪军警在黑龙江省双城县教育界进行大搜捕，40余名爱国志士被逮捕入狱。

10月4日 汤原、鹤立（在黑龙江省）日伪宪兵对汤原地下党组织进行大搜捕。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文、组织部长崔贵福，县委委员高庆云、金成刚（女）等12名党团员被捕，惨遭杀害。

8日 从大连调到奉天工作的于冀贤自首叛变。特委书记张有才（张适）及李长贵、张智山等三人在沈阳被敌宪兵队逮捕。中共奉天特委又遭到第三次破坏。张有才被捕后，被奉天高等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李长贵有期徒刑5年。判刑后转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

20日　大连日本宪兵队在叛徒于冀贤带领下，在大连逮捕了中共大连窑业党支部书记尹继原（尹茂库）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刘景新）及其妻李玉贞（非党，不久释放）。敌人随即在大连、旅顺先后逮捕我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共53人，大连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第三次破坏。

28日　共青团满洲省委委员陈屏章（何能）等三人，在哈尔滨被捕。

30日　省委代理书记李耀奎，在哈尔滨道里绣湘书店与中央交通员接头时被捕。

是月　杨一辰（刘孟平）、王予明（孙已泰）、王德海（安哲）、杨于典（杨坚白）等先后转到沈阳检察厅看守所（北未决）。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杨一辰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并通过教育争取过来的监狱副看守长王惠风和桑玉贵与被服厂党员栾芳有（老栾头）、日本站附近春日町胡同做皮鞋的山东人张某；兵工厂党员刘清涛，分别接上了关系，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同奉天特委书记夏尚志保持联系。

11月13日　日本宪兵队将张有才一案移交给沈阳警察厅。在移交书中写道："张有才对宪兵队数次审讯，从头到尾称说不是共产党员，在精神上准备一死……坚守着所谓共产党铁板纪律的秘密……因此没有同情地余地，应以极刑的必要。"

1934年

2月26日　由于哈尔滨电车厂共青团员窦成瑞不慎将组织暴露，哈尔滨市伪警务厅特务科从26日开始到3月10日，对哈尔滨电业局电车厂党团及工会组织进行大搜捕。王景侠、马克亚、

王知一等30余名党团员、工会会员被捕。海员、东铁、皮鞋等处的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也先后遭到破坏。东铁有20余名党团员及工会会员被捕。省总工会书记老曹也遭逮捕入狱。

3月3日 中共安东临时工作委员会被破坏，于福昌（共产党员、安东赤色工会委员）被捕。

是月 中共台辽（辽宁省台安县、辽中县）中心县委书记王耿在台安被捕后叛变，许中午、王殿科及时撤出，幸未被捕。

△ 伪满洲国实行帝制，皇帝溥仪登基后，对监狱犯人实行大赦时，谢雨天、楚图南、郑效洵、肖汝纶、郑键、黄受天、方秀春等提前获释出狱。

4月下旬 由于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书记刘明佛（胡彬）的被捕叛变，造成中共哈尔滨区委、中共吉东局、双城、长春、吉林、珠河等地及呼海路党团组织、工会主要领导30余人被捕。

刘明佛被捕后，还供出了先于他以盗窃嫌疑被捕入狱的省委代理书记李跃奎及奉天特委的通讯地址，致使中共奉天特委书记杨大聪、团奉天特委组织部长白广泽、台辽县委宣传部长文甲松等人被捕，中共奉天特委遭到第四次破坏。

杨大聪被捕后，夏尚志接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夏尚志到沈阳后，通过奉天监狱看守长王惠风与正在监狱关押的杨一辰接上关系。

5月6日 沈阳日本宪兵队到清原（在辽宁省）逮捕了共青团清原特别支部书记张映辉等人，清原的共青团组织遭到破坏。

11日 中共东省特别区立第二中学（在哈尔滨）党支部书记王锜，在哈尔滨道外南马路小学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转哈尔滨道里监狱关押，被判5年徒刑后转哈尔滨道外监狱。1937年11月1日病死狱中，时年36岁。

30日　辽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邓铁梅，在辽宁省岫岩县小蔡家沟张家堡子（今岫岩县大营子镇）岳父家养病，由于叛徒出卖，当夜被捕。

是月　长春第二中学等学校的9名教师被日伪警察逮捕。其中4人被杀害，余者下落不明。

6月2日，邓铁梅被押送到凤城（辽宁省）伪满安奉警备司令部（司令赫慕侠），次日转送奉天陆军监狱。

6月24日　依照伪康德元年3月1日敕令第8号“恩赦令”，赵毅敏、廖如愿、杨先泽、刘伯刚等共产党人，从奉天第一监狱被特赦出狱（张应龙于1932年病死狱中）。

9月28日　夜，邓铁梅在奉天陆军监狱被秘密杀害，时年43岁。

11月　日军在凌南药王庙（现属辽宁省建昌县）一带进行一次大搜捕，17名爱国志士惨遭杀害。

是年冬　延吉监狱（在现吉林省延吉市内）当局，将延吉监狱内的秘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原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勋秘密杀害。接着，尹范、申春等狱内秘密党组织领导成员也遭到敌人暗害。

1935年

3月　党员傅根深（傅海令），在吉林第二监狱（在长春）以看守警公开身分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并派出特务伪装“犯人”对付根深进行监视，准备将其逮捕。他在地下党员赵俊山（铁路警察）的帮助下，机智地乘火车离开长春到哈尔滨，后返回晋察冀革命根据地。

4月　哈尔滨道里监狱，被关押的政治犯全体绝食，提出：

反对长期审讯关押，应早日送法院结案；允许和亲人通信、见面；允许送东西；改善生活、改善伙食；允许看书、看报纸。绝食7天后，敌人答复了所有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5月 金景、吕纹、常家椿因不服判决，经多次上诉后，敌人改判有期徒刑5年；冯毓生等六人改判犹豫刑5年，取保释放。

6月7日 吉林延吉监狱“犯人”在金明柱（共青团员，1930年11月被捕入狱）、李英春（和龙县游击队员，1933年被捕入狱）、李泰根（珲春游击队员）等人领导下，经长期准备，两次挫折，终于武装越狱暴动成功。他们用抢来的武器打死监狱长和日本指挥官鹤岗等数人，率领100多名“犯人”冲出监狱。其中一部分人在金明柱带领下奔向抗日游击区，投入了抗日武装斗争。

6月12日夜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参议、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率部驻扎在羊角沟（今辽宁省岫岩县岭沟乡孤家子村境内）。

13日 清晨由于汉奸告密，日伪军包围了羊角沟。苗可秀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身负重伤，潜藏在凤城县沙里寨乡益家村胡家沟砗碣岭朱运成家养伤，6月21日不幸被敌人逮捕。

7月25日 日伪军将苗可秀从凤城县警察署押到凤城镇的所谓“建国六勇士”碑前，强迫苗可秀在碑前下跪，苗可秀傲然挺立，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罪行，大义凛然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围观群众不断发出哭泣、哀叹之声。敌人害怕群众骚动，慌忙将苗可秀架上汽车，拉到城南枪杀了，时年仅29岁。

10月3日 奉天陆军监狱发生越狱事件，轰动全城。

11月11日 中共清原县（在辽宁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奎恒，在杨树崴子被捕，清原县委遭到破坏。

是年冬 中共奉天市委宣传部长张醒民被捕。

15日 中共珠河铁北区委书记赵一曼与日伪军警作战负伤后，同宣传部长周伯学，战士老于、妇女会员杨桂兰和交通员刘福生等到小西北沟一个空窝棚里养伤。

22日 上午，当地反动地主发现了赵一曼等人的隐藏处，报告了敌人。30多名伪警察包围了赵一曼等人住的窝棚，经2小时激战，刘福生和老于牺牲，赵一曼左大腿受重伤，昏倒在地。赵一曼、周伯学、杨桂兰3人被俘，囚在珠河县伪警务科。五天后，赵一曼被转押到滨江省警务厅拘留所。由于赵一曼的庇护，杨桂兰在珠河县关押28天后被释放。

12月13日夜，赵一曼被敌人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部旧楼）监视治疗。住院期间，赵一曼"卓有成效"地教育争取了看管她的伪警士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他（她）们决心帮助赵一曼逃出虎口。

是月 吉林市日伪警特当局从月初到月末，在吉林市知识分子中进行了"思想大检举"，并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毓文中学校长李铭勋，训育主任李桂勋，吉师学生李玉芳，吉林县中学教员付庆恒、富鹤一、张宗德，吉林师范教务主任娄德庸，吉林一中教员丛佩文、赵承志，吉林女师代理校长肖汝纶，教员黄维新，女师附小主任李寿田，市立第五小学校长魏启宇等人。其中魏启宇被严刑审讯致死，娄德庸、李铭勋分别于次年2月和5月间因刑而死，余者直到1937年6月末才获释。

1936年

2月12日 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后改称抗日联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和党员张常德先后在牡丹江被捕叛变。中共吉东特委组织部长孟泾清被捕（后牺牲在狱中），代理书记李范五以及田孟君、交通员张哈、张发等转移到苏联。吉东特委遭到破

坏。

14日　伪《大同报》报道，辽宁省朝阳著名义勇军首领刘振东在北平被日军秘密逮捕，押回朝阳。后被秘密杀害。

春　由于日本宪兵队加紧了追查狱中党的活动，经杨一辰、王子明、杨于典商量决定放弃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狱中党组的活动。

4月21日　奉天宪兵队以“中共奉天特别教育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罪名，逮捕了奉天大北私立共荣学校教员王殿玉、陈景师、黄克勇、王重谦；又以“中共南满特委奉天支部”成员的罪名，在启东烟草公司逮捕了杨子平、许香久、李佩然等人。同年8月，将王殿玉、陈景师、杨子平、许香久、黄克勇、王重谦等人以共产党员反满抗日罪名杀害。

6月13日　日伪军警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昂昂溪、博克图等地进行大搜捕。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敬文、党员金剑啸、姜椿芳及爱国青年20余人被捕，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三棵树机务段、绥化、孙家店及哈尔滨机务段抗日救国会会员20余人被捕。齐齐哈尔市教育界、《黑龙江民报》、师范学校中的爱国志士40余人被捕。

21日　革命文艺战士、中共党员金剑啸被敌人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特高系监狱转送齐齐哈尔伪第三军管区的陆军监狱关押。

28日　晚9时，赵一曼在看管她的伪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及董广正（董宪勋的堂侄）的帮助下，从哈尔滨市立医院逃出。6月30日早5时行至阿城县境内，离游击区只有20华里的李家屯附近时，被敌人追上。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三人同时带回哈尔滨，关进市警察厅刑事拘留所。董宪勋被折磨致死，韩勇义以“纵匪逃走”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赵一曼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渝，于同年8月2日在珠河（现尚志县）小北门

外英勇就义，时年31岁。

是月 留在省委工作的小骆撤离哈尔滨赴莫斯科。他在临行前以省委代表菲野的名义，给珠汤中心县委写信，宣布："从现在起，原省委正式取消。"

8月15日 金剑啸在齐齐哈尔市北门外，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牺牲时年仅26岁。

9月3日 中共通河特支（黑龙江省）书记李秋岳（女，朝鲜族）在通河县城西门外英勇就义。

19日 下午，盘石县（现吉林省）日本宪兵队派便衣特务骑马来到五块石村（现吉林省海龙县康大营乡）逮捕了海龙县游击队交通员赵玉仙（女，人称"梅花鹿"）等7人。次日，在五块石村又逮捕22人。同时，中共海龙区委及其所属的马崇岭、草庙子、三十一户、大亮子河、葡萄贝等五个党支部全部遭到破坏，4名支部书记和许多党员、团员、反日会员、赤卫队员被捕。1937年1月20日，赵玉仙等41人，在盘山县靠山屯屯西头一个枯干的大水泡子前，被日本宪兵杀害。

11月12日 驻安东县（现辽宁省丹东市）的日本宪兵队，安东省警务厅、安东县警务局、中兴镇警察署对"救国会"人员进行大肆搜捕。先后逮捕了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教育会长张镇蕃、副会长于学礼、小学校长单荣道、小学校长迟学禹、中学校长秦有德等。与此同时，在凤城、桓仁等县也进行了大逮捕，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安东教育界大惨案"。被捕人员遭到了野蛮的刑讯逼供。邓士仁于11月14日在安东日本宪兵队被活活用凉水灌死。

27日 盘石（现吉林省盘石县）伪警务统制委员会，集满日宪兵、警察、密探40余人，逮捕了盘石东部地区党、团员及进步群众30人。其中党员8人，救国会员10人，赤卫队员4人，其他群众8人。

是年 常家椿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不久病故。

1937年

1月29日 中共柳河（现属吉林省）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和抗联战士藺秀文在东丰县拉拉河梁会春（藺的岳父）家，被甲长带人连同梁会春的全家一并被绑到村公所后，藺秀文及其岳父全家被取保释放。郭喜明只身被押到海龙县山城镇日本宪兵分队。

是月 “安东教育界大惨案”中被逮捕人员从安东全部转押到奉天陆军监狱。

2月8日 伪陆军军法处开庭宣判。桓仁县13名爱国志士被判死刑，在沈阳大南门外英勇就义。安东县的张镇蕃、宋东安、刘国安、王宝彰、秦有德、单荣道、孙朗轩、孙德润、马仁田、李勤业、孙文敷等爱国志士也同时残遭杀害，8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由奉天陆军监狱转押到抚顺监狱。此次事件共有300多人被关押，近百人死于非命。

△ 清晨，中共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具恩惠及刘文阁（曾任地下县政府副县长）在柳河县城西门外王家屯被日本特务长岛等人逮捕。

12日 中共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在清原县草市，被当地伪警察署逮捕，押送到山城镇日本宪兵分队，后投敌叛变，写出了近万字的自供书，致使五道沟、孤山子、三原浦三个党支部和大牛沟、四道河子等六个反日会，共27名党员和反日会员全部被捕入狱。中共柳河县委遭到彻底破坏。

3月上旬 伪奉天警察厅在沈阳将中共党员苏振久逮捕，苏在敌人诱惑下，叛变投敌，成为敌人打入我党内部的密探。

24日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三方面军中将司令王凤阁率部在临江、通化、辑安（今集安）三县交界处的老虎顶子山寨与两千多

名日、伪军进行战斗，激战三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失利。王凤阁左臂和腿部受重伤。27日清晨，王凤阁及其妻张氏和4岁的儿子（小金子）及8名抗日战士被俘。8名抗日战士在小南岔沟门被处决，王凤阁及其妻儿被送通化县城南门里日伪混成第一宪兵队本部秘密监狱关押。

4月15日 王凤阁和其妻张氏及4岁的儿子小金子全家3口，在通化县城郊柳条沟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

由于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付景勋叛变投敌，致使日、伪军警在哈尔滨、滨绥、滨北各铁路沿线及各城市进行大逮捕。即“四一五”事件。16日，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被捕叛变，随之，哈尔滨特委交通局主任桑如桂、哈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被捕。哈尔滨特委，党的交通局及其所属组织大连、哈尔滨市委、海伦县委、呼兰、宾县、巴彦特支均遭破坏。南满省委所属的抚顺特支等党的组织也遭到破坏。此外，在阿城、双城、安达等地还逮捕了一些抗日群众，在哈尔滨逮捕了口琴社侯小古等10余人。这次大逮捕一直延续到冬季，党团员及爱国群众745人被投入监狱，198人被杀害。

17日 日寇大连宪兵于大连不老街141号（李明武家）将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李明武和到李家研究工作的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王清志及李明武的妻子李洁吾逮捕。

是月 敌山城镇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五大队，在清原县飞机场集体屠杀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老长青”、“四海山”和赵明思及其所属部下94人。5月10日至6月中旬，又先后两批在山城镇停车场北山，由山城镇警务统治委员会屠杀了中共柳河地下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柳河游击队长车任清、陈俊山，工作人员崔洋焕、杨景阳、杨玉林，红军第五团副官处长侯德清等18人，以及县委领导的民众抗日组织积极分子34人。中共柳河地下组织全部遭到破坏。

5月13日　中共宾县（现属黑龙江省）特支副书记吕大千在宾县中学被捕，7月21在哈尔滨市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

8月2日　日寇开始对中共大连市委所属支部党员及有关人员进行大逮捕。仅在一天之内就逮捕77人。至12月共逮捕124人。其中共产党员80人。使中共大连市委遭到第四次严重破坏。

9月　抗联三师师长王仁斋派指导员石振华、机枪连长付景生到抚顺参加中共抚顺特支工作。同月下旬，在沈阳被奉天宪兵队逮捕。

10月2日　由于叛徒、内奸苏振久的告密，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张佐汉和中共南满省委联络员纪儒林在沈阳被奉天宪兵队逮捕。从4日起，奉天宪兵队和抚顺宪兵队联合行动，在抚顺进行大逮捕，至5日下午，共有27名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28日，敌人又分别在清原县财神庙和抚顺县城子后逮捕了王绍先和石翔振（左鉴）两人。至此，包括9月下旬，在沈阳被捕的石振华、付景生在内，先后共有31人被捕，中共抚顺特支遭到了严重破坏。

11月5日　张佐汉、纪儒林等31人，被奉天宪兵队全部审讯完毕。11月17日，张弦等11人被"严格谕，立下誓约"后释放。

11月19日　张佐汉、纪儒林等26人被奉天宪兵队送交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羁押于奉天陆军监狱。

12月3日　奉天第一军管区简易军法处会审，纪儒林、张佐汉、王绍纯、周鼎仲、张贵恒、许吉傅、佟保功、李壮猷、朱成业、佟书庵、丁宝珩、肖启亮、石振华等13名共产党员被判处极刑。宣判当天，即在沈阳小河沿被杀害。

付景生，判15年徒刑，崔尧章、石翔振、贾富英（死于狱中）判10徒刑，判后转抚顺监狱关押。王绍先、舒玉洗、

蔚占春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是月 伪满当局在沈阳开办奉天第二监狱，隶属伪满洲国司法部行刑司，为外国人犯拘禁之地。

△ 东北抗日联军二军六师设在吉林省长白县黑瞎子沟的密营医院，由于叛徒出卖，被日寇讨伐队包围，共产党员、朝鲜族女战士李桂顺，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不幸中弹负伤被捕。被捕后，李桂顺坚贞不屈，英勇斗争。

26日 敌人事先拟好反动讲稿，强行让李桂顺在长白县城满洲街朝鲜小学院内参加大会演讲，李桂顺借此机会高呼抗日口号，号召乡亲们参加抗日。敌人用枪将李桂顺打伤，押上了摩托车，驶到梨树沟大湖岭的路上时，李桂顺已奄奄一息，敌人把她推入峡谷，时年23岁。



参 考 资 料



狱中干事会给满洲党团省委的信

关于干事会的组织、工作情形和请求经济、政治上的援助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三日）①

满洲省党、团委：

兹有下列数事向你们报告和请求：

1．我们自从入狱以来虽然是经常过着组织的生活，但因环境关系以前是没有具体组织形式。到最近我们又因为事实需要，成立了党团合组的五人干事会（党二人，芬、俨；团三人，姚、孙、张——兵工厂工人）芬任书记，这干事会是在党团省委直接指导之下，管理△△△△和△△△全体在监的党团员的教育组织工作。

2．干事会成立后，我们很精密的估量了△△客观环境和我们案情的实在关系，认为我们现在是不需要而且不应当将全副精力都用在△△斗争中，而是应当依据客观的可能，争取尽速出△的保障。在未被释放以前，主要应当注重武装头脑的工作。但这不是说要完全抛弃日常斗争，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生活能够比较自由，能有自由读书的机会，这都是过去和监狱方面不断斗争的结果。

① 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3．因此除请你们要切实和互济会及中央规定具体的对于我们的物质经常救济办法，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目前重病者又有四人，轻病可说是急〔几〕乎全体）外，我们请求你们以后无论如何要源源不绝的供给我们政治的养料。四中全会决议案，最近中央和省委的通告、决议案，与我国党史和俄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请你们要负起责任运送进来。

4．最近我们的工作可以报告的主要事项有二：（一）我们详细的讨论了反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问题。先在干事会扩大会上讨论成立了决议案（上文便是），随后又在小组会议中讨论，并全体通过干事会的决议。（二）我们领导△△的年关斗争，被发动的人数愈四百，得到相当结果，但其中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不斗争，不管闲事。另一部分同志则不顾群众斗争情绪和监狱环境，而走向强迫命令群众的左倾盲动的道路，以至在群众面前做成同志对骂的怪现象。一方面骂机会主义者，他方面骂盲动主义者，最后干事会是根据党的新路线做了正确的批判的结论。

（此件选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集）

狱中干事会扩大会《关于反立三路线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三日）

干事会扩大会议热烈的讨论了最近P① 内关于反对L·S·L②及拥护C·I·L③ 的问题，一致决议如下：

（一）我们认为目前正在发展着的中国 R④ 运动中，正在发展着的苏维埃 R·A⑤ 英勇斗争中，L·S·L 的领导实给了这些运动以严重的损失，L·S·L 的整个错误系统，是与布尔什维克的 C·I·L 不能并存的。这个路线以许多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对于当前最紧迫R现实任务执行的消极怠工；所以其本质是机会主义的。立三路线很左倾的否认了目前革命形势，主要的特征之一，即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其终局：第一是没有积极巩固和扩大现实的革命胜利，尤其没有切实注意建立党和无产阶级领导，巩固纪律，坚强以工人、贫农、雇农、苦力为基础的真正工农红军。没有切实注意团结和巩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没有坚决展开贫农联合中农的土地革命，反对富农，坚决实行自己正确的政纲，创造新中国工农群众的政治生活。相反的，立三路线不

① 为"党"。

② 为"立三路线"

③ 为"共产国际路线"。

④ 为"革命"。

⑤ 为"红军"。

勇敢执行平分土地政策，容忍富农劫掠土地革命的结果，同时又有许多过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企图。这样实在是停滞了苏维埃革命运动，停滞了六次大会正确指示，而为现在客观环境所实证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争取。第二是没有真正开展非苏维埃区域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首先是大城市产业工人运动的停滞，没有及时抓住工人经济政治的迫切要求，发动并领导工人的斗争和罢工，密切联〔系〕到工人阶级总要求与苏维埃运动。空喊政治罢工而不去组织政治罢工，放松了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内部的革命群众工作，反用革命爆发前组织困难，工人只要暴动不要斗争等表面左倾论调，掩盖其工作消极的实际机会主义。对于农民兵士革命斗争，在单纯布置地方暴动与兵士暴〔动〕的策略口号之下，没有充分开展。相反的方面，立三路线在许多中心大城市毫无实际阶级力量对比的正确估量，没有相当工作前提，便实行计划组织武装暴动，调动红军无阵地无后防的拼命进攻，这样，就大大做了发狂的盲动，一经发展下去，便要葬送阶级力量的精锐，使我们的运动向后倒退。还在布置全国的暴动之中，用总行委的组织实行取消了党和团以及工会的组织，在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之下，形成了家长统治制度，使党走到非常状态，完全丧失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组织精神。总之，目前革命环境一般的发展，政治经济危机一般的加速，反映出党的政治经济领导落后，反映出党的尾巴主义，这是立三路线主要的结果和实在的危机。还有立三路线许多各个错误，以及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等半托洛斯基的理论，将对中国革命忠实与对共产国际忠实，认为两事互相对立起来的反国际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企图等，这些在国际的来信与中央最近决议及告同志书等文件中都有详细说明，我们完全拥护这些意见。

（二）1、很正确很坚决的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正确的指示了现实具体的革命进攻路线。2、分析中国形势，认为暂时

我们还没有客观的全国革命形势，但最近事变趋向，革命形势虽未包括全中国地域，但至少要包括几个主要省份。武装暴动方针是确定了，要同全党力量去准备组织暴动，共产党一定要宣传团结群众，引导群〔众〕到决定胜负的阵地上去。中国苏维埃政权建立运动的意义，正是走向大城市以至最大城〔市〕的武装暴动。因此中国目前具体现实的任务，应当是加紧建立坚强的真正工农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而依据着红军，尽量实行自己的政纲。坚决实行贫农中农的彻底土地革命，重新平分土地，坚决反对富农，抵抗富农，尽量组织贫农、苦力、雇农，引进革命后备军，极端改良工人生活。在非苏维埃区域中努力发动真正革命群众工作，发动工人政治经济的斗争。罢工每个发动，不仅是进行组织群众一步，并且是实际准备武装暴动一步，也是直接对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帮助。要发展农民斗争和骚动，象个箍一样的去包围城市，要发动兵士斗争哗变，捣乱国民党政权。只有这样才是准备工业中心大城市的暴动，准备用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占领这些城市。对帝国主义必须有应付手段，尽量避免在我们巩固以前与帝国主义作决定胜负的冲突，同时须尽量动员群〔众〕作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斗争，宣传鼓动群众明白了解反帝国主义的全国任务。我们认为国际这样的路线，是真正革命进攻的路线，是深入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这样路线，固然与立三路线没有基本共同之点，同样，一切右派曲解国际路线，认为是降低党的任务，是退却的路线，取消现实的革命形势，这些倾向无疑义的是国际路线的敌人。

（三）我们知道最近许多政治事变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告诉我们革命危机一般的深入，与革命运动的生长，而在党和中国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实在力量和动员群众的能力来说，争取完成一省几省革命根据的树立，已是当前紧迫的实际的事实。这一事实充分斥驳了在另一形势下出现的右倾分子机会主义的滥调，他们

认为中国革命是与立三路线的破产同时葬送了。相反的，证实了革命运动和党的危机，只有在立三路线领导下才是生长的状态。目前在正确执行国际路线并与立三路线斗争中，党是正在趋向更进一步的巩固与团结，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在日益生长。这在实际的驳斥了那些取消革命者的谬误。他们只以为六次大会后，党的路线是一贯的错误。相反的，目前状况，具体证实了六次大会的路线是绝对正确，他推动了党和中国革命坚定的生长。这中间曾有一个时期离开国际路线和六次大会路线，成了立三路线的领导，但目前党已勇敢迅速的接受了国际路线，坚决肃清立三路线，反对左右倾的斗争，正确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便是中国苏维埃运动胜利前途的保障。

（四）我们坚决团结在国际和中国党的四中全会以及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斗争。我们要深刻认识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与机会主义实质的危险。我们一定站在全党自我批评的精神上，深入到群众工作中，深入到日常政治生〔活〕中去切实检查，肃清立三路线，反对对于立三路线的各种形式的调和主义，坚决无情的发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的机会主义，特别要集中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因为这一基本的危险提供了立三路线的实在基础，所以真正反对立三路线，坚决执行国际路线，正是更巩固加强反右倾的立场，更健全了反右倾的武装。同时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更企图在此时扩大破坏党的运动，我们必须坚决抵抗。现在我们为了艰苦的革命斗争，被囚禁在敌人的监狱里，然而我们的革命热忱和勇敢，依然贯彻了广大革命群众和党所领导正在进行着的伟大阶级斗争。我们在未接受敌人死刑宣告之前的现实生活中，是要特别利用时机加紧武装头脑的革命教育与研究工作，并进行监狱内部的斗争，尽力争取更广大革命群众斗争的革命战地。在这样生活中，同样有可能与必要去反对立三路线与深刻学习和执行国际路线，在党的立场上

去反对国际的右倾曲解，以至托陈派破坏党的反革命企图。

（五）我们认为最近在国际和中央领导之下，正在进行着反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坚决斗争中，党内一切右倾分子乘机窃发，他们利用全党群众反立三路线的热情，实行向党进攻，他们不只是曲解国际路线，想用他们的右倾政纲去代替国际路线，并且有分裂党的公开的小组织行动；私自召集反党的公开的小组织行动，私自召集反党会议，印发反党小册子，成立反党的决议；还公开在上海进行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的组织，以至反对党在国际指导下的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中央、反对党的六次大会！这一洋洋大观的反党活动，开了闻所未闻的恶例，这些现象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是党的耻辱！是破坏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原则与铁的纪律！我们一致奋起坚决抗议右派这种反党活动，我们要求满洲省委坚决执行纪律！无条件的制止他们的活动，解除他们的领导工作，在服从党的决定转中央之下工作。我们建议罗章龙之流这些反党的领袖，中央要首先给以严重的制裁，要他即刻停止反党活动，服从党的决定，否则毫无顾恤开除出党。我们坚信全党在正确的国际领导下，与立三路线斗争，正是进一步的趋向巩固与团结。全体党团员要在他们的血战中，去证实国际路线的正确，与立三路线的破产；同样，也就要打碎右派的活动，撕毁他们的政纲，并抵抗托陈派一切破坏党的反革命企图。

（六）我们的口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拥护苏维埃的中国！拥护为苏维埃而战争的工农红军！开展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和罢工运动！发展农民斗争，骚动包围城市！士兵们斗争哗变，捣乱军阀统治！组织政治罢工！准备组织大城市苏维埃的真正群众武装暴动！争取一省几省苏维埃政权首先胜利！平分土地，反对富农，富农从苏维埃红军中滚出去！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中国工农苏维埃万岁！打倒帝国主

义！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拥护苏联！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万岁！坚决制止党内右派分裂党的活动！拥护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原则与铁的纪律！抵抗托陈派破坏党的阴谋！深入群众中艰苦工作，反对一切空谈！实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全党象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绝不疲倦的争斗！

（此材料选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集）

万生为营救奉天被捕同志给天生的信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六日）①

天生兄：

关于奉天营救事，特录奉庄原报告如下：

一九三〇年四月被捕者，此案已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暗地判决，最重者为十年，轻者一年半，本来说张学良回奉即宣判，但至今还未宣布，内中尚有数人或将释出（内有子芬、丘九亦或在内），此案营救无可能。

仲丹等在抚顺之被捕，今已押于第一监禁中，幸归高等法院办理。仲丹被捕时，身虽无证物，但同时被捕者有二十五人之多，原因为告密，故丹被捕后，指证者甚多，并有同时被捕之张麻子，因受刑不过，亦指证仲丹，并说出一切，因此丹已受刑极重，关系亦居首位。关于此案正在竭力设法调查，营救方法大概请律师进行，如果无效，再用别法，将来成效与把握，则不敢一定言之，关于此事，将来另行报告，还要请你们不要作急，要知道此地之困难，并非是不极力进行。

丹（大约系潭之误）②秋在哈埠被捕一案，前已派△△同志前去营救，虽然是极力营救，但是仍然未有若何消息，现在押于哈司令部。今所可办到者，只有探得消息而已，因此，由全部看来，关于营救事，不易办理。

---

① 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时间。

② 原文如此。

此外，我们根据奉庄来函，关于奉天互济会事特摘录告诉你们：

奉地互会成立，虽有数月，但上海互总置之不加闻问，更加经费亦不寄给，因此，数月来只依当地党营救吃饭等问题，工作既不能发展且将旧有关系亦不能持续下去，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上海互总须负此完全责任也。

万　生

三月十六日

天生：此信我看过，望告济总党团速汇款去救济在狱×士，至急勿误！①

（本件选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集）

① 此系周恩来同志的亲笔批示。

满洲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告同志书

满洲全党同志们！

正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二次猛烈进攻苏区与红军的血战中，正在红军获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的进展中，同时正在全党坚决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尖锐的斗争中，满洲党恰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

……

满洲全党同志们！拿着布尔塞维克的永不疲倦的精神来真正"深入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与中央的一切指示。

在狱的同志们！你们与敌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扩大会议非常满意，你们要更加锻炼你们的奋斗精神，保重你们有用的身体，他日得释归来，继续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全党同志们！

正在动员广大群众加紧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派工人到红军中去！建立满洲线路，海员兵工厂矿山和三大城市几大港口的工作！大批吸收工人入党，迅速发展中国农民的工作！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发展赤色工会，准备建立满洲总工会的组织！发展各种群众团体和附属组织！为夺取国民党的军队而斗争！加紧反帝运动，援助朝鲜革命！只有实际的执行这些任务，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全党同志们！扩大会议要求每个同志拿实际工作的成绩来答

复这些问题！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1931年3月27日

（摘自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文件》）

为报羁押犯张贯一患病由

为签报事案检查前奉

钧府羁押日警署引渡人犯张贯一一名当该犯人入所之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患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合签报

鉴核示遵施行谨签呈

抚顺县政府监督张

抚顺县公安局长　刘克羽印

抚顺县政府的批示

呈悉查监狱有官医疗治候即提讯转押以便医治此令

1929年10月 3 日

抚顺县政府　刘万进印

（选自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

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公函

二十年第31号

径启者本月二十六日准

民国廿年六月廿九日到科

东北宪兵司令部公函内开兹据本部特务密报略称中国共产党祸国阴谋无孔不入愈趋愈奇共党附设之革命互济会及济难会与各地共党干部组织并行发展为共党伤亡失业及坐狱党员惟一之救济机关该互济会等近已遵从同际互济会济难会命令更张组织近更悯不畏法倡（监狱是革命战士休养所）之谬论并通过关于监狱内部革命团体组织的决议案此等决议案之最大阴谋即共党将有计划的组织探望队慰问队以种种之奸狡方法与在狱中共党以金钱上之救济及政治消息之傅报并慰问救济共囚之家属其在监狱内之活动首在发动斗争其斗争之方式或消极绝食要求改良待遇或积极示威以至越狱前者山东法院共犯之越狱暴动及最近津沪法院在押共犯之消极绝食皆一贯之共党监狱内工作计划之演奏苟不严加防范至堪忧虑云云除密报

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外相应函请查照并请饬各地方法院一体严防是为至盼等因准此除迳电东北各新监狱一体严防外相应函请

贵处查照转饬所属一体严防为荷此致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

中华民国二十年六月廿七日

校对、监印　阎龙田

（摘自辽宁省档案馆辽革档案第135号卷1～2页）

辽宁高等审判厅关于对刘伯刚不予大赦的批示

刘伯刚系未依共产党人自首法自首之共产党人又无政治犯大赦条例第八条之情形自不在赦免之列毋庸交会审核

辽宁高等审判厅印

1931年7月8日

（摘自辽宁省档案馆辽革档案94号卷）

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张贯一的起诉书

被告张贯一

右（上）开被告因反革命嫌疑一案经本处侦察终结认为应行起诉兹叙述犯罪事实及起诉理由如左（下）

缘已决犯王振祥在抚顺古城子炭矿雇工加入逸犯关世荣在该处所组织之共产党支部受关世荣之委托宣传共产主义被告于本年阴历七月间由山东曹县持有张若立之介绍信函前来抚顺与王振祥计议以该处炭矿工人为中心极力劝诱入党并谓加入工会可以增加工资短缩工作时间倘资本家不应要求即以暴动罢工手段冀达其目的王振祥等已于7月26日为第一次之宣传自该被告来抚计议后拟

于9月7日依上开方法作第二次之宣传至8月30日王振祥等被该处日警捕获后当在福合客栈将被告拿获并搜出信函及共产党书籍与红旗报等物除王振祥等业已送案经侦查起诉判决确定外又据日警将被告引渡归案侦讯该被告虽不承认有意图宣传共产主义情事但查该被告即持有张若立致王振祥之介绍信函又经日警在该被告身旁搜出共产党书籍及红旗报六张并经查明该被告拟于9月7日为第二次之宣传未便任其狡展应即起诉

所犯法条

依右（上）事实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之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送付公判并请将起获之违禁书籍及红旗报等物依法没收此致

辽宁高等法院刑事庭

计送卷五宗红旗报六张药面半盒茶盒一个（无盖）书籍三册

被告张贯一一名在押

辽宁高等法院检查处检查官

陈士杰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敌伪报载资料

“侦获党犯始末志”[①]

驻长春宪兵分所前十数日奉吉林督办公署密令有南军派来党员宣传共产主义担任吉林省之干部隐寓于长春饬严密查拿等情该所奉令后于本月二日午后三时余侦察明确随通知警察照会日警署由附属地三条通四十二番地楼上查获韩守本年约二十岁左右赵尚志年十八岁均南省人尚在其住室搜出党印一颗其文曰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之印党书十数本印刷品宣传单来往信件报告书各种宣传单选举票多种当即带所嗣经孙道尹审讯韩为宣传部长兼秘书赵为青年部长兼庶务其内容分为八大部其名称为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公民部商民部农民部女子部外交部实系受委东来宣传共产主义不讳并供出嫌疑犯谢会樵乃本埠中华书局主任又黄子元亦在中华书局居住者当晚亦经警察逮捕拘禁惟韩赵二犯证据确凿供无隐饬于今（四日）午前经宪兵张所长派〇（原字不清——编者注）副官同宪兵该二犯解送省垣以凭究办云

---

① 摘自1927年3月8日《盛京时报》。

“共产党员第二次公审”①

共产党第二次公审旁听席仍患人满
被告陈述极为怯弱

共产党事件第二回公审二十一日早八点在大连法院刑事部第一号法庭继续开庭今天不见一个女性但旁听席仍旧人满住了一会安住庭长那种老练中略带一点温情味的审理开始了迟文诚刘林秀邹继升裴德亮被告五名异口同音的供称我们工人像牛马似的被酷使却吃不饱就因为被资本家剥削去了所以为了打倒资本家提高工资才入的党并絮烦地陈叙贫困的生活状况经廷谈然的结束紧接着审问邓鹤皋的助手致力于组织大连共青团（共产党的别动队）百名的组织者魏长魁自大正十一年加入国民党以来与增智学校教师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主笔互通声气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后来邓鹤皋（化名陈友俊）带着国民党的介绍信见了他便开始了战斗的活动发展了约二十名团员上述事实都是他自己侃侃而谈的但当问到党员逮捕状况时他说我虽然第一次被捕但对于党的状况至死也不能供出一个字这种决定永矢弗渝致被庭长所申斥而带下

石华源　朱长德　林春生　宫相承等很顺利地审问承认事实后庭长令大家一同起立就工人之友大连工人及其他证据文件让他们承认被告律师也没有意见审判就在这样的光景中闭庭

① 摘自1927年9月21日《大连新闻》日文翻译稿。

全部党犯廿九名十日晨一律解部[1]

由侦缉处先后捕获之反帝大同盟党员，共计三十三名（前〇志三十六名）拘捕后统押在西公园后身之侦缉处内，日前雷恒成处长业将刘陆晨、袁效之、王绍棠、崔国政等四名实情清结。曾于六日转押于宪兵司令部，就中崔国政一名，因讯与党犯无关，即于六日晚释放，其余三名，仍押部候讯，在侦缉处拘押之全部党廿九名，兹悉经雷处长将案由一一清结，即于十日午前九时，由该处雇大车七辆，将全体党犯捆载，一律解至城内宪兵司令部拘押候办，沿途经过小西边门、经电车路入大西城门，由武装侦缉员及卫兵三十余名，护送至部，据闻此公部党犯送部后，即将由陈兴亚司令，请示张司令长官核办，至是或枪决，或惩役，或释放，日内即当明令发表完案云。

---

①摘自1930年5月11日《盛京时报》

抚顺日警破获大批共党[1]

昨年十一月间，抚顺破获大批共产党员一案，为搜查上之关系，令禁登报，直至今二十日，搜查告一段落，乃即弛禁公表。查其经过情形中国共产党抚顺特别支部，曾于民国十八年八月卅日为日警察当局所检举，党员十一人均被逮捕，一时共党似已绝迹。嗣后该共党残余分子，似再组织共产党部。自民国十九年四月以来前后二次发生撒布不稳传单等事件，当局乃鉴及此极力严探共产党之所在。直至八月初旬，探知有赤色工会之秘密存在。惟该党行动，颇极巧妙，一时难以发现。嗣后当局注心搜查，警戒抚顺站时，有一举动不沈（审）之某华人下车，乃派员追踪监视。该华人每日昼间视查各采炭所，然至夜则数人相集密谈，其北（应为“此”——编者注）举动多有客（应为“可”——编者注）疑之点。直至十一月十一日晨，该华人乘车离抚西行，尾行追踪之，警察员俟车到深井子站，带华人到派出所询问。该华人缄口不发一言，惟依该人帽子中所隐匿之书类及态度服装等，多有本部有力共产党员之嫌疑，乃押送本署严重审问，结果判明抚顺特别支部所在，即夜八时围绕该支部逮捕特派员李德禄、书记兼联络员赵金山及党员赵金发三名，并押收多数证据物件，依此证据物件发觉各党员之所在，于是当局不移时间派员逮捕特别支部委员李贺年以下党员十四人；翌十六日，再逮捕五人。

兹录被逮捕之该党员姓名如下：

---

① 摘自1931年3月21日《盛京时报》。

陈子真、赵金山、李德禄、李贺年、刘荣芝、杨德恩、张安邦、张喜善、王书琴、冠集云、马德水、薛敬斋、曹玉发、李开亭、张全发、赵守漢、葛海鸣、安贺臣、张龙飞、魏同兴、姜玉起、曹继升、韩万顺

“大胆的杨一辰”①

铃木领警高等主任和山本次席（主任次席都是职务）对于本事件的调查情况作了如下的谈话

本事件在短时间内逮捕完毕弄清事件真象不能忘记主包含了本溪湖署和我们的巨大苦心在审问共产党员的时候最初一般害怕处分和暴露内情极力否认事实随着各关系者被捕加上几乎所有党员都年少意志比较起来可很巩固又渴望减轻罪责甚至于被释放所以慢慢大量地供出事实使得审问调查比较顺利

满洲国方面所逮捕的党特委书记杨一辰（刘孟平）是当地共产党的最高干部即使死也不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如果出卖了党的内容就会使党遭到根本的破坏过去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因此为了主义就是被判死刑也心甘情愿他对于机要事项守口如瓶实在是胆大包天

① 摘自昭和8年(1933年)10月22日《奉天每日新闻》日文翻译稿。

东北地区敌伪监狱简介

林凤山　王得田

沈阳监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前，在沈阳市沈河区小南门里西顺城街有三所监狱。在一个高墙大院里分南北两院：南院称盛京刑部衙门监狱（简称刑部大狱），北院称奉天府监狱和承德县监狱。这三级监狱，开办最早的是盛京刑部衙门监狱，始建于1632年（天聪六年）。承德县监狱始建于1667年（康熙六年）。奉天府监狱始建于1668年（康熙七年）。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盛京刑部衙门监狱撤销。同年9月在刑部大狱之侧，建立奉天省城罪犯习艺所，隶属奉天提法司。收押省城各级审判厅及其他衙署已经判决的军流徒以下犯人。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拆毁北院的奉天府、承德县两监，7月始建奉天模范监狱。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奉天模范监狱建成，隶属奉天提法司。模范监狱与旧式监狱不同，除官舍外，设杂居监、分居监、假留监、女监和病监。有楼房两座，并附高亭一座，园亭二座，瞭望亭四座，工场四区，运动场四区，水井三口。共有大小监房130余间，可容400余名犯人。全监犯人除官犯、死罪立决人犯和未决之重犯外，一律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

1912年（民国元年），在沈河区小南门里有两所监狱，分南北两院：北院是奉天模范监狱，南院是奉天习艺所。

1913年（民国2年）7月，奉天模范监狱改称沈阳监狱。奉天省城罪犯习艺所改称沈阳分监。12月沈阳分监并入沈阳监狱。至此，小南门里西顺城街的监狱合为一体，占地面积73,218平方米。1917年（民国6年）1月，沈阳监狱改称奉天第一监狱。

1929年（民国18年）4月，奉天第一监狱改称辽宁第一监狱，隶属辽宁高等检查厅。监舍有杂居监、分居监、未决监、女监、病监、幼年监和囚人浴室。全监共有监房235间，可容犯人1279名。

1932年（伪满洲国大同元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伪政府将民国时期的辽宁第一监狱改称奉天第一监狱。隶属伪满洲国司法部行刑司。

1937年（伪满洲国康德4年）12月，日伪政府在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二段四号开办奉天第二监狱，占地面积143,105平方米。隶属伪满洲国司法部行刑司，为外国人犯拘禁之地。

1943年（伪满洲国康德10年）奉天第一监狱改称奉天第一刑务署，奉天第二监狱改称奉天第二刑务署，均隶属伪司法部矫正总局。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沈阳的两所监狱仍沿袭日伪时期的奉天第一、第二刑务署名称。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军队占据沈阳后，将奉天第一刑务署改称辽宁第一监狱，隶属辽宁高等法院。奉天第二刑务署被东北保安司令部军人监狱接管并改称辽宁第二监狱。1947年9月1日，军队从监狱全部撤出，该监改属辽宁高等法院。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辽宁第一、第二监狱被我人民政府接收。原辽宁第一监狱旧址现为辽宁精密仪器厂，原辽宁第二监狱旧址现为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所在地。

（摘自《沈阳监狱志》）

沈阳检察厅看守所

沈阳检察厅看守所俗称"北未决"。在小南门里西顺城街，奉天第一监狱北墙之外与监狱有一小门可通。这个看守所旧中国（1927年以前）是奉天第一监狱"未决监"，1928年东北易帜后划归沈阳法院做未决犯的看守所。"九一八"后伪满时改为沈阳检察厅看守所。

这个看守所是一个十字监，有中央大厅（30平方米）设中心岗，围绕中心岗作辐射状，建成四条各有十个监房的号筒。向左旋排列标名为孝、悌、忠、信号筒，每个号筒分为十个监房。正常关押近200多人犯。

看守所内分为重刑监、死刑待决监、未决监。在东北角另设一个小院为病监。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用这个地方来关押我军被俘人员。

抚顺监狱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5月，兴仁县（现新宾）改为抚顺县。县署移驻抚顺城，隶属奉天府管辖。当时地方上的一般案件均由原设在塔尔峪的奉天省第二初级审判厅掌理。这是抚顺司法工作之始。

1909年（清宣统元年）12月，为便利管理，又复设抚顺地方审判厅于千金寨。因新设又系初级审判，案件简单，人犯也不多，当时租用民房办公。在审判厅院内西南角有四间民房做看守所，此看守所即是抚顺县属监狱的前身。

1913年（民国2年），抚顺地方初级审判厅奉令裁撤，地方司法案件划归县知事兼理，审判厅之看守所相应归县，由县署设

司法科具体管理。

1916年（民国5年）4月1日，旧看守所改建为抚顺县监狱。抚顺县监狱坐落在千金寨县署街西首，坐北朝南。县监狱西邻为抚顺县教养工厂，系1920年（民国9年）经县陶知事募款建筑，经厂长金殿阁监修，1921年9月落成。教养工厂内的在押者有：已判决的轻刑犯，违反清乡条款轻微犯，无业之游手青年其父兄自愿送厂习艺者。创始之目的为：清乡、教养游民、以清盗源。建后不久，因罪犯与无业青年混押，于法理诸多不合，故奉天省高等检察厅于1923年（民国12年）8月训令，以“监外执行刑罚不宜”为由，将教养工厂归并给监狱。添修监房围墙、中央岗，改设新监，归属奉天省高等检查厅。按全省统一排列，为奉天省第十五监狱。

1928年（民国17年），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奉天省第十五监狱奉省政府统一指令改称为辽宁省第十五监狱，隶属辽宁省高等法院检察处。1930年底至1931年初，中共满洲省委职委书记林仲丹（张浩）、及中共抚顺县委书记张干民（赵文栋）等共产党人及一些进步群众曾在此关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抚顺沦陷为殖民地，辽宁省第十五监狱，被伪满洲国司法部接管。狱内附设有伪警察局的看守所。

日本侵占抚顺之后，决定在千金寨开发露天矿。日本人采取各种强制手段将整个千金寨搬到新抚顺。第十五监狱地处开采中心区，经伪司法部决定拨款366000元（伪满币），强征抚顺城西边一片菜地为新监地址。于1934年（康德3年）开始修建监舍至1935年峻工，随即改名为抚顺监狱。

1943年，抚顺监狱改名为抚顺刑务署。在监管方面，除高墙电网外，实行轻刑犯外役劳动，重刑犯严密监视或不参加劳动的管理办法。设立单独关押号和刑讯室，还配有枪百余支，囚车、

摩托车、汽车七台。同时对犯人进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内容的奴化教育和伪善的“导之以德”的教育，加之倒吊、灌凉水、鞭抽、戴防声器等惨无人道的刑罚。每人每天只给五两粮食吃，生活卫生条件极为低下。因而被折磨致死及患病死亡者屡见不鲜。嗣后，将尸体送到高尔山上浅埋，许多尸体被狗吃掉，残忍已极。

抚顺刑务署在日伪统治时期关押的犯人中，政治犯约占20%左右，其中有从关内河北省等地转押来的八路军战士和抗日游击队员；有从哈尔滨、桓仁等地捕来的抗日联军战士；有反满抗日的“思想犯”；还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我党被捕同志和被关押的爱国志士，在监狱内与敌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

1945年9月份，苏军进入抚顺。抚顺刑务署两层楼的办公室和160余间平房保持完好。不久，东北人民自治军谢团长带领抚顺县公安局长郭占忠接收了抚顺刑务署。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抚顺后，将抚顺刑务署改称抚顺监狱，收押抚顺、本溪两地的已决犯和部分抚顺地方法院的未决犯。

1948年10月31日抚顺解放。抚顺监狱被我人民政府接收，现址为辽宁省抚顺监狱。

（摘自《抚顺监狱志》）

安东监狱

1876年（光绪二年）清政府置安东县。1881年（光绪七年）3月，在今丹东市元宝区金汤街40号修建衙署和监狱。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7月被大水冲失殆尽，后在今元宝区县前街56号重新建衙署和监狱。

1917年（民国6年）1月16日，奉天高等检察厅筹建新式监

狱，并按成立顺序，安东监狱改称奉天第七监狱，属奉天高等审判厅和奉天高等检察厅直接辖管。

1919年（民国8年）4月，在丹东市东坎子（现丹东劳改支队处）建筑新监。同年12月全部竣工，共建杂居间40间，每间容6人，可容240人犯，1922年9月迁入。1923年（民国12年）又增修监房30间，并增修看守所12间，病监4间，女监4间，工场20余间，总共70余间，总容418人。监狱设10个作业科供犯人服役，有织袜科、缝纫科、靴鞋科、豆腐科、建筑科、织布科、窑业科、印刷科、碾米科、营缮科。

1929年（民国18年），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奉天第七监狱改称辽宁第七监狱。当时在押人犯327 人，其中男犯317 人、女犯10人。

1932年，伪满当局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辽宁第七监狱随之改称奉天第七监狱，并增建了监舍，加高了围墙，共可羁押1760多人。

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12月，伪满政权划东北为14个省，安东划为安东省。1935年（伪满康德2年），奉天第七监狱随省改称安东监狱。辖五个分监：岫岩分监、宽甸分监、桓仁分监、庄河分监、凤城分监。

1935年，安东监狱（本监）入监男犯1614人、女犯68人，年末统计男犯596人，女犯5人。该监狱对政治犯设有特种监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实行独居一个监号、分别关押。1943年（伪康德10年）5月，伪满司法行政部，将安东监狱改称安东刑务署，隶属矫正总局。安东刑务署下辖五个支署，即岫岩支署、宽甸支署、桓仁支署、庄河支署、凤城支署。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同年11月2日，由山东胶东八路军吕其恩、孙己泰派警卫队鲁敏（尉达夫）等人接收了安东刑务署。1946年1月15日，安东刑务署改称安东省公安局第二看守所。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安东市人民政府被迫撤出。

看守所对一般犯人教育释放，将战犯、国民党特务、先遣军等重要犯人带至宽甸夹皮沟、临江等地羁押。

国民党占领时期，将安东监狱改称安东省安东第一监狱。1947年6月，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安东省安东第一监狱被我人民政府接收。现址为丹东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丹东劳改支队张华寿供稿）

旅顺刑务所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元宝房，有一处红砖高墙包围着的建筑群，那就是当年被人们诅咒为“有进无出的阎王殿”——旅顺日俄监狱。

1898年，沙俄强行“租借”旅大后，为大肆囚禁和屠杀中国人民，经沙皇批准于1902年开始在旅顺元宝房强占大片耕地，修建一座规模较大的监狱。后因“日俄战争”爆发，监狱修建工程被迫停工，当时已建成监狱前楼和85间牢房。

日本统治旅大初期，便着手扩建沙俄尚未峻工的旅顺监狱，并于1907年将“关东都督府监狱署”设在这里。1920年改成“关东厅监狱”，1926年又改为“关东厅刑务所”。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在长春设立关东局，直接控制这座监狱，遂于1934年更名为“关东刑务所”。直到1939年监狱才最后定名为“旅顺刑务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监狱被苏军接管，后来移交给我军。

当年这座法西斯监狱，阴森恐怖，戒备森严，周围是4米高、725米长的围墙，院内有牢房253间，同时可以关押2000多人。地下室设暗牢4间，后院有病牢18间。房与房的汇合处设有看守台和刑室，监狱东北角设秘密杀人场“绞刑室”。另外，围墙内还有服役用的机械、木工、铁工、印刷、纺线、织布、被服

等厂房15座，库房4座。围墙外还有大片“刑用地”，包括服役用的窑地、林场、菜地和看守住宅区。整个监狱占地面积约有22.6万平方米，是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较大的一座监狱。

在日本驻伪满大使直接控制下，狱中设所长（早期叫典狱长）。组织机构包括庶务系、戒护系、教务系、作业系、用度系、会计系和医务系等七个系（课）。各系设系长、部长、看守和雇员。狱中管理人员共有120多人，除少数朝鲜人，大都是日本人，也有部分中国人充当押丁、翻译、使役和车夫。

阴森森的牢房，是吞噬中国人的虎口，在每间长5.6米，宽2.7米，面积仅15平方米的牢房里，关押七八个人，里面放着食具，水桶和便桶。夏季牢房闷热，空气混浊，里面有马桶的臭味，东西霉烂的气味，加上虱子咬、蚊子叮，令人难忍。冬天寒风刺骨，牢房里没有取暖设备，墙上结满冰霜，被子又薄又短，铺在地板上的是一条不足二尺宽的薄褥子，夜里根本无法入睡。每间牢房墙上贴着一张中、朝、日三国文字的“狱规”，规定在牢房里不准说话，不准倚墙，不准对面，不准向外张望和走动。如违反“狱规”，就要遭到看守的毒打。牢房门旁有一个送饭用的方形孔。看守按照被关押者的表现和劳动强度，把饭量分成七等，一等量多，七等量最少，每顿仅一两高粱米饭，菜是萝卜叶加咸盐水。由于缺乏营养，许多人面黄肌瘦，一旦瘟疫流行，便被夺去了生命。

在这里被关押的“犯人”们忍着饥饿，每天还要在看守的棍棒和皮鞭的威逼下，到监狱内设的工厂、窑场、菜地连续服十几个小时的劳役。厂（场）房里专门设有监视台，一旦发现谁不遵守他们的规定或没完成规定的劳动数量，看守便把囚号记下来，收工后就以“怠工”为名进行惩罚。

凡是“犯人”服苦役，每天早晨要强令过“检身室”，“犯人”们把这叫做“鬼门关”。不论春夏秋冬，过“鬼门关”时都

必须把身上的衣服脱个净光，然后走到检身室中间的木杠前，举起双手，口里用日语喊着自己“囚号”，抬腿跨过木杠，然后走到检身室的另一头，换上另一套囚衣再到监狱工厂里做苦工。收工回牢房时，用同样方式再通过一次“鬼门关”。特别是冬季，年老体弱者往往被折磨成病，甚至含恨而死去。

在监狱菜地服役时，“犯人”们两人抬土抬粪时要被用铁链拴在一起。单人则在脚镣后面拴上一个22斤重的大铁球（“犯人”管它叫“坠铁”）防止逃跑。

在北墙外窑场服役是最苦的劳役，那里每天有近百人制坯、烧砖。抬砖时两人腰部被用铁链拴在一起，每次抬100多块砖，肩被木杠压得流血化脓。如果昏倒，看守就以“怠工”为由抡起镐把毒打一顿，爬起来还得照常服役。

据日本战犯田子仁郎供称，他在1944年至1945年任旅顺刑务所长时，仅一年多时间就通过服役共榨取日币53万多元，而被摧残致死者竟有百余名。

狱中严刑酷罚名目繁多，最常见的是罚饭和“笞刑”。罚饭就是将所谓违反“狱规”的人的饭量减少1／3，时间是三天或一周，还得照常服劳役。“笞刑”是由看守把受刑人带到一个三角形的刑讯室里，剥光衣服，把四肢捆绑在“火”字形的老虎凳上，然后用灌铅的竹条抽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方肯罢休。拖回牢房后，有的受刑者伤口腐烂化脓，甚至生蛆，有的过几天还得被打第二次。对所谓“严重违反狱规”的人，在遭受毒打之后，腰部要捆上特制的刑具皮铐子，把两支手腕固定起来，然后关进地下室漆黑窄小的暗牢里。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加之阴暗潮湿，往往造成伤残甚至死亡。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法西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于1934年在狱中设置了秘密杀人场——绞刑室。这是一座单独的二层小楼房。二楼上设有绞刑架，上面挂着三条绞索，绞索下面设一块自

动翻板。当把绞索套到“犯人”的脖子上时，看守搬动手阀，翻板立即翻下去，“犯人”便被吊在空中绞死。然后将尸体顺着翻板洞放到一楼，塞进事先准备好的木桶里，钉上桶盖，抬到监狱东侧马营后埋掉。几乎每天都有几具甚至十几具尸体被埋在那里。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旅大的后期，因那里已埋满了“犯人”的尸骨，无法再埋了，他们便把尸体埋进沟里，任凭野狗将尸体扒出，撕扯得七零八碎，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多少年来，被绞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无法计算。仅从1942年到1945年8月间，就有700余具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尸体被埋在这里。

大连地下党的组织从1927年至1937年的11年间，曾数次遭到到敌人严重破坏，先后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被逮捕判刑在这里关押。

1945年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中华民族在艰苦的抗争中见到了胜利的曙光。日本侵略者也感到了末日来临，于是在狱中开始进行秘密大屠杀。装人木桶改成活底，把尸体扔进坑里，木桶抬回来继续使用。刑务所长田子仁郎还亲自指挥看守，销毁档案，妄图灭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8月16日，刑务所长田子仁郎还指挥看守在绞刑室秘密绞杀了共产党员刘逢川、何汉清等五人。

昔日的法西斯监狱，如今已变成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它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将向今天，向未来诉说中华民族苦难而又英勇的过去。

（周祥令供稿）

吉林监狱

吉林监狱始建于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隶属吉林将军

衙门。此为吉林设狱之始，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1742年、1755年、1757年迭次修葺，1792年监狱发生火灾，围墙改用砖石。

监狱“改良”始于清末。1905年，创建吉林罪犯习艺所。从1906年起，吉林罪犯习艺所归吉林省知府管辖。1907年7月，因监狱改建之时被烧，又于同年9月，在吉林市巴尔虎门内满洲正旗官地一区新建吉林省监狱一所（即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收容所和劳教所现址），于次年10月竣工。新建的省狱布局较旧狱复杂，男女分押，设有讯问庭、搜检室、屏禁室、教诲室、罪犯家属接见室等，并设有工厂和种植地。1909年，更名为吉林模范监狱。1911年，监狱再次被大火烧毁，则又建筑新监狱，1912年建成，改称吉林监狱。1915年因犯人发生炸狱，监狱第三次遭焚。后又重建，1917年1月竣工。新建后的监狱改称吉林第一监狱及吉林陆军监狱。监狱建筑形式为东西扇面监两处，设杂居间108间，独居间56间，东西两监均设瞭望楼和教诲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监狱成了日本侵略者血腥迫害革命者和中国人民的场所。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将吉林监狱改称吉林第二监狱。隶属吉林省高等法院。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吉林第二监狱为我人民政府接收。1958年监狱迁至吉林市西部黄旗屯。现称吉林省吉林监狱，隶属吉林省司法厅。

（根据吉林省司法厅劳改局史志办及吉林监狱史志办提供材料整理）

长春监狱

1800年（清嘉庆五年）长春开始设治，在新立城设长春厅，同时设厅监（监狱），地址在今长春市郊区永春乡。

1825年（道光五年）长春厅监狱移建于西四道街。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长春厅升为长春府，厅监改为府监。1915年（民国4年）长春监狱隶属长春县。1917年（民国6年）改称吉林省第二监狱及陆军监狱。

1922年，吉林省第二监狱改称吉林第二监狱所。

1929年，在长春长通路清真寺北新建一所监狱，定名为吉林省第二监狱（今长春监狱现址）。1932年伪满当局将在长春县西四道街的监狱改称为新京监狱，隶属伪满司法部行刑司监狱科。

1934年，伪满当局将在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北的监狱改称新京地方检查厅看守所。

1938年4月，新京地方检查厅看守所改名为新京监狱。原新京监狱改称新京分监。新京监狱下辖新京、榆树、九台、扶余、农安、伊通、公主岭等七处分监。

1943年，新京监狱改称新京刑务署，所辖七处分监改称刑务支署，隶属于伪司法部矫正总局。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将伪满的新京刑务署改称为吉林第一监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所监狱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在这里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达千余人。其中许多人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国民党占领时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刑种之多，恐怖之甚，手段之恶毒阴险，却有甚于日寇。大批的所谓政治犯——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和无辜的群众，在这里惨遭摧残杀害。解放初期，在监狱院内西角一处地下就发现五具并排用铁丝捆绑带着脚镣的尸体。

1948年10月20日，长春解放后，长春监狱为我人民政府接收，至今仍称长春监狱，现隶属吉林省司法厅。

根据吉林省司法厅劳改局史志办及长春监狱史志办提供整理

长春监狱几种刑具及“极刑楼”

常用的几种刑具

上大挂

上大挂分两种：

一种是把受刑者的两只胳膊倒背身后，用绳子绑起来，然后头朝下吊在半空中，加之鞭抽、棒打，来回游荡。

另一种是，把受刑者的双手或双手大姆指用绳子绑上吊起来，然后毒打。

压杠子

压杠子就是让受刑人跪在地上，把一根木杠子放在他的小腿肚子上，然后由两个人在两边踩压，有时还要加人。受刑者往往腿肚子被压开花，腿骨骨折。

灌凉水

灌凉水就是把受刑人绑在一个特制的凳子上，用湿毛巾蒙在脸部，然后往湿毛巾上倒水，水便从鼻孔，嘴流入腹中，受刑者轻者被灌得肚子鼓胀，重者会被灌得七窍流血、休克直至死亡。

过电

过电就是把电话机的电线绑在受刑人身上，行刑人一摇电话机摇把，受刑人的全身就通上了电流，把人电得神经错乱，全身极度抽搐，难以忍受。

针刺

针刺就是用钢针或竹签子刺受刑人的指甲缝，十指连心，疼痛过度往往使人休克，不省人事。

烧烙

烧烙就是把烧红的铁烙铁往赤身露体的受刑人身上烧烙。烙得受刑人血肉焦化，剧痛异常，往往被烙几次就会致死。

坐老虎凳

坐老虎凳就是让受刑人坐在特制的凳子上，绑上双腿，在脚后跟下垫砖，每垫一块砖，大腿筋就被拉长一节，垫到三块砖时，由于剧烈的疼痛，受刑者往往就会昏厥休克。

“极刑楼”

“极刑楼”是1937年长春监狱专门建造的一座实行绞刑的房屋。

它是一座半地下砖瓦结构的独立房屋。室内是水泥地面和阶梯，中间用木板隔成上下两层。上层设有绞刑架。绞刑架由绳索、翻板和翻板插销组成。敌人杀人时将戴着手铐、脚镣，蒙着眼睛的被害人押到楼上，让其坐在绞刑架的翻板上，在脖子上勒上绳索，然后执刑人拔出翻板插销，翻板脱落，人即坠下被杀害。坠入下层的尸体被送入停尸房，扒光衣服，再集中用汽车运到郊外掩埋。从1937年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9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座“极刑楼”里残酷的杀害了大批的共产党人和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

（根据长春监狱提供材料整理）

吉林省延吉监狱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始建延吉厅治，设立厅监。

1909年（清宣统元年）延吉改为府治，设府监。

1913年（民国2年）延吉改为县治，设县监。地址在今延吉市河南街，为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四个县的犯人行刑机关。民国初，每年押犯人数在200人以上。1923年4月（民国12年）延吉监狱动工增修，翌年10月增修完工。

1931年延吉监狱改称吉林第四监狱，是年在押犯人为610人（其中男犯590人，女犯20人）。

1934年伪满洲国政府把延吉划入间岛省，改称吉林第四监狱为延吉监狱，主要关押朝鲜族犯人和抗日爱国人士。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苏联红军进驻延吉，由延吉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接管了延吉监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吉市划归吉林省。延吉监狱隶属吉林省公安厅。1983年改由吉林省司法厅主管至今。

（根据吉林省司法厅劳改局史志办提供材料整理）

哈尔滨道里监狱

哈尔滨道里监狱，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北头路西警察街（现友谊路）拐角，狱门向北，四面围有高墙，墙上设有岗楼和电网，戒备森严。监狱总面积约有10000平方米，呈枪把形。

这所监狱是1901年沙皇俄国政府修筑中东路期间，出于殖民政策的需要而建立的。当时主要是收押俄、华员工因刑事案件待审人犯和已决服刑犯人。这是我国东北地区沦为沙俄殖民地的标志，是中国人民丧失主权的国耻见证。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20年中国政府收回司法权，接管了道里俄国监狱。划归东省特别区管辖，改称东省特别区监狱。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改称哈尔滨监狱道里分监。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为国民党政府接收。1946年4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滨市，接管了道里监狱，改称哈尔滨市监狱。1967年末，由道里区中央大街迁驻哈尔滨市香坊区东门街一号，现称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隶属黑龙江省司法厅。

这所监狱，伪满时期经常押有犯人2000人左右。犯人们在这里受到的是非人道的生活待遇和名目繁多的残酷刑罚。吃的是每

顿一小碗红高粱米饭加点咸菜，每天吃不饱饭，还得连续劳动12个小时。“犯人”们一旦违犯了“狱规”就要受到刑罚。轻者带上手铐、脚镣，重者“蹲黑屋”或卧“逍遥自在床”。

所谓“蹲黑屋”就是把犯人关进又黑又潮的有1平方米左右的小牢房里，小牢房四面都没有窗户，透不进一点阳光，只在门的上中方两个碗口大小的圆铁板上扎一些小孔透进空气。每天只给一点点吃的，一蹲进去就是三五天，多者7天，时间长了有的竟被闷死。

“逍遥自在床”是用木头做的一种象床一样的刑具。四条腿上各有一个绳套。动刑时，把受刑人的手，脚捆绑在四个绳套上，“床”中间是空心。利用绳套做拉力，把受刑人悬空绷起来，在臀部下边放一个“马桶”可随时大小便。

此外监狱还设有绞刑架。

在这里曾经关押过许多共产党员和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他（她）们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

（根据黑龙江省司法厅劳改局史志办范世忠及哈尔滨监狱史志办提供材料整理）

哈尔滨道外监狱

哈尔滨道外监狱位于道外南新街路北，现十四道街145号。建于1917年，1919年开始使用。因当时道外为滨江县，归吉林省管辖。故称吉林省第三监狱，也称模范监狱。这是中国政府在哈尔滨市设监狱之始。

这所监狱原设计容纳400人，自1923年以后实际关押的犯人常在600—900人左右，最多达千人以上。起初，关押的大部分是刑事犯，1927年以后才开始关押政治犯。

监狱的最高领导是典狱长，下设若干科、股、所。监狱分前后两部，前部为办公室及宿舍、库房等；后部为监房及工场。东

北为炊场，东南为病监，西南为工场，前部西南隅为女监，东南隅为行刑场。监房系扇面形，分为五翼，定名为仁、义、礼、智、信五号。仁、信两号为分号监，各分40个监房。义、礼、智三号为杂居监，各分10个监房。除监房外，设有犯人作业场。监狱初期设有印刷、缝纫、木工、洗濯和织布等工场。1921年增设制米工场。1923年增设毛毯、糊盒、皮革、手套、油漆等工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这所监狱关押的政治犯通常在20人左右。

1932年（伪大同元年）伪满政权改吉林省第三监狱为哈尔滨监狱，隶属伪滨江省高等检察厅。下设道里、双城、阿城、宾县、一面坡、肇东、肇州、肇源八个分监。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疯狂的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反满抗日的爱国群众。为此，道外监狱关押的政治犯逐渐增多。最高时达百余人。

1938年，在我地下党领导下，以该监狱的政治犯为主组织过一次越狱暴动，但因计划不周，夺枪后把子弹拿错，无法自卫。宪兵、警察闻讯赶来，将监狱包围，只跑出 9 人（其中政治犯 3 人）。

1941年，因道外监狱年久失修，不堪使用，当局决定在香坊建立一所新监狱。1943年，新建监狱全部竣工，道外监狱停止使用，所有犯人全部迁往香坊新建监狱。

（根据范世忠及哈尔滨监狱史志办提供材料整理）

哈尔滨香坊监狱

哈尔滨香坊监狱是1941年由日本人设计修建的，也称哈尔滨监狱。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公滨路东门街。1943年改名哈尔滨刑务

署，归伪满司法矫正总局管辖。整个监狱从外观上看，象一座大工厂，高大的围墙环绕四周，8 米高的岗楼，戒备森严。院外有一栋二层的办公楼和围墙接近。监狱后院西50米有一栋二层楼为监房。西面是一排五个作业场，有木器、洋裁、木器油工、铁锹镐把、木材干燥等。工厂以对外加工为主，如关东军需要的办公桌椅和日本开拓团用的被服等，都由这里提供。

监狱最高领导是典狱长，下设文书科、会计科、作业科、医务科、需用科、监理科等。监理科是最大的一个科，下设戒护、教诲二个股，共约100人。从典狱长到各科长一般正职都由中国人担任，日本人任副职。但日本人却掌握实权。

这所监狱在押犯人常在2000人左右，其中政治犯约占20～30%，他们都是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反满抗日的爱国群众，也有国民党员。

1940年12月“三肇”事件中（“三肇”即肇州、肇源、肇东三县，由于这一地区1936年——1940年抗日活动极为活跃，日伪当局把这一地区划为“匪区”）日伪当局集中大批军警大搞白色恐怖达 4 个月之久，屠杀数千名抗联战士、爱国志士和无辜的百姓。其中有的农民只供抗联一顿饭，就被抓来判刑15年。还有一无辜农民，进城卖点粮食，被宪兵看见，以“经济犯”抓来坐牢。1943年，巴彦、木兰、东兴事件中，日本人抓来100多名农民，未经判刑就送到这所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判死刑的50多人，均死在这所监狱的南大墙边的五个绞刑架下。

1945年 8 月 9 日，苏军对日宣战，监狱受伪司法部命令，决定将全部政治犯枪毙。由于狱中政治犯的坚持斗争和大多数中国狱警的反对，这个残酷的屠杀计划没有得逞。8 月17日，苏军解放了哈尔滨、香坊监狱的政治犯全部被释放出来，许多人为维护哈尔滨治安和接收伪政权做出了贡献。

1946年 4 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将此地改做黑龙江省物资局

仓库。

（根据范世忠及哈尔滨监狱史志办提供材料整理）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狱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设立的能关押百余人的地下监狱。1907年设立于南岗车站街（现红军街）34号。1924年迁至南岗义州街27号(现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1936年迁至车站街原满铁哈尔滨事务所（现红军街60号）。属日本外务省警务系统管辖。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关押在这里的多是抗日的朝鲜革命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逮捕中国、朝鲜和苏联的革命人士。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当时被捕的团省委宣传部长扬波等20余人都被关押在这所地下室监狱里。后分别转押道里和道外监狱。这所地下监狱除了牢房外，还设有刑讯室和一个有火炉的烧烙具小屋。凡被逮捕的我地下党员、团员、抗联战士及反日爱国志士，都要被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如上大挂、压杠子、电刑、灌煤油，灌辣椒水、蜡烧、开水浇、滚钉笼、烙铁条、坐老虎凳、坐板钉、装在麻袋里摔、往指甲里钉竹签等。

1934年、1936年、1937年、1938年、1940年，日寇在东北实行的五次大逮捕中，哈尔滨及东北各地大批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被逮捕，判死刑杀害。日本驻哈总领事馆地下室监狱，是屠杀我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最多的魔窟之一。

1937年末，总领事馆特高系撤销，其所属监狱改为731部队（细菌工厂）监狱转运站。

1930年5月1日，在我党领导下，组织了一次捣毁日本驻哈总领事馆的活动。先由朝鲜青年35人带头，袭击领事馆，解救被监禁在狱中的同志。当局开了枪，但毫无作用，却被群众打得不

敢露面。朝鲜青年与其他群众一起又举行了游行，人数达千余人。

（范世忠供稿）

哈尔滨松花塾监狱

松花塾监狱是伪满日本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狱。它是一座俄式洋房，坐落在哈尔滨市友谊路50号。地下室有刑讯室、牢房、刑场。各种刑具俱全，刑罚多种多样。在这所监狱里、无数的共产党员，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残酷杀害。因此敌人为掩盖罪行，毁灭罪证，在1945年“八一五”前夕，将这座秘密监狱焚毁。

（范世忠供稿）

哈尔滨护路军司令部地牢

护路军司令部地牢，是沙俄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办公楼后院的一个钢筋水泥拱顶地下室。现地址是哈尔滨市南岗西大直街铁路卫校。当时是关押革命志士和爱国群众的一所秘密监狱。1920年10月为奉系军阀接管。

编 后 记

本编写组历时近5年，跋涉10万里，查找、翻阅了几百万字的敌伪档案和有关史料，采访了数以百计的有关革命前辈、当事人和知情者，多方求证、反复核实，终于完成了《铁窗丹心》的最后一篇文稿。

按说，我们应该轻松了。然而，我们却一点轻松的感觉也没有。这是因为：

《铁窗丹心》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当年曾经历过铁窗岁月的王鹤寿、赵毅敏、郭峰等革命前辈的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得到了东北三省及有关市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我们担心，限于编纂者的水平，可能会有负众望。我们还担心，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占有史料的局限，当年许多同志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同敌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和感人事迹，没能得到充分的表述。

编纂这本书，是为了昨天，更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如果这本书能在这方面产生某种积极作用，并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我们将感到无限欣慰。

在编纂过程中，考虑到一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变发展，是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的八年又八个月所容纳不了的，为了反映某些事件的始终，也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当时的历史全貌，故将本书收进的史料和文稿，从时间上向前延伸了四个月，向后推移了一年多。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许多单位的支持和协作。他们是：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近现代史革命博物馆、

辽宁省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沈阳市公安局、沈阳评剧院、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日俄监狱展览馆、抚顺市委党史研究室、抚顺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抚顺市矿务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抚顺监狱、丹东监狱、本溪市委党史研究室、辽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朝阳市委党史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延边革命博物馆、吉林省劳改局、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长春市档案馆、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延吉市委党史研究室、通化市委党史办、靖宇烈士陵园、吉林市博物馆、吉林监狱、长春监狱、黑龙江省劳改局、东北烈士纪念馆、黑龙江文史馆、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哈尔滨监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佳木斯市委党史研究室、舒兰矿务局等单位。

本书成稿后，我们先后在沈阳、抚顺、长春、哈尔滨等地专门征求了党史专家、学者的意见。金宇忠、罗占元、张广恩、安振泰、于纪源、尉长荣、曹林春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修改意见。

参加本书编纂的有贺玲、孙桂荣、金伟刚。

进行征集整理的还有王得田、孙文学、范震、王玉梅、李志民、高嵩、董娟秋、徐良、金国范等同志。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0年12月





铁窗丹心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中斗争纪实

ISBN 7-205-01804-8/K·193

定价：8.00元